



列宁选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选集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列 宁 选 集

(第二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
列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长 春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60年4月第1版 1972年10月第2版

1977年8月北京第7次印刷

书号 1001·882 每册 2.15 元

目 录

1908—1917 年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1-9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	10-11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	12-368
第一版序言	12
第二版序言	15
代绪论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 1908 年和某些唯心 主义者在 1710 年是怎样驳斥唯物主义的	16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认识论 (一)	34
一 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34
二 “世界要素的发现”	47
三 原则同格和“素朴实在论”	62
四 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	70
五 人是否用头脑思想?	83
六 关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唯我论	91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认识论 (二)	95
一 “自在之物”或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驳斥	95
二 论“超越”,或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学说的“修改”	104
三 费尔巴哈和约·狄慈根论自在之物	116

四	有没有客观真理?	121
五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或论波格丹诺夫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衷主义	130
六	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137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	
	认识论(三)	144
一	什么是物质? 什么是经验?	144
二	普列汉诺夫对“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	151
三	自然界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154
四	“思维经济原则”和“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170
五	空间和时间	176
六	自由和必然	189
第四章	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哲学	
	唯心主义者	196
一	从左边和从右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196
二	“经验符号论者”尤什凯维奇怎样嘲笑“经验批判主义者”切尔诺夫	207
三	内在论者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战友	212
四	经验批判主义往哪里发展?	221
五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	230
六	“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和对赫尔姆霍茨的批判	237
七	对杜林的两重批判	244
八	约·狄慈根为什么会为反动哲学家喜欢?	249
第五章	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256
一	现代物理学的危机	258
二	“物质消失了”	264
三	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可想象的吗?	272
四	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英国唯灵论	280

五	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德国唯心主义·····	289
六	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法国信仰主义·····	297
七	俄国的“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	306
八	“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和意义·····	309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20
一	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漫游·····	320
二	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328
三	关于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	337
四	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342
五	海克尔和马赫·····	353
	结论·····	364
	第四章第一节的补充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 批判康德主义的? ·····	366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369—374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	375—385
	革命的教训 ·····	386—391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	392—397
	一 ·····	392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	398—402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	403—415
	纪念赫尔岑 ·····	416—422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	423—428
	两种乌托邦 ·····	429—433
	欧仁·鲍狄埃 (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434—436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	437—440
	一 ·····	437

二	438
三	439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441—446
一	442
二	443
三	445
亚洲的觉醒	447—448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449—450
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 短评	451—456
几个争论问题 (公开党和马克思主义者)	457—480
一、1908年的决议	457
二、1910年的决议	461
三、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决议的态度	465
四、取消主义的阶级作用	468
五、“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	472
六	476
给阿·马·高尔基	481—484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485—506
一、论“派别性”	486
二、论分裂	490
三、论八月联盟的瓦解	495
四、一个调和派分子对“七人团”的忠告	498
五、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观点	501
论民族自决权	507—567
1. 什么是民族自决?	507
2. 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	512
3. 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	516

4. 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520
5. 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526
6. 挪威从瑞典的分离	536
7. 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	542
8. 空想的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546
9. 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	554
10. 结束语	563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568—574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摘录)	575—606
序言	575
马克思的学说	580
哲学唯物主义	580
辩证法	583
唯物主义历史观	584
阶级斗争	586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588
价值	589
剩余价值	590
资本积累	592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593
平均利润率	594
地租论	595
农业资本主义进化	596
社会主义	599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602
辩证法的要素(摘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607—608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609—613

第二国际的破产	614—665
一	615
二	619
三	624
四	630
五	634
六	640
七	648
八	657
九	662
社会主义与战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666—705
初版(国外版)序言	666
第二版序言	667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 1914—1915 年的战争	668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668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668
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	669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670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671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	673
比利时的例子	673
俄国为什么作战?	674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675
巴塞尔宣言	675
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676
第二国际的破产	677
社会沙文主义是到了顶的机会主义	678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	
结成联盟,分裂国际革命工人阶级	679
“考茨基主义”	680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681
战壕联欢的例子	682
秘密组织的意义	682
关于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	683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683
关于民族自决权	684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685
资产阶级和战争	685
工人阶级和战争	686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688
第三章 恢复国际	691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691
反对派的情况	69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696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史和现状	698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1894—1903年)	698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03—1908年)	699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	700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5年)	702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702
我们党的任务	705
论欧洲联邦口号	706—710
谈谈辩证法问题	711—715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纲	716—729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716

2. 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717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719
4. 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问题的革命提法·····	720
5. 民族问题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722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723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724
8. 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726
9.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 对自决的态度·····	727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论述·····	730—845
序言·····	730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732
(一)·····	732
(二)·····	732
(三)·····	734
(四)·····	735
(五)·····	736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739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753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768
四 资本输出·····	782
五 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788
六 列强分割世界·····	796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807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817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827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840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846—860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摘录)	861—870
7. 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	861
9. 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	869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871—882
一	871
二	874
三	877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883—898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899—918
第一篇(或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转变	899
第二篇(或第二章) 考茨基与屠拉梯的和平主义	903
第三篇(或第三章) 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	909
第四篇(或第四章) 十字路口的齐美尔瓦尔得	914
注释	919—983
人名索引	984—1005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官方教授按官方规定讲授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十九世纪四

十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四十年代末,在经济理论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¹的斗争。五十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在六十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在第一国际中清除了巴枯宁主义²。在七十年代初,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德国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在七十年代末,实证论者杜林也暂时显露过头角。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就是在蒲鲁东主义传统保持得最久的罗曼语各国,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是拿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基础的。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立刻而且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原因已经改变,但是斗争还是继续着。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因为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

了。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把全部土地收归地方公有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改”来代替他们那自成一派而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现在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³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哝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哝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⁴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

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①。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改”更广泛详细得多，他们竭力用“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们说，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完全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在危机已经更少见，更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下去的趋势，所以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他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⁵的观点来加以纠正。

在这些问题上对修正主义者进行的斗争，正象二十年前恩格斯同杜林的论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有了颇见成效的活跃。人们用事实和统计数字详细分析了修正主义者的论据，证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了。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比较不发达，而现代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别注意那些表明农业越来越卷入世界经济交换范围的农业特殊部门（有时甚至是特殊作业）。在自然经济的废墟上，小生产是靠饮食无限恶化，经常挨饿，延长工作时间，家畜质量及其饲养情况恶化，总之，

^① 见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合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这里不是分析这本书的地方，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实质上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谟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见本卷第12—368页。——编者注）

是靠手工业生产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维持的。科学和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没有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科学方面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不把这些事实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方面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他们不可避免地、有意或无意地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

在危机论和崩溃论的问题上，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是客观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统一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显著、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无论就每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来说，或者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崩溃来说都是如此。不久以前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全欧洲失业人数惊人的增加，更不用说已经有许多迹象出现的、快要到来的工业危机，——所有这些都使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论”被一切人忘记了，似乎连许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忘记了。但是这种知识分子

的不坚定性所给予工人阶级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

在价值理论的问题上要说明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维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绝对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掉，并且把《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成不正确的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问，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会消除阶级和阶级区分的，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预国家事务的权利。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议会制度并不能以此促使危机和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在这种政治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最高限度地尖锐化。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证明这种尖锐化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就同民族公敌，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起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谁不懂得议会制度

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个议会制度的基地上去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工作，去真正培养工人群众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这种“争执”。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改良派（立宪民主党⁶）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已经十分确凿地证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把努力斗争的人同最不能斗争、最动摇、最容易叛变的人联系在一起。法国的米勒兰主义⁷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它给修正主义作了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的实际评价。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每一个稍有见识、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丝毫不会怀疑：德国正统派和伯恩斯坦派的关系、法国盖得派和

饶勒斯派（现在尤其是布鲁斯派）⁸、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⁹、比利时勃鲁克尔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和改良派¹⁰、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现状来说，彼此有极不相同的民族条件和历史特点。现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现在实质上在世界各国都已经是按一条路线进行着，这表明比三四十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三四十年前在各个国家内相互斗争的并不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些同一性质的派别。而现在在罗曼语各国表现为“革命工团主义”¹¹的“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同时把它加以“修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开口闭口都说他们反对向来被人了解得不正确的马克思，而求助于现在被他们正确地了解了的马克思。

我们在这里不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区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区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生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诞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诞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免不了要重新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种情形当然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

生的时候还会继续存在，以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那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改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现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问题的实践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关键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写于1908年4月3日(15日)

以前

1908年载于《卡尔·马克思
(1818—1883)》文集

署名：弗拉·伊林

按文集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
第13—21页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¹²

1. 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如果不承认，那末他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分析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无数言论？

如果承认，那末为什么马赫主义者把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修正”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2. 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把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近代哲学中的休谟路线看作是介于两者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称这条路线为“不可知论”并说康德主义是不可知论的变种？

3. 报告人是否承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

4. 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断是正确的？

5. 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①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6. 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②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① 《反杜林论》（《Anti-Dühring》）1886年第2版第1编第4节《世界模式论》第28页¹³。

② 《反杜林论》1886年第2版第6节《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第45页¹⁴。

7. 报告人是否承认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等观念是自然界、现实世界的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或者恩格斯这样说^①是不正确的。

8. 报告人是否知道，马赫曾经表示他赞同内在论学派的首领舒佩的观点，甚至还把自己最后的一本主要哲学著作献给舒佩？马赫这样地附和僧侣主义的维护者、哲学上露骨的反动分子舒佩的露骨唯心主义哲学，报告人怎样解释？

9. 报告人的昨天的同志（根据《概论》^②）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今天宣称波格丹诺夫（随着拉赫美托夫）是唯心主义者，报告人为什么对这件“怪事”避而不谈？报告人是否知道，彼得楚尔特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认为马赫的许多门徒是唯心主义者？

10. 报告人是否确认马赫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是否确认列宁不止一次地反对过马赫主义？¹⁶是否确认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都是“纯粹的”经验批判主义者？

写于1908年5—6月

1925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3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4卷
第1—2页

① 《反杜林论》第3节《先验主义》第20—21页，第11节《自由和必然》第103—104页¹⁵。

② 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编者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¹⁷

第一版序言

许多想充当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今年在我们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举行了真正的讨伐。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第一本是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巴札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的论文集《关于〈？应当说是：反对〉^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其次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和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所有这些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别尔曼说，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巴札罗夫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好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看来被我们勇敢的战士驳倒了，他们自豪地引证着“现代认识论”，引证着“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引证着

^① 本选集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编者注

“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我们的这些消灭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们以所有这些所谓最新的学说为依据，竟肆无忌惮地谈起纯粹的信仰主义^①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最为明显，但决不只是他一个人！¹⁹），可是到了要明确地表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时，他们的全部勇气和对自已信念的一切敬意就立即消失了。在事实上，他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企图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企图用某一个唯物主义者来代替整个唯物主义，根本不去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唯物主义言论。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只有修正主义者由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敢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正统派在反对马克思的过时见解（例如梅林反对某些历史论点）时，总是把话说得非常明确、非常详细，从来没有人在这类论著中找到过一点模棱两可的地方。

不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中也有一句近似真理的话。那句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也许我们（显然就是《概论》的全体撰稿人）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第161页）这句话的前半句包含着绝对真理，后半句包含着相对真理，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中力求详尽地指出来。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如果我们的哲学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是用几个“进行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讲话，那末，他们对自己和对马克思主义就显得尊重些了。

① 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

至于我自己，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就是说，我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们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作者

1908年9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除了个别的文字上的修改，和第一版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是一本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可是我希望，它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介绍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至于波格丹诺夫的一些近作，我没有机会阅读，书末附载的涅夫斯基同志的文章²⁰提出了必要的意见。涅夫斯基同志不仅是一位宣传家，而且特别是一位党校工作者，因此，他有充分的可能确信，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²¹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

尼·列宁

1920年9月2日

代 绪 论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 1908 年 和某些唯心主义者在 1710 年 是怎样驳斥唯物主义的

凡是多少读过一些哲学著作的人都应该知道，未必能找到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驳斥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以及神学）教授。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全都在驳斥唯物主义，同时又装出一副样子，好象他们驳斥的本来只是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是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他们是根据“最新的”“现代的”实证论、自然科学等等来驳斥唯物主义的。我不引证他们的话了，谁只要愿意，都可以从前面提到的著作中引证几百段话。我只提一提巴札罗夫、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切尔诺夫^①以及其他马赫主义者用来攻击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马赫是现今最有名望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

^① 维·切尔诺夫《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作者象巴札罗夫之流一样，是阿芬那留斯的热诚的信徒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敌人。

这在哲学著作中是公认的^①；至于波格丹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同“纯粹的”马赫主义违背的地方则完全是次要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说明。

这些人对我们说，唯物主义者承认某种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自在之物”，即“经验之外”的、我们认识之外的物质。唯物主义者由于承认彼岸的、在“经验”和认识范围之外的某种东西，因而陷入了真正的神秘主义。当唯物主义者说什么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感觉的时候，他们是以“未知的东西”、“无”作为基础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声明我们的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泉源。唯物主义者陷入了“康德主义”（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他承认“自在之物”即在我们意识之外的物的存在），他们把世界“二重化”，宣扬“二元论”，因为他们认为在现象后面还有自在之物，在直接的感性材料后面还有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物神、“偶像”、绝对者、“形而上学”的泉源、宗教的孪生兄弟（如巴札罗夫所说的“神圣的物质”）。

这就是上述那些著作家用各种不同的调子一再重复的马赫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

为了考证这些论据是不是新颖的，它们是不是真的只反对一个“陷入康德主义”的俄国唯物主义者，我们来详细地引证一下一个老牌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著作。由于马赫主义者不正确地陈述了马赫和贝克莱的关系以及贝克莱的哲学路线的实质，而我们在后面又不得不屡次提到贝克莱及其哲学流派，所以在这篇绪论中作这种历史考证就更有必要了。

^① 见理查·赫尼格斯瓦尔德博士《休谟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学说》（*Dr. Richard Hönigswald. «Über die Lehre Hume's von der Realität der Aussendinge»*）1904年柏林版第26页。

1710年出版的贝克莱主教的一本以《人类知识原理》^①为书名的著作，开头就是下面这一段论述：“每个观察人类认识对象的人都看得清楚：这些对象或者是感官真正感知的观念(ideas)，或者是我们观察人心的情感和作用而获得的观念，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而形成的观念……凭着视觉，我获得光和色的观念，获得它们的强弱浓淡的观念。凭着触觉，我感知硬和软、热和冷、运动和阻力……嗅觉使我闻到气味，味觉使我尝到滋味，听觉使我听到声音……人们观察到各种不同的观念彼此结合在一起，于是就用一个名称来标志它们，认为它们是某一个物。例如，人们观察到一定的颜色、滋味、气味、形状、硬度结合在一起(to go together)，就承认这是一个单个的物，并用苹果这个词标志它；另外一些观念的集合(collections of ideas)构成了石头、树木、图书以及诸如此类的感性实物……”(第1节)

这就是贝克莱那本著作的第一节的内容。我们必须记住，贝克莱是把“硬、软、热、冷、颜色、滋味、气味”等等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的。在贝克莱看来，物是“观念的集合”，而他所说的“观念”正是上面列举的那些质或感觉，而不是抽象的思想。

贝克莱继续说道，除了这些“观念或认识对象”之外，还有一种感知它们的东西，即“心、精神、灵魂或自我”(第2节)。这位哲学家作出结论说，不言而喻，“观念”不能存在于感知它们的心之外。只要想一想“存在”这个词的意思就会确信这一点。“当我说我写字的桌子存在着，这就是说，我看到它而且感觉到它；如果我走出我的书房后说桌子存在着，那就是说，如果我在我的书房里，我就

① 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George Berkeley,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贝克莱全集》，亚·弗雷塞编，1871年牛津版第1卷，有俄译本。

能够感知它……” 贝克莱在他的著作的第三节里是这样说的,并且就在这里开始和那些被他称为唯物主义者的人论战(第18、19节以及其他各节)。他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their,即物的 *esse is percipi*,第3节,——这是哲学史教科书中常常引用的贝克莱的一句名言)。“在人们中间奇怪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见解:房屋、山岳、江河,一句话,一切感性实物都有一种自然的或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同于理性所感知的那种存在。”(第4节)贝克莱说,这个见解含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对象若不是我们凭感官感知的物,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所感知的若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或感觉(*ideas or sensations*),那又是什么呢?认为任何观念、感觉或它们的组合能够不被感知而存在着,这岂不是非常荒谬吗?”(第4节)

贝克莱现在把观念的集合换成了感觉的组合这个在他看来是含义相同的说法,责备唯物主义者“妄想更进一步去找出这种复合……即这种感觉的某个泉源。在第五节里,他责备唯物主义者玩弄抽象,因为在贝克莱看来,把感觉和对象分开,这是空洞的抽象。他在第五节末尾说道:“事实上,对象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are the same thing*),因而不能把一个从另一个中抽象出来。”(这句话在第二版里删掉了)贝克莱写道:“你们说,观念可以是那些存在于心外的、存在于一种无思维的实体中的物的复写或反映(*resemblances*)。我回答说,观念不能和观念以外的任何东西相似,一种颜色或形状只能和另一种颜色或形状相似,不能和任何别的东西相似……试问,我们能不能感知这些假设的原物或外在物(我们的观念似乎是它们的摄影或表象)呢?如果能够,那就是说,它们是观念,我们没有向前跨进一步,如果你们说不能,那末

我就要找随便哪一位问一问，说颜色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相似，硬和软同某种不能触觉到的东西相似，等等，有没有意义。”(第8节)

读者可以看出，在关于物离开它们对我们的作用是否能够存在于我们之外这个问题上，巴札罗夫用来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论据”，是和贝克莱用来反对他没有提名道姓的唯物主义者的那些论据没有丝毫差别的。贝克莱认为，关于“物质或有形实体”的存在(第9节)的思想是如此“矛盾”，如此“荒谬”，实在用不着浪费时间去驳斥它。他说道：“但是，由于物质存在这个教义(tenet)看来在哲学家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又引出这样多有害的结论，所以，我宁肯让人说我饶舌和罗嗦，也不放过彻底揭露和根除这种偏见的任何机会。”(第9节)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贝克莱说的是些什么样的有害的结论。让我们首先把他用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理论论据讲完吧。贝克莱在否定客体的“绝对”存在即物在人类认识之外的存在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敌人的观点是承认“自在之物”。在第二十四节里，贝克莱加上着重号写道，他所驳斥的那种看法承认“自在的感性客体(objects in themselves)或心外的感性客体的绝对存在”(前引书第167—168页)。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这是在1710年即在康德诞生前十四年写的，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根据所谓“最新的”哲学发现了：承认“自在之物”，这是唯物主义受到康德主义的感染或歪曲的结果！马赫主义者的“新”发现，是他们对基本哲学派别的历史惊人无知的结果。

他们的其次一个“新”思想是：“物质”或“实体”的概念是旧的非批判观点的残余。你们看到了没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把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使分析更深刻了，把这些“绝对者”、“不变的实质”等等消除了。你们只要看一看贝克莱的著作，查考一下这类说法的出处，就会看得出这类说法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虚构。贝克莱十分肯定地说，物质是〈nonentity〉（不存在的实质）（第 68 节），物质是无（第 80 节）。贝克莱嘲笑唯物主义者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别人使用‘无’这个词的意思上使用‘物质’一词。”（前引书第 196—197 页）贝克莱说，起初人们相信颜色、气味等等“是确实存在的”，后来抛弃了这种见解，承认它们只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但是，那些旧的错误概念没有彻底消除，其残余就是“实体”这个概念（第 73 节），也就是贝克莱主教在 1710 年彻底揭露的那种“偏见”（第 195 页）！1908 年在我们这里竟有这样一些滑稽人物，他们认真地相信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马赫之流，以为只是“最新的实证论”和“最新的自然科学”才彻底消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

就是这些滑稽人物（波格丹诺夫也在内）硬要读者相信：正是新哲学说明了在老是遭到驳斥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中存在着“世界二重化”的错误，唯物主义者说人的意识是什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的“反映”。关于这个“二重化”，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家们写下了无数诚挚的话。不知是由于健忘还是由于无知，他们没有提到这些新发现早在 1710 年就已经被发现了。

贝克莱写道：“我们对它们〈观念或物〉的认识曾经异常模糊、异常混乱，而且由于假设感性客体有二重（twofold）存在，即一个是心智的或心内的存在，一个是实在的、心外的〈即意识之外的〉存在，因而走入最危险的谬误之中。”于是贝克莱嘲笑起那种认为能

够思维不可想象的东西的“荒谬”见解来了！“荒谬”的泉源当然在于区分“物”和“观念”（第 87 节），在于“承认外部客体”。就是这个泉源产生了对物神和偶像的信仰。这一点，贝克莱在 1710 年就发现了，而波格丹诺夫在 1908 年又发现了。贝克莱说：“物质或未被感知的物的存在不仅是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的主要支柱，而且也是各色各样的偶像崇拜所依据的原则。”（第 94 节）

在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从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的“荒谬”学说中得出的“有害”结论，这些结论迫使贝克莱主教不仅从理论上驳斥这个学说，而且把这个学说的信奉者当作敌人大肆攻击。他说：“无神论的和反宗教的一切渎神体系是建立在物质学说或有形实体学说的基础上的……物质的实体对于各时代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朋友，这是用不着说的。他们的一切怪异体系之依存于物质的实体，是如此明显、如此必要，以致一旦把这个基石抽掉，整个建筑物就一定倒塌。因此，我们不必特别注意无神论者的个别的支派末流的荒谬学说。”（前引书第 92 节第 203—204 页）

“物质只要被逐出自自然界，就会带走很多怀疑论的和渎神的体系，带走无数的争论和纠缠不清的问题（马赫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思维经济原则”！1876 年阿芬那留斯发现的“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这些争论和问题使神学家和哲学家经常感到烦恼。物质使人类白费了那么多的劳动，所以即使我们提出来反驳物质的那些论据被认为是没有充分说服力的（而我则认为它们是十分清楚的），我还是相信，真理、和平和宗教的一切友人都有理由希望这些论据被认为是充分有力的。”（第 96 节）

贝克莱主教在直爽地议论，愚蠢地议论！现在，同样的一些主

张把“物质”“经济地”赶出哲学的思想却具有狡猾得多的、被“新”术语弄得更混乱得多的形式，使得幼稚的人把这些思想当作“最新的”哲学！

贝克莱不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哲学倾向，他也竭力掩盖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被人责难为现在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唯我论者。他说，我们的哲学“没有使我们失去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物”（第34节）。自然界依然存在着，实物和幻想的区别也依然存在着，不过“两者同样地都存在于意识中”。“我决不对我们通过感觉或思考能够认识到的任何一物的存在提出异议。我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触到的那些物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否定其存在的唯一的物，是哲学家们〈着重号是贝克莱加的〉叫作物质或有形实体的东西。否定它，不会给其余的人类带来任何损害；我敢说，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察出缺少了它……无神论者的确需要这个徒有其名的幽灵来作为他们的不信神的根据……”

这个思想在第三十七节里表达得更清楚。贝克莱在这一节里对于责难他的哲学消灭了有形实体这一点回答道：“如果就通常的(vulgar)意思来了解实体这个词，就是说把它了解为广延性、硬度、重量等等感性的质的组合，那就不能责难我消灭了有形实体。但是，如果就哲学的意思来了解实体这个词，就是说把它了解为〈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偶性或质的基础，那末，只要对于根本不存在、甚至在想象中也不存在的东西说得上消灭的话，我就真的承认我消灭了它。”

怪不得英国哲学家弗雷塞把贝克莱的学说叫作“自然实在论”（前引书序言第10页）。弗雷塞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贝克莱主义的

信徒，出版过贝克莱的著作并在书中添进了他写的注释。“自然实在论”这个有趣的术语一定要提出来，因为它的确表现出贝克莱想乔装改扮成实在论者的意图。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会多次碰到一些“最新的”“实证论者”用另一种形式，用另一套话重复着同样的把戏或伪装。贝克莱没有否定实物的存在！贝克莱没有违反全人类的公意！贝克莱“只是”否定哲学家们的一种学说，即否定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贝克莱没有否定过去和现在始终立脚在（多半是不自觉地）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上的自然科学。我们在第五十九节里读到：“根据我们关于各种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共存和相继出现的经验^①〈贝克莱——“纯粹经验”的哲学〉……我们能够正确地判断；如果被安置在一个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极不相同的环境中，我们会感觉到什么〈或者说，看到什么〉。这就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听呀！〉根据上面所说的，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它的意义和可靠性。”

让我们把外部世界、自然界看作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感觉的组合”吧！承认这一点吧！不要在意识之外，在人之外去探求这些感觉的“基础”吧！这样我将在我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承认全部自然科学，承认它的结论的全部意义和可靠性。为了我的结论有利于“和平和宗教”，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范围，而且只是这个范围。这就是贝克莱的思想。这个正确地表达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的思想，我们以后在谈到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时还会碰到。

现在我们要指出最新实证论者和批判实在论者尤什凯维奇在

^① 弗雷塞在他的序言里坚决认为，贝克莱和洛克一样，都是“只诉诸经验”（第117页）。

二十世纪从贝克莱主教那里剽窃来的另一个最新发现。这个发现就是“经验符号论”。弗雷塞说，贝克莱的“心爱的理论”就是“普遍自然符号论”（前引书第190页）或“自然符号论”（Natural Symbolism）。如果这些话不是出现在1871年出版的书中，那末就会怀疑英国哲学家、信仰主义者弗雷塞是在剽窃现代数学家兼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什凯维奇！

贝克莱主教用如下的话说明了他的那个使弗雷塞狂喜的理论：

“观念的联系（不要忘记，在贝克莱看来，观念和物是同一个东西）不是表示因果关系，它只是表示记号或符号同用符号标志的物的关系。”（第65节）“由此可见，一些物，从促成或帮助产生结果的原因这个范畴方面（under the notion of a cause）去看，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并且会把我们引入极大的荒谬，如果把它们看作使我们通晓事物的记号或符号，那它们就能够很自然地得到解释……”（第66节）当然，在贝克莱和弗雷塞看来，利用这些“经验符号”来使我们通晓事物的不是别人，而是神。在贝克莱的理论中，符号论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就在于：符号论应当代替那种“妄想以有形的原因为说明物”的“学说”（第66节）。

在因果性问题上，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哲学派别。一个“妄想以有形的原因为说明物”，显然它是和贝克莱主教所驳倒的“荒谬的”“物质学说”有关的。另一个把“原因概念”归结为（神）用来“使我们通晓事物”的“记号或符号”概念。在分析马赫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我们就会遇到这两个穿上了二十世纪时装的派别。

其次，关于实在性问题还必须指出，贝克莱不承认物存在于意识之外，但却力图找出一个区别实在和虚假的标准。他在第三十

六节中说道,人心所随意唤起的那些“观念”“和我们由感官感知的那些观念比较起来,是暗淡的、软弱的、不稳固的。后一类观念是按照自然界的一定规则或规律印入我们心中的,这类观念证明有一种比人心更有力更有智慧的心在起作用。人们说,这类观念比前一类观念有更多的实在性;这就是说,它们更明确、更有秩序、更清晰,它们不是感知它们的心所虚构的……”在另一个地方(第84节),贝克莱力图把实在的概念和许多人同时对同一些感觉的感知联系起来。例如,假定有人告诉我们说水变成了酒,怎样知道这是不是实在的呢?“如果所有在座的人都看到了酒,闻到了酒香,喝了酒,尝到了酒味,并感觉到喝酒以后的效果,那末在我看来,就不能怀疑这个酒的实在性了。”弗雷塞又加以解释:“不同的人同时对同一些感性观念的意识,不同于个别人或单个人对想象的客体和情感的意识,在这里,前者被认为是证实前一类观念的实在性的证据。”

由此可见,不能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解为:似乎他忽视个人的知觉和集体的知觉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他企图靠这个区别来确立实在性的标准。贝克莱从神对人心的作用中引出“观念”,这样他就接近了客观唯心主义:世界不是我的表象,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原因的结果,这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原因创造“自然规律”,也创造那些把“比较实在的”观念和不大实在的观念区分开来的规律等等。

贝克莱在他的另一著作《希勒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1713年)中,竭力用异常通俗的形式说明他的观点。他是这样说明他的学说和唯物主义学说的对立的:

“我也象你们〈唯物主义者〉一样肯定地说,既然外界有某种东西影响我们,我们就应该承认在〈我们〉之外存在着一种力量,一种

属于和我们不同的存在物的力量。可是这个强有力的存在物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有了分歧。我肯定说它是精神,你们则肯定说它是物质,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可以补充一句,也是你们所不知道的)第三种东西……”(前引书第335页)

弗雷塞评述道:“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感性现象是由物质实体或某种谁也不知道的‘第三种东西’唤起的;在贝克莱看来,感性现象是由理性的意志唤起的;在休谟和实证论者看来,感性现象的起源是绝对不知道的,我们只能按照习惯归纳的方法把它们当作事实概括起来。”

在这里,英国的贝克莱主义者弗雷塞从他的彻底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接触到了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的最基本的哲学“路线”。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把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 and 唯心主义者。同弗雷塞比较起来,恩格斯注意了这两个派别的内容更发展、更多样、更丰富的理论,认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恩格斯把休谟和康德的信奉者们放在这两者之间,称他们为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²²在《路·费尔巴哈》中,恩格斯只是对休谟的信徒(就是那些被弗雷塞称为“实证论者”而他们也喜欢以此自称的人们)使用了不可知论者这个术语,而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就公开讲到“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²³的观点,把新康德主义³看作不可知论的变种^①。

① 弗·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Fr. Engels. «Über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载于《新时代》杂志²⁴第11年卷(1892—1893)第1分卷第1期第18页。德译文是恩格斯自己从英文译出来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文集中的俄译文(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67页)不精确。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述恩格斯的这个非常正确而又深刻的论断(被马赫主义者不知羞耻地忽视了)的论断)。这点我们以后再详细地谈。现在我们只指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只指出两个极端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and 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对基本哲学派别的看法的相合。为了举例说明这些派别(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不得不常常提到它们)，我们简略地讲一讲和贝克莱走着不同道路的十八世纪大哲学家们的看法。

请看休谟在《人类理性研究》一书的怀疑论哲学那一章(第12章)中的论述：“人们为自然本能或偏见所驱使，喜欢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总是不加思索地，甚至在思索之前，就设想有一个外部世界(external universe)，它不依赖于我们的知觉，而且即使在我们和其他一切能够感觉的生物都不存在了或被消灭了的时候，它也会存在着。这可以说是很明显的。连动物也为类似的见解所支配，在它们的一切意图、计划和行动中保持着这种对外部客体的信仰……但是一切人的这种普遍的最初的见解很快就被最浅显的(slightest)哲学摧毁了。这种哲学教导我们说：除映象或知觉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呈现于我们心中；感官只不过是这些映象所由以输入的入口(inlets)，它们不能在心和客体之间建立任何直接的关系(intercourse)。我们离桌子远一些，我们所看到的桌子好象就小一些。可是，不依赖我们而存在的实在的桌子并没有变化。因此，呈现于我们心中的只不过是桌子的映象(image)。这些显然是理性的指示。任何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从来都不会怀疑：当我们说‘这张桌子’和‘这棵树’的时候所指的那些东西(existences)，不外是我们心中的知觉……用什么论据可以证明：我们心中的知觉一定是由那些虽和这些知觉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然而又完全不同的外物唤起的，而不是由心本身的能力，或者是由某种看不

见的、无人知道的精神的作用，或者是由我们更加无从知道的一种别的原因产生的呢？……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呢？当然，也象其他一切类似的问题一样，由经验来解决。可是经验在这里却沉默了，而且也不能不沉默。我们心中从来只有知觉，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并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有关知觉和客体的关系的任何经验。因此，设想有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为了证明我们感觉的真实性而乞援于上帝的真实性，就是完全意外地回避问题……我们如果怀疑外部世界，我们就失掉了可以用来证明那个上帝的存在的一切论据。”^①

休谟在《人性论》第四篇第二章《对于感觉的怀疑论》中也讲了同样的话。“我们的知觉是我们的唯一对象。”（雷诺维叶和毕雍的法文译本，1878年版第281页）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不用物、精神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即一方面不用外部世界的作用来说明知觉，另一方面不用神或未知的精神的作用来说明知觉。休谟著作的法文译本序言的作者、一个同马赫相近的派别的哲学家（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毕雍（F. Pillon）说得对；在休谟看来，主体和客体都是“各种不同知觉的集群”，都是“意识的要素、印象、观念等等”；问题应当只在于“这些要素的类集和组合”^②。同样地，英国的休谟主义者、“不可知论”这个确切名词的创造者赫胥黎，在他的一本论述休谟的书中也着重指出：休谟把“感觉”看作“原初的、不可分解的意识状态”，但是，在应当以客体对人的作用还是以心的

① 大卫·休谟《人类理性研究》（论文集）（*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ssays and Treatises*）1882年伦敦版第2卷第124—126页。

② 《休谟的心理学。人性论……》。沙·雷诺维叶和弗·毕雍合译（*Psychologie de Hume. Traité de la nature humaine etc. Trad. par Ch. Renouvier et F. Pillon*）1878年巴黎版序言第10页。

创造力来说明感觉的起源这个问题上，休谟不是十分彻底的。“他〈休谟〉认为实在论和唯心主义是同样可能的假说。”^① 休谟没有超出感觉的范围。“红色和蓝色，玫瑰香，这些都是单纯的知觉……一朵红玫瑰给我们一种复杂的知觉 (complex impression)，这种复杂的知觉可以分解为红色、玫瑰香等等单纯的知觉。”(同上，第64—65页) 休谟既承认“唯物主义立场”，也承认“唯心主义立场”(第82页)；“知觉的集合”可能是费希特的“自我”所产生的，也可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 (real something) 的“模写，或者至少是符号”。赫胥黎是这样解释休谟的。

至于说到唯物主义者，请看百科全书派²⁵ 的首领狄德罗对贝克莱的批评：“那些只承认自己的存在和我们体内彼此更替着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作唯心主义者。这种怪诞的体系，在我看来，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② 狄德罗非常接近现代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单靠论据和三段论法是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理论上的论证），他指出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前提和感觉论者孔狄亚克的前提的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孔狄亚克本应驳斥贝克莱，以免从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这个观点中作出那种荒谬的结论来。

在《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中，狄德罗这样叙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假定钢琴是有感觉能力和记忆的，请你告诉我，难道它自己不会把你在它的键盘上弹出的曲调重弹一下吗？我们就是赋有感觉能力和记忆的乐器。我们的感官就是键盘，我们周围的

① 托·赫胥黎《休谟》(Th. Huxley, «Hume») 1879年伦敦版第74页。

② 《狄德罗全集》，茹·阿西萨编 (Œ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éd. par J. Assézat) 1875年巴黎版第1卷第304页。

自然界弹它，它自己也常常弹自己。依我看来，这就是和你我具有同样结构的钢琴中所发生的一切。”达兰贝尔回答说，这样的钢琴还要有获取食物和生出小钢琴的能力。狄德罗答辩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蛋来说吧。“就是这个蛋推翻了一切神学教义和地上的一切神庙。这个蛋是什么东西呢？在胚胎注入以前，它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在胚胎注入以后，它又是什么东西呢？还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因为这个胚胎也还只是一种呆滞的、混沌的液体。这块东西是怎样变成另一种组织，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变成有生命的呢？依靠热。什么产生热呢？运动。”从蛋中孵出来的动物有你所有的一切情感，能做出你所做的一切动作。“你是不是要和笛卡儿一样断言，这只是一架简单的模仿机器？可是小孩们会笑你，而哲学家们会答复你说，如果这是一架机器，那末你也是同样的一架机器。如果你承认这些动物和你之间只有机体组织上的差异，那你就表明自己是有常识、有理智的，你就是正直的。但是人家会由此得出反对你的结论，就是：一种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的呆滞的物质，浸染上另一种呆滞的物质，加上热和运动，就产生出感觉能力、生命、记忆、意识、情感和思维。”狄德罗接着说道，两者必居其一：或者设想蛋中有某种“隐藏的要素”，它是在一定发育阶段上不知怎样地钻入蛋中的，它是否占据空间，它是物质的还是特意创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这种看法是违反常识的，会导致矛盾和荒谬。或者只好作出“一个能说明一切的简单假定，就是：感觉能力是物质的普遍特性或者是物质机体组织的产物”。达兰贝尔反驳说，这个假定是承认一种在本质上和物质不相容的质。狄德罗回答道：

“既然你不知道一切东西的本质，不知道物质的本质，也不知道感觉的本质，那你怎么会知道感觉能力在本质上是和物质不相

容的呢？难道你更了解运动的本性、运动在某一物体中的存在、运动从一个物体向另一个物体的转移吗？”达兰贝尔：“虽然我既不知道感觉的本性，也不知道物质的本性，可是我看到感觉能力是一种单纯的、单一的、不可分的质，是一种和可分的主体或基质（sup-pôt）不相容的质。”狄德罗：“这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胡扯！怎么？难道你没有看见物质的一切质，它的能被我们感觉到的一切形式，在本质上都是不可分的吗？不可入性是不能有多少之分的。圆的物体的一半是有的，但是不能有圆的一半……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学家，当你看到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承认这个结果是产生出来的，虽然你还不能说明原因和结果的联系。如果你是遵循逻辑的，你就不要抛弃一个现有的并能说明一切的原因，而去提出另外一个不可了解的、和结果的联系更难理解的、造成无数困难而解决不了一个困难的原因。”达兰贝尔：“如果我抛弃这个原因呢？”狄德罗：“在宇宙中，不论在人身上或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手风琴是木制的，人是肉做的。黄雀是肉做的，音乐家是一种结构不同的肉做的；可是无论哪一个都有同一的起源。同一的构造，都有同一的机能和同一的目的。”达兰贝尔：“你的两架钢琴之间的声音的一致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狄德罗：“……有感觉能力的乐器或动物根据经验知道，在某种声音之后，就会有某种结果在它身外发生；别的象它一样有感觉的乐器或别的动物就会走近它或离开它，向它要什么或给它什么，伤害它或抚爱它。所有这些结果在它的记忆里和在别的动物的记忆里都同一定的声音联结着。请你注意，在人们的交往中，除了声音和动作，再没有什么别的。为了认识我的体系的全部力量，还请你注意，这个体系也遇到贝克莱为否认物体存在而提出的那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有过一个发疯的时刻，有感觉的钢琴以为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架钢琴，宇宙的全

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①

这是在 1769 年写的。我们的不长的历史考证就到此结束吧！在分析“最新实证论”的时候，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遇到“发疯的钢琴”和在人的内部发生的宇宙和谐。

现在我们只作出一个结论：“最新的”马赫主义者提出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没有一个，的确没有一个是贝克莱主教没有提出过的。

当作一个笑柄，我们提一提这些马赫主义者中间的一位瓦连廷诺夫。他模糊地觉得他的立场是错误的，便竭力把他和贝克莱的血缘关系的“形迹掩盖起来”，而又作得非常可笑。在他的著作的第一五〇页上，我们读到：“……人们每当说到马赫时就拉上贝克莱，我们要问，是指的哪一个贝克莱呢？是那个一贯地自称为〈瓦连廷诺夫想说是被认为〉唯我论者的贝克莱呢，还是那个为神的直接降临和神意辩护的贝克莱？一般说来〈？〉，是那个攻击无神论的、谈论哲理的主教贝克莱呢，还是那个深思熟虑的分析家贝克莱？马赫同唯我论者和宗教形而上学说教者的贝克莱的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瓦连廷诺夫糊涂了，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维护“深思熟虑的分析家”、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而反对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狄德罗把基本的哲学派别鲜明地对立起来。瓦连廷诺夫把它们混淆起来，同时还可笑地安慰我们，他写道：“马赫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接近’即使是确实的，我们也不认为是哲学上的罪过。”（第 149 页）把哲学上的两个不可调和的基本派别混淆起来，这算什么“罪过”呢？这正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全部大睿大智。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种大睿大智。

^① 《狄德罗全集》1875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114—118 页。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

一 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早期哲学著作中,直言不讳地、简单明了地叙述了他们的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著作,至于这些作者后来所作的修正和删改,则留到以后再进行分析。

马赫在1872年写道:“科学的任务只能是:(一)研究表象之间的联系(心理学);(二)揭示感觉之间的联系(物理学);(三)阐明感觉和表象之间的联系(心理物理学)。”^①这是十分清楚的。

物理学的对象是感觉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物或物体(我们的感觉就是它们的映象)之间的联系。1883年,马赫在《力学》一书中重复同样的思想:“感觉不是‘物的符号’,而‘物’倒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东

^① 恩·马赫《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1年11月15日在波希米亚皇家科学学会上的讲演(E. Mach. «Die Geschichte und die Wurzel des Satzes von der Erhaltung der Arbeit». Vortrag, gehalten in der K. Böhm.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am 15. Nov. 1871) 1872年布拉格版第57—58页。

西)。”^①

4 关于经过十二年“思考”后得出的“要素”这个名词，我们在下面再讲。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马赫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承认物或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同一种相反的、认为感觉是物的“符号”（确切些说，物的映象或反映）的理论对立起来，这种理论就是哲学唯物主义。例如，马克思的著名的合作者、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就经常毫无例外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物及其在思想上的模写或反映（Gedanken-Abbilder），不言而喻，这些思想上的模写无非是由感觉产生的。看起来，凡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尤其是以这种哲学的名义著书立说的人，都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观点。但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造成了异乎寻常的混乱，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众所周知的东西再重复一下。翻开《反杜林论》第一节，我们就可以读到：“……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② 或者翻开哲学编第一节，那里写道：“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指一切认识的基本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 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杜林的主张却相反，他想作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不能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的相反的观点是

① 恩·马赫《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E. Mach. «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 historisch-kritisch dargestellt»*）1897年莱比锡第3版第473页。

② 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Fr.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1904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6页。

唯心主义的观点，它把现实的相互关系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来构造现实世界……”（同上，第21页）²⁸①我们再重复一遍：恩格斯到处都毫无例外地坚持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只要看到杜林稍微从唯物主义退向唯心主义，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任何人只要略为留心读一读《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其中恩格斯讲到物及其在人的头脑中，在我们的意识、思维中的模写等等。恩格斯并没有说感觉或表象是物的“符号”，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应该用“映象”、画像或反映来代替“符号”，关于这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详尽的说明。我们现在完全不是谈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任何狡辩、任何诡辩（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狡辩和诡辩）都不能抹杀一个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马赫关于物即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如果物体象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象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末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不管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怎样拒绝唯我论，但事实上，如果他们不陷入惊人的逻辑谬误，就不可能摆脱唯我论。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马赫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要素，我们再从马赫的著作中作一些引证。下面就是引自《感觉的分析》（柯特利亚尔的俄译本，1907年莫斯科斯基尔蒙特出版社版）

① 本选集中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均按列宁的俄译文译出，其中个别地方与原文稍有出入。——编者注

的一个例证，

“我们面前有一个具有尖端 S 的物体。当我们碰到尖端，使它和我们的身体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刺痛。我们可以看见尖端，而不感觉刺痛。但是当我们感觉刺痛时，我们就会发现尖端。因此，看得见的尖端是一个永恒的核心，而刺痛是一种偶然现象，依照不同的情况，它可能和核心联系着，也可能不和核心联系着。由于类似现象的多次重复，最后人们习惯于把物体的一切特性看作是从这些永恒的核心中发出并通过我们身体而传给自我的‘作用’；我们就把这些‘作用’叫作‘感觉’……”（第 20 页）

换句话说，人们“习惯于”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感觉看作物体、物、自然界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这个“习惯”对哲学唯心主义者是有害的（反而是整个人类和全部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马赫非常讨厌它，于是就去摧毁它：

“……但是，这些核心因此便失去它们的全部感性内容，成为赤裸裸的抽象符号了……”

最可敬的教授先生，这是陈词滥调呵！这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贝克莱所说的物质是赤裸裸的抽象符号这句话呵！实际上，赤裸裸的正是马赫，因为，他既然不承认离开我们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是“感性内容”，那末在他那里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抽象的”自我，一个必须大写并加上着重号的自我，也就是“一架发了疯的、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既然外部世界不是我们感觉的“感性内容”，那末除了这个发表空洞“哲学”谬论的赤裸裸的自我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真是一个愚蠢的毫无结果的勾当！

“……因而，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但这样一来我们所知道的也就仅仅是我们的感觉了，而关于那些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是感觉）的假

定，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这样的观点仅仅在不彻底的实在论或不彻底的批判主义看来才是好的。”

我们把马赫的《反形而上学的意见》的第六节全部抄下来了。这些话完全是从贝克莱那里剽窃来的。除“我们只感觉到自己的感觉”这一点以外，没有丝毫创见，没有一点思想的闪光。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仅仅是由我的感觉构成的。”马赫用“我们的”这个字眼来代替“我的”这个字眼，是不合理的。就在这一个字眼上，马赫暴露出了他所谴责别人的那种“不彻底性”。因为，如果关于外部世界的“假定”，关于针不依赖于我而存在以及我的身体和针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假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所有这些假定的确都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那末关于别人是存在的这一“假定”就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存在的只是自我，而其余的一切人以及整个外部世界都属于这类没有意义的“核心”。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能说“我们的”感觉，而马赫却这样说了，这只是表明他的惊人的不彻底性。这只是证明：他的哲学是连他本人也不相信的没有意义的空话。

下面的例子特别明显地说明马赫的不彻底性和思想混乱。在《感觉的分析》第十一章第六节里，我们读到：“假使正当我感觉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用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观察我的头脑，那就可以确定一定的感觉和有机体中所发生的哪些过程有联系……”（第 197 页）

好极了！这不是说我们的感觉和整个有机体中、特别是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定过程有联系吗？是的，马赫十分肯定地作出了这种“假定”；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作出这种“假定”是困难的。但是对不起，这正是关于那些“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假定”，正是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曾经把它宣布为多余的和没

有意义的假定！经验批判主义者对我们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马赫象贝克莱一样，硬要我们相信：如果超出这一点，认为感觉是物体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那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没有意义的多余的假定等等。但头脑是物体。那末，头脑也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结果是，我（我也无非是感觉的复合）依靠感觉的复合去感觉感觉的复合。多妙的哲学！先宣布感觉是“世界的真正要素”，并在这上面建立“独出心裁的”贝克莱主义，然后又偷运相反的观点，说感觉是和有机体中的一定过程有联系的。这些“过程”是否跟“有机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有联系呢？如果某一有机体的感觉不向该有机体提供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客观正确的表象，这种物质交换能够发生吗？

马赫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麻烦的问题，他机械地把贝克莱主义的一些片断言论和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见解掺杂在一起……马赫在同一节里写道：“有时候人们也提出‘物质’（无机的）是否也有感觉的问题……”这不是说有机物质具有感觉是不成问题了吗？这不是说感觉并非什么第一性的东西，而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吗？马赫越过了贝克莱主义的一切荒谬之处！……他说：“从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出发，这个问题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按照这种物理学观念，物质是直接的、无疑地存在着的实在的东西，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是由它构成的……”我们要好好记住马赫的这个实在有价值的自供：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认为物质是直接的实在，而且只有这种实在的一个变种（有机物质）才具有明显的感觉特性……马赫继续写道：“那末在这样的场合下，在物质所构成的大厦中，感觉应该突然产生，还是应该存在于所谓这个大厦的基础本身中。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根本是荒谬的。对我们来说，物质不是第一性

的东西；这种第一性的东西只是要素（要素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叫作感觉）……”

这样说来，感觉是第一性的东西了，尽管它只和有机物质中的一定过程有“联系”！当马赫说这种荒唐话时，仿佛是在责难唯物主义（“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说它没有解决感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问题。这是信仰主义者及其娄罗们“驳斥”唯物主义的例证。难道有什么其他哲学观点能够在解决问题所需的材料还没有充分收集起来的时候就“解决”问题吗？马赫自己在同一节中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他说：“当这个任务（即解决“感觉在有机界里扩展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特殊场合下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时，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可以归结如下：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明显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例如，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海克尔、英国生物学家劳·摩尔根等人的假定就是这样，至于我们上面所讲的狄德罗的猜测就更不用说了。马赫主义坚持相反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于是就马上陷入荒谬之中。因为，第一，它不顾感觉只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的一定过程相联系这一事实，把感觉当作第一性的东西；第二，由于它假定除了那个大写的自我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生物和其他“复合”，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一基本前提就遭到了破坏。

“要素”这个字眼被许多天真的人看成（我们以后会看到）一种新东西、一种发现，其实“要素”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它只是把问题弄糊涂，只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向前推进

了。这种假象之所以虚妄,是因为:对于那种看来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如何跟那种由同样原子(或电子)构成但却具有明显的感觉能力的物质发生联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再研究。唯物主义明确地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从而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实验研究。马赫主义,即一种混乱的唯心主义,却用“要素”这个空洞的狡辩的辞令把问题弄糊涂,使它离开正确的途径。

下面的一段话引自马赫的最后一部带有综合性和结论性的哲学著作,这段话表明了这种唯心主义狡辩的全部虚伪性。在《认识和谬误》中,我们读到:“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aufzubauen)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但不能设想(ist keine Möglichkeit abzusehen),任何心理体验怎么可以由现代物理学所使用的要素即质量和运动(处在仅仅对这门特殊科学有用的那种僵化状态——Starrheit——的要素)构成(darstellen)。”^①

关于许多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概念的僵化,关于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按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字的理解,即反辩证法的)观点,恩格斯曾经不止一次十分明确地讲到过。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马赫正是在这点上走入了歧途,因为他不懂得或者不知道相对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所说的还不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在这里指出:尽管马赫使用了混乱的、似乎是新的术语,但他的唯心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你们看,由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是的,这样的构成当然是没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纯粹字面上的构成,是偷运信仰主义的空洞的经院哲学。因此,马赫把他的著作献给内在论者,而最反动的哲

^① 恩·马赫《认识和谬误》(E. Mach. «Erkenntnis und Irrtum») 1906年第2版第12页注释。

学唯心主义的信徒内在论者又来拥抱马赫，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只是迟了两百年，因为贝克莱早已充分地表明：“由感觉即心理要素”所能“构成”的不是别的，只是唯我论。至于说到唯物主义（马赫虽然没有公开地把它叫作“敌人”，然而在这里也把自己的观点和它对立起来），我们从狄德罗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唯物主义者的真正观点了。这种观点不是从物质的运动中引出感觉或者把感觉归结为物质的运动，而是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特性之一。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狄德罗的观点。恩格斯之所以和“庸俗”唯物主义者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划清界限，就是因为他们迷惑于下述的观点：大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而经常把自己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的马赫，自然也会完全象其他一切御用哲学的御用教授一样，无视一切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了说明阿芬那留斯的原来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要谈一谈187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独立的哲学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纯粹经验批判绪论》）。波格丹诺夫在他的《经验一元论》（1905年第2版第1卷第9页注释）中说道：“在马赫的观点的发展中，哲学唯心主义是出发点，而阿芬那留斯的特点则在于他一开始就有实在论的色彩。”波格丹诺夫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信了马赫的话（见《感觉的分析》俄译本第288页）。但是波格丹诺夫枉然相信了马赫，而且他的论断完全违反了事实的真相。相反地，阿芬那留斯的唯心主义在上述1876年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连阿芬那留斯本人在1891年也不得不承认这点。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的序言中说：“谁读了我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谁马上就会推测到：我是企图先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去阐明《纯粹经

验批判》一书中的问题的”^①，但是“哲学唯心主义的无效”，使我“怀疑我以前所走的道路的正确性”（序言第10页）。在哲学文献中，阿芬那留斯的这个唯心主义出发点是大家所公认的。从法国著作家中，我可以举出柯维拉尔，他说阿芬那留斯在《绪论》^②中的哲学观点是“一元论唯心主义”^③；从德国著作家中，我可以举出阿芬那留斯的学生维利，他说：“阿芬那留斯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他的1876年的著作中，完全处在所谓认识论唯心主义的影响之下（ganz im Banne）。”^④

如果否认阿芬那留斯的《绪论》中的唯心主义，那的确是可笑的，因为他在那里直言不讳地说：“只有感觉才能被设想为存在着的东西。”（德文第2版第10页和第65页，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阿芬那留斯自己就是这样来叙述他的著作第一一六节的内容的。这一节的全文如下：“我们承认：存在着的东西（das Seiende）就是赋有感觉的实体；实体消失了（你们看，设想“实体”不存在，设想什么外部世界都不存在，是“更经济些”，“更省力些”！）……而感觉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把存在着的东西设想为感觉，在它的基础中没有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nichts Empfindungsloses）。”

于是，感觉可以不要“实体”而存在，也就是说，思想可以不要头脑而存在！难道真的会有替这种无头脑的哲学作辩护的哲学家

① 《人的世界概念》（《Der menschliche Weltbegriff》）1891年版序言第9页。

② 即《纯粹经验批判绪论》。——编者注

③ 柯维拉尔《经验批判主义》（F. Van Cannelaert. «L'empiricriticisme»），载于《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²⁷1907年2月号第51页。

④ 鲁道夫·维利《反对学院智慧。哲学批判》（Rudolf Willy. «Gegen die Schulweisheit. Eine Kritik der Philosophie»）1905年慕尼黑版第170页。

吗？有的，阿芬那留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关于这样的辩护，尽管正常的人很难认真地去对待它，但我们却不能不稍微谈一谈。下面就是阿芬那留斯在同书第八十九至九十节中的议论：

“……运动引起感觉这个论点，仅仅是以一种假象的经验为根据的。这种经验（知觉是它的个别部分）似乎就在于：感觉是由于传来的运动（刺激）的作用以及其他物质条件（例如血液）的协助而在某种实体（大脑）中产生的。尽管这种产生从来也没有人直接（selbst）看到过，但是为了使设想的经验成为各部分都是真实的经验，至少必须用经验的证据来证明，那种似乎由传来的运动在某一实体中所引起的感觉，不是早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个实体中的，因此，只能把感觉的出现理解为传来的运动的一种创造作用。于是，只有证明在现在出现感觉的地方以前没有任何感觉，甚至没有最低级的感觉，才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表示某种创造作用，它和其余的一切经验相矛盾，并且根本改变其余的全部自然观（Naturanschauung）。但是任何经验都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明，而且任何经验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明；相反地，实体在具有感觉之前的那种根本没有感觉的状态，只不过是一种假说而已。这样的假说不是使我们的认识简单明白，而是使我们的认识复杂模糊。

“如果所谓的经验（即感觉是借助于传来的运动而在实体中产生的，而实体从这时起才开始具有感觉）在仔细的考察下原来只是假象的经验，那末，或许在残存的经验内容中还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肯定感觉至少相对地起源于运动的条件，就是说，可以肯定现有的然而潜伏的、或者最低级的、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没有被我们意识到的感觉，由于传来的运动而解放出来了，或者上升了，或者被意识到了。然而，这一点残存的经验内容也只是一种假象。假使我们用一种理想的观察方法去探究从运动着的实体A中发出并经

过一系列媒介中心传达到赋有感觉的实体B的运动，那末我们至多能发现实体B中的感觉在接受传达到的运动的同时便发展或上升起来，但是我们不会发现这是由于运动而产生的……”

我们特意把阿芬那留斯驳斥唯物主义的这段话全部摘录下来，使读者可以看到“最新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在玩弄着多么可怜的诡辩。我们现在把唯心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议论和波格丹诺夫的唯物主义的议论……比较一下，就算是对波格丹诺夫背叛唯物主义的一个惩罚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整整九年以前，当波格丹诺夫一半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即绝大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只有一半被糊涂虫奥斯特瓦尔德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他写道：“从古代到现在，记述心理学一直把意识的事实分为三类：感觉和表象的领域、情感的领域以及冲动的领域……属于第一类的是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现象在意识中如实出现的映象……这样的映象，如果是直接由与它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经过外部感觉器官引起的，就叫作‘感觉’。”^①往后一点他又说，“感觉……在意识中的产生，是通过外部感觉器官传来的外部环境的某种刺激的结果。”(第222页)又说：“感觉是意识生活的基础，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第240页)“在感觉过程的每一步上，都发生着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第133页)甚至在1905年，当波格丹诺夫在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善意的协助下，在哲学上已经从唯物主义观点转到唯心主义观点时，他(由于健忘!)还在《经验一元论》中写道：“大家知道，外部刺激力在神经末梢器官中变为‘电报’形式的神经流，这种形式的神经流虽然

^① 亚·波格丹诺夫《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216页。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丝毫没有神秘性。这样的刺激力首先到达分布在神经节、脊髓、皮质下神经中枢等所谓‘低级’中枢里面的神经原。”（1905年第2版第1卷第118页）

任何一个没有被教授哲学弄糊涂的自然科学家以及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都认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这种转化每个人都能看到千百万次，而且的确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阿芬那留斯只是把这种早已被贝克莱主教用滥了的旧诡辩在形式上略微改变了一下。既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每分钟所看到的感觉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之间的联系的一切条件，因此我们承认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着的，阿芬那留斯的诡辩就是如此。

为了结束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的评述，我们简略地提一下这一哲学流派在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关于英国人毕尔生，马赫直言不讳地说：“我和他的认识论的 (erkenntniskritischen) 观点在一切主要点上是一致的。”（《力学》前引版本序言第9页）毕尔生也表示他和马赫是一致的^①。在毕尔生看来，“实物”就是“感性知觉” (sense impressions)。他宣称，凡是承认在感性知觉之外有物的存在的，都是形而上学。毕尔生最坚决地攻击唯物主义（尽管他既不知道费尔巴哈，也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的论据与上面所分析过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毕尔生却一点也不想冒充唯物主义者（这是俄国马赫主义者的特长），他如此

^① 卡尔·毕尔生《科学入门》(Karl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1900年伦敦第2版第326页。

地……不谨慎,以致于不替自己的哲学想出“新的”称号,而直截了当地宣布他和马赫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前引书第326页)!毕尔生是直接从贝克莱和休谟那里引出自己的家谱的。我们在下文中将不止一次地看到,毕尔生的哲学按其完整性和思考的周密性来说,大大地超过了马赫的哲学。

马赫特地表示自己是同法国物理学家杜恒和昂·彭加勒一致的^①。关于这些著作家的特别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哲学观点,我们在论新物理学的那一章中再讲。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彭加勒认为物是“感觉群”^②,而杜恒也曾偶然吐露过类似的观点^③。

现在我们来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承认他们的最初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之后,又怎样在以后的著作中修改这些观点。

二 “世界要素的发现”

苏黎世大学的讲师阿德勒曾用这个标题写了一篇关于马赫的文章^④;他几乎是德国唯一想用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的著作家。我们应当为这位天真的讲师说句公道话,他本想好心好意地帮马

① 《感觉的分析》第4页。参看《认识和谬误》第2版序言。

②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Henri Poincaré, «La Valeur de la Science») 1905年巴黎版,有俄译本,见若干处。

③ 参看比·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P. Duhem, «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 et sa structure») 1906年巴黎版第6,10页。

④ 弗里德里希·维·阿德勒《世界要素的发现(为庆祝恩·马赫七十寿辰而作)》(Friedrich W. Adler, «Die Entdeckung der Weltelemente(Zu E. Machs 70. Geburtstag)»),载于《斗争》杂志²⁸ 1908年第5期(2月号),英译文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²⁹ 1908年第10期(4月号),阿德勒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载于《历史唯物主义》文集。

赫主义的忙，结果反而弄巧成拙。问题至少是提得明确而尖锐的，马赫是真的“发现了世界要素”吗？如果是真的，那末，当然只有那些十分落后的和无知的人才会直到现在还要当唯物主义者。或者，这个发现只是马赫对旧的哲学谬误的重复吗？

我们知道，1872年的马赫和1876年的阿芬那留斯都抱着纯粹唯心主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我们的感觉。1883年，马赫的《力学》出版了，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恰好引证了阿芬那留斯的《绪论》，对那些和自己的哲学“非常接近的”(sehr verwandte)思想表示欢迎。下面就是《力学》中关于要素的议论：“全部自然科学只能描写(nachbilden und Vorbilden)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要素的复合。这里所说的是这些要素的联系。A(热)和B(火光)的联系属于物理学，A和N(神经)的联系属于生理学。这两种联系不是单独地存在着的，而是一起存在的。我们只能暂时撇开这种或那种联系。因此，连那些看来是纯粹力学的过程往往也是生理学的过程。”(前引书德文版第498页)在《感觉的分析》里也有同样的议论：“……凡是把‘感觉’、‘感觉的复合’这两个名词和‘要素’、‘要素的复合’这两个名词同时并用，或是用前者来代替后者的地方，必须经常注意：只有在这种联系上(即在A、B、C和K、L、M的联系上，也就是说，在“通常称为物体的复合”和“我们称为我们身体的复合”的联系上)，在这种关系上，在这种函数的依存关系上，要素才是感觉。在另一种函数的依存关系上，它们同时又是物理对象。”(俄译本第23页和第17页)“例如，当我们注意到颜色对照明颜色的光源(其他颜色、热、空间等)的依存关系时，颜色就是物理对象。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它对视网膜(要素K、L、M……)的依存关系时，它就是心理对象、感觉。”(同上，第24页)

这样一来，世界要素的发现就在于：

(一)宣称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感觉；

(二)把感觉叫作要素；

(三)要素分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后者依赖于人的神经并且依赖于整个人的机体，而前者不依赖于它们；

(四)宣称物理要素的联系和心理要素的联系不是彼此单独地存在着的，而只是一起存在着的；

(五)只能暂时撇开这种或那种联系；

(六)宣称“新”理论是没有“片面性”的^①。

这里的确没有片面性，然而却有彼此相反的哲学观点的杂乱的混合。既然你们只是从感觉出发，那末你们不能用“要素”这个字眼克服你们的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只是把问题弄糊涂，胆怯地躲开你们自己的理论。在口头上，你们消除了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的对立^②，唯物主义（它认为自然界、物质是第一性的）和唯心主义（它认为精神、意识、感觉是第一性的）之间的对立，但实际上，你们又马上放弃自己的基本前提，重新恢复这种对立，偷偷地恢复这种对立！因为，如果要素是感觉，那末你们连一秒钟也没有权利认为“要素”是不依赖于我的神经和我的意识而存在的。但是，既然你们承认这种不以我的神经和我的感觉为转移的物理对象，这种只是通过对我的视网膜的作用而产生感觉的物理对象，那末你们就是可耻地离开你们的“片面的”唯心主义而转到“片面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了！如果颜色仅仅在依存于视网膜

①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一书中说：“人们通常把要素叫作感觉。但由于在感觉这个名称下已经有了一种片面的理论，所以我们宁肯简单地讲要素。”（第27—28页）

② “自我与世界的对立、感觉或现象与物的对立消失了，一切只归结为要素的结合。”（《感觉的分析》第21页）

时才是感觉(如自然科学迫使你们承认的那样),那末,这就是说,光线落到眼网膜上才引起颜色的感觉;这就是说,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和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物质的运动,例如,存在着一定长度和一定速度的以太波,它们作用于眼网膜,使人产生这种或那种颜色的感觉。自然科学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它用人的眼网膜之外的、在人之外和不以人为转移的光波的不同长度来说明各种颜色的感觉。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眼网膜等等,即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通过“要素”这个字眼悄悄地偷运唯物主义;这个字眼仿佛可以把他们的理论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中拯救出来,似乎容许他们承认心理的东西依赖于眼网膜、神经等等,而物理的东西则不依赖于人的机体。事实上,玩弄“要素”这个字眼,显然是一种最可怜的诡辩,因为唯物主义者在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著作时,马上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要素”是什么呢?以为造出一个新字眼就可以躲开哲学上的基本派别,那真是小孩子的想法。如果象一切经验批判主义者,如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①等等所说的那样,“要素”是感觉,那末,先生们,你们的哲学就是妄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目的唯心主义。如果“要素”不是感觉,那末你们的这个“新”字眼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它只不过

① 约瑟夫·彼得楚尔特《纯粹经验哲学引论》(Joseph Petzoldt.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reinen Erfahrung») 1900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13页,“感觉,即通常所谓的简单的不能再分解的知觉(Wahrnehmungen),就叫做要素。”

是大肆吹嘘的空话而已。

例如,拿彼得楚尔特来说吧,根据俄国第一个经验批判主义的大师列谢维奇的评论,他是经验批判主义的权威^①。他把要素规定为感觉,并在上述著作第二卷里说道:“在‘感觉是世界要素’这个命题中,必须防止把‘感觉’这个词看作仅仅是指一种主观的、因而是虚无缥缈的、把通常的世界图景变为幻影(verflüchtigendes)的东西。”^②

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彼得楚尔特感觉到:假使认为感觉是世界要素,那末世界就会“消散”(verflüchtigt sich),或者变成幻影。好心肠的彼得楚尔特以为只要附带声明一下,即不要把感觉只看作是主观的东西,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难道这不是可笑的诡辩吗?难道事情会因为我们把感觉“看作”感觉或者竭力扩大这个词的含意而有所改变吗?难道象人的感觉同正常活动着的神经、视网膜、大脑等等联系着以及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感觉而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会因此消失吗?如果你们不想用一些狡辩来支吾搪塞,如果你们真想“防止”主观主义和唯我论,那末你们首先应该防止你们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路线(从外部世界到感觉)来代替你们哲学的唯心主义的路线(从感觉到外部世界),应该抛弃“要素”这个空洞的、混乱的饰词,而直截了当地说:颜色是物理对象作用于视网膜的结果,也就是说,感觉是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结果。

我们再拿阿芬那留斯来说吧。他的最后的(也可以说对于了解他的哲学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

① 弗·列谢维奇《什么是科学的〈应该作时髦的、教授的、折衷主义的〉哲学?》1891年圣彼得堡版第229页和第247页。

② 彼得楚尔特所著前书1904年来比锡版第2卷第329页。

察》^①，在“要素”问题上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作者在这里列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图表(第18卷第410页)，我们把它的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要素、要素的复合：

一、物或属于物的东西……………有形物。

二、思想或属于思想的东西

(Gedankenhaftes)……………无形物、记忆和幻想”。

请把这个表同马赫在对“要素”作了一切说明之后所说的(《感觉的分析》第33页)“不是物体引起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感觉的复合)构成物体”这句话对照一下。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克服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的“世界要素的发现”！起初他们要我们相信：“要素”是一种新东西，它同时既是物理的又是心理的东西。后来他们又偷偷地作了一些修正，用“最新实证论”关于物的要素和思想的要素的学说来代替物质(物体、物)与心理的东西(感觉、记忆、幻想)之间的显著的唯物主义的区别。阿德勒(弗里茨)并没有从“世界要素的发现”中得到很多东西！

1906年波格丹诺夫在反驳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我不能承认自己在哲学上是一个马赫主义者。在总的哲学观点上，我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关于经验要素对‘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中立性的观念、关于这两种特性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联系的观念。”(《经验一元论》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序言第41页)这正如一个信奉宗教的人说：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宗教徒，因为我从宗教徒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信仰上帝。波格丹诺

① 理·阿芬那留斯《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R. Avenarius, «Bemerkungen zum Begriff des Gegenstandes der Psychologie»), 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³⁰第18卷(1894)和第19卷(1895)。

夫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而这一点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错误，就是这整个哲学的基本错误。波格丹诺夫认为自己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差异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事实上这种差异完全是次要的，它没有超出马赫所赞成的以及赞成马赫的各个经验批判主义者之间的细小的、局部的、个别的差异的范围（关于这点下面再详细地谈）。因此，当波格丹诺夫看到别人把他同马赫主义者混为一谈而愤愤不平的时候，只是暴露出他不了解唯物主义同波格丹诺夫以及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者的共同点之间的根本差别。重要的不是波格丹诺夫如何发展或修改马赫主义，或者如何把马赫主义弄得坏些，而是他抛弃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使自己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走上唯心主义的歧途。

我们看到，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他写道：“我直接看到的、在我面前的人的形象，就是感觉。”^①波格丹诺夫没有化费精力去批判自己的这个旧观点。他盲目地相信马赫的话，并且跟着他重复说：经验的“要素”对于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中立的。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一卷（第2版第90页）里写道：“正如最新实证哲学所阐明的那样，心理经验的要素和任何经验的要素都是等同的，因为它们是和物理经验的要素等同的。”又如他在1906年写道（第3卷序言第20页）：“至于说到‘唯心主义’，难道仅仅根据承认‘物理经验’的要素跟‘心理经验’的要素或基本感觉是等同的这一点（这完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说这是唯心主义吗？”

波格丹诺夫的一切哲学厄运的真正根源，他和一切马赫主义者所共有的根源，就在这里。当他们承认“物理经验的要素”（即物

^① 《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216页，参看上面的引文。

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物质)和感觉是等同的时候,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说这是唯心主义,因为这无非是贝克莱主义。这里连一点最新哲学、实证哲学或毋庸置疑的事实影子也没有,这里只有陈旧不堪的唯心主义的诡辩。假使问一问波格丹诺夫,他怎样能够证明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物理的东西是和感觉等同的,那末你们连一个论据也听不到,你们只能听到一些唯心主义者的老调:我只感觉到自己的感觉;“自我意识的陈述”(die Aussage des Selbstbewußtseins——见阿芬那留斯的《绪论》德文第2版第93节第56页);或者“在我们的经验中〈这个经验表明“我们是有感觉的实体”〉,感觉比实体性更为可靠”(同上,第91节第55页);如此等等。波格丹诺夫相信了马赫,结果把反动的哲学谬论当作“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在实际上他没有举出而且也举不出一个事实来驳倒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的观点,即1899年波格丹诺夫所同意的并且至今仍为自然科学所同意的观点。物理学家马赫在他的哲学的谬误中完全离开了“现代自然科学”,波格丹诺夫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一重要情况,我们在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

促使波格丹诺夫如此迅速地从事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跳到马赫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去的情况之一,就是阿芬那留斯关于经验的依存系列和独立系列的学说(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不算在内)。波格丹诺夫自己在《经验一元论》第一卷里这样叙述这个问题:“只要经验材料依存于某个神经系统的状态,它们就构成某人的心理世界;只要经验材料超出这种依存关系,我们面前就出现物理世界。因此,阿芬那留斯称呼经验的这两个领域为经验的依存系列和独立系列。”(第18页)

糟糕的是,这种关于独立(即不依赖于人的感觉的)“系列”的学说,就是偷运唯物主义,从主张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感觉是和物

理“要素”“等同的”哲学观点看来，这种偷运是非法的、放肆的、折衷主义的。因为，你们既然承认光源和光波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着，承认颜色依赖于这些光波对视网膜的作用，那末你们实际上就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了，并且把唯心主义的一切“无庸置疑的事实”、一切“感觉的复合”、最新实证论所发现的要素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彻底摧毁了。

糟糕的是，波格丹诺夫（以及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没有深刻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观点，没有认清他们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因而就没有看出他们后来想偷运唯物主义这一企图的非法性和折衷性。但是，正如在哲学文献中大家公认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一样，大家也公认后来经验批判主义力图转向唯物主义。我们上面引证过的法国著作家柯维拉尔，在阿芬那留斯的《绪论》里看到“一元论唯心主义”，在《纯粹经验批判》（1888—1890）里看到“绝对实在论”，而在《人的世界概念》（1891）里看到“说明”这种转变的企图。应当指出：在这里，实在论这个术语是在唯心主义的对立物的意义上使用的。我照恩格斯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只使用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并且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术语，这特别是因为“实在论”这个词已经被实证论者和其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糊涂虫们玷污了。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柯维拉尔所指的是下面这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在《绪论》（1876）中，阿芬那留斯认为感觉是唯一的存在物，而把“实体”（按照“思维经济”的原则！）取消了；在《纯粹经验批判》中，物理的东西被看作是独立系列，而心理的东西（因而也包括感觉）被看作是依存系列。

阿芬那留斯的门徒维利同样承认：阿芬那留斯在1876年“完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可是后来他把这个学说和“素朴实在论”

“调和”(Ausgleich)起来了(前引书,同页),也就是说,和人类自发的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意识而存在的观点“调和”起来了。

《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阿芬那留斯》一书的作者艾瓦德说:这种哲学本身就结合着互相矛盾的唯心主义的和“实在论的”(应当说唯物主义的)要素(不是马赫主义者所说的要素,而是一般人所说的要素)。例如:“绝对的〈考察〉会使素朴实在论永世长存;相对的〈考察〉会宣称绝无仅有的唯心主义永恒不变。”^①阿芬那留斯所谓的绝对的考察,相当于马赫所说的我们身体之外的“要素”的联系,而相对的考察则相当于马赫所说的依存于我们身体的“要素”的联系。

但是在这方面使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冯特的意见,他自己也象上述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抱着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他几乎比谁都更仔细地研究了经验批判主义。关于这点,尤什凯维奇说了这样的话:“有趣的是,冯特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是最新型的唯物主义的最科学的形式”^②,而这种唯物主义就是指那些认为精神是肉体过程的机能的唯物主义者(再补充一句,即冯特称之为站在斯宾诺莎主义和绝对唯物主义之间的人们^③)的学说。

说冯特的意见非常有趣是对的,但在这里最“有趣的”还是尤什凯维奇先生对他所论述的哲学书籍和哲学论文的态度。这是我

① 奥斯卡·艾瓦德《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理查·阿芬那留斯》(Oskar Ewald. «Richard Avenarius als Begründer des Empiriokritizismus»)1905年柏林版第66页。

② 巴·尤什凯维奇《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5页。

③ 威·冯特《论素朴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W. Wundt. «Über naiven und kritischen Realismus»),载于《哲学研究》杂志³¹第13卷(1897)第334页。

们的马赫主义者对待问题的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果戈里的彼得鲁什卡³²常常读书，发现字母总会拼成字这一点是有趣的。尤什凯维奇先生读了冯特的书，发现冯特谴责阿芬那留斯为唯物主义这点是“有趣的”。如果冯特错了，为什么不驳斥呢？如果他沒有错，为什么不说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对立呢？尤什凯维奇先生发现唯心主义者冯特所说的话是“有趣的”，可是这位马赫主义者认为把问题追究明白则完全是浪费精力(大概是由于“思维经济”的原则)……

要知道，尤什凯维奇完全歪曲了事实，他只向读者说冯特谴责阿芬那留斯为唯物主义者，而不向读者说冯特认为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些方面是唯物主义，另一些方面是唯心主义，而二者之间的联系则是人为的。这位绅士或者是根本不懂得他所读的东西，或者是想通过冯特来骗人地自夸一番：你们瞧，连御用的教授们也认为我们不是什么糊涂虫，而是唯物主义者。

冯特的上述论文是一本厚书(共三百多页)，它首先对内在论学派，然后对经验批判主义者作了极详尽的分析。为什么冯特把这两派联结在一起呢？因为他认为这两派是近亲，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内在论者都赞同这个见解。冯特在上述论文第一编里指出：内在论者是唯心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信仰主义的信徒。这个见解，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冯特在说明这一见解时不必要地卖弄教授的博学，用了无用的微词妙语并加上多余的保留条件，这是因为冯特本人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者。他责难内在论者，不是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的信徒，而是因为在在他看来他们不正确地推论出这些大原则。往下，在论文的第二编和第三编里，冯特专门探讨经验批判主义。他在这里

十分明确地指出：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原理（对“经验”的理解和“原则同格”，关于后者我们在下面再谈）和内在论者的主张是一致的（die empiriokritische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r immanenten Philosophie annimmt^①，冯特的论文第382页）。阿芬那留斯的其他理论原理是从唯物主义那里剽窃来的，所以整个讲来，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五花八门的混合物（bunte Mischung）”（上述论文第57页），其中“不同的组成部分是彼此完全没有联系的（an sich einander völlig heterogen sind）”（第56页）。

冯特主要是把阿芬那留斯的“独立的生命系列”学说当作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混合物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他说（上述论文第64页）：如果你们从“C系统”（极喜欢学究式地玩弄新名词的阿芬那留斯以此称呼人脑或整个神经系统）出发，如果你们认为心理的东西是大脑的机能，那末这个“C系统”就是“形而上学的实体”，而你们的学说就是唯物主义。必须指出，许多唯心主义者和一切不可知论者（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包括在内）都辱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就是超越经验的范围。关于形而上学这个术语以及为什么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个术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论述。现在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指出：阿芬那留斯关于“独立”系列的主张（马赫也有同样的主张，不过用的字眼不同而已），根据哲学上不同党派即不同派别的哲学家的一致公认，是剽窃唯物主义。如果你们从存在的一切都是感觉或者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点出发，那末你们不破坏你们的一切基本前提、“你们的”全部哲

① 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和内在论哲学是一致的。——编者注

学,就不能得出以下的结论:物理的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感觉是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的机能。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哲学中把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与唯物主义的个别结论混在一起,这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恩格斯以应有的鄙视称之为“折衷主义残羹剩汁”³³的典型^①。

在马赫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中,这种折衷主义特别触目。我们已经看到,马赫在那里宣称:“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而在同书中我们又读到:“在U<=Umgrenzung,即“我们肉体的空间界限”,第8页>之外的依存关系,就是最广义的物理学。”(第4节第323页)“要纯粹地获得(rein erhalten)这种依存关系,就必须尽可能地排除观察者的影响,即U之内的要素的影响。”(同上)是的,是的。起初山雀扬言要烧枯海洋³⁴,就是说,要用心理要素构成物理要素,而后来却说物理要素处在“存在于我们肉体之内的”心理要素的界限之外!多妙的哲学!

还有一个例子:“理想(vollkommenes)气体、理想液体、理想弹性体是不存在的。物理学家知道他的假说只是近似地符合事实,因为这些假说随意地把事实简单化;物理学家知道这个不能消除的偏差。”(第30节第418页)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偏差(Abweichung)呢?是什么离开

^① 见1888年2月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序言。恩格斯的这些话是针对整个德国教授哲学讲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不能了解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的意义和内容,他们往往用一种可怜的辞令来掩饰自己,说“恩格斯还不知道马赫”(弗里茨·阿德勒的论文,见《历史唯物主义》文集第370页)。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恩格斯没有引证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话吗?别的根据是没有的,而这个根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折衷主义者的姓名,至于从1876年起就编辑《“科学的”哲学季刊》的阿芬那留斯,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什么的偏差呢？是思想（物理学理论的思想）离开事实的偏差。那末思想、观念是什么呢？观念是“感觉的痕迹”（第9页）。而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感觉的复合”。这样说来，感觉的痕迹离开感觉的复合的偏差是不能消除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马赫忘记了他自己的理论，在开始谈论物理学的各种问题时，他不要唯心主义的花招，直率地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议论。一切“感觉的复合”和全部贝克莱主义的智慧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物理学家的理论原来是我们之外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物体、液体、气体的反映，这个反映当然是近似的，可是把这种近似或简单化叫作“随意的”，那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实际上马赫正象没有被贝克莱和休谟的弟子们“清洗过的”全部自然科学一样，把感觉看作外部世界的映象。马赫自己的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可是当他需要客观性的因素时，就毫不客气地把相反的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前提加到自己的议论中去。哲学上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和彻底的反动分子哈特曼，是马赫的反唯物主义斗争的同情者，在说到马赫的哲学立场是“素朴实在论和绝对幻想主义的混合物（Nichtunterscheidung）”^①时，他很接近真理。那个说法是正确的。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等等的学说，就是绝对幻想主义，也就是唯我论，因为从这个观点出发，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而我们在上面所引证的马赫的议论以及他的其他许多片断的议论，就是所谓的“素朴实在论”，即不自觉地自发地从自然科学家那里接受过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阿芬那留斯和追随他的教授们，企图用“原则同格”的理论来掩饰这种混合。我们马上就要考察这个理论，但我们先得把责难

^① 爱德华·冯·哈特曼《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Eduard von Hartmann, «Die Weltanschauung der modernen Physik»）1902年莱比锡版第219页。

阿芬那留斯为唯物主义者的问题告一结束。尤什凯维奇先生只觉得他所不了解的冯特的意见非常有趣，但却没有兴趣亲自去弄清楚或者不屑于告诉读者：阿芬那留斯的最亲近的弟子和继承者是怎样对待这个责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关心马克思的哲学(即唯物主义哲学)如何对待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上面这一点对于弄清问题是必要的。其次，如果马赫主义是一团糟的东西，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合物，那末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御用的唯心主义者由于这个思潮对唯物主义作了让步而把它推开的时候，这个思潮究竟流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什么地方。

阿芬那留斯的两个最道地的正统的弟子彼得楚尔特和卡斯坦宁答复了冯特。彼得楚尔特高傲而愤懑地驳斥了把这位德国教授诬蔑为唯物主义者的责难，并且引证了……你们猜，他引证了什么？……引证了阿芬那留斯的那部据说把实体概念消灭了的著作——《绪论》！多么方便的理论，既可以把纯粹唯心主义的著作同它联系起来，也可以把任意拿来的唯物主义前提同它联系起来！彼得楚尔特写道：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判》，当然是和这个学说(即唯物主义)不矛盾的，可是它与完全相反的唯灵论学说也是不矛盾的^①。绝妙的辩护！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波格丹诺夫不肯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而要别人承认(在哲学上)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步着彼得楚尔特的后尘。他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无论和唯物主义，无论和唯灵论，无论和一切形而上学都没有关系”^②，“真理……不是两个冲突着的派别(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之间的‘中庸之道’，真理是超出二者之外的”^③。其实，

① 约·彼得楚尔特《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352页。

② 《经验一元论》第2版第1卷第21页。

③ 同上，第93页。

波格丹诺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是一团糟的东西，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东西。

卡斯坦宁在反驳冯特时说：他根本反对“塞进 (Unterschiebung) 与纯粹经验批判完全不相容的唯物主义因素”^①。“经验批判主义，在对概念的内容的关系上，主要是 (κατ'ἐξοχήν) 怀疑论。”这种对马赫主义的中立性的强调多少包含有一点真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对他们原来的唯心主义的修正，完全可以归结为他们对唯物主义作了不彻底的让步。贝克莱的彻底的观点有时候被休谟的观点代替了。贝克莱认为外部世界就是我的感觉，休谟把我的感觉之外是否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取消了。而这个不可知论的观点注定要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三 原则同格和“素朴实在论”

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和《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这两本书中阐述了他的原则同格学说。后一著作写得较晚，阿芬那留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这里的讲法的确有些不同，但讲的东西同《纯粹经验批判》和《人的世界概念》里讲的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②。这个学说的本质，就是关于“我们的自我 (des Ich) 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 (unauflösliche) 同格”(即相互关联)的原理(第146页)。阿芬那留斯在这里又说：“用哲学的话来讲，可以说是‘自我和非我’”。前者和后者，我们的自我和环境，“总是被我

① 弗·卡斯坦宁《经验批判主义——对威·冯特论文的答复》(Fr. Carstanjen, «Der Empiriekritizismus, zugleich eine Erwiderung auf W. Wundt's Aufsätze»), 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2年卷(1898)第73页和第213页。

② 《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载于1894年前引杂志第137页。

们一起发现的 (immer ein Zusammen-Vorgefundenes)”。“对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des Vorgefundenen〉的任何完全的描述,不能只包括‘环境’而没有某个自我 (ohne ein Ich) (这个环境就是这个自我的环境),至少不能没有那个描述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或见到的东西; das Vorgefundene〉的自我。”(第 146 页)这里自我叫作同格的中心项,环境叫作同格的对立项 (Gegen-glied)^①。

阿芬那留斯妄想用这个学说来表示他承认所谓素朴实在论的全部价值,即一切不考虑自己以及环境、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人们所主张的普通的非哲学的素朴的观点的全部价值。马赫表示自己和阿芬那留斯是一致的,他也竭力把自己装扮成“素朴实在论”的保护人(《感觉的分析》第 39 页)。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一个例外,都相信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为他们真的在保护“素朴实在论”;他们承认自我,承认环境,你们还要什么呢?

为了弄清楚最高度的真实的素朴性究竟在谁那里,我们稍为讲得远一些。下面是某哲学家和一个读者的通俗对话:

“读者:物的体系应该是存在着的〈根据普通哲学的见解〉,意识应该是来自物的。”

“哲学家:现在你是在随着职业哲学家说话……而不是根据普通常识和现实意识的观点说话……”

告诉我,并且在回答之前好好地想一想:如果某一物不跟你关于该物的意识在一起,或者说不通过这一意识,那末它能否在你的心里或面前出现呢?……”

“读者:如果我好好地想一想,我应该同意你的意见。”

① 见《人的世界概念》1905年第2版第148节和以下各节第83—84页。

“**哲学家**：现在你是说自己的话了，说自己的真心话了。不要企图超出你自己的范围，不要企图超出你所能理解〈或把握〉的东西。你所能理解的就是意识和〈着重号是哲学家加的〉物，物和意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二者中的哪一个，而是那种后来才分解为这二者的东西，那种绝对的主体-客体和客体-主体。”

这就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的全部实质，就是最新实证论对“素朴实在论”的最新式的保护的全部实质！“不可分割的”同格的思想在这里叙述得非常清楚，而且被说成仿佛是真正保护没有被“职业哲学家”的诡辩所歪曲的普通人的观点。但这段对话是从1801年出版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古典代表费希特的著作中引来的^①。

在我们所考察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中，除了重弹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调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妄想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消除从物到意识和从意识到物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然而这是刷新了的费希特主义的痴心妄想。费希特也以为：他把“自我”和“环境”、意识和物“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他用人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这种说法把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在重复贝克莱的论据：我感觉的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没有权利假定在我的感觉之外有“自在客体”。贝克莱在1710年，费希特在1801年，阿芬那留斯在1891—1894年所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世界是我的感觉；非我是由我们的自我“规定”（创造、产生）

^①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就最新哲学的真正本质向广大读者的明白报道——强使读者了解的一个尝试》（*Johann Gottlieb Fichte, «Sonnenklarer Bericht an das größere Publikum über das eigentliche Wesen der neuesten Philosophie. — Ein Versuch die Leser zum Verstehen zu zwingen»*）1801年柏林版第178—180页。

的，物和意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论点，都是同样的破烂货色，只不过挂上了略加粉饰或重新油漆过的招牌而已。

援用那种似乎受到这类哲学保护的“素朴实在论”，是最不值钱的诡辩。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素朴实在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正是这个经验（不是马赫主义所理解的经验，而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经验）使我们坚信：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是其他的人，而不是我的高、低、黄、硬等等感觉的单纯复合。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

这样地评价“原则同格”，是不是由于唯物主义对马赫主义怀有偏见呢？完全不是。有一些哲学专家，他们对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偏袒，甚至还憎恨唯物主义和信奉某种唯心主义体系，但都一致认为阿芬那留斯之流的原则同格是主观唯心主义。例如，冯特（他的有趣的意见是为尤什凯维奇先生所不了解的）直截了当地说：根据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似乎没有某个自我、观察者或描述者，就不可能有对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的完全的描述，这种理论就是“错误地把现实经验的内容和关于这种内容的论断混在一起”。冯特说，自然科学完全摆脱任何观察者。“这样的摆脱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关于必须在每一经验内容中看出（hinzudenken，直译为：设想出）感受着经验的个人这一观点，完全是没有经验根

据的假定，是由于错误地把现实经验的内容和关于这种内容的论断混在一起而作出的假定，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和内在论哲学是一致地同意这个观点的。”（前引论文第382页）因为对阿芬那留斯表示热烈同情（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内在论者（舒佩、雷姆克、莱克列尔、舒贝特-索尔登），恰恰是从主体和客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思想出发的。冯特在分析阿芬那留斯之前详细地指出：内在论哲学只不过是贝克莱主义的“变形”；不管内在论者怎样否认和贝克莱的关系，但字面的差别实际上掩盖不了“哲学学说的更深刻的内容”，即贝克莱主义或费希特主义^①。

英国著作家斯密斯在分析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哲学》的时候，更直截了当地、更果断地说明了这个结论：

“大多数读过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一书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不管他的批判〈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有多大的说服力，但他的积极成果却完全是虚幻的。如果我们试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理论按照他们所要设想的那样解释成真正实在论的（genuinely realistic）理论，那末这种理论就不能获得任何明确的说明：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否定那据说是它所反驳的主观主义。但是，当我们把阿芬那留斯的术语翻译成比较普通的话时，我们就会发现这套把戏的真正根源在什么地方。阿芬那留斯着重攻击自己理论的致命弱点〈即唯心主义的弱点〉，从而使人们不去注意他的立场的弱点。”^②“在阿芬那留斯的全部议论中，‘经验’（experience）这个术

^① 前引论文C节，《内在论哲学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第373、375页，参看第386页和第407页。关于从这一观点出发必然会陷入唯我论这点，可参看第381页。

^② 诺曼·斯密斯《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哲学》（Norman Smith, 《Avenarius' Philosophy of Pure Experience》），载于《思想》杂志³⁵第15卷（1906）第27—28页。

语的含糊不清很好地帮了他的忙，这个术语有时候指经验着的人，有时候指被经验的东西；当说到我们的自我(of the self)的本性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后一种含意。‘经验’这个术语的两种含意实际上是和他的绝对考察和相对考察的重要划分〈我在上面已经指出阿芬那留斯的这种划分的意义〉一致的；在他的哲学中，这两种观点事实上没有调和起来。因为当他假定经验在观念上被思想补充〈对环境的完全的描述在观念上被观察着的自我这一思想所补充〉这一前提是合理的时候，他就不能把这一假定和他自己的另一主张，即离开对我们的自我(to the self)的关系什么都不存在的主张结合起来。在观念上补充这种实在——这是我们在把物质的物体分解为我们感觉不到的要素时所得到的实在〈这里的要素是指自然科学所发现的物质的要素，如原子、电子等，而不是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所臆造的要素〉，或在描写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时所得到的实在——严格说来，不是补充经验，而是补充我们所经验的东西。这只是补充阿芬那留斯所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同格的两项中的一项。这不仅引导我们达到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不曾是经验的对象的，has not been experienced〉东西，而且还引导我们达到象我们这样的生物永远也不能经验到的东西。但是‘经验’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在这里正好帮了阿芬那留斯的忙。阿芬那留斯说，思想象感性知觉一样是真正的(genuine)经验形态，这样他就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陈旧的(time-worn)论据上，这个论据就是：思想和实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实在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感知，而思想则以思想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阿芬那留斯的积极议论的最终结果，并不是什么独创地、精辟地恢复实在论，而只是以最粗陋的(crudest)形式恢复主观唯心主义。”(第29页)

完全重复着费希特错误的阿芬那留斯所要的把戏，在这里被

精彩地揭穿了。只要我们一开始研究一定的具体问题，如关于地球先于人、先于任何有感觉的生物而存在的问题时，立刻就会发现，用“经验”这个字眼可以消除唯物主义（斯密斯没有根据地把它叫作实在论）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的那种滥调，完全是神话。关于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加以详细的讨论。现在我们要指出：撕破阿芬那留斯及其伪“实在论”的假面具的，不仅有他的理论上的敌人斯密斯，而且还有曾经热烈欢迎《人的世界概念》的出版并认为它是素朴实在论的确证的内在论者舒佩^①。事情是这样的：舒佩完全赞同这样的“实在论”，即阿芬那留斯所伪造的唯物主义。他在给阿芬那留斯的信中写道，我一直希望和您 hochverehrter Herr College（最尊敬的同行）有同样的权利主张这样的“实在论”，因为有人诬蔑我这个内在论者，似乎我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最尊敬的同行，我的思维概念……与您的‘纯粹经验的理论’是非常和谐的（verträgt sich vortrefflich）。”（第384页）实际上只有我们的自我（das Ich，即抽象的、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离开头脑的思想）才给予“同格的两项以联系和不可分割性”。舒佩在给阿芬那留斯的信中说：“您默默地把您想要排除的东西定为前提。”（第388页）我们很难说是谁更彻底地撕破了卖弄玄虚的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是直率地明确地反驳他的斯密斯呢，还是热烈赞扬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的舒佩？哲学上舒佩的接吻，并不比政治上司徒卢威或缅甸科夫先生的接吻好一些。

称赞马赫没有向唯物主义屈服的艾瓦德，也以同样的方式讲到原则同格：“如果宣称中心项与对立项的相互关连是不可违背的认识论的必然性，那末，不管用怎样醒目的大字在招牌上标着‘经

^① 见威·舒佩致理·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卷（1893）第364—388页。

验批判主义’，这仍意味着主张与绝对唯心主义毫无差别的观点〈绝对唯心主义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应当说是主观唯心主义，因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人以外的地球、自然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容的，它只是把自然界看成了绝对观念的“异在”〉。相反地，如果不一贯坚持这个同格而承认对立项的独立性，那末，一切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特别是走向超越的实在论的可能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前引书第56—57页)

以艾瓦德为笔名的弗里德兰德先生把唯物主义叫作形而上学和超越的实在论。他本人拥护唯心主义的一个变种，因而同马赫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完全一致地说：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是最粗野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第134页)。讲到唯物主义的“超越”和形而上学性，他和巴札罗夫以及我们的一切马赫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论述。这里重要的是要再一次指出：这个想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的伪学者的奢望实际上是怎样幻灭的，以及问题是怎样尖锐地不可调和地提出来的。“承认对立项的独立性”，这就是(如果把喜欢装腔作势的阿芬那留斯的矫揉造作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这就是唯物主义。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的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物理和心理方面是等同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这是一个简单的必然的真理，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很容易透过阿芬那留斯、舒佩、艾瓦德和其他人的成堆晦涩难懂的、故意把问题弄糊涂并使广大读者畏避哲学的、伪学者的术语，而发现这个真理。

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与“素朴实在论”的“调和”，最后甚至引起了他的弟子们的怀疑。例如，维利说：对于所谓阿芬那留斯达到了

“素朴实在论”这个流行的说法，我们必须有条件地去理解。“素朴实在论作为教条来说，无非是对存在于人之外的 (außerpersönliche)、可以感知的自在之物的信仰。”^①换句话说，在维利看来，真正同“素朴实在论”有着真实而非虚构的一致性的唯一的认识论，就是唯物主义！当然，维利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一书中，“用了一系列复杂的和部分是极端牵强的辅助概念和中介概念”（第 171 页）去恢复“经验”的统一、“自我”和环境的统一。《人的世界概念》这本著作是对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它“完全带有调和 (eines Ausgleiches) 合乎常识的素朴实在论和学院哲学的认识论唯心主义的性质。但是，说到这样的调和能够恢复经验〈维利把它叫作 Grunderfahrung，即根本经验。又是一个新名词！〉的统一和完整，那我不敢断言”（第 170 页）。

真是一个有价值的自供！阿芬那留斯的“经验”不能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维利似乎想丢开经验的学院哲学，以使用加倍混乱的“根本”经验的哲学来代替它……

四 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对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来说，是特别毒辣的。自然科学肯定地认为：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和任何生物的状况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来的现象，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当时没有具有感觉的物质，没有任何“感觉的复合”，没有任何象阿芬那留斯的学说所讲的那

^① 参·维利《反对学院智慧》第 170 页。

种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自我。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试问：经验批判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们是否注意到了他们的理论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种矛盾？他们注意到了，而且直接提出了应当用哪些论点去克服这种矛盾的问题。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对这个问题的三种看法，即阿芬那留斯本人以及他的弟子彼得楚尔特和维利的看法，是特别有意思的。

阿芬那留斯企图用同格中的“潜在”中心项的理论来克服与自然科学的矛盾。我们知道，同格就是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消除这个理论的明显的荒谬，他采用了“潜在”中心项这个概念。例如，人是从胚胎发育来的，这怎么说呢？如果“中心项”是胚胎，那末环境（=“对立项”）是否存在呢？阿芬那留斯回答说，胚胎的C系统“对于未来的个体的环境来说，是潜在中心项”（《考察》^①第140页）。潜在中心项决不等于零，甚至在没有双亲（elterliche Bestandteile）而只有能够成为双亲的“环境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也是这样（第141页）。

因此，同格是不可分割的。经验批判主义者为了挽救自己的哲学基础，即感觉及其复合，不能不这样主张。人是这个同格的中心项。而在没有人的时候，在人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中心项并不等于零，它只是变成了潜在的中心项！居然还会有人能够认真地对待发表这类议论的哲学家，真是令人惊奇！就连那位声明自己决不是任何形而上学（即任何信仰主义）的敌人的冯特，在这里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使用了破坏一切同格的“潜在”这个字眼，“经验概

① 即《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编者注

念被弄得神秘莫测了”(前引论文第 379 页)。

事实上,如果同格的不可分割性就在于其中一项是潜在的,那末难道还可以认真地说什么同格吗?

难道这不是神秘主义吗?难道这不是走到了信仰主义的大门口吗?如果可以给未来的环境设想一个潜在的中心项,那末为什么不能给过去的环境,即人死后的环境设想一个潜在的中心项呢?你们会说,阿芬那留斯并没有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的,但正因为这样,他的荒谬的反动的理论只是变得更卑怯些,而不是变得更好些。阿芬那留斯在 1894 年没有把他的理论彻底讲出来,也许是害怕彻底讲出来,害怕彻底思索下去,可是,我们将看到,舒贝特-索尔登在 1896 年正是引证了这个理论,而恰恰是为了作出神学结论,他在 1906 年博得马赫的赞许,马赫说舒贝特-索尔登走的是(和马赫主义)“十分接近的道路”(《感觉的分析》第 4 页)。恩格斯有充分的根据责备公开的无神论者杜林,因为杜林在自己的哲学中表现得不彻底,给信仰主义留下了空子。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并且十分公正地在这一点上责难了至少在七十年代还没有作出神学结论的唯物主义者杜林。而现在我们这里却有一些人,他们希望别人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自己却把那种与信仰主义十分接近的哲学传播到群众中去。

阿芬那留斯在同书中写道:“……也许有人会觉得,正是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然科学没有权利提出关于我们现在的环在人类存在以前的各个时期的问题。”(第 144 页)阿芬那留斯回答说:“凡是提出这样问题的人,都不能不设想自己的存在(sich hinzuzudenken,即设想自己是在场的)。”阿芬那留斯继续说道:“其实,自然科学家所要求的(尽管他们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实质上不过是下面这一点:如果我设想自己是观察者,就好

象设想我们在地球上用完善的器械观察另一行星或甚至另一太阳系的历史那样，那末应该如何确定生物和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或世界的情况呢？”

物不能离开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我们总是把自己设想成力图认识这个物的理性”。

这种必须把人的意识“设想成”和一切物、和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在一起的理论，我在第一段里是用“最新实证论者”阿芬那留斯的话说明的，而在第二段里是用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的话^①说明的。这一理论的诡辩是如此明显，真叫人不好意思去分析它。如果我们“设想”自己存在着，那末我们的在场是想象的，而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存在却是真实的。人实际上不能成为地球的白热状态的观察者，因而“设想”人在那时候就在场乃是蒙昧主义，这正象用下述论据来为地狱的存在作辩护一样：我只要“设想”自己是地狱的观察者，我就能观察到地狱。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调和”就在于：阿芬那留斯竟宽宏大量地同意“设想”一种自然科学认为是不可能设想的东西。稍微受过教育或稍微正常的人都不会怀疑：当地球上不可能有任何生命、任何感觉、任何“中心项”的时候，地球早就存在了。所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全部理论是哲学蒙昧主义，是荒谬透顶的主观唯心主义，因为这个理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地球是感觉的复合（“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者地球是“要素的复合，在要素中，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是等同的”，或者地球是“对立项，而它的中心项决不能等于零”。

彼得楚尔特看到阿芬那留斯站在如此荒唐的立场上，也觉得惭愧。他在《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里，用整整一节（第65

^① 约·哥·费希特《〈埃奈西德穆〉评论》（*J. G. Fichte. «Rezension des «Aenesidemus»»*）（1794），载于《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19页。

节)论述了“地球早期(frühere)的真实性问题”。

彼得楚尔特说道：“自我(das Ich)在阿芬那留斯的学说里所起的作用和在舒佩那里不同(我们要注意，彼得楚尔特屡次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哲学是由阿芬那留斯、马赫和舒佩这三个人创立的)，但是，自我所起的作用，对他的理论来说，毕竟还是太大了”(舒佩曾撕破了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说在阿芬那留斯那里事实上一切都只是建立在自我之上的，这一点显然影响了彼得楚尔特，因此，他想修正一下)。彼得楚尔特继续写道：“阿芬那留斯有一次说，‘当然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人迹未到的地方，但是为了能够想象(着重号是阿芬那留斯加的)这样的环境，就必须有我们称之为自我(Ich-Bezeichnetes)的东西，因为这种想象就是这个自我(着重号是阿芬那留斯加的)的想象。’”^①

彼得楚尔特反驳说：

“但是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想象这样的地方，而在于我们有没有根据想象它是离开任何一个人的思维而存在着的或者曾经存在过的。”

正确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人们能够去想象和“设想”各种各样的地狱、各种各样的鬼怪，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设想出了”……(说得和缓些)宗教的概念³⁶。但是认识论的任务就在于指出这一类设想的非实在性、幻想性和反动性。

“……因为，C系统(即脑)是为思维所必需的，这在阿芬那留斯以及我所拥护的哲学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

不对。1876年阿芬那留斯的理论，是不用头脑思想的理论。而且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甚至在他的1891—1894年的理论中，也

^① 《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卷(1894)第146页注释。

有这样一些唯心主义胡说的因素。

“……但是这个C系统是不是，譬如说，地球的第二纪(Sekundärzeit)的存在条件〈着重号是彼得楚尔特加的〉呢？”彼得楚尔特在这里举出了我引证过的阿芬那留斯关于自然科学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可以“设想”观察者的那段议论，并反驳说：

“不，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有没有根据象我想象地球在昨天或一分钟以前是存在的那样，想象那个遥远时代的地球也是存在的。或者，地球的存在真的是应当取决于维利所主张的那个观点吗？这个观点是：至少我们有根据想象，在当时和地球一起存在着某种C系统，即使它还处在最低的发展阶段上。”关于维利的这一思想，我们马上就要讲到。

“阿芬那留斯用下述思想来避开维利的奇怪结论，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能在思想上撇开自己〈sich wegdenken，即想象自己是不在场的〉，或者不能不设想自己的存在〈sich hinzuzudenken，见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德文第1版第130页〉。但是，这样一来，阿芬那留斯就把提问题的人的个人的自我，或关于这个自我的思想，不仅当作想象无人居住的地球这样一个简单活动的条件，而且当作我们有根据去想象当时地球的存在条件。

“只要不给这个自我以如此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些错误的途径是容易避免的。在注意研究这些或那些对空间和时间上离我们遥远的东西的看法时，认识论应当要求的只是：使这种东西成为可以想象的并且能够被一义地(eindeutig)规定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专门科学的事情。”(第2卷第325页)

彼得楚尔特把因果性规律更名为一义规定性规律，并且象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把这个规律的先验性加到自己的理论中去。这就是说，彼得楚尔特依靠康德主义的观点来摆脱阿芬那留斯的

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如果用教授的行话来说就是:“他过分看重我们的自我!”)。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缺乏客观因素,他的学说与宣称地球(客体)在生物(主体)出现以前早就存在的自然科学的要求不能调和,这种情况使得彼得楚尔特抓住因果性(一义规定性)不放。地球之所以是存在的,是因为它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存在和它现在的存在有着因果的联系。第一,因果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彼得楚尔特说,是先验的。第二,关于地狱、鬼怪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设想”等观念不也是有因果联系吗?第三,“感觉的复合”的理论无论如何是被彼得楚尔特破坏了。彼得楚尔特没有解决他所承认的阿芬那留斯的矛盾,反而使自己更加混乱,因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有一个,就是承认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只有这样的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才真正与自然科学相符合,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解决办法才能扫除彼得楚尔特和马赫对因果性问题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另行论述。

第三个经验批判主义者维利,在1896年的《经验批判主义——唯一的科学观点》(«Der Empirikritizismus als einzig wissenschaftlicher Standpunkt»)这篇论文里,第一次提出了关于阿芬那留斯哲学中的这个困难的问题。维利在这里问道:对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怎么办呢?①最初他附和着阿芬那留斯回答说:“我们在想象中使自己处身于以往的时代。”但是后来他又说:决不是一定要把经验了解为人的经验。“因为,如果我们把动物的生活和一般经验联系起来考察,那末,我们就应该把动物界,即使最下等的蛆虫,都看作是原始的人(Mitmenschen)。”(第73—74页)这

① 《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0卷(1896)第72页。

样,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就是蛆虫的“经验”了,蛆虫为了拯救阿芬那留斯的“同格”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而履行着“中心项”的职务!怪不得彼得楚尔特竭力想和这种论断划清界限。这种论断不仅荒谬绝伦(把符合地质学家的理论的地球观念硬加在蛆虫身上),而且对于我们的哲学家也毫无帮助,因为地球不但在人类出现以前而且在一切生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维利在1905年又一次讲到这个问题。蛆虫被清除了^①。而彼得楚尔特的“一义性规律”当然也没有使维利满意,维利认为这只是“逻辑的形式主义”。作者说,关于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的问题,如果依照彼得楚尔特的提法,恐怕使我们“又回到所谓常识的自在之物了吧?”(就是回到唯物主义!这实在太可怕了!)没有生命的千百万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时间也是自在之物呢?当然不是!^②既然这样,那就是说:人以外的物只是一些表象,只是人们依靠我们在周围所见到的一些片断而描绘出来的一点幻想。为什么不真是这样呢?难道哲学家应该惧怕生命的洪流吗?……我对自己说,不要为一些体系而煞费苦心吧,抓住瞬间(ergreife den Augenblick),抓住我们所经历的、唯一能带来幸福的瞬间。”(第177—178页)

对,对!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我论,不管维利的话多么刺耳,他在分析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这一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们总结一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三位经验批判主义的算命先生,他们满头大汗地竭力把自己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把唯我论的一些漏洞弥补起来。阿芬那留斯重复费希特的论据,用

① 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1905年版第173—178页。

② 关于这一点,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要同马赫主义者另行讨论。

想象的世界代替现实的世界。彼得楚尔特离开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走向康德的唯心主义。维利在他的“蛆虫”理论失败后，把手一挥，无意中说出了一个真理：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我论，或者甚至是不承认当前瞬间之外的任何东西。

现在我们只要向读者指出，我们本国的马赫主义者是怎样了解和叙述这个问题的。你们看，巴札罗夫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第十一页上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只好在我们忠实的向导〈指普列汉诺夫〉的领导下，走到唯我论地狱的最下的最可怕的一层里面去，在这一层里面，据普列汉诺夫断言，每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都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即必须以鱼龙和始祖鸟的直观形式来想象世界。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在想象中使自己处身于地球上只有人类的极遥远的祖先存在的那个时代，如第二纪。试问：那时候的空间、时间和因果性是怎样的呢？那时候它们是谁的主观形式呢？是鱼龙的主观形式吗？那时候是谁的悟性把自己的规律加给自然界呢？是始祖鸟的悟性吗？康德哲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和现代科学完全不能相容，它应该被抛弃。’（《路·费尔巴哈》注释，第117页）”

这里，巴札罗夫恰好在很重要的（我们马上会看到）一句话前面不继续引证普列汉诺夫的话了，这句话就是：“唯心主义说：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地球的历史表明：客体在主体出现以前老早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在具有明显的意识的有机体出现以前老早就存在了…… 发展史揭示出唯物主义的真理。”

我们继续引证巴札罗夫的话：

“……但是，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是否提供了我们所要得到的回答？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普列汉诺夫也认为我们对于物的本来面目一点也不能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只知道它们对

我们感觉器官作用的结果。‘除了这个作用，它们没有任何形态。’（《路·费尔巴哈》注释，第112页）在鱼龙时代，有什么样的感觉器官呢？显然，只有鱼龙以及和它类似的动物的感觉器官。那时只有鱼龙的表象才是自在之物的真实的、实在的现象。因此，普列汉诺夫也认为，如果古生物学家愿意站在‘实在的’基础上，就应该以鱼龙的直观形式来描写第二纪的历史。因此，和唯我论比起来，这里并没有前进一步。”

这就是这个马赫主义者的一段完整的议论（请读者原谅我们作了冗长的引证，但我们非这样不可）；作为第一流的典型糊涂思想，这种议论应当永垂不朽。

巴札罗夫以为他抓住普列汉诺夫的话柄了。如果说自在之物除了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就没有任何形态，那就是说，它们只有作为鱼龙的感觉器官的“形态”才存在于第二纪。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议论吗？！如果“形态”是“自在之物”对感觉器官作用的结果，那末，由此就可以得出物不依赖于任何感觉器官就不存在的结论吗？？

我们暂且假定巴札罗夫真的“不懂”普列汉诺夫的话（尽管这样的假定是不可能的），假定这些话在他看来是晦涩的。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问，巴札罗夫是在以高谈阔论反对普列汉诺夫呢（普列汉诺夫被马赫主义者捧为唯物主义的唯一代表！），还是在阐明关于唯物主义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话是晦涩的或矛盾的，如此等等，那末你为什么不出其他的唯物主义者呢？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吗？然而无知并不是论据。

如果巴札罗夫真的不知道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那末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极端无知的突出例子了。请读者回想一下

贝克莱，他在1710年曾经因为唯物主义者承认不依赖于我们意识而存在的并且为我们意识所反映的“自在客体”而责难他们。当然，任何人都有站在贝克莱一边或另外什么人一边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在议论唯物主义者时歪曲或抹杀整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这就是肆无忌惮地把问题弄得一塌糊涂。

普列汉诺夫说，唯心主义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而唯物主义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着，并且或多或少正确地反映在主体的意识中，这些话说得对吗？如果这些话说得不对，那末稍微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人，就应该指明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错误，并且在谈到唯物主义和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这一问题时不必同普列汉诺夫计较，而是应该同别的什么人，如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去计较。如果这些话说得对，或至少你不能够在这里发现错误，那末你企图颠倒是非，混淆读者头脑中的关于跟唯心主义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概念，这是写作方面极不体面的事情。

对于那些不为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字一句所左右而对这个问题抱有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引证费尔巴哈的见解。大家知道（也许巴札罗夫不知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他而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入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费尔巴哈在反驳哈伊姆时写道：

“当自然界还不是人或意识的对象时，它在思辨哲学看来，或者至少在唯心主义看来，当然是康德的自在之物（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把康德的自在之物和唯物主义的自在之物混为一谈，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详细讲），是没有实在性的抽象物，然而使唯心主义破产的正是自然界。自然科学，至少在它当前的情况下，必然把我们引到这样一个时代，当时还没有人类生存的条件，当时自然界即地球

还不是人的眼睛和意识的对象，因而当时自然界是一个绝对非人的存在物 (absolut unmenschliches Wesen)。唯心主义可以这样反驳说：这个自然界是你设想的 (von dir gedachte) 自然界。不错，可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自然界在某一时期实际上没有存在过，这正如不能根据我现在没有想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对我来说也就不存在这一点得出结论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当时实际上没有在我之外存在过。”^①

这就是费尔巴哈从人类出现以前就有自然界的观点出发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作的论断。费尔巴哈驳倒了阿芬那留斯的诡辩(“设想一个观察者”)，他虽然不知道“最新实证论”，但很了解旧的唯心主义诡辩。而巴札罗夫根本没有提出一点新东西，只是重复唯心主义者的这个诡辩：“如果我在那里 (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上)，我就会看到世界是怎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第 29 页)换句话说，假如我作出一个显然荒谬的并且与自然科学相矛盾的假定(人可以成为人类出现以前的时代的观察者)，那末我就能够在我的哲学中自圆其说了！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巴札罗夫对问题的了解和他的写作手法了。巴札罗夫甚至没有提到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维利所竭力对付的“困难”，并且把一切都搅成一团，给读者带来如此难于置信的混乱，仿佛唯物主义和唯我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他把唯心主义描写成“实在论”，硬说唯物主义否定物存在于它们对感觉器

^① 《费尔巴哈全集》，波林和约德尔合编 (L. Feuerbach. Sämtliche Werke, herausg. von Bolin und Jodl) 1903 年斯图加特版第 7 卷第 510 页或卡尔·格律恩《路·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的发展》(Karl Grün, «L.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 1874 年莱比锡版第 1 卷第 423—435 页。

官的作用之外！是的，是的，或者是费尔巴哈不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或者是巴札罗夫之流用完全新的手法改造了哲学上的起码真理。

你们还可以看一看瓦连廷诺夫，这个哲学家当然会对巴札罗夫赞赏之至，他认为：（一）“贝克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关连理论的创始人。”（第148页）但这完全不是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绝对不是！这是“深思熟虑的分析”！（二）“阿芬那留斯不用他的普通的唯心主义说明〈仅仅是说明！〉形式〈！〉，而用最彻底的实在论的方式表述了理论的基本前提。”（第148页）显然，骗人的把戏只能使小孩子上当！（三）“阿芬那留斯对认识的出发点的见解是这样：每一个体都发现自己处在一定的环境中，换句话说，个体和环境是同一个同格中的相互联系的和不可分割的〈！〉两项。”（第148页）妙极了！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巴札罗夫和瓦连廷诺夫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这是客体和主体的“不可分割性”，是彻底“实在论的”“不可分割性”。（四）“相反的论断——没有中心项（个体）与之相符合的那种对立项是不存在的——正确吗？当然〈！〉是不正确的……在古代生长着葱绿的树木……可是还没有人。”（第148页）这就是说，不可分割性是可以分割的了！难道这不是“当然”的吗？（五）“可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关于自在客体的问题毕竟是荒谬的。”（第148页）当然罗！在具有感觉的有机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物仍然是那些和感觉等同的“要素的复合”呵！（六）“以舒贝特-索尔登和舒佩为代表的内在论学派，使这些〈！〉思想具有不适用的形式，因而陷入唯我论的绝境。”（第149页）在“这些思想”中没有唯我论，而经验批判主义决不是重弹内在论者的反动理论的老调！内在论者说自己同情阿芬那留斯，那是撒谎！

马赫主义者先生们！这不是哲学，而是毫无联系的文字的

堆砌。

五 人是否用头脑思想?

巴札罗夫十分果断地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如果给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意识是物质的内部(?)〈巴札罗夫加的〉状态’这一论点加上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形式，例如，‘一切心理过程都是头脑过程的机能’，那末不论是马赫或阿芬那留斯都不会反驳他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第29页）

老鼠以为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³⁷ 俄国马赫主义者以为没有比普列汉诺夫更强的唯物主义者。难道真的只有普列汉诺夫或者首先是普列汉诺夫提出了意识是物质的内部状态这个唯物主义的论点吗？如果巴札罗夫不喜欢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的說法，那末他为什么要同普列汉诺夫计较而不同恩格斯或费尔巴哈计较呢？

因为马赫主义者害怕承认真理。他们反对唯物主义，可是却装出一副好象只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样子，真是一种胆怯的无原则的手法。

我们且谈经验批判主义吧！巴札罗夫认为阿芬那留斯“不会反驳”思想是头脑的机能这一论点，他简直是撒谎。阿芬那留斯不仅反驳唯物主义的论点，而且创造了整套的“理论”来推翻这个论点。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里说：“我们的头脑不是思维的住所、座位、创造者，也不是思维的工具或器官，承担者或基质等等。”（第76页；马赫在《感觉的分析》第三十二页中同情地引证了这句话）“思维不是头脑的居住者或主人，不是头脑的一半或一面等等，思维也不是头脑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头脑的生理机能或一般状态。”（同上）阿芬那留斯在他的《考察》里同样断然地说：“表象”“不

是头脑的(生理的、心理的、心理物理的)机能”(前引论文第 115 节第 419 页)。感觉不是“头脑的心理机能”(第 116 节)。

可见,阿芬那留斯认为头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思想不是头脑的机能。如果我们读一读恩格斯的著作,就立刻会看到与此完全相反的明确的唯物主义论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道:“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德文第 5 版第 22 页)³⁸ 这个思想在这部著作里重复了许多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可以看到下述的费尔巴哈和恩格斯的观点:“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stofflich)、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Erzeugnis)。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德文第 4 版第 18 页)。或者在第四页上也可以读到:自然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³⁹,等等,等等。

阿芬那留斯反驳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头脑的思维”叫作“自然科学的拜物教”(《人的世界概念》德文第 2 版第 70 页)。因此,阿芬那留斯对于自己在这点上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分歧,是没有丝毫错觉的。象马赫和一切内在论者一样,他也承认自然科学是坚持自发的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他承认并且直言不讳地说:他和“流行的心理学”是有根本分歧的(《考察》第 150 页及其他各页)。这种流行的心理学作了不能容忍的“嵌入”(这是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挖空思想出来的新名词),即把思想放进头脑,或把感觉放到我们里面。阿芬那留斯在同书中说道,这“两个词”(in uns=到我们里面)就包含着经验批判主义所反驳的前提(Annahme)。“把看得见的东西等等放到(Hineinverlegung)人里面,我们就称之为嵌入。”(第 45 节第 153 页)

嵌入说“在原则上”违背了“自然的世界概念”(natürlicher Weltbegriff),因为它说“在我里面”而不是说“在我面前”(vor mir, 第154页),它“把(实在的)环境的组成部分变成了(观念的)思维的组成部分”(同上)。“嵌入说把自由地明显地表现在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im Vorgefundenen)中的非机械的东西(代替心理的东西的一个新字眼)变成某种在中枢神经系统里神秘地潜藏着的东西(阿芬那留斯又用了一个新字眼: Latitierenden)。”(同上)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内在论者曾经在替“素朴实在论”进行臭名昭彰的辩护时耍过的把戏。阿芬那留斯以屠格涅夫作品里的骗子⁴⁰的贼喊捉贼的忠告为行动准则。阿芬那留斯竭力装出一副好象是反对唯心主义的样子,说人们通常从嵌入说得哲学唯心主义,把外部世界变成感觉、表象等等,而我却保护“素朴实在论”,认为见到的一切,不论“自我”或环境,都具有同样的实在性,我不把外部世界放到人脑里去。

这里的诡辩和我们在臭名昭彰的同格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完全一样。阿芬那留斯用攻击唯心主义的手法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但实际上是用一些稍微不同的词句来保护同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不是头脑的机能,头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感觉不是神经系统的机能,感觉是“要素”,这些要素在一种联系上只是心理的东西,而在另一种联系上(虽然是“等同的”要素,但是)又是物理的东西。阿芬那留斯用了一些新的混乱术语、新的古怪字眼来表达所谓新的“理论”,其实他只是在一个地方打转,而后回到他的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上。

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例如,波格丹诺夫)没有看出这种“把戏”,并且还把对唯心主义的“新的”辩护看成对唯心主义的驳斥,

但是在哲学专家们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分析中，我们却看到他们对阿芬那留斯的思想本质的清醒的评价，而这种本质是在清除那些古怪术语之后才被揭露出来的。

波格丹诺夫在1903年《〈权威的思维〉一文，见《社会心理学》文集第119页及以下各页）写道：

“阿芬那留斯给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发展描绘了一幅最和谐最完整的哲学图景。他的‘嵌入说’的本质如下：〈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只是物理的物体，我们只能凭假说推断别人的体验，即别人的心理。〉……由于别人的体验是在他的肉体之内，是被置入（嵌入）他的机体之内，这种假说就复杂化了。这已经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产生无数矛盾的假说。阿芬那留斯系统地指出了这些矛盾，详细叙述了二元论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发展中的一连串历史环节，可是在这里我们无须追随阿芬那留斯…… 嵌入说是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一个说明。”

波格丹诺夫上了教授哲学的圈套，相信“嵌入说”是反对唯心主义的。他轻信阿芬那留斯自己评价嵌入说的话，而没有看出那个反对唯物主义的毒刺。嵌入说否认思想是头脑的机能，否认感觉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也就是说，嵌入说为了破坏唯物主义而否认生理学的最起码的真理。“二元论”原来是被唯心地驳倒的（不管阿芬那留斯如何装腔作势地对唯心主义表示愤怒），因为感觉和思想不是第二性的，不是物质所派生的，而是第一性的。二元论在这里所以说是被阿芬那留斯驳倒了，只是因为他“驳倒了”主体以外的客体的存在、思想以外的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感觉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这就是说，二元论是被唯心地驳倒的。阿芬那留斯所以要荒谬地否认树木的视觉映象是我们的视网膜、神经和头脑的机能，是为了巩固他的关于“完全的”经验（它

既包含我们的“自我”也包含树木即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

嵌入说是一堆糊涂思想,它偷运唯心主义的胡说,并且与自然科学相矛盾。自然科学坚决地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所引起的。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排除(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心主义的排除(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肉体的机能,因而精神是第一性的,“环境”和“自我”只是处在同一一些“要素复合”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排除“精神肉体二元论”的方法之外,如果不算折衷主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糊涂的混合,就不可能有第三种方法。而波格丹诺夫之流却把阿芬那留斯的这种混合看成“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真理”。

但是,哲学专家们并不象俄国马赫主义者那样天真和轻信。不错,每一位正教授先生都维护“自己的”驳斥唯物主义的或至少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调和起来”的体系,可是在对付竞争者的时候,他们就毫不客气地把各种“最新的”和“独创的”体系中毫无联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断揭露出来。如果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会上阿芬那留斯的圈套,那末老麻雀冯特决不是用一把糍就可以捉住的。唯心主义者冯特在赞扬阿芬那留斯的嵌入说的反唯物主义倾向后,就毫不客气地撕破了装腔作势的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

冯特写道:“如果经验批判主义责难庸俗唯物主义,说它用头脑‘有’思想或‘产生’思维等说法来表明那根本不能用事实的观察

和记述来确证的关系〈在冯特看来，人不用头脑思想应该是“事实”！〉……那末这种责难当然是有根据的。”（前引论文第47—48页）

当然罗，唯心主义者总是同不彻底的阿芬那留斯和马赫一起反对唯物主义的！冯特补充说道，遗憾的只是这种嵌入说“与独立的生命系列的学说没有任何关系，显然只是在事后十分勉强地从外面加到这个学说中的”（第365页）。

艾瓦德说道，嵌入说“无非是经验批判主义需要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的一种虚构（前引书第44页）。“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矛盾：一方面，排除嵌入，恢复自然的世界概念，就会使世界重新有活生生的实在这种性质；另一方面，经验批判主义却通过原则同格走向主张对立项和中心项绝对相互关连的那种纯粹唯心主义的理论。这样，阿芬那留斯就在一个圈子里打转。他向唯心主义进军，但在同唯心主义公开交战的前夜，却在它面前放下了武器。他想使客体世界摆脱主体的束缚，可是又重新使它受主体的束缚。他所真正批判地摧毁的，是漫画式的唯心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真正认识论的表现。”（前引书第64—65页）

斯密斯说道：“我们经常引证阿芬那留斯的一句名言：头脑不是思想的座位、器官或承担者。这句话就是对我们用来规定两者之间关系的唯一术语的否定。”（前引论文第30页）

至于说冯特所称赞的嵌入说引起了露骨的唯灵论者华德的同情^①，那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华德一贯攻击“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特别是攻击赫胥黎，（这不是由于赫胥黎象恩格斯所责难的那样，是一个不够明确和坚决的唯物主义者，而是）由于他的不可知

^① 詹姆斯·华德《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James Ward. 《Naturalism and Agnosticism》）1906年伦敦第3版第2卷第171、172页。

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主义。

应当指出：英国的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轻视一切哲学花招，不承认嵌入、同格和“世界要素的发现”，因而他得到了没有这些“掩护”的马赫主义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即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无论什么样的“要素”毕尔生都不知道。“感性知觉”(sense-impressions)是他的唯一用语。他丝毫不怀疑人是用头脑思想的。因此在这个论点(唯一适合于科学的论点)和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之间的矛盾，是十分明显和醒目的。毕尔生在反对不依赖于我们感性知觉而存在的物质的概念时，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的《科学入门》第7章)。毕尔生重复着贝克莱的一切论据，宣称物质是无。但是当毕尔生谈到头脑和思想的关系时，则毅然决然地说：“我们不能从那种和物质机构联系着的意志和意识中推论出任何跟那种不和物质机构联系着的意志和意识相类似的东西。”^①毕尔生甚至提出下述论点作为他的这一部分研究的总结：“意识超出了跟我们的神经系统相类似的神经系统，就没有任何意义。断言一切物质都具有意识，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断言意识或意志存在于物质之外，那就更不合逻辑了。”(同上，第75页第2论题)毕尔生的混乱是惊人的！物质不过是感性知觉群，这是他的前提，这是他的哲学。这就是说，感觉和思想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但又不是这样，没有物质的意识是不存在的，甚至说没有神经系统的意识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意识和感觉是第二性的。真象是说水在地上，地在鲸上，鲸在水上。马赫的“要素”、阿芬那留斯的同格和嵌入，丝毫没有消除这种混乱，只是模糊问题，用学究气十

^① 《科学入门》1900年伦敦第2版第58页。

足的哲学胡话来掩盖形迹。

阿芬那留斯的特殊术语就是这样的胡话（关于这些胡话只要讲一两句就够了），他造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名词，如«notal», «sekural», «fidential»等等。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都羞羞答答地回避这种教授的胡言乱语，只是偶而向读者抛出«existential»这一类的名词（以便迷惑他们）。天真的人把这些字眼当作特种的生物力学，而那些自己也喜欢用一些“古怪的”字眼的德国哲学家却嘲笑阿芬那留斯。冯特在题为《经验批判主义体系的经院哲学性质》这一节中说道，我们说«notal»（notus=已知的）或者说某某东西我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一样的。的确，这是最纯粹的晦涩的经院哲学。阿芬那留斯的一位最忠实的弟子维利，有勇气公开承认这点。他说：“阿芬那留斯幻想着生物力学，但是要了解头脑的生活，只能靠事实的发现，而决不能用阿芬那留斯所尝试的那种方法。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力学决不是以任何新的观察为依据的，它的特征是纯粹公式化的概念结构，而且这些结构连展示某种远景的假说的性质也没有，它们不过是一些思辨的死板公式（bloße Spekulierschablonen），它们象一堵墙壁那样阻挡着我们的视线。”①

俄国马赫主义者很快就会象那些赶时髦的人一样，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家戴破了的帽子都赞扬备至。

① 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第169页。当然，老学究彼得楚尔特没有这样承认。他怀着庸人的洋洋自得的心情，一再重复阿芬那留斯的“生物”经院哲学（第1卷第2章）。

六 关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唯我论

我们已经看到，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世界是我们的感觉，这就是它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虽然被“要素”这个字眼以及“独立系列”、“同格”、“嵌入”的理论掩盖着，但并不因此有丝毫改变。这种哲学的荒谬就在于：它导致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高谈哲理的个人才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硬要读者相信：“谴责”马赫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甚至是唯我论”，这是“极端的主观主义”。波格丹诺夫在《感觉的分析》的序言第十一页中就是这样说的，而且马赫派的全班人马也用许多不同的调子重复这一点。

我们在分析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如何掩盖唯我论之后，现在应当补充一点：“极端的主观主义”论断完全是在波格丹诺夫这伙人方面，因为不同派别的著作家早已在哲学文献中揭发了打着各种掩护的马赫主义的主要过失。现在我们只是把足以表明我们马赫主义者的“主观主义”的无知的那些意见简单地综合一下。同时应当注意，几乎所有的哲学专家都同情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决不象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那样，是一个谴责的字眼；他们确定马赫的真正的哲学方向，用一种同样是唯心主义的然而在他们看来是更彻底的体系去反对另一个唯心主义体系。

艾瓦德在一本专门分析阿芬那留斯学说的书中说道：“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注定要陷入唯我论（前引书第61—62页）。

马赫的弟子克莱因佩特（马赫在《认识和谬误》的序言中特别

声明自己和他是一致的)说:“马赫正是说明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要求可以相容的例子(在折衷主义者看来,一切都是“可以相容的”!),正是说明自然科学能够很好地从唯我论出发而不停留在唯我论上的例子。”^①

路加在分析马赫的《感觉的分析》时说道:如果把误解(Mißverständnisse)撇开不谈,那末“马赫是站在纯粹唯心主义的基地上的”。“马赫否认他是贝克莱主义者,这是不可理解的。”^②

耶鲁萨伦姆是一个最反动的康德主义者,马赫在同一序言中也曾表示自己和他是一致的(思想上的“血缘关系”比马赫以前所想的“更密切些”^③),他说,“彻底的现象论会导致唯我论”——因此必须借用一点康德的东西!^④

赫尼格斯瓦尔德说:“……内在论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只能从二者之中选择一个:不是唯我论,就是费希特、谢林或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⑤

英国物理学家洛治在一本专门驳斥唯物主义者海克尔的书中,象谈到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似的,顺便谈到“毕尔生和马赫之流的唯我论者”^⑥。

英国自然科学家的刊物《自然界》杂志⁴³(《Nature》),通过几何学家狄克逊的口,说出了对马赫主义者毕尔生的十分明确的意思

① 《系统哲学文库》杂志⁴¹第6卷(1900)第87页。

② 《康德研究》杂志⁴²第8卷(1903)第416、417页。

③ 《认识和谬误》1906年版序言第10页。

④ 见《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纯粹的逻辑》(《Der kritische Idealismus und die reine Logik》)1905年版第26页。

⑤ 《休谟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学说》1904年版第68页。

⑥ 奥利弗·洛治《生命和物质》(Sir Oliver Lodge. 《La vie et la matière》)1907年巴黎版第15页。

见。这个意见之所以值得我们引用，不是因为它新颖，而是因为俄国马赫主义者天真地把马赫的一团糟的哲学当作是“自然科学的哲学”(波格丹诺夫给《感觉的分析》写的序言第12页及以下各页)。

狄克逊写道：“毕尔生的全部著作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论点：除了感性知觉(sense-impressions)以外，我们不能直接知道其他任何东西，因此我们通常当作客观对象或外部对象来谈论的物，只不过是感性知觉群。但是毕尔生教授还承认别人的意识的存在，他不仅由于自己写书给别人看而默默地承认这点，并且在他的书的许多地方也公开地承认这点。”关于别人意识的存在，毕尔生是在观察别人身体的运动时类推出来的。既然别人的意识是实在的，那末就承认在我之外也有别人存在了！“当然，我们还不可能就这样来驳倒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这个唯心主义者会断言：不仅外部对象而且别人的意识都是不实在的，它们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但是，承认别人意识的实在性，就是承认我们借以推断别人意识的那些手段的实在性，即……人体外貌的实在性。”摆脱困难的出路，就是承认我们之外的客观实在和我们的感性知觉相符合这一“假说”。这个假说令人满意地说明了我们的感性知觉。“我不能认真地怀疑毕尔生教授自己也象别人一样相信这个假说。但是，如果他明确地承认这一点，那末他就不得不把他的《科学入门》几乎每一页都要重新写过。”^①

嘲弄就是动脑筋的自然科学家对待那种使马赫狂喜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态度。

最后是德国物理学家波尔茨曼的意见。马赫主义者也许会象

① 《自然界》杂志 1892 年 7 月 21 日出版第 269 页。

阿德勒那样说：他是一个旧派的物理学家。但是现在要谈的完全不是物理学的理论，而是基本的哲学问题。波尔茨曼反对那些“迷醉于新的认识论教条”的人们，他写道：“怀疑我们所只能从直接的感性知觉中得出的表象，就会走到与从前的素朴信念完全相反的极端。有人说，我们感知的只是感性知觉，我们没有权利再前进一步。但是，如果这些人是彻底的，那末就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感知自己昨天的感性知觉吗？我们直接感知的，只是一种感性知觉或一种思想，即我们在这一瞬间所想的思想。可见，如果这些人是彻底的，那末他们不仅要否定我的自我之外的别人的存在，而且还要否定过去的一切表象的存在。”^①

这位物理学家鄙视马赫之流的所谓“新的”“现象学的”观点，把它看作是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陈腐的谬论，这完全是应当的。

然而，患“主观”盲目症的却是那些“没有看出”唯我论就是马赫的基本错误的人。

^① 路德维希·波尔茨曼《通俗论文集》(Ludwig Boltzmann. «Populäre Schriften») 1905年莱比锡版第132页，参看第168、177、187页以及其他各页。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二)

一 “自在之物”或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驳斥

关于“自在之物”，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写了好多东西，如果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真是堆积如山。“自在之物”对于波格丹诺夫和瓦连廷诺夫，巴札罗夫和切尔诺夫，别尔曼和尤什凯维奇来说，真是**个 bête noire**^①。他们对“自在之物”用尽了“恶言秽语”，使尽了冷嘲热讽。为了这个倒霉的“自在之物”，他们究竟同谁战斗呢？在这里，俄国的马赫主义哲学家就按政党分化了。一切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谴责他糊涂和陷入康德主义，谴责他背弃恩格斯(关于前一个谴责，我们把它放到第四章里去讲；关于后一个谴责，我们就在这里谈一谈)。民粹派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为了“自在之物”直接攻击恩格斯。

这一次，由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公开地仇视马克思主义，因而他同在党派上是我们的同志而在哲学上是我们的反对派的那些人比较起来，是较有原则的笔头上的敌人⁴⁴，这一点令人耻于承认，可是隐瞒它却是罪过。因为只有不干净的心地(或者再加上对

① 直译是：恶兽、怪物、憎恶的对象。——编者注

唯物主义的无知?)才会使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圆滑地撇开恩格斯,根本不理费尔巴哈,专门纠缠着普列汉诺夫。这正是纠缠,正是无聊而又琐碎的吵闹,对恩格斯的学生吹毛求疵,而对老师的见解却胆怯地避免作直接分析。鉴于我们这个简略评述的任务是要指出马赫主义的反动性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谈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的吵闹,而直接谈论经验批判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所驳斥的恩格斯。在切尔诺夫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论文集里的文章除少数几篇之外,都是在1900年以前写的)里,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先验哲学》的文章,它一开始就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谴责恩格斯的学说是“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第29、32页)。切尔诺夫先生说,恩格斯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谟的哲学路线的议论就是“充分的”例证。我们就从这个议论谈起吧。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维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却相反。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各派”哲学家所分成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差别提到首要地位,并且直截了当地谴责在别种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的那些人的“混乱”。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接着他又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

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①

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包括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例如，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某种永恒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而且人类精神在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世界认识“绝对观念”。

“但是，另外〈即除了唯物主义者 and 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之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超过很重要的作用的……”②

切尔诺夫先生在引用恩格斯的这些话时，就拚命加以攻击。他给“康德”这个名词作了以下的注释：

“在 1888 年，把康德、特别是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叫作‘近代’哲学家，是相当奇怪的。在那个时候，听到柯亨、朗格、黎尔、拉斯、李普曼、格林等人的名字更自然一些。看来，恩格斯在‘近代’哲学方面不怎么行。”（第 33 页，注释 2）

切尔诺夫先生是始终如一的。不论在经济问题上和哲学问题上，他跟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伏罗希洛夫⁴⁵一样，简单地抬出一些“学者的”名字，一会儿用来消灭无知的考茨基^②，一会儿用来消灭

① 弗·恩格斯《路·费尔巴哈》第 4 版第 15 页。1905 年日内瓦俄译本第 12—13 页。维·切尔诺夫先生把 Spiegelbild 译作“镜中的反映”，责怪普列汉诺夫“十分无力地”表达恩格斯的理论，因为在他的俄译本里只是译“反映”，而不是译“镜中的反映”。这是吹毛求疵。Spiegelbild 这个词在德文里也只是当作 Abbild（反映、模写、映象）来使用的。

② 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 年圣彼得堡版第 1 部第 195 页（见《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128—129 页。——编者注）。

无知的恩格斯！但遗憾的是，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这些权威，就是恩格斯在《路·费尔巴哈》的同一页上讲到的那些新康德主义者，恩格斯把他们看作是企图使早已被驳倒的康德和休谟学说的僵尸重新复活的理论上的反动分子。好样儿的切尔诺夫先生不懂得，恩格斯在自己的议论中所要驳斥的正是这些在马赫主义眼里是权威的糊涂教授们！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已经提出了反对休谟和康德的“决定性的”论据，费尔巴哈在这些论据上补充了一些与其说深刻不如说机智的见解，接着他继续说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Schrullen）驳斥得最彻底的就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现象，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unfaßbaren——这个重要的词在普列汉诺夫的译文里和切尔诺夫先生的译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现在不是从地里种的茜草根中，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前引书第16页）⁴⁶

切尔诺夫先生引了这段议论，于是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要彻底消灭可怜的恩格斯。你们听听他怎样说吧！“可以‘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茜素，这当然是任何新康德主义者都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在提炼茜素的同时可以用同样便宜的方法从同样的煤焦油中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真是了不起的空前的发现，当然，这样看的不仅是新康德主

义者”。

“显然，恩格斯知道了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于是他就把这个定理颠倒过来，断言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都是自在之物……”(第33页)

马赫主义者先生，请你听着，扯谎也要有一个限度呀！你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歪曲恩格斯的这段话，甚至你不懂得这儿说的是什么，就想去“捣毁”它！

第一，说恩格斯“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是不对的。恩格斯曾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过：他驳斥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把恩格斯关于物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弄得糊里糊涂。第二，如果康德的定理说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那末“逆”定理应当说不可认识的东西是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用未被认识的代替了不可认识的，他不理解由于这样一代替，他又混乱和歪曲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

切尔诺夫先生被他自己所奉为指导者的那些御用哲学的反动分子弄得糊里糊涂，他根本不了解自己所引用的例子便大叫大嚷地反对恩格斯。我们且向这位马赫主义的代表说明一下，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他既反对休谟，又反对康德。但是休谟根本不谈什么“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那末这两个哲学家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但是，休谟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在之物”，他认为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在哲学上就是不可容许的，是“形而上学”（象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而康德则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不过宣称它是

“不可认识的”，它和现象有原则区别，它属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即属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发现的“彼岸”（Jenseits）领域。

恩格斯的反驳的实质是什么呢？昨天我们不知道煤焦油里有茜素，今天我们知道了。试问，昨天煤焦油里有没有茜素呢？

当然有。对这点表示任何怀疑，就是嘲弄现代自然科学。

如果是这样，那末由此就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

（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我们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没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障壁把我们同关于某些部分尚未被认识的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

（三）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識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識。

只要你们抱着人的认识是由不知发展起来的这一观点，你们就会看到：千百万个类似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那样简单的例子，千百万次从科学史和技术史中以及从我们大家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来的观察，都在向人表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都在表

明,当我们的感官受到来自外部的某些对象的刺激时,“现象”就产生,当某种障碍物使得我们明明知道是存在着的对象不可能对我们的感官发生作用时,“现象”就消失。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与此相反的马赫的理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是可鄙的唯心主义胡说。而切尔诺夫先生在其对恩格斯的“分析”中再一次暴露出他的伏罗希洛夫式的品质:恩格斯举的简单例子在他看来竟是“奇怪而又幼稚的”!他认为只有学究的臆说才是哲学,他不能区别教授的折衷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至于切尔诺夫先生的其他议论,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分析它们,因为它们都是同样狂妄的胡说(譬如他说:原子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自在之物!!)。我们只须指出一个和我们的题目有关系的(并且看来迷惑了某些人的)议论,即关于马克思似乎跟恩格斯不同的议论。这里讲的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以及普列汉诺夫对此岸性(Diesseitigkeit)这个词的译法。

下面就是提纲第二条: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完全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⁴⁷

普列汉诺夫的译文不是“证明思维的此岸性”(直译),而是证明思维“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于是切尔诺夫先生就大叫大嚷地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矛盾被异常简单地排除了”,“结果马克思似乎和恩格斯一样,也主张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彼岸性

了”(前引书第34页,注释)。

请同这位每说一句话就增加好多糊涂思想的伏罗希洛夫打一次交道吧! 切尔诺夫先生, 如果你不知道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 这就是无知。切尔诺夫先生, 如果你跳过这一条的第一句话, 不想一想思维的“对象的真理性”(gegenständliche Wahrheit) 无非是指思维所真实反映的对象(=“自在之物”)的存在, 这就是无知或极端的马虎。切尔诺夫先生, 如果您认为从普列汉诺夫的转述(普列汉诺夫只是转述而不是翻译)当中“可以得出结论说”, 马克思拥护思维的彼岸性, 这也是无知。因为只有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才使人的思维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一切唯物主义者, 其中包括贝克莱主教所攻击的十七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见《代绪论》), 都认为“现象”是“为我之物”或者是“自在客体”的复写。当然, 那些想知道马克思的原文的人是不一定需要普列汉诺夫的自由转述的, 但是必须细心推敲马克思的言论, 而不应该伏罗希洛夫式地卖弄聪明。

有意思的是我们碰到这样一种情况: 一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不愿意或不能够细心推敲马克思的《提纲》, 而一些资产阶级著作家、哲学专家, 有时候却抱着十分认真的态度。我知道这样一个著作家, 他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且为此还探讨了马克思的《提纲》。这个著作家就是莱维, 他在自己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著作的第二部第三章里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①。我们不谈莱维是否在每一个地方都正确地解释费尔巴哈以及他如何用通

① 阿尔伯·莱维《费尔巴哈的哲学及其对德国文献的影响》(Albert Lévy. «La philosophie de Feuerbach et son influence sur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1904年巴黎版第249—338页(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 第290—298页(对《提纲》的分析)。

常的资产阶级观点去批判马克思，我们只举出他对马克思的著名《提纲》的哲学内容的评价。关于提纲的第一条，莱维说道：“一方面，马克思和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一起承认，同我们关于物的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单独的（独立的，distincts）客体……”

读者可以看到，莱维一下子就清楚了：承认我们表象与之“相符合的”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是任何唯物主义、“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这种关于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知识，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不知道。莱维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唯物主义曾经让唯心主义去评价能动力（即人的实践）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力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也把它导入唯物主义的体系中，但是，当然必须把唯心主义所不能承认的那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特质给予这些能动力。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正象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一样，同我们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活动、物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不仅是通过理论认识而且还通过实践活动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样，人类的全部活动就获得了一种使它可以同理论并驾齐驱的价值和尊严。革命的活动从此就获得形而上学的意义……”

莱维是一个教授。而一个规矩的教授不会不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在唯心主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教授们看来，一切唯物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因为它在现象（为我之物）之外还看到我们之外的实在；因此，当莱维说马克思认为“物的活动”和人类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即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

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的时候,他的话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实践标准在马赫和马克思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在适当地方(本章第6节)将详细地加以说明。“人类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就是说:人的认识反映绝对真理(见本章第5节),人类的实践检验我们的表象,确证其中与绝对真理相符合的东西。莱维继续说道:

“……马克思谈到这点时,自然会遭到批判者的反驳。他承认自在之物是存在的,而我们的理论在对自在之物的关系上,是人对于自在之物的翻译。他就不能避开通常的反驳:什么东西向你保证这种翻译是正确的呢?什么东西证明人的思想给你提供客观真理呢?对于这种反驳,马克思在提纲第二条中作了答复。”(第291页)

读者可以看到,莱维一分钟也没有怀疑马克思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

二 论“超越”,或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学说的“修改”

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圆滑地避开了恩格斯的最坚决最明确的声明中的一个声明,而对于恩格斯的另外一个声明则完全按照切尔诺夫的方式加以“修改”。尽管纠正他们对引文原意的歪曲是一个多么无聊而困难的任务,但是任何一个想谈论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人,都不能避开这个任务。

下面就是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修改。

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①一文中关于英国的不可知论者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译本序言,恩格斯自己把它译成德文,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1892—1893)第1分卷第1期第15页及以

(休谟路线的哲学家)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同意,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Mitteilungen)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要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指出: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也是从感觉出发的,它不承认知识的任何其他的泉源。我们要告诉“最新实证论”的信徒们,不可知论者是纯粹的“实证论者”!

“……可是,他〈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它们所感知的物的正确摹写(Abbilder)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物或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物或物的特性本身,而只是这些物或物的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⁴⁸

在这里,恩格斯把哪两条哲学路线对立起来了呢?一条路线是: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摹写,我们知道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这就是不可知论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而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出超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即自在之物,如果用贝克莱所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者们的话来说,就是“自在客体”),我们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十分肯定的声明。这就是说,在恩格斯所谈到的那个争论中,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而不可知论者连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都不容许,宣称我们根本不能确实知道自在之物。

试问:恩格斯所讲的不可知论者的观点和马赫的观点的区别

下几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篇序言的俄译文只有一种,载于《历史唯物主义》文集第一六二页及以下几页。巴札罗夫在《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一书第六十四页上引过这篇序言里的话。

是什么呢？是“要素”这个“新”名词吗？但是，以为一个名称就能改变哲学路线，以为叫作“要素”的感觉就不再成为感觉，这完全是小孩子的想法！或者是那个关于同一些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东西而在另一种联系上却构成心理东西的“新”思想吗？但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恩格斯所说的不可知论者也用“印象”来代替“这些物本身”吗？这就是说，不可知论者实质上也把“印象”分成物理的和心理的！这仍然只是名称上的区别。当马赫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他是贝克莱主义者。当马赫“修正”说，“要素”（感觉）在一种联系上可以是物理要素，在另一种联系上又可以是心理要素的时候，他是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马赫在自己的哲学上出不了这两条路线，只有极端天真的人才会轻信这个糊涂虫的话，以为他真的“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叙述中故意不举出名字，因为他批判的不是休谟主义的个别代表（职业哲学家们很喜欢把他们之中某一个人在术语上或论据上的些微改变叫作独创的体系），而是休谟主义的整个路线。恩格斯批判的不是细节，而是本质；他抓住了一切休谟主义者同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因此穆勒、赫胥黎和马赫都受到他的批判。不管我们说物质是感觉的恒久的可能性（依照穆勒），或者说物质是“要素”（感觉）的比较稳定的复合（依照马赫），我们总是停留在不可知论或休谟主义的范围之内。这两种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两种说法，都包括在恩格斯所叙述的不可知论的观点中。恩格斯说：不可知论者不超出感觉，宣称自己根本不能确切知道感觉的泉源或原本等等。如果马赫认为他和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正是因为马赫符合于恩格斯给正教授们所下的评语：捉跳蚤者（Flohknacker）。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抛弃基本的不彻底的观点，而只是修改一下，把术语换一下，那末

你们不过是捏死了一个跳蚤而已！

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他在这篇论文里一开始就公开而坚决地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对立起来）是怎样驳斥上述论据的呢？

他说：“……不用说，这种论点显然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人们在开始论证之前，就已经行动了。‘起初是行动。’在人类自作聪明地想出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要证明布丁，或者说要检验、检查布丁，就要吃一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某一物的特性来利用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准确无误地检验我们的感性知觉的真理或谬误了。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对利用该物的可能性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且利用该物的一切尝试也必然会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表象，发现它产生我们所预期的使用效果，那末我们就有了肯定的证据，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

可见，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在这里是叙述得异常清楚的。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别它们的真伪。我们再听恩格斯往下讲吧（巴札罗夫在这里不再引用恩格斯或普列汉诺夫的话了，因为大概他认为同恩格斯本人计较是多余的）。

“……相反地，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犯了错误，那末我们多半很快地就能找到错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检验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或者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俄译文把这处译错了）。只要我

们好好地发展和利用我们的感官，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取得和利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总会发现，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 (gegenständlich) 本性^①相符合的 (Übereinstimmung)。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还没有一种情况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⁴⁹

关于新康德主义者的论据，我们下次再分析。现在我们要指出，凡是稍微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或者甚至只要是细心的人，都不会不了解恩格斯在这里所叙述的正是一切马赫主义者随时随地加以攻击的唯物主义。现在请看一看巴札罗夫修改恩格斯的学说的手法吧！

关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段话，巴札罗夫写道：“在这里，恩格斯确实是反对康德的唯心主义……”

不对。巴札罗夫糊涂了。在他引用过而我们引用得更完整的那段话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康德主义和唯心主义。如果巴札罗夫真的读了恩格斯的全篇文章，那末他就不会不看到恩格斯只是在下一段我们没有引用的话里，才谈到新康德主义和康德的整个路线。如果巴札罗夫仔细地读一读和想一想他引用的那段话，那末他就不会看不到，在恩格斯所反驳的不可知论者的论据中丝毫没有唯心主义或康德主义的东西，因为，只有在哲学家说物是我们感觉的时候才开始有唯心主义，而康德主义则是在哲学家说自在

^① 对象本性即客观本性。——编者注

之物存在着然而不是不可认识的时候才开始的。巴札罗夫把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混淆起来了，而他所以这样混淆，就是因为他自己是马赫派的半贝克莱主义者、半休谟主义者，他不懂得（下面将详细指出）休谟主义者反对康德主义与唯物主义者反对康德主义之间的差别。

巴札罗夫继续说道：“……但是，真可惜！恩格斯的论据，象反对康德哲学那样，也同样地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如波格丹诺夫已经指出的，普列汉诺夫—奥尔托多克斯⁵⁰的学派，对于意识有一种严重的误解。普列汉诺夫也象一切唯心主义者一样，他认为：一切感知的东西，即一切意识到的东西，都是‘主观的’；只从实际感知的东西出发，那就是唯我论者；实在的存在只有在一切直接感知的东西的界限之外才能找到……”

这完全符合切尔诺夫的精神，符合切尔诺夫硬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个真正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精神！既然普列汉诺夫是一个背弃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者，那末自称为恩格斯信徒的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巴札罗夫同志，这不过是可鄙的把戏！你开始用“直接感知的东西”这个马赫主义的字眼来混淆不可知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三者之间的差别了。但要懂得，“直接感知的东西”和“实际感知的东西”这类字眼是马赫主义者、内在论者以及哲学上其他反动分子的糊涂话，是不可知论者（在马赫那里有时又是唯心主义者）用以伪装唯物主义者的假面具。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外部世界，而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对于唯心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感觉，而外部世界被宣称为“感觉的复合”。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实际感知的”也是感觉，但不可知论者既没有进一步唯物地承认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没有进一步唯心地承认世界是我们的感觉。因此，说“实在

的存在(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只有在一切直接感知的东西的界限之外才能找到”，这是蠢话，是你的马赫主义观点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你有权利采取随便什么样的立场，包括马赫主义的立场在内，但是你在谈到恩格斯的时候却没有权利曲解他的话。从恩格斯的话中，最明显不过地可以看出：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在的存在是在人的“感性知觉”、印象和表象的界限之外的；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超出这些知觉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巴札罗夫相信马赫、阿芬那留斯和舒佩，以为“直接”(或实际)感知的东西把感知的自我和被感知的环境结合在臭名昭彰的“不可分割的”同格中了，而且他力图通过读者觉察不出的方式把这个谬论硬加给唯物主义者恩格斯！

“……上面引用的那段恩格斯的话，好象是他为了用极其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唯心主义的误解而特意写出来的……”

巴札罗夫没有白白地向阿芬那留斯领教！他继承了阿芬那留斯的把戏，在反对唯心主义(恩格斯在这里根本没有谈到它)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主义的“同格说”。真不坏，巴札罗夫同志！

“……不可知论者问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观的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表象呢？……”

你糊涂了，巴札罗夫同志！恩格斯自己没有说过“主观的”感觉这样的蠢话，甚至也没有把它加给他的敌人不可知论者。除了人的、即“主观的”感觉之外，没有其他的感觉得，因为我们都是从人的观点而不是从魔鬼的观点来判断问题的。你又把马赫主义硬加给恩格斯了，你想说：不可知论者认为感觉^①，或者说得更确切

① 以上出现“感觉”一词的地方，俄文是 «чувства», 它有“感觉”、“感情”等含义，因此列宁认为用 «ощущения» 这个名词更确切些，它只有“感觉”的含义。——编者注

些, ощущения(感觉)只是主观的(不可知论者并没有这样认为!),而我和阿芬那留斯则使客体和主体处在不可分割的“同格”的联系中。真不坏,巴札罗夫同志!

“……恩格斯反驳说:但是你把什么东西叫作‘正确的’呢?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因此,只要我们的感性知觉被经验所证实,它们就不是‘主观的’,就是说,不是任意的或虚幻的,而是正确的、实在的……”

你糊涂了,巴札罗夫同志!你把物存在于我们的感觉、知觉、表象之外的问题,改成我们关于“这些”物的表象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你用后一个问题来掩盖前一个问题。但是恩格斯公开地明白地说过:他和不可知论者的区分不仅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模写的正确性,而且还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能否说物本身,能否“确实地”知道物的存在。巴札罗夫为什么要偷天换日呢?就是为了蒙蔽和搅混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者恩格斯)所说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物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问题。不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作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感觉给我们提供的模写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上,尽管看法各有不同,却仍然可以作一个唯物主义者。

巴札罗夫又糊涂了,他硬说恩格斯在和不可知论者的争论中有这样一种荒谬的愚蠢的说法:我们的感性知觉被“经验”所证实。恩格斯没有用过而且在这里也不能用“经验”这个名词,因为他知道唯心主义者贝克莱、不可知论者休谟和唯物主义者狄德罗都是引用经验这个词的。

“……在我们通过实践与物发生关系的界限内,关于物及其特性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一致的。‘一致’(«совпадать»)和‘象形文字’的意思稍有不同。它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在

这种界限内，感性表象也就是〈着重号是巴札罗夫加的〉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大功终于告成了！恩格斯被改扮成马赫的样子，油炸之后，又加上马赫主义的作料。高贵的厨师们，当心哽住喉咙呵！

“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恰恰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的谬论、基本的糊涂思想和错误观点，这种哲学的其余一切胡言乱语都是由此产生的，那些狂妄的反动分子和僧侣主义的说教者、内在论者，都是因此而热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不管巴札罗夫在回避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怎样转弯抹角，怎样狡猾，怎样玩弄外交手腕，但他终究还是说滑了嘴，暴露了他的全部马赫主义真相！说“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回到休谟主义，或者甚至是回到隐藏在“同格”的迷雾里的贝克莱主义那里去。巴札罗夫同志，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谎话或不可知论者的狡辩，因为感性表象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而只是这个现实的映象。你想利用 совпадать 这个俄文词的双关意义吗？你想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相信〈совпадать〉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同”而不是“符合”吗？这是通过歪曲引文原意的手法把恩格斯改扮成马赫的样子，仅此而已。

如果读一读德文原本，你就会看到〈stimmen mit〉这个词，它的意思是“符合”、“协调”，“协调”是直译，因为 Stimme 是指声音讲的。〈stimmen mit〉这个词的含义不可能指“相同”这个意义上的 совпадают。就是一个不懂德文而稍微仔细地阅读恩格斯著作的读者，也完全懂得而且也不会不懂得，恩格斯在他的全部论述中总是把“感性表象”解释为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映象 (Abbild)，因此，在俄文里，只能在符合、协调等等意义上使用〈совпадать〉这个词。把“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个思想硬

加给恩格斯，这是马赫主义颠倒是非的拿手好戏，把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硬加给唯物主义的拿手好戏；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巴札罗夫打破了一切纪录！

试问，没有发疯的人在智力正常和记忆力良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断言“感性表象〈无论在什么样的界限内都无关紧要〉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呢？地球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它既不能和我们的感性表象“一致”（“相同”的意思），也不能和我们的感性表象处在不可分割的同格中，也不能是在别种联系上跟感觉等同的那些“要素的复合”，因为在没有人、没有感觉器官、没有比较明显地具备感觉特性的高级形式的物质的时候，地球就已经存在了。

问题在于：我们在第一章里分析过的关于“同格”、“嵌入”、新发现的世界要素的矫揉造作的理论，都是用来掩饰这种主张的全部唯心主义荒谬性的。巴札罗夫无意地不小心地吐露出来的这种说法的妙处，就在于它明确地揭露了这种惊人的荒谬性，否则，我们就必须到大堆学究气十足的、假科学的、教授的废话中去发掘它。

巴札罗夫同志，你应该受到赞扬呵！我们将在你生前给你修一座纪念碑，一边刻上你的名言，另一边刻上：献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葬送了马赫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

关于上面引文中巴札罗夫所提到的两点，即不可知论者（包括马赫主义者在内）和唯物主义者的实践标准，以及反映论（或模写论）和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之间的差别，我们将另行论述。现在我们再引几句巴札罗夫的话：

“……但是什么东西在这些界限之外呢？关于这点恩格斯只

字不提。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示过愿意‘超越’，愿意超出感知的世界的界限，而这却是普列汉诺夫的‘认识论’的基础……”

在“这些”什么样的界限之外呢？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所谓的把自我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格”的界限吗？巴札罗夫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象普通人一样地提出问题，那末他就会清楚地看到：外部世界是在人的感觉、知觉、表象的“界限之外”的。但“超越”这个字眼一再暴露了巴札罗夫的面目。这是康德和休谟所特有的“狡辩”，这是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划一条原则的界限。康德说：从现象，或者从我们的感觉、知觉（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等等过渡到存在于知觉之外的物，这就是超越，而这种超越对信仰来说是容许的，而对知识来说则是不容许的。休谟反驳道：超越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康德主义者也象休谟主义者一样，把唯物主义者叫作超越的实在论者、“形而上学者”，认为他们从一个领域非法地过渡（拉丁文是 *transcensus*）到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你们可以看到，现代追随康德和休谟的反动路线的哲学教授们（就拿伏罗希洛夫式的切尔诺夫所列举的那些人来说吧）喋喋不休地用千百种调子重复着这些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和“超越”的责难。巴札罗夫袭用反动教授们用的字眼和他们的想法，并且以“最新实证论”的名义向他们敬礼！但全部问题在于：“超越”的思想，即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原则的界限的思想，乃是不可知论者（包括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荒唐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用恩格斯所举的茜素的例子说明过了，我们还要用费尔巴哈和约·狄慈根的话来加以说明。但是让我们先讲完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学说的“修改”：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一个地方说：在感性世界之外的

‘存在’是‘悬而未决的问题’(«offene Frage»),即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解决甚至提出的一个问题。”

这个论据是巴札罗夫重复德国马赫主义者阿德勒的,而这后一个例子恐怕比“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例子更糟些。在《反杜林论》德文第五版第三十一页上,恩格斯说: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视野(Gesichtskreis)的范围之外,存在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offene Frage)。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¹³

看看我们的厨师新做的这盘肉酱吧!恩格斯说的是我们视野的范围之外的存在,例如,火星上人的存在等等。很明显,这样的存在的确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巴札罗夫却故意不引证全文,把恩格斯的话转述为:“感性世界之外的存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真是荒谬绝伦,在这里,巴札罗夫把自己所一贯信仰的、被约·狄慈根公正地称为僧侣主义和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的那些哲学教授们的观点硬加给恩格斯。事实上,信仰主义断言“在感性世界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而同自然科学一致的唯物主义者,则坚决否认这点。站在二者中间的是那些教授们、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包括马赫主义者)等等,他们“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发现了真理”,并且“调停”说: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恩格斯在什么时候说过诸如此类的话,那末,谁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奇耻大辱。

说得够了!从巴札罗夫那里引来的这半页话里,就有这么多

的糊涂观念，因此我们只好说到这里，不去进一步追究全部摇摆不定的马赫主义思想了。

三 费尔巴哈和约·狄慈根论自在之物

按照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说法，似乎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自在之物（即我们的感觉、表象等等之外的物）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可知性，似乎他们容许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着某种原则的界限。为了说明这些说法是何等的荒谬，我们再引证几段费尔巴哈的话。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全部不幸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辩证法，又不懂得唯物主义，却用反动教授们的话来谈论辩证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说：“自称为唯心主义的现代的哲学唯灵论，对唯物主义进行了以下的、在它看来是致命的责难：唯物主义是独断主义，也就是说，它从感性（sinnlichen）世界、即无可争辩的（ausgemacht）客观真理出发，认为客观真理是自在（an sich）世界、即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但实际上世界只是精神的产物。”^①

看来，这很清楚吧！自在世界是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这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象贝克莱主教所驳斥的十七世纪的唯物主义一样，承认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自在客体”。费尔巴哈的〈An sich〉（“自在”）和康德的〈An sich〉是根本对立的。请回忆一下上面引用过的费尔巴哈的话，在那里他责难康德把“自在之物”看作“没有实在性的抽象物”。在费尔巴哈看来，“自在之物”是“具有实在性的抽象物”，即存在于我们之外的、

^① 《费尔巴哈全集》1866年版第10卷第185页。

完全可以认识的、跟“现象”没有任何原则差别的世界。

费尔巴哈非常俏皮地、明白地说明,承认从现象世界到自在世界的某种“超越”,承认神父们所划下而为哲学教授们所袭用的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何等荒谬。下面就是他的说明之一:

“当然,幻想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因为幻想的力量,和人的其他一切力量一样,就其基础和起源来说,归根到底(zuletzt)是自然界的力量,但是人毕竟是跟太阳、月亮和星辰,跟石头、动物和植物,一句话,跟人用自然界这个一般名词所标明的那些存在物(Wesen)有区别的存在物。因而,人关于太阳、月亮、星辰和其他一切自然物(Naturwesen)的表象(Bilder),虽然也是自然界的产物,然而却是和自然界中的它们的对象有区别的另一种产物。”^①

我们表象的对象和我们的表象有区别,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有区别,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正象人自己也只是他的表象所反映的自然界的一小部分一样。

“……我的味觉神经,正如盐一样,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盐味本身直接就是盐的客观特性;盐在仅仅作为感觉对象时是(ist)怎样的,它自身(an und für sich)也就是怎样的;舌头对盐的感觉是我们不通过感觉而设想的盐(des ohne Empfindung gedachten Salzes)的特性……”在前几页,他还说:“咸味是盐的客观特性的主观表现。”(第514页)

感觉是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结果,这就是费尔巴哈的理论。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an und für sich)的主观映象。

“……所以,人象太阳、星辰、植物、动物和石头一样,也是自然

^① 《费尔巴哈全集》1903年斯图加特版第7卷第516页。

物(Naturwesen),但他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因而人的头脑和心之中的自然界不同于人的头脑和心之外的自然界。”

“……人,根据唯心主义者自己所承认的,是自身中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等同性’这一要求的唯一对象;因为人是这样一种对象,这种对象与自我存在的同等性和统一性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甚至最亲密的人,难道不是幻想的对象、表象的对象吗?每一个人难道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按自己的方式(in und nach seinem Sinne)去了解另一个人吗?……既然人与人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那末在非思维的、非人的、跟我们不是等同的自在的存在物(Wesen an sich)与我们所思维、想象和了解的这个存在物之间,该有多么大的差别?”(同上,第518页)

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任何神秘的、古怪的、玄妙的差别,是十足的哲学胡说。事实上,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马赫主义认为,既然我们只知道感觉,所以我们就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这种“学说”是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哲学的旧的诡辩,不过加上了新的作料而已。

狄慈根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在下面将指出:他的表达方式往往不确切,他常常陷入混乱,而各式各样无知的人(包括欧·狄慈根⁵¹)就把这些东西抓住不放,当然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也不例外。然而,他们不化一点力气或者没有本事去分析他的哲学的主要路线,把唯物主义和其他因素分别清楚。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德文版第65页)中说道:“我们如果把世界看作是‘自在之物’,那就容易了解:‘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

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现象和显现者之间的差别,正象十哩路程和全程之间的差别一样。”(第71—72页)在这里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原则的差别、任何“超越”、任何“天生的不一致”。但是,差别当然是有的,因为这里有着超出感性知觉的界限向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的过渡。

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①这篇文章中说道:“我们知道(erfahren, 体验到),任何经验都是那种超出任何经验界限的东西(用康德的话来讲)的一部分。”“对于意识到自己的本质的意识来说,任何微粒,不论是灰尘、石头或木头的微粒,都是一种不能彻底认识的东西(Unauskenntliches),这就是说,每一个微粒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可穷尽的材料,因而是一种超出经验界限的东西。”(第199页)

你们看,在狄慈根用康德的话来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仅仅为了通俗化和对比的目的而采用康德的错误的混乱的术语的时候,他承认超出“经验界限”。这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从唯物主义转到不可知论时抓住不放的一个好例子,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超出“经验界限”,在我们看来,“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狄慈根正反对这种哲学,他说:“不健康的神秘主义反科学地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分开。它把显现着的物和‘自在之物’,即把现象和真理变为两个彼此 toto coelo(完全地、根本地、原则地)不同的并且不包括在任何一般范畴中的范畴。”(第200页)

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而希望别人在哲学上称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

^① 《短篇哲学论文集》(《Kleinere philosoph. Schriften》) 1903年版第199页。

诺夫的造詣和聰明吧！

“帶有更多批判色彩的唯物主義者守着‘泛心論和泛物論’之間的中庸之道，他們否認‘自在之物’是絕對不能認識的，但同時又認為‘自在之物’和‘現象’有原則的〈着重號是波格丹諾夫加的〉差別，因而‘自在之物’始終只是在現象中‘被模糊地認識的’，就其內容來說〈大概是就那些並非經驗要素的“要素”來說〉是經驗之外的，但是‘自在之物’卻處在被稱為經驗形式的那些東西的範圍之內，即處在時間、空間和因果性的範圍之內。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和最新的哲學家恩格斯及其俄國的信徒別爾托夫⁵²的觀點大致就是這樣。”（《經驗一元論》1907年第2版第2卷第40—41頁）

這是一堆十足的胡話。（一）貝克萊所反駁的十七世紀的唯物主義者，認為“自在客體”是絕對可以認識的，因為我們的表象、觀念只是“心外”客體的復寫或反映（見《代緒論》）。（二）費爾巴哈和他以後的狄慈根堅決地反駁自在之物和現象之間有“原則”差別的見解，而恩格斯則用“自在之物”轉化成“為我之物”的簡單明了的例子推翻了這個見解。（三）最後，我們在恩格斯對不可知論者的駁斥中已經看到：那種說唯物主義者認為自在之物“始終只在現象中被模糊地認識”的論調，完全是胡說。波格丹諾夫所以曲解唯物主義，就是因為他不懂得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講到）。至於“經驗之外”的自在之物和“經驗的要素”，這些已經是馬赫主義的混亂思想的開端，這種混亂思想我們在上面講得夠多了。

重複反動教授們的有關唯物主義者的那些不可思議的胡言亂語；在1907年背棄恩格斯，而在1908年又企圖把恩格斯的觀點“修改”成不可知論，——這就是俄國馬赫主義者的“最新實證論”的哲學！

四 有没有客观真理？

波格丹诺夫说：“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否定任何永恒真理。”（《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4—5页）什么叫绝对客观性呢？波格丹诺夫在同一个地方说，“永恒真理”就是“有绝对意义的客观真理”，他只同意承认“仅仅在某一时代范围内的客观真理”。

在这里显然是把下面两个问题搞混了：（一）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二）如果有客观真理，那末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

波格丹诺夫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根本否认绝对真理，并且因恩格斯承认绝对真理而非难恩格斯有折衷主义。关于波格丹诺夫发现恩格斯有折衷主义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另行论述。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波格丹诺夫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但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否定人的某些表象中的相对性因素，可以不否定客观真理；但是否定绝对真理，就不可能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

稍后，波格丹诺夫在序言第九页上又说：“……别尔托夫所理解的客观真理的标准是没有的；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

这里和“别尔托夫的理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谈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根本不是别尔托夫。这里也和真

理的标准没有什么关系,关于真理的标准要另行论述,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和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混为一谈。波格丹诺夫对后一问题的否定的回答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真理只是思想形式,那就是说,不能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了,因为除了人类的思想以外,我们和波格丹诺夫都不知道别的什么思想。从波格丹诺夫的后半句话来看,他的否定的回答就更加明显了: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形式,那就是说,不能有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不能有客观真理了。

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就是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这种否定的荒谬,即使从前面所举的一个自然科学真理的例子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这一点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完全符合的: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客观真理。自然科学的这个原理同马赫主义者的哲学以及他们的真理学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地球存在于任何人类经验之外的论断就不可能是真理了。

但是不仅如此。如果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天主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真理了。因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波格丹诺夫本人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的这种惊人的谬误。我们来看看他怎样企图从他所陷入的泥坑中爬出来,倒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在《经验一元论》第一卷里读到:“客观性的基础应该是在集体经验的范围内。我们称之为客观的,是这样一些经验材料,它们对于我们和别人都具有同样的切身意义,不仅我们可以根据它

们来毫无矛盾地组织自己的活动,而且我们深信,别人为了不陷于矛盾也应该以它们为根据。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存在的(不对!它是不依赖于“所有的人”而存在的),并且我深信,它对于所有的人,就象对于我一样,具有同样确定的意义。物理系列的客观性就是它的普遍意义。”(第25页,着重号是波格丹诺夫加的)“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所遇见的那些物理物体的客观性,归根到底是确立在不同人的意见的相互检证和一致的基础上的。总之,物理世界是社会地一致起来的、社会地协调起来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第36页,着重号是波格丹诺夫加的)

这是根本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定义: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类经验而存在的;在不可能有人类经验的任何“社会性”和任何“组织”的时候,物理世界就已经存在了,等等。关于这些我们不必再重复了。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揭穿马赫主义哲学:它给客观性下这样的定义,就会使宗教教义也适合这个定义了,因为宗教教义无疑地也具有“普遍意义”等等。再听一听波格丹诺夫往下说吧!“我们再一次提醒读者:‘客观’经验决不是‘社会’经验……社会经验远非都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它总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因而它的某些部分和其他一些部分是不一致的。鬼神可以存在于某个民族或民族中的某个集团(例如农民)的社会经验范围之内,但还不能因此就把它们包括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或客观的经验之内,因为它们和其余的集体经验不协调,并且不能列入这种经验的组织形式中,例如,因果性的链条中。”(第45页)

波格丹诺夫自己“没有”把关于鬼神等等的社会经验“包括”在客观经验之内,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以否定信仰主义的精神来作出的这种善意修正,丝毫没有改正波格丹诺夫的整体立场

的根本错误。波格丹诺夫给客观性和物理世界所下的定义无疑地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宗教教义比科学学说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人类的大部分至今还信奉宗教教义。天主教由于好几世纪的发展已经是“社会地组织起来、协调起来和一致起来的”，它无可争辩地可以“列入”“因果性的链条”中，因为宗教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现代条件下宗教得到人民群众的信奉，决不是偶然的，而哲学教授们迎合宗教的意旨，也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如果说这种无疑地具有普遍意义的和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宗教的经验与科学的“经验”“不协调”，那末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原则的差别，而波格丹诺夫在否认客观真理时却把这种差别抹杀了。无论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自己的观点，说信仰主义或僧侣主义是和科学不协调的，然而有一个事实始终是无可怀疑的，即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和信仰主义完全“协调”的。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末一切信仰主义就被完全否定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如果真理（包括科学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这就是承认僧侣主义的基本前提，替僧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为宗教经验的“组织形式”开拓地盘。

试问：这种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出自不肯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本人呢，还是出自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如果世界上只存在着感觉（1876年阿芬那留斯是这样说的），如果物体是感觉的复合（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是这样说的），那末就很明显，在我们面前的是不可避免地会否定客观真理的哲学主观主义。如果把感觉叫

作“要素”，这种“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的东西，在另一种联系上构成心理的东西，那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并没有因此被否定，而只是陷于混乱。阿芬那留斯和马赫都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因此他们都有经验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或感觉论（一切知识来自感觉）的观点。然而，不管你们用什么“新”字眼（“要素”）去装饰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只会导致而不会排除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别。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贝克莱和狄德罗都渊源于洛克。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混了第二个重要前提：人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对客观真理的承认是最要紧的。这个哲学上的老问题，即关于从经验论和感觉论的前提中可以产生两种倾向，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可能得出两个结论的问题，马赫并没有解决，也没有排除或超越，他只是玩弄“要素”这类名词，使问题陷于混乱。波格丹诺夫否定客观真理，这是整个马赫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离开马赫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路·费尔巴哈》中，把休谟和康德叫作“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哲学家。因而恩格斯提到首要地位的是休谟和康德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分歧点。同时他又指出：“对驳斥这一〈休谟的和康德的〉观

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德文第4版第15—16页)²²因此,指出黑格尔讲的下面一段话,在我看来不是没有意思的。黑格尔在宣称唯物主义是“彻底的经验论体系”时写道:“在经验论看来,外部东西(das Äußerliche)总是真实的;其次,经验论即使容许某种超感觉的东西,但否认这种超感觉的东西的可知性(soll doch eine Erkenntnis desselben (d. h. des Übersinnlichen) nicht stattfinden können),经验论认为必须完全遵循属于知觉的东西(das der Wahrnehmung Angehörige)。而这个基本前提经过彻底的发展(Durchführung),便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唯物主义。在这种唯物主义看来,物质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das wahrhaft Objektive)。”^①

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不论你是否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时间、空间、因果性的客观性(象康德那样),还是不容许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象休谟那样),结果反正都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论、经验哲学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你否定经验中的客观内容,否定经验认识中的客观真理。

康德和休谟路线的维护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也包括在休谟路线的维护者之内,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贝克莱主义者)把我们唯物主义者叫作“形而上学者”,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我们承认我们感觉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泉源。我们

^① 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Hegel,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黑格尔全集》1843年版第6卷第83页,参看第122页。

唯物主义者，象恩格斯一样，把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叫作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定作为我们感觉泉源的客观实在。不可知论者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在希腊文里 *a* 是不的意思，*gnosis* 是知识的意思。不可知论者说：我不知道是否有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模写的客观实在；我宣布，要知道这点是不可能的（参看上面恩格斯所叙述的不可知论者的立场）。因此，不可知论者就否定客观真理，并且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宽容有关鬼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妄想提出所谓“新的”术语、“新的”观点，实际上却是糊涂地混乱地重复不可知论者的回答：一方面，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纯粹的主观主义、纯粹的贝克莱主义），另一方面，如果把感觉改名为要素，那就可以设想它们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官而存在的！

马赫主义者喜欢唱这样一种高调：他们是完全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的哲学家，他们认为世界确实象显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是充满着声音、颜色等等的，而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死的，世界没有声音和颜色，它本身和它的显现不同，等等。例如，彼得楚尔特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和《实证论观点中的世界问题》（1906）里面唱的就是这种高调。切尔诺夫先生对这一“新”思想称赞不已，他跟着彼得楚尔特喃喃不休地重复这种论调。其实，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作为我们感觉泉源的、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们没有把感觉看作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比它的显现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因为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它的新的方面。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客观实在的映象，所谓

最终的，并不是说客观实在已经被彻底认识了，而是说除了它，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客观实在。这种观点不仅坚决地堵塞了通向一切信仰主义的大门，而且也堵塞了通向教授的经院哲学的大门。这种经院哲学不是把客观实在看作我们感觉的泉源，而是用成套臆造的字眼来“推演出”客观的这一概念，认为客观的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等等，它不能够而且也往往不愿意把客观真理和关于鬼神的教义分别开来。

马赫主义者对“独断主义者”即唯物主义者的“陈腐”观点轻蔑地耸耸肩膀，因为唯物主义者坚持着似乎已被“最新科学”和“最新实证论”驳倒了物质概念。关于物质构造的新物理学理论，我们将另行论述。但是，象马赫主义者那样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问题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有人对我们说：马赫“发现了”红、绿、硬、软、响、长等等“世界的要素”。我们要问：当人看见红，感觉到硬等等的时候，人感知的是不是客观实在呢？这个老而又老的哲学问题被马赫搞乱了。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不是客观实在，那末你们就必然和马赫一起陷入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你们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内在论者即哲学上的缅施科夫派的拥抱。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是客观实在，那末就需要有一个关于这种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它就是物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因此，如果说这个概念会“陈腐”，就是小孩子的糊涂话，就是无聊地重复时髦的反动哲学的论据。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

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宗教和科学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超感觉知识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

接受或抛弃物质概念这一问题，是对他的感官的提示是否相信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认识的泉源的问题。这一问题从一开始有哲学起就被提出来讨论了，虽然教授小丑们千方百计地把这个问题改头换面，但是它正如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是否是人的认识的泉源这个问题一样，是不会陈腐的。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只引证费尔巴哈以及两本哲学入门书里的话，以便读者可以看清楚，这是一个多么起码的问题。

费尔巴哈写道：“感觉是客观救世主的福音、通告 (Verkündigung)，否认这一点，是多么庸俗。”^①你们可以看到，这是稀奇古怪的术语，然而却是一条十分鲜明的哲学路线：感觉给人们揭示客观真理。“我的感觉是主观的，可是它的基础或原因 (Grund) 是客观的。”(第 195 页) 请把这句话同上面引证过的那段话比较一下，在那段话里费尔巴哈说过，唯物主义是从感性世界，即最终的 (ausgemachte) 客观真理出发的。

在弗兰克的《哲学辞典》^②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感觉论是“把认识归于感觉，从感性经验中”引出我们的一切观念的学说。感觉论分为主观的感觉论（怀疑论和贝克莱主义）、道德的感觉论（伊壁鸠鲁主义）和客观的感觉论。“客观的感觉论是唯物主义，因

① 《费尔巴哈全集》1866 年版第 10 卷第 194—195 页。

② 《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1875 年巴黎版。

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物质或物体是能够作用于我们感官 (atteindre nos sens) 的唯一客体。”

施维格勒在他的《哲学史》中说：“既然感觉论断言只有依靠感觉才能认识真理或存在物，那末只要〈指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哲学〉客观地去表述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唯物主义的论点：只有感性的东西是存在着的，除了物质的存在，没有别的存在。”^①

这就是写进教科书的一些起码的真理，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把它们忘记了。

五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波格丹诺夫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衷主义

波格丹诺夫的这一发现写在 1906 年《经验一元论》第三卷的序言中。波格丹诺夫写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里所说的真理的相对性和我刚才所说明的意思差不多”（序言第 5 页），就是指否定一切永恒真理，²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恩格斯的错误就在于不坚决果断，就在于透过他的全部讥讽言论，流露出他对某些尽管是可怜的‘永恒真理’的承认。”（序言第 8 页）“在这里，只有不彻底性才会容许象恩格斯所作的那些折衷主义的保留……”（序言第 9 页）现在我们来举出波格丹诺夫如何反驳恩格斯的折衷主义的一个例子。为了向杜林说明，凡是奢望在历史科学中发现永恒真理的人会局限于哪些东西，会满足于哪些陈词滥调 (Plattheiten)，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里（论“永恒真理”这一章）说到

^① 阿尔伯特·施维格勒博士《哲学史纲要》(Dr. Albert Schwiegl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m Umriß»)第 15 版第 194 页。

“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于是波格丹诺夫反驳恩格斯说：“这是什么‘真理’呵？它有什么‘永恒的’呢？确证对于我们这一代大概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个别关系，这不能作为任何活动的出发点，而且也不会引导我们到达任何地方。”（序言第9页）他在序言第八页上还说：“难道‘陈词滥调’（«Plattheiten»）可以叫作‘真理’（«Wahrheiten»）吗？难道‘陈词滥调’是真理吗？真理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它引导我们通过自己的活动到达某个地方，它给我们的生活斗争提供支撑点。”

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波格丹诺夫不是在反驳恩格斯，而是在唱高调。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是不确切的，那末你就得承认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断定它在将来会被推翻，那末你就得承认这个真理是永恒的。把真理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这类词句叫作反驳，这就是用一堆无聊的话来冒充哲学。地球具有地质学所叙述的历史呢，还是在七天内被创造出来的呢？难道能够用“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地方的“生动的”（这是什么意思？）真理等等词句来回避这个问题吗？难道关于地球和人类历史的知识“没有现实意义”吗？这只是波格丹诺夫用来掩饰其退却的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他在证明恩格斯对永恒真理的承认就是折衷主义的时候，既没有推翻拿破仑确实死于1821年5月5日的事实，也没有驳倒那个认为这一真理将来会被推翻的见解是个荒谬见解的论点，而只是用响亮的词句来回避问题。这样的作法，就是一种退却。

恩格斯所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浅显的，象诸如此类的有关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的例子，象恩格斯在举“巴黎在法国”这个例子时所说的那种只有疯子才会怀疑的真理的例子，任何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想出几十个。为什么恩格斯在这里要讲到这些“陈词滥调”

呢？因为他是要驳斥和嘲笑不善于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应用辩证法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在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最复杂的问题上，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恩格斯嘲笑他，并且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gewaltige Worte)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三十年前杜林和恩格斯展开了斗争。波格丹诺夫假装“没有看到”恩格斯在这一章中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所作的说明，由于恩格斯承认了对一切唯物主义来说都是最起码的论点，波格丹诺夫就想尽办法非难恩格斯有“折衷主义”，他这样作，只是再一次暴露了他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绝对无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章的开头写道：“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Anspruch)，如果能，那末是哪些产物能这样？”(德文第5版第79页)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如下：

“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绝对真理的认识和至上的思维〉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

思维的性质必然被我们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至少对我们说来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或构造,Anlage)、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第81页)^①

恩格斯继续说道:“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完全一样。”⁵³

这个论断,对于一切马赫主义者所强调的相对主义问题,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原则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马赫主义者都坚决认为他们是相对主义者,但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在重复德国人的话的时候,却害怕或不能直截了当地明白地提出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波格丹诺夫(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看来,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根本不承认绝对真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辩证论者。下面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同一章中讲的另一段同样重要的话:

“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辩证法的基本前提,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

^① 参看维·切尔诺夫的话,前引书第64页及以下几页。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完全站在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的立场上。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波格丹诺夫竭力掩饰他和恩格斯的分歧,认为这是偶然的,等等,而切尔诺夫则觉得,这是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行斗争的问题。

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是说,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第86页)⁵⁴接着恩格斯举了波义耳定律(气体的体积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作为例子。这个定律所包含的“一粟真理”只有在一定界限内才是绝对真理。这个定律“只是近似的”真理。

因此,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约·狄慈根在《漫游》^①中说:“我们可以看到、听到、嗅到、触到绝对真理,无疑地也可以认识绝对真理,但它并不全部进入(geht nicht auf)认识中。”(第195页)“不言而喻,图画不包括对象的全部,画家落后于他的模特儿……图画怎么能够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只是近似地一致。”(第197页)“我们只能相对地认识自然界和它的各个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虽然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相对的部分,然而却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具有认识所不可穷尽的自在的自然整体(des Naturganzen an sich)的本性……我们究竟怎样知道在自然现象背后,在相对真理背后,存在着不完全显露在人面前的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自然呢?……这种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天赋的,是同意识一起为我们所秉赋的。”(第198页)最后这句话是狄慈根的不确切的说法之一,这些不确切的说法使得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指出:狄慈根的观点中存在着混

^① 即《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编者注

乱。⁵⁵ 只有抓住这类不正确的地方,才能谈论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狄慈根的特殊哲学。但是狄慈根自己在同一页上就改正了,他说:“虽然我说,关于无限的、绝对的真理的知识是天赋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先于经验的(a priori)知识,但是这种天赋知识还是要由经验来证实的。”(第198页)

从恩格斯和狄慈根的所有这些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波格丹诺夫完全不懂得这点,他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它〈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希望成为对于事物本质的绝对客观的认识〈着重号是波格丹诺夫加的〉,因而同任何思想体系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性不能相容。”(《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4页)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

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宣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和一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地说：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是的，切尔诺夫先生和马赫主义者同志们，你们的错误正在这里。因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可以认为拿破仑是否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件事是“有条件的”，可以纯粹为了人或人类的“方便”，在承认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一方面是“方便”的）的同时，又承认宗教思想体系（它在另一方面也是很“方便”的），等等。

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波格丹诺夫加上着重号写道：“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象永恒真理“这样的独断主义和静力学”（《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9页）。这是一句糊涂话。如果象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和发展着的物质，而这种物质为不断发展着的人的意识所反映，那末这同“静力学”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谈的根本不是物的不变的本质，也不是不变的意识，而是反映自然界的

意识和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之间的符合。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仅仅在这个问题上，“独断主义”这个术语具有特殊的、独特的哲学风味。它是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反对唯物主义者时所爱用的字眼，我们已经看到，相当“老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曾经指出这一点。总之，从臭名昭彰的“最新实证论”的观点出发对唯物主义所进行的一切反驳，都是陈词滥调。

六 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⁵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客观的〉真理性”^①的问题，乃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Übereinstimmung)。”⁵⁷

请把马赫关于实践标准的言论和上面的言论对比一下。“在日常的思维和谈话中，通常把假象、错觉同现实对立起来。把一支铅笔举在我们面前的空气中，我们看见它是直的；把它斜放在水里，我们看见它是弯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说：‘铅笔好象是弯的，但实际上是直的。’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一个事实说成是现实，而把另一个事实贬斥为错觉呢？……当我们犯着在非常情况下

^① 本处引文的俄译文同本卷第一〇一页的同一段引文不一致，为了读者方便起见，我们参照德文，将本处引文和第一〇一页的引文统一。本处引文按俄文原译为：“对象的〈客观的〉真理同人的思维是否符合”。——编者注

仍然期待通常现象的到来这种自然错误时，那末我们的期待当然是会落空的。但事实在这点上是没有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谈错觉，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有意义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或者它只是我们的象梦一样的错觉，这个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同样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就连最荒唐的梦也是一个事实，它同任何其他事实比较起来并不逊色。”（《感觉的分析》第18—19页）

真的，不仅荒唐的梦是事实，而且荒唐的哲学也是事实。只要知道了马赫的哲学，对这点就不可能有什么怀疑。马赫是一个最彻底的诡辩论者，他把对人类的谬误和各种“荒唐的梦”（如相信鬼神等等）的科学历史的和心理学的研究同真理和“荒唐”在认识论上的区别混淆起来了。这正好象一位经济学家说：西尼耳所谓资本家的全部利润是由工人的“最后一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理论⁵⁸和马克思的理论同样都是事实，至于哪一种理论反映客观真理以及哪一种理论表现资产阶级的偏见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卖身求荣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制革匠约·狄慈根认为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①，而正教授马赫却认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差别，“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斗争中是无党性的，这不仅是马赫一个人所喜爱的思想，而且是现代所有的资产阶级教授们所喜爱的思想，这些教授，用狄慈根的公正的说法来讲，就是“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同上，第53页）。

马赫把每个人用来区别错觉和现实的实践标准置于科学和认

^① 《短篇哲学论文集》第55页。

识论的界限之外，这正是这种生造的教授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些离开实践而想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但马赫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而认识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可以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不用前者来制约后者。马赫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认识和谬误》中说：“认识是对生物机体有用的（förderndes）心理体验。”（德文第2版第115页）“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别开来。”（第116页）“概念是物理学的作业假说。”（第143页）我们俄国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天真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竟把马赫的这些话当作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证明。但是，马赫在这里接近马克思主义，正同俾斯麦接近工人运动或叶夫洛吉主教接近民主主义完全一样。在马赫那里，这些论点是和他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并列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并不决定在认识论上选择哪一条肯定的路线。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机体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末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马赫说：就算实践是唯物主义的，但理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写道：“在实践方面，当我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时候，我们不能缺少自我这个观念，正如在我们伸手拿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能缺少物体这个观念一样。在生理学方面，我们经常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正如我们经常看到日出

一样。但是在理论方面，我们决不应该坚持这种看法。”（第 284—285 页）

这里说到利己主义，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因为它根本不是认识论的范畴。这里和表面看到的太阳环绕地球的运行也毫不相干，因为，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剩下来的只是马赫的有价值的供状：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完全地唯一地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至于在“理论方面”逃避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试图，只不过是表现着马赫的学究式的经院哲学和生造的唯心主义的倾向罢了。

这些把实践作为一种在认识论上不值得研究的东西而加以排除从而为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扫清地盘的努力，不是什么新东西，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德国古典哲学史中的一个例子里看出来。在康德与费希特之间有一个舒尔兹⁵⁹（在哲学史上叫作舒尔兹-埃奈西德穆）。他公开拥护哲学上的怀疑论路线，自称为休谟（以及古代哲学家皮浪和塞克斯都）的追随者。他坚决否认任何自在之物和客观认识的可能性，坚决要求我们不要超出“经验”、感觉之外，同时他也预见到了来自其他阵营的反驳：“既然怀疑论者在参加实际生活时承认客观事物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并且依据这点进行活动和承认真理的标准，那末他自己的这种行为就是对他的怀疑论的最好的和最明白的驳斥。”^①舒尔兹愤慨地回答说：“这类论据只是对于小民百姓（Pöbel）才是有用的”（第 254 页），因为“我的怀疑论并不涉及到生活实践，而只是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第

① 哥·恩·舒尔兹《埃奈西德穆或耶拿的教授赖因霍尔德所提出的哲学基本原理》（G. E. Schulze, «Aenesidemus oder über die Fundamente der von dem Prof. Reinhold in Jena gelieferten Elementarphilosophie»）1792 年版第 253 页。

255 页)。

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 同样也希望在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内给这样一种实在论留个地盘, “这种实在论就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最坚决的唯心主义者在行动时都不能回避的(sich aufdringt)实在论, 就是承认事物完全不依赖于我们而独立存在的实在论”(《费希特全集》第 1 卷第 455 页)。

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并不比舒尔兹和费希特高明多少! 作为一个笑柄, 我们要指出: 在这个问题上, 巴札罗夫还是以为除普列汉诺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了, 再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³⁷。巴札罗夫嘲笑“普列汉诺夫的获生的跳跃的哲学”(《概论》^①第 69 页), 的确, 普列汉诺夫曾经写过这样拙劣的词句, 说什么“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就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获生的跳跃 (salto vitale)”(《路·费尔巴哈》注释, 第 111 页)。“信仰”这个字眼, 虽然是重复休谟的话, 并且加上了引号, 但无疑地表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语的混乱。可是为什么要找普列汉诺夫呢?? 为什么巴札罗夫不举其他的唯物主义者, 哪怕是费尔巴哈呢? 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费尔巴哈吗? 但无知并不是论据。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 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也向实践作了在舒尔兹、费希特和马赫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跳跃”。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时候, 费尔巴哈引证了费希特的一段典型的话来说明唯心主义的实质, 这段话绝妙地击中了整个马赫主义的要害。费希特写道: “你所以认为物是现实的, 是存在于你之外的, 只是因为你看到它们、听到它们、触到它们。但是视、触、听都只是感觉……你感觉的不是物体, 而只是你自己的感觉。”(《费尔巴哈全集》第 10 卷第 185 页)费尔巴哈反驳说:

^① 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编者注

人不是抽象的自我，他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可以把世界是否是感觉的问题同别人是我的感觉还是象我们在实践中的关系所证明的别人不是我的感觉这一问题同等看待。“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并解决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世界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问题。”（同上，第189页）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他说，当然唯心主义者在实践中也承认我们的自我和他人的你的现实性。不过在唯心主义者看来，“这个观点只适合于生活而不适合于思辨。但是，这种和生活矛盾的思辨，把死和脱离了肉体的灵魂的观点当作真理的观点的思辨，乃是僵死的、虚伪的思辨”（第192页）。我们要感觉，首先就得呼吸；没有空气、食物和饮料，我们就不能生存。

“愤怒的唯心主义者大叫大嚷地说，这样说来，在研究世界的观念性或实在性的问题时要讨论饮食问题吗？多么卑下！在哲学和神学的讲坛上竭力谩骂科学的唯物主义，而在公共餐桌上实地运用最粗俗的唯物主义，这个良好的习惯遭到多么严重的破坏呵！”（第195页）费尔巴哈大声说，把主观感觉和客观世界同等看待，“就等于把遗精和生孩子同等看待”（第198页）。

这种评语虽然不十分文雅，但却击中了宣称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那些哲学家的要害。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

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例如，波格丹诺夫同意承认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把那种认为这个理论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见解叫作“独断主义”（《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7页）。这又是一个糊涂观点。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其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是个永恒的真理一样。但是，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是客观真理的，乃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三)

一 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

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其中包括马赫主义者)经常拿第一个问题追问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经常拿第二个问题追问马赫主义者。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物质的问题,阿芬那留斯说道:

“在清洗过的‘完全的经验’内部没有‘物理的东西’,即没有形而上学的绝对概念下的‘物质’,因为这个概念下的‘物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也就是一切中心项都被抽象掉的对立项的总和。正如在原则同格(即“完全的经验”)中没有中心项的对立项是不可设想的(undenkbar)一样,形而上学的绝对概念下的‘物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Unding)。”^①

从这段费解的蠢话中看得出一点:阿芬那留斯把物理的东西或物质叫作绝对者和形而上学,因为根据他的原则同格(或者用新的说法:“完全的经验”)的理论,对立项和中心项是分不开的,环境和自我是分不开的,非我和自我是分不开的(如费希特所说的)。我们已经说过,这种理论是改头换面的主观唯心主义。因此,阿芬

^① 《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第2页,载于前引杂志第119节。

那留斯对“物质”的抨击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唯心主义者否认物理的东西的存在是不以心理为转移的，所以不接受哲学给这种存在所制定的概念。物质是“物理的东西”（即人最熟悉的、直接感知的东西，除了疯人院里的疯子，谁也不会怀疑它的存在），这一点阿芬那留斯并不否认，他只是要求接受“他的”关于环境和自我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

马赫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比较简单，没有哲学词藻的矫饰：“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东西，只是要素（“感觉”）的一定的有规律的联系。”（《感觉的分析》第265页）马赫以为，他一提出这个论断，就会使普通的世界观发生“根本的变革”。其实这是用“要素”这个字眼掩盖了真面目的老朽不堪的主观唯心主义。

最后，疯狂地攻击唯物主义的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说道：“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不能反对把某些比较恒久的感性知觉群加以分类，把它们集合在一起而称之为物质。这样我们就很接近穆勒的定义：物质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但是这样的物质定义完全不同于如下的定义：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①这里没有用“要素”作遮羞布，唯心主义者直接向不可知论者伸出了手。

读者可以看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的这一切论述，完全是在思维对存在、感觉对物理东西的关系这个认识论的老问题上兜圈子。要有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无比天真才能在这里看到某种和“最新自然科学”或“最新实证论”多少有点关系的东西。所有我们提到的哲学家都是用唯心主义路线代替唯物主义基本哲学路线（从存在到思维、从物质到感觉），只是在做法上，有的质直明言，有的吞吞吐吐。他们否认物质，也就是否认我们感觉的外部的、客观的泉源，

^① 《科学入门》1900年第2版第249页。

否认和我们感觉相符合的客观实在，这是大家早已熟知的对认识论问题的解答。相反地，承认被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所否认的那条哲学路线，是以如下的定义表达的：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等等。

波格丹诺夫胆怯地避开恩格斯，装作只跟别尔托夫争辩，对上述定义表示愤慨，因为，你们要知道，这类定义“原来是简单地重复着”（《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16页）下面的“公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说：恩格斯的公式）：对哲学上的一个派别说来，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对另一个派别说来，则恰恰相反。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都喜出望外地重复着波格丹诺夫的“驳斥”！可是这些人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可能下别的定义。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例如，当我下定义说驴是动物的时候，我是把“驴”这个概念放在更广泛的概念里。现在试问，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和心理的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这是些广泛已极的概念，其实（如果撇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它们。只有欺诈或极端愚蠢才会要求给这两个广泛已极的概念“系列”下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不是“简单地重复”二者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就拿上面所引的三种关于物质的论断来说吧！这三种论断归结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归结起来就是：这些哲学家是从心理的东西或自我到物理的东西或环境，也就是从中心项到对立项，从感觉到物质，从感性知觉到物质。实际上，阿芬那留斯、马赫和毕尔生除了表明他们的哲学路线的倾向以外，是不是给这些基本概念下了什么别的“定义”呢？对于什么是自

我，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感性知觉，他们是不是能下别的定义，能下什么更特别的定义呢？只要清楚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了解，当马赫主义者要求唯物主义者给物质下的定义不再重复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时候，他们是在说些什么样荒唐绝顶的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也表现在：他们蔑视学究式地玩弄新奇的名词、古怪的术语、狡猾的“主义”，而直截了当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在两者之间有各式各样的不可知论。劳神费力寻找哲学上的“新”观点，正如劳神费力创造“新”价值论、“新”地租论等等一样，是精神上贫乏的表现。

关于阿芬那留斯，他的学生卡斯坦宁说，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我既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也不知道心理的东西，只知道第三种东西。”有一位著作家指出，阿芬那留斯没有提出这个第三种东西的概念。彼得楚尔特回答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提出这样的概念。因为第三种东西没有对立概念（Gegenbegriff，相关概念）……什么是第三种东西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不合逻辑的。”^①不可能给这个概念下定义，这一点彼得楚尔特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懂得，援用“第三种东西”不过是一种狡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物理的东西，什么是心理的东西，可是目前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第三种东西”。阿芬那留斯用这种狡辩只是掩盖形迹，事实上他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

^① 《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第329页。

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里是怎样使用“经验”一词的。《纯粹经验批判》一书的第一节叙述了如下的“假设”：“我们环境的任何构成部分和个人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如果前者呈现，那末后者就申述自己的经验，说某某东西是我从经验中知道的，某某东西是经验；或说某某东西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是依赖于经验的。”（俄译本第1页）这样，经验还是由自我和环境这两个概念来确定的，可是关于二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学说”暂时收藏起来了。再往下读：“纯粹经验的综合概念”，就是“这样一种申述的经验的综合概念，在这种申述的所有构成部分中，只有环境构成部分才能是这种申述的前提”（第1—2页）。如果认为环境是不依赖于人的“申述”或“言表”而存在着的，那末就有可能唯物地解释经验了！“纯粹经验的分析概念”，就是“这样一种申述的经验的分析概念，在这种申述中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因而这种申述本身不外就是经验”（第2页）。经验就是经验。竟有人把这种冒牌学者的胡说当作真正的深奥思想！

必须再补充几点：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第二卷里把“经验”看作是心理的东西的一种“特殊现象”；他把经验分为物的价值（sachhafte Werte）和思想的价值（gedankenhafte Werte）；“广义的经验”包含思想的价值；“完全的经验”被视为和原则同格是等同的（《考察》^①）。一句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经验”掩盖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使二者的混同神圣化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轻信地把“纯粹经验”当作真的，可是在

^① 即《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编者注

哲学著作中，各种派别的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阿芬那留斯滥用这个概念。黎尔写道：“什么是纯粹经验，在阿芬那留斯的书中仍然是不清楚的。他说‘纯粹经验是一种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的经验’，这显然是在兜圈子。”^①冯特写道，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有时是指任何一种幻想，有时是指具有“物性”的言表^②。阿芬那留斯把经验这个概念扩大了(第382页)。柯维拉尔写道：“这种哲学的全部意义取决于经验和纯粹经验这两个术语的精确定义。阿芬那留斯没有下这样的精确定义。”^③斯密斯说道：在阿芬那留斯用反唯心主义的幌子去偷运唯心主义的时候，“经验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很好地帮了他的忙”^④。

“我郑重声明，我的哲学的真谛和灵魂在于：人除了经验以外什么也没有；人所要获得的一切，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获得……”这岂不是一位狂热的纯粹经验的哲学家吗？讲这段话的人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⑤。我们从哲学史中知道，对经验概念的解释，使古典的唯物主义者 and 古典的唯心主义者划分开来了。目前，各式各样的教授哲学都以侈谈“经验”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一切内在论者都援用经验。马赫在他的《认识和谬误》一书第二版序言里对耶鲁萨伦姆教授的一本书称赞不已。在那本书中我们读到：“承认神的原初存在，是和任何经验都不矛盾的。”^⑥

我们只能怜惜那些相信阿芬那留斯之流的人，他们以为靠“经

① 《系统哲学》(«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1907 年来比锡版第 102 页。

② 《哲学研究》杂志第 13 卷第 92—93 页。

③ 《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 1907 年 2 月号第 61 页。

④ 《思想》杂志第 15 卷第 29 页。

⑤ 《就最新哲学的真正本质向广大读者的明白报道》(«Sonn. Ber. etc.») 第 12 页。

⑥ 《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纯粹的逻辑》第 222 页。

验”一词就可以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陈旧”差别。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责备同纯粹马赫主义略有分歧的波格丹诺夫滥用了经验一词，这些先生们在这里只是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过错的”，因为他只是盲目地接受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糊涂观念。当他说“意识和直接心理经验是等同概念”（《经验一元论》第2卷第53页），物质“不是经验”，而是“引出一切已知物的未知物”（《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13页），这时候他是在唯心地解释经验。当然，他不是第一个^①但也不是最后一个在经验这个字眼上建立起唯心主义体系的人。当他驳斥反动的哲学家们，说那些想超出经验界限的尝试事实上“只会导致空洞的抽象和矛盾的映象，而这些抽象和映象的一切要素还是从经验中取得的”（第1卷第48页），这时候他把在人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同人的意识的空洞抽象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

完全同样地，马赫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物体是感觉或“要素”的复合），却常常不由自主地对经验一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在《力学》^②一书（1897年德文第3版第14页）中说道：“不要从自身中推究哲理（nicht aus uns herausphilosophieren），而要从经验中去推究。”在这里，他把经验同从自身中推究哲理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把经验解释为某种客观的、人从外界得到的东西，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在自然界里观察到的东西，

① 在英国，贝尔福特·巴克斯同志老早就这样作了。不久以前，一位评论巴克斯的著作《实在的根源》（《The roots of reality》）的法国评论家辛辣地对他说：“经验不过是意识的代用语”，你就公开地作一个唯心主义者吧！（《哲学评论》杂志⁶⁰1907年第10期第399页）

② 即《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编者注

虽然我们还不理解，还没有加以分析，但是已经印入我们的表象中，以后这些表象以最一般、最稳定的 (stärksten) 特征模仿 (nachahmen) 自然过程。这种经验就成为永远在我们手边的宝藏 (Schatz)……”(同上，第 27 页) 在这里自然界被看作是第一性的，感觉和经验被看作是派生的。如果马赫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始终坚持这种观点，他就会使人类摆脱许多愚蠢的唯心主义的“复合”。第三个例子：“思想和经验的密切结合创立了现代自然科学。经验产生思想。思想经过进一步的精炼，又来和经验相比较”，等等^①。马赫的特殊“哲学”在这里被抛弃了，这位作者自发地转到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唯物地看待经验。

总结：马赫主义者用来作为其体系的基础的“经验”一词，老早就在掩蔽各种唯心主义体系了，现在它又被阿芬那留斯之流用来为其往返于唯心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立场之间的折衷主义服务。这个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只是表现着被恩格斯十分鲜明地揭示出的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二 普列汉诺夫对“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

普列汉诺夫在给《路·费尔巴哈》(1905年版)写的序言第十页至十一页上说道：

“一位德国作家说，在经验批判主义看来，经验只是研究的对象，决不是认识的手段。如果真是这样，那末把经验批判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关于经验批判主义负有代替唯物主义的使命的议论也就是十分空洞无谓的了。”

^① 《认识和谬误》第 200 页。

这全是糊涂思想。

阿芬那留斯的最“正统的”继承者之一卡斯坦宁在一篇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文章（给冯特的答复）中说道：“从《纯粹经验批判》一书来看，经验不是认识的手段，而只是研究的对象。”^①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把卡斯坦宁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卡斯坦宁几乎逐字逐句地转述阿芬那留斯的话。阿芬那留斯在他的《考察》^②一书中，坚决把自己对经验的理解同“占统治地位的、实质上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对经验看法对立起来；他认为经验是我们见到的东西，是我们发现的东西（das Vorgefundene），后者认为经验是“认识的手段”（前引书第401页）。彼得楚尔特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170页）中也跟随阿芬那留斯说同样的话。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把卡斯坦宁、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的观点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不是普列汉诺夫没有“读完”卡斯坦宁及其同伴的著作，就是他从第三手引用了“一位德国作家”的话。

最著名的经验批判主义者们的这个为普列汉诺夫所不了解的论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卡斯坦宁本来想说：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中把经验（即一切“人的言表”）当作研究的对象。卡斯坦宁说道（前引论文第50页）：阿芬那留斯不是在这里研究这些言表是否真实，或者它们是否和幽灵有关系；他只是把人的各式各样的言表，不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都聚集起来，加以系统化，从形式上予以分类（第53页），而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卡斯坦宁认为这种观点“主要是怀疑论”（第213页），他是完全正

① 《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2年卷（1898）第45页。

② 即《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编者注

确的。卡斯坦宁还在这篇文章里保护他的亲爱的老师，驳斥了冯特说他的老师是唯物主义者那个可耻的(在一位德国教授看来)责难。哪里，我们算是唯物主义者！——这就是卡斯坦宁反驳的用意，——即使我们谈到“经验”，那也决不是指通常所说的那种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唯物主义的经验，而是指我们所研究的、人们当作“经验”而“说出”的一切东西。卡斯坦宁和阿芬那留斯认为把经验看作认识的手段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这也许是最平常的，然而如同我们从费希特的例子中所看到的，这毕竟是不对的)。阿芬那留斯使自己和“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因为后者不理睬嵌入说和同格说，坚决认为脑是思想的器官。阿芬那留斯认为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或见到的东西(das Vorgefundene)正是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看法导致对“经验”作混乱的唯心主义的解释。

总之，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无疑地可以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同样也可以隐藏休谟主义路线和康德主义路线，但是不论对经验所下的定义如何，研究的对象^①也好，认识的手段也好，都还没有解决这方面的任何问题。而卡斯坦宁专门对冯特的驳斥，同经验批判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问题毫无关系。

作为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波格丹诺夫和瓦连廷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给普列汉诺夫的答复表现了同样的无知。波格丹诺夫说：“还不十分明白”(第3卷序言第11页)，“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事情

^① 也许普列汉诺夫以为卡斯坦宁说的是“不依赖于认识而存在的认识对象”，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如果是这样，这倒的确是唯物主义。但是，不论卡斯坦宁，或者任何一个熟悉经验批判主义的人，都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是弄清楚这种说法和接受或不接受条件”。多么有利的立场：我并不是马赫主义者，所以我没有义务去弄清楚某一个阿芬那留斯或卡斯坦宁所说的经验是什么意思！波格丹诺夫想利用马赫主义（以及马赫主义关于“经验”的糊涂观念），可是他不愿意对这种糊涂观念负责。

“纯粹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瓦连廷诺夫抄下了普列汉诺夫的那一段话，并且当众跳起了康康舞⁶¹，他讥笑普列汉诺夫没有说出作者的名字，没有说明问题的所在（前引书第108—109页）。但是这位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自己对于问题的本质一个字也没有回答，虽然他承认曾把普列汉诺夫的那段话“至少反复读了三遍”（显然，他什么也不了解）。瞧，这就是马赫主义者！

三 自然界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任何一种最新“主义”的哲学路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稍微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谈起。费尔巴哈的观点，在前面提到的他对哈伊姆的反驳中讲得特别清楚。

“哈伊姆说，‘在他（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自然界和人类理性是完全分开的，它们之间有一条双方都不能逾越的鸿沟。’哈伊姆是根据我的《宗教的本质》第四十八节提出这个谴责的。我在这一节中说过：‘自然界只有通过自然界本身才能理解；自然界的必然性不是人类的或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自然界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存在物，对于它是不能够运用任何人类尺度的，虽然为了使自然界能够为我们理解，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

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这些用语用于自然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任何秩序,比方说,秋去可以夏来,春去可以冬来,冬去可以秋来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目的,比方说,肺和空气之间,光和眼睛之间,声音和耳朵之间没有任何适应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规律,比方说,地球时而按椭圆形运转,时而按圆形运转,时而一年环绕太阳一周,时而一刻钟环绕太阳一周呢?这是多么荒谬呵!我在这段话里究竟想说什么呢?无非是把属于自然界的東西同属于人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段话里没有说自然界中任何真实的東西都跟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和观念不相符合,这段话只是否认思想和存在是等同的,否认秩序等等之存在于自然界就象存在于人的头脑或感觉中一样。秩序、目的、规律不外是一些词,人用这些词把自然界的事物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以便了解自然界的事物;这些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 (nicht sinn- d. h. gegenstandlose Worte);但是,终究必须把原文和译文区别开来。人理解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是有些随意的。

“有神论根据自然界的秩序、合目的性、规律性的偶然性公然断定它们是任意产生的,断定有一个和自然界不同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把秩序、合目的性、规律性加到本身 (an sich) 就是混乱的 (dissolute)、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自然界身上去。有神论者的理性……是和自然界相矛盾的理性,是绝对不了解自然界本质的理性。有神论者的理性把自然界分成两个存在物,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形式的或精神的。”^①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被人类的

^① 《费尔巴哈全集》1903年版第7卷第518—520页。

秩序、规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他承认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些，在因果性问题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线，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路线，被费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流派。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路线，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隔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谟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论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

至于说到恩格斯，如果我没有弄错，他当时用不着专门在因果性问题上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去驳斥其他派别。对他来说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在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十分明确地同一切不可知论者完全划清了界限。谁要是稍微认真地读过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就一定会明白，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章里说道：“为了认识个别方面（或世界现象总画面的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natürlich）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方面逐个地加以研究。”（第5—6页）这种自然联系即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恩格斯特别强调以辩证观点来看原因和结果：“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

念,只有在应用于一定的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并交织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原因,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结果,反之亦然。”(第8页)因此,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恩格斯说道,如果我们注意到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那末我们发现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相符合,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明显,“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其他的自然界的联系(Naturzusammenhang)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第22页)⁶²。世界现象的自然的、客观的联系是存在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恩格斯经常讲到“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解释这些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原理。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到:“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第38页)恩格斯责备旧的自然哲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它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自然现象的联系)”(第42页)⁶³。十分明显,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我们人类用某些概念对这个规律性所作的近似的反映具有相对性。

在讲到约·狄慈根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从我们的马赫主义

者歪曲事实的无数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的作者之一格尔方德先生告诉我们：“狄慈根的世界观的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9）实际上，物本身中并不含有我们强加于物的因果依存性。”（第248页）这完全是胡说。格尔方德先生本人的见解是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杂烩。他恶意地歪曲了约·狄慈根的观点。的确，从约·狄慈根那里可以找出不少糊涂的不确切的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马赫主义者称快，使一切唯物主义者不能不承认狄慈根是一位不十分彻底的哲学家。但是，硬说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根本否认唯物主义的因果观，这也只有格尔方德之流、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干得出来。

约·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德文版）中说道：“客观的科学认识，不是在信仰中，不是在思辨中，而是在经验中，在归纳中寻找原因，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去寻找原因。自然科学不是在现象之外，不是在现象之后，而是在现象之中或通过现象去寻找原因。”（第94—95页）“原因是思维能力的产物。然而它们不是思维能力的纯粹产物，它们是思维能力和感性材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感性材料给这样产生的原因提供了客观存在。正如我们要求真理是客观现象的真理一样，我们要求原因是实在的，要求它是某个客观结果的原因。”（第98—99页）“物的原因就是物的联系。”（第100页）

由此可见，格尔方德先生提出的论断是和实际情况绝对相反的。约·狄慈根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承认“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的。为了制造马赫主义的杂烩，格尔方德先生需要在因果性问题上把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混淆起来。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二条路线。

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

则对世界的思维》中清楚地说出了他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我们在第八十一节里读到：“我们既然感觉不到(erfahren, 没有在经验中认识到)某种引起运动的力量,也就感觉不到任何运动的必然性…… 我们所感觉到(erfahren)的一切,就是一个现象跟着一个现象。”这是最纯粹的休谟观点:感觉、经验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必然性。断言(根据“思维经济”的原则)感觉是唯一存在的哲学家,不能得出任何别的结论。我们往下读到:“既然因果性的观念要求力量和必然性或强制作为决定结果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因果性的观念也就和它们一样地完蛋。”(第82节)“必然性是表示期待结果的或然率的程度。”(第83节,论题)

这是因果性问题上的十分明确的主观主义。只要稍微彻底一点,那末,不承认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就不能得出别的结论。

拿马赫来说吧!我们在关于“因果性和说明”的专门一章^①中读到:“休谟<对因果性概念的>批判仍然有效。”康德和休谟对因果性问题的解答是各不相同的(马赫是不重视其他哲学家的!);“我们赞成”休谟的解答。“除了逻辑的必然性(着重号是马赫加的),任何其他的必然性,例如物理的必然性,都是不存在的。”这正是费尔巴哈极坚决地反对的一种观点。马赫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他和休谟的血缘关系。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会断言休谟的不可知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在马赫的《力学》里读到:“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1897年第3版第474页)“我说过不止一次: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Triebe)中产生的;对自然界说来,并没有必要去同这

^① 《热学原理》(«Wärmelehre») 1900年第2版第432—439页。

些形式相适应。”(第 495 页)

在这里应当指出,我们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幼稚得惊人,他们用关于因果律的这种或那种说法的问题来代替关于因果律的一切论断上的唯物主义趋向或唯心主义趋向的问题。他们相信了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教授们,以为只要说“函数关系”,那就是“最新实证论”的发明,那就摆脱了类似“必然性”、“规律”等等说法的“拜物教”。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冯特完全有理由嘲笑这种一点也没有改变问题实质的名词更换(前引论文,载于《哲学研究》第 383 页和第 388 页)。马赫自己也说到因果律的“一切形式”,并在《认识和谬误》(第 2 版第 278 页)中作了一个很明白的声明:只有在能够用可测的量来表达研究的结果时,函数概念才能够更精确地表达“要素的依存性”,但是这甚至在化学那样的科学中也只能够部分地作到。大概,在我们那些轻信教授们的发明的马赫主义者看来,费尔巴哈(不必说恩格斯了)不知道秩序、规律性等等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数学上规定的函数关系来表达!

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并不是关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些记述是否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正是这个问题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同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阿芬那留斯、马赫断然分开了。

如果责备马赫是始终如一的,那就错了。马赫在其著作的个别地方常常“忘记”他同休谟的一致,“忘记”他的主观主义的因果性理论,而“只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说以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谈论问题。例如,我们在《力学》中读到:“自然界教导

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均一性。”(法译本第182页)如果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均一性,那是不是说这个均一性是客观地,在我们心之外存在着呢?不是的。关于自然界的均一性这个问题,马赫说出这样的话:“推动我们把那些只观察了一半的事实在思想中加以充实的力量,是联想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不断重复而加强起来。于是我们就觉得它是一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个别事实的力量,是一种既指导思想也〈着重号是马赫加的〉指导事实并且作为支配二者的规律而使它们相互符合的力量。至于我们认为自己能借助于这种规律而作出预言,这仅仅〈!〉证明我们环境的充分的均一性,但决不证明我们的预言实现的必然性。”(《热学》^①第383页)

这样说来,可以而且应当在环境(即自然界)的均一性以外去寻找某种必然性!到哪儿去寻找,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秘密,因为它害怕承认人的认识能力不过是自然界的反映。马赫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认识和谬误》里甚至断定自然规律是“对期待的限制”(第2版第450页及以下各页)!唯我论又显形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哲学派别的其他著作家的立场。英国人毕尔生以他特有的明确性表示:“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②“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sov-
reign)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过于容易忘记;使他们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象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物。”(第185页)“自然规律的广括性质应当归功于人心的机敏。”(同上)第三章第四节这样写道:“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一说法要比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这一相反的说法有意义得多”,但是,这位尊贵的教授痛苦地

① 即《热学原理》。——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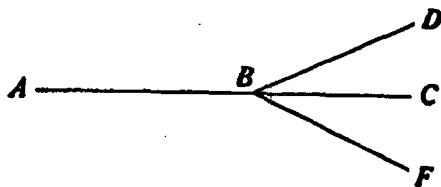
② 《科学入门》第2版第36页。

承认，后一（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幸得很，现在太流行了”（第 87 页）。第四章是论述因果性问题的，其中第十一节表述了毕尔生的论点：“必然性属于概念的世界，不属于知觉的世界。”应当指出，对毕尔生说来，知觉或感性印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在一定知觉系列不断重复时具有的均一性中，即在知觉的常规中，没有任何内在必然性；可是知觉常规的存在是思维者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必然性包含在思维者的本性中，而不包含在知觉本身中；必然性是认识能力的产物。”（第 139 页）

我们的这位马赫主义者（马赫“本人”曾一再表示和他完全一致）就这样顺利地达到了纯粹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问题不在于重复康德的先验性学说，因为这一点所决定的不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路线，而是这条路线的一个特殊说法。问题在于：理性、思维、意识在这里是第一性的，自然界是第二性的。理性并非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它的最高产物之一、它的过程的反映，而自然界倒是理性的一小部分。这样，理性便自然而然地从普通的、单纯的、谁都知道的人的理性扩张成象约·狄慈根所说的“无限的”、神秘的、神圣的理性。“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公式是信仰主义的公式。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在恩格斯的书中读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自然界而不是把精神当作第一性，因而就非常惊异，这只是表明他们在分辨真正重要的哲学派别同教授们的故弄玄虚、咬文嚼字方面无能到了什么地步。

彼得楚尔特在他的两卷集著作中阐述和发挥了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他可以说是反动的马赫主义经院哲学的最好的典范。他武断地说：“直到今天，在休谟死后的一百五十年，实体性和因果性仍旧麻痹着思维的勇气。”（《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 1 卷第 31 页）当

然,唯我论者比任何人都“更有勇气”,他们发现了没有有机物质的感觉、没有头脑的思想、没有客观规律性的自然界!“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关于因果性的最后一个说法,即必然性或自然界的必然性,在自身中包含着一种模糊的神秘的东西”——“拜物教”、“拟人观”等等的观念(第 32 页和第 34 页)。可怜的神秘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自然界的必然性,而且还把休谟路线的拥护者叫作理论上的反动派……彼得楚尔特是超出一切“拟人观”的。他发现了伟大的“一义性规律”,这个规律消除了一切模糊性、一切“拜物教”的痕迹,如此等等。就以力的平行四边形(第 35 页)为例吧!我们不能“证明”它,应当承认它是“经验的事实”。我们不能假定物体受到同样的冲击而有各种不同的运动。“我们不能容许自然界的这种不规定性和任意性;我们应当向它要求规定性和规律性。”(第 35 页)是的,是的!我们向自然界要求规律性。资产阶级向它的教授们要求反动性。“我们的思维向自然界要求规定性,而自然界总是服从这个要求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它不得不服从这个要求。”(第 36 页)当物体在 AB 线上受到冲击时,为什么它向 C 运动,而不向 D 或 F 等等方向运动呢?



“为什么自然界不从无数其他可能的方向中选择一个方向呢?”(第 37 页)因为这些方向是“多义的”,而彼得楚尔特的伟大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发现要求一义性。

“经验批判主义者们”以诸如此类不可名状的谬论充塞着好几

十页篇幅！

“……我们一再指出，我们的原理不是从个别经验的总和中汲取力量的，相反地，我们要求自然界承认它(seine Geltung)。事实上，这个原理在还没有成为规律之前，就已经是我们对待现实的原则即公设了。它可以说是先验地、不依赖于任何个别经验而发生作用的。乍看起来，纯粹经验哲学不应当宣传先验的真理，从而回到最空洞的形而上学去。但我们所说的先验只是逻辑的先验，不是心理的先验，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第40页)当然，如果把先验叫作逻辑的先验，那末这种观念的一切反动性就会因此而消失，并且它会上升到“最新实证论”的顶峰！

彼得楚尔特接着教训我们说，不可能有心理现象的一义规定性。幻想的作用，伟大发明家的意义等等在这里造成了例外，而自然规律或精神规律是不容许有“任何例外”的(第65页)。我们面前是一位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他对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差别的相对性一无所知。

彼得楚尔特继续说，也许人们会引用历史事件的或诗歌中人物性格发展的动因来反驳我。“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就会看到并没有什么一义性。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任何一出戏剧，我们都可以设想，其中的人物在一定心理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行动。”(第73页)“不但在心理的领域中没有一义性，而且我们有理由要求在现实中也并没有一义性(着重号是彼得楚尔特加的)。我们的学说就是这样提高到……公设的地位……即提高到任何以前的经验的必要条件的地位、逻辑的先验(*a priori*)的地位。”(着重号是彼得楚尔特加的，第76页)

彼得楚尔特在他的《引论》^①两卷集和1906年出版的小册子

^① 即《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编者注

《实证论观点中的世界图景》^①中继续使用着这个“逻辑的先验”。我们看到的是卓越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第二个例子。他不露声色地滚到康德主义那边,并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宣传最反动的学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因果性学说根本就是唯心主义的谎话,这是无论用多么响亮的有关“实证论”的词句也掩盖不了的。休谟和康德在因果性理论上的差别是次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们都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注定他们必然得出某种唯心主义的结论。比彼得楚尔特稍微有点“良心”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维利,由于自己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羞惭,他不同意彼得楚尔特的全部“一义性”理论,认为它除了“逻辑的形式主义”之外一无所有。然而维利是否因为摈弃了彼得楚尔特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呢?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摈弃康德的不可知论,完全是为了拥护休谟的不可知论。他写道:“我们从休谟的时代起就早已知道‘必然性’不是‘超越的’,而是纯粹逻辑的标记(Merkmal),或者象我很乐意说的并且我已经说过的,是纯粹语言上的(sprachlich)标记。”^②

不可知论者把我们对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叫作“超越的”观点,因为从维利并不反对而只是加以清洗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学院智慧”来看,凡是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都是非法的“超越”。

在属于我们所研究的哲学派别的法国著作家中,常常误入这

① 约·彼得楚尔特《实证论观点中的世界问题》(J. Petzoldt. «Das Weltproblem von positivistischem Standpunkte aus») 1906年莱比锡版第130页,“从经验论的观点看来,可能有逻辑的先验,因为对于我们环境的经验的(erfahrungsmäßig, 在经验中感知的)恒久性来说,因果性是逻辑的先验。”

② 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1905年慕尼黑版第91页;参看第173、175页。

同一条不可知论道路的是昂·彭加勒。彭加勒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尤什凯维奇当然把他的错误宣称为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这种实证论“最新”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还需要用上一个新“论”：经验符号论。在彭加勒看来（在论新物理学的一章中将会谈到他的全部见解），自然规律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记号。“唯一真正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内部和谐”，并且彭加勒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多数人或所有的人都承认的东西叫作客观的东西^①，也就是说，他象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纯粹主观主义地抹杀了客观真理，而关于“和谐”是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问题，他断然说：“毫无疑问，不是。”十分明显，新术语一点也没有改变不可知论的陈旧不堪的哲学路线，因为彭加勒的“独创的”理论的本质就是否认（虽然他还很不彻底）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因此，很自然，和那些把旧错误的新说法当作最新发现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不同，德国康德主义者欢迎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向他们那边即向不可知论方面的转化。我们在康德主义者菲·弗兰克的著作中读到，“法国数学家昂·彭加勒维护这样的观点：理论自然科学的许多最一般的原理（惯性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往往很难说它们的起源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实际上，它们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纯粹是一些假定的前提，完全以人的意愿为转移。”这位康德主义者喜不自胜地说：“这样一来，最新自然哲学就出乎意料地复活了批判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那就是：经验只不过填满人生来就有的框架而已……”^②

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要让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尤什凯维奇之流天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把一种什么“符号论”当作真正的新货

①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版第7、9页，有俄译本。

② 《自然哲学年鉴》⁶⁴第6卷（1907）第443、447页。

色,可是稍微有点学识的哲学家们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转到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去了!因为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一定在于重复康德的说法,而是在于承认康德和休谟共有的基本思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从主体、从人的意识中而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某些“经验的条件”,引出某些原则、公设、前提。恩格斯说得对,重要的不是一个哲学家归附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无数学派中的哪一派,而是他把自然界、外部世界、运动着的物质当作第一性的呢,还是把精神、理性、意识等等当作第一性的。

有学识的康德主义者路加对马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其他哲学路线的特征也提出了评述。在因果性问题上,“马赫完全附和休谟”^①。“福尔克曼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个观点承认必然性的事实,它同马赫相反而和康德一致;但是福尔克曼又和康德相反,他认为必然性的泉源不是思维而是自然过程。”(第424页)

福尔克曼是一位物理学家,写过许多有关认识论问题的著作。他也象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倾向于唯物主义——虽然是一种不彻底的、懦怯的、含糊的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上述引文中唯一不确切的地方,是认为马赫对一切必然性一概否定。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马赫,或者是坚决放弃唯物主义并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的整个经验批判主义流派,都不是这样的。

关于俄国马赫主义者,我们还要专门说几句话。他们想当马

^① 艾·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E. Lučka, «Das Erkenntnisproblem und Machs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载于《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409页。

克思主义者，他们全都“知道”恩格斯坚决划分唯物主义和休谟派别的界限，他们也不会不从马赫本人或任何稍许知道马赫哲学的人那里听到说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是遵循休谟路线的，但是他们在因果性问题上对休谟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尽量一声不响！支配他们的是十足的糊涂思想。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尤什凯维奇先生宣传“新”经验符号论。无论是“所谓纯粹经验的材料，如蓝色、坚硬等感觉”，或者是“所谓纯粹理性的创造，如契玛拉⁶⁵或象棋游戏”，全都是“经验符号”（《概论》^①第179页）。“认识是充满了经验符号的，它在发展中走向更高度符号化的经验符号。”“所谓自然规律……就是这些经验符号。”（同上）“所谓真正的实在、自在的存在，就是我们知识所力求达到的那个无限大的（尤什凯维奇先生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②终极的符号体系。”（第188页）“成为我们认识的基础的”“知觉流”是“非理性的”、“非逻辑的”（第187、194页）。能量“就象时间、空间、质量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不是物、实体；能量是常数，是经验符号，它象其他经验符号一样，在相当时期内满足人要把理性、逻辑斯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这个重要要求”（第209页）。

我们面前是一个穿着用斑驳陆离、刺人眼目的“最新”术语作成的小丑服装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外部世界、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是我们认识的符号。知觉流是没有理性、秩序、规律性的，是我们的认识把理性导入其中的。天体（包括地球在内）是人类认识的符号。尽管自然科学教导我们说，地球在人类和有机

① 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编者注

② 在这句话里，尤什凯维奇用 infinite（无限大的）这个外文字加上俄文字尾凑成了一个俄文形容词 инфинитный，因此列宁嘲笑尤什凯维奇“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编者注

物质可能出现以前就早已存在了，而我们却把这一切都给改变了！行星运动的秩序是我们给予的，是我们认识的产物。当尤什凯维奇先生感到人类理性被这种哲学扩张为自然界的缔造者时，便在理性旁边摆上“逻各斯”，即抽象的理性——这不是一般的理性，而是特殊的理性；这不是人脑的机能，而是一种先于任何头脑而存在的东西、一种神灵的东西。“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乃是费尔巴哈已经揭露了的那个陈旧的信仰主义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波格丹诺夫吧！1899年，当他还是一个半唯物主义者，由于一位很有名的化学家但也是很糊涂的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而刚刚开始动摇时，他写道：“现象的普遍因果联系，是人类认识的最终的也是最好的产物；它是普遍的规律，它是那些（用一个哲学家的话来说）由人类理性加诸自然界的规律中的最高级的规律。”（《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41页）

天晓得波格丹诺夫的这段话那时候是从谁那里引来的。事实上，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轻信地一再重复的“一个哲学家的话”就是康德的话。这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更不愉快的是：这甚至不能“单纯”用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来解释。

1904年，波格丹诺夫已经丢开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奥斯特瓦尔德，他写道：“……现代实证论认为因果律仅仅是从认识上把许多现象联结成连续系列的一种方法，仅仅是使经验协调的一种形式。”（《社会心理学》第207页）这种现代实证论就是不可知论，它否认在一切“认识”和一切人以前和以外存在着的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关于这一点，波格丹诺夫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知而不言。他完全相信德国教授们称为“现代实证论”的东西。最后，在1905年，当波格丹诺夫经过了上述几个阶段和经验批判主义阶段而处在“经验一元论”阶段时，他写道：“规律决不属于经验的范

围…… 规律不是在经验中得出的，而是思维创造出来用以组织经验、和谐地把经验协调成严整的统一体的一种手段。”（《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40页）“规律是认识的抽象；正如心理学的规律很少具有心理性质一样，物理学的规律很少具有物理性质。”（同上）

这么说来，秋去冬来，冬去春来的规律不是我们在经验中得出的，而是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手段，用以组织、协调、调合…… 波格丹诺夫同志，组织、协调、调合什么和什么呵？

“经验一元论之所以能成立，只是因为认识积极地协调经验，排除经验的无数矛盾，为经验创造普遍的组织形式，以派生的、有秩序的关系世界代替原始的、混乱的要素世界。”（第57页）这是不对的。似乎认识能够“创造”普遍的形式，能够以秩序代替原始的混乱等等，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就只能反映这个规律性。

总结：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盲目地相信“最新的”反动教授们，重复着康德和休谟在因果性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的错误，他们既看不到这些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即唯物主义）处于怎样的绝对矛盾中，也看不到这些学说在急转直下地滚向唯心主义。

四 “思维经济原则”和“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其他许多人用来作为认识论基础的‘费力最小’原则……无疑是认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巴札罗夫在《概论》第六十九页中就是这样讲的。

马克思的学说中有“经济”。马赫的学说中也有“经济”。二者之间真的是“无疑”有一丝联系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阿芬那留斯的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1876)是这样运用这个“原则”的：为了“思维经济”，宣布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的。也是为了思维经济，宣布因果性和“实体〈教授先生们“为了表示自己非同小可”，喜欢用这个名词来代替更确切明白的名词：物质〉都被废弃了”，也就是说，感觉成了没有物质的感觉，思想成了没有头脑的思想。这种十足的谬论是企图在新的伪装下偷运主观唯心主义。这部关于声名狼藉的“思维经济”问题的主要著作正具有这种性质，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哲学文献上已被公认。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没有看出藏在“新”幌子下的主观唯心主义，这倒是怪事。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第49页)里引证过他在1872年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著作。我们知道，这部著作也贯穿着纯粹主观主义的观点，把世界归结为感觉。可见，把这个著名“原则”引入哲学的这两部主要著作都贯穿着唯心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真的把思维经济原则当作“认识论的基础”，那末这个原则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不能导致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把这样荒谬的概念搬入认识论，那末不用说，“设想”只有我和我的感觉存在着，是最“经济”不过的了。

“设想”原子是不可分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原子是由阳电子和阴电子构成的“经济些”？设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自由派进行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它是反对自由派的“经济些”？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在这里使用“思维经济”这个范畴是荒谬的、主观主义的。人的思维在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而实践、实验、工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准绳。只有在否认客观实在，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情况下，才会一本正经地谈论认识论中的思维经济！

如果看一看马赫的晚期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对这个著名原则的说明往往是完全否定这个原则。例如，马赫在《热学》里又返回到他心爱的关于科学的“经济本性”的思想（德文第2版第366页）。但是，他立即就补充说，我们不是为经济而经济（第366页；第391页重述）：“科学经济的目的是提供一幅尽可能全面的……静止的……世界图景”（第366页）。既是这样，那末“经济原则”不仅离开了认识论的基础，而且实际上完全离开了认识论。说科学的目的是提供一幅正确的（这同静止毫无关系）世界图景，这就是重复唯物主义的论点。这样说，就是承认世界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是客观实在，模特儿对于画像来说是客观实在。就此看来，思维的经济性只不过是有一个笨拙的极其可笑的名词来代替正确性。马赫在这里，象平常一样，又弄糊涂了，而马赫主义者模仿并推崇糊涂思想！

在《认识和谬误》一书的《研究方法的实例》一章中，我们读到：

“基尔霍夫的全面而又极简单的记述（1874年），对真实事物的经济描写（马赫，1872年），‘思维和存在的符合以及各种思想过程的相互符合’（格腊斯曼，1844年），——这一切都大同小异地表现着同一个思想。”

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糊涂思想吗？竟把“思维经济”（马赫在1872年中推出只有感觉是存在着的，后来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同数学家格腊斯曼关于思维和存在必然相符合这一纯粹唯物主义的见解相提并论！竟把“思维经济”同对客观实在（基尔霍夫从未想到要怀疑它的存在）的极简单的记述相提并论！

这样运用“思维经济”原则不过是马赫的奇怪的哲学上的动摇不定的一个例子。如果除掉那些怪话或错误（lapsus），“思维经济

原则”的唯心主义性质就是很明显的了。例如,康德主义者赫尼格斯瓦尔德在和马赫进行哲学论战时,就称赞马赫的“经济原则”接近于“康德主义的思想领域”^①。事实上,如果不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那末“‘经济原则’不从主体中得出”,又从哪里得出呢?感觉当然是决不包含“经济”的。这就是说,思维提供一种在感觉中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说,“经济原则”不是从经验(=感觉)中得出的,而是在一切经验之前就存在着的,它象康德的范畴一样,构成经验的逻辑条件。赫尼格斯瓦尔德从《感觉的分析》一书中引用了下面一段话:“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本身的肉体均衡和精神均衡,推论出自然界一切过程的均衡、一义规定性和同类性。”(俄译本第281页)这种论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马赫跟谈论先验主义的彼得楚尔特的相近,的确都是毋庸置疑的。

唯心主义者冯特根据这个“思维经济原则”,很恰当地把马赫叫作“翻了一个面的康德”^②。在康德那里是先验和经验。在马赫那里则是经验和先验,因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实质上是先验的(第130页)。联系(Verknüpfung)或者作为“客观的自然规律(这是马赫坚决否认的)存在于物中,或者是主观的记述原则”(第130页)。马赫的经济原则是主观的,并且象可以具有各种意义的目的论原则一样,它 kommt wie aus der Pistole geschossen (不知道是从何处降到世上的)(第131页)。你们看,哲学术语的专家们并不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那样天真,凭空就肯相信一个“新”名词可以消除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英国哲学家华德。他干脆自称是唯灵论

① 理查·赫尼格斯瓦尔德博士《马赫哲学批判》(Dr. Richard Hönigswald. «Zur Kritik der Machschen Philosophie») 1903年柏林版第27页。

② 《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28页。

的一元论者。他不同马赫争论，相反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他利用物理学上的整个马赫主义潮流来反对唯物主义。他明确地说，马赫的“简便标准”“主要是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①。

思维经济原则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很合德国康德主义者和英国唯灵论者的心意，对于这一点，只要看过上述的一切，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至于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使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赫的认识论经济学靠拢起来，这真是滑稽的事情。

在这里略谈一下“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适宜的。在这个问题上，尤什凯维奇先生千百次明显地表现出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造成的那种极端混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反驳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时说道：“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三两句骗人的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第31页）¹³尤什凯维奇先生引用了这一段话并“加以反驳”：“这里首先不明白的是：‘世界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前引书第52页）

这不是挺有意思吗？这个人公开乱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的是声明自己“不明白”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恩格斯以杜林为例指出：稍微彻底一点的哲学，都会或者从思维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那样它就毫无力量反对唯灵论和信仰主义（《反杜林论》第30页）⁶⁶，它的论据也必然会是一些骗人的话，或者从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在认识论上早就叫作物质并且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跟一个“不明白”这种问题的

^① 《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第3版第1卷第82页。

人进行认真的讨论是毫无益处的，因为他在这里说“不明白”，是为了用骗人的话来规避对恩格斯的十分清楚的唯物主义原理作根本性的答复，同时他重复纯粹杜林式的谬论，说什么“关于存在的原则同类性和联系性的基本公设”（尤什凯维奇，前引书第51页），说什么公设就是“原理”，“如果认为原理是从经验中推出来的，那就不确切了，因为只有把原理作为研究的基础，才可能有科学的经验”（同上）。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个人只要对印刷文字稍加重视，就会看出下述思想一般说来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具体说来具有康德主义性质，这个思想就是：似乎有这样的原理，它们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而且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经验。从各种书籍中找来的、和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一些明显错误交织在一起的连篇累牍的空话，就是尤什凯维奇先生们的“哲学”。

我们最好看一看一位严肃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彼得楚尔特关于世界统一性问题的论断。他的《引论》第二卷第二十九节的题目是：《在认识领域中寻找均一性（*einheitlich*）的意图。一切事物的一义性的公设》。下面是他的几段典型的论断：“……只有在统一性中找得到这样的自然目的，任何思维都超不出这个目的，所以，如果思维估计到有关领域内的一切事实，那末它就能在这个目的内达到安定。”（第79页）“……自然界决不总是适应统一性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目前自然界在许多场合下已经满足着安定的要求，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根据我们过去的一切研究来看，应当认为极可能的是，将来自然界在一切场合下都会满足这个要求。因此，用倾向稳定状态来表示实际的精神状态要比用倾向统一性来表示更为确切…… 稳定状态的原则更深邃一些…… 海克尔建议把原始生物界同动物界和植物界并列，这是一种不适当的解决办法，因为它造成两种新困难来代替以前的一

种困难。以前是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界限有疑问，而现在既不能把原始生物同动物截然分开，又不能把原始生物同植物截然分开……很明显，这种状态不是最终的 (endgültig) 状态。无论如何必须消除概念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末用专家协商和服从多数的表决的方法也行。”(第 80—81 页)

看来已经够了吧？经验批判主义者彼得楚尔特一点也不比杜林好，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敌对者也应当公正：彼得楚尔特至少具有科学良心，他在每部著作中都毅然决然地批驳唯物主义这个哲学派别。至少他没有卑贱到装扮成唯物主义者，并且声明自己“不明白”基本哲学派别的最起码的差别。

五 空间和时间

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首先就和康德主义不同。康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在唯心主义方面的，它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人的直观形式。派别极不相同的著作家、稍微彻底一些的思想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根本的分歧。我们先从唯物主义者谈起。

费尔巴哈说道：“空间和时间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根本条件 (Wesensbedingungen)。”(《费尔巴哈全集》第 2 卷第 332 页) 费尔巴哈承认我们通过感觉认识到的感性世界是客观实在，自然也就否认现象论(如马赫会自称的)或不可知论(如恩格斯所说的)对空间和时间理解。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简单的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实在一样，空间

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恩格斯在揭发不彻底的糊涂的唯物主义者杜林时，抓住他的地方正是：他只谈时间概念的变化（这对于各种极不相同的哲学派别中的比较大的现代哲学家来说是无可争辩的问题），躲躲闪闪地不明确回答下面的问题：空间或时间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我们的相对的时空观念是不是接近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或者它们只是发展着的、组织起来的、协调起来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这就是而且唯有这才是真正划分根本哲学派别的认识论基本问题。恩格斯写道：“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就是说用概念的可变性这类词句〉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反杜林论》德文第5版第41页）⁶⁷

看来，这已经非常清楚，就连尤什凯维奇先生们也都能了解问题的本质吧？恩格斯提出了大家公认的、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十分明了的关于时间的现实性即时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原理来反驳杜林。他说，光凭谈论时空概念的变化是回避不了正面承认或否认这个原理的。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否认了对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变化和发展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科学意义，而是说，我们要彻底解决认识论问题，即关于整个人类知识的泉源和意义的问题。聪明一些的哲学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在说到唯心主义者的时候，指的是古

典哲学的天才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容易承认我们的时空概念是发展的,例如,认为发展着的时空概念接近于绝对的时空观念等等,但他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如果不坚决而肯定地承认我们的发展着的时空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时间和空间,不承认它们在这里也和在一一般场合一样接近于客观真理,那末就不可能把敌视一切信仰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到底。

恩格斯教训杜林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 and 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同上)

为什么恩格斯要在前半句话里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费尔巴哈的话,而在后半句话里提起费尔巴哈同有神论这种非常荒诞的事情所进行的胜利斗争呢?因为,从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同一章里可以看到,要是杜林不时而依恃世界的“终极原因”,时而依恃“第一次推动”(恩格斯说,这是神这个概念的另一种说法),他就不能够使自己的哲学自圆其说。杜林想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诚意大概不亚于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可是他没有能够彻底坚持那种确实可以把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荒诞事情的全部基础消灭掉的哲学观点。既然杜林不承认,至少不是明确地承认(因为杜林在这个问题上动摇的、糊涂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他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一直滚到“终极原因”和“第一次推动”中去,因为他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如果时间和空间只是概念,那末创造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拥护中世纪的“荒诞事情”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

恩格斯曾经向杜林指出,否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在理

论上就是糊涂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上就是向信仰主义投降或对它束手无策。

现在看一看“最新实证论”有关这个问题的“学说”吧！在马赫的著作里，我们读到：“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或者协调了的，wohlgeordnete）体系。”（《力学》德文第3版第498页）这是很明显的唯心主义谬论，它是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个学说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是具有感觉的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而是空间和时间存在于人里面，依赖于人，为人所产生。这就是从马赫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马赫感到自己要滚入唯心主义了，于是就“抵抗”，提出一大堆保留条件，并且象杜林一样使问题淹没在关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相对性等等冗长的议论中（着重参看《认识 and 谬误》）。但是，这没有挽救他，而且也挽救不了他，因为只有承认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才能真正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这是马赫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干的。他根据相对主义的原理建立时间和空间的认识论，仅此而已。实质上，这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我们在谈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

马赫为了抵抗从他的前提中必然得出的唯心主义结论，便反驳康德，坚持说空间概念起源于经验（《认识 and 谬误》德文第2版第350、385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经验中感知客观实在（象马赫说的那样），那末这样反驳康德就一点也没有抛弃康德和马赫所共有的不可知论的立场。如果空间概念是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然而它不是我们以外的客观实在的反映，那末马赫的理论仍旧是唯心主义的。在人和人的经验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于以百万年计算的时间中，这一点就证明这种唯心主义理论是荒谬的。

马赫写道：“在生理学方面，时间和空间是判定方位的感觉，它

们同感性的感觉一起决定着生物机体合目的的适应反应的发出 (Auslösung)。在物理学方面,时间和空间是物理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同上,第 434 页)

相对主义者马赫只限于从各个方面考察时间概念!他也象杜林一样踏步不前。如果“要素”是感觉,那末物理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不能存在于人以外、人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如果说时间和空间的感覺能够使人这个生物机体合目的地判定方位,那也只有在这些感觉反映了人以外的客观实在的条件下才能作到,因为,假如人的感觉没有使人对环境具有客观的正确观念,人这个生物机体就不能适应环境。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说是同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感觉是物体和物的映象呢,还是物体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马赫只是在这两种解答之间无所适从。

马赫说道,在现代物理学中保持着牛顿对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观点(第 442—444 页),即保持着对本来的时间和空间的观点。他接着说,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唯物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观点是无害的 (unschädlich) (第 442 页),因而它在长时期内没有受到批判。

唯物主义观点是无害的,这种天真的说法使马赫露出了马脚!首先,说唯心主义者“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批判这种观点,是不确实的;马赫只是忽视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他回避直率而清楚地叙述这两种观点。其次,马赫承认他所反驳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无害”的,实质上也就是承认它们是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东西怎么能够在许多世纪以来都是无害的呢?马赫曾经向之递送秋波的实践标准到哪儿去了?唯物主义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之所以是“无害的”，只是因为自然科学没有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没有超出物质世界的界限，而把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这件事让给反动哲学的教授们去作了。这种“无害”也就是正确。

“有害的”是马赫对空间和时间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第一，它向信仰主义敞开了大门；第二，它引诱马赫本人作出反动的结论。例如，马赫在1872年写道：“不必去设想化学元素是在三维空间中的。”^①这样作，就是“作茧自缚。正如没有任何必要从音调的一定高度上去设想纯粹思维的东西(das bloß Gedachte)一样，也没有任何必要从空间即从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上去设想纯粹思维的东西”(第27页)。“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令人满意的电学理论，这也许是由于始终想以三维空间的分子过程来说明电的现象的缘故。”(第30页)

根据马赫在1872年为之公开申辩的那种露骨的不混乱的马赫主义观点，毋庸置疑地会作出如下的论断：如果人们感觉不到分子和原子，一句话，感觉不到化学元素，那末，这就是说化学元素“仅仅是纯粹思维的东西(das bloß Gedachte)”。既然如此，既然空间和时间没有客观实在的意义，那末很明显，大可不必去设想原子是占有空间的！让物理学和化学以物质在其中运动的三维空间来“自缚”吧，——可是为了说明电，却可以在非三维空间中寻找它的元素！

尽管马赫在1906年重述过这个谬论(《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418页)，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不这样，他们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唯物主义和唯

① 《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第29页，第55页重述。

心主义对空间的看法问题,不能有任何狡辩,任何“调和”这个对立的企图。同样地,在七十年代,当马赫还没有成名,甚至“正统派的物理学家”都拒绝刊登他的论文的时候,内在论学派的首领之一莱克列尔就不遗余力地抓住马赫的这个论断,说它出色地否认了唯物主义,承认了唯心主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莱克列尔还没有发明或者说还没有从舒佩、舒贝特-索尔登或雷姆克那里剽窃到“内在论学派”这个“新的”称号,而是坦率地自称为批判唯心主义者^①。这位信仰主义的毫不掩饰的维护者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公开宣传着信仰主义,他一看到马赫的那些话,就立刻宣称马赫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最好的革命者”(第252页);他这样作是完全对的。马赫的论断是从自然科学阵营向信仰主义阵营的转移。不论在1872年或在1906年,自然科学都曾经在三维空间中探求,而且现在还在探求和发现(至少在摸索)电的原子即电子。自然科学毫不怀疑它所研究的物质只存在于三维空间中,因而这个物质的粒子虽然小到我们不能看见,也“必定”存在于那个三维空间中。从1872年起,三十多年来科学在物质构造问题上获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唯物主义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一直是“无害的”,也就是说跟过去一样,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而马赫及其伙伴们所持的相反的看法却是对信仰主义的“有害的”投降。

马赫在他的《力学》里维护那些研究设想出来的 n 维空间问题的数学家,使他们不致于因为研究出“怪异的”结论而遭到谴责。这种维护无疑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请看一看马赫是站在什么样的认

① 安东·冯·莱克列尔《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Anton von Leclair, «Der Realismus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 im Lichte der von Berkeley und Kant angebahnten Erkenntniskritik») 1879年布拉格版。

识论立场上维护他们的。马赫说道，现代数学提出了设想出来的 n 维空间这个十分重要而有用的问题，可是只有三维空间才是“现实的”(ein wirklicher Fall) (第3版第483—485页)。因此，“由于不知道把地狱安放在什么地方而感到为难的许多神学家”以及一些降神术者想从第四维空间得到好处，那是白费心思(同上)。

很好！马赫不愿意加入神学家和降神术者的队伍。但是他在自己的认识论中用什么来和他们划清界限呢？用的是：只有三维空间才是现实的！如果你不承认空间和时间是客观实在，那怎么能反驳神学家及其伙伴们呢？原来，当你需要摆脱降神术者的时候，你就采用不声不响地剽窃唯物主义的方法。因为，唯物主义者既然承认现实世界、我们感觉到的物质是客观实在，也就有根据得出结论说，任何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人类臆想，不管它的目的怎样，都不是现实的。而你们呢，马赫主义者先生们，当你们和唯物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就否认客观实在是“现实”，可是当你们要同彻底的、始终无畏的、公开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又偷运这个客观实在！如果在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的概念里除了相对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如果这些相对的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既不依存于个别人，也不依存于全人类的实在)是不存在的，那末为什么人类，为什么人类的大多数不能有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的概念呢？如果马赫有权在三维空间以外探求电的原子或一般原子，那末为什么人类的大多数无权在三维空间以外探求原子或道德基础呢？

马赫在同一本书中写道：“还没有过借助第四维来接生的产科大夫。”

绝妙的论据，但是，只有对那些认为实践是证实客观真理、证实我们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标准的人们来说，才是绝妙的论

据。如果我们的感觉给我们提供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客观真实的映象，那末这种援引产科大夫、援引整个人类实践的论据是适用的。但是，整个马赫主义这个哲学派别就毫不中用了。

马赫在提到自己 1872 年的著作时继续说道：“我希望没有人会用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和所写的东西替任何鬼神之说辩护（*die Kosten einer Spukgeschichte bestreiten*）。”

不能希望拿破仑不是死于 1821 年 5 月 5 日。当马赫主义已经为内在论者服务而且还在服务的时候，不能希望它不为“鬼神之说”服务！

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马赫主义还不只是替内在论者服务。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请看一看这个哲学流派的法国代表和英国代表吧！他们不大象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代表那样矫饰。彭加勒说，时空概念是相对的，因而（对于非唯物主义者来说的确是“因而”）“不是自然界把它们〈这些概念〉给予〈impose, 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它们给予自然界，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方便的”（前引书第 6 页）。这不是说明了德国康德主义者应当兴高采烈吗？这不是证实了恩格斯的话吗？恩格斯说，彻底的哲学学说必须或者把自然界当作第一性的，或者把人的思维当作第一性的。

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的见解是十分肯定的。他说道：“我们不能断定空间和时间是真实的存在；它们不是存在于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感知物的方式（*our mode*）中。”（前引书第 184 页）这是毫不掩饰的唯心主义。“时间象空间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这部伟大的分类机器用来整理（*arranges*）它的材料的方式〈*plans*, 直译：方案〉之一。”（同上）毕尔生的最后结论（照常是用确切明白的提纲形式叙述的）如下：“空间和时间不是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 的实在性,而是我们用以感知物的方式(样式, modes)。它们既不是无限大的,也不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按其本质来说(essentially),它们是受我们知觉的内容限制的。”(第191页,第5章中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结论)

唯物主义的这位认真而诚挚的敌人毕尔生(我们再重复一遍,马赫一再表示他和毕尔生完全一致,而毕尔生也公开地说他和马赫一致)没有给自己的哲学另造特别的招牌,而是毫不隐讳地说出他的哲学路线渊源于两位古典哲学家:休谟和康德(第192页)!

在俄国居然有一些天真的人相信马赫主义在空间和时间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解答,而在英国的文献里则可以看到,自然科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对马赫主义者毕尔生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例如,请看生物学家劳·摩尔根批评:“自然科学本身认为现象世界是存在于观察者的心以外的,是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心的”,而毕尔生教授则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的^①。“依我看来,作为科学的自然科学有充分根据来说明空间和时间是纯粹客观的范畴。我认为,生物学家有权研究有机体在空间的分布,地质学家有权研究有机体在时间上的分布,而不必向读者解释,这里讲的只是感性知觉、积累起来的感性知觉、知觉的某些形式。也许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可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却是不适当的。”(第304页)劳·摩尔根是恩格斯叫作“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的那种不可知论的代表,不管这种哲学具有怎样的“调和”倾向,可是要把毕尔生的观点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毕竟是不可能的。另一位批评家^②说道,毕尔生“起初认为心存在于空间中,后来又认为空间

① 《自然科学》杂志⁶⁸第1卷(1892)第300页。

② 本特利论毕尔生,载于《哲学评论》杂志⁶⁹第6卷(1897)第5期9月号第523页。

存在于心中”。毕尔生的拥护者莱尔(R. J. Ryle)回答道：“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空学说，是从贝克莱主教以来关于人类认识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肯定的成就，这是不容怀疑的。毕尔生的《科学入门》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也许是第一次在英国学者的著作里看到对康德学说的基本真理的完全承认，对康德学说所作的简短而明晰的说明……”^①

可见，在英国，无论是马赫主义者自己，或者是自然科学家营垒中反对他们的人，或者是哲学专家营垒中拥护他们的人，都丝毫没有怀疑马赫关于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学说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看不出”这一点的只有几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著作家。

例如，巴札罗夫在《概论》第六十七页上写道：“恩格斯的许多个别观点，比方说，他关于‘纯粹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现在已经陈旧了。”

当然啦！唯物主义者恩格斯的观点陈旧了，而唯心主义者毕尔生和糊涂的唯心主义者马赫的观点是最新的！这里最怪的是巴札罗夫居然毫不怀疑，对于空间和时间的看法（就是承认或否定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可以归入“个别观点”，而和这位著作家在下一句话里所说的“世界观的出发点”相对立。这就是恩格斯在谈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哲学时常说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的一个鲜明例子。因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同他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个“个别观点”对立起来，就象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同他关于剩余价值这个“个别观点”对立起来一样，是荒谬绝伦的。把恩格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同他关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的

^① 雷·约·莱尔论毕尔生，载于《自然科学》杂志 1892 年 8 月号第 454 页。

学说分开来，同他对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承认（就是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分开来，同他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承认分开来，这就等于把完整的哲学变为杂烩。巴札罗夫象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糊涂，他把人类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即这些概念具有的纯粹相对的性质）同下列事实的不变性混淆起来；这个事实就是：人和自然界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以内，僧侣们所创造的、为无知而又受压制的群众的臆想所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是一种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物。关于物质的构造、食物的化学成分、原子和电子的科学学说会陈旧，并且正在日益陈旧；但是，人不能拿思想当饭吃、不能单靠精神恋爱生育孩子这一真理是不会陈旧的。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正如否定上述真理一样，是荒诞的、内部腐朽的、虚伪的。正如伪君子宣传精神恋爱一样，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花样整个说来是伪善的！

为了举例说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相对性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在这个问题上的绝对的（在认识论范围内）对立二者之间的差别，我还要引证一位很老的而且是十足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即休谟主义者舒尔兹-埃奈西德穆在1792年写的一段有代表性的话：

“如果从表象推论出‘我们之外的物’，那末，空间和时间就是某种在我们以外的实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着的的东西，因为只能想象物体存在于现存的(vorhandenen)空间中，只能想象变化存在于现存的时间中。”(前引书第100页)

一点也不错！休谟的追随者舒尔兹虽然坚决地批驳唯物主义并且丝毫不向它让步，但是他在1792年对空间和时间问题同在我们以外的客观实在问题的关系所作的描述，正好和唯物主义者

恩格斯在 1894 年对这种关系所作的描述相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最后一篇序言上注明的日期是 1894 年 5 月 23 日）。这并不是说，一百年来，我们的时空观念没有改变，没有收集大量有关这些观念的发展的新材料（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切尔诺夫和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瓦连廷诺夫在所谓驳斥恩格斯的时候所提到的材料），这是说，不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卖弄什么“新”名称，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除了“新”名称，波格丹诺夫也没有给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旧哲学增添任何东西。当他重复赫林和马赫关于生理学空间和几何学空间的差别或者感性知觉的空间和抽象空间的差别的论述时（《经验一元论》第 1 卷第 26 页），他完全是在重复杜林的错误。人怎样依靠各种感觉器官感知空间，抽象的空间概念怎样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从这些知觉中形成起来，这是一个问题；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实在同人类的这些知觉和这些概念是否符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后一个问题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但是波格丹诺夫由于对前一个问题进行了很多详尽的研究而“忽视了”它，所以他没有能够明确地把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马赫的糊涂观念对立起来。

时间象空间一样，“是各种人的经验的社会一致的形式”（同上，第 34 页），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具有普遍意义”（同上）。

这完全是骗人的话。宗教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它表现出大部分人类的经验的社会一致。但是，任何客观实在都不和宗教的教义（例如，关于地球的去和世界的创造的教义）相符合。地球存在于任何社会出现以前、人类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对其他行星说来）空间内。客观实在和这种科学学说（虽然，象宗教发展的每一阶段是相对的一

样,它在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也是相对的)是相符合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空间和时间的各种形式适应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认识正日益适应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日益正确而深刻地反映它们。

六 自由和必然

卢那察尔斯基在《概论》第一四〇页至一四一页上引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且完全同意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惊人的一页”^①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异常明晰确切的”评述。

这里的确有很多惊人的地方。而最“惊人的”是:无论卢那察尔斯基,或者其他一群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都“没有看出”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他们读也读过,抄也抄过,可是什么都不了解。

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且根据这种认识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我们的观念中而决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

^① 卢那察尔斯基说,“……宗教经济学的惊人的一页。我这样说,不免会引起不信教的读者的微笑。”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不管你的用意多么好,你对宗教的诋毁所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⁷⁰。

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 and 外部自然界……”（德文第5版第112—113页）⁷¹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整段论述是以哪些认识论的前提为根据的。

第一，恩格斯在他的论述中一开始就承认自然规律、外部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就是说，承认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叫作“形而上学”的一切东西。如果卢那察尔斯基愿意好好地想一想恩格斯的“惊人的”论述，就不可能不看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后二者否认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宣称它只是“逻辑的”规律性等等。

第二，恩格斯没有生造自由和必然的“定义”，即反动教授（如阿芬那留斯）和他们的门徒（如波格丹诺夫）所最感兴趣的那些经院式的定义。恩格斯一方面考察人的认识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考察自然界的必然性；他没有提出任何定义，只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恩格斯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无须多费唇舌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会不满意恩格斯给唯物主义所下的一般定义（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请回想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的“困惑莫解”！），同时又认为恩格斯对这个一般的基本的定义的一个个别应用是“惊人的”，是“异常确切的”！

第三，恩格斯并不怀疑有“盲目的必然性”。他承认有尚未被人认识的必然性。这从上面所引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从马赫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人怎么能够知道他所不知道

的东西是存在的呢？怎么能够知道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是存在的呢？这难道不是“神秘主义”，不是“形而上学”，不是承认“物神”和“偶像”，不是“康德主义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吗？如果马赫主义者细想一下，他们就不会看不出，恩格斯关于物的客观性质的可知性和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点，同他关于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每一个个人的意识的发展和全人类的集体知识的发展在每一步上都表明：尚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自在的必然性”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人完全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但是永远不能够彻底地认识它们。我们不知道气象中的自然界的必然性，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气候的奴隶。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必然性，我们却知道它是存在的。这种知识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它同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这种知识同出一源，就是说，从我们知识的发展中得来的。我们知识的发展千百万次地告诉每一个人，当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时候，不知就变为知，相反地，当这种作用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知就转化为不知。

第四，在上面所引的论述中，恩格斯显然运用了哲学上“获生的跳跃”方法，就是说，作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追随的那些博学的（和愚蠢的）哲学教授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容许自己作出这种对“纯科学”的代表说来是可耻的跳跃。对他们说来，要想尽办法狡猾地用文字来捏造“定义”的认识论是一回事，而实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

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结论是什么呢？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每一步骤，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建立在正面打击马赫主义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关于“要素”、关于“感性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一致”等等一切胡说的那些前提上的。马赫主义者对这些满不在乎，他们抛弃唯物主义，重复着（象别尔曼那样）关于辩证法的陈腐的混话，同时又热烈地欢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应用！他们从折衷主义残羹剩汁里获得自己的哲学，并且继续用这种东西款待读者。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它们混合起来，于是含糊糊地说这种杂烩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以及他们的其他一切权威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自由和必然）丝毫不了解，那完全是偶然的事情，那不过是他们没有读过某一本书的某一页罢了，决不是因为这些“权威”过去和现在对十九世纪哲学的真正的进步完全无知，决不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哲学上的蒙昧主义者。

请看这种蒙昧主义者之一、维也纳大学最正式的哲学教授马赫的论述：

“决定论的立场正确还是非决定论的立场正确，这是无法证明的。只有至善至美的科学或者证明其不可能有的科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在考察事物时使用(man heranbringt)什么样的前提，因为我们使用的前提根据我们是否认为以往研究的成败中含有相当大的主观成分(subjektives Gewicht)而不同。但是在进行研究时，每个思想家在理论上必然是一个决定论者。”(《认识 and 谬误》德文第2版第282—283页)

用心地把纯粹的理论同实践割裂开来，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把决定论局限于“研究”的领域，而在道德、社会活动的领域中，在除开“研究”以外的其他一切领域中，问题则由“主观的”评定来解决，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这位博学的学士说，我在书房里是一个决定论者；可是，关于哲学家要关心建立在决定论上的、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世界观这一点，却丝毫没有谈到。马赫之所以胡说，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完全不明白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

“……每一个新发现都暴露了我们知识的不足，都显示出至今尚未被看出的依赖性残余……”(第283页)妙极了！这个“残余”就是我们的认识日益深刻反映的“自在之物”吗？完全不是这样：“……由此可见，在理论上拥护极端的决定论的人，在实践上必定仍旧是一个非决定论者……”(第283页)瞧，分配得多好^①：理论是教授们的事，实践是神学家们的事！或者：理论上是客观主义(即“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实践上是“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俄国的小市民思想家，民粹派，从列谢维奇到切尔诺夫，都同情这

^① 马赫在《力学》中说道：“人们的宗教见解纯属私人的事情，只要他们不想强迫别人相信它们，不把它们应用到属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上去。”(法译本第434页)

种庸俗的哲学，这是不足为奇的。至于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迷恋这样的胡说，羞羞答答地掩饰马赫的特别荒谬的结论，这就是十分可悲的了。

但是在意志问题上，马赫没有停留在糊涂思想和不彻底的不可知论上，而是走得更远了……我们在《力学》一书中读到：“我们的饥饿感觉同硫酸对锌的亲合力本质上没有差别，我们的意志同石头对它的垫基的压力也没有多大差别。”“这样（就是说，抱这种观点）就发现我们更接近自然界，而不需要把人分解成一堆不可理解的云雾似的原子，或者使世界成为精神结合物的体系。”（法译本第434页）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唯物主义（“云雾似的原子”或电子，即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了，也不需要那种承认世界是精神的“异在”的唯心主义了。但是承认世界就是意志的唯心主义还是可以有的！我们不仅超出唯物主义，而且超出“某一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我们不妨向叔本华之流的唯心主义打情骂俏！只要有人一提到马赫接近哲学唯心主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就装出一副无辜受辱的样子，可是又认为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最好来个默不作声。但实际上，在哲学文献中，很难找到一篇叙述马赫观点的文章不指出他倾向于意志的形而上学（Willensmetaphysik），即倾向于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包曼指出了这一点^①，而对包曼进行驳斥的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也没有反驳这一点，反而说，马赫当然“接近康德和贝克莱基于接近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经验论”（即自发的唯物主义；同上，第6卷第87页）。贝歇尔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马赫在一些地方承认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在另一些地方又否认它，这只是证明他用语随便；事实

^① 《系统哲学文库》杂志第2部第4卷（1898）第63页，关于马赫的哲学观点的论文。

上马赫无疑是接近于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的^①。路加也承认有这种形而上学(即唯心主义)和“现象学”(即不可知论)的混合物^②。冯特也指出了这一点^③。宇伯威格—海因泽的近代哲学史教程也断定,马赫是一位“并非同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无关的”现象论者^④。

总而言之,除了俄国马赫主义者,谁都很清楚马赫的折衷主义和他的唯心主义倾向。

① 埃利希·贝歇尔《恩·马赫的哲学观点》(Erich Becher,《The Philosophical Views of E. Mach》),载于《哲学评论》杂志第14卷(1905)第5期第536、546、547、548页。

② 艾·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载于《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1903)第400页。

③ 《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31页。

④ 《哲学史概论》(《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903年柏林第9版第4卷第250页。

第四章

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哲学唯心主义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孤立地研究经验批判主义。现在我们应该看一看它的历史发展，看一看它同其他哲学派别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对康德的关系问题。

一 从左边和从右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于哲学舞台的，当时德国教授中间的时髦口号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两位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在哲学上的发展正是从康德那里出发的。马赫写道：“我应当万分感激地承认，正是他的〈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作了我的全部批判思维的出发点。但是我没有能够始终忠实于它。我很快又回到贝克莱的观点上来了”，后来“又得出了和休谟的观点相近的观点……现在我还是承认贝克莱和休谟是比康德彻底得多的思想家”（《感觉的分析》第292页）。

可见，马赫完全肯定地承认，他是从康德开始的，以后走上了贝克莱和休谟的路线。再看一看阿芬那留斯吧。

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纯粹经验批判〉绪论》（1876）一书的序言里就已指出：《纯粹经验批判》这几个字表明了他对康德的《纯粹理

性批判》的态度，“而且当然是”对康德采取“对立的态度”（1876年版序言第4页）。阿芬那留斯在什么问题上和康德对立呢？在阿芬那留斯看来，康德没有充分地“清洗经验”。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绪论》^①（第56、72及其他许多节）里论述的就是这种“对经验的清洗”。阿芬那留斯要“清洗掉”康德的经验学说中的什么东西呢？首先是先验主义。他在第五十六节里说道：“关于是否应当从经验的内容中排除多余的‘理性的先验概念’，从而主要造成纯粹经验的问题，据我所知，是第一次在这里提出来的。”我们已经看到，阿芬那留斯就是这样“清洗掉”康德主义对必然性和因果性的承认。

其次，阿芬那留斯要清洗掉康德主义对实体的承认（第95节），即对自在之物的承认，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自在之物“不是存在于现实经验的材料中，而是由思维输送到这种材料中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阿芬那留斯给自己的哲学路线所下的定义和马赫的定义完全一致，不同的只是在表达上过于矫揉造作。但是首先必须指出：阿芬那留斯说他在1876年第一次提出了“清洗经验”的问题，即清洗掉康德学说中的先验主义和对自在之物的承认的问题，这完全是撒谎。事实上，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紧跟着康德之后就产生了对康德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阿芬那留斯的批判正好是同一方向。在德国古典哲学里，这种方向的代表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信徒舒尔兹-埃奈西德穆和贝克莱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信徒费希特。1792年舒尔兹-埃奈西德穆批判过康德，就是因为康德承认先验主义（前引书第56、141及其他许多页）和自在之物。舒尔兹说道，我们这些怀疑论者或休谟的信徒摒弃超出“一切经验界限”的自在之物（第57页）。我们摒弃客观

^① 即《〈纯粹经验批判〉绪论》。——编者注

的知识(第25页);我们否认空间和时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第100页);我们否认在经验中有必然性(第112页)、因果性、力,等等(第113页)。决不能认为它们具有“在我们表象以外的实在性”(第114页)。康德“独断地”证明先验性;他说,既然我们不能用别的方法来思维,那就是说先验的思维规律是存在的。舒尔兹回答康德说:“这个论据在哲学上老早就被用来证明存在于我们表象以外的东西的客观性质了。”(第141页)这样推论下去,就会认为自在之物具有因果性(第142页)。“经验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wir erfahren niemals),客观对象作用于我们就产生表象。”并且康德完全没有证明:“为什么必须承认这种存在于我们理性以外的东西就是不同于我们的感觉(Gemüt)的自在之物。感觉可以被设想为我们全部认识的唯一基础。”(第265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把任何认识都开始于客观对象对我们感觉(Gemüt)器官的作用这一前提作为其论断的基础,可是后来它又否认这个前提的真理性和实在性”(第266页)。康德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驳倒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第268—272页)。

由此可见,休谟主义者舒尔兹摒弃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学说,认为它对唯物主义作了不彻底的让步,因为唯物主义“独断地”断言: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表象是由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意识的)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不可知论者舒尔兹责备不可知论者康德,因为康德对自在之物的承认是和不可知论相矛盾的,并且会导向唯物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也这样批判康德,不过更坚决些。他说,康德承认不依存于我们的自我的自在之物,这是“实在论”(《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83页);康德“没有明确地”把“实在论”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费希特认为康德和康德主义者最不彻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

承认自在之物是“客观实在的基础”（第 480 页），因此他们便陷入和批判唯心主义相矛盾的境地。费希特向那些用实在论解释康德的人们大叫道：“在你们看来，地在象上，象在地上。你们的自在之物只不过是思想而已，但却作用于我们的自我！”（第 483 页）

可见，阿芬那留斯以为他“第一次”从康德的“经验中清洗掉”先验主义和自在之物，从而创立了哲学上的“新”派别，那是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他继续着休谟和贝克莱、舒尔兹-埃奈西德穆和费希特的旧路线。阿芬那留斯以为他在全面地“清洗经验”。事实上他只是把不可知论中的康德主义清洗掉了。他不是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就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而是主张更纯粹的不可知论，主张排除康德的那个和不可知论相矛盾的假定：自在之物尽管是不可认识的、心智的、彼岸的，总还是存在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尽管是先验的，是存在于思维中而不是存在于客观现实中的，总还是存在的。他不象唯物主义者那样从左边同康德进行斗争，而是象怀疑论者和唯心主义者那样从右边同康德进行斗争。他自以为前进了，实际上他后退了，退到费舍在谈到舒尔兹-埃奈西德穆时曾确切地表述过的批判康德的纲领上去了。费舍说：“剔除纯粹理性（即先验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怀疑论。剔除自在之物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近代哲学史》1869 年德文版第 5 卷第 115 页）

现在我们接触了整个“马赫狂”（即俄国马赫主义者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整个进攻）的最有趣的插曲之一。波格丹诺夫和巴札罗夫、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用种种不同的调子竭力吹嘘的最新发现就是：普列汉诺夫作了一次“倒霉的尝试，想用妥协的、勉强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来调和恩格斯和康德的学说”（《概论》^① 第 67

^① 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编者注

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这个发现向我们暴露出，他们的思想真是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对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发展过程的无知真是达到极其惊人的地步。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此外，不可知论者抛弃了自在之物，也抛弃了先验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则要求不仅从纯粹思想中彻底地引出先验的直观形式，而且彻底地引出整个世界（把人的思维扩张为抽象的自我或“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没有发觉”自己是把那些从怀疑论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人们奉为老师的，因而看见一些怪人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康德，驳斥康德体系中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唯心主义的因素，证明自在之物是客观实在的、完全可以认识的、此岸的，证明它同现

象没有原则的差别并且随着个人意识和人类集体意识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转化为现象，他们就悲观失望，不胜伤感。他们喊叫道：天呀！这是把唯物主义和康德主义生拉活扯地混合起来了呀！

当我读到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要人家相信他们对康德的批判比任何老朽的唯物主义者彻底得多、坚决得多的时候，我总觉得好象普利什凯维奇走进了我们中间，他大喊大叫：我对立宪民主党人⁶的批判要比你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彻底得多、坚决得多！当然啦，普利什凯维奇先生，政治上彻底的人们能够而且永远会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立宪民主党人，可是毕竟不应该忘记：你们批判立宪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是过火的民主派，而我们批判立宪民主党人，却是因为他们是不彻底的民主派。马赫主义者批判康德，是因为他是过火的唯物主义者，而我们批判康德，却是因为他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而我们从左边批判康德。

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休谟主义者舒尔兹和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是前一种批判的典型。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极力排除康德主义的“实在论”因素。正如舒尔兹和费希特批判康德本人那样，休谟主义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内在论者也批判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者。休谟和贝克莱的那条路线用新词句略微改扮一下又出现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对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实在、不够唯物，而是因为他承认有自在之物；不是因为他拒绝从客观现实中引出自然界的因果性和必然性，而是因为他一般地承认任何因果性和必然性（除了纯粹“逻辑的”因果性和必然性）。内在论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步调是一致的，他们也从休谟和贝克莱的观点去批判康德。例如，1879年莱克列尔就在他那本吹捧马赫是位卓绝的哲学家的著作中谴责

康德,说他“不彻底并顺从(Connivenz)实在论”,这表现在“庸俗实在论的名词残渣(Residuum)”,即“自在之物”这个概念上^①。为了说得“更厉害些”,莱克列尔把唯物主义叫作庸俗实在论。莱克列尔写道:“我们认为应当把康德理论中一切倾向于庸俗实在论(realismus vulgaris)的组成部分都除掉,因为在唯心主义看来,它们是不彻底的,是杂种的(zwitterhaft)产物。”(第41页)康德学说中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是因“唯心主义的批判主义和实在论的独断主义的未被排除的残渣混合起来(Verquickung)”而产生的(第170页)。莱克列尔把唯物主义叫作实在论的独断主义。

另一位内在论者雷姆克也谴责康德,说他用自在之物在自己和贝克莱之间筑起一个实在论的屏障^②。“康德的哲学活动实质上具有论战的性质:他通过自在之物使自己的哲学和德国的唯理论对立(即和十八世纪的旧信仰主义对立),通过纯粹的直观和英国的经验论对立。”(第25页)“我想把康德的自在之物比作一个安置在陷阱上面的活动机关,这个小东西看起来是不伤人的,是没有危险的,可是你一踩上去,就会意外地掉进自在世界的深渊。”(第27页)原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战友内在论者不喜欢康德,是因为康德在某些方面接近唯物主义的“深渊”!

现在请看几个从左边批判康德的典型。费尔巴哈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的“实在论”,而是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把康德的体系叫作“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上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296页)。

请看费尔巴哈对康德所作的特别重要的评论:“康德说:‘如果

① 《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第9页。

② 约翰·雷姆克《世界是知觉和概念》(Johannes Rehmke. «Die Welt als Wahrnehmung und Begriff») 1880年柏林版第9页。

我们把感觉的对象看作是单纯的现象(我们应当这样看),那我们就是承认这些现象的基础是自在之物,虽然我们只知道它的现象,就是说,只知道这个未知物用来影响(affiziert)我们感官的那个方式,而不知道这个自在之物本身是怎样构成的。所以,我们的理性由于承认现象的存在,也就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可以说,设想这种作为现象基础的本质(即仅仅是想象的本质),不但是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费尔巴哈从康德的文章中选出这样一段话来加以批判。康德在这一段话里认为自在之物不过是想象的物,即想象的本质,而不是实在。费尔巴哈说道:"……因此,感觉的对象、经验的对象,对于理性说来只是现象,而不是真理……要知道,想象的本质对理性说来并不是现实的客体!康德哲学是主体和客体、本质和实存、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本质归于理性,实存归于感觉。没有本质的实存(即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现象的实存)是单纯的现象,即是感性实物;没有实存的本质,是想象的本质、本体;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思索它们,可是它们缺少实存(至少对我们说来是这样),缺少客观性;它们是自在之物,是真正的物,但是它们不是现实的物……使真理和现实分开,使现实和真理分开,这是多么矛盾呵!"(《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02—303页)费尔巴哈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承认自在之物,而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在之物的现实性(即客观实在性),因为他认为自在之物是单纯的思想、“想象的本质”,而不是“具有实存的本质”(即实在的、真实存在的本质)。费尔巴哈谴责康德,是因为他离开了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在1858年3月26日给波林的信中写道:“康德哲学是一种矛盾;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或感觉论”;前一个结论“是属于过去的”,后一个结论“是属于现在和将来的”

(格律恩,前引书第2卷第49页)。我们已经看到,费尔巴哈是拥护客观的感觉论(即唯物主义)的。从康德那里再转到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转到休谟和贝克莱那里,即使在费尔巴哈看来,也无疑是反动的。费尔巴哈的热忱的信徒阿·劳(他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优点,也接受了费尔巴哈的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缺点),完全按照他的老师的精神去批判康德:“康德哲学是有两面性的(模棱两可的)。它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理解康德哲学实质的关键就在于它的这种二重性。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或经验论者,康德不能不承认存在(Wesenheit)是在我们之外的物。可是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不能摆脱这种偏见:灵魂是某种和感性实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存在着现实的物和理解这些物的人的精神。这个精神是怎样接近和它完全不同的物呢?康德托辞如下:精神具有某些先验的认识,借助这些认识,物必定象显现给精神那样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按照自己对物的理解去理解物,可说是我们的创造。因为生存在我们身体内的精神不外是神的精神,并且象神从无中创造出世界那样,人的精神也从物中创造出一种并非物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这样,康德便保证了现实的物作为‘自在之物’而存在。康德需要灵魂,因为在他看来,灵魂不灭是道德的基本前提。先生们(这是阿·劳对新康德主义者,特别是对伪造《唯物主义史》的糊涂虫胡格说的),‘自在之物’是区分康德的唯心主义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它架起了一座从唯心主义通向唯物主义的桥梁。这就是我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谁能驳斥这个批判,就请驳斥吧……对唯物主义者说来,把先验的认识和‘自在之物’区别开来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唯物主义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自然界中的经常联系割断,都没有把物质和精神看作彼此根本不同的东西,而是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东西的两个方面,因此不需

要用什么特别巧妙的方法来使精神接近物。”^①

其次，我们看到，恩格斯谴责康德，是因为康德是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因为他离开了彻底的不可知论。恩格斯的学生拉法格在1900年曾这样反驳康德主义者（当时拉波波特也在内）：

“……在十九世纪初期，我们的资产阶级结束了革命性的破坏事业之后，便开始否弃他们的伏尔泰主义哲学。被沙多勃利昂涂上了(peinturlurait)浪漫主义色彩的天主教又行时了；百科全书派的宣传家们被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为了彻底击溃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迈尔西埃输入了康德的唯心主义。

“在历史上将被称为资产阶级世纪的十九世纪末期，知识分子企图借助康德哲学来粉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这个反动的运动开始于德国——这样说并不是想冒犯我们那些想把一切荣誉都归于自己学派的创立者马隆的整体社会主义者¹⁰。事实上，马隆本人属于赫希柏格、伯恩施坦以及杜林的其他门徒那一学派，那个学派是在苏黎世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拉法格说的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有名的思想运动⁷²）。应当预料到，在饶勒斯、符尼埃尔以及我们的知识分子用熟了康德的术语以后，也会把康德呈献给我们的……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等同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首先，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观念象客体一样，也是实在的，它是客体在头脑中的反映……为了使那些需要了解资产阶级哲学的同志们开开心 (récréer)，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引起

① 阿尔勃莱希特·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批判》(Albrecht Rau, «Ludwig Feuerbach's Philosophie, die Naturforschung und die philosophische Kritik der Gegenwart») 1882年莱比锡版第87--89页。

唯灵论者如此浓厚兴趣的有名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吃着香肠、每天收入五个法郎的工人很明白：老板在掠夺他，他吃的是猪肉；老板是强盗，香肠好吃而且对身体有营养。资产阶级的诡辩家（不管他叫皮浪也好，叫休谟或者康德也好，反正都一样）说道：完全不是这样，工人的看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就是主观的看法；他可以有同样的理由认为，老板是他的恩人，香肠是由剁碎的肉皮作成的，因为他不可能知道自在之物……”

“问题提得不对，它的困难也就在这里……为了认识客体，人首先必须检验一下他的感觉是不是欺骗他……化学家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深入到物体内部，分析了物体，把物体分解为元素，然后作了相反的工作，即进行综合，用元素再组成物体。从人能够用这些元素制造出东西来供自己使用的那个时候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就可以认为他认识了自在之物。如果基督教徒的上帝的存在而且真的创造了世界，他所作的也不会多于这些。”^①

我们引用这样长的一段话，是为了说明拉法格怎样理解恩格斯，以及他怎样从左边批判康德。他不是批判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不同的那些方面，而是批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那些方面；不是批判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批判康德对于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唯物。

最后，考茨基在他的《伦理学》里，也是从与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他这样来反对康德的认识论：“我看见绿色、红色、白色，这是根据我的视力。但是，绿色是一种不同于红色的颜色，这一点证明在我以外存在着某种东西，证明

^① 保尔·拉法格《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Paul Lafargue. «Le matérialisme de Marx et l'idéalisme de Kant»*），载于1900年2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73。

物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个别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向我表明的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差别……是外部世界的真实的相互关系和差别；它们不为我的认识能力的性质所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性的学说是对的〉，我们就一点也不能知道我们之外的世界，甚至不能知道它是存在着的。”（俄译本第33—34页）

可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跟着哲学上的反动派别走，跟着以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走。当然，跟哪一个思想反动的人走都可以，这是每个公民尤其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神圣权利。但是，如果在哲学上坚决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人，后来又开始支吾不清，颠倒是非，闪烁其词，硬说他们在哲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硬说他们和马克思“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稍微“补充了”马克思的学说，那末，这实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二 “经验符号论者”尤什凯维奇怎样 嘲笑“经验批判主义者”切尔诺夫

尤什凯维奇先生写道：“看到切尔诺夫先生怎样想使不可知论的实证论者—孔德主义者和斯宾塞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成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先驱，当然觉得可笑。”（前引书第73页）

在这里，可笑的首先是尤什凯维奇先生的惊人的无知。他象一切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一样，用一堆学术上的字眼和学者的名字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上面引用的话出自专谈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那一节里。尤什凯维奇先生谈论着这个问题，可是

他不知道：在恩格斯看来（正如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不论是休谟路线的拥护者或者是康德路线的拥护者同样都是不可知论者。因此，当马赫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休谟的拥护者的时候，还把不可知论同马赫主义对立起来，这只能表明他缺乏起码的哲学知识。“不可知论的实证论”这个名词也是荒谬的，因为休谟的拥护者就把自己叫作实证论者。尤什凯维奇先生既然把彼得楚尔特奉为老师，他就应当知道彼得楚尔特是直接经验批判主义归进实证论的。最后，把孔德和斯宾塞的名字缠在一起也是荒谬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批驳的不是一个实证论者和另一个实证论者不同的地方，而是他们共同的地方，而是使一个哲学家成为不同于唯物主义者的实证论者的那些东西。

我们的伏罗希洛夫所以需要这一大堆字眼，是为了“困惑”读者，是为了用响亮的词句震昏读者，使他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实质转到无关紧要的枝节上去。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唯物主义和传播很广的整个实证论思潮（其中有孔德、斯宾塞、米海洛夫斯基、许多新康德主义者以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之间的根本分歧。恩格斯在他的《路·费尔巴哈》里极其明确地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恩格斯把当时（即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所有的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都归入可怜的折衷主义者、打小算盘的人（Flohknacker，直译为捉跳蚤者）等人的阵营中。⁷⁴ 这种评定可以加在什么人身上和应当加在什么人身上，这是我们的伏罗希洛夫们不愿考虑的。既然他们不会考虑，那末我们就给他们看一个鲜明的对比吧。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说到一般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时，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⁷⁵ 恩格斯只引用了一本书，那就是他曾经分析过的施达克评论费尔巴哈的一部著作。恩格斯说：“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

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要怜惜怜惜读者了。”^①

恩格斯想“怜惜读者”，就是说，使社会民主党人不至于有幸去结识那些不肖的自命为哲学家的空谈家。究竟谁是这些“不肖子孙”的代表呢？

我们翻开施达克的著作^②，就会看到他经常引证休谟和康德的拥护者们。施达克把费尔巴哈同这两条路线隔离开来。施达克同时还引证黎尔、文德尔班和朗格（同上，第3、18—19、127页及以下各页）。

我们翻开1891年出版的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这本书的德文第一版，就会在第一二〇页上读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和其他研究者（例如，拉斯、马赫、黎尔、冯特）的结论一致的，虽然由于观点的不同，这种一致并不是绝对的（durchgehend）。并请参阅叔本华。”

我们的伏罗希洛夫-尤什凯维奇嘲笑了谁呢？

阿芬那留斯丝毫不怀疑他自己在原则上接近康德主义者黎尔和拉斯，接近唯心主义者冯特。这种接近不是在个别问题上，而是在经验批判主义关于“最后结论”的问题上。他在两个康德主义者之间提到马赫。的确，当黎尔和拉斯以休谟精神清洗康德，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贝克莱精神清洗休谟的时候，难道他们还不是一丘之貉吗？

恩格斯想“怜惜”德国工人，使他们不至于和这一伙“捉跳蚤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25页76。

② 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C. N. Starke, «Ludwig Feuerbach») 1885年斯图加特版。

的”大学讲师们成为知交,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吗?

恩格斯能怜惜德国工人,可是伏罗希洛夫们却不怜惜俄国读者。

必须指出,康德和休谟的混合物或休谟和贝克莱的混合物——本质上是折衷主义的混合物——会有各种不同的比例,有时会特别强调这种混合物的这一因素,有时会特别强调它的另一因素。例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公开承认自己和马赫是唯我论者的(即彻头彻尾的贝克莱主义者),只有一个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相反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许多门徒和拥护者,如彼得楚尔特、维利、毕尔生、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列谢维奇、法国人得拉克鲁阿^①和其他人,都强调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观点中的休谟主义。我们且举一位特别卓著的学者为例。这位学者在哲学上也把休谟和贝克莱结合起来,但是他把着重点放在这种混合物的唯物主义因素上。这位学者就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赫胥黎。是他使“不可知论者”这个术语通用起来的;当恩格斯谈到英国的不可知论的时候,无疑地首先而且主要指的就是他。恩格斯在1892年把这种不可知论者叫作“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⁴⁸。英国唯灵论者华德在他的《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一书中主要攻击了“不可知论的科学领袖”(第2卷第229页)赫胥黎。华德的话证实了恩格斯的评价。华德说:“赫胥黎学说中承认物理的方面(按马赫的说法,就是“要素的系列”)居于第一位的这种倾向,往往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致在这里几乎说不上平行主义。尽管赫胥黎非常激烈地拒绝接受

^① 昂利·得拉克鲁阿《大卫·休谟和批判哲学》(*Henri Delacroix, «David Hume et la philosophie critique»*),见《国际哲学大会丛书》(*«Bibliothèqu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第4卷。作者把阿芬那留斯和德国内在论者、法国沙·雷诺维叶及其学派(“新批判主义者”)都列为休谟的拥护者。

唯物主义者这个称号，认为这是对他的洁白无瑕的不可知论的侮辱，但我却不知道还有哪一位著作家比他更配得上这个称号。”（第2卷第30—31页）华德还引用了赫胥黎的话来证实他的看法。赫胥黎说：“凡是熟悉科学史的人都会承认，在各个时代里，尤其是目前，科学的进步就是意味着我们称作物质和因果性的东西的领域扩大，我们称作精神和自发性的东西相应地从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中逐渐消失。”或者：“我们要用精神的术语来表达物质现象，还是要用物质的术语来表达精神现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在一定的相对的意义，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按马赫的说法，就是“相对稳定的要素复合”）。但是根据科学的进步来看，在各方面最好使用唯物主义的术语。因为它把思想和其他宇宙现象联结起来……而相反的术语或唯灵论的术语却是毫无内容的（utterly barren），只能引起思想糊涂和混乱……几乎用不着怀疑，科学愈向前发展，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将要愈广泛愈彻底地用唯物主义的公式或符号来表达。”（第1卷第17—19页）

“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赫胥黎就是这样论述的。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唯物主义，认为唯物主义是不正当地超出“感觉群”的“形而上学”。这同一位赫胥黎又写道：“如果我非得在绝对唯物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中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末我不得不选择后者……”“我们唯一确实知道的是精神世界的存在。”（华德，同上，第2卷第216页）

赫胥黎的哲学正象马赫的哲学一样，是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混合物。但是在赫胥黎的著作中，贝克莱主义是偶尔出现的，而他的不可知论是唯物主义的遮盖布。在马赫的著作中，混合物的“色彩”就不同了。因而那位唯灵论者华德在无情地攻击赫胥黎的同时，亲昵地拍着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肩膀。

三 内在论者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战友

在谈到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我们不免要一再引证所谓内在论学派的哲学家们。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舒佩、莱克列尔、雷姆克和舒贝特-索尔登。现在有必要弄清楚经验批判主义和内在论者的关系，弄清楚内在论者所宣扬的哲学的本质。

马赫在1902年写道：“……现在我看到许多哲学家，如实证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内在论哲学的信徒，以及极少数自然科学家，互不通气，各自开辟新的道路，尽管这些道路因人而异，但差不多都是殊途同归。”（《感觉的分析》第9页）这里首先必须指出，马赫难得正确地承认，极少数自然科学家是这种似乎“很新”但事实上非常陈旧的休谟主义-贝克莱主义哲学的拥护者。其次，马赫认为这种“新”哲学是一种传播很广的思潮，内在论者在这个思潮中同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实证论者处于同等地位；马赫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重要的。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1906）的序言里重复说道，“这样，就展开了一个共同的运动……”（第4页）马赫在另一个地方又说道：“我非常接近内在论哲学的信徒……我在这本书《舒佩的《认识论和逻辑概论》》里找不到一个地方是我不会欣然同意的，我顶多略加修订。”（第46页）马赫也认为舒贝特-索尔登是在走着“一条十分相近的道路”（第4页）；而对于舒佩，马赫甚至把自己最后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哲学著作《认识和谬误》献给他。

另一位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阿芬那留斯在1894年写道，舒佩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赞同使他感到“高兴”和“振奋”，而他和舒佩之间的“意见相左（Differenz）”“也许只是暂时的（vielleicht nur

einstweilen noch bestehend)”^①。最后,彼得楚尔特(列谢维奇认为他的学说是经验批判主义的顶峰)直截了当地宣布舒佩、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这三个人是“新”派别的领袖^②。同时彼得楚尔特坚决反对维利^③,因为维利几乎是唯一的由于有舒佩这样的亲属而感到羞愧的著名马赫主义者,他力图在原则上同舒佩划清界限,阿芬那留斯的这个学生因此受到了敬爱的老师的训诫。阿芬那留斯在评注维利反对舒佩的论文时写了上面引用的那几句有关舒佩的话,并且补充说,维利的批判“是过火了”^④。

我们已经知道了经验批判主义者对内在论者的评价,现在来看一看内在论者对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评价。莱克列尔在1879年的评论,我们已经讲过了。舒伯特-索尔登在1882年直率地说自己的见解“一部分同老费希特(即主观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费希特,他也象约·狄慈根一样,在哲学方面有一个不肖之子)一致”,再就是“同舒佩、莱克列尔、阿芬那留斯一致,并且一部分同雷姆克一致”,他还特别满意地引证马赫^⑤来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⑥(德国所有的反动讲师和教授都这样称呼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1893年,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一书问世后,舒佩在

① 《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年卷(1894)第1册第29页。

② 《纯粹经验哲学引论》1904年版第2卷第295页和《实证论观点中的世界问题》1906年版序言第5页和正文第146页。

③ 《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第321页。

④ 《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年卷(1894)第29页。维利反对舒佩的论文就是刊载于此的。

⑤ 《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

⑥ 理查·冯·舒伯特-索尔登博士《论客体和主体的超越性》(Dr. Richard von Schubert-Soldern. «Über Transcendenz des Objekts und Subjekts»)1882年版第37页和第5节,并参看他的《认识论的基础》(«Grundlagen einer Erkenntnistheorie»)1884年版第3页。

《给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中祝贺这部著作的出版，认为这部著作是对舒佩本人也拥护的“素朴实在论的确认”，舒佩写道：“我对思维的理解和您的〈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是非常一致的。”^①后来，在1896年，舒贝特-索尔登在给他“所依据的”“哲学上的方法论派别”作总结时，追溯起自己的家谱，他从贝克莱和休谟数起，数到朗格（“我们德国这一派其实是从朗格开端的”），然后又数到拉斯、舒佩及其同伙、阿芬那留斯和马赫、新康德主义者中的黎尔、法国人雷诺维叶等等^②。最后，在内在论者的专门的哲学刊物的创刊号上刊载的纲领式的《发刊辞》里，我们除了看到向唯物主义的宣战和对雷诺维叶的同情外，还读到：“甚至在自然科学家本身的营垒中，个别自然科学家也发出了呼声，宣扬反对同行们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反对那种支配着自然科学的非哲学精神。物理学家马赫就是这样的一个…… 新生力量普遍行动起来了，它们致力于破除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正确性的盲目信仰，开始重新寻求进入神秘之堂奥的其他途径，探索通向真理之宫殿的更好入口。”^③

关于雷诺维叶，我稍微谈几句。他是在法国影响很大而且传播很广的所谓新批判主义学派的首领。他的理论哲学是休谟的现象论和康德的先验主义的结合。他坚决否认自在之物。他宣称现象的联系、秩序、规律是先验的，他用大字写规律二字，并把它变为宗教的基础。天主教的神父们看到这种哲学欣喜若狂。马赫主义者维利愤怒地把雷诺维叶叫作“使徒保罗第二”、“高级蒙昧主义

① 《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年卷（1893）第384页。

② 理查·冯·舒贝特-索尔登博士《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Dr. Richard von Schubert-Soldern, «Das menschliche Glück und die soziale Frage»*）1896年版序言第5页和第6页。

③ 《内在论哲学杂志》⁷⁷1896年柏林版第1卷第6、9页。

者”、“善于诡辩的自由意志的宣扬者”^①。就是内在论者的这样一些同道者热烈地欢迎马赫的哲学。当马赫的《力学》^②一书的法译本出版时，雷诺维叶的战友和学生毕雍主编的“新批判主义者”的刊物《哲学年鉴》(«L'Année Philosophique»)写道：“谈论马赫先生的实证论科学对实体、物、自在之物的批判同新批判主义的唯心主义有多大程度的一致，这是没有用处的。”(第15卷(1904)第179页)

至于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因自己和内在论者有亲属关系而感到羞愧；对于这些不自觉地走上司徒卢威、缅施科夫一伙的道路的人们，当然不能有别的指望。只有巴札罗夫把“内在论学派的一些代表”叫作“实在论者”^③。波格丹诺夫简短地(而事实上是错误地)宣称：“内在论学派只不过是康德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间的中间形式。”(《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22页)切尔诺夫写道：“一般说来，内在论者只在其理论的一个方面接近实证论，其他方面则远远超出实证论的范围。”(《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第37页)瓦连廷诺夫说：“内在论学派使这些〈马赫主义的〉思想具有不合适的形式，并且陷入唯我论的绝境。”(前引书第149页)请看，这里是要什么有什么：既有宪法又有姜汁鲑鱼；既有实在论又有唯我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敢直率地清楚地道出内在论者的真相。

事实上，内在论者是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信仰主义的公开说教者，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公开地用自

① 《反对学院智慧》第129页。

② 即《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法译本在1904年出版于巴黎。——编者注

③ “现代哲学的实在论者(来自康德主义的内在论学派的一些代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派以及许多和这个学派相近的流派)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否认素朴实在论的出发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第26页)

己的理论性最强的认识论著作来捍卫宗教，替这种或那种中世纪思想辩护。莱克列尔在 1879 年替自己的哲学辩护，说它能“满足宗教信仰者的一切要求”^①。雷姆克在 1880 年把自己的《认识论》一书献给新教牧师比德曼，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宣扬的神，不是超感觉的，而是“实在的概念”（大概巴札罗夫因此就把“某些”内在论者列为“实在论者”的吧？），同时他“把这个实在的概念的客体化交给实际生活来解决”，他还把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学》称为“科学的神学”的典型^②。舒佩在《内在论哲学杂志》上断言，虽然内在论者否认超验的东西，可是神和来世决不包含在这个概念之中^③。他在《伦理学》一书中坚决认为“道德规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有联系”，并斥责教分立这种“毫无意义的词句”^④。舒伯特-索尔登在他的《认识论的基础》这本书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的自我先于我们的肉体而存在，自我在肉体死后仍然存在，也就是说，灵魂不灭（前引书第 82 页）等等。他在《社会问题》^⑤一书中反对倍倍尔，拥护“社会改良”以及等级选举制。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神恩赐的不幸，就没有幸福。”（第 330 页）同时又悲叹道，唯物主义“占着统治地位”（第 242 页），“现在谁要是相信有彼岸的生活，哪怕只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他也会被看成是个傻瓜”（同上）。

就是这些德国的缅施科夫们，这些一点也不比雷诺维叶差的第一流蒙昧主义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亲密地姘居着。他们在理

① 《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第 73 页。

② 约·雷姆克《世界是知觉和概念》1880 年柏林版第 312 页。

③ 《内在论哲学杂志》第 2 卷第 52 页。

④ 威廉·舒佩博士《伦理学和法哲学基础》（*Dr. Wilhelm Schuppe. «Grundzüge der Ethik und Rechtsphilosophie»*）1881 年布勒斯劳版第 181、325 页。

⑤ 即《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编者注

论上有血缘关系，这是无可争辩的。内在论者的学说中的康德主义并不比彼得楚尔特或毕尔生的学说中的康德主义多。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内在论者自认是休谟和贝克莱的学生，而且对内在论者的这种评价在哲学文献上也是得到公认的。为了清楚地指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这些战友是以什么样的认识论前提为出发点的，我们现在从内在论者的著作里引证几个基本的理论论点。

莱克列尔在 1879 年还没有想出“内在论者”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本来的意思是“经验的”、“凭经验得到的”，它象欧洲资产阶级政党的骗人招牌一样，也是一块遮盖腐败物的骗人招牌。莱克列尔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公开地坦率地自称为“批判唯心主义者”^①。我们已经看到，他在这本书里批判康德向唯物主义让步，肯定地指出他自己的道路是从康德走向费希特和贝克莱。莱克列尔象舒佩、舒贝特-索尔登和雷姆克一样，进行了反对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倾向的无情斗争。

莱克列尔说：“如果我们回到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把超验的存在（即在人的意识以外的存在）加之于整个自然界和自然过程，那末，在主体看来，无论是物体的总和，或者是能看到和接触到的自己的肉体及其一切变化，都将是空间上相互关联的共存和时间上的连贯性的直接现象，因此对自然界的一切解释归结起来就是确定这些共存和连贯性的规律。”（第 21 页）

反动的新康德主义者说过：回到康德那里去。反动的内在论者现在所说的其实就是：回到费希特和贝克莱那里去。在莱克列尔看来，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感觉的复合”（第 38 页），同时他把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某一类特性（Eigenschaften），比方说，用字母 *M*

^① 《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第 11、21、206 页和其他许多页。

来表示，而把作用于其他的自然界客体的另一类特性用字母 N 来表示(第 150 及其他各页)。莱克列尔还说，自然界不是个别人的“意识现象 (Bewußtseinsphänomen)”，而是“人类”的“意识现象”(第 55—56 页)。如果注意到莱克列尔正是在马赫担任物理学教授的布拉格出版这本书的，并且莱克列尔欣喜若狂地引证的仅仅是 1872 年出版的马赫的《功的守恒》^①，那末不由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应当承认信仰主义的信徒、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莱克列尔是马赫的“独创的”哲学的真正祖师呢？

至于讲到那个得出“同样结论”(据莱克列尔说^②)的舒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真的以拥护“素朴实在论”自居，并且在《给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中苦恼地抱怨说：“我的〈舒佩的〉认识论被肯定地曲解为主观唯心主义了。”这个不高明的骗术(即内在论者舒佩所说的拥护实在论)究竟是怎么回事，从舒佩反驳冯特时所说的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冯特毫不犹豫地把内在论者都列为费希特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③。

舒佩反驳冯特说：“我认为，‘存在就是意识’这个论点的意思是，意识离开外部世界是不可设想的，因而后者属于前者，这就是我屡次指出并加以说明的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绝对的联系 (Zusammengehörigkeit)，在这种联系中，它们构成存在的统一的、原初的整体。”^④

① 即《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编者注

② 《一元论的认识论概论》(《Beiträge zu einer mon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1882 年布勒斯劳版第 10 页。

③ 《哲学研究》杂志前引卷数第 386、397、407 页。

④ 威廉·舒佩《内在论哲学和威廉·冯特》(《Wilhelm Schuppe, Die immanente Philosophie und Wilhelm Wundt》)，载于《内在论哲学杂志》第 2 卷第 195 页。

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看不出这种“实在论”中的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真想不到；外部世界“属于意识”并且和意识有绝对的联系！是的，人们诋毁了这位可怜的教师，“肯定地”把他列为主观唯心主义者。这种哲学和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完全一致。切尔诺夫和瓦连廷诺夫的任何声明和抗议都不能把它们分开。这两种哲学将一起被送到德国教授们的反动制成品的博物馆里去。我们提出一个笑柄来再次证明瓦连廷诺夫先生的轻率：瓦连廷诺夫把舒佩称为唯我论者（不用说，舒佩曾经象马赫、彼得楚尔特之流一样，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我论者，还专以这个题目写了文章），而对《概论》一书中的一篇巴札罗夫的论文则赞扬备至！我真想把巴札罗夫所说的“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句名言译成德文，把它寄给一个头脑稍微清楚一些的内在论者。他一定会狂吻巴札罗夫，而且会象舒佩、莱克列尔和舒贝特-索尔登狂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那样把巴札罗夫吻个不休。因为巴札罗夫的这句名言就是集内在论学派的学说之大成。

最后，请看舒贝特-索尔登吧。“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即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形而上学”，是这位哲学家的大敌（《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31页以及整个第2章《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自然科学舍弃了一切意识关系”（第52页）——这就是主要的罪恶（这也就是唯物主义！）。因为人不能脱离“感觉，因而也不能脱离意识状态”（第33、34页）。舒贝特-索尔登在1896年承认说，当然，我的观点是认识论上的唯我论（《社会问题》序言第10页），但不是“形而上学的”唯我论，不是“实践的”唯我论。“我们直接感知的东西都是感觉，是不断变化的感觉的复合。”^①

① 《论客体和主体的超越性》第73页。

舒贝特-索尔登说：“自然科学把〈人类〉共同的外部世界当作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原因，马克思用同样的方式（而且同样错误地）把物质的生产过程当作内部过程和动机的原因。”（《社会问题》序言第 18 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一般哲学唯物主义有联系，对于这一点，马赫的这位战友并不想表示怀疑。

“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从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观点看来，任何形而上学都是不可能有的，就是说，形而上学总是超验的。经过深思以后，我不能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理由是这样的…… 见到的一切东西的直接基础是精神的（唯我论的）联系，个人的自我（个人的表象世界）及其肉体是精神联系的中心。没有这个自我，其余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没有其余的世界，这个自我也是不可设想的。随着个人的自我的毁灭，世界也就烟消云散，但这是不可能的；随着其余的世界的毁灭，个人的自我就没有容身之地，因为个人的自我只能在逻辑上而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同世界分开。因此我的个人的自我在我死后必然还继续存在，只要整个世界不随着我的死而一起毁灭……”（同上，序言第 23 页）

“原则同格”、“感觉的复合”以及马赫主义的其他庸俗见解，对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是服务得很好的！

“……从唯我论的观点看来，什么是彼岸世界（das Jenseits）呢？它只不过是我在未来可能有的经验……”（同上）“当然，举例来说，降神术没有证明自己的彼岸世界的存在，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拿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来反对降神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唯物主义只不过是无所不包的精神联系（=“原则同格”）内部的世界过程的一个方面。”（序言第 24 页）

所有这些话全是在《社会问题》（1896）一书的那篇哲学序言里

说的。在那篇序言里，舒贝特-索尔登一直是以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互相扶持的姿态出现的。马赫主义只有在一小群俄国马赫主义者那里才是专供知识分子空谈的材料，而在它的祖国却公开地扮演信仰主义奴仆的角色！

四 经验批判主义往哪里发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马赫主义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后的发展情形。我们已经看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大杂烩，是一些矛盾的没有联系的认识论命题的堆砌。我们现在应当看一看这种哲学怎样发展，往哪里发展，就是说，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会帮助我们援引一些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来解决若干“引起争论的”问题。实际上，由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派别的基本哲学前提是折衷主义的、没有联系的，所以对这个派别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在枝节问题上进行无谓的争论，这也是完全难免的。但是，经验批判主义象任何一个思潮一样，是活生生的、成长着的、发展着的东西，它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这一事实要比冗长的议论更有助于解决有关这种哲学的真正本质的基本问题。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这后一个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感到兴趣的。一切根本的东西，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二十多年以前都已经谈过了。那些想要理解这两位“领袖”的人以及这两位“领袖”本人（至少是比自己的

同伴长寿的马赫)认为是自己事业的继承者的人怎样理解这两位“领袖”,在这段时期内也一清二楚了。为了确切起见,我们就以自称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生(或追随者)以及被马赫列入这个营垒的那些人为例。这样,我们就会看出,经验批判主义是一个哲学流派,而不是著作家的奇谈汇集。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序言中推荐汉斯·科内利乌斯,说他是一位“即使不是同行,也是走着很相近的道路的青年研究工作者”(第4页)。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一书的正文里再一次“满意地提到”科内利乌斯以及其他人的“著作”,说他们“揭示了阿芬那留斯思想的本质并且向前发展了这些思想”(第48页)。拿科内利乌斯的《哲学引论》(1903年德文版)这本书来说吧。我们看到,这本书的作者也表明他要跟随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走(序言第8页,正文第32页)。看来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这个学生也是从感觉一要素开始的(第17、24页)。他肯定地说,他不超出经验(序言第6页)。他称自己的观点是“彻底的或认识论的经验论”(第335页)。他毅然决然地谴责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以及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独断主义”(第129页)。他竭力批驳可能产生的“误解”(第123页);似乎从他的哲学中会得出承认世界存在于人脑中的结论。他以不亚于阿芬那留斯、舒佩或巴札罗夫的巧妙方法向素朴实在论递送秋波(第125页,“视觉和其他任何一种知觉所在的地方,就是而且只是我们发现它们的地方,即没有被虚伪的哲学玷污的素朴意识给它们限定的地方”)。这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也得出了灵魂不灭、有神的结论。这位教授讲坛上的下级警官、“最新实证论者”的学生吼叫道,唯物主义把人变成了一部自动机器。“不用说,唯物主义破坏了我们可以自由决断一切的信心,同时还破坏了对我们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全部评价

和我们对这种价值的责任心。同样地，关于我们的生命在死后继续存在的思想，唯物主义也不给它容身之地。”（第 116 页）这本书的结尾是：教育（显然是对这位科学家所愚弄的青年的教育）之所以需要，不仅是为了行动，而“首先”是为了“培养崇敬心（Ehrfurcht）——不是崇敬偶然传统的暂时价值，而是崇敬天职和美的不朽价值，崇敬在我们内心和在我们以外的神灵（dem Göttlichen）”（第 357 页）。

请把这种见解和波格丹诺夫的说法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说，由于马赫否认任何“自在之物”，所以在马赫哲学中，神、意志自由、灵魂不灭等观念绝对没有（着重号是波格丹诺夫加的）而且“不可能有容身之地”（《感觉的分析》序言第 12 页）。可是马赫就在这一本书里（第 293 页）声称：“没有什么马赫哲学”，他不仅推荐内在论者，而且还推荐那位揭示了阿芬那留斯的思想本质的科内利乌斯！因此，第一，波格丹诺夫绝对不知道“马赫哲学”是一种不仅栖身于信仰主义的羽翼下而且还达到了信仰主义的思潮。第二，波格丹诺夫绝对不知道哲学史，因为把否定上述观念和否定任何自在之物联系在一起，就是嘲弄哲学史。一切始终不渝地拥护休谟的人否定任何自在之物，正是给这些观念留下容身之地，波格丹诺夫是不是想要否认这个事实呢？主观唯心主义者否定任何自在之物，从而使这些观念有容身之地，波格丹诺夫是不是听到过这个事实呢？这些观念惟独在一种哲学即唯物主义哲学里“不可能有容身之地”，因为这种哲学教导说：只有感性的存在；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外部世界即物理的东西是唯一的客观实在。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马赫所推荐的内在论者和马赫的学生科内利乌斯以及整个现代教授哲学都同唯物主义展开了斗争。

当人们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指出这种不体面的言行时，他们

才开始和科内利乌斯断绝关系。可是这没有多大价值。阿德勒大概没有“接到警告”，所以他在社会主义杂志上还推荐这位科内利乌斯（《斗争》杂志 1908 年第 5 期第 235 页：“这是一部容易读的、值得大大推荐的著作”）。有人通过马赫主义把露骨的哲学反动派和信仰主义的宣扬者拉来作工人的老师！

彼得楚尔特没有接到警告就看出科内利乌斯的虚伪，可是他同这种虚伪作斗争的方法简直妙极了。请听一听：“断言世界就是表象（我们正与之斗争的——这可不是开玩笑！——唯心主义者就是这样断言的），这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有意义：认为世界是说话的人或者是所有说话的人（陈述者）的表象，就是说，世界的存在仅仅依赖于这个人或这些人的思维，只有当这个人想到世界的时候，世界才存在，当他没有想到世界的时候，世界就不存在。相反地，我们使世界不依赖于个别的人或者许多个别的人的思维，或者说得更确切和更明白些，不依赖于思维的活动，不依赖于任何现实的〈实际的〉思维，而是依赖于一般思维，并且只是在逻辑上。唯心主义者把二者混淆起来，其结果就是我们在科内利乌斯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不可知论的半唯我论。”^①

斯托雷平否认有信件检查室！⁷⁸彼得楚尔特彻底击败了唯心主义者。但令人诧异的是：他这样歼灭唯心主义，倒象是劝告唯心主义者要更狡猾地掩盖自己的唯心主义。世界依赖于人们的思维，——这是错误的唯心主义。世界依赖于一般思维，——这是最新的实证论，这是批判实在论，一句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欺骗手段！如果科内利乌斯是不可知论的半唯我论者，那末彼得楚尔特就是唯我论的半不可知论者。先生们，你们在捉跳蚤呵！

① 《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 2 卷第 317 页。

我们继续谈下去吧。马赫在他的《认识和谬误》这本书的第二版里说道，教授汉斯·克莱因佩特博士（对马赫的观点）“作了有系统的叙述^①，在一切重要的地方，我都同意这个叙述”。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号汉斯吧。这位教授是马赫主义的忠诚的传播者，他在一些专门的哲学刊物上用德文和英文写了不少介绍马赫观点的文章，翻译了马赫推荐的并附有马赫的序言的一些著作，总而言之，他是这位“老师”的得力的帮手。请看他的观点：“……我的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经验，我的全部思维和意向，都是我的心理的过程，都是我的意识的一部分。”（前引书第18页）“我们叫作物理的东西的，是由心理要素构成的。”（第144页）“任何科学所能达到的唯一的目标是主观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的真相（Gewissheit）。”（第9页，着重号是克莱因佩特加的，他在这里作了一个注释：“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已经说过相似的话。”）“假定有别人的意识存在，这是一个决不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假定。”（第42页）“我不知道……在我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自我。”（第43页）第五节的题目是《意识的能动性》（“自生性”=自发性）。动物这类自动机器的表象变换纯粹是机械的。当我们作梦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正常状态下，我们意识的特性和这种情形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具有那些〈自动机器〉所没有的特性；要机械地或自动地说明这种特性，至少是困难的。这种特性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自我的主动性。任何人都能使自己和自己的意识状态对立起来，都能操纵这些意识状态，都能把它们鲜明地摆出来或者把它们藏起来，都能分析它们，都能把它们各个部分加以比较，等等。这一切都是（直接的）经验的事实。我们的自我实质上不同于一切意识状态的

^① 《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Die Erkenntnistheorie der Naturforschung der Gegenwart》）1905年莱比锡版。

总和,所以不能同这个总和相提并论。糖是由碳、氢、氧组成的;假如我们使糖具有糖的灵魂,那末类推下去,糖的灵魂就应当具有任意移动氢粒子、氧粒子和碳粒子的特性。”(第 29—30 页)下一章第四节的题目是《认识的行动就是意志的行动 (Willenshandlung)》。“我的一切心理体验划分为强制行为和任意行为两大类,应当认为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外部世界的一切印象都属于前一类。”(第 47 页)“关于同一个事实领域,可以有许多理论……这个事实是物理学家完全了解的,然而同任何绝对认识论的前提是不相容的。这个事实是和我们思维的意志性质有关联的,这个事实表现出我们的意志不受外部环境的束缚。”(第 50 页)

当马赫自己推荐克莱因佩特这种人的时候,波格丹诺夫竟说在马赫哲学里“意志自由绝对没有容身之地”。请大家判断一下波格丹诺夫的声明是多么大胆!我们已经看到,克莱因佩特没有掩饰自己的唯心主义和马赫的唯心主义。克莱因佩特在 1898—1899 年写道:“对于我们概念的本质,赫兹表露出同样的〈象马赫一样的〉主观主义看法…… 如果从唯心主义方面看来,马赫和赫兹〈克莱因佩特把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扯上,这是否公正,我们另行论述〉因为着重指出我们的一切概念(不是个别的概念)的主观起源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建立了功绩,那末从经验论方面看来,他们因为承认只有经验这个不依赖于思维的阶段才能解决概念的正确性问题也建立了同样大的功绩。”^① 克莱因佩特在 1900 年写道:虽然康德和贝克莱跟马赫有很大不同,“但是至少他们比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即唯物主义!这位教授先生避讳叫出这个恶魔的名字!〉更加接近马赫,形而上学的经验论是

^① 《系统哲学文库》杂志第 5 卷(1898—1899)第 169—170 页。

马赫的主要攻击对象”(同上,第6卷第87页)。他在1903年写道:“贝克莱和马赫的出发点是无法驳倒的……”“马赫是康德事业的完成者”^①。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序言中还说,齐亨和他“走的即使不是相同的道路,也是很相近的道路”。我们拿起齐亨教授的《心理生理学的认识论》^②这部著作就会看到,作者在序言里就引用了马赫、阿芬那留斯、舒佩等人的话。看来,这又是一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齐亨的“最新”理论是:只有“群氓”才会认为,似乎是“现实的物引起我们的感觉”(第3页);“在认识论的门上,除了贝克莱的‘外部客体不是独自存在着,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存在着’这个匾额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匾额”(第5页)。“我们感知的只是感觉和表象。这二者都是心理的东西。非心理的东西是没有内容的字眼。”(第100页)自然规律不是物质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还原了的感觉之间的”关系(第104页;齐亨式的贝克莱主义的全部独创性就在于“还原了的感觉”这个“新”概念!)

还在1904年,彼得楚尔特就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二卷(第298—301页)里把齐亨当作唯心主义者抛弃了。他在1906年已经把科内利乌斯、克莱因佩特、齐亨、费尔伏恩列入唯心主义者或心理一元论者的名单^③。要知道,所有这些教授先生们在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观点”的解释中都有“误解”(同上)。

可怜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非但他们的敌人诬蔑他们是唯心主义者,“甚至”(用波格丹诺夫的说法)是唯我论者,连他们的朋

① 《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1903)第314、274页。

② 泰奥多尔·齐亨《心理生理学的认识论》(Theodor Ziehen, «Psychophysiologische Erkenntnistheorie») 1898年耶拿版。

③ 《实证论观点中的世界问题》第137页注释。

友、学生、追随者、专家教授也误认自己的老师是唯心主义者。即使经验批判主义发展为唯心主义，这也决不能证明它的混乱的贝克莱主义的基本前提根本是虚妄的。天呵！这不过是一个诺兹德烈夫⁷⁰式的人物彼得楚尔特所说的那种小小的“误解”而已。

在这里最可笑的就是：这位以维护纯洁无瑕自居的彼得楚尔特自己首先以“逻辑的先验”“补充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然后把他们和信仰主义的传播者舒佩结合在一起。

如果彼得楚尔特知道英国的马赫信徒，他就必然会把陷进（由于“误解”）唯心主义的马赫主义者的名单大大地扩充。我们已经指出，大受马赫赞赏的毕尔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请再听两位“诽谤者”对毕尔生所作的同样的评论。诺克斯说：“毕尔生教授的学说不过是贝克莱的真正伟大的学说的回声。”^①罗狄埃说：“毫无疑问，毕尔生先生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②马赫认为英国唯心主义者克利福德^③的学说“非常接近”他的哲学（《感觉的分析》第8页）。不过这个克利福德与其说是马赫的学生，不如说是马赫的老师，因为他的哲学著作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版了。这里的“误解”是直接^④从马赫那里来的，马赫在1901年“没有看出”克利福德学说中的唯心主义。克利福德曾说，世界是“精神的物质（mind-stuff）”、“社会的客体”、“高度组织起来的经验”等等^⑤。为了说明德国马赫主义者的欺骗行为，应当指出，克莱因佩特在1905年就把这个唯心主义者抬高到“现代自然科学认识论”

① 霍华德·诺克斯的话载于《思想》杂志第6卷（1897）第205页。

② 若尔日·罗狄埃的话载于《哲学评论》杂志（1888）II，第26卷第200页。

③ 威廉·金顿·克利福德《演讲、论文集》（*William Kingdon Clifford, «Lectures and Essays»*）1901年伦敦第3版第2卷第55、65、69页。在第五十八页上写道：“我拥护贝克莱，反对斯宾塞。”在第五十二页上写道：“客体是我的意识中的一连串变化，而不是我的意识以外的某种东西。”

的创始人的地位！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第二八四页上指出了一位“接近”佛教和马赫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卡鲁斯。卡鲁斯自称是“马赫的崇拜者和朋友”，他在芝加哥主编一个研究哲学的杂志《一元论者》和一个宣传宗教的杂志《公开论坛》(《The Open Court》)。这个通俗杂志的编辑说道：“科学是神的启示。我们坚持这样一种看法：科学可以改革教会，这种改革将保存宗教中一切正确的健康的好的东西。”马赫经常为《一元论者》杂志撰稿，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他的新作的个别章节。卡鲁斯按照康德的精神“稍微”修改了马赫的学说，声称马赫“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如我所说的，是主观主义者”，但是，尽管他(卡鲁斯)和马赫有部分意见分歧，却仍然深信“我和马赫在思想上是一致的”^①。卡鲁斯声明：我们的一元论“不是唯物主义的，不是唯灵论的，也不是不可知论的；它只不过是意味着彻底性……它把经验当作基础，把经验关系的有系统的形式当作方法来使用”(显然这是从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那本书里抄来的!)。卡鲁斯的口号是：“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实证科学；不是神秘主义，而是清醒的思想；不是超自然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一元论的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宗教；不是信条，而是信仰(not creed, but faith)。”为了实行这个口号，卡鲁斯宣传一种“新神学”、“科学的神学”或宗教科学。这种神学否定圣经的词句，但是坚信“一切真理都是神的真理，神在自然科学中也象在历史中一样显示自己”^②。应当指出，克莱因佩特在上面提到的那本论述现代自然科

① 《一元论者》杂志第 16 卷(1906)7 月号，保·卡鲁斯《马赫教授的哲学》(P. Carus, 《Pr. Mach's Philosophy》)第 320, 345, 333 页。这是对克莱因佩特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回答。

② 前引杂志第 13 卷第 24 页，卡鲁斯的论文，《作为科学的神学》。

学的认识论的书里，除了推荐奥斯特瓦尔德、阿芬那留斯和许多内在论者，还推荐了卡鲁斯（第151—152页）。当海克尔发表了他的一元论者协会的论纲时，卡鲁斯表示坚决反对。首先，卡鲁斯认为，海克尔否定“同科学的哲学完全相容的”先验主义是枉费心机的。其次，卡鲁斯反对海克尔的决定论学说，因为这个学说“认为不能有意志自由”。再次，他说海克尔“强调自然主义者的片面观点，反对教会的传统保守主义，是犯了一个错误。因此，海克尔并不是愉快地努力使现存教会得到高度的发展，使教理得到新的更正确的解释，而是变成了现存教会的敌人”（前引杂志第16卷（1906）第122页）。卡鲁斯本人也承认：“许多自由思想者认为我是反动分子，责备我不加入他们的合唱队，不把一切宗教当作偏见去攻击。”（第355页）

十分明显，我们面前是以宗教鸦片来麻醉人民的一伙美国文化骗子的首领。马赫和克莱因佩特显然也是由于小小的“误解”而加入了这一伙的。

五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

波格丹诺夫关于自己写道：“直到现在，我在哲学著作中只看到一个经验一元论者，此人就是波格丹诺夫。我很了解他，并且能够保证他的观点完全适合自然界对于精神是第一性的这一神圣的公式。这就是说，他把一切存在物看作是发展的一根不断的链条，这根链条最底下的环节消失在要素的混沌世界里，而我们所知道的上面的环节是人们的经验（着重号是波格丹诺夫加的），即心理经验和更高一层的物理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和从其中产生出来的认识都符合于通常称之为精神的东西。”（《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

言第 12 页)

波格丹诺夫在这里把我们所熟知的恩格斯的原理叫作“神圣的”公式来加以讥笑，但又巧妙地避开了恩格斯！我们同恩格斯没有分歧，根本没有……

可是请大家更仔细地看一看波格丹诺夫自己对他的标榜一时的“经验一元论”和“代换说”所作的这段概述吧。波格丹诺夫把物理世界叫作人们的经验，宣称在发展的链条上，物理经验要比心理经验“更高一层”。这真是荒谬绝伦！而这种荒谬正是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如果波格丹诺夫把这样的“体系”也归入唯物主义，说什么他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那简直是滑稽。如果这样应用恩格斯的定义，那末连黑格尔也是唯物主义者了。因为，在黑格尔的学说中也是心理经验(名为绝对观念)在先，然后是“更高一层”的物理世界(即自然界)，最后才是人的认识，人是通过自然界认识绝对观念的。在这种意义下，任何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会否认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因为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性，实际上自然界不是被看作直接存在的东西，不是被看作认识论的出发点。实际上还要通过“心理的东西”的抽象概念这一漫长的行程才转到自然界。不论这些抽象概念叫作绝对观念、普遍的自我，还是叫作世界意志或其他等等，都是一样的。这些名称只是用来区别唯心主义的变种，而这些变种是多得不可胜数的。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例如，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观念，但是脱离了人的和在人出现以前的观念、抽象的观念、绝对观念，却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学的虚构。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感觉，但是脱离了人的

和在入出现以前的感觉，却是胡说、僵死的抽象概念、唯心主义的谬论。波格丹诺夫在编排下面的阶梯的时候，也就是制造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

(一)“要素”的混沌世界（我们知道，要素这个名词除了感觉，不包含任何其他的人的概念）；

(二)人们的心理经验；

(三)人们的物理经验；

(四)“从这种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认识”。

与人脱离的(人的)感觉是没有的。这就是说，第一层梯级是僵死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实质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普通的人的感觉，而是某种臆造的、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一般感觉，神的感觉，正如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普通的人的观念一旦离开人和人脑就成了神的观念。

第一层梯级滚开吧。

第二层梯级也滚开吧。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自然科学也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以前的心理的东西（而波格丹诺夫认为第二层梯级先于第三层梯级）。物理世界在心理的东西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心理的东西是有机物质的最高形式的最高产物。波格丹诺夫的第二层梯级也是僵死的抽象概念，是没有头脑的思想，是与人分开的一种人的理性。

只有完全抛弃前两层梯级，我们才能获得一幅真正同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相符合的世界图景。这就是：(一)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它在人出现以前，在任何“人们的经验”产生以前老早就已存在；(二)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东西）的最高产物，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

波格丹诺夫写道：“代换的领域是和物理现象的领域相合的；用不着以任何东西代换心理现象，因为它们是直接的复合。”（序言第39页）

这就是唯心主义，因为心理的东西，即意识、表象、感觉等等，被认为是直接的东西，而物理的东西是从其中引出来的，是代换它的。费希特说，世界是我们的自我所创造的非我。黑格尔说，世界是绝对观念。叔本华说，世界是意志。内在论者雷姆克说，世界是概念和表象。内在论者舒佩说，存在是意识。波格丹诺夫说，物理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的代换。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些不同的说法所包含的相同的唯心主义实质。

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一卷第一二八页至一二九页里写道：“让我们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生物’，譬如说，什么是‘人’？”他回答道：“‘人’首先是‘直接体验’的一定的复合（请注意“首先”二字！）。然后，在经验的进一步发展，‘人’自己和别人才知道，‘人’是其他许多物体中的一个物体。”

这完全是胡说的“复合”，它只适宜于推出灵魂不灭或神的观念等等。人首先是直接体验的复合，而在进一步发展中才是物体！这就是说，有脱离了物体的、在物体出现以前的“直接体验”。真可惜，我们的正教中学还没有讲授这种卓绝的哲学；在那里，它的全部价值是会受到珍视的。

“……我们承认，物理自然界本身是那些具有直接性质的复合（其中包括心理同格）的派生的东西（着重号是波格丹诺夫加的）；物理自然界是这种复合在其他的、与它们相似的、不过是最复杂的复合中（在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中）的反映。”（第146页）

凡是说物理自然界本身是派生的东西的哲学就是最纯粹的僧侣主义哲学。它的这种性质决不会因为波格丹诺夫本人极力否认

一切宗教而有所改变。杜林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甚至提议在他的“共同社会的”制度里禁止宗教。尽管这样，恩格斯完全正确地指出，杜林的“体系”如果没有宗教便不能自圆其说。⁸⁰波格丹诺夫也完全是这样，只不过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上面引的一段话不是偶然的自相矛盾，而是他的“经验一元论”和他的全部“代换说”的本质。如果自然界是派生的，那末不用说，它只能是由某种比自然界更巨大、更丰富、更广阔、更有力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只能是由某种存在着的東西派生出来的，因为要“派生”自然界，就必须有一个不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的東西。这就是说，有某种存在于自然界以外、并且能派生出自然界的東西。用俄国话说，这种東西叫作神。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想方设法变换这个名称，使它更抽象，更模糊，同时（为了显得更真实）更接近于“心理的東西”，如“直接的复合”、无须证明的直接存在的東西。绝对观念，普遍精神，世界意志，心理的東西对物理的東西的“普遍代换”，——这些都是同一个观念，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任何人都知道（而且自然科学也在研究）观念、精神、意志、心理的東西是进行正常活动的人脑的机能；把这种机能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分开，把这种机能变为普遍的抽象概念，用这个抽象概念“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妄想，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嘲弄。

唯物主义说，“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是由物理自然界派生出来的，是物理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社会、组织、经验和生物的那种状态的物理自然界中发展出来的。唯心主义说，物理自然界是由生物的这种经验派生出来的。唯心主义这样说就是把自然界和神相提并论（如果不是使自然界隶属于神）。因为神无疑是由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派生出来的。不管怎样考察波格丹诺夫的哲学，除了反动的混乱思想，

它没有任何别的内容。

波格丹诺夫以为谈论社会地组织经验就是“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第3卷序言第34页)。这真是痴人说梦。如果这样解释社会主义,那末耶稣会会员也是“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的热忱信徒了,因为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就是神这个“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疑地,天主教也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不过它反映的不是客观真理(为波格丹诺夫所否定而为自然科学所反映的客观真理),而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

何必提耶稣会会员呢!我们完全可以在马赫所心爱的内在论者中间找到波格丹诺夫的“认识上的社会主义”。莱克列尔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的意识^①,决不是个别人的意识。这种费希特主义的认识上的社会主义,随便你要多少,资产阶级的哲学家都可以供给。舒佩也强调 *das generische, das gattungsmäßige Moment des Bewusstseins*^②(认识中的共同的、种属的要素)。以为用人类的意识代替个人的意识,或者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代替一个人的经验,哲学唯心主义便会消失,这等于以为用股份公司代替一个资本家,资本主义便会消失一样。

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跟着唯物主义者拉赫美托夫说,波格丹诺夫是唯心主义者(同时又完全象流氓似地大骂拉赫美托夫)。但是他们不能够想一想这种唯心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在他们看来,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单独的偶然现象、个别的例子。这是不正确的。波格丹诺夫个人可以认为他发明了“独创的”体系,可是只要把他和上述的马赫的学生们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看法的错误。波格丹诺夫和科内利乌斯之间的差

① 《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第55页。

② 参看《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卷第379—380页。

别，比科内利乌斯和卡鲁斯之间的差别小得多。波格丹诺夫和卡鲁斯之间的差别，又比卡鲁斯和齐亨之间的差别小些（当然是从哲学体系方面来看，而不是从反动结论的自觉性方面来看），等等。波格丹诺夫不过是那种证明马赫主义向唯心主义发展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的表现之一。如果在波格丹诺夫的老师马赫的学说中没有贝克莱主义的……“要素”，世界上就不会出现波格丹诺夫（当然指的仅仅是哲学家的波格丹诺夫）。我想象不出对波格丹诺夫还有比下述作法更“可怕的报复”：把他的《经验一元论》翻译成德文并送给莱克列尔和舒贝特-索尔登、科内利乌斯和克莱因佩特、卡鲁斯和毕雍（雷诺维叶的法国助手和学生）去评论。马赫的这些人所共知的战友和不完全公开的追随者会用接吻来欢迎这个“代换说”，这恐怕会比他们的议论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若把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看作成熟的和一成不变的体系，也未必正确。从1899年到1908年这九年中间，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中的漫游经过了四个阶段。最初他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即半自觉的，自发地忠于自然科学精神的）唯物主义者。《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这本书就带有这个阶段的鲜明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流行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的阶段，也就是在某些地方陷入唯心主义的混乱的不可知论的阶段。波格丹诺夫从奥斯特瓦尔德（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封面题辞是：“献给马赫”）那里转向了马赫，也就是说他采用了象马赫的全部哲学一样不彻底的、糊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第四个阶段是：企图清除马赫主义的若干矛盾，创立一种类似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普遍代换说”表明波格丹诺夫从他的出发点起差不多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比起之前的几个阶段，波格丹诺夫哲学的这个阶段离辩证唯物主义更远还是更近呢？如果他停

留在一个地方，当然是更远了。如果他继续顺着他九年来走的那条曲线前进，那末就更近了。现在他只需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需要普遍抛弃他的普遍代换说，就可以重新回到唯物主义。因为，就象(*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如果可以用小比大的话)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把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一切矛盾和费希特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一样，这个普遍代换说把摇摆不定的唯心主义的一切过失和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条中国式的辫子。以前费尔巴哈只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要普遍抛弃，完全根除绝对观念，即黑格尔的“代换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就可以重新回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剪掉了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也就是说，他把自然界当作基础，而没有任何的“代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马赫派的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是否还会长期留下去。

六 “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和 对赫尔姆霍茨的批判

上面讲到了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唯心主义者，为了再作一些补充，我们认为指出马赫主义对我国文献中所提到的某些哲学论点所作的批判的性质，是适当的。例如，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兴高采烈地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即一种认为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物和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论。巴札罗夫嘲笑这种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但是必须指出，如果他为了保护非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而反对象形文字论的唯

物主义，那他是**对的**。但是巴札罗夫又在这里使用耍把戏的手法，在批判“象形文字论”的幌子下偷运其否认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而说的是物的复写、摄影、模写、镜像。巴札罗夫不是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违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说法而犯的**错误**，而是用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来蒙蔽读者，使读者看不到恩格斯的本来说法。

为了揭示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和巴札罗夫的混乱，我们且举出“符号论”（用象形文字这个词代替符号这个词，也是一样的）的一位著名代表赫尔姆霍茨，并看一看唯物主义者和包括马赫主义者在内的唯心主义者是怎样批判赫尔姆霍茨的。

赫尔姆霍茨这位在自然科学上极伟大的人物，也象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在哲学上是不彻底的。他倾向于康德主义，但是在他的认识论里并没有彻底地坚持这种观点。例如，在他的《生理光学》一书中对概念和客体是否相符合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说法：“……我曾把感觉叫作外部现象的符号，并且我否认感觉和它们所代表的物之间有任何的相似之处。”（法译本第 579 页，德文原本第 442 页）这是不可知论。但是在同一页的下面我们读到：“我们的概念和表象是我们所看见或我们所想象的对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我们的意识所发生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赫尔姆霍茨只是不明白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从他在后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例如，赫尔姆霍茨在稍后一点说道：“因此，我认为，在实用的真理的意义之外谈论我们表象的真理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关于物的表象，只能是客体的符号和天然标志。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标志来调整我们的活动和行动。当我们学会正确地解释这些符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助它们来调整我们的行动，获得所期望的结果……”这是不对的。赫尔姆霍茨在这里滚入主观主义，否

从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当他用下面这句话来结束这一段的时候，他达到了极端错误的地步：“观念和它所代表的客体，显然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两种东西……”只有康德主义者才把观念和现实、意识和自然界这样割裂开来。但是，我们在稍后一点读到：“首先，谈到外部对象的质，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我们可以加之于外部对象上的所有的质，仅仅表示外部对象对我们的感官或对自然界的其他对象的作用。”（法译本第 581 页，德文原本第 445 页；我是从法译本转译的。）这里赫尔姆霍茨又转到唯物主义观点上了。赫尔姆霍茨是一个不彻底的康德主义者，时而承认先验的思维规律，时而倾向于时间和空间的“超验的实在性”（即倾向于唯物主义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时而从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外部对象中引出人的感觉，时而宣称感觉不过是符号，即某种任意的标志，这种标志是跟“完全不同的”被标记的物的世界脱离的^①。

1878 年赫尔姆霍茨在关于“知觉中的事实”的演讲中（莱克列尔把这个演讲叫作“实在论阵营中的一件大事”），曾经这样表明他的观点：“我们的感觉正是外部原因在我们的器官上所引起的作用。至于这种作用怎样表现出来，那当然主要取决于感受这种作用的器官的性质。由于我们感觉的质把引起这种感觉的外部影响的特性告知我们，所以感觉可以看作是外部影响的记号（Zeichen），但不能看作是它的模写。因为模写必须同被模写的对象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而记号却不需要同它所代表的东西有任何相似之处。”^② 如果感觉不是物的映象，而只是同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记号或符号，那末作为赫尔姆霍茨的出发点的唯物主义前提

① 参看维克多·海费尔德《关于赫尔姆霍茨的经验概念》（Victor Heyfelder. «Über den Begriff der Erfahrung bei Helmholtz»）1897 年柏林版。

② 《报告和演说》（«Vorträge und Reden»）1884 年版第 2 卷第 226 页。

就被推翻了，外部对象的存在就有些问题了，因为记号或符号完全可能代表虚构的对象，并且任何人都知道一些这种记号或符号的例子。赫尔姆霍茨继康德之后，企图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划一道原则的界限。赫尔姆霍茨对直率的、清楚的、公开的唯物主义持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见。但是他在稍后一点又说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驳倒想把生活看作是梦幻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人们可以宣称这种体系是最难令人置信的和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在这方面会同意最激烈的否定说法，但是，这种体系还是可以彻底地贯彻的……相反地，实在论的假说信赖平常的自我观察的申述（或提示，Aussage）。依据平常的自我观察，随着一定行动而发生的知觉的变化和先前的意志的冲动是没有任何心理的联系的。这种假说，把日常知觉所证实的一切东西，即在我们以外的物质世界，看作是不依赖于我们的表象而存在的东西。”（第 242—243 页）“无疑地，实在论的假说是我们所能制定的最简单的假说，它在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内是受过考验的并且是得到证实的，它的各个部分是被精确地规定了的，因而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是最有用和最有效的。”（第 243 页）赫尔姆霍茨的不可知论也是和具有康德主义成分（不同于赫胥黎的贝克莱主义成分）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相似的。

因此，费尔巴哈的继承者阿·劳坚决地批判赫尔姆霍茨的符号论，认为它不彻底地背弃了“实在论”。阿·劳说，赫尔姆霍茨的基本观点是实在论的前提，按照这种前提，“我们借助我们的感觉认识物的客观特性”^①。符号论不能和这种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对感性有些不信任，即对我

^① 阿尔勃莱希特·劳《感觉和思维》（Albrecht Rau, «Empfinden und Denken»）1896年基森版第304页。

们感官的提示不信任。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定要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因此，阿·劳说得十分正确：赫尔姆霍茨用符号论向康德主义纳贡。阿·劳说道：“如果赫尔姆霍茨始终忠于自己的实在论观点，彻底坚持物体的特性既表现物体彼此间的关系又表现物体对我们的关系这一原则，那末，他大概就不会需要这一套符号论了，就会简单明了地说，‘物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是这些物的本质的模写’。”（同上，第320页）

唯物主义者就是这样批判赫尔姆霍茨的。阿·劳是为了维护费尔巴哈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而批驳赫尔姆霍茨的象形文字论（或符号论）的唯物主义或半唯物主义的。

唯心主义者莱克列尔（很合马赫心意的“内在论学派”的代表）也责备赫尔姆霍茨不彻底，责备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之间^①。但是，在莱克列尔看来，符号论不是唯物主义不足，而是唯物主义太多。莱克列尔写道：“赫尔姆霍茨认为，我们意识的知觉给我们的证据，足以认识超验原因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超验原因的相同性或相异性。在赫尔姆霍茨看来，这足以使我们推想超验东西的领域中（即客观实在的东西的领域中）的合规律的秩序。”（第33页）莱克列尔大声疾呼地反对这种“赫尔姆霍茨的独断主义的偏见”。他叫嚷道：“贝克莱的神作为我们意识中观念的合规律的秩序的假设原因，至少能象外部的物的世界一样满足我们对说明要求的要求。”（第34页）“如果不大量地掺入庸俗实在论（即唯物主义），彻底贯彻符号论……是不可能的。”（第35页）

^① 《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第154页。

“批判唯心主义者”在1879年就是这样斥责赫尔姆霍茨的唯物主义。过了二十年，马赫的得意门生克莱因佩特在《马赫和赫兹对物理学的根本观点》^①一文中，用马赫的“最新”哲学对“过时的”赫尔姆霍茨作了如下的驳斥。我们暂时撇开赫兹（他实质上 and 赫尔姆霍茨一样不彻底）不谈，看一看克莱因佩特是怎样比较马赫和赫尔姆霍茨的。他引证了这两位著作家的许多话，特别着重地强调了马赫关于物体是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等等有名的言论，然后说道：

“如果我们探讨一下赫尔姆霍茨的思想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下列的基本前提：

（一）存在着外部世界的对象。

（二）没有某种（被认为是实在的）原因的作用，这些对象的变化便是不可想象的。

（三）‘原因按其原意是始终不变的东西，是停留或存在于不断变化的现象后面的东西，即实物及其作用的规律、力’（克莱因佩特引用赫尔姆霍茨的话）。

（四）从现象的原因中，可以在逻辑上严格地一义地导出一切现象。

（五）达到这个目的和掌握客观真理，意思是相同的，因此获得（Erlangung）客观真理是可以想象的。”（第163页）

这些前提及其矛盾以及不可解决的问题的形成，激怒了克莱因佩特，他指出，赫尔姆霍茨并不严格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有时候使用的“一些说法，有点象马赫对”物质、力、原因等“这些词的纯粹逻辑的理解”。

^① 《哲学文库》杂志⁸¹的第2部《系统哲学》杂志第5卷（1899）特别是第163—164页。

“如果我们想起马赫的一些那样美妙、明白的名词，就不难发现我们对赫尔姆霍茨感到不满的由来。对质量、力等名词的误解理解，就是赫尔姆霍茨全部论述的毛病。要知道，这些只不过是概念即我们幻想的产物，而决不是存在于思维之外的实在。我们根本不能认识什么实在。由于我们的感官不完善，我们根本不能够从我们感官的观察中作出只有一个意思的结论。我们决不能断言，例如，在看某一标度 (durch Ablesen einer Skala) 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因为在一定的界限内，总可能有无数与所观察的事实都很相符的数字。认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某种实在的东西，这是我们完全办不到的。即使假定能够办到并且我们认识了实在，我们也无权把逻辑规律应用于实在，因为逻辑规律是我们的规律，它们只能应用于我们的概念，应用于我们的〈着重号都是克莱因佩特加的〉思想产物。在事实之间并没有逻辑的联系，而只有简单的连贯性，在这里必然判断是不可设想的。因此，说一种事实是另一种事实的原因，是不正确的。所以，赫尔姆霍茨依据这种论断所进行的整个演绎也就随之站不住脚了。最后，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任何主体而存在的真理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感觉的特性，而且因为我们既是人 (wir als Menschen)，也就根本不能理解完全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第 164 页)

读者可以看到，马赫的这位学生重复着他的老师和那个不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所爱说的话来驳斥赫尔姆霍茨的全部哲学，而且是以唯心主义的观点来驳斥的。这位唯心主义者甚至没有特别注意符号论，因为他认为符号论是对唯物主义的不关紧要的、也许是偶然的偏离。克莱因佩特把赫尔姆霍茨看作是“物理学的传统观点”即“现在大多数物理学家所持的那种观点”的代表(第 160 页)。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普列汉诺夫在阐述唯物主义时犯了明显的错误，而巴札罗夫却完全把问题搞混了，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为一谈，用“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种唯心主义胡说来驳斥“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从康德主义者赫尔姆霍茨那里出发，正如从康德本人那里出发一样，唯物主义者向左走，马赫主义者则向右走。

七 对杜林的两重批判

我们还要指出马赫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难于置信的歪曲中的一个特征。瓦连廷诺夫想用和毕希纳对比的方法来打垮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恩格斯已和毕希纳异常清楚地划清了界限，但瓦连廷诺夫还是说毕希纳有许多同普列汉诺夫相似的地方。波格丹诺夫则从另一方面对待这个问题，仿佛他是在维护那个“不知何故常常被人们轻蔑地谈论的”“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10页）。瓦连廷诺夫和波格丹诺夫在这里糊涂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轻蔑地谈论”不好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应当从中看出，他们的本意是要求正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不是要求从社会主义飞到资产阶级观点上去。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斥责不好的（主要是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但他们所根据的是更高级、更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休谟主义或贝克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经常谈论不好的唯物主义者，是由于重视他们，希望纠正他们的错误；对于休谟主义者和贝克莱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他们就会不屑于谈论，而只给这整个派别下一个更轻蔑的评语。因此，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在提到霍尔巴赫一伙、毕希纳一伙等等时所作的无数鬼脸怪相，完全是想蒙蔽大家的视听，掩

盖整个马赫主义对一般唯物主义原理的背弃，害怕正面地明显地和恩格斯论争。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二章的后面对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以及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提出了意见；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只要不想歪曲恩格斯，就不可能不了解他。恩格斯在这一章里阐明唯物主义的一切学派同唯心主义者的整个营垒、同一切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的基本区别时说道：马克思和我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责备费尔巴哈有几分怯懦和轻率，这表现在：费尔巴哈在某些地方由于某个唯物主义学派的错误而背弃了一般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不应该（*durfte nicht*）把叫卖者〈毕希纳及其一派〉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第21页）⁷⁴。只有那些由于诵读和迷信德国反动教授们的学说而失了的头脑，才会不了解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责备的性质。

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即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象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甚至想也没有想到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的〉理论”。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就在这里，恩格斯逐一地列举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基本的“局限性”（*Beschränktheit*）。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这些局限性，可是毕希纳一伙没有摆脱得了。第一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机械的”，这就是说，他们“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第19页）。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由于不懂得恩格斯的这句话，某些人是怎样经过新物理学而陷入唯

心主义的。恩格斯批驳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因，是和“近代”唯心主义（亦即马赫主义）派别的物理学家们责难它的原因不同的。第二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这就是说，“他们的哲学是反辩证法的”。这个局限性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和毕希纳一伙所共有，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对于恩格斯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例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丝毫没有理解的。第三个局限性是：“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列举并透彻地阐明了这三个“局限性”之后（第19—21页），紧接着补充说，毕希纳一伙并没有越出“这个范围”（über diese Schranken）。

只是因为这三个东西，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恩格斯批驳了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批驳了毕希纳一伙的学说！在唯物主义的其余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被马赫主义者歪曲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把这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弄得混乱不清的完全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西欧的导师和同道者看来，马赫一伙的路线和全体唯物主义者的路线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需要使这个问题混乱不清，以便把自己脱离马克思主义而转入资产阶级哲学阵营这一事实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略加修正”！

就拿杜林来说吧。我们很难想象有比恩格斯对他的批评更轻蔑的了。可是请看一看，在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同时，称赞马赫的“革命哲学”的莱克列尔，是怎样批判同一个杜林的。莱克列尔认为杜林是唯物主义的“极左派”，这派人“毫不掩饰地宣称感觉以及意识和理性的各种表现，都是动物机体的分泌物、机能、高级产物、

总效果等”^①。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在这一点上，他和杜林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他是从正相反的观点批判杜林的，是因为杜林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是因为杜林具有给信仰主义留下空子的唯心主义的奇思妙想。

“自然界本身在具有表象的生物之内起作用，也在它之外起作用，以便合规律地产生相互联系的观点，创造关于物的进程的必要知识。”莱克列尔引用了杜林的这几句话并疯狂地抨击这种观点的唯物主义，抨击这种唯物主义的“最粗糙的形而上学”、“自我欺骗”等等（第160页和第161—163页）。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他嘲笑任何的夸张，可是在承认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一点上，恩格斯和杜林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

“思维是其余一切现实的高级形态……哲学的基本前提是：物质的现实世界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并认识这个世界的意识现象群之外，不同于这种意识现象群。”莱克列尔引用了杜林的这几句话以及杜林对康德等人的一连串抨击，责备杜林有“形而上学”（第218—222页），责备他承认“形而上学的教条”等等。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着，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贝克莱主义者等等的任何违背这个真理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点上，恩格斯和杜林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如果恩格斯看到了莱克列尔和马赫是从哪一方面手携手地批判杜林的话，他就会用比他用在杜林身上的更加轻蔑百倍的话来骂这两个哲学

^① 《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1879年版第23—24页。

上的反动分子！在莱克列尔看来，杜林是有害的实在论和唯物主义的化身^①。马赫的老师 and 战友舒佩在 1878 年责备杜林的“荒谬的实在论”(Traumrealismus)^②，以报复杜林给一切唯心主义者加上“荒谬的唯心主义”这个名称。在恩格斯看来，恰恰相反，杜林是一个不够坚定、明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出现于哲学舞台上，都是当唯物主义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工人中间已经占居优势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的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葺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见狄慈根的著作），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的辩证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并没有去关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初步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不使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不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被遗忘，而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及莱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就是不能够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粪堆中啄出这颗珍珠。

只要稍微具体地想一想恩格斯和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产生时的历史条件，就会完全明白为什么他们反对使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庸俗化，甚于拥护这些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使政治民主的

① 再参看《一元论的认识论概论》1882年版第45页。

② 威廉·舒佩博士《认识论的逻辑》(Dr. Wilhelm Schupp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Logik») 1878年波恩版第56页。

基本要求庸俗化，也甚于拥护这些要求。

只有哲学反动分子的门徒们才会“看不见”这种情况，才会向读者把事情说成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懂得作一个唯物主义者是怎么一回事。

八 约·狄慈根为什么会为反动哲学家喜欢？

前面引过的格尔方德的例子已经包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准备再看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格尔方德式地对待约·狄慈根的无数例子。最好还是引用狄慈根本人的一些论述来说明他的弱点。

狄慈根说：“思想是脑髓的机能。”^①“思想是脑髓的产物……我的书桌，作为我的思想的内容，和这个思想是一致的，不是不同的。但是，在我的头脑之外的这张书桌是我的思想的对象，它和我的思想迥然不同。”（第53页）然而狄慈根对这个十分明白的唯物主义论点却作了这样的补充：“但是，非感性的表象也是感性的、物质的，即现实的……精神和桌子、光、声音之间的差别，并不比这些东西彼此之间的差别大。”（第54页）这显然是不对的。说不论思想或物质都是“现实的”，即存在着的，这是对的。但是把思想叫作物质的，这就是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面迈了错误的一步。实质上，这多半是狄慈根用语不确切，他在另一地方就正确地说道：“精神和物质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存在着的。”（第80页）狄慈根说：“思维是肉体的活动。为了思维，我需要可供思维的实物。这种实物是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提供给我们的……物质是精神的界限；精神不能超出物质的界限。精神是

^① 《人脑活动的实质》（《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1903年版第52页，有俄译本。

物质的产物，但物质是比精神的产物更大的东西……”(第64页)马赫主义者不去分析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这类唯物主义的说话，偏要抓住狄慈根的一些不确切的混乱的地方。例如，狄慈根说，自然科学家“只有在自己的领域以外”才可能成为“唯心主义者”(第108页)。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马赫主义者对此默不作声。但是在前一页上狄慈根承认“现代唯心主义有积极方面”(第106页)和“唯物主义原理有缺陷”，这必定使马赫主义者感到高兴！狄慈根没有正确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是：物质和精神的差别是**相对的**，不是**无限的**(第107页)。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唯物主义有缺陷，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有缺陷。

“普通的、科学的真理不以个人为基础。它的基础是在外面(即在个人之外)，在它的素材中；它是客观的真理……我们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哲学唯物主义者的特征是：他们把物体世界作为起点，摆在首位，把观念或精神看成结果。而他们的反对者却按宗教的办法从词中引出物……从观念中引出物质世界。”^①马赫主义者回避这种对客观真理的承认和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定义的重复。但是狄慈根却又说：“我们同样也有理由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因为我们的体系建立在哲学的总成果上，建立在对观念的科学研究上，建立在对精神本性的清楚理解上。”(第63页)抓住这些显然不正确的词句来否定唯物主义是不困难的。事实上，在狄慈根的书里，与其说是基本思想错误，不如说是措词不当，他的基本思想是要指出旧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念。

请看狄慈根关于旧唯物主义的论述：“正如我们对政治经济学

^① 《短篇哲学论文集》1903年版第59、62页。

的了解一样，我们的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历史的成果。正如我们同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判然不同一样，我们也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判然不同。我们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承认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第140页）这个“只有”是值得注意的！它包含着和不可知论、马赫主义、唯心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基础。狄慈根在这里注意的是和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但接着就是一段完全不正确的话：“物质这个概念必须扩大。它包括现实界的一切现象，因之也包括我们的认识能力和说明能力。”（第141页）这是糊涂思想，它只能托辞“扩大”唯物主义来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淆起来。抓住这种“扩大”，就是忘掉狄慈根的哲学基础，忘掉他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是“精神的界限”。在几行之后，狄慈根实际上自己就纠正了自己：“全体支配部分，物质支配精神……”（第142页）“就这种意义来说，我们可以把物质世界看作是……第一原因，看作是天地的创造者。”（第142页）狄慈根在《漫游》^①（前引书第214页）中重复说，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这是糊涂思想。如果这样，狄慈根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就会失去意义。这种对立不应当是“无限的”、夸大的、形而上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强调这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巨大的功绩）。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然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派别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和恩格斯不同，狄慈根暧昧、模糊、混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撇开他的叙述的缺点和个别的错误不谈，他很好地捍卫了

① 即《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领域中的漫游》。——编者注

“唯物主义认识论”(第 222 页及第 271 页)和“辩证唯物主义”(第 224 页)。狄慈根说:“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于承认:人的认识器官并不放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反映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第 222—223 页)“认识能力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真理泉源,而是反映世界的物或自然界的类似镜子的工具。”(第 243 页)我们的深思熟虑的马赫主义者回避研究狄慈根的每一个个别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点,而抓着他离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地方,抓着他的模糊、混乱的地方。狄慈根会为反动哲学家们所喜欢,是因为他有某些混乱的地方。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马赫主义者,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1868 年 12 月 5 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很久以前,狄慈根寄给我一部分关于《思维能力》的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是令人惊叹的思想。”(俄译本第 53 页)⁵⁵ 瓦连廷诺夫先生引用了这个评语,可是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马克思是在什么地方看出狄慈根的混乱的,是在狄慈根和马赫接近的地方呢,还是在狄慈根和马赫对立的地方?瓦连廷诺夫先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不论是狄慈根的著作或是马克思的信,他都是象果戈里小说中的彼得鲁什卡那样读的。但是要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难的。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就是瓦连廷诺夫先生们也能从这里想到:狄慈根的混乱只能在于他离开了对辩证法的彻底应用,离开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离开了《反杜林论》。

瓦连廷诺夫先生及其弟兄们现在是不是想到,马克思所指的狄慈根的混乱只是狄慈根和马赫(他从康德出发不是走向唯物主

义,而是走向贝克莱和休谟)接近的地方?或者也许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恰好把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叫作混乱,而赞成他离开唯物主义,赞成那些和《反杜林论》(在马克思参加下写成的)发生分歧的地方?

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想使人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告诉全世界,“他们的”马赫赞同狄慈根。这些人是在愚弄谁呢?我们的英雄们没有觉察到马赫赞同狄慈根的地方,恰恰就是马克思称狄慈根为糊涂人的地方!

如果给约·狄慈根一个总的评价,他是不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谴责的。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约·狄慈根多次讲到马克思,总是说他是一派之首(《短篇哲学论文集》:第4页(1873年的评论);第95页(1876年的评论)着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必要的哲学教养”,即哲学修养;第181页(1886年的评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派的“公认的创立者”)。约·狄慈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欧·狄慈根和——十分遗憾!——达乌盖同志杜撰“自然一元论”、“狄慈根主义”等等,是给他帮了倒忙。“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想不根据约·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这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是有许多伟大之处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种路线的企图!

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达乌盖同志和欧·狄慈根是怎样滚入反动哲学的。

达乌盖在《成就》^①第二七三页上写道,“甚至资产阶级的批判

^① 这里指的是达乌盖给约·狄慈根的《哲学的成就》俄译本第二版所写的一篇后记,标题为《约瑟夫·狄慈根和他的批判者普列汉诺夫》。——编者注

者也指出了约·狄慈根的哲学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内在论学派的联系”，在后面又写道：“特别是同莱克列尔的联系”（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批判”中引来的）。

毫无疑问，达乌盖是重视并尊敬约·狄慈根的。但是，由于他毫无批驳地引用资产阶级的低能著作家的评论而褻渎了狄慈根，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些资产阶级的低能著作家把信仰主义和教授们（资产阶级的“有学位的奴仆”）的最坚决的敌人同公开宣扬信仰主义的反动透顶的莱克列尔扯在一起了。很可能达乌盖只是重复了别人对内在论者和莱克列尔的评论，自己并不知道这些反动分子的著作。但是下面的话可以作为对他的一个警告：从马克思到狄慈根的一些特殊之处，然后到马赫，再到内在论者，这是一条通向泥潭的道路。不要说把狄慈根和莱克列尔扯在一起，就是把他和马赫扯在一起，也突出了糊涂人狄慈根而不是唯物主义者狄慈根。

我要保护约·狄慈根，使他不受达乌盖的侮辱。我肯定地说，狄慈根不应该受到把他和莱克列尔扯在一起的侮辱。我能够举出一位在这个问题上极有权威的人物作证，这个人象莱克列尔本人一样是个反动分子、信仰主义哲学家和“内在论者”。这个人就是舒贝特-索尔登。他在1896年写道：“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接近黑格尔，并且有或多或少的（通常是少的）理由，但他们只是使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化；参看狄慈根的著作。在狄慈根的著作中，绝对者变成宇宙，宇宙变成自在之物、绝对的主语，而宇宙的现象是谓语。狄慈根就这样使最纯粹的抽象成为具体过程的基础，当然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就象黑格尔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一样……约·狄慈根常常把黑格尔、达尔文、海克尔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混杂在一起。”（《社会问题》序言第33页）舒贝特-索尔登比马赫更能分辨

哲学上的细微差别，而马赫则随便称赞一切人，甚至称赞康德主义者耶鲁萨伦姆。

欧·狄慈根由于幼稚，竟向德国公众埋怨俄国的狭隘的唯物主义者“侮辱了”约·狄慈根；他还把普列汉诺夫和达乌盖关于约·狄慈根的论文^①译成了德文。这个可怜的“自然一元论者”其实是埋怨了自己。懂得一些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梅林在他的评论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反对达乌盖实际上是对的^②。在梅林看来，约·狄慈根一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陷入窘境（第431页），这是毫无疑问的。欧·狄慈根写了一篇冗长的哀恸的文章回答梅林。在这篇文章中，他竟说约·狄慈根“对于联合”“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这两个相互敌视的弟兄”，也许是有用的^③。

达乌盖同志，再一次警告你：从马克思到“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的道路，是一条通向泥潭的道路；这当然不是对个人说的，不是对伊万、西多尔或巴维尔^④说的，而是对一个派别说的。

马赫主义者先生们，不要叱责我抬出了“权威人士”。你们对权威人士的叱责，不过是掩饰你们以资产阶级的权威人士（马赫、彼得楚尔特、阿芬那留斯、内在论者）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考茨基）。你们最好不要提出有关“权威人士”和“权威”的问题吧！

① 见约·狄慈根《认识和真理》（*J. Dietzgen. «Erkenntnis und Wahrheit»*）1908年斯图加特版附录。

② 《新时代》杂志1908年第38期6月19日出版杂感栏第432页。

③ 《新时代》杂志1908年第44期7月31日出版第652页。

④ 意思是张三李四。——编者注

第五章

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一年前，《新时代》杂志（1906—1907年第52期）登载了狄奈-德涅斯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缺点在于，它忽视了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并且是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的认识论结论。但是，正是这个缺点使我们对这位作者的观点和结论分外感到兴趣。象本书的作者一样，狄奈-德涅斯所持的观点，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极其轻视的“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尤什凯维奇先生写道：“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者，通常是一般的、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第1页）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狄奈-德涅斯，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的最新发现（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镭等等）直接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了比较。这种比较使他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狄奈-德涅斯写道：“在自然科学的各种极不相同的领域里都获得了新知识，所有这些新知识归结起来就是恩格斯想要提到首位的一点：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对立，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分界线和差别’；虽然在自然界中有对立和差别，但是它们的固定性和绝对性只是我们加到自然界中去的。”例如，人们发现了光和电只是同一自然力的表现。化学亲和力归结为电的过程已日益成为可能。不可破坏的、不可分解的化学元素被发现是可以破坏的、可以分解的，它们的数目继续不断地增多，真好象是在跟世界的统一性开玩笑似的。镭元素已经能变成氦元素了。“就象

一切自然力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力一样，自然界的一切实物也可以归结为一种实物。”（着重号是狄奈-德涅斯加的）作者在援引一位著作家认为原子只是以太的凝结这个见解时惊叫道：“多么辉煌地证实了恩格斯的名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运动，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我们人所感知的是这种运动的各种不同形式……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然界完全和历史一样，是服从于辩证的运动规律的。”

另一方面，只要拿起马赫主义的著作或关于马赫主义的著作，就一定会有看到，它们自命不凡地引证了新物理学，而这种新物理学据说把唯物主义驳倒了，云云。这些引证是不是有根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的一些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放弃恩格斯的方法。恩格斯直率地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路·费尔巴哈》德文版第19页）⁶²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会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我们谴责马赫主义者的决不是这样的改正，而是他们的纯粹修正主义的方法。他们在批判唯物主义的形式的幌子下改变唯物主义的实质，他们采纳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论点，又毫不打算直接、公开、断然地反驳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象“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反杜林论》第50页）¹⁴这样无疑是极端重要的论断。

不言而喻，在研究现代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和哲学唯心主义

的复活的联系这一问题时，我们决不想涉及专门的物理学理论。我们想知道的只是从一些明确的论点和尽人皆知的发现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这些认识论结论是很自然地得出的，许多物理学家都提到了它们。不仅如此，在物理学家当中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派别，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形成一定的学派。因此，我们的任务仅限于清楚地说明：这些派别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它们和哲学基本路线的关系如何。

一 现代物理学的危机

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在他的《科学的价值》一书中说，物理学有发生“严重危机的迹象”，并且专用一章来论述这个危机（第8章，参看第171页）。这个危机不只是“伟大的革命者——镭”推翻了能量守恒原理，而且“所有其他的原理也遭到危险”（第180页）。例如，拉瓦锡原理或质量守恒原理已经被物质的电子论推翻了。根据这种理论，原子是由一些带有正电或负电的极微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叫作电子，它们“浸入我们称之为以太的介质中”。物理学家的实验提供出计算电子的运动速度及其质量（或者电子的质量对它的电荷的比例）的数据。电子的运动速度证明是可以和光速（每秒三十万公里）相比较的，例如，它达到光速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首先克服电子本身的惯性、其次克服以太的惯性的必要，必须注意电子的双重质量。第一种质量将是电子的实在的或力学的质量，第二种质量将是“表现以太的惯性的电动力学的质量”。现在，第一种质量证明等于零。电子的全部质量，至少是负电子的全部质量，按其起源来说，完全是电动力学的质量。质量消失了。力学的基础毁坏了。牛顿的原理即作用

和反作用相等的原理被推翻了，等等。

昂·彭加勒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遍毁灭”。他同时声明说：不错，所有上述同原理有出入的地方都属于无穷小量，——很可能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反对推翻旧定律的另外的无穷小量，——而且镗也很稀少，但是不管怎样，“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作者从这个“怀疑时期”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不是自然界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给予〈或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给予自然界”；“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这是唯心主义的结论。最基本的原理的被推翻证明（彭加勒的思想过程就是这样）：这些原理不是什么自然界的复写、映象，不是人的意识之外的某种东西的模写，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彭加勒没有彻底地发挥这些结论，他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方面没有多大兴趣。法国的哲学问题著作家莱伊在自己的《现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论》^①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方面。的确，作者本人是一个实证论者，就是说，是一个糊涂虫和半马赫主义者，但是在这里，这一点甚至还有某些方便之处，因为这样就不能怀疑他想“诽谤”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偶像。在讲到概念的确切哲学定义，尤其是讲到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不能相信莱伊，因为他也是一个教授，作为一个教授，他对唯物主义者怀着无比轻蔑的态度（何况他是以对唯物主义认识论极端无知而著名的）。不用说，对这样一些“科学大家”来说，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都完全是不在眼下的。但是莱伊仔细地、一般讲来是诚实地引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非常丰富的文献，其中不仅有法国的，而且有英

① 阿伯尔·莱伊《现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论》(Abel Rey, «La théorie de la physique chez les physiciens contemporains») 1907年巴黎弗·阿尔康出版社版。

国的和德国的（特别是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所以我们将常常利用他的这部著作。

这位作者说：一般哲学家以及那些出于某种动机想全面批判科学的人，现在都特别注意物理学。“他们在讨论物理学知识的界限和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批判实证科学的合理性，批判认识客体的可能性。”（序言第1—2页）他们从“现代物理学的危机”中急于作出怀疑论的结论（第14页）。这个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在十九世纪前六十年中，物理学家们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彼此是一致的。“他们相信对自然界的纯粹力学的解释；他们认为物理学无非是比较复杂的力学，即分子力学。他们只是在把物理学归结为力学的方法问题上，在机械论的细节问题上有分歧。”“现在，物理化学的科学展示给我们的景况看来是完全相反的。严重的分歧代替了从前的一致，而且这种分歧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基本的、主导的思想上。如果说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特殊倾向，那未免过甚其词。但是，毕竟必须确认，象艺术一样，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也有很多学派，它们的结论常常是分歧的，有时候简直是敌对的……”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危机具有多么大的意义和多么广的范围。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传统物理学认为，只要使物理学延续下去就可以达到物质的形而上学。这种物理学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这些理论完全是机械论的。传统机械论（莱伊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指的是把物理学归结为力学的观点的体系）就这样在经验结果之上，超出经验结果的范围，提供了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这不是对经验的假定的说法，而是教条……”（第16页）

我们在这里必须打断一下这位可敬的“实证论者”。很清楚，

他是在给我们描述传统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可是不愿意说出这个魔鬼（即唯物主义）的名字。在休谟主义者看来，唯物主义一定是形而上学、教条、超出经验范围的东西等等。休谟主义者莱伊由于不懂得唯物主义，所以对辩证法、对辩证唯物主义和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也就一点不了解。因此，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莱伊是完全不明白的。

“……十九世纪后半叶对传统机械论所作的批判破坏了机械论的这个本体论实在性的前提。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对物理学的一种哲学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十九世纪末几乎成为哲学上的传统的看法。依据这种看法，科学不过是符号的公式，是作记号（标记，repérage，创造记号、标志、符号）的方法。由于这些作记号的方法因学派的不同而各异，于是人们很快就作出结论说：被作上记号的东西，只是人为了标记（为了符号化）而事先创造出来（façonné）的东西。科学成了艺术爱好者的艺术品，成了功利主义者的艺术品。这些看法当然就被普遍解释为对科学的可能性的否定。只要不曲解科学二字的意义，那末，科学若是纯粹人造的作用于自然界的手段，若是单纯的功利主义的技术，它就没有权利被称为科学。说科学只能是人造的作用手段，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否定真正的科学。

“传统机械论的破产，确切些说，它所受到的批判，造成了如下的论点：科学也破产了。人们根据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机械论这一点，断定不可能有科学。”（第16—17页）

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物理学危机是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外部的偶然事件呢，还是科学突然开倒车并且完全离开了它一向所走的道路？……”

“……如果在历史上实际起过解放者作用的那些物理化学科

学在这样一次危机中毁灭，如果这次危机会使它们只具有在技术上有用的处方的价值，而使它们失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的一切意义，那末，无论在逻辑上或在思想史上都一定会发生根本的变革。物理学失去一切教育价值；物理学所代表的实证科学的精神成为虚伪的、危险的精神。”科学只能提供实用的处方，不能提供真实的知识。“对实在的东西的认识，要用其他方法去寻求……要走另外一条道路，要把认为是被科学夺去了的东西归还给主观直觉，归还给对实在的神秘感觉，一句话，归还给神秘的东西。”（第19页）

作为一个实证论者，作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物理学的危机是暂时的。莱伊怎样清洗了马赫、昂·彭加勒及其伙伴们的这些结论，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现在我们只来查明“危机”的事实和它的意义。从我们所引证的莱伊的最后几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哪些反动分子利用了这种危机并使它尖锐化的。莱伊在他的著作的序言里直率地说：“十九世纪末期的信仰主义的、反理智的运动”力图“以现代物理学的一般精神为依据”（序言第2页）。在法国，凡是把信仰置于理性之上的人都被称为信仰主义者（来自拉丁文 *fides*，信仰）。否认理性的权力或要求的学说被称为反理智主义。因此，在哲学方面，“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物理学中的新思潮则认为理论只是实践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如果莱伊使用正确的哲学用语，他就一定会这样说：为旧物理学自发地接受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被唯心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代替了，信仰主义不管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愿望如何却利用了这种代替。

但是，莱伊并没有认为这种构成危机的代替似乎是所有的新

物理学家反对所有的旧物理学家。他没有这样想。他指出，根据现代物理学家的认识论倾向，他们可分为三个学派：唯能论或概念论（conceptuelle——从纯概念一词来的）学派；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现在还支持的机械论或新机械论学派；介于这两种学派之间的批判学派。马赫和杜恒属于第一个学派；昂·彭加勒属于第三个学派；旧物理学家基尔霍夫、赫尔姆霍茨、威·汤姆生（凯尔文勋爵）、麦克斯韦以及现代物理学家拉摩、罗仑兹等人属于第二个学派。这两条基本路线（因为第三条路线不是独立的路线，而是中间的路线）的实质何在，从莱伊下面的话中可以看出：

“传统机械论建立了物质世界的体系。”它的物质构造学说所根据的是“同质的和同一的元素”，并且这些元素应当看作是“不变的、不可入的”等等。物理学“用实在的材料和实在的水泥建造了实在的建筑物。物理学家掌握了物质的元素、它们发生作用的原因和方式，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实在的规律”（第33—38页）。“这种对物理学的看法的改变主要在于：抛弃了理论的本体论价值而特别强调物理学的现象论的意义。”概念论的观点从事“纯粹的抽象”，“探求那种尽可能排除物质假说的纯粹抽象的理论”。“能量的概念已成为新物理学的基础（substructure）。所以概念论物理学多半可以叫作唯能论物理学”，虽然这个名称对于象马赫这样的概念论物理学的代表是不适合的（第46页）。

莱伊把唯能论和马赫主义混为一谈当然是不完全正确的，同样，硬说新机械论学派尽管同概念论者有着十分深刻的分歧，也会得出对物理学的现象论的看法（第48页），这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莱伊的“新”术语并没有使问题清楚，反而使问题模糊了。但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实证论者”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我们又不能撇开“新”术语。就问题的实质来说，读者定能相信，“新”学派和旧观点

的对立，是同前面援引过的克莱因佩特对赫尔姆霍茨的批判完全相同的。莱伊在介绍不同物理学家的观点时，反映出那些物理学家的哲学观点是十分含糊，动摇不定的。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物质消失了”——这句话可以表达出在许多个别问题上的基本的典型的困难，即造成这种危机的困难。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困难。

二 “物质消失了”

在现代物理学家论述最新发现的著作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例如，在乌尔维格的《科学的进化》一书中，论述物质的新理论那一章的标题是：《物质存在吗？》他在那一章里说道：“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消失了。”^①为了看看马赫主义者怎样轻易地由此作出根本的哲学结论，我们且看一下瓦连廷诺夫吧。他写道：“对世界的科学说明‘只有在唯物主义中’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论据，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荒谬的虚构。”（第67页）他把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利希当作这种荒谬虚构的破坏者举了出来，因为利希说：电子论“与其说是电的理论，不如说是物质的理论；新体系直接用电代替了物质”^②。瓦连廷诺夫先生引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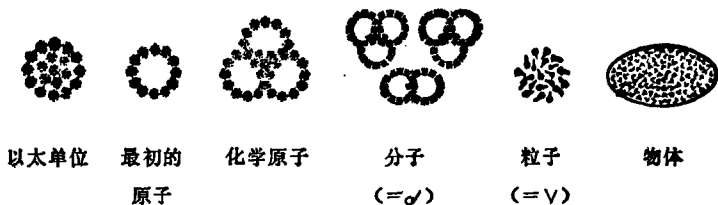
① 路·乌尔维格《科学的进化》（*L. Houlléigues. «L'évolution des sciences»*）1908年巴黎阿·科林出版社版第63、87、88页。参看他的论文《物理学家关于物质的观念》（《*Les idées des physiciens sur la matière*》），载于《心理学年鉴》杂志⁸³（1908）。

② 奥古斯托·利希《现代的物理现象理论》（*Augusto Righi. «Die moderne Theorie der physikalischen Erscheinungen»*）1905年来比锡版第131页，有俄译本。

这些话(第64页)后就大叫:

“为什么利希竟敢这样侮辱神圣的物质呢?也许因为他是唯我论者、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的批判主义者、某种经验一元论者、或者比这更坏的什么人吧?”

这种在瓦连廷诺夫先生看来是对唯物主义者的难堪的辛辣的谴责,正表明他在哲学唯物主义问题上十分幼稚无知。哲学唯心主义和“物质的消失”之间的真正关系何在,瓦连廷诺夫先生是绝对不了解的。他跟着现代物理学家所说的那种“物质的消失”,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差别毫无关系。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举出一位最彻底的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毕尔生来说吧。在他看来,物理世界是一些感性知觉群。他用下图来说明“我们所认识的物理世界模型”,并附带声明,这个图没有注意大小的比例^①:



毕尔生为了使他的图简单化,完全抛开了以太和电或正电子和负电子的比例关系问题。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毕尔生的唯心主义观点把“物体”当作感性知觉,至于这些物体由粒子构成,粒子由分子构成等等,涉及的是物理世界模型中的变化,而同物体是不是感觉的符号或者感觉是不是物体的映象这个问题丝毫

^① 《科学入门》第282页。

无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依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当物理学家说“物质正在消失”的时候，他们是想说，自然科学从来都是把它对物理世界的一切研究归结为物质、电、以太这三个终极的概念，而现在却只剩下后两个概念了，因为物质已经能够归结为电，原子已经能够解释为类似于无限小的太阳系的東西，在其中，负电子以一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过的，极大的）速度环绕着正电子转动。因此，物理世界可以归结为两三种元素（因为，正如物理学家贝拉所说的，正电子和负电子构成“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物质”^①），而不是几十种元素。因此，自然科学正导向“物质的统一”（同上）^②，——这就是把很多人弄糊涂了的那些话（物质消失了，电代替了物质，等等）的实在内容。“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① 莱伊的前引著作第294—295页。

② 参看奥利弗·洛治《论电子》（*Oliver Lodge. «Sur les électrons»*）1906年巴黎版第159页：“物质的电的理论”，即认为电是“基本实体”的学说，“差不多从理论上达到了哲学家一向追求的东西，即物质的统一”。再参看奥古斯托·利希《物质的构造》（*Augusto Righi. «Über die Struktur der Materie»*）1908年莱比锡版；约·约·汤姆生《物质微粒论》（*J. J. Thomson. «The Corpuscular Theory of Matter»*）1907年伦敦版；保·朗之万《电子物理学》（*P. Langevin. «La physique des électrons»*）；载于《科学总评》杂志⁸⁴（1905）第257—276页。

一般马赫主义和马赫主义新物理学的错误在于：它们忽视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这个基础，忽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差别。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因此，约·狄慈根着重指出：“科学的对象是无穷无尽的”，不仅无限大的东西，连“最小的原子”也是不可度量的、不可彻底认识的、不可穷尽的，因为“自然界的各个部分都是无始无终的”^①。因此，恩格斯引用了从煤焦油中发现茜素的例子来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为了从唯一正确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我们要问：电子、以太等等，是不是作为客观实在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呢？对这个问题，自然科学家一定会毫不踌躇地而且总是回答说是的，正如他们毫不踌躇地承认自然界在人和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一样。问题就这样得出了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解答，因为物质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不管没有重量的以太变成有重量的物质和有重量的物质变成没有重量的以太，从“常识”看来是多么稀奇；不管电子除了电磁的质量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质量，是多么“奇怪”；不管力学的运动规律只适用于自然现象的一个领域并且服从于更深刻的电磁现象规律，是多么奇异，等等，——这一切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

^① 《短篇哲学论文集》第 229—230 页。

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竟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否定了不依赖于认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的议论，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关于“实体”的议论等等，也都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结果。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新物理学是怎样无意识地本能地动摇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现象论”之间的。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资产阶

级学者所不懂得，“现象论”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主观主义的（进而便是露骨的信仰主义的）结论。

就是瓦连廷诺夫先生没有能够把他感兴趣的唯物主义问题向之请教的那个利希，在他的一本书的绪论里写道：“电子或电原子究竟是什么东西，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秘密；但是尽管这样，新理论大概注定在将来会获得不小的哲学意义，因为它将会取得关于有重量物质的结构的崭新的前提，并且力求把外部世界的一切现象归之于一个共同的起源。

“对于现代的实证论和功利主义的倾向说来，这样的好处也许是不重要的。理论可以首先被认为是一种便于整理和排列事实的手段，是一种指导人们去进一步探索现象的手段。但是，从前人们对人类精神的能力大概过于信任，把掌握万物的最终原因看得过于容易，而现在却有一种陷入相反的错误的趋向。”（前引书第3页）

为什么利希在这里要跟实证论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划清界限呢？因为，他虽然看来没有任何一定的哲学观点，却自发地坚持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承认如下的看法：新理论不仅是“方便的手段”（昂·彭加勒），不仅是“经验符号”（尤什凯维奇），不仅是“经验的协调”（波格丹诺夫）或他们给予诸如此类的主观主义谬论的其他名称，而是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更进一步。如果这位物理学家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他对于同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相反的错误的判断，也许就会成为正确的哲学的出发点。但是这些人的整个生活环境，使他们厌弃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投入庸俗的御用哲学的怀抱里去。

莱伊对辩证法也是一窍不通的。但是他也不得不确认，在现代物理学家中间有“机械论”（即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说：

走“机械论”这条路的，不只是基尔霍夫、赫兹、波尔茨曼、麦克斯韦、赫尔姆霍茨和凯尔文勋爵。“那些继罗仑兹和拉摩之后制定物质的电的理论，宣称质量是运动的函数而否认质量不变的人们，都是纯粹的机械论者；并且从某种观点看来，他们是达到机械论的顶峰(L'aboutissant)的、比任何人都更彻底的机械论者。所有这些人都是机械论者，因为他们都以实在的运动为出发点。”(着重号是莱伊加的，第290—291页)

“……如果罗仑兹、拉摩和朗之万(Langevin)的新假说被实验证实了，并且为建立物理学体系获得了十分稳固的基础，那末现代力学的规律依存于电磁学的规律就会是毫无疑问的；力学的规律就会成为特殊的情况，并且会被限制在严格规定的界限之内。质量不变和我们的惯性原理就会只对物体的中等速度有效，所谓‘中等的’这一术语是对我们的感觉和构成我们的一般经验的现象而言的。力学的全面改造就会成为必然的，因而作为一个体系的物理学的全面改造也会成为必然的了。

“这是不是说放弃了机械论呢？决不是的。纯粹机械论的传统将会继续保存，机械论将会循着它的发展的正常道路前进。”(第295页)

“电子物理学虽然应该列入具有机械论的一般特征的理论中，但是它力图把自己的体系加诸整个物理学。虽然这种电子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不是取自力学，而是取自电学的理论的实验材料，可是按其精神说来却是机械论的。因为，(1)它使用形象的(figurés)、物质的元素来表示物理的性质及其规律；它是用知觉的术语表现出来的。(2)虽然它没有把物理现象看作力学现象的特殊情况，但是却把力学现象看作物理现象的特殊情况。因此，力学的规律依然和物理学的规律有着直接的联系，力学的概念依然和物理化

学的概念是同一类的概念。在传统的机械论中，这些概念是比较缓慢的运动的模写 (calqués)。这种运动因为是唯一已知的并且可以直接观察的，所以就被看作是……一切可能有的运动的典型。最近的实验证明，必须扩大我们关于可能有的运动的观念。传统力学依然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它已经只能应用于比较缓慢的运动……对于高速度，则有另外一些运动规律。物质归结为电粒子，即原子的终极元素…… (3) 运动，空间中的位移，依然是物理学理论的唯一形象的 (figuré) 元素。(4) 最后，对于物理学、对于物理学的方法、对于物理学的理论以及它们和经验的关系的看法，仍然和机械论的看法、和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物理学的理论是完全等同的。从物理学的一般特征看来，这个见解比其他一切见解高出一筹。”(第 46—47 页)

我一大段一大段地全文摘录莱伊的文章，是因为，莱伊总是不敢提“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不这样引证就不能说明他的主张。但是不管莱伊和他所讲到的物理学家们怎样发誓不提唯物主义，然而力学是缓慢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新物理学是极迅速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毕竟还是不容置疑的。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当莱伊说在新物理学家中间有一种“对概念论〈马赫主义〉学派和唯能论学派的反动”的时候，当他把电子理论的物理学家们看作是这种反动的代表的时候 (第 46 页)，就最好不过地证实了下述事实：实质上，斗争是在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着。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只是不要忘记，除了一切有学识的市侩们对唯物主义的一般偏见之外，在最杰出的理论家的身上表现出对辩证法的完全无知。

三 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可想象的吗？

哲学唯心主义利用新物理学或由新物理学得出唯心主义结论，这不是由于发现了新种类的实物和力（即新种类的物质和运动），而是由于企图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对这种企图，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作实质性的分析。对恩格斯的“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①的论断，他们又不愿意去反驳。约·狄慈根早在1869年就在他的《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书中表述了与恩格斯相同的思想。不错，他还带着他所常有的那种想“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糊涂意图。我们暂且撇开这种意图不谈，因为这种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狄慈根同毕希纳的非辩证的唯物主义进行论争而产生的。现在来看一看狄慈根本人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说法吧。狄慈根说：“唯心主义者希望有没有特殊的一般，没有物质的精神，没有实物的力，没有经验或没有材料的科学，没有相对的绝对。”^②这样，狄慈根就把那种使运动和物质分离、使力和实物分离的意向同唯心主义联系起来，同那种使思想和大脑分离的意向并列起来。狄慈根接着说：“喜欢放弃自己的归纳科学而转向哲学思辨方面的李比希唯心地说道，力是不能看见的。”（第109页）“唯灵论者或唯心主义者相信力具有精神的即虚幻的、不可说明的本质。”（第110页）“力和实物的对立，正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一样，是自古有之的。”（第111页）“当然，没有实物的力是没有的，没有力的实物也是没有的。没有力的实物和没有实物的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唯心主义自然科学家相信力是非物质的存在，那末在这一点

^① 《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版第108页。

上他们就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看到幽灵的人。”(第114页)

我们由此看到，四十年前也有自然科学家准备承认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可想象的，而狄慈根说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看到幽灵的人。哲学唯心主义同物质和运动的分离、同实物和力的隔绝之间的联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岂不是“更经济些”吗？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假定他持着这样的观点：整个世界是我的感觉或我的表象等等(如果认为整个世界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或表象，那么因此改变的不过是哲学唯心主义的一个形式，而不是它的实质)。唯心主义者也不想否认世界是运动，就是说，是我的思想、表象、感觉的运动。至于什么在运动，唯心主义者拒绝回答，并认为这是荒谬的问题。只有我的感觉在交替变换，只有我的表象在消失和出现，仅此而已。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运动着”——这就够了。再想象不出比这更“经济的”思维了。如果唯我论者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末，任何证明、任何三段论法和任何定义都驳不倒他。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感觉、知觉、表象和一般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物质的运动。物质概念，除了表示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之外，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使运动和物质分离，就等于使思维和客观实在分离，使我的感觉和外部世界分离，也就是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否定物质和承认没有物质的运动的一般手法是：不提物质对思想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想象成仿佛并不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正被偷运进来；议论开始时不说出这种关系，以后却以比较不易觉察的方

式把它搬出来。

有人向我们说，物质消失了。他们想由此作出认识论上的结论。我们要问，思想还存在吗？如果它不存在，如果它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了，如果表象和感觉随着脑髓和神经系统的消失而消失了，那就是说，一切都消失了，作为某种“思想”（或浅见）标本的你们的议论也消失了！如果它存在，如果设想思想（表象、感觉等等）并没有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那就是说，你们悄悄地转到哲学唯心主义观点上去了。那些为了“经济”而要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人们向来就是这样，因为只要他们议论下去，他们就默默地承认了在物质消失之后思想还存在。而这就是说，一种非常简单的哲学唯心主义或一种非常复杂的哲学唯心主义被当成基础了。如果公开地把一切归结为唯我论（我存在着，整个世界只是我的感觉），那就是非常简单的哲学唯心主义；如果用僵死的抽象概念，即用不属于任何人的思想、不属于任何人的表象、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一般的思想（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作为不确定的“要素”的感觉、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等等，来代替活人的思想、表象、感觉，那就是非常复杂的哲学唯心主义。哲学唯心主义的变种可能有一千种色调，并且随时可以创造出第一千零一种色调来。而这个第一千零一种的小体系（例如，经验一元论）和其余体系的区别，对于它的创造者说来，也许是重要的，可是对于唯物主义说来，则完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出发点。重要的是：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因此，例如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一个最明显、最彻底、最厌恶闪烁其词的马赫主义者，在写他的著作中专论“物质”的第七章时，开头一节就用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标题：《万物都在运动——

但只在概念中运动》(All things move—but only in conception)。他说：“对于知觉的领域说来，什么在运动以及它为什么运动，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it is idle to ask)。”^①

因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厄运其实在他认识马赫以前就开始了，就是说从他相信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话，以为可以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了。谈一谈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早已是陈迹的插曲是很适当的，尤其是因为在讲到哲学唯心主义和新物理学的某些派别的联系时，不能避而不谈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写道：“我们已经说过，十九世纪没有完全解决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这一问题。这种实质以‘物质’为名，甚至在本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家的世界观中，还起着显著的作用……”(《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38页)

我们说过，这是糊涂思想。这里是把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在我们意识之外存在着永恒运动着和永恒变化着的物质，同承认物的不变的实质混淆起来了。不能说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入“先进的思想家”。但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他显然是不懂得。

“……人们通常还是把自然过程区分为两个方面：物质及其运动。不能说物质这一概念已经非常清楚了。对于什么是物质的问题，不容易提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有人给物质下定义为‘感觉的原因’，或者‘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但是，这里显然把物质和运动混淆起来了……”

很明显，波格丹诺夫的议论是不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唯物主义对感觉的客观泉源(感觉的原因那个说法不清楚)的承认

^① 《科学入门》第243页。

同穆勒的不可知论的物质定义（感觉的恒久可能性）混淆起来了。这里的根本错误是：作者刚要接触到感觉的客观泉源是否存在的问题时，却中途抛开这个问题，而跳到关于没有运动的物质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去了。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即使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高度“协调起来的”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即使是暂时的、在“第一次推动”之前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

“……‘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这样的定义也许是最精确的了；但是这也正如我们说物质是句子的主语，‘运动着’是句子的谓语一样，是毫无内容的。可是问题也许在于：在静力学时代，人们惯于一定把某个坚实的东西、某种‘实物’看成是主语，而象‘运动’这种不适合静力学思维的东西，他们只同意当作谓语，当作‘物质’的一种属性看待。”

这倒有点象阿基莫夫对火星派⁸⁵的责难，阿基莫夫说，在火星派的纲领中无产阶级一词没有用第一格出现过！⁸⁶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或者说世界是物质的运动，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相信物质的人们说：‘要知道，能量应该有承担者呀！……’奥斯特瓦尔德问得有道理：‘为什么呢？难道自然界一定要由主语和谓语构成吗？’”（第39页）

这个在1899年深得波格丹诺夫欢心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回答，不过是诡辩而已。我们可以反问奥斯特瓦尔德：难道我们的判断一定要由电子和以太构成吗？事实上，在思想上把作为“主语”的物质从“自然界”中排除掉，这就是默认思想是哲学上的“主语”（即

某种第一性的、原初的、不依赖于物质的东西)。被排除掉的不是主语,而是感觉的客观泉源,因此感觉变成了“主语”,就是说,不管以后怎样改扮感觉这个词,哲学变成了贝克莱主义哲学。奥斯特瓦尔德含糊地使用“能量”一词,企图以此躲避不可避免的哲学上的抉择(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然而正是他的这种企图再一次证明了诸如此类的诡计都是枉费心机的。如果能量是运动,那你们只是把困难从主语移到了谓语,只是把是不是物质在运动着的问题改变为能量是不是物质的问题。能量的转化是在我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和人类而发生的呢,或者这只是观念、象征、符号等等?“唯能论”哲学,这种用“新”术语来掩饰认识论上的旧错误的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破产了。

这里有几个说明唯能论者奥斯特瓦尔德如何混乱的例子。他在《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序言中说:“如果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就会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排除掉那种使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旧困难,那是一个很大的收获。”^①这不是收获,而是损失,因为按照唯物主义的方向还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向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奥斯特瓦尔德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所提出的正是认识论上的问题,而不是化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会由于滥用“能量”一词而得到解决,反而会混乱起来。当然,如果把物质和精神“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对立无疑会从字面上消除,但是鬼神之说的荒谬却不会由于我们称它为“唯能论的”而就消失了。在奥斯特瓦尔德的《讲演录》第三九四页上有这样的话:“一切外界现象都可以说是能量之间的过程,其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意识的过程本身就是能量的过程,它把自己的这种特性传给(aufprägen)

① 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讲演录》(Wilhelm Ostwald. «Vorlesungen über Naturphilosophie») 1902年莱比锡第2版序言第8页。

一切外界现象。”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不是我们的思想反映外部世界中的能量的转化，而是外部世界反映我们的意识的“特性”！美国哲学家希本针对着奥斯特瓦尔德讲演录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话，非常恰当地说：奥斯特瓦尔德“在这里穿着康德主义的服装出现”；我们智慧的特性使得一切外界现象成为可以解释的！^①希本说道：“很明显，如果我们这样给能量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下定义，说它还包含心理现象，那末这就已经不是科学界所承认的，甚至也不是唯能论者本人所承认的单纯的能量概念了。”自然科学把能量的转化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人类经验的客观过程，即唯物地看能量的转化。就是奥斯特瓦尔德本人在许多场合下，甚至可能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也把能量理解为物质的运动。

这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奥斯特瓦尔德的学生波格丹诺夫成了马赫的学生以后，就开始责备奥斯特瓦尔德，这不是因为奥斯特瓦尔德没有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而是因为他承认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有时候甚至把它作为基础）。唯物主义者批判奥斯特瓦尔德，是因为他常常陷入唯心主义，是因为他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波格丹诺夫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奥斯特瓦尔德，他在1906年写道：“……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敌视原子论，而在其他方面却和旧唯物主义非常接近，它引起了我最深切的共鸣。可是不久我就看出了他的自然哲学的重大矛盾：他多次强调能量概念的纯方法论的意义，但自己在许多场合下却不坚持这一点。他时常把能量从经验事实间的相互关系的纯粹符号变为经验的实体，即变为世界的物质……”（《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

^① 约·格·希本《唯能论及其哲学意义》（J. Gr. Hibben, 《The Theory of Energetics and its Philosophical Bearings》），载于《一元论者》杂志1903年4月第13卷第3期第329—330页。

16—17 页)

能量是纯粹的符号! 波格丹诺夫此后便可以随意和“经验符号论者”尤什凯维奇, 和“纯粹马赫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等去争论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 这将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因为, 重要的不是波格丹诺夫和其他马赫主义者有区别, 而是他们有共同点: 唯心地解释“经验”和“能量”, 否认客观实在。可是人的经验就是对客观实在的适应, 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唯能论”就是客观实在的模写。

“世界的材料对于它〈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无足轻重的; 旧唯物主义也好, 泛心论〈即哲学唯心主义?〉也好, 都是和它完全一致的……”(序言第 17 页) 波格丹诺夫离开混乱的唯能论, 不是沿着唯物主义的道路, 而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走的……“如果能量被认为是实体, 那末这就是减去了绝对原子的旧唯物主义, 即在存在物的连续性方面作过修正的唯物主义。”(同上) 是的, 波格丹诺夫离开“旧”唯物主义即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不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在 1906 年仍象在 1899 年一样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 而是走向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 因为没有现代信仰主义的有教养的代表、没有一个内在论者、没有一个“新批判主义者”会反对能量的“方法论的”概念, 会反对把能量解释为“经验事实间的相互关系的纯粹符号”。就拿卡鲁斯(这个人的面貌, 我们在上面已经十分熟悉了)来说吧。你们会看到, 这个马赫主义者完全是波格丹诺夫式地批判奥斯特瓦尔德的, 他写道:“唯物主义和唯能论无疑都属于同一范畴。”^①“唯物主义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少的, 因为它只告诉我们, 一切是物质, 物体是物质, 思想不过是物质的机能。而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唯能论也并不高明, 因为它

^① 《一元论者》杂志 1907 年第 17 卷第 4 期第 536 页。

只对我们说，物质是能量，心灵不过是能量的因素。”(第 533 页)

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使人们看到一个“新”术语怎样很快地时髦起来，以及人们怎样很快地就知道：表达方式的稍微改变是丝毫也没有取消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的基本派别的。如同“经验”等术语一样，“唯能论”这一术语也可以用来表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当然，彻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唯能论物理学是那些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新的唯心主义尝试的泉源，这种尝试是由于以前认为不可分解的物质粒子的分解和从来没见过的物质运动形式的发现而产生的。

四 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英国唯灵论

为了具体介绍由于新物理学的某些结论而在现代文献中展开的哲学论战，我们让直接参加“战斗”的人讲话，并且先让英国人讲。物理学家李凯尔根据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来拥护一个派别，哲学家华德则根据认识论的观点来拥护另一个派别。

1901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自然科学家会议上，物理学组主席李凯尔选择了关于物理学理论的价值、关于原子特别是以太的存在所引起的疑惑问题作自己的讲题。演讲人援用了提出这个问题的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和波英廷(符号论者或马赫主义者的英国同道者)的话，提到了哲学家华德，引证了海克尔的名著，试图来说明自己的观点^①。

^① 1901年英国科学协会格拉斯哥会议。阿瑟·威·李凯尔教授的主席致辞(The British Association at Glasgow, 1901. Presidential Address by Prof. Arthur W. Rücker), 载于《美国科学附刊》(《The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1901年第1345和1346期。

李凯尔说道：“争论的问题是：应当把那些成为最流行的科学理论基础的假说看作是我们周围世界的构造的确切描述呢，还是只看作是一种方便的虚构？”（用我们同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及其伙伴进行争论时所使用的术语来说：是客观实在的复写、运动着的物质的复写呢，或者只是“方法论”、“纯粹符号”、“经验的组织形式”？）李凯尔赞同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可以没有差别：一个只查看地图或图例上的蓝色线条的人也许和一个知道蓝色线条表示真正河流的人一样，也能够确定江河的流向。从方便的虚构这一观点看来，理论会“帮助记忆”，“整理”我们的观察，使它们和某种人造的体系相符合，“调整我们的知识”，把知识概括为方程式，等等。例如，我们可以只说热是运动或能量的一种形式，“这样来把运动着的原子的生动图景换成关于热能的平淡的（colourless）叙述，而不去确定热能的真实本性”。李凯尔完全承认在这条道路上可能获得巨大的科学成就，但是他“大胆地断言，这种策略体系不能认为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的顶峰”。问题依然存在着：“我们能不能从物质所显露的现象中推断出物质本身的构造？”“我们有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已经提供的理论概要，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理的复写，而不是真理的简单图表？”

李凯尔在分析物质构造的问题时，用空气作例子，说空气是由几种气体组成的，科学把“各种基本气体”分解“为原子和以太的混合物”。他继续说道，就在这里有人向我们大喝一声：“停住！”分子和原子是看不见的；它们作为“简单的概念（mere conceptions）”会是有用的，“但是不能把它们看作实在的东西”。李凯尔引用科学发展中的无数实例中的一个实例来排除这种反驳，这个实例就是：土星光环从望远镜里观察似乎是连续的物质。数学家用计算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并且光谱的分析证实了根据计算而得出的结

论。另一种反驳是：人们把我们从普通物质中没有感觉到的特性强加于原子和以太。李凯尔引用象气体和液体的扩散这类例子，也排除了这种反驳。许多事实、观察和实验都证明，物质是由分离的粒子或颗粒组成的。这些粒子、原子是不是和它们四周的“原初介质”、“基本介质”（以太）有区别，或者它们是处在特殊状态下的这种介质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不过它没有损害原子存在的理论。违反经验的指示，先验地否定跟普通物质不同的“准物质的实体”（原子和以太）的存在，这是没有根据的。个别的错误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但全部科学资料是不容许怀疑原子和分子的存在。

李凯尔然后举出一些新材料证明原子是由带负电的微粒（小体、电子）组成的，并且指出有关分子大小的各种实验的结果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是近似的：“第一级近似值”是直径约一百毫微米（一毫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毫米）。撇开李凯尔的个别意见和他对新活力论的批判不谈，我们现在引用他的结论：

“有些人贬低那种至今还在指导科学理论前进的思想的意义，他们常常认为，除了如下两种对立的论断，别无选择：或者断言，原子和以太不过是科学想象的虚构；或者断言，现在尚不完善的原子和以太的力学理论，如果达到完善的境地，就会使我们对实在有全面而又非常正确的看法。依我看来，中间的道路还是有的。”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里只能极其模糊地辨别东西，但是如果他没有碰到家具，没有把穿衣镜当作门走，那就是说，他正确地看见某些东西。因此，我们既不必放弃不停留在自然界的表面而要深入自然界内部的打算，也不必自以为我们已经完全揭露了我们周围世界的秘密。“可以承认，不论关于原子的本性，或是关于原子存在于其中的以太的本性，我们都没有描绘出完整的图画。可是我想指

出,尽管我们的某些理论具有近似的〈tentative,直译是:摸索的〉性质,尽管有许多局部的困难,原子论……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原子不仅是数学家(puzzled mathematicians)的辅助概念(helps),而且也是物理的实在。”

李凯尔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说。读者可以看出,演讲人并没有研究过认识论,但是实际上他无疑代表着许多自然科学家坚持了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的立场的实质是:物理学的理论是客观实在的(日益确切的)摹写。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我们对它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李凯尔哲学的不确切性的产生,是由于他不必要地维护以太运动的“力学的”(为什么不是电磁学的?)理论和不懂得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这位物理学家所缺少的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当然不算上那些迫使英国教授们自称为“不可知论者”的很重要的通常的见解)。

我们现在看一看唯灵论者华德是怎样批判这种哲学的。他写道,“……自然主义不是科学,作为它的基础的机械的自然理论,也不是科学……虽然自然主义和自然科学,机械宇宙论和作为科学的力学,在逻辑上是各不相同的东西,可是乍看起来,它们彼此是很相似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密切联系着的。自然科学和唯心主义或唯灵论派别的哲学是没有混同的危险的,因为这类哲学必然包含着对自然科学所不自觉地作出的认识论前提的批判……”^①一点不错!自然科学不自觉地承认它的学说反映客观实在,而且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和自然科学相容!“……自然主义就不同了,它象科学本身一样,在认识论方面是没有过错的。事实上,象唯物主义一样,自然主义不过是被当作形而上学看待的物理学……

^① 詹姆斯·华德《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1906年版第1卷第303页。

无疑地，自然主义不象唯物主义那样武断，因为它对最终实在的本性作了不可知论的保留声明；但是它坚决地认为这个‘不可认识的东西’的物质方面是第一位的……”

唯物主义者把物理学当作形而上学看待。好熟悉的论据！承认人以外的客观实在，被称为形而上学。在对唯物主义的这种责难上，唯灵论者同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是一致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排除众所周知的物、物体、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就不可能为雷姆克之流的“实在的概念”扫清道路！……

“……当如何更好地把全部经验系统化（华德先生，这是剽窃波格丹诺夫的！）这个在本质上是哲学的问题产生的时候，自然主义者就断言，我们应当先从物理的方面开始。只有这些事实才是确切的、肯定的、严密地联系着的；一切激动人心的思想……据说都可以归结为物质和运动的十分精确的再分配……至于具有这样的哲学意义和这样的广阔范围的论断是从物理科学（即自然科学）中得出的合理的结论，这一点现代物理学家还不敢直截了当地肯定。但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认为，谁竭力揭露隐蔽的形而上学，揭穿机械宇宙论所依据的物理学实在论，谁就损害了科学的意义……”他说，李凯尔也是这样看待我的哲学的。“……事实上，我的批判（对于同样为一切马赫主义者所憎恶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完全是以物理学家的一个人数逐渐增多、影响日益扩大的学派（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的结论为根据的，那个学派驳斥这个差不多是中世纪的实在论……这个实在论很久很久没有遇到反对意见，以致人们把对它的挑战都看作是宣布科学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若怀疑基尔霍夫和昂·彭加勒（我只从许多名人中提出这两个人）这样的人想‘损害科学的意义’，这的确是奇怪的……为了把他们同我们有根据称之为物理学实在论者的旧学派分开，我们可

以把新学派叫作物理学的符号论者。这个用语是不十分恰当的，可是它至少着重指出了现在特别为我们关心的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差别。争论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不言而喻，两个学派都以同样的感性(perceptual)经验为出发点；两个学派都使用在细节上相异而在本质上相同的抽象的概念体系；两个学派都采用同样的检验理论的方法。但是一个学派认为，它愈来愈接近最终实在，愈来愈离开外表。另一个学派则认为，它只是以适宜于理智活动的、概括的记述图式来代换(is substituting)复杂的具体事实…… 不管哪一个学派都没有损害作为关于〈着重号是华德加的〉物的系统知识的物理学的价值，都同样认为物理学能够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于实际。但是两个学派在哲学上的(speculative)差别很大；在这一方面，哪一个学派正确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

这个露骨的彻底的唯灵论者提问题的方法，是非常正确和明白的。的确，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学派的~~区别只是哲学上的~~，只是认识论上的。的确，基本的差别只是在于：一个学派承认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最终的”(应当说：客观的)实在，而另一个学派则否认这一点，认为理论不过是经验的系统化、经验符号的体系等等。新物理学发现了物质的新种类和物质运动的新形式，并且趁旧物理学概念被推翻的时候提出了旧的哲学问题。“中间的”哲学派别的人们(“实证论者”、休谟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不善于明确地提出争论的问题，而露骨的唯心主义者华德则把一切面具都取下来了。

“……李凯尔的主席致辞维护物理学的实在论，反对昂·彭加勒教授、波英廷教授和我最近所维护的那种符号论的解释。”(第305—306页；华德在其著作的另一些地方，把杜恒、毕尔生和马赫也添进了名单，见第2卷第161、63、57、75、83页及其他

各页。)

“……李凯尔经常谈到‘想象的形象’，同时经常声称原子和以太是某种超乎想象的形象的东西。这种推论方法实际上就等于说：在某种场合下，我不能创造另外的形象，因而实在必须和它相似……李凯尔教授承认另外的想象的形象的抽象可能性……他甚至承认我们的某些理论的‘近似的’ (tentative) 性质和许多‘局部的困难’。归根到底，他拥护的只是一种作业假说 (a working hypothesis)，而且是一种在最近半世纪来大大丧失了权威的作业假说。但是，如果物质构造的原子论和其他理论仅仅是作业假说，而且是严格地局限于物理现象方面的假说，那末就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下述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理论断言：机械论是一切的基础；它把生命的和精神的事实归结为副现象，就是说，它使生命的和精神的事实成为比物质和运动具有更多的现象和更少的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机械宇宙论。如果李凯尔教授不公开地支持它，那末我们和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第314—315页)

所谓唯物主义断言意识具有“更少的”实在性，或者断言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世界的图象一定是“机械”图象，而不是电磁图象或某种更复杂的图象，这当然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露骨的毫不掩饰的唯心主义者华德，确实很巧妙地、比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即糊涂的唯心主义者）高明得多地抓住了“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弱点，例如，不能阐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华德反过来说，既然真理是相对的、近似的，只是“摸索到”事情的本质，那就是说，它不能反映实在！但是，唯灵论者却非常正确地提出了作为“作业假说”的原子等等的问题。现代的有修养的信仰主义（华德是从自己的唯灵论中直接引出这种信仰主义的），除了宣称自然科学的概念是作业假说之外，再也不想要什么了。自然

科学家先生们，我们把科学让给你们，请你们把认识论、哲学让给我们，——这就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神学家和教授同居的条件。

至于说到华德的认识论中同“新”物理学有关系的其他各点，还必须提一下他反对物质的坚决斗争。华德在嘲笑假说太多而且相互矛盾的时候反问道：什么是物质？什么是能量？是一种以太还是几种以太？或者是某种被人们任意地加上了未必有的新质的新的“理想液体”？华德的结论是：“除了运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确定的东西。热是运动的形态，弹性是运动的形态，光和磁也是运动的形态。正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甚至质量本身归根到底也是某种东西的运动形态，这种东西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或气体；它自身既不是物体，也不是物体的混合物；它不是现象的，也不应当是本体的；它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用语加于其上的真正的 *apeiron*（希腊哲学的用语 = 无限者、无尽者）。”（第 1 卷第 140 页）

这个唯灵论者是始终如一的，他把运动和物质割裂开来。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转化为不是具有不变质量的物体的那种东西的运动，转化为一种在未知以太中的未知的电的未知电荷的运动，——这种在实验室和工厂里发生的物质转化的辩证法，在唯心主义者看来（正如在广大的公众以及在马赫主义者看来一样），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确证，而是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专门（*professed*）解释世界的力学理论，由于力学的物理学本身的进步而遭到致命的打击……”（第 143 页）我们回答道，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力学反映这一物质的缓慢运动的规律，电磁理论反映这一物质的迅速运动的规律……“有广延性的、坚固的、不可破坏的原子，一向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柱。但是，对于这种观点来说，不幸的是，有广延性的原子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知识向它提出的要

求(was not equal to the demands)……”(第144页)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及其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它们表示我们的智慧接近于认识物质,但是这丝毫也不证明自然界、物质本身是符号、记号(即我们智慧的产物)。电子和原子相比,就象这本书中的一个句点和长三十俄丈、宽十五俄丈、高七点五俄丈的建筑物的体积相比(洛治);电子以每秒达到二十七万公里的速度运动着;它的质量随着它的速度而改变;它每秒转动五百亿兆次,——这一切比旧力学复杂得多,可是这一切都是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人的智慧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奇异的东西,并且还将发现更多的东西,从而扩大自己对自然界的统治,但这不是说,自然界是我们的智慧或抽象智慧所创造的,即华德的神、波格丹诺夫的“代换”等所创造的。

“……这个理想〈“机械论”的理想〉如果作为实在世界的理论被严格地(rigorously)实现的时候,就会使我们陷入虚无主义:一切变化都是运动,因为运动是我们所能认识的唯一变化,而运动着的东西要为我们所认识,又必须是运动……”(第166页)“正如我想指出的,物理学的进步正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可以用来反对愚昧地信仰物质和运动、反对承认它们是最最终的(inmost)实体而不是存在总和的最抽象的符号……通过纯粹的机械论,我们是永远不会达到神的……”(第180页)

好啦,这已经完全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中所说的一模一样了!华德先生,你不妨去跟卢那察尔斯基和尤什凯维奇、巴札罗夫和波格丹诺夫攀谈攀谈,他们虽然比你“害羞些”,可是宣扬的却完全是同样的东西。

五 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德国唯心主义

1896年，著名的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者柯亨，洋洋得意地给朗格所伪造的《唯物主义史》第五版写了一篇序言。柯亨大叫道：“理论唯心主义开始使自然科学家们的唯物主义动摇了，也许不久就会彻底战胜它。”（序言第26页）“唯心主义正在渗入（Durchwirkung）新物理学。”“原子论应该让位给动力论。”“惊人的转变在于，对实物的化学问题的深究，一定会根本克服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就象泰勒斯完成了实物概念的最初抽象并把这一点和关于电子的思辨推论结合起来一样，电的理论一定会在对物质的理解上引起最大的变革，并且经过物质之转化为力而导致唯心主义的胜利。”（序言第29页）

柯亨象华德一样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基本派别，不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那样，迷失在唯能论、符号论、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一元论等等唯心主义的各种细小差别之中。柯亨分析了物理学中现在同马赫、昂·彭加勒等人的名字联系着的那个学派的基本的哲学倾向，正确地指明这种倾向是唯心主义的。在柯亨看来，“物质之转化为力”是唯心主义的最大胜利，这种看法完全和约·狄慈根在1869年所揭穿的那些“看到幽灵的”自然科学家的看法一样。电被宣称为唯心主义的合作者，因为它破坏了旧的物质构造理论，分解了原子，发现了新的物质运动形式，而这些新形式极不同于旧形式，也从来没有被人考察和研究过，真是不同寻常，“奇妙非凡”，以致可以把自然界解释为非物质的（精神的、思想的、心理的）运动。我们对无限小物质粒子的知识的昨天的界限消失了，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物质也消失了（但思想仍然存在）。每一个物理学

家和每一个工程师都知道电是(物质的)运动,可是谁也弄不清楚什么东西在运动,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可以用下面这个“经济”得诱人的建议欺骗没有哲学修养的人们:让我们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吧……

柯亨竭力要把著名的物理学家赫兹列为自己的同盟者。柯亨说:赫兹属于我们,他是康德主义者,他承认先验!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争辩道:赫兹属于我们,他是马赫主义者,因为可以看到,赫兹“对于我们的概念的本质,具有和马赫相同的主观主义的观点”^①。关于赫兹是属于谁的这种可笑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怎样抓住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们的极小的错误和表达得稍微模糊的地方来证明自己替信仰主义的变相辩护是正确的。事实上,赫兹为他的《力学》^②所写的哲学序言,表明了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这个自然科学家虽然被教授们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吼声吓倒,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克服他对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自发的信念。这一点克莱因佩特自己也承认,他一方面抛给广大读者一些谎话连篇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通俗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里把马赫和赫兹并列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在专门的哲学论文中承认“赫兹跟马赫和毕尔生相反,仍然坚持全部物理学可以用力学来说明的偏见”^③,承认赫兹保持着自在之物的概念和“物理学家的普通观点”,承认赫兹“仍然坚持自在世界的存在”^④,等等。

指出赫兹对唯能论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他写道:“如果我们

① 《系统哲学文库》杂志第5卷(1898—1899)第169—170页。

② 《亨利希·赫兹全集》(Heinrich Hertz, «Gesammelte Werke») 1894年莱比锡版第3卷,特别是第1、2、49页。

③ 《康德研究》杂志1903年第8卷第309页。

④ 《一元论者》杂志1906年第16卷第2期第164页,论马赫的“一元论”的论文。

问一下，究竟为什么现代物理学在自己的论述中喜欢使用唯能论的表现方法，那末回答将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最便于避开谈论我们极少知道的物……当然，我们深信：有重量的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对于原子的大小及其运动，在某些场合下，我们是相当清楚的。但是原子的形状、它们的结合和它们的运动，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是完全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关于原子的观念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而有意思的目标，尽管它们决不是特别适合于用作数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前引书第3卷第21页）赫兹期望对以太的进一步研究能得到对“旧物质的本质即它的惯性和引力”的说明（第1卷第354页）。

由此可以看出，赫兹甚至没有想到会有非唯物主义的能量观。在哲学家看来，唯能论是从唯物主义逃到唯心主义的借口。自然科学家把唯能论看作是在物理学家离开了原子而还没有达到电子的时期（如果可以这样说）用以说明物质运动规律的方便手段。直到现在，这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着：一种假说为另一种假说所代替；关于正电子还什么也不知道；仅仅在三个月前（1908年6月22日），柏克勒尔向法兰西科学院报告，他发现了这个“物质的新组成部分”^①。唯心主义哲学怎么能不利用这样有利的情况；人类的智慧还仅仅在“探索着”“物质”，因此，“物质”还不过是“符号”等等而已。

比柯亨反动得多的另外一个德国唯心主义者爱德华·冯·哈特曼，用一整本书专门论述《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②。作者对他拥护的那个唯心主义变种所发表的特殊议论，我们当然不感兴趣。

① 《科学院会议报告汇编》（《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第1311页。

② 《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1902年莱比锡版。

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只是指出,这个唯心主义者也确认莱伊、华德和柯亨所确认的那些现象。哈特曼说:“现代物理学是在实在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只是现代的新康德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思潮,才使得人们唯心地解释物理学的最后成果。”(第 218 页)在哈特曼看来,最新物理学的基础有三个认识论的体系:物质运动论(来自希腊文 hyle=物质和 kinesis=运动,即承认物理现象是物质的运动)、唯能论和动力论(即承认没有实物的力)。当然,唯心主义者哈特曼拥护“动力论”,从“动力论”推出自然规律是宇宙思想的结论,一句话,用心理的东西“代换”物理的自然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物理学家拥护物质运动论;这个体系“最常被应用”(第 190 页);它的严重缺点是“纯粹物质运动论有产生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危险”(第 189 页)。作者完全正确地把唯能论看成一种中间体系,并把它叫作不可知论(第 136 页)。当然,它是“纯粹动力论的同盟者,因为它排除实物”(序言第 6 页,正文第 192 页);但是它的不可知论,哈特曼不喜欢,因为这是一种同真正德国黑帮分子的真正唯心主义相矛盾的“英国狂”。

看一看这位具有不调和的党性的唯心主义者(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怎样向物理学家说明走这一条或那一条认识论路线究竟是什么意思,会得益不少。关于对物理学的最新结论的唯心主义解释,哈特曼写道:“在追求这种时髦的物理学家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完全认识到这种解释的一切意义和一切后果。他们没有看出,物理学及其特殊规律之所以保持了独立意义,只是因为物理学家们违反自己的唯心主义而坚持了实在论的基本前提,这些前提就是:自在之物的存在,自在之物在时间上的实在的可变性,实在的因果性……只有在这些实在论的前提(因果性、时间、三维空间具有超越的意义)

下,就是说,只有在自然界(物理学家就是论述它的规律的)符合于自在之物的王国的条件下……才谈得到不同于心理规律的自然规律。只有当自然规律在不依赖于我们思维的领域中起作用时,它才能说明:从我们的映象中得出的逻辑上必然的结论,是一种未知物在自然科学上的必然结果的映象,而这些映象在我们的意识中反映或标记这种未知物。”(第218—219页)

哈特曼正确地感觉到,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就是一种时髦,而不是离开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重大的哲学上的转变。因此,他正确地向物理学家们解释说,要使这种“时髦”变成彻底的完整的哲学唯心主义,必须根本修改关于时间、空间、因果性以及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不能仅仅认为原子、电子、以太是简单的符号、简单的“作业假说”,也要宣布时间、空间、自然规律和整个外部世界是“作业假说”。要就是唯物主义,要就是以心理的东西普遍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有很多人喜欢把二者混淆起来,可是我和波格丹诺夫不在其列。

死于1906年的一位德国物理学家波尔茨曼,曾不断地反对马赫主义流派。我们已经指出过,他把马赫主义简单明白地归结为唯我论,反对“迷醉于新的认识论教条”(见本书第1章第6节)。波尔茨曼当然害怕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甚至还特别声明一句:他决不反对神的存在^①。但是他的认识论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正如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史家君特^②所认为的,它表达了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意见。波尔茨曼说:“我们是从万物在我们的感官上所引

① 路德维希·波尔茨曼《通俗论文集》1905年莱比锡版第187页。

② 济格蒙德·君特《十九世纪无机自然科学史》(Siegmond Günther, «Geschichte der anorganischen Naturwissenschaften im 19. Jahrhundert») 1901年柏林版第942页和第941页。

起的印象中认识万物的存在的。”(前引书第 29 页) 理论是自然界即外部世界的“模写”(或摄影)(第 77 页)。波尔茨曼指出,对那些说物质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的人来说,别的人也不过是他的感觉而已(第 168 页)。这些“思想家”(波尔茨曼有时这样称呼哲学唯心主义者)给我们描绘了“主观的世界图景”(第 176 页),而作者却宁愿要“更简单的客观的世界图景”。“唯心主义者把物质象我们的感觉一样是存在的这一论断,比作那种觉得被敲打的石头也会感到疼痛的孺子之见。实在论者把那种认为不能设想心理的东西是从物质或者甚至是从原子的活动中产生的见解,比作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的见解:他断言太阳距离地球不可能有二千万哩,因为这一点他不能设想。”(第 186 页)波尔茨曼没有放弃把精神和意志想象为“物质粒子的复杂作用”的科学理想(第 396 页)。

波尔茨曼屡次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反驳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他证明:奥斯特瓦尔德既不能驳倒也不能取消动能的公式(速度之平方乘以质量的一半);奥斯特瓦尔德是在错误的圈子里兜来兜去,起初从质量中导出能量(承认动能公式),然后又把质量下定义为能量(第 112、139 页)。这不由使我想起了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三卷里所转述的马赫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用马赫的《力学》^①时写道:“在科学中,物质的概念归结为出现在力学方程式中的质量系数,而根据精密的分析,这个系数就是两个物理的复合(即物体)相互作用时的加速度的倒数。”(第 146 页)显然,如果以某一物体为单位,那末其他一切物体的运动(力学的)都能用加速度的简单比例表达出来。但是“物体”(即物质)还决不因此就消失,就不再离开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当整个世界归结为电

① 即《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编者注

子的运动时,可以从一切方程式中消去电子,因为到处都是指电子,而电子群或电子聚合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归结为它们的相互加速度,——如果运动的形式也象在力学中那样简单。

波尔茨曼在反对马赫一班人的“现象论的”物理学时,肯定地说:“那些想以微分方程式来排除原子论的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144页)“如果对微分方程式的意义不抱幻想,那就不能怀疑:世界图景(用微分方程式表明的)仍旧必然是原子论的图景,是排列在三维空间中的巨大数量的物依照一定规则在时间上变化着的图景。这些物当然可以是一样的或不一样的,不变的或可变的”等等(第156页)。波尔茨曼在1899年慕尼黑自然科学家会议的讲演中说:“十分明显,现象论的物理学只是穿上了微分方程式的外衣,实际上它的出发点也是原子状的个体(Einzelwesen)。因为不得不设想这些个体在各种不同的现象群中时而有这一种特性,时而又有一种特性,所以立刻就发现需要一种更加简单划一的原子论。”(第223页)“电子学说正发展为一切电的现象的原子理论。”(第357页)自然界的统一性显示在关于各种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式的“惊人的类似”中。“用同一方程式可以解决流体动力学的问题,也可以表达势论。流体的漩涡理论和气体的摩擦(Gasreibung)理论显出同电磁理论有惊人的类似。”(第7页)承认“普遍代换说”的人们,决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想到这样划一地“代换”物理的自然界呢?

仿佛是答复那些漠视“旧学派的物理学家”的人们似的,波尔茨曼详细地叙述了某些“物理化学”专家是怎样采取了跟马赫主义相反的认识论观点的。1903年的“最好的”综合性著作“之一”(用波尔茨曼的话来说)的作者福贝尔(Vaubel),“对常常受人赞扬的现象论的物理学采取了坚决敌视的态度”(第381页)。“他力求构

成尽量具体的、显明的关于原子和分子的本性以及作用于两者之间的力的观念。他使这种观念适应于这个领域里的最新实验”(离子、电子、镭、塞曼效应等等)。“作者在对物质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特别加以说明的时候,严格地坚持物质和能量的二元论^①。在对物质的看法上,作者也坚持有重量的物质和以太的二元论,但是他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后者看作是物质的。”(第381页)作者在自己著作(电的理论)的第二卷里,“一开始就持着如下观点:电的现象是在原子状的个体(即电子)的相互作用和运动中产生的”(第383页)。

因此,德国的情形和唯灵论者华德所承认的英国的情形是一样的,就是:实在论学派的物理学家在整理近年来的事实和发现上所获得的成就,并不下于符号论学派的物理学家;它们的根本差别“仅仅”在于认识论的观点上^②。

-
- ① 波尔茨曼是想说,作者没有企图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这里说“二元论”是可笑的。哲学上的一元论和二元论就在于:彻底或不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
- ② 在写完本书以后,我读到了埃利希·贝歇尔的著作《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Erich Becher,《Philosophische Voraussetzungen der exakten Naturwissenschaften》1907年莱比锡版),这本著作证实了本节所说的一切。作者非常接近赫尔姆霍茨和波尔茨曼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说,非常接近“羞羞答答的”、想得不彻底的唯物主义,他用自己的著作来捍卫和阐述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前提。这种捍卫自然地转为反对物理学中的时髦的然而却遭到愈来愈多的反击的马赫主义派别的斗争(参看第91页及其他各页)。埃·贝歇尔正确地指明这个派别是“主观主义实证论”(序言第3页),并把同它斗争的重心移到对外部世界的“假说”的证明上(第2—7章),移到对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们知觉而存在”(von Wahrgenommenwerden unabhängige Existenz)这一点的证明上。马赫主义者对这个“假说”的否定,常常把他们引向唯我论(第78—82页及其他各页)。马赫认为,自然科学的唯一对象是“感觉和感觉的复合,而不是外部世界”(第133页),贝歇尔把这个观点称之为“感觉一元论”(Empfindungsmonismus),并将它列入“纯意识论派别”。这后一个笨拙而

六 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法国信仰主义

在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同样坚决地抓住了马赫主义物理学的动摇。我们已经看到，新批判主义者怎样欢迎马赫的《力学》，怎样一下就指出马赫哲学基础的唯心主义性质。法国马赫主义者彭加勒(昂利)在这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带有肯定的信仰主义结论的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一下就抓住了他的理论。这种哲学的代表勒卢阿(Le Roy)发表了如下的议论：科学的真理是符号、记号；你们抛弃了想认识客观实在这一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奢望；你们要合乎逻辑些并同意我们的看法，即同意科学只对人的行动的一个领域具有实践意义，而对于另一个行动领域，宗教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并不小于科学这种看法；“符号论的”马赫主义科学没有权利否定神学。昂·彭加勒因这些结论而感到羞愧，并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特别抨击了这些结论。但是你们看一看，他为了摆脱勒卢阿式的同盟者，竟不得不采取了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彭加勒写道：“勒卢阿先生宣称理性是软弱得不可挽救的东西，只是为了给认识的其他源泉，给心情、情感、本能、信仰让出更大的地盘。”

又荒谬的术语是由拉丁文的 *conscientia* (意识) 造成的，其意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参看第156页)。在这本书的最后两章中，埃·贝歇尔很不坏地把旧的力学的物质理论和新的电的物质理论同世界图景(就是作者所说的“动力学弹性的”自然观和“动力学电的”自然观)作了比较。以电子学说为基础的后一种理论，在认识世界的统一性上前进了一步，这种理论认为，“物质世界的元素是电荷(Ladungen)”(第223页)。“任何纯粹动力学的自然观除了一些运动着的物，什么都不知道，不管这些物是叫作电子或者叫作别的什么；这些物在下一时刻的运动状态是完全合乎规律地由它们在前一时刻的位置和运动状态所决定的。”(第225页)埃·贝歇尔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作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完全无知。这种无知常常使他陷入混乱和荒谬，在这里我们不能谈论这些了。

(第 214—215 页)“我没有走到尽头”；科学的规律是符号、记号，但是“如果科学的‘处方’具有行动规则的价值，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大体上是有成效的。知道了这一点，也就是知道了某些东西；既然如此，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们不能知道任何东西呢？”(第 219 页)

彭加勒搬用了实践标准。但是他只是用来转移问题，而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因为这个标准可以作主观的解释，也可以作客观的解释。勒卢阿也承认这个标准适用于科学和工业；他只否认这个标准能够证明客观真理，因为这样一否认，他就可以在承认科学的主观（离开人类就不存在的）真理的同时承认宗教的主观真理。彭加勒看到，只搬用实践来反对勒卢阿是不行的，于是就转入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什么是科学的客观性的标准呢？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对外部对象的信仰的标准。这些对象是实在的，因为它们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qu'ils nous font éprouver*)感觉，我们觉得是由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破坏的结合剂而不是由一时之机遇所结合起来的東西。”(第 269—270 页)

发表这种议论的人可以当个卓著的物理学家，那是可能的。但是完全不容争论，只有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尤什凯维奇之流才会认真地把他看作是一个哲学家。他们宣称唯物主义被一种“理论”摧毁了，而这种“理论”一受到信仰主义的袭击却求救于唯物主义羽翼的保护！因为，如果认为感觉是由实在的对象在我们身上唤起的，认为对科学的客观性的“信仰”就是对外部对象的客观存在的“信仰”，那末这就是最纯粹的唯物主义。

“……例如，可以说，以太有着和任何外部物体同样的实在性。”(第 270 页)

假如这句话是唯物主义者说的，将不知马赫主义者会怎样地

叫嚷哩！将不知会有多少对“以太唯物主义”等等的不高明的讥诮话哩！但是这位最新经验符号论的创立者在五页之后就断言：“一切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因为我们不能思考思想之外的任何东西。”（第 276 页）你错了，彭加勒先生，你的著作证明有些人只能思考毫无意义的东西。著名的糊涂虫索列尔就属于这一类人，他肯定地说，彭加勒的关于科学价值的著作的“前两部”是“按照勒卢阿的精神写成的”，因此这两个哲学家能够在下面这点上“和解”：确证科学和世界的同一性的企图，这是一种幻想；不必提出科学能否认识自然界的问题，只要科学符合于我们所创造的机械就够了^①。

彭加勒的“哲学”只要提一提就够了，而莱伊的著作却必须详细地谈谈。我们已经指出，现代物理学的两个基本派别（莱伊称之为“概念论”和“新机械论”）的差别，可以归结为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差别。现在我们应该看一看，实证论者莱伊怎样解决同唯灵论者华德、唯心主义者柯亨和哈特曼等人的任务正相反的任务：不是附和新物理学的哲学错误及其唯心主义倾向，而是改正这些错误，证明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唯心主义的（以及信仰主义的）结论是不合理的。

象一条红线贯串着莱伊的全部著作的，是他承认如下的事实：信仰主义（序言第 2 页，正文第 17、220、362 页及其他各页）、“哲学唯心主义”（第 200 页）、关于理性的权利和科学的权利的怀疑论（第 210、220 页）、主观主义（第 311 页）等等抓住了“概念论者”（马赫主义者）的新物理学说。因此，莱伊完全正确地把分析“物理学

^① 若尔日·索列尔《现代物理学家的形而上学偏见》（*Georges Sorel, «Les préoccupations métaphysiques des physiciens modernes»*）1907 年巴黎版第 77、80、81 页。

家对物理学的客观价值的看法”(第3页)作为他的著作的中心。

这个分析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拿经验这个基本概念来说吧!莱伊肯定地说,马赫(为了简单明了,我们以马赫作为莱伊所说的概念论学派的代表)的主观主义解释是一种误解。诚然,“十九世纪末哲学的主要的新特征”之一是,“越来越精巧、越来越色彩繁多的经验论走向了信仰主义,即承认信仰至上,这种经验论曾经一度成为怀疑论用来反对形而上学论断的强大武器。实质上,这件事情的发生还不是因为人们通过各种难以觉察的细微差异慢慢地歪曲了‘经验’一词的真正意义吗?事实上,如果在经验的存在条件下,在确定和研磨经验的实验科学中去考察经验,那经验就会把我们引向必然性和真理”(第398页)。毫无疑问,广义的整个马赫主义无非是通过难以觉察的细微差异歪曲“经验”一词的真正意义!但是,仅仅非难信仰主义者的歪曲而不非难马赫本人的歪曲的莱伊是怎样纠正这种歪曲的呢?请听一听吧:“按照普通的定义,经验是对客体的认识。在物理科学中,这个定义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当……经验是我们的智慧所没有支配的东西,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意志所不能改变的东西,是现存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经验是主体面前的(en face du)客体。”(第314页)

这就是莱伊保护马赫主义的典型例子!恩格斯的天才眼光多么敏锐,他用“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这个绰号形容哲学上的最新型的不可知论和现象论的信徒。实证论者和狂热的现象论者莱伊,就是这种人里面的出类拔萃者。如果经验是“对客体的认识”,如果“经验是主体面前的客体”,如果经验是表明“某种外部的东西(quelque chose du dehors)存在着并且必然存在着(se pose et en se posant s'impose)”(第324页),那末很明显,这就是唯物主

义！莱伊的现象论和他竭力强调的言论（除了感觉之外什么也没有；客观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等等）都是用来掩蔽唯物主义的遮羞布、空洞词藻，因为他向我们说：

“我们从外部得到的、经验强加于 (imposé) 我们的东西，我们所不能创造的、不依赖于我们而产生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创造我们的东西，是客观的。”(第 320 页)莱伊以消灭概念论来维护“概念论”！他驳斥从马赫主义得出的唯心主义结论，不过是把马赫主义解释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莱伊自己承认了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的差别，却又满头大汗地去涂抹一切差别，以利于唯物主义的派别。例如，莱伊在谈到新机械论学派时说道，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它不容许“有丝毫怀疑，丝毫不信任”(第 237 页)，因为“在这里（即根据新机械论学派的学说），你们无须经过从其他物理学理论的观点出发所必须经过的一些弯路，就可以断定这种客观性”。

莱伊掩蔽的就是马赫主义的这些“弯路”，在他的全部叙述中给它们罩上了一层纱幕。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唯心主义则需要“弯路”，以便这样或那样地从精神、意识中，从“心理的东西”中“引出”客观性。莱伊写道：“物理学中的新机械论的（即占统治地位的）学派，正如人类相信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一样，相信物理学理论的实在性。”(第 234 页，第 22 节：论纲)对于这一学派说来，“理论想要成为客体的摄影(le décalque)”(第 235 页)。

一点不错。“新机械论”学派的这个基本特征不是别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不管莱伊怎样声明自己和唯物主义者绝少姻缘，不管他怎样断言新机械论者实质上也是现象论者等等，这些都不能削弱这个根本事实。新机械论者（多少有些羞羞答答的唯

物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差别的本质就在于:马赫主义者抛弃这种认识论,而抛弃这种认识论,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信仰主义。

拿莱伊对马赫关于自然界的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学说的态度来说吧!莱伊肯定地说,只是乍一看来,马赫“接近怀疑论”(第76页)和“主观主义”(第76页);如果考察一下马赫的全部学说,这种“暧昧性(équivoque)”(第115页)就消失了。莱伊考察了马赫的全部学说,从《热学》^①和《感觉的分析》里引证了许多话,特别论述了前一本书中关于因果性的一章,但是……但是他却留神地不引用马赫的最重要的话:没有物理的必然性,只有逻辑的必然性!对于这一点只能说,这不是解释马赫,而是粉饰马赫,这是抹杀“新机械论”和马赫主义之间的差别。莱伊的结论是:“马赫继续分析,并接受了休谟、穆勒和一切现象论者的结论,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因果性并不包含任何实体的东西,它只是思维的习惯。马赫接受了现象论的基本命题(因果性学说不过是这个命题的结果):除了感觉,什么也不存在。但是,马赫以纯粹客观主义的观点补充道,科学研究感觉,发现其中有永恒的共同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是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就具有与感觉同样的实在性,因为它们是通过感性的观察从感觉中汲取来的。这些永恒的共同的因素,例如能量及其转化,是使物理学系统化的基础。”(第117页)

这就是说,马赫接受了休谟的主观的因果性理论并且客观主义地加以解释!莱伊托辞规避,引用马赫的不彻底的地方来为马赫辩护,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实在地”解释经验,这个经验就会导致“必然性”。而经验是我们从外部得到的东西,如果自然界的必然性和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从外部即客观实在的自然界中得到

^① 即《热学原理》。——编者注

的，那末不言而喻，马赫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一切差别就会消失。莱伊用完全向“新机械论”投降，坚持现象论这个名词而不坚持这个派别的实质的办法来保卫马赫主义，使它免受“新机械论”的攻击。

例如，彭加勒完全按照马赫的精神为了“方便”而导出了自然规律——直到空间有三维。莱伊急忙“更正”道，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任意的”。不，“方便”在这里是表示“对客体的适应”（第196页，着重号是莱伊加的）。真是对两个学派的出色的划分，对唯物主义的出色的“反驳”……“即使彭加勒的理论在逻辑上和机械论学派的本体论解释〈即这个学派对理论是客体的摄影一点的承认〉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彭加勒的理论可以作为哲学唯心主义的支柱，但是，至少在科学的领域内，它是同古典物理学思想的一般发展十分一致的，同那种把物理学看作象经验一样（即象产生经验的感觉一样）客观的客观知识的倾向十分一致的。”（第200页）

一方面，不能不意识到；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一方面，虽然彭加勒站在马赫的“概念论”和新机械论的中间，可是他与新机械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马赫和新机械论之间却似乎完全没有任何鸿沟；另一方面，彭加勒和古典物理学是完全一致的，而古典物理学，用莱伊自己的话来说，是完全坚持“机械论”的观点的。一方面，彭加勒的理论可以作为哲学唯心主义的支柱；另一方面，它是和经验一词的客观解释相符的。一方面，这些恶劣的信仰主义者抛弃了“经验是客体”这一正确观点，通过不显著的偏差歪曲了经验一词的意义；另一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只意味着经验是感觉，——这一点不论贝克莱或费希特都是完全同意的！

莱伊所以陷于混乱，是因为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

任务：“调和”新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的对立。他企图削弱新机械论学派的唯物主义，把那些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客体的摄影的物理学家们的观点归之于现象论^①。他还企图削弱概念论学派的唯心主义，删去了这个学派的信徒的最坚决的言论并用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来解释其他言论。莱伊对唯物主义的否认是何等的虚伪、勉强，这可从他对麦克斯韦和赫兹的微分方程式的理论意义的评价这一例子看出来。马赫主义者认为，这些物理学家把自己的理论局限于方程式的体系这一情况就是驳斥唯物主义；方程式就是一切，没有任何物质，没有任何客观实在，只有符号。波尔茨曼驳斥了这个观点，他懂得自己是在驳斥现象论的物理学。莱伊也驳斥了这个观点，他以为自己是在拥护现象论！他说：“不能根据麦克斯韦和赫兹局限于同拉格朗日的动力学微分方

① “调和者”阿·莱伊不仅给哲学唯物主义对问题的提法蒙上一层纱幕，而且也回避了法国物理学家们的表达得极为明显的唯物主义言论。例如，他就没有提到1902年逝世的阿尔弗勒德·高尔纽(A. Cornu)。这位物理学家轻蔑地说，奥斯特瓦尔德之流“对科学唯物主义的破坏(或征服, Überwindung)”，是妄自尊大地杂感式地阐述问题(见《科学总评》杂志1895年第1030—1031页)。阿·高尔纽在1900年巴黎国际物理学家大会上说过：“……我们认识自然现象愈深，笛卡儿对宇宙结构的大胆见解，即关于物理世界除了物质和运动以外什么都有的见解，就会更加发展和更加精确。在那些作为十九世纪末的标志的伟大发现之后，物理的力的统一性问题……重新提到了首位。我们的现代科学界领袖——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如果只提已死的著名物理学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更精确地确定自然界和推测无重量的物质(matière subtile)即世界能量的承担者的特性……这显然是返回到笛卡儿的思想……”(《国际物理学会议报告汇编》1900年巴黎版第4卷第7页)。律西安·彭加勒在其著作《现代物理学》(Lucien Poincaré. «La physique moderne»)一书中正确地指出，这种笛卡儿思想曾为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所接受和发展(1906年巴黎版第14页)，但是，不论这位物理学家或阿·高尔纽都不晓得，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使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前提摆脱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的。

程式相类似的方程式，就不把他们列入‘机械论者’。这不是说，根据麦克斯韦和赫兹的见解，我们不能在实在的元素上建立电力机械理论。相反地，这件事是可能的，这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电的现象可以由一种在形式上和古典力学的一般形式相同的理论来说明……”（第 253 页）在目前解决问题方面的含糊不清的地方，“将随着那些列入方程式中的量的单位（即元素）的性质愈显得精确而减少”。在莱伊看来，物质运动的某些形式尚未经过研究，不能成为否定运动的物质性的理由。不是作为公设而是作为经验和科学发展的结果的“物质的同类性”（第 262 页），即“物理学对象的同类性”，乃是应用度量 and 数学计算的条件。

下面是莱伊对认识论上的实践标准的看法：“与怀疑论的前提相反，我们有理由说，科学的实践价值是从它的理论价值中产生的……”（第 368 页）关于马赫、昂·彭加勒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十分明确地接受怀疑论的前提这一点，莱伊宁愿默不作声……“这两种价值是科学的客观价值的不可分割和绝对平行的两个方面。说某一自然规律有实践的价值……实质上就是说这一自然规律有客观的意义……对客体的作用，是以客体的变化即客体的反应为前提的，而后者是同前者所依据的我们的期待或预见相符合的。因此，这些期待或这些预见包含有被客体和我们的行动所控制着的要素……这就是说，在这些各种各样的理论中有一部分客观的东西。”（第 368 页）这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只能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因为其他的观点，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否认实践标准的客观意义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意义的。

总结：莱伊决不是从华德、柯亨一班人那方面去研究问题的，可是他却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承认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是划分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主要学派的基础。

七 俄国的“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

由于我的工作的某些恶劣条件，我几乎完全不可能看到同本章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俄国著作。我仅仅论述我国著名的哲学上的黑帮分子洛帕廷先生的一篇对于我的题目很重要的论文：《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这篇论文发表在去年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⁸⁷（1907年9—10月号）上。道地俄国的哲学唯心主义者洛帕廷先生对现代欧洲唯心主义者的态度，大致象“俄罗斯人民同盟”⁸⁸对西欧反动党派的态度一样。但是正因为这样，看一看同类的哲学倾向怎样表现在全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中，是更有教益的。洛帕廷先生的这篇论文，是对已故的俄国物理学家施什金（死于1906年）的一篇法国人所说的 *éloge*（颂词）。使洛帕廷先生感到钦佩的是：这位对赫兹和新物理学很感兴趣的有教养的人，不仅是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第339页），而且是虔诚的教徒、索洛维约夫哲学的崇拜者等等。尽管洛帕廷先生主要是“向往”哲学和警察之间的交界领域，但是，他却能够提供某些说明这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的认识论观点的材料。洛帕廷先生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实证论者，他毫不倦怠地致力于对科学的研究方法、假说和事实的最广泛的批判，看它们是否适合于作为建立完整的完备的世界观的手段和材料。在这方面，施什金同他的很多同代人是完全相反的。在我以前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的一些文章里，我早就不止一次地力求阐明所谓科学的世界观是由哪些五花八门的、往往不可靠的材料构成的。这些材料中有已经证明了的事实，有多少有点大胆的概括，也有在当时对某一科学领域很方便的假说，甚至还有科学上的辅助的假想；这一切都被看重为不容争辩的客观真理，因而必须

根据这些真理去判断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其他一切思想和信仰，批驳其中一切不包含在这些真理中的东西。我国的极有天才的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维尔纳茨基教授，曾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类想使当前历史时期的科学观点成为一成不变的、人人都应遵守的独断主义体系的企图是多么空虚和不妥当。但是犯这种过错的，不仅是广大的读者（洛帕廷先生的注释：“许多通俗书籍是为这些读者写的，这些书籍的使命是使他们深信有那样一种解答一切问题的科学手册。这一类的典型著作是毕希纳的《力和物质》或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也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各专门部门的个别学者；特别奇怪的是，官方哲学家们也常常犯这种错误，他们的一切努力有时候只是为了证明：除了各专门科学的代表在他们以前讲过的东西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只不过用自己的特殊语言复述了一遍。

“施什金决没有一点先入的独断主义。他始终不渝地拥护对自然现象的机械论解释，但是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只是一种研究方法……”（第341页）哼，哼，旧调重弹呀！……“他决不认为机械论揭示了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只把它看作是一种为了科学而把现象结合起来并加以论证的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在他看来，机械论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远不是互相一致的……”这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的作者们所说的完全一样！……“正相反，他觉得在高级问题上机械论应该采取一种严格批判的、甚至是调和的立场……”

用马赫主义者的话来讲，这叫作“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陈腐的、狭隘的、片面的”对立……“关于物的始源和终结、关于我们精神的内在本质、关于意志自由、关于灵魂不灭等等问题，就其意义的现实广度来说，不能属于机械论的研究范围，因为机械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适用的自然界限只限于物理经验的

事实……”(第342页)最后两行无疑是从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中抄来的。

施什金在他的论文《从机械论观点来看心理生理现象》(《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第1卷第127页)里写道：“光可以看作是实物，是运动，是电，是感觉。”

毫无疑问，洛帕廷先生十分正确地把施什金列入实证论者，这个物理学家完全是属于新物理学的马赫主义学派的。施什金想用他关于光的论断来说明：各种不同的考察光的方法是从某种观点看来同样合理的各种不同的“组织经验”(按照波格丹诺夫的用语)的方法，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要素的联系”(按照马赫的用语)；物理学家们的关于光的学说无论如何不是客观实在的摄影。但是施什金论述得糟透啦。“光可以看作是实物，是运动……”自然界中既不存在没有运动的实物，也不存在没有实物的运动。施什金的前两个“对比”是没有意义的。“看作是电……”电是实物的运动，因此在这里施什金也错了。光的电磁理论已经证明，光和电都是同一实物(以太)的运动形式。“看作是感觉……”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映象。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的。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看法。红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钟频率约为四百五十亿兆的以太的振动。天蓝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钟频率大约六百二十亿兆的以太的振动。以太的振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光的感受而存在的。我们的光的感受依赖于以太的振动对人的视觉器官的作用。我们的感受反映客观实在，即反映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的感受而存在的东西。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看法。施什金的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断是最廉价的诡辩。

八 “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和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关于从最新物理学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的问题，并且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丝毫用不着怀疑，我们面前有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它不从属于某一哲学体系，而是由哲学之外的某些一般原因所产生的。上面对各种材料的简要评论，无疑地表明了马赫主义是和最新物理学“有联系”的，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散播的关于这一联系的观念是**根本不正确的**。不论在哲学上或在物理学上，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盲目地赶时髦，不能够根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某些思潮作一个总的概述，并评定它们的地位。

关于马赫哲学是“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最新的自然科学的实证论”等等（波格丹诺夫在《感觉的分析》序言第四、十二页里这样讲过；参看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一班人的同一说法）的一切空泛议论充满了双重的虚伪。因为，第一，马赫主义在思想上只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中的一个学派有联系。第二，在马赫主义中，和这个学派有联系的，不是使马赫主义同其他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流派和体系相区别的东西，而是马赫主义和一般哲学唯心主义共有的东西，这一点是主要的。只要看一看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思潮，就会毫不怀疑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我们拿这个学派的物理学家德国人马赫、法国人昂·彭加勒、比利时人杜恒、英国人毕尔生来说吧！正如他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正确地自白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他们有同一基础和同一倾向。但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包括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学说，特别是不包括马赫关于“世界要素”的学说。后三个物理学家甚至都不知

道这两种学说。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哲学唯心主义。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倾向于它。拿那些以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为靠山的、极力在认识论上加以论证和发展的哲学家来说吧。你们在这里又会看见德国的内在论者，马赫的门徒，法国的新批判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英国的唯灵论者，俄国的洛帕廷，还有唯一的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贯彻哲学唯心主义，不过在贯彻过程中，有的是急急忙忙地倾向信仰主义，有的则对信仰主义怀着个人的厌恶（波格丹诺夫）。

我们所考察的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或者是怀疑这种实在的存在。在这里，这个学派离开了被公认为在物理学家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它被不确切地称为实在论、新机械论、物质运动论；物理学家自身一点没有自觉地去发展它），是作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学派而离开唯物主义的。

要说明“物理学”唯心主义这个听起来很古怪的术语，必须提一提最新哲学和最新自然科学的历史上的一段插话。1866年，费尔巴哈攻击著名的最新生理学的创始者弥勒，并把他列入“生理学唯心主义者”之中（《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97页）。这个生理学家的唯心主义在于：他研究我们感官结构对感觉的功用，例如，他指出光的感觉是由对眼睛的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的，但他由此否定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映象。费尔巴哈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自然科学家的一个学派的这种“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即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生理学成果的倾向。生理学和哲学唯心主义，主要是和康德派唯心主义的“联系”，后来很长时间被反动哲学利用了。朗格曾以生理学为王牌来拥护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驳斥

唯物主义；而内在论者（波格丹诺夫很不正确地把他们归入介于马赫和康德之间的路线）中的雷姆克却在 1882 年特别起来反对用生理学虚伪地证实康德主义^①。那时许多大生理学家追求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正如现在许多大物理学家追求哲学唯心主义一样，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物理学”唯心主义，即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的唯心主义，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也没有证实唯心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这正如朗格和“生理学”唯心主义者曾经枉费心机一样。在这两种场合下，自然科学一个部门中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所显露的趋于反动哲学方面的倾向，是一时的波折，是科学史上的暂时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一向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和现代物理学危机的联系是公认的。莱伊写道：“怀疑论针对现代物理学而进行批判的论据，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切怀疑论者的著名论据：意见分歧〈物理学家中间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对怀疑论者说的，毋宁说是对象布吕纳提埃尔那样的信仰主义的公开信奉者说的。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对物理学的客观性提出任何反证”。“物理学的历史同其他各种历史一样，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时期，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理论形式、不同的理论概貌……只要有一个由于确定了当时尚不知道或者未被充分认清的某一重要事实而影响了物理学的各个部分的发现，物理学的整个面貌就改变了，从而新的时期就开始了。在牛顿的发现以后，在焦耳—迈尔和卡诺—克劳胥斯的发现以后，都有过这种情形。在发现放射性以后，显然正在发生同样的情形……在若干年后观察事件的历史家，会很容易地在

^① 约翰·雷姆克《哲学和康德主义》（*Johannes Rehmke. «Philosophie und Kantianismus»*）1882 年爱森纳赫版第 15 页及以下各页。

现代人只看到冲突、矛盾、分裂成各种学派的地方，看到一种不断的进化。看来，物理学近年来所经历的危机也是属于这类情况的（不管哲学的批判根据这个危机作出什么结论）。这是新的大发现所引起的典型的发育上的危机（*crise de croissance*）。不容争辩，危机会引起物理学的改革（没有这点就不会有进化和进步），可是这种改革不会改变科学精神。”（前引书第 370—372 页）

调和者莱伊极力要把现代物理学的一切学派联合起来反对信仰主义！这是好心肠的虚伪，然而终究是虚伪，因为马赫—彭加勒—毕尔生学派之倾向于唯心主义（即精致的信仰主义），是不容争辩的。与不同于信仰主义精神的“科学精神”的基础相关联的并为莱伊所热烈拥护的那个物理学的客观性，无非是唯物主义的“羞羞答答的”表述方式。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的危机，但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现代物理学的危机就在于它不再公开地、断然地、坚定不移地承认它的理论的客观价值，——调和者莱伊常常力图掩盖这个事实，但是事实胜于一切调和的企图。莱伊写道：“数学家习惯于研究这样一种科学，它的对象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学者的智慧所创造的，或者说，它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不涉及具体现象，因此他们对物理学就形成了一种过于抽象的看法：他们力图使物理学接近数学，把数学的一般理论搬用于物理学……一切实验家都指出，数学精神侵入（*invasion*）物理学的判断方法和对物理学的理解中去了。对物理学的客观性的怀疑和思想动摇，达到客观性所必经之弯路以及那些必须克服的障碍，往往不就是因为这种影响（并不因为它有时是隐蔽的而就失去效力）而产生的吗？……”（第 227 页）

这说得好极了！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就是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

“……数学的抽象虚构，似乎在物理的实在和数学家们用以理解关于这个实在的科学的方法之间放置了一重屏障。数学家们模糊地感觉到物理学的客观性……当他们着手研究物理学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是客观的，他们力求依靠实在并固守这个据点，可是旧日的习惯占了上风。所以，甚至在想比旧的机械论物理学更稳固和更少用假说来描绘世界的唯能论中，即在力图摹写(décalquer)感性世界而不是重建感性世界的唯能论中，我们都会看到数学家们的理论……数学家们曾经用一切办法拯救物理学的客观性，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客观性就谈不上物理学……但是他们的理论的复杂性，他们所走的弯路，给人留下了一种笨拙的感觉。这未免过于虚假，太牵强附会，太矫揉造作(édifie)；实验家在这里感觉不到那种不断和物理的实在接触时所产生的自发的信赖……实质上，这就是一切物理学家——这些人首先是物理学家(他们是不可胜数的)，或者仅仅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话，这就是整个新机械论学派所说的话……物理学的危机在于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在十九世纪，物理学的进步和数学的进步使这两门科学密切地接近了……理论物理学变成了数学物理学……于是形式物理学即数学物理学的时期开始了；这种物理学成为纯粹数学的了，它已不是物理学的一个部门，而是数学的一个部门。在这个新阶段上，数学家已习惯于使用那种成为自己工作的唯一材料的概念的(纯粹逻辑的)要素，对于一些他认为不大顺从的粗糙的物质要素感到拘束，因而不能不尽量地把它们抽象化，把它们想象为完全非物质的、纯粹逻辑的，或者甚至根本漠视它们。作为实在的、客观的材料的要素，即作为物理要素的要素，完全消失了。

剩下的仅仅是微分方程式所表示的形式关系……只要数学家不为自己头脑的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所愚弄……就会找到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的联系；但是初看起来，以及对于没有基本知识的人说来，显然会觉得这是随意构成的理论……概念、纯粹概念代替了实在的要素……这样，由于理论物理学采用了数学形式，便历史地说明了……物理学的微恙 (le malaise)、危机及其表面上同客观事实的脱离。”(第 228—232 页)

这就是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第一个原因。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同类的单纯的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遗忘了物质。“物质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方程式。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仿佛是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旧的康德主义的观点；理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精神欣喜若狂的柯亨，竟鼓吹在中学教授高等数学，以便把我们的唯物主义时代正在排除的唯心主义精神灌输给中学生^①。当然，这是反动分子的虚妄的梦想；事实上，除了少数专家对唯心主义的极短暂的迷恋而外，这里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什么的。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象快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一样，企图用十分巧妙的手段来人为地为那种由于无知、闭塞和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荒诞不经的现象而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信仰主义保持或寻找地盘。

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

^① 阿·朗格《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von A. Lange) 1895 年第 5 版第 2 卷序言第 49 页。

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这个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对于说明马赫主义在理论上的厄运，几乎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莱伊象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当然，“过分的相对主义纵然不是在实践上，也是在逻辑上近似真正的怀疑论”（第 215 页），但是，在彭加勒的理论中，是没有这种“过分的”相对主义的。嘿，象秤药那样多秤一些或少秤一些相对主义就可以改善马赫主义！

实际上，关于相对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指出的。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单是不了解这一点，就足以使别尔曼先生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这本荒谬的小册子失去一切意义，因为别尔曼先生关于他所完全不懂得的辩证法只是重复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看到，一切马赫主义者在认识论上处处都显露出同样的无知。

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包括那些被认为是不容争辩和不可动摇的旧真理在内，都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能有的。不仅整个马赫主义，而且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都是这样断定的。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一切论点，对于所有研究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现代”认识论却是无法理解的。

象马赫所特别推荐的杜恒的《物理学理论》^①或斯塔洛的《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②这一类著作，非常显明地表明：这些“物理学”唯心主义者最重视的是证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实质上他们动摇于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这两个处于不同的时代并且从不同的观点研究问题的作者（杜恒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工作了二十年；斯塔洛以前是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却又因他在1848年出版了一本按照老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写出的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而感到羞惭），都极力攻击原子论—机械论的自然观。他们证明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证明不能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我们知识的界限，证明那些持这种自然观的作家们的许多概念是僵化的。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这也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摒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例如，斯塔洛说：“机械论的理论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把局部的、观念的、也许是纯粹假设的属性群或个别属性实体化，把它们说成是各种各样的客观实在。”（第150页）如果你们不拒绝承认客观实在并攻击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那末这是对的。斯塔洛并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他不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

杜恒也是一样。他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

① 比·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

② J. B. Stallo.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Physics》，1882年伦敦版。有法译本和德译本。

多在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一切规律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它们是近似的”(第280页)。马克思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为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他们由于不能够正确地阐明相对主义，便从相对主义滚入唯心主义。杜恒写道：“其实，物理学的规律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而是近似的。”(第274页)这个“而是”，就已经是开始虚伪，开始抹杀近似地反映客体的(即接近于客观真理的)科学理论和任意的、空想的、纯粹假设的理论(例如，宗教理论或象棋理论)之间的界限。

这种虚伪竟使杜恒宣称，“物质的实在”是否和感性现象相符合这一问题是形而上学(第10页)，因此取消关于实在的问题吧；我们的概念和假说不过是符号(*signes*) (第26页)、“任意的”(第27页)构造等等。从这里只走一步就达到唯心主义，就达到杜恒先生按照康德主义的精神所宣扬的“信仰者的物理学”(莱伊，第162页；参看第160页)。而好心肠的阿德勒(弗里茨)——也是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所想出的最聪明的办法是这样地“改正”杜恒的理论；杜恒所排除的“隐藏在现象后面的实在，只是作为理论对象的实在，而不是作为现实对象的实在”^①。这是我们早就熟悉的根据休谟和贝克莱的观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但是杜恒说不上有什么自觉的康德主义。他不过是也象马赫一样地动摇着，不知道使自己的相对主义依据什么。在好多地

① 杜恒著作的德译本的《译者前言》，1908年莱比锡伊·巴特出版社版。

方，他非常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他说，我们知道声音“怎样同我们发生关系，而不知道它本身即在发声的物体中的状态。声学使我们可以认识这种实在，而我们的感觉从其中只能发现外表和浮面的东西。声学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知觉只是把握着我们称之为声音的那种表面现象的地方，确实有一种很小的、很迅速的周期运动”等等（第7页）。物体不是感觉的符号，而感觉却是物体的符号（更确切些说是映象）。“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不停地提供材料的自然界和不停地进行认识的理性之间的不间断的斗争”（第32页）——自然界正如它的极微小的粒子（包括电子在内）一样是无限的，可是理性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也是无限的。“实在和物理学规律之间的斗争将无限地延续下去；实在迟早将会对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规律予以无情的驳斥——用事实驳斥；可是物理学将不断地修正、改变、丰富被驳斥的规律。”（第290页）如果作者坚持这个客观实在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那末这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十分正确的阐述。“……物理学的理论不是今天方便明天就不适用的纯粹人造的体系；它是实验方法所不能直接〈直译——面对面地，face à face〉观察的那些实在的越来越真实的分类，越来越清楚的反映。”（第445页）

马赫主义者杜恒在最后一句话里向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递送秋波，似乎给“实验方法”以外的方法开辟了一条小路，似乎我们不能径直地、直接地、面对面地认识“自在之物”。但是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越来越真实，那末这就是说，这个理论所“反映”的“自然”，实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的，这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部门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

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立刻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①。现代物理学正在走这一步，而且将来还会走这一步，但它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有意识地而是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着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经验符号论、经验一元论等等，都是这一类废物。

① 著名的化学家威廉·拉姆赛说道：“常常有人问我，难道电不是一种振动吗？怎样才能用微小的粒子或微粒的移动来说明无线电报呢？回答如下，电是物，它就是（着重号是拉姆赛加的）这些极小的微粒，但是当这些微粒离开某一物体时，一种象光波一样的波就通过以太散播开来，而无线电报使用的就是这种波。”（威廉·拉姆赛《传记和化学论文集》1908年伦敦版第126页）拉姆赛叙述了镭转化为氦之后指出，“至少有一种所谓的元素现在不能再看作是最终物质了，它本身正转化为更简单的物质形式。”（第160页）“负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而正电是一种失去负电的物质，也就是说，是减去这种带电物质的物质。”（第176页）“什么是电？从前人们以为有两种电，正电和负电。当时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过去一向叫作负电的东西，确实（really）是一种实体。事实上负电的粒子的相对重量已经测定；这种粒子约等于氢原子质量的七分之一……电的原子叫作电子。”（第196页）如果我们的那些以哲学题目著书立说的马赫主义者们的会动脑筋，那末他们就会了解，“物质消失了”、“物质归结为电”等等说法，不过是下述真理在认识论上的一种无力的表现；科学成功地发现了物质的新形式、物质运动的新形式，并把旧形式归结为新形式，等等。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切尔诺夫先生和《俄国财富》杂志^①的撰稿者，他们不论在哲学或历史上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反对者；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那一伙马赫主义者，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千方百计地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但是，这些保证大部分仅仅是保证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曾打算稍微系统地去阐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在社会科学中的真实倾向。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先谈载入文献中的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言论，然后再谈他们的俄国弟子们的言论。

一 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在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漫游

1895年，当阿芬那留斯还在世的时候，在他所主编的哲学杂志上登载了一篇他的弟子布莱的文章：《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①。经验批判主义的所有的老师不仅攻击公开的自觉的哲学

^① 弗·布莱《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F. Blei. «Die Metaphysik in der Nationalökonomie»), 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9卷(1895)第378—390页。

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且还攻击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而这位弟子则攻击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他攻击的矛头指向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学派，但是我们感到兴趣的仅仅是那些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经验批判主义论据的性质。

布莱写道：“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整个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说明经济生活现象时使用着形而上学的前提；它从经济的‘本性’中‘引出’经济的‘规律’，人对于这些‘规律’说来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东⋯⋯ 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现代理论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它的全部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对认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理论家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从什么土壤中结出的果实。他们自命为不依靠任何前提的实在论者，因为据说他们研究的是这样‘平凡的’(nüchterne)、‘实际的’、‘明显的’(sinnfällige)经济现象⋯⋯ 他们都跟生理学上的许多流派有着血缘的类似，这种类似只是同一父母遗传给子女的(在我们这个场合就是指：形而上学和思辨遗传给生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有一派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阿芬那留斯及其学派常常把普通名词加上引号，想表示：他们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才懂得这类庸俗的、未被“认识论的分析”所清洗过的用语的全部“形而上学性”)，没有把他们在过程中所见到的东西(das Gefundene)跟个人的行为联系起来；生理学家把个人的行为当作‘灵魂的作用’(Wirkungen der Seele)而摒弃于他们的研究之外，而这一派经济学家则宣称个人的行为对‘内在的经济规律’来说是毫无意义的(eine Negligible)。”(第378—379页)“马克思的理论从一些构造出来的过程中把‘经济规律’确定下来，并且这些‘规律’是处于依存的生命系列的起首部分(Ini-

tialabschnitt), 而经济过程则在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经济学家把‘经济’变成了一个超验的范畴, 他们在这个范畴中发现了他们所需要发现的那些规律, 即‘资本’、‘劳动’、‘地租’、‘工资’、‘利润’的‘规律’。经济学家把人变成了‘资本家’、‘工人’等等柏拉图式的^①概念。社会主义把‘唯利是图’这个特性加给‘资本家’, 自由主义把‘贪得无厌’这个特性加给工人——并且这两个特性可以从‘资本的合乎规律的作用’中得到说明。”(第381—382页)

“马克思在着手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时候, 就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了, 而他的认识目的是要给这个世界观提供‘理论根据’以‘保证’它的起首价值。马克思在李嘉图那里发现了价值规律, 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从李嘉图那里得出的结论, 并不能满足马克思‘保证’他的被导致生活差异状态的E价值⁹⁰即‘世界观’的要求, 因为这些结论已经以‘因工人遭到掠夺而感到愤怒’等等形式成为他的起首价值的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些结论被当作‘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结论而被摈弃了, 因为它们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已。‘但是,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 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是不公正的, 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 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 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 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 可能隐藏着真实的经济内容’(恩格斯给《哲学的贫困》所写的序言)⁹¹。”

布萊在引证恩格斯的话以后继续写道: “在这段引文中, 我们

^① 意即“抽象的”。——编者注

在这里感到兴趣的依存系列的中间部分 (Medialabschnitt) 被取出来了 (abgehoben, 这是阿芬那留斯的术语, 意即被意识到了, 被划分出来了)。在‘认识’了‘对不公正性的道德意识’后面一定隐藏着‘经济事实’这一点以后, 接着就是最终部分 (Finalabschnitt: 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陈述, 即 E 价值, 即经过起首、中间、最终 (Initialabschnitt, Medialabschnitt, Finalabschnitt) 这三个阶段或三个部分的生活差异)……即对这个‘经济事实’的‘认识’。或者换句话说, 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事实’中‘重新发现’起首价值、即‘世界观’, 从而‘保证’这个起首价值。不管‘被认识的东西’如何出现于最终部分 (Finalabschnitt), 在依存系列的这种一定的变化中, 已经包含着马克思的形而上学了。作为独立的 E 价值、作为‘绝对真理’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是‘事后’通过‘特殊的’认识论、即通过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和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论证的……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 ‘主观’‘真理’借助于剩余价值的概念在‘经济范畴’的认识论里面找到了它的‘客观真理’, 对起首价值的保证完成了, 形而上学在事后受到了认识的批判。”(第 384—386 页)

我们这样冗长地引证这一大段极其无聊的胡话、用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打扮起来的伪学者的无稽之谈, 读者大概会生我们的气吧。但是, *wer den Feind will verstehen, muß im Feindes Lande gehen*——谁要了解敌人, 就得深入敌巢⁹²。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杂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 是真正的敌巢。我们请求读者暂时克制对资产阶级科学小丑的正当的嫌恶, 去分析一下阿芬那留斯的这位弟子和同事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 马克思是“形而上学者”, 他不了解认识论的“概念批判”, 他没有研究一般认识论, 而是直接把唯物主义塞到自己的“特殊的认识论”中去。

在这个论据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布莱个人和仅仅是属于布莱个人的。我们已经几十次、几百次地看到，所有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和所有俄国马赫主义者都非难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更确切些说，他们都重复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用以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那些陈腐的论据。

第二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生理学）同样是形而上学的。在这个论据上，“有过失的”不是布莱，而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因为，正是他们把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持有的（根据他们两人自己的承认和所有那些多少知道这个问题的人的判断）自发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叫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并向它宣战。

第三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宣称“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量（quantité négligeable），它认为人是一种“偶然的東西”，它使人服从某种“内在的经济规律”，它不去分析 des Gefundenen（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等等。这个论据完全是重复经验批判主义的那一套“原则同格”的思想，即重复阿芬那留斯理论中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谬论。在布莱看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丝毫找不到这类唯心主义的谬论，而且从这种谬论的角度来看，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从它的最基本的哲学前提上完全加以推翻，是不可避免的事。这完全正确。

第四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它完全不知道任何“生活差异”以及诸如此类玩弄生物学术语的把戏（反动教授阿芬那留斯的“科学”就是由这类把戏构成的）。从马赫主义的观点看来，布莱的这个论据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和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学的”玩意之间的鸿沟的确是一目了然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事实上是在步布莱的后尘。

第五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有党性和偏颇性，在解决问题时有先入之见。不仅布莱一个人，而且整个经验批判主义，都妄图主张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既不主张社会主义，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不去区分哲学上两个根本的不可调和的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力图超乎二者之上。我们曾经在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上探讨过马赫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当我们在社会学中碰见它的时候，就不应当再感到惊讶了。

第六个“论据”是讥笑“客观”真理。布莱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并且是十分公正地感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经济学说都彻底地承认客观真理。布莱正是因为客观真理的思想而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并一下子宣布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除了马克思的“主观的”观点以外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样，他就正确地表达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倾向。

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摒弃布莱（他们大概是会摒弃他的），那末我们要对他们说：脸丑不要怪镜子。布莱是一面忠实地反映着经验批判主义的倾向的镜子，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摒弃布莱，这不过是证明他们有善良的愿望以及想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结合起来的荒唐的折衷主义的企图而已。

我们现在从布莱转到彼得楚尔特。布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而彼得楚尔特却被列谢维奇这类杰出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称为老师。布莱直接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这位不屑于限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计较的彼得楚尔特，却以正面的形式叙述了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是把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作个对照。

彼得楚尔特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二卷的标题是：《趋向稳定》（«Auf dem Wege zum Dauernden»）。作者把这种趋于稳定

的倾向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他说：“人类的最终(endgültig)稳定状态的主要特征，可以从形式方面加以揭示。这样我们会获得伦理学、美学和形式认识论的基础。”(序言第3页)“人类的发展有它自己本身的目的”，它趋向于“完善的(vollkommenen)稳定状态”(第60页)。表明这一点的特征是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例如，到老年时还没有“变聪明”、还没有平静下来的狂热的激进分子难道是很多的吗？不错，这种“过早的稳定”(第62页)乃是庸人的特性。但庸人不正是构成“密集的多数”吗？(第62页)

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加上了着重号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思维和创造性的一切目的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稳定性。”(第72页)解释如下：许多人看见墙上的画挂斜了或桌子上的钥匙放歪了就“不顺眼”，这种人“不一定就是学究”(第72页)，他们“感觉到有些无秩序”(第72页，着重号是彼得楚尔特加的)。一句话，“趋于稳定的倾向，乃是追求终极的、按本性来说是最终的状态的努力”(第73页)。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第二卷第五章(标题是：《趋于稳定的心理倾向》)中引来的。对于这个倾向的证明的确是最有力的。例如：“喜欢爬山的人都是被一种冲动所驱使，他们总想登峰造极，达到最初意义上即空间意义上的最高点。他们所以要爬上顶峰，往往不只是为了登高远眺或借此在新鲜空气和大自然中锻炼身体，而且是因为在一切有机生物内部深藏着一种欲望，一旦开始活动，就一定要依着既定方向达到自然的目的为止。”(第73页)再如：人们为了搜集成套的邮票不知花了多少的金钱！“只要看一看邮票商人的价格表，你就会头昏眼花……然而有什么东西比这种趋向稳定的欲望更自然和更容易使人理解呢？”(第74页)

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不理解稳定原则或思维经济原则的整个广度。彼得楚尔特为这些门外汉详细地发挥了自己的“理论”。他

在第二十八节中说道：“同情是对稳定状态的直接需要的表现”，“同情不是所看到的苦难的重复、增加，而是由于这个苦难而引起的苦难…… 同情的这种直接性是应当加以大力强调的。如果我们承认它，那末也就是承认，别人的幸福象自己的幸福一样能够得到直接的最先的关心。这样我们就否定了对道德学说的一切功利主义的和幸福主义的论证。由于人性追求稳定和宁静，因而它在根本上不是恶的，而是乐于援助他人的。”

“同情的直接性常常表现在援助的直接性中。为了救人，人们常常不加思索地跳到水里去援助快要淹死的人。与死亡挣扎的人的样子是难堪的，它迫使救他的人忘掉自己的其他义务，甚至冒着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堕落的醉汉的无用生命，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情能够驱使一个人做出一些从道德观点看来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这类难以言传的蠢话，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著作中，竟占了几十几百页的篇幅！

道德是从“道德的稳定状态”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第2卷第2篇：《灵魂的稳定状态》，第1章：《论道德的稳定状态》）。“稳定状态，就它的概念而言，在自己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中都不包含任何变化的条件。因此，用不着进一步论证就可以断定：这种状态没有给战争以任何可能性。”（第202页）“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就是从这种最终(endgültig)稳定状态的概念中产生的。”（第213页）这种“稳定状态”不是从宗教而是从“科学”中产生的。不是象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将由“多数”去实现这种稳定状态，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权力“能够帮助人类”（第207页）。不是的，只有“自由的发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事实上，资本的利润不是在减少，工资不是经常在增加吗？（第223页）关于“雇佣奴隶”的一切论断都是不正确

的(第229页)。过去可以打断奴隶的腿而不受任何处罚,而现在呢?现在却不是这样,“道德的进步”是无庸置疑的:请看一看英国的大学公社、救世军(第230页)、德国的“伦理协会”吧!为了“美学的稳定状态”(第2篇第2章),“浪漫主义”被摈弃了。而浪漫主义包括着自我的无节制扩大的一切形态,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玄秘主义、唯我论、利己主义、“多数对少数的暴力压制”以及“由国家来组织一切劳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第240—241页)^①。

布莱、彼得楚尔特和马赫在社会学中的漫游,可以归结为市侩的无限愚蠢,他们在“新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体系和术语的掩饰下沾沾自喜地散布陈词滥调。浮夸的言辞、牵强的三段论法、精巧的经院哲学,一句话,无论在认识论上或社会学上,都是一路货色,都是用同样诱人的幌子掩盖着的同样反动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俄国的马赫主义者。

二 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 “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波格丹诺夫在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的发展》(1902)这篇论文中(见《社会心理学》第35页及以下若干页),引证了“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一书的序言⁸³里用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段著名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克思的这段话时说:“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虽然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可

^① 马赫在同样的精神下赞同伯倍尔和门格尔的那种保证“个人自由”的官僚社会主义,同时他认为,与这种社会主义“不能匹比”的社会民主派的学说面临着“比君主制或寡头制国家中的奴隶制更加普遍、更加厉害的奴隶制”的威胁。见《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第80—81页。

是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了。”(第 37 页)因此,作者想从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去修正或发展这个理论。下面就是作者的主要的结论: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形态属于广义的类即生物学适应的类。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确定了社会形态的范围;为了确定这个范围,不仅要确定类,而且要确定种……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等同的。”(第 50、51 页,着重号是波格丹诺夫加的)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已由奥尔托多克斯指出了(《哲学概论》1906 年圣彼得堡版第 183 页及以前几页)。但是波格丹诺夫仅仅用谩骂来回敬她,挑剔引文中的错误,说原本本来是“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而奥尔托多克斯却引成了“按完全的含义”。错误是有的,作者完全有权利加以纠正,但抓住这点大叫“曲解”、“伪造”等等(《经验一元论》第 3 卷序言第 44 页),这不过是用拙劣的字眼来模糊分歧的实质而已。不管波格丹诺夫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词想出了怎样“确切的”含义,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所引举的他的那个论点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等同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等同的一样。人们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互相交往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等同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波格丹诺夫企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来悄悄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这显然是按照唯心主义的精神来歪曲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想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巴札罗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说明（不是对经验一元论的说明，怎么可能呢！因为在这些“体系”之间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别！）：“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识 and 存在等同的理论。我们再回想一下内在论者舒佩（他象巴札罗夫之流一样拚命地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心主义者，并且也象波格丹诺夫一样坚决地声明他的用语有特别“确切的”含义）的公式：“存在就是意识。”现在请把这个公式和内在论者舒贝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驳斥对比一下。舒贝特-索尔登是这样说的，“任何物质生产过程，对于它的观察者来说，总是一种意识现象……在认识论上，外部生产过程不是第一性的（*prius*），而主体或诸主体才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甚至纯粹物质的生产过程也不能引导〈我们〉脱离意识的普遍联系（*Bewußtseinszusammenhangs*）。”^①

波格丹诺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诅咒唯物主义者，说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诅咒都不能改变简单明了的事实。“经验一

^① 见前引书《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第 293 页和第 295—296 页。

元论者”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发展，跟唯心主义者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者舒贝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驳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波格丹诺夫硬说自己不是唯心主义者；舒贝特-索尔登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巴札罗夫甚至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这时代，哲学家不能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唯心主义的敌人”。马赫主义者先生们，现在是应该懂得这点的时候了！

内在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和经验一元论者，在枝节问题上，在唯心主义的一些说法上相互争论着，而我们则根本否定他们三者所共有的一切哲学基础。就算波格丹诺夫在接受马克思的一切结论时最好心好意地宣传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等同”，但我们还是要说：波格丹诺夫减去“经验一元论”（更确切些说，减去马赫主义），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的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果有个别的人把这种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调和起来，那末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比他们的理论要好些，但决不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理论上的歪曲是正当的。

波格丹诺夫把自己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结论调和起来，为这些结论牺牲了起码的彻底性。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所有者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所有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

在而存在和发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波格丹诺夫承认这一切。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的理论，事实上被他抛弃了，它成了空洞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成了象“普遍代换说”或“要素”说、“嵌入”说以及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谬论那样空洞的、僵死的、无用的东西。但是“死的抓住了活的”，僵死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违反波格丹诺夫的意志并且不依赖于他的意识，把他的哲学变成了替舒贝特-索尔登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服务的工具，这些反动分子在几百个教授讲坛上用几千种调子把这种死的东西当作活的东西来宣传，以便反对活的东西，窒息活的东西。波格丹诺夫本人是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死敌。但波格丹诺夫的“代换”说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的理论，却为这些反动派服务。这是可悲的事实，然而的确是事实。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

动谬论的怀抱。

下面还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僵死的哲学唯心主义怎样抓住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在1901年所著的《什么是唯心主义?》(同上,第11页及以下若干页)一文中写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人们对进步的见解是一致的地方或是不一致的地方,进步观念的基本含义始终只有一个,即意识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完满与和谐。进步概念的客观内容就是如此……如果现在把我们所得出的心理学上的进步观念和以前阐明的生物学上的进步观念(“生物学上所谓的进步就是生命总数的增长”,第14页)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深信:前者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从后者中引伸出来……由于社会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所以进步观念的内容在这里也还是生活的完满与和谐的不断增长,我们只要加上‘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几个字就行了。当然,社会进步的观念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第16页)

“我们发现……唯心主义表现着人的心灵中社会性较多的情绪对社会性较少的情绪的胜利;进步的理想乃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在唯心主义心理中的反映。”(第32页)

不用说,在这一套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玩意中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那里,我们可以随便地发现许多比这毫不逊色的定义,这些定义除了说明作者的“一片好心”以外,什么也没有说明,而且表明作者完全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和什么是唯物主义。

在《经验一元论》第三卷中,在1906年写的《社会选择》(方法的基础)这篇文章中,作者一开始就首先驳斥“朗格、费利、伏尔特曼及其他许多人的折衷主义的社会生物学的企图”(第1页),而在

第15页上提出了下述的“研究”的结论：“我们可以把唯能论和社会选择的基本联系表述如下：

“社会选择的每一活动，就是与它有关的社会复合的能量的增加或减少。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肯定的选择’，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否定的选择’。”(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象这样一些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谬论竟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难道还能想象出比罗列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意义而且也不能有什么意义的生物学和唯能论的名词更无益、更死板、更烦琐的事情吗？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的迹象，只有定义的制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地是社会整体的能量的增长……”——这句话的后半句，无疑地只是用一些毫无内容的术语重复前半句，这些术语看起来好象使问题“深刻化”了，事实上却跟朗格之流的折衷主义的生物社会学的企图没有丝毫区别！——“但是，由于这个过程性质不和谐，因而它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能量的急剧减少，肯定的选择被否定的选择代替了”(第18页)。

你们看，这不是朗格吗？在危机的现成结论上只是贴上生物学的和唯能论的标签，既没有补充一点具体材料，也没有说明危机的性质。这一切虽然都是出于一片好意，因为作者想证实和加深马克思的结论，但实际上他却用枯燥不堪的僵死的经院哲学来冲淡马克思的结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结论的重复而已，至于对这种结论的全部“新的”论证、全部“社会唯能论”(第34页)和“社会选择”，都只不过是名词的堆砌，对马克思主义的十足的嘲弄而已。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在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上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呆板了。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在这里企图把他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结论塞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去（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修正”），而是在于他所采用的方法，即“社会唯能论”的方法完全是虚伪的，是跟朗格的方法毫无区别的。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论工人问题……》第2版）对我大加赞扬……目的是为了标榜他自己是一个伟人。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冒充学者、高傲无知、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⁹⁴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本质，不是指出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

主义⁹⁵硬搬进社会学,而是指出: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以及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认识论上并没有发展唯心主义而是在旧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上增添一些胡诌瞎说的术语(“要素”、“原则同格”、“嵌入”等等)一样,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上即使最诚挚地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还是以空洞浮夸的唯能论的和生物学的词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俄国的马赫主义(更确切些说,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的历史特点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杜林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所有这些哲学家和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都是一些侏儒和可怜的庸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

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因此，应当把波格丹诺夫这一流人叫作颠倒过来的俄国的毕希纳分子和杜林分子。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波格丹诺夫的“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集体的劳动过程”等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或“经验符号”，物理自然界是“心理的东西”的“派生物”，等等。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三 关于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苏沃洛夫同志的《社会哲学的基础》，正因为这本书是一部集体创作，所以成了一把散发着浓烈气味的花束。巴札罗夫说，恩格斯认

为“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别尔曼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提倡宗教，尤什凯维奇把“逻各斯”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波格丹诺夫把唯心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格尔方德清洗掉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而苏沃洛夫写了《社会哲学的基础》这篇论文。当这些人在你们面前同时出现的时候，你们立即会感觉到新路线的“精神”。量转变成了质。早先各自在个别的论文和书籍中探索着的“探索者”，现在发表了真正的宣言。他们之间的局部的分歧，由于他们共同反对（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消除了；作为一个流派的马赫主义的反动面貌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苏沃洛夫的这篇文章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有趣：他既不是经验一元论者，也不是经验批判主义者，而只是“实在论者”，因而使他与这伙人接近的，不是作为哲学家的巴札罗夫、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所具有的特点，而是他们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共同立场。我们把这位“实在论者”的社会学的议论和经验一元论者的议论比较一下，会有助于描绘他们的共同倾向。

苏沃洛夫写道：“在调节世界过程的各种规律的序列中，特殊的和复杂的规律可以归入一般的和简单的规律，而一切的规律都从属于一个普遍的发展规律，即力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的实质在于：任何力的体系消耗愈少，积蓄愈多，而且消耗为积蓄服务得愈好，那末这个体系就愈能保存和发展。很早就引起客观合目的性这一观念的各种动的平衡形态（太阳系、地球上各种现象的循环、生命过程）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正是由于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能量的保存和积蓄，即由于它们内部的经济。力的经济规律，是统一和调节任何发展——无机界、生物界和社会的发展——的一个原则。”（第 293 页，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我们的“实证论者”和“实在论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各种普遍规律”呵！但遗憾的只是这些规律并不比杜林所同样轻而易举地迅速地制造出来的那些规律高明半分。苏沃洛夫的“普遍规律”与杜林的普遍规律一样，都是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词句。试把这个规律应用于作者所列举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领域，即应用于无机界的发展。你们就会看到，除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任何“力的经济”在这里都是用不上的，更不必说“普遍地”应用了。至于“能量守恒”定律，作者早已把它看成特殊规律^①（第292页）而剔在一边了。撇开这一规律，无机界的发展领域中还剩下些什么呢？作者所以能够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改变（“改良”）为“力的经济”规律的那些补充、复杂化、新发现或新事实在哪里呢？这样的事实或发现根本没有，苏沃洛夫甚至提也没有提到。他不过是象屠格涅夫小说里的巴札罗夫⁹⁶所说的，为着显示自己非同小可，把大笔一挥，立即描画出“实在一元论哲学”的新的“普遍规律”（第292页）。瞧，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我们比杜林差吗？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发展领域，即生物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机体是通过生存斗争和选择而发展的，那末在这里，力的经

^① 值得注意的是，苏沃洛夫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叫作“唯能论的基本原理的确立”（第292页）。我们的这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实在论者”是否听说过，无论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之流或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都认为这个定律是唯物论基本原理的确立？我们的这位“实在论者”是否考虑过这个差别有什么意思？没有！他只是追求时髦，重复奥斯特瓦尔德的话，如此而已。这类“实在论者”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在时髦面前五体投地，而恩格斯则不然，他掌握了能量这个对他来说是新的名词，并在1885年（《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和1888年（《路·费尔巴哈》）开始使用它，而是把它和“力”、“运动”这些概念同等使用的，掺杂在一起使用的。恩格斯善于吸收新名词来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实在论者”和其他的糊涂虫，虽然抓住了这个新名词，可是看不出唯物主义和唯能论之间的区别！

济规律是普遍的呢，还是力的浪费“规律”是普遍的？不要紧！对于“实在一元论哲学”说来，普遍规律的“含义”在一个领域里可以理解为这样，而在另一个领域里可以理解为那样，例如，理解为有机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虽然普遍规律因此就成为空话，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把“一元论”的原则保持下来就行了。至于第三个领域（社会领域）里，又可以从第三种意义上来理解“普遍规律”，可以把它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普遍规律”之所以需要，就是为了用它去套随便什么东西。

“虽然社会科学还很年轻，然而它已经有了坚固的基础和完善的概括，在十九世纪它发展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是马克思的主要功绩。他把社会科学提高到了社会理论的水平……”恩格斯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可是在苏沃洛夫看来这还不够。如果我们把科学（在马克思以前有社会科学吗？）和理论区别开来，就会更加有力些，至于说这种区别毫无意义，那没有什么关系！

“……他确立了社会动力学的基本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生产力的进化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原则。但是生产力的发展符合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量的消耗的相对减少和能量的积蓄的增加（请看，“实在一元论哲学”的成就多么大呵！它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唯能论的论证！）……这是经济的原则。这样，马克思就把力的经济原则当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了……”

“这样”两字真是绝无仅有！因为马克思有政治经济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来咀嚼“经济”这个字眼，并把咀嚼的结果叫作“实在一元论哲学”！

不，马克思并没有把任何力的经济原则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这是那些不甘心杜林专美于前的人所杜撰的废话。马克思给生产力的提高这一概念下了完全精确的定义，并且研究了生产力提高

的具体过程。而苏沃洛夫却臆造了一个新名词来表达马克思所分析过的概念，而且臆造得非常糟糕，只是把问题弄糊涂了。因为，“力的经济”是什么意思，怎样测量它，怎样应用这一概念，哪些精确的和固定的事实适合于这个概念，关于这一切，苏沃洛夫没有说明，而且也不能说明，因为这是一笔糊涂账。请再听下去吧！

“……这个社会经济规律，不仅是社会科学内部统一的原则（诸位读者，你们在这里懂得了一些什么吗？），而且是社会理论和普遍存在理论之间联系的环节。”（第 294 页）

是的，是的。曾被经院哲学的许多代表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下发现过许多次的“普遍存在理论”，现在又被苏沃洛夫发现了。我们祝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发现了新的“普遍存在理论”！我们希望他们在下一部集体著作中专门去论证和发展这个伟大的发现！

至于我们的实在论哲学或实在一元论哲学的代表怎样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来：“总之，人们的生产力形成着发生序列（嘿！），这些生产力是由人们的劳动能量、被役使的自然力、被文明地改变了的自然界、以及构成生产技术的劳动工具所组成的…… 生产力对于劳动过程履行着纯粹经济的职能；它们节约劳动能量，提高劳动能量消耗的生产率。”（第 298 页）生产力对于劳动过程履行着经济的职能！这同说生命力对于生命过程履行着生命的职能完全一样。这不是叙述马克思的学说，而是用不可思议的废话来充塞马克思主义。

在苏沃洛夫的论文中，这类废话是不胜枚举的，例如：“阶级的社会化表现为阶级对于人们及其财产的集体权力的增长……”（第 313 页）“阶级斗争的目的，是要建立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形态……”（第 322 页）社会的纠纷、仇视和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反社会的现象。“社会进步，按其基本内容说来，就是人们的社

会性、社会联系的增长。”(第328页)如果把这类无聊的话汇集起来,可以写成好多本书,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代表们确是用这类无聊的话写成了好多本书,但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那就未免太过分了。如果苏沃洛夫的论文是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一个尝试,那就用不着对它进行特别严厉的指责。每个人都会承认,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尝试却完全失败了,仅仅如此而已。然而,当一群马赫主义者把这类名为《社会哲学的基础》的东西奉送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著作中看到同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动的认识论同社会学中的反动的挣扎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四 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我们还须要考察一下马赫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扩大成了哲学上究竟有没有党派以及哲学上的无党性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实际上仍然在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没有看出这两个基本倾向(例如,波格丹

诺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唯心主义，因为他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类“经验的”概念。字眼改变了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企图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明白了解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竭力攻击的对象。

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格律恩曾引用过马克思在1843年10月20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⁹⁷，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⁹⁸写一篇反对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吹牛大王，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 and 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①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

^① 卡尔·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的发展》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361页。

叫作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或者叫作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三十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文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和休谟的错误。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⁹⁹中也轻蔑地斥责“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它采取轻视的态度^①。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末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基本论点：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¹⁰²，

① 关于实证论者比斯利 (Beesley)，马克思在1870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比斯利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 (crotchets)。”¹⁰⁰ 请把这一点同1892年恩格斯对赫胥黎之流的实证论者的评价¹⁰¹比较一下。

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才会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象以前那样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的垃圾般的新体系清除掉。

关于恩格斯探究过新哲学这一点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看出来。他在1888年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复活的现象,而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他除了表示极端的轻蔑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过(不论在序言里或该书正文里)。很明显,恩格斯在看到德国和英国的时髦哲学重复黑格尔以前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旧错误时,甚至认为转向黑格尔(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也会是有好处的,因为他希望这位大唯心主义者和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浅薄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谬误。

恩格斯虽然没有详细考察德国新康德主义和英国休谟主义的许许多多流派,但根本否定它们的背弃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恩格斯宣称这两个学派的整个趋向是“科学上的退步”。那末,对于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例如他们之中的赫胥黎,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的倾向,如果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无疑地是“实

证论的”、无疑是“实在论的”倾向，恩格斯是怎样评价的呢？恩格斯宣称：曾经迷惑过并且还在迷惑着无数糊涂虫的那种“实证论”和“实在论”，**至多也不过是**当众谩骂和扞斥唯物主义而在暗中却偷运唯物主义的一种庸俗手段！¹⁰³只要稍微想一想恩格斯对赫胥黎这样一位最大的自然科学家，比马赫、阿芬那留斯之流更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者和更讲实证论的实证论者所作的这种评价，就可以懂得恩格斯会怎样鄙视现在的一小撮沉溺于“最新实证论”或“最新实在论”等等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约·狄慈根尽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们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一帜“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①，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

^① 这又是一个欠妥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

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 (Retraitebläser^①) 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②，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性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末中间分子就是烂泥一类的东西。”^③

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烂泥，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唯心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僧侣主义”，不过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这一点在约·狄慈根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他写道：“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前引书第 51 页）“尤其是认识论的领域以及对人类精神的无知”，乃是这两种僧侣主义在其中“产卵”的“虱巢 (Lausgrube)”。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的福利’并用生造的 (geschraubter) 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第 53 页）。“正如魔鬼是神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 (Kathederpaffen) 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第 55 页），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

① 吹倒退号的人。——编者注

② 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

③ 见他在 1876 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论文集》1903 年版第 135 页。

醉的 (benebelter) 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的宗教”(第 58 页)。

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第 60 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第 107 页)。“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集团。”(第 108 页)“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Welsch)所迷惑,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即研究哲学。”(第 103 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末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驾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象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和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拚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

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①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结果就沿着陡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们读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就相信奥斯特瓦尔德，转述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马赫的著作，就相信马赫，转述马赫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转述彭加勒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

^①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 *pragma* ——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据一般实证论思潮；专门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昂·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超越经验的任何界限（参看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象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实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实定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方面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ing-val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

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而我们的那些奴颜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作到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代表《概论》的作者们写道：“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其实，不是你们在探索，而是别人在探索你们，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你们自己根据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你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去探讨资产阶级时髦哲学的每一转变，而是这种时髦哲学在探寻你们，把它的那些适合唯心主义胃口的新花样塞给你们，今天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花样，明天是马赫的花样，后天又是彭加勒的花样。你们所天真地信仰的那些愚蠢的“理论”把戏（例如“唯能论”、“要素”、“嵌入”等等），始终没有超出狭隘的小学派的圈子，但这些把戏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倾向却立刻被华德分子、新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洛帕廷分子、实用主义者所抓住，并且尽着自己应尽的职责。对经验批判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正象对新康德主义和“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一样，很快就会消逝，而信仰主义却千方百计地变换自己的那些有利于哲学唯心主义的把戏，以便从每一次这样的迷恋中获得利益。

对宗教的态度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最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来看一看前一个问题吧！卢那察尔斯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部集体著作中谈到了“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宗教

的无神论”^①等等，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那末只是因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把整个欧洲的马赫主义思潮及其对宗教的态度正确地告诉读者。这个思潮对宗教的态度不仅跟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甚至跟费尔巴哈的态度毫不相同，而且根本相反。例如，彼得楚尔特说经验批判主义“无论与有神论或无神论都不矛盾”^②，马赫说“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法译本第434页），而科内利乌斯（他极力赞扬马赫，马赫也极力赞扬他）、卡鲁斯以及一切内在论者甚至公开宣传信仰主义、公开鼓吹黑帮思想。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超出而且也不能超出中立的范围，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了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的泥坑，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如果说感性世界就是客观实在，那末其他的任何“实在”或冒牌实在（请回想一下，巴札罗夫曾相信那些硬说神是“实在概念”的内在论者的“实在论”），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末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对唯物主义的仇视，对唯物主义者的无数诽谤，所有这一切在文明的民主的欧洲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

① 《概论》（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编者注）第157、159页。这位作者在《国外新闻报》¹⁰⁴上曾谈到“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第3号第5页），而在《教育》杂志¹⁰⁵上（1908年第1期第164页）又公然写道：“新的宗教在我心中早已成熟了……”

② 《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页。

大众面前把这一切掩盖起来，他们甚至一次也没有打算把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一流人攻击唯物主义的胡言乱语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保卫唯物主义的言论简单地对比一下。

但是“包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对信仰主义的态度，是无济于事的。事实是抹杀不掉的。这些反动教授由于华德、新批判主义者、舒佩、舒贝特-索尔登、莱克列尔、实用主义者等等同他们亲吻而遭到的奇耻大辱，是世界上任何办法都不能洗刷干净的。刚才列举的那些身为哲学家和教授的人物的影响之大，他们的思想在“有教养的”即资产阶级的人士中间传播之广，他们写的专门著作之多，都比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那个小小的专门学派要胜过十倍。这个小小的学派该为谁服务，就替谁服务；该被怎样利用，就被怎样利用。

卢那察尔斯基说出的可耻言论，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如果他的话里有明显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那末我们就不会再同作者交谈了，因为，大概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这些言论不使卢那察尔斯基和司徒卢威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而且的确还不是这样），那末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特殊”含义，并且在还有可能实行同志式的斗争的时候同他进行斗争。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之所以可耻，就是因为他居然把这些言论和他的“善良的”意图联系起来。他的“理论”之所以有害，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为了实现善良的意图竟采用这样的手段或作出这样的结论。糟糕的是，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卡尔普、彼得、西多尔^①

① 意思是张三李四。——编者注

的主观的事情而已，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所谓“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和波格丹诺夫的所谓用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的，而后者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的。“代换说”默默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处理问题，它把“心理的东西”跟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样就把“人类最高潜在力”神化了。而尤什凯维奇的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的“逻辑斯”又怎样呢？

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了；从他们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他们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类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

五 海克尔和马赫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作为哲学思潮的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整个马赫主义始终在攻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他们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即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界客观实在的自发的、不自觉的、不定型的、哲学上无意识的信念。可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故意抹杀这个事实，他们掩饰和混乱自然科学家的自发唯物主义同早已闻名的、由马

克思和恩格斯证实过千百次的、作为一个派别的哲学唯物主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拿阿芬那留斯来说吧！早在187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他就已经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①、即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进行战斗了，并且象他本人在1891年所承认的（但没有“改正”自己的观点！）那样，他是站在认识论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战斗的。

拿马赫来说吧！从1872年，甚至更早些起，一直到1906年，他始终不渝地在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战斗；而且他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跟在他后面的以及和他同行的有“一大批哲学家”（其中也包括内在论者），可是只有“很少的自然科学家”（《感觉的分析》第9页）。在1906年，马赫也是很老实地承认：“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坚持唯物主义。”^②

再拿彼得楚尔特来说吧！他在1900年宣称：“自然科学彻头彻尾地（ganz und gar）浸透着形而上学。”“它们的经验还应该加以清洗。”^③我们知道，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把我们所承认的、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完全从经验中“清洗”出去。在1904年，彼得楚尔特又说：“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实际上并不比古代印度人的世界观高明些”；“无论世界是建立在神话里的巨象背上，还是建立在一些分子和原子上，只要在认识论上把它们设想成实在的，而不是仅仅用来作比喻的（bloß bildlich）〈概念〉，那末这两种说法完全是一样的。”（第2卷第176页）

再拿维利来说吧！他算是马赫主义者当中唯一的规矩人，他

① 该书第79、114节及其他各节。

② 《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4页。

③ 《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43页。

居然因为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可耻。但是，他在1905年说：“……自然科学归根到底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我们必须摆脱掉的权威。”^①

所有这一切都是十足的蒙昧主义，都是最露骨的反动思想。认为原子、分子、电子等等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的运动在我们头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同相信世界建立在象背上成了一回事！无怪乎内在论者要张开两臂欢迎这类穿着时髦实证论者的小丑服装的蒙昧主义者了。没有一个内在论者不口沫四溅地咒骂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咒骂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这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家们承认物质（及其粒子）、时间、空间、自然规律等等的客观实在性。早在产生“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的那些物理学上的新发现出现以前，莱克列尔就已经根据马赫的理论向“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的唯物主义方向(Grundzug)”^②进行斗争了，舒贝特-索尔登就已经跟“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③进行战斗了，雷姆克就已经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个“街头的形而上学”^④进行攻击了，等等。

内在论者从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形而上学性”这一马赫主义的思想出发，完全合法地作出了直接的公开的信仰主义结论。如果自然科学在它的理论中不给我们描绘客观实在，而只是给我们提出一些比喻、符号、人类经验的形式等等，那末毫无疑问，人类就完全有权利替另一个领域创造出上帝之类的同样“实在的概念”。

自然科学家马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大的接

① 《反对学院智慧》第158页。

② 《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1879年版第6章的标题。

③ 《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2章的标题。

④ 《哲学和康德主义》1882年版第17页。

物对于耶稣一样。¹⁰⁸ 马赫也同样地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因为他实质上转到哲学唯心主义方面去了。马赫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背弃，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反动现象。在谈到“物理学唯心主义者”同那些坚持旧哲学观点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斗争时，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如果我们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海克尔和那位在反动市侩中享有盛名的哲学家马赫作个比较，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这点一方面异常突出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是有党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的斗争是有真正的社会意义的。这本书立即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发行了几十万册，并出版了定价特别低廉的版本。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本书已经“深入民间”，海克尔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本通俗的小册子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千方百计地诽谤和诋毁海克尔。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治为了保卫上帝，立刻起来反对海克尔。俄国物理学家赫沃尔桑先生特地赶到德国去，以便在那里出版一本卑鄙的黑帮的小册子来反对海克尔，并使那些最尊贵的市侩先生们确信，决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家现在都拥护“素朴实在论”的观点^①。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②。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海克

① 奥·达·赫沃尔桑《黑格尔、海克尔、科苏特及第十二诫》(O. D. Chwolson. «Hegel, Haeckel, Kossuth und das zwölfte Gebot») 1906年版，参看第80页。

② 亨利希·施米特的小册子《〈宇宙之谜〉所引起的斗争》(1900年波恩版)很好地描写了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对海克尔的进攻，但是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是太陈旧了。

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些供奉纯粹科学和所谓最抽象的理论的祭司们，简直咆哮如雷。从这些哲学上的死硬派（唯心主义者保尔逊、内在论者雷姆克、康德主义者阿迪克斯以及其他只有天晓得他们的名字的人）的一切咆哮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个主调：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反对“独断主义”，反对“夸大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抓住他，抓住这个唯物主义者；他欺骗公众，不坦白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点特别使得最尊贵的教授先生们狂怒不休。

在整个悲喜剧中^①，最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海克尔本人也**否弃唯物主义**，拒绝这一称呼。不仅如此，他非但不反对任何宗教，反而发明了自己的宗教（也是象布尔加柯夫的“无神论的信仰”或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的无神论”一类的东西），在原则上主张宗教和科学结成联盟；那末问题究竟在哪里呢？究竟是由于什么“致命的误解”而争吵起来的呢？

问题在于，尽管海克尔的哲学具有素朴性，他缺乏确定的党派目的，愿意重视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同宗教有妥协倾向而且还提出有关宗教的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更加突出地显示了他这本小册子的总的精神，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它同一切御用的教授哲学和神学是**不可调和的**。尽管海克尔本人不愿意和市侩们决裂，但是他用这样坚定而素朴的信念所阐明的见解，跟形形色色流行的哲学唯心主义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从某位哈特曼的最粗陋的反

^① 悲剧的因素是由于今年（1908年）春天有人企图谋杀海克尔而产生的。当海克尔收到许多封用“狗”、“渎神者”、“猴子”等称呼来骂他的匿名信以后，有一个道地的德国人曾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扔进海克尔在耶拿的工作室。

动理论一直到自以为是最新颖、最进步和最先进的彼得楚尔特的实证论或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都一致认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就是“形而上学”，承认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结论反映客观实在，就是最“素朴的实在论”，如此等等。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对于整个教授哲学和神学的“神圣”教义说来，都是一记耳光。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群众和自己隐瞒的东西，即那块日益宽广和坚固的磐石，这块磐石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末流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素朴实在论者”（即全人类）的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一信念，是大批自然科学家的不断加强和日臻巩固的信念。

新的哲学派别的创始者和认识论上新“主义”的制造者的勾当失败了，而且是永远地不可挽救地失败了。他们可以用自己“独创的”体系来进行挣扎，可以竭力用有趣的争论——最先喊出“唉！”的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博勃钦斯基还是经验一元论的多勃钦斯基¹⁰⁷——来吸引几个赞赏者，甚至可以象“内在论者”那样来编造浩瀚的“专门”文献。但是，不管自然科学多么摇摆不定，不管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多么不自觉，不管他们昨天对时髦的“生理学唯心主义”多么神往或今天对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多么迷恋，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却在扫除一切渺小的体系和狡猾的诡计，把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一次又一次地推向前进。

现在我们可以从海克尔的著作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上所讲的话。在《生命的奇迹》中，作者把一元论的认识论和二元论的认识论作了对比。我们把这种对比中最有趣的几点摘录在下面：

一元论的认识论

.....

3. 认识是生理现象；它的解剖器官是大脑。

4. 人的大脑中发生认识活动的唯一部分，是大脑皮质的一定部分，即思想皮质层 (phronema)。

.....

5. 思想皮质层是极其完善的发电机，它的组成部分是千百万个物理细胞 (phronetal 细胞)。正象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大脑的这一部分的 (精神的) 机能是组成大脑的那些细胞的机能的总结果^①。

二元论的认识论

.....

3. 认识不是生理现象，而是纯粹精神的过程。

4. 大脑中似乎起着认识器官的作用的那一部分，事实上不过是帮助精神现象出现的一种工具。

.....

5. 作为理性器官的思想皮质层不是自主的，它同它的组成部分 (phronetal 细胞) 一起，不过是非物质的精神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媒介物。人的理性与高等动物的理性和低等动物的本能有本质的不同。

从引自海克尔著作的这段典型的话里，你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去分析哲学问题，而且也不善于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对立起来。他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来嘲笑一切唯心主义的诡计，更广泛些说，嘲笑一切专门的哲学诡计，他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外还可能其他的认识论。他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嘲笑哲学家们，但他不知道自己站在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上！

^① 我用的是法译本，《生命的奇迹》(«Les merveilles de la vie») 巴黎施来歌尔出版社版第 1 表和第 16 表。

哲学家们对这个强有力的唯物主义的无力的愤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了“道地的俄国人”洛帕廷的评论。现在再来看看同唯心主义不共戴天的(可不是开玩笑的!)最先进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维利先生的评论:“海克尔的一元论是一种乱七八糟的混合物,它把某些自然科学的定律,例如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同关于实体和自在之物的一些经院哲学的传统混杂在一起。”^①

什么东西使得这位最可敬的“最新实证论者”大发雷霆呢?你想,当他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老师阿芬那留斯的一切伟大学说——例如,大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物质(“实体”)或“自在之物”不是客观的实在,等等——在海克尔看来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胡说时,他怎么会不恼怒呢!?海克尔没有这样说,因为他并没有研究哲学,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经验批判主义”。但是维利不能不看到:海克尔有十万个读者,就意味着有十万个人唾弃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维利按洛帕廷的方式预先把自己的脸拭了一下。因为洛帕廷先生与维利先生用来反对一切唯物主义、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洛帕廷先生和维利、彼得楚尔特、马赫先生及其同伙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于新教神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之间的差别。

反对海克尔的“战争”证明:我们的这个观点符合客观实在,也就是说,符合现代社会及其阶级思想倾向的阶级本性。

还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把斯奈德的一本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著作《现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②从英文译

^① 《反对学院智慧》第128页。

^② 《现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Das Weltbild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 1905年莱比锡版。

成了德文。这部著作明白地通俗地叙述了物理学中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中的最新发现。但是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给斯奈德的著作加了一篇序言，声明斯奈德的认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序言第5页）。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斯奈德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前引书第288页）。斯奈德在他的第二部著作《世界机器》^①中谈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60），他说：“德谟克利特常常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始祖。这个哲学派别目前已不大时髦，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对世界的看法上的一切最新进步，事实上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上的。老实说（practically speaking），唯物主义的前提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简直是不可回避的（unescapable）。”（第140页）

“当然，如果高兴的话，也可以同善良的贝克莱主教一起去梦想：一切都是幻想。但是无论虚无缥缈的唯心主义的各种戏法怎样令人神往，然而在我们之中，尽管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却很少有人怀疑到自己的存在。我们根本用不着多探究各种鬼火般的自我与非我，就可以深信：我们在假定自身的存在时，就已经让一系列现象进入感官的六道大门了。星云说、光媒以太论、原子论以及一切类似的学说，都可以被称为仅仅是方便的‘作业假说’，但是应该记住：在这些学说没有被驳倒以前，它们同关于您亲爱的读者这个人正在阅读这几行字的假说，是站在多少相同的立足点上的。”（第31—32页）

当这种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归结为单纯作业假说的马赫主义者的精心杰作被大洋两岸的自然科学家当作十足的谬论来嘲笑的时候

^① 卡尔·斯奈德《世界机器》(Karl Snyder. 《The World Machine》) 1907年伦敦和纽约版。

候，你们想一想，他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呵！维利在1905年把德谟克利特当作一个活着的敌人加以攻击，这就最好地说明了哲学的党性，并再三地暴露了他在这个党派斗争中的真正立场，这一点还用得着惊奇吗？维利写道：“当然，德谟克利特没有意识到原子和虚空不过是仅仅起辅助作用(bloße Handlangerdienste)的虚构的概念，并且由于它们具有合理性，即由于它们有用而被接受下来的。德谟克利特还没有自由到足以了解这一点的程度；但是我们现代的自然科学家，除了少数人以外，竟也是这样。古代的德谟克利特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的信仰。”(前引书第57页)

绝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完全用“新的方式”、用“经验批判主义的方式”证明了空间和原子是“作业假说”，可是自然科学家们却嘲笑这种贝克莱主义，并且追随着海克尔！我们决不是唯心主义者，这是诬蔑，我们只是(同唯心主义者一起)努力推翻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路线，我们已经努力了两千多年，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现在，我们的领袖马赫只有把他的一生和他的哲学的总结、他的最后的著作《认识和谬误》去献给舒佩，并且在该书惋惜地指出，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也”同情海克尔的“自由思想”(第14页)。

在这里，这位追随黑帮分子舒佩而又“同情”海克尔的自由思想的反动市侩思想家的原形毕露了。所有那些欧洲的人道的市侩们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具有爱好自由的同情心，而在思想上(以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却为舒佩之流所俘虏^①。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谀逢迎

① 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意见中，与其说他关心于驳斥马赫，不如说他关心于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派别危害。由于他拙劣地可怜地利用根本的理论分歧，他已经受到孟什维克的马赫主义者所著的两本书¹⁰⁸的应有的惩罚。

而已。

最后，请看一看梅林对海克勒的评论。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1899年末，当《宇宙之谜》刚刚出版不久，梅林就立即指出：“海克勒的著作无论就其缺点或优点来讲，对于帮助澄清我们党内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论这两方面存在的多少有些混乱的观点，都是很有价值的。”^①海克勒的缺点是：他还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在谈到政治，在谈到“一元论宗教”等等时，发表了许多非常荒谬的言论。“海克勒是唯物主义者 and 一元论者，但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同上）

“谁要想亲身体会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谁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必须在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后才能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的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那就请他读一读海克勒的这本书吧！

“但是，海克勒的这本书之所以应该读，还不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不寻常的缺点是和它的不寻常的优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也就是说，是和作者对本世纪（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清楚明白的叙述，换言之，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胜利前进的叙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这些叙述无论在篇幅上或重要性上都在本书中占有极大的分量。”^②

① 弗·梅林《宇宙之谜》（*Fr. Mehring. «Die Welträtsel»*），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8年卷（1899—1900）第1分卷第418页。

② 同上，第419页。

结 论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观点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本书前三章作了这样的比较，从而表明了：用新的谬论、术语和诡计来掩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旧错误的经验批判主义在全部认识论问题上反动透顶的。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以及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人，才会侈谈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第二，必须确定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哲学专家们的小学派在现代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清洗了一般经验”，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学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第三，必须注意：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专业部门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现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象不久以前流行过的

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乃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着，它拥有庞大的组织，它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第四章第一节^①的补充¹⁰⁹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 批判康德主义的？

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我们已经详细地说明，不论过去和现在，唯物主义者批判康德的角度总是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批判康德的角度完全相反的。我们认为，在这里哪怕是简略地补充说明一下俄国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认识论立场，也是必要的。

在费尔巴哈的德国学生阿·劳批判康德之后没有多久，俄国的伟大著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也是费尔巴哈的学生）开始试图公开地表明他对费尔巴哈和康德的态度。早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作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出现在俄国文坛上了，可是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甚至连费尔巴哈的名字也不许他提到。188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准备付印的《艺术和现实在美学上的关系》第三版序言中，试图直接提出费尔巴哈，可是书报检查机关即使在这一年也不准引证一下费尔巴哈！这篇序言直到1906年才和读者见面（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第190—197页）。在这篇序言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了半页篇幅来批判康德和那些在自己的哲学结论中追随康德的自然科学家。

请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88年的卓越的论述：

“那些自以为是无所不包的理论的创造者的自然科学家们，事

① 见本卷第196—207页。——编者注

实上仍不过是建立了形而上学体系的古代思想家的学生，而且往往是那些被谢林部分地破坏了而又被黑格尔彻底地破坏了体系的思想家的学生，而且往往是些拙劣的学生。只要提一提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大多数企图建立关于人类思想活动规律的广泛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在重复康德关于我们知识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告诉那些思想混乱已极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落后于恩格斯的，因为他在用语上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同形而上学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对立混淆起来了；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站在恩格斯的水平上，因为他不是责备康德的实在论，而是责备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不是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责备康德不能够从这个客观的泉源引出我们的知识。〉，都根据康德的言论说道，我们感性知觉的形式同对象的真实存在的形式没有相似之处〈告诉那些思想混乱已极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康德的批判同阿芬那留斯和马赫以及内在论者对康德的批判完全相反，因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我们感性知觉的形式和对象的真实的即客观实在的存在的形式是有相似之处的。〉，因此，我们不能认识真实存在的对象、它们的真正的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告诉那些思想混乱已极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对象——用康德的过分矫饰的话来说就是“自在之物”——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完全可以认识的；不论是它们的存在，或是它们的质，或是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都是可以认识的。〉，即使对象是可以认识的，它们也不能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因为我们的思维把一切知识材料放到了和真实存在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中；思维规律本身也只有主观的意义〈告诉糊涂虫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一切唯物主义者

看来一样，思维规律不是只有主观的意义，也就是说，思维规律反映对象的真实存在形式，和这些形式完全相似，而不是不同。>；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因为既没有先行的，也没有后继的，既没有全体，也没有部分，等等<告诉糊涂虫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在现实中，有着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有着自然界的客观的因果性或必然性。>。当自然科学家不再说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创立出比费尔巴哈提出的概念体系更加精确完备的概念体系<告诉糊涂虫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一切背弃唯物主义而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言论都叫作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然而目前对有关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的叙述，仍然是费尔巴哈作得最好。”（第195—196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摒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写于1908年下半年

1909年“环节”出版社
用单行本刊印

按1909年出版的单行本
原文刊印并根据1920年出
版的单行本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14卷
第3—382页

列甫·托尔斯泰是 俄国革命的镜子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许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满版都是祝贺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着伪善，简直令人作呕。伪善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露骨的伪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下流作家写文章得到代价，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则微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论报》¹¹⁰上那些立宪民主党⁶的吹鼓手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似乎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者”的那种故意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

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他们用声嘶力竭的叫嚣来淹没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写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糰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111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

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拚命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要求象一条红线贯串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

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要用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一切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问政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了解，使得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走，大多数农民则变成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从劳动派¹¹²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讨价还价，讲和妥协，答应和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来说吧。我们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兼而有之；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军队中的运动，丝毫没有表现出象在一挥手之间就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无产阶级所表现的那种全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对党的认识。另一方面，认为士兵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军官的领导，这种见解是再错误没有了。相反地，从民意党¹¹³时期以来，革

命的巨大进步正好表现在：拿起武器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立活动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军官们丧魂落魄的“愚昧的畜生”。士兵们对农民的事情充满着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了；过了几天，甚至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给人枪毙，躺下来给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常言道：打了败仗的军队会好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级比作军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和加强那些推动千百万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这些农民由于仇恨农奴主-地主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了。就在农民中间，交换的增长、市场统治和货币权力的加强，正在日益排除宗法式的古旧东西和宗法式的托尔斯泰式的思想。但是，最初几年的革命和最初几次群众革命斗争的失败，毫无疑问得到了一种收获，即群众以前那种软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分界线更加清楚了。各阶级、各政党彼此划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的教训影响之下，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渝的鼓动之下，不仅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中，甚至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

中,也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愈来愈好、重犯我国托尔斯泰主义历史罪过愈来愈少的战士!

载于1908年9月11日(24日)
《无产者报》第35号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无产者报》
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
第176—183页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现在我们把杜马代表苏尔科夫在国家杜马讨论主教公会预算案时的发言，以及我们杜马党团会议讨论这篇发言稿的材料刊登出来，因为这两个材料提出了一个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别迫切的问题。凡是同宗教有关的一切，目前无疑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以至接近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某些工人群众的兴趣。社会民主党当然应该表明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屡次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的和德国十九世纪上半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自始至终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须指出，恩格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¹¹⁴，——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做得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那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¹¹⁵ 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无情地斥责哲学家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让步，即使是些微的让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责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说，这样向宗教宣战，就是“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即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斗争的覆辙（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麦在1870年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对德国天主教党，即反对“中央”党的斗争¹¹⁶）。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战斗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某些工人阶层和民主派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说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同时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努力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⁸⁰ 这个观点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教徒以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

的斗争手段。“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¹¹⁷ (1891年)的一个有名的条文，这一条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

这个策略现在竟然成为陈规陋矩，竟然产生了一种新的歪曲，即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到它的反面，即歪曲成了机会主义。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论点说成这样，似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虽然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争辩，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辩论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¹¹⁸

从外表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就是如此。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善于或不愿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最革命的战斗，另一方面懦怯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没有原则”的动摇。在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作品中，这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很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儒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

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把”工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²⁵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坚决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即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宣传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这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抑，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

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势力，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盲目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末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由此是否可以说，反宗教的启蒙书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只是说，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应当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思考过的人，也许不能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了解）这条原则。怎么会这样呢？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同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同支持了数千年之久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为什么要服从阶级斗争，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呢？

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这证明反驳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使这种反驳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

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定某个地方和某个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是相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然是无神论者，另一部分则是相当落后的，他们同农村和农民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祭司的影响。再假定这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使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应当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显得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这倒并不是由于象庸人那样考虑到不要把落后工人吓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等，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 and 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神论，就只能有利于僧侣，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神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宗教开战，其实是帮助了僧侣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当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

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生产者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象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宗教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斤斤计较细小的得失;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

凡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枝节问题,都应该根据上述观点来解决。例如,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祭司能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人们通常根据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经验并不完全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工人运动的结果,而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条件,我们到下面再谈),所以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国是不正确的。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祭司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纲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这个祭司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许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矛盾,只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一个政治组织要用考试的方法检验自己成员所持的观点是否同党纲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俄国更是难于想象了。如果这位祭司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那末党当然应该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信神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绝对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

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定的范围为限；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内多数人摈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声明“社会主义是我的宗教”，并且宣传与此相应的观点，对这种党员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呢？不能这样做。这种声明确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背离的意义和所谓的比重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是不相同的。一个鼓动员或一个在对工人群众讲话的人，为了说得明白一点，为了给自己的解释开一个头，为了用不觉悟的群众最熟悉的说法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作家开始宣传“造神说”¹⁹或造神社会主义（就同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及其同伙那样），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甚至是过分限制鼓动员的自由，限制运用“教育法”来影响群众的自由，在后一种情况下，党的申斥却是必须而且应该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从社会主义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现在来谈谈西欧哪些条件使“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点遭到了机会主义的歪曲。当然，这里是有产生一般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的影响，机会主义也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根本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麻醉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机会主义者把情况歪曲成这样，似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是除了常见的机会主义歪曲（对于这种歪曲，我们的杜马党团在讨论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说时完全没有加以说明）而外，还有一

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问题采取了目前这种可说是过分冷漠的态度。这些条件分两种：第一，反宗教的斗争在历史上是革命资产阶级的任务，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争取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在俄国，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也几乎完全落到工人阶级的肩上。同欧洲比较起来，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派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并不是（象《路标》¹¹⁹中的那些新出现的黑帮立宪民主党人⁶或立宪民主党人黑帮所想的那样）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在欧洲早已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一斗争所作的纯粹资产阶级性的歪曲，而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罗曼语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德国的莫斯特¹²⁰（附带说一句，他曾经是杜林的门生）之流，奥地利八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宗教斗争中使革命的空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现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因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而做得矫枉过正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忘记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西欧，自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以后，自从实现了比较完全的信教自由以后，反宗教的民主斗争问题在历史上已被资产阶级民主派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政府往往故意对教权主义举行假自由主义的“讨伐”，转移群

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德国的文化斗争以及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斗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斗争，是转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这就是目前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争普遍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该使反宗教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借以对抗资产阶级的俾斯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运动。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思想上的领袖，领导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其中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企图等等。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政党要求国家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的主张偷换成宣布宗教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来说也是私人事情，如果说，恩格斯纠正这种机会主义所用的方式还比较缓和，那末俄国机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就应该受到恩格斯严厉一百倍的斥责。

我们的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先例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次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时都应该遵循的。是不是还应该更进一步，把无神论的结论发挥得更详细呢？我们认为用不着的。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会有夸大反宗教斗争意义的危险；这样就会抹杀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同社会主义者反宗教斗争之间的界限。社会民主党党团在黑帮杜马中应该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已经光荣地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明教会和僧侣支持黑帮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作用，这一任务也光荣地完成了。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很多；今

后社会民主党人谈这个问题还会对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作些补充,但是这篇发言毕竟是很出色的,我们党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各级党组织广泛宣传这篇发言。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详尽地说明经常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原理的正确含义。遗憾的是苏尔科夫同志没有这样做。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党团过去的活动中,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这个错误《无产者报》¹²¹曾及时指出了)。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表明,党团争论无神论问题,却没有正确说明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著名的要求。我们决不把整个党团所犯的这个错误都推在苏尔科夫同志一个人身上。不仅如此。我们公开承认这是全党的过错,因为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解释不够,没有让社会民主党人充分认识到恩格斯批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意思。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证明,这正是由于对问题了解得不清楚,而不是不愿意考虑到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我们深信,党团在以后发言时一定会纠正这一错误。

我们再说一遍,总的说来,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是很出色的,各级党组织应当广泛加以宣传。党团对这篇发言的讨论,证明党团在兢兢业业地完成它所肩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不过我们希望报道党团内部讨论情况的通讯能更经常地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使得党团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党能了解党团内部所进行的艰巨的工作,使党和党团的活动在思想上趋于一致。

载于1909年5月13日(26日)
《无产者报》第45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
第376—387页

革命的教训

自从1905年10月俄国工人阶级给了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强大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无产阶级在那伟大的日子里，发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去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它在1905年几个月内争得了工人数十年来徒然期待“首长”赐给的那些改良。无产阶级为全俄人民争得了（虽然只是暂时地争得了）俄国空前未有的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它从自己的前进途中扫除了伪造的布里根杜马¹²²，从沙皇手中争得了立宪诏书¹²³，并且一举而造成了没有代议机关就不能管理俄国的定局。

无产阶级所争得的伟大胜利是很不彻底的，因为沙皇政权没有推翻。十二月起义结果遭到失败，于是沙皇专制政府就随着工人阶级进攻的减弱，群众斗争的减弱，而把工人阶级所获得的成果相继夺了回去。1906年工人的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风潮，虽然比1905年弱得多，但终究还是很强大的。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人民的斗争又发展起来，沙皇解散了第一届杜马，但没有敢于马上修改选举法。1907年工人斗争更加减弱下去，于是沙皇就把第二届杜马解散，举行了政变（1907年6月3日）¹²⁴；沙皇违背了他所许下的非经杜马同意决不颁布法律的冠冕堂皇的一切诺言，修改了选举法，使地主和资本家、黑帮政党及其走狗在杜马中能够稳稳地占大多数。

革命的胜利与失败给了俄国人民伟大的历史教训。我们纪念

1905年革命五周年，要明白认识这些教训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夺回去。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第二个教训就是：仅仅破坏或限制沙皇政权还不够，必须把它消灭。沙皇政权如不消灭，沙皇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沙皇在革命进攻加强时就作些让步，进攻减弱时就把这些让步统统收回了。只有争得民主共和国，推翻沙皇政权，使政权归人民，才能使俄国摆脱官吏的暴力和专断，摆脱黑帮-十月党人¹²⁵杜马，摆脱农村中地主及其走狗的专横势力。现在革命后农民和工人所遭到的灾难比先前更加深重，就是当时革命的力量还弱，而沙皇政权没有被推翻的结果。1905年的事变，头两届杜马和这两届杜马被解散的事实，都给了人民很多的教训，首先就是教他们知道必须用共同斗争来实现政治要求。人民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开始是要求专制政府让步：要沙皇召集杜马，要沙皇撤换大臣，要沙皇“颁赐”普选权。但是专制政府没有做也不可能做这种让步。专制政府用刺刀回答了请求让步的行动。于是人民开始觉悟到必须进行斗争来反对专制政权。现在斯托雷平和反动的老爷杜马，可以说是更加用力地

要把这种觉悟灌进农民脑海中去。他们在灌而且一定会灌进去的。

沙皇专制政府也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它已经知道不能指望农民对沙皇的迷信了。现在它和黑帮地主以及十月党厂主结成联盟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现在要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就要有比1905年强大得多的革命群众斗争的进攻。

这种强大得多的进攻是否可能发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谈谈第三个而且是最主要的革命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俄国人民中各个阶级怎样行动了。在1905年以前，有很多人以为全体人民都同样追求自由，都愿意得到同样的自由；至少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清楚俄国人民中各个阶级对于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它们所争取的自由也是各不相同的。革命把迷雾吹散了。1905年末，以及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公开行动了。他们在实际上表明了自己的面目，暴露了他们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他们究竟能为什么而斗争，斗争究竟有力、顽强和坚忍到什么程度。

工厂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进行了最坚决最顽强的斗争。无产阶级用一月九日的发动¹²⁶和群众性罢工开始了革命。无产阶级把斗争进行到底了，它奋起举行了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奋起保护了被枪杀、被鞭笞拷打的农民。1905年罢工的工人约有三百万（如算上铁路员工、邮务人员等等大概有四百万人），1906年有一百万，1907年有七十五万。这样强大的罢工运动在世界上还未曾有过。俄国无产阶级表明了，在革命危机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中间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最大的1905年罢工浪潮还远没有把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量全都发挥出来。例如在莫斯科工厂区的五十六万七千个工厂工人中罢工达五十四万人次，而在彼得堡的三十万个工厂工人中罢工就达一百万人次。

可见，莫斯科地区的工人还远没有发挥出彼得堡工人那样顽强的斗争性。在里夫兰省（里加城）的五万工人中罢工达二十五万人次，就是说，每个工人在1905年平均至少参加过五次罢工。目前全俄工厂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起码有三百万，而且他们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如果各地的运动都象1905年的里加那样强大，那末，他们就能提供一千五百万人次的罢工大军。

任何沙皇政权也抵挡不住这样的进攻。但是，谁都知道，这样的进攻不能按社会主义者或先进工人的愿望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这样的进攻只有在危机、风潮和革命普及全国的时候才能发生。要准备这种进攻，就必须把最落后的工人阶层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必须进行多年顽强的、广泛的、始终不渝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各种团体和组织。

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超过了俄国人民中其余一切阶级。工人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富有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资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到各大城市，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训练他们共同行动。工人随时随地都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阶级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过程中，工人就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觉悟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工人一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会一往直前地奋勇斗争，反对横在他们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首先是反对沙皇政权和农奴主-地主。

农民在这次革命中也起来进行斗争，反对地主，反对政府，但是他们的斗争力量要弱得多。据统计，工厂工人参加过革命斗争即罢工运动的占大多数（约五分之三），而农民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无疑只占少数，大概不超过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农民斗争得不那样顽强，比较分散，不那样自觉，往往仍然指望沙皇老子的好心肠。实际上，在1905—1906年间农民只不过把沙皇和地主吓了

一下，其实用不着恐吓他们，应该消灭他们，把他们的政府——沙皇政府连根铲掉。现在，斯托雷平和反动的地主杜马竭力把富农培养成为新的地主式的独立农庄主，作为沙皇和黑帮的盟友。但是，沙皇和杜马愈是帮助富农掠夺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就会愈加觉悟，而他们对沙皇的迷信，农奴制度下闭塞无知的奴隶的迷信，也就会保存得愈少。农村中农业工人一年比一年增加，他们除了与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共同斗争以外找不到别的自救方法。农村中陷于破产、一贫如洗、忍饥挨饿的农民一年比一年增加，——当城市无产阶级发动起来时，他们中间就会有千百万人更坚决更一致地起来向沙皇和地主进行斗争。

自由资产阶级，即自由派地主、厂主、律师和教授等等，也参加过革命。他们成立了“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⁶）。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向人民大许其愿，高喊自由。他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有大多数代表席位。他们约许“用和平手段”去争取自由，而责备工农的革命斗争。农民和许多农民代表（“劳动派”¹¹²）相信了这种约许，驯服地跟着自由派走，而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采取回避态度。这是农民（和许多市民）在革命时所犯的一个极大错误。自由派用一只手偶尔帮助一下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另一只手却始终援助沙皇，向沙皇保证要保持并巩固他的政权，使农民去与地主妥协，“安抚”“好闹事的”工人。

当革命进入同沙皇决战，进入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时候，自由派就全体一致地卑鄙地叛卖了人民自由事业，离开了斗争。沙皇专制政府利用自由派这种叛卖人民自由事业的行为，利用非常相信自由派的农民的无知，击溃了起义的工人。当无产阶级已被击溃的时候，任何杜马，立宪民主党的任何甜言蜜语，他们的任何约许都阻止不住沙皇取消一切残存的自由权利，恢复专制制度和

恢复农奴主-地主的专横势力了。

自由派受了骗。农民获得了沉痛然而有益的教训。当广大人民群众还相信自由派，还相信可能同沙皇政权讲“和平”，回避工人革命斗争的时候，在俄国决不会有自由的。当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起来斗争，推开那些动摇叛变的自由派，领导农业工人和破产农民前进的时候，世界上便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俄国自由的到来。

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奋起进行这种斗争，一定会重新来领导革命，俄国全部经济状况以及革命年代的全部经验就是保证。

五年前，无产阶级给了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打击。自由的曙光在俄国人民面前闪动了一下。现在，沙皇专制制度又恢复起来，农奴主又来宰制一切，工农群众依然处处遭受压迫，亚洲式的官吏专横和卑鄙地侮辱人民的现象依然到处可见。然而沉痛的教训不会不发生作用。俄国人民已经不是1905年以前那样的人民了。无产阶级已教会他们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一定会把他们引向胜利。

载于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

《工人报》创刊号

按《工人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
第295—302页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一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离开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统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大规模工人运动的五十多年来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这两种离开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是常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表现出来的，不过带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罢了。

单从这个事实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等影响造成的。经常引起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去年出版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潘涅库克所著《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Anton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Erdmann Dubber, 1909) 这本小册子，是用科学态度研究这些原因的一次值得注意的尝试。下面我们就要向读者介绍潘涅库克所作出的那些不能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结论。

工人运动的增长这个事实本身，是经常引起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运动，而是把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在一批一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群一群新的劳动群众被卷入运动的同时，也必然会发生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复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经常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

其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中间是不一样的。在大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它的思想家领会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最迅速，最完整，最扎实。落后的或发展速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一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思想。

再其次，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也是经常引起分歧的一种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但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又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面启发着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退化堕落，受穷受苦等等。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能够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这种矛盾，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种矛盾。但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某些个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

主义发展的某种特点或某一“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自由派和民主派——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跳到另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他们一会儿说一切都是由于心怀恶意的人“唆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一会儿又以工人政党是“和平改良的政党”来聊以自慰。应当看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它们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情况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象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一样。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飞跃”、说明工人运动与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反对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等候“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或后者都阻碍了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力量坚强、动作敏捷、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很好地行动的组织，团结成为充满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受着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组织。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们要稍微离开本题而附带声明一下，潘涅库克分析问题时仅仅引用了西欧各国特别是德法两国历史中的例子，而完全没有提到俄国的情形。即使有时也使人觉

得他在暗示俄国，那只是因为在我们这里也表现出那些引起离开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的基本趋向，虽然俄国在文化、生活方式和历史经济方面，都是与西欧大不相同的。

最后，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般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至少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地用一个样子和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不免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捍卫自己的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相互交替，时而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根本反对改良的方法。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就是这样，这种政策在西欧各国日益成为不再是地主阶级的政策，而是一般资产阶级的一种政策。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就是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恶意，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议制度，就不能不使人民有相当的政治权利，人民在“文化”方面也不能不具有较高的要求。这种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发展的迅速性等等条件所造成的。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转到仿佛是让步的方式，乃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五十年来历史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例如英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采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国家，而德国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则始终采取暴力方法等等。

当这种方法盛行于德国的时候，对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片面反应便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或如当时所称的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增长起来（九十年代的“青年派”¹²⁷，八十年代的约翰·莫斯特¹²⁰）。在1890年转而采取了“让步”，这种转变照例是对工人运动更加有害的，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潘涅库克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积极的实际的目标就是诱惑工人，在工人中间制造分裂，把工人的政策变成软弱的，始终软弱不堪的和朝生暮死的所谓改良运动的一种软弱的附属品。”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所有上述一类原因，都在工人运动内部，在无产阶级中间，引起策略上的分歧。况且，在无产阶级与那些同它接近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在内）之间，并没有隔着而且也不可能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自然也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的动摇。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根据具体实践问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帮助比较年轻的国家更加清楚地认识离

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真实阶级意义，并更顺利地去同这些倾向作斗争。

载于1910年12月16日

《明星报》创刊号

署名：弗·伊林

按《明星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6卷

第344—351页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 几个特点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¹²⁸。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客观形势，改变了密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这样的任务在各阶级间的根本关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不会随着历史的转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象俄国社会各阶级间的根本关系一样，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最近的直接行动任务也有过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且来看看近六年来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时期划分为前三年和后三年，前三年大约在1907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1910年夏季结束；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三年是不同的。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来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飞速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向两边摆动的幅度很大。“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俄国社会中各个阶级在各个不同方面的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形式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们再重复一遍，这里也是只从纯理论的“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十分缓慢的演进，几乎等于停滞。在国家制度方面没有任何比较显著的改变。前一时期各个阶级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多方面的活动的“场所”，现在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活动了。

这两个时期的相同的地方在于，俄国的演进在前后两个时期都仍旧是先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演进。这种经济演进同现存的许多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还是同从前一样；某些局部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渗入个别的制度，不仅没有缓和这个矛盾，反而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了。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一时期摆在历史舞台台口的是前面所说的那些飞速的不平衡的变化将会引起什么结果的问题。由于俄国的演进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变化的内容也就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有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两种资产阶级的立场是某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害怕剧烈的变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保存大量旧制度的残余。也有农村

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同“自食其力”的农民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不能不力求实现另一种资产阶级的改革，给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保留极少余地的改革。雇佣工人既然自觉地对待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当然不能不对这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两种不同趋向虽然都停留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内，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发展的速度以及进步影响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前三年，通常称作策略问题的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标派分子¹¹⁹认为这些问题引起的争论和分歧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争论，是“争取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表现，这种意见是极其错误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它才不能对俄国整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不能不作出与这两种趋向相适应的（直接地或间接地适应，正面地或反面地反映）理论公式。

在后三年，俄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中两种趋向的冲突不是当前的迫切问题，因为这两种趋向都被“死硬派”压下去了，都被推到后面去了，被逼到内部去了，暂时熄灭了。中世纪的死硬派不仅站满了舞台台口，而且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各广大阶层的内心充满了路标派的情绪，沮丧和背叛的心情。这时呈现出来的不是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而是不再相信任何改革的心理，“顺从”和“悔罪”的心情，对反社会学说的迷恋，神秘主义的风行等等。

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极其剧烈地震动了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不懂得政治的居民阶层，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

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从头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是不能在这个高峰上长久地支持下去的，不免要停顿一下，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极深的瓦解和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反对这种瓦解，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畸形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背了一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并不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哲学原理的“修正”。各种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只是背得很熟，但并不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空谈广泛流行起来，实际上这些空谈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¹²⁹，又如认为召回主义是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合法的派别”等等。

另一方面，笼罩了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路标主义精神和背叛主义精神也渗透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温文尔雅”的轨道的那个思潮中去了。这里已经只剩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词句，是用来掩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关于“等级制度”和“领导权”等等议论的。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这些议论。为了说明前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经受的危机的深度，以及这种危机同现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联系，只要指出这些议论就够了。对这种危机所提出的问题推开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做法。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度并了解到必须克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在前三年觉醒的那些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的广大阶层，其中有许多人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地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刊物制造出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更广。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认识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载于1910年12月23日

《明星报》第2号

署名：弗·伊林

按《明星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7卷

第22—27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 改良主义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过去那种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用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是越来越多地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越纯粹，政治自由越多，运用“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的范围就越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

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来看，不能不认为这个变化是一大进步。起初，社会主义是为生存而斗争，当时，反对它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胆地和坚决地维护自由主义这一套经济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后来，社会主义成长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生存的权利，它现在是为争取政权而斗争了；而资产阶级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于是就竭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

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尖锐化，是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环境的上述变化的完全必然的结果。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某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奴役的、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陷入这种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必然投到工人运动方面来。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没有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¹³⁰在这个革命以前的原则上的鲜明分野，没有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内的完全决裂，是不能设想的。

俄国的情形实际上也是这样，不过由于我们比欧洲落后（甚至比亚洲先进部分落后），我们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情况还要复杂一些，模糊一些，奇特一些罢了。因此，俄国的改良主义也就特别顽固，成为一种可以说是更恶性的病症，对无产阶级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也就更大。我们这里的改良主义有两个根源。第一、俄国与西欧各国比起来，小资产阶级要多得多。因此，我们这里对社会主义采取矛盾的不稳定的动摇态度（时而是“炽烈的爱”，时而是卑鄙的叛变）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特别多，而这种态度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特点。第二、每逢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受到挫折时，我们这里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就最容易最迅速地灰心丧气，打算叛变，最迅速地背弃彻底民主革命的任务，即全部肃清俄国一切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残余的任务。

头一个根源，我们不准备详细分析。只想提醒一点，就是世界上大概不会找到第二个国家，会有象我们的司徒卢威、伊兹哥也夫和卡拉乌洛夫之流的先生们这样迅速地同情社会主义“转到”同情反革命自由主义的事情。不过这些先生决不是例外，决不是单个人，而是广泛流行的派别的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外有很多好心

人——社会民主党内也有不少，总喜欢指责“过分的”争论和“分野的热情”等等，这就暴露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俄国产生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的“过分的”“热情”。

现在来谈谈俄国改良主义的第二个根源。

我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未结束。专制制度企图采取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革命遗留下来的和整个客观经济发展过程迫切要求的任务，但它解决不了这些任务。无论是旧的沙皇制度在向革新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转变这条道路上的新的一步，还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全国范围内的组织（第三届杜马），还是地方官实行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所有这些“极端”手段，所有这些沙皇制度在它还能活动的最后一个场所即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场所采取的“最后”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用这种办法“维新的”俄国不但不能赶上日本，甚至还会开始落到中国后面去。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还未完成，革命危机还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危机又在渐渐成熟，我们又在朝着这个危机前进，是用新的方式前进，不象过去那样，不是用过去的速度，不是只采取旧的形式，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地是在前进。

这个形势十分明确地确定了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彻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无产者，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或是背弃这个思想的无产者，则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的奴隶。

由此可见，我国改良派的一位年轻首领，《我们的曙光》杂志¹³¹

的列维茨基先生的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这个著名公式，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公式，而且是十足叛变主义的公式。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等于投到资产阶级方面，投到自由派方面去，因为自由派正是向现代的奴隶雇佣工人说：你尽可为改善你的奴隶地位斗争，但你必须把推翻奴隶制度的思想看作有害的空想！把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有名公式同列维茨基的公式对照一下，就会看到，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伯恩施坦的公式要广一些，因为它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列维茨基的公式要窄一些，因为它在背弃一般革命的同时，特别是要背弃自由派 1905—1907 年最仇视的，也就是无产阶级从自由派手里夺去的在实现彻底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

向工人宣扬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等于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自由派，宣扬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背弃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取消派¹³²都敢用这样明确的方式公开表露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些人（如马尔托夫先生）甚至企图不顾真相，否认放弃领导权和取消主义之间的联系。

为改良主义观点“找根据”的一个更“精巧”的企图是这样一种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1905 年以后，不会发生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不会发生第二次争取民主改革的全民斗争；因此，俄国将要到来的不是革命危机，而是“立宪”危机，工人阶级只要在这个“立宪危机”的基础上，设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就行了。

取消派尤·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上（先前还在《复兴》杂志¹³³上），就是这样说的。

“1905年十月事变不会再发生了”，——拉林先生这样写道。“谁把杜马解散，他就要把杜马恢复起来，而且比革命后的奥地利还要快些；奥地利曾于1851年废除宪法，而到1860年，即过了九年以后，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请注意这一点！），只是为了统治阶级里最有势力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便重新承认了宪法。”“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不可能发生1905年那样的全国革命运动。”

拉林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不过是把唐恩先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说的话长篇大论地转述一遍罢了。当那次会上有人提出一个决议¹³⁴，指出“引起1905年革命的那些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因素现在继续发生作用”，又在成熟的正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的时候，取消派的《呼声报》¹³⁵编辑就反对这个决议，大叫“他们”（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竟想钻到已被打垮一次的地方去”。

又“钻到”革命里去，在已经改变了的环境中始终不倦地鼓吹革命，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去进行革命，——这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罪行，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过错。不要“钻到已被打垮一次的地方去”，——这就是叛徒和每逢失败就灰心丧气的人的聪明想法。

但是，那些比俄国更老、更“有经验”的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善于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地“钻到已被打垮一次的地方去”，可以（例如在法国）在1789—1871年间举行四次革命，遭到极严重的失败以后一次再次地掀起斗争，争取共和制度，在这种共和制度中，革命无产阶级和它的最后一个敌人——先进资产阶级劈面对立起

来；也只有这种共和制度才能成为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最后斗争的条件相适应的国家形式。

这就是社会党人与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不同的地方。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准备新的革命斗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开展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听话的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因此，改良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为了使俄国工人离开社会主义，总是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奥地利（以及普鲁士）来做例子。为什么他们喜欢拿这些国家做例子呢？尤·拉林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因为这些国家在1848年革命“没有成功”之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完成了。

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他们从心里感到高兴的地方。你看，资产阶级改革不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呵！！既然这样，那我们俄国人又何必自讨苦吃，考虑革命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让地主和厂主也对俄国进行这种“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呢！？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很软弱，因此，没有能够阻止地主和资产阶级违反工人利益，以最不利于工人的形式，在保存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保存农民的无权状况和其他许多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实现改革。

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已经表现了西方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所没有见过的伟大力量以后，俄国的改良主义者还来援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四五十年以前力量薄弱的例子来为自己的叛变主义辩护，为自己的叛变主义说教“找根据”！

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喜欢援引六十年代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例子，就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他们的议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他们在政治实践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事实上，奥地利恢复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废除的宪法，普鲁士在六十年代开始了“危机时代”，那又证明了什么呢？首先证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还未完成。一方面说俄国政权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象拉林说的那样），目前我国政权已经没有丝毫农奴制的性质（也是拉林说的），同时，又拿普鲁士和奥地利来做例子，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般说来，否认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还未完成，是可笑的；就连立宪民主党⁶和十月党¹²⁵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拉林自己（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没有疑问，君主制度现在在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我们已经说过，并由党的决议（1908年12月）承认了的，但更没有疑问的是，就连这种适应，就连资产阶级的反动，无论是第三届杜马，还是1906年11月9日（以及1910年6月14日）的土地法¹³⁶，都不能解决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的任务。

其次，为什么奥地利和普鲁士六十年代的“危机”是“立宪”危机，而不是革命危机呢？因为当时许多特殊情况减轻了君主制度的困难（德国“自上而下的革命”，德国用“铁血”手段实现的统一），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时还极软弱，极不成熟，而自由资产阶级也象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卑鄙怯懦，背叛成性。

为了让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己来说明对这种情形的估计，我们从倍倍尔去年发表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摘引几段来看一下。后来传说，俾斯麦在讲到普鲁士发生“立宪”危机的1862年时说过，国王当时非常忧郁，常向俾斯麦诉苦，

说他们两人有上断头台的危险。当时，俾斯麦耻笑了这个懦夫，叫他不要害怕斗争。

关于这点，倍倍尔说道：“这些事变表明，自由派若是善于利用当时的形势，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他们已经害怕站在他们后面的工人。俾斯麦说，‘如果把我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把亚赫隆发动起来（也就是把下层群众发动起来，投入人民运动），这可把自由派吓破了胆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那次“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把他的国家改革成为资产阶级容克君主国的“立宪”危机过去半个世纪以后，指出了自由派当时由于害怕工人而没有利用的那个形势的革命性。俄国改良派的领袖们却向俄国工人说：既然德国资产阶级当时那样卑鄙，在吓破了胆的国王面前吓破了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来仿照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漂亮策略干一下呢？倍倍尔斥责资产阶级，斥责它的害怕人民运动的剥削者心理，斥责它没有“利用”“立宪”危机来实现革命。拉林之流责备俄国工人不该要求领导权（即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吸收群众加入革命），并劝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俄国的立宪维新的条件下维护自己利益”组织起来。取消派居然把腐朽的德国自由派的腐朽观点当作“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献给俄国工人！试问，怎能不把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叫作斯托雷平式的社会民主党人呢？

倍倍尔在估计普鲁士六十年代的“立宪”危机的时候，不仅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不敢同君主制进行斗争，而且指出了当时工人中间的情形。他说：“工人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政治形势不堪忍受，这自然也反映到工人的情绪上。大家要求改革。但由于没有充分觉悟的、明确认识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并能获得信任的领导分子，由于没有能把力量团结起来的坚强组织，这种情绪也就毫

无结果地消失了 (verpuffte)。从来没有一个实质上非常出色的 (in Kern vortreffliche) 运动这样毫无成果地结束。每次会议都挤满了人, 谁说得最激烈, 谁就是当时的英雄。这种情绪特别是在‘莱比锡工人自修会’非常盛行。”1866年5月8日, 莱比锡五千人的大会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 要求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召集全民武装所支持的国会, 并“希望德国人民只把反对任何世袭的中央政权的人选进国会”。可见, 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具有十分明确的共和的革命的性质的。

总之,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立宪”危机时期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了共和的革命的性质的决议。经过半个世纪以后, 当他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 向新的一代叙述早已过去的那个时期的事情的时候, 还特别强调, 遗憾的是, 当时没有充分觉悟的认识到革命任务的领导分子 (也就是没有一个认识到领导任务的革命社会民主党), 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 因此, 革命情绪“毫无结果地消失了”。而俄国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们却象伊万努什卡¹³⁷那样深思熟虑地援引六十年代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例子来证明可以“没有经过任何革命”! 这些中了反革命的毒、思想上备受自由主义奴役的庸人, 竟敢败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

当然, 在同社会主义决裂的改良主义者中间, 也有人用在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转弯抹角的外交手腕来代替拉林的真诚机会主义。这种人混淆问题的实质, 模糊原则性的争论, 弄脏这些争论, 例如马尔托夫先生就曾设法在合法刊物上 (即在受斯托雷平保护不会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公开反驳的情况下), 硬说什么拉林提出的“公式”和“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的决议中”提出的相同。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真相, 只有下流作品的作者才

干得出来。同一位马尔托夫又装做与拉林争论的样子，在刊物上公开声明说，“他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马尔托夫竟不怀疑发表十足改良主义观点的拉林有改良主义观点！！——真堪称为改良主义外交家玩弄手腕的典范。^①就是这位马尔托夫，有些傻瓜竟把他看作比拉林“左”些、可靠些的革命家，马尔托夫又把他和拉林的“分歧”总结如下：

“总结一下。要给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现在做的事情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理由，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足够了：现时的制度就是专制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充满矛盾的结合；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相当成熟，它可以象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一样，抓住这个制度里面的这些矛盾的要害。”

不管马尔托夫怎样支吾搪塞，但他一做总结，他的所有支吾手法就失去效力了。我们引的这段话表明，他完全背弃了社会主义，偷偷用自由主义把它代替了。马尔托夫所说的“足够了”，只是对自由派，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够了。一个无产者，如果以为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的结合是矛盾的就“足够了”，那他就是抱的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观点，就不是社会党人，他就没有了解到，本阶级的任务是发动人民群众，发动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反对一切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动摇或反抗，而去独立干预国家的历史命运。摆脱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所进行的独立的历史活动，会把“立宪”危机变成革命。资产阶级（特别是1905年以后）害怕革命和仇视革命，无产阶级却教导人民群众忠于革命思想，解释革命任务，要群众去迎接二连三的革命战斗。革命会不会发生，什

^① 参看护党派孟什维克¹³⁸ 德涅夫尼茨基在《争论专页》¹³⁹（我党中央机关报的附刊）第三期上发表的文章中对拉林的改良主义和马尔托夫的遁辞的正确评论。

么时候发生，在什么情形下发生，这不以某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但群众中的革命工作永远不会是徒然的。只有这样的工作才会使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些社会主义的起码道理，拉林和马尔托夫之流的先生们都忘了。

拉林反映了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全决裂的俄国取消派的观点，毫无愧色地把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全都端了出来。下面就是他在《生活事业》杂志（1911年第2期）上发表的一段话，这段话，每个珍重社会民主党原则的人都应该记在心里。

“当人们简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就会有茫然若失和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等待情绪，就是模糊的希望，也不知是希望革命重演一遍，还是希望‘等着瞧’。目前的任务，不是在海边坐着等天气，而是向广大群众灌输这种指导思想；俄国实际生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不是‘为了革命’，不是‘等待革命’，而只是……〈请注意这“只是……”〉为了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了用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活动来集合和训练自己的力量；为了用这个方法去培养和积蓄社会主义意识；特别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那个随着封建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而产生的俄国立宪维新时期，在俄国社会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善于决定方针（辨别情况）和保卫自己！”

这真是一个完备的坦率的自鸣得意的道道地地的改良主义者。向革命思想宣战，向革命“希望”宣战（改良主义者觉得这种“希望”模糊，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经济政治矛盾的深刻），向为革命组织力量和进行思想准备的任何活动宣战，在受斯托雷平保护不会遭到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反驳的合法刊物上宣战，代表已经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全决裂的合法派宣战，——这就是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之流的先生们建立的斯托雷平工党¹⁴⁰的

纲领和策略。上面这段话确切地反映了这些人的真正纲领和真正策略，这不同于他们的虚伪的官场声明；他们“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属于“不调和的国际”。这些声明是装饰门面的空话。这个完全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他们的行动，是他们的实际社会本质。

请看改良主义者纠缠不清的可笑矛盾吧！既然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象拉林说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对每个不是为了用流行的称号来欺骗工人而自称社会党人的人来说是很清楚的。这样，我们应当组织起来，就正是“为了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了“等待”革命，为了“希望”（不是模糊的希望，而是以不断增加的准确科学材料为依据的希望，有信心的“希望”）社会主义革命。

但问题在于改良主义者妄谈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象马尔托夫妄谈要害等等一样），只是为了用空话来掩盖他背弃任何革命的行为。他背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借口是这个革命已经完成，或者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的矛盾就“足够了”，他背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借口是，我们“此刻”必须组织起来“只是”为了参加“俄国即将到来的立宪维新”！

但是，既然你，披着社会主义者漂亮外衣的可敬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承认俄国“即将到来的立宪维新”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是承认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结束，你就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你说“封建反动势力自取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唾弃无产阶级通过人民革命运动，不仅要消灭封建反动势力，而且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的思想，你就再一次暴露了你的资产阶级本性。

不管我们的斯托雷平工党的英雄们怎样进行自由派的说教，俄国无产阶级都要始终不渝地本着忠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精神，来进行反革命时代注定要它进行的全部困难的、艰苦的、日常的、细小的、看不见的工作，组织起来，积蓄力量，去进行革命，给叛徒以无情的回击，不是以“模糊的希望”为依据，而是以相信革命还会重新爆发这种有科学根据的信心为依据。

载于1911年9月14日(1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
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7卷
第212—224页

纪念赫尔岑

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了。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纪念他，可是又小心翼翼地回避严重的社会主义问题，费尽心机地掩盖革命家赫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右派报刊也在悼念赫尔岑，但是撒谎骗人，硬说赫尔岑晚年背弃了革命。至于侨外的自由派和民粹派纪念赫尔岑的言论，则满篇都是些花言巧语。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赫尔岑是属于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朗和阿拉克切也夫¹⁴¹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暴徒，赌徒，闹集市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痴心妄想的马尼洛夫之流。“但是在他们中间，——赫尔岑写道，——也出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¹⁴²，出现了象罗慕洛和烈姆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 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¹⁴³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 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通信》的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就陷入了精神破产的状态。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直接观察过这次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¹⁴⁴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

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破产，他的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花言巧语宣扬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的俄国自由派空谈家中的骑士们没有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1905年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伟大称号的骑士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派到自由派，到趋炎附势、卑鄙齷齪、穷凶极恶的自由派的转化形式，这种自由派在1848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毁的皇朝，向拿破仑第三鼓过掌，正是这种自由派遭到过赫尔岑的咒骂，尽管他还没有识破他们的阶级本质。

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岑在1869年即逝世前一年写给巴枯宁的几封《致老友书》就是证明。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了。诚然，赫尔岑把这种决裂还只是看作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看作相信本阶级定会胜利的无产者的世界观同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之间的一道鸿沟。诚然，赫尔岑在这里又重复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词句，说什么社会主义应当“向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小市民同样作宣传”。但是，赫尔岑与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已经开始“集合”无产阶级“队伍”、团结“抛弃了不劳而获者的世界”的那个“劳工世界”的国际！¹⁴⁵

赫尔岑既然没有了解1848年全部运动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也就更加不能了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其实，赫尔岑的这一学说，也象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现时的“社会革命党人”¹⁴⁶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象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1861年农民得到的土地愈多，得到的土地愈便宜，农奴地主主的权力也就会破坏得愈厉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会愈迅速，愈自由，愈广泛。“地权”和“平分土地”的

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

1905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农民（“劳动派”¹¹²和“农民协会”¹⁴⁷）力求用各种方式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直到“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正是以业主资格，以小企业主资格进行斗争的。

现在争论什么地权的“社会主义性”等等，这只能模糊和掩盖真正重要而严肃的历史问题，即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的区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这次革命中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义倾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看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看词句，如果我们是把阶级斗争当作“理论”和学说的基础来研究，而不是相反的话，那末，赫尔岑的《钟声》杂志¹⁴⁸所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¹⁴⁹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在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是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有一个极其卑鄙无耻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卡维林，他先前正是由于《钟声》杂志带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大加赞赏，但是后来他反对宪法，攻击革命鼓动，反对“暴力”，反对号召使用暴力，开始宣传忍耐，这时候赫尔岑就同这位自由主义的哲人决裂了。赫尔岑抨击了卡维林为了“替玩弄自由主义手腕的政府暗中策划”而写的那篇“空洞的、荒谬的、有害的杂文”，抨击了卡维林硬说“俄国人民蠢如牛，政府则聪明绝顶”的那些“充满政治感伤的警句”。《钟声》发表过一篇以《祭文》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痛斥了“那些把自己高傲而浅薄的思想编成一整套腐败谬论的教授，那些一度表现仁慈宽厚、后来看见健全的青年不会同情他们的腐败思想就勃然大怒的退职教授”。卡维林一看到这种描绘，就知道说的是他自己。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推翻政府，政府也就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赫尔岑在谈到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正好答复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⁶：“这里有一些可怜的人，草木一样的人，软体动物一样的人，却说不应当咒骂这一伙统治我们的强盗和败类。”

当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而受伤的兵士时，《钟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马格达琳娜（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诚心忏悔”。屠格涅夫一看就知道是说的自己。

当所有俄国的自由派狐群狗党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仍然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

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大多数的奴才们的非难。”

当有消息说一个农奴打死了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赫尔岑就在《钟声》杂志上补充说：“干得好！”听说沙皇政府准备派遣军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就会登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当雷帖尔恩上校不愿做刽子手的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1860年），赫尔岑写道：“如果真要开枪，那就应该对准那些命令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的将军们开枪。”当别兹得纳村的五十个农民被杀死，而他们的首领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极刑的时候（1861年4月12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写道：

“呵，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主教公会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的那些牧师……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们吧。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们现在认识他了，你们是别兹得纳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们是奔萨城被杀老人的子弟……你们的首领也同你们一样无知，也同你们一样贫穷……为了你们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别兹得纳村的安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四十八种奇迹，向他们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们时刻纪念着他们，这就能创造出一种奇迹——获得解放。”

由此可见，那些藏身于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主义者，只颂扬赫尔岑的弱点而隐瞒他的优点，这种对赫尔岑的诬蔑该是多么卑鄙无耻。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六十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

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¹¹³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增长。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蠹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蠹贼的第一人。

载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
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9—16页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论文¹⁵⁰（我们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¹⁵¹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这位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论文正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代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最早的和唯一的先驱者贵族赫

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1905年农民协会¹⁴⁷会员和1906—1912年前三届杜马的劳动派¹¹²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们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娼妓化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

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怎么？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后面这两种政治思想倾向使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因此，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

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截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往往停留在这里。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¹⁵²。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点。¹⁵³

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历

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

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是什么经济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被人接受呢？这是因为必须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各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是极其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一定要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载于1912年7月15日
《涅瓦明星报》第17号
署名：弗拉·伊林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151—157页

两种乌托邦

乌托邦是一个希腊字，按照希腊文的意思，“乌”是“没有”，“托邦斯”是地方。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

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一种愿望，是不依靠社会力量，也不依靠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的一种愿望。

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现代俄国，有两种政治乌托邦最牢固，并且由于有诱惑力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

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撤销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职务，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劳动群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妄想自由俄国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

民粹派的乌托邦就是民粹派的知识分子和劳动派¹¹²的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合理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或者以为在资本统治

下，在金钱权力下，在商品生产下，也可以维持“公平的”、“均等的”土地分配制度。

这两种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俄国保持得相当牢固呢？

这两种乌托邦的产生反映了这样一些阶级的利益，它们进行着反对旧制度，反对农奴制，反对政治压迫，一句话，“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乌托邦、幻想是由这种不独立和软弱性产生的。幻想是软弱者的命运。

一般自由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无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性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都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他们的首倡精神，仇视他们“冲天的”气魄，如马克思形容十九世纪一次欧洲群众运动时所说的那样¹⁵⁴。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在俄国政治解放事业中表现软弱无力的乌托邦，是那些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平”瓜分特权，而把这种崇高的愿望冒充为俄国民主派的“和平”胜利论的营利自肥的富豪的乌托邦。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既要战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又不使他们失败，既要摧毁他们而又不使他们痛苦的幻想。很明显，这种乌托邦之所以有害，不仅由于它是乌托邦，而且由于它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相信这种乌托邦的群众，永远也不会争得自由；这样的群众不配享受自由；这样的群众完全应该受普利什

凯维奇之流的嘲弄。

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是站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中间的小业主的一种不用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当经济解放问题也如现时政治解放问题这样成为俄国当前的迫切问题的时候，民粹派乌托邦的害处就不亚于自由派的乌托邦了。

但是，现在俄国所处的时代还是资产阶级改革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改革时代；彻底成熟了的不是无产阶级经济解放问题而是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民粹派的乌托邦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乌托邦对于重分土地应有（和将有）什么经济结果的问题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是农民群众，即在资产阶级-农奴制的现代俄国占人口多数的群众的波澜壮阔的民主主义高涨的伴侣和象征（在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也象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样，农民是不会占人口多数的）。

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伴侣和象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

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民粹派和劳动派在俄国土地问题方面，提出并执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把它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土地重分的“平均制”是乌托邦，但是土地重分必须与一切旧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占有制完全决裂，这却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方向上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办法。

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⁹¹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现在，在二十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不可遏止地向这方面前进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也许不仅俄国一国，在二十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应当这样）。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反映了农民群众斗争的愿望，答应胜利以后让他们享有千万种福利，尽管这种胜利实际上只能给他们一百种福利。但是，长期处在旷古未闻的黑暗、匮乏、贫困、肮脏、孤苦、闭塞的境遇中的勇于斗争的千百万民众，把可能胜利的果实夸大十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品。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

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和“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乌托邦，应当坚持本阶级的独立性，这个阶级正因为丝毫没有“陷入”那种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主，而且往往同封建主结成联盟的私有制的“深渊”，所以能够奋不顾身地反对封建制度。农民“陷入”小商品生产的“深渊”，他们在顺利的历史情况下，能够做到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但是他们必然而不是偶然地永远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动摇不定。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辨别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的一贯趋向。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趋向，并且考察出这种趋向同二十世纪头十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写于1912年10月

第一次载于1924年《生活》
杂志第1期

署名：弗·伊·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349—353页

欧仁·鲍狄埃

(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去年，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的二十五周年。

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并且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象《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1816年10月4日生于巴黎。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十四岁，这首歌的名字叫作《自由万岁!》。1848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一个无产者，他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

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在三千六百张选票中，有三千三百五十二票是选他的。他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措施。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1876年，在流亡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

公社失败以后过了九年鲍狄埃才回到法国，回来后立即参加了“工人党”。1884年他的第一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第二卷出版了，题名为《革命歌集》。

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一些歌，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遗体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Père Lachaise），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了的公社社员。警察夺取红旗，组织殴打。无数的人群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

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

载于1913年1月3日

《真理报》第2号

署名:尼·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6卷

第209—211页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变进程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

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第三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起。

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学说在每个时期的命运。

一

在第一个时期的初期，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与我国粹派相似的社会主义派别：它们不懂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不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而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什么“人民”、“正义”、“权利”等辞句来掩盖各种民主改革的资产阶级实质。

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1848年六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¹⁴⁴，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活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开始转向现存秩序方面，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这一资产阶级改革的发展过程；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英勇，才使共和制度即最露骨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那种国家组织形式巩固起来。

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更混乱和不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向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二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

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了换取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三

当机会主义者刚在拚命赞美“社会和平”，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共和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群众斗争的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人，看见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失望是多么近视，多么

懦弱。

八亿人民的亚洲投入了为实现与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从这个事实中所应吸取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气。

亚洲各国革命同样向我们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卑鄙无耻、民主群众独立活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与任何资产阶级间的明显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义腐化最深的英国工人也动作起来了。就是在德国这个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容克国家里，政治危机也在迅速成熟。狂热的军备竞争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现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象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解体与无产阶级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载于1913年3月1日
《真理报》第50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581—584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 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科学会抱别的态度，因为在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在应不应该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

而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

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和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使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认识是相对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不管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些“重新”回到陈旧腐烂的唯心主义去的学说怎样说，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人。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作为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工人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反转来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能够取得胜利是十分明显的,在农业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日益占优势,使用机器的范围日益扩大,农民经济日益陷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着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物却归一小撮资本家所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也造成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的发展过程，都一年比一年明显地向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是完全正确的。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三

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露出一件事实，即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并且表示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

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要打破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到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能够（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洲，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地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教育和训练，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估计自己的成绩，锻炼自己的力量和不可遏止地成长起来。

载于1913年3月《启蒙》
杂志第3期
署名：弗·伊·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9卷
第1—8页

亚洲的觉醒

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 1905 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正在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人口近四千万的荷属印度——爪哇岛等荷属殖民地。

这个民主运动的代表者：第一、是爪哇的人民群众，他们在伊斯兰教旗帜下掀起了民族运动。第二、是资本主义在熟悉当地风土气候的欧洲人中间培养的当地知识分子，这些欧洲人是主张荷属印度独立的。第三、是爪哇和其他群岛上的很多华侨，他们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万-拉维斯泰因在描述荷属印度的这种觉醒时指出，荷兰政府历来的专横与暴政现在正遭到土著居民群众的坚决反击和抗议。

革命前夕的通常现象出现了：社团和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在产生。政府加以禁止，因而引起更大的愤恨，使运动得到新的增长。例如，不久前荷兰政府解散了“印度党”^①，因为该党的章程和纲领中谈到了要求独立。荷兰“巡警”（顺便说一句，教权派和自由派都

^① 这里指的是荷属印度党。——编者注

是赞成他们的；欧洲自由主义已经腐朽了！）认为这是想脱离荷兰的犯罪的要求！当然，被解散了的政党改换了名称又恢复起来了。

在爪哇，产生了土著人的民族协会，这个协会已有八万名会员，并组织了群众大会。民主运动的增长是不可遏止的。

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关心地、兴奋地注视着全球各地和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强大的增长。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身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和为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活活地腐朽了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载于1913年5月7日

《真理报》第103号

署名：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9卷

第67—68页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拿这两组词作对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用作本文标题的语句，包含着一种辛辣的真理。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衰老的资产阶级与一切衰败了的和正在衰败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陷于动摇状态的雇佣奴隶制。

在先进的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欧洲在现时之所以先进，并不是由于存在资产阶级，而是由于不愿资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争取美好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增长起来，只有它才能保持和扩展对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和人侮辱人现象的深恶痛绝的仇恨。

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尚存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

欧洲资产阶级为了一些财阀和资本家骗子的贪利目的而支持亚洲反动势力的事实，要算是证明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了。

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百万人民正在觉醒起

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

请看一笔很简单但又值得注意的帐目吧。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拥护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借款数目约为二亿五千万卢布，按一百卢布折合八十四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付中国人二亿一千万卢布；而他们向公众要去二亿二千五百万卢布。你看，在几个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一千五百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是一笔绝妙的“纯”利吗？

若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借款呢？在中国不是有共和制度以及国会中的大多数反对这笔借款吗？

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了！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的。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有各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

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斗争概念

短 评

取消派分子¹³²阿·叶尔曼斯基在《我们的曙光》月刊¹³¹上用很多恶狠狠的话猛烈攻击我对他（和古什卡）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批评（《启蒙》¹⁵⁵第5—7期合刊）^①。

叶尔曼斯基先生破口大骂，并且提起以前对他的“侮辱”（包括对1907年在圣彼得堡企图分裂社会民主党组织而遭到失败的唐恩先生及其伙伴的“侮辱”在内），力图以此来抹杀问题的真正实质。

但是我们仍然不允许叶尔曼斯基先生以回顾取消派不该受到的侮辱和失败来抹杀目前争论的实质。因为目前的争论涉及很重要的原则问题。这个原则问题经常因各种不同的理由而一再被提出来。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伪造马克思主义，以自由派的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取消派分子进行的全部争论的思想基础，我们将不厌其烦地阐述清楚。

①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41—57页。——编者注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伊林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叶尔曼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工业组织的活动看成是‘全民族的（部分甚至是国际的）规模’的阶级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缺乏全民族的、全国的基本特征——国家政权机构’……”（《我们的曙光》第55页）

这就是那个阿·叶尔曼斯基对问题实质的论述。他用尽一切办法来回避这一实质！无论他怎样责备我歪曲他的观点，骂我罪该万死，无论他怎样竭力隐讳，甚至求助于对1907年分裂的回顾的“庇护”，但是真理毕竟要占上风。

总之，我的论点是清楚的：全民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机构。

我的愤怒的论敌，您不赞同这一观点么？您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么？

那末您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呢？您为什么不针对错误的观点而提出正确的观点呢？按照您的意见，断定全民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机构只不过是引号里的马克思主义，那末，您为什么不驳斥我的错误，不明白、清楚、毫不含糊地叙述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呢？

我们引用阿·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紧接着上述引文的一段议论，读者就会得到对这些问题的清楚的答案了。

“伊林希望俄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另外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希望它力争改变整个国家制度。伊林希望这样，但是资产阶级不希望这样——而这一点当然是‘取消派分子’叶尔曼斯基的过错了，因为他以‘自由派的阶级斗争概念偷换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

就是叶尔曼斯基先生这段冗长的话，它能让人当场看到这个借词规避的取消派分子的真面目。

借词规避确是事实。

我所指的全民族的“基本特征”对不对呢？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本人被迫承认，我指出的正是事情的这一实质。

而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捉住，于是对这个问题避不作答！

“被捉住的”叶尔曼斯基先生避开关于我指出的基本特征是否正确的问题，从这个问题跳到伊林“希望”什么和资产阶级“希望”什么的问题上去了。但是，无论叶尔曼斯基先生跳得多么勇敢，多么不顾死活，也不能掩盖他已被捉住这一事实。

我的可爱的论敌，既然我们是在争论阶级斗争的概念，这同“希望”又有什么关系呢？！您本人应当承认，我是在斥责您以自由派的概念偷换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应当承认我曾指出过把国家政权机构归入全民族的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基本特征”。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虽然发怒，却是一个笨拙的论战家；他竟以自己为例清楚地说明了取消主义以及他叶尔曼斯基的错误和自由派的阶级斗争概念的联系！

阶级斗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此，应该详细地谈谈阶级斗争的概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¹⁵⁶。大家都知道，对马克思的这句深刻的话，那些受自由主义思想奴役的机会主义者作了歪曲的理解，并且力图作歪曲的解释。例如，取消派的兄长“经济派”就属于机会主义者之列。“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因此承认为每个卢布多争取到五个戈比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却不愿看到更高级的、更发达的、全民族的为政

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经济派”只承认萌芽阶段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它的更发展的形式。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的那些从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客。“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

其次，如果认为，只要阶级斗争是属于政治范围的，它就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阶级斗争，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政治上，可能局限于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可能深刻些，直到涉及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在工人运动稍微巩固时，已经不敢否认阶级斗争，但是力图缩小、限制、阉割阶级斗争的概念。自由主义甚至愿意承认政治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政权机构不属于政治范围。不难明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造成了这种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歪曲。

叶尔曼斯基先生转述温文尔雅的官吏古什卡的著作时与之一唱一和，没有看出(还是不愿看到?)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阉割，正是在这时候，我向叶尔曼斯基先生指出了他的这一根本的理论性的和一般原则性的过错。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就生气，谩骂，支吾搪塞，却不能驳倒我的意见。

同时，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是一个十分笨拙的辩论家，他使自己原形毕露！他写道：“伊林希望这样，但资产阶级不希望这样。”现在我们明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观点的什么特点引起这些“希望”的分歧了。

资产阶级“希望”限制阶级斗争，歪曲并缩小它的概念，磨钝它的锋芒。无产阶级“希望”这一骗局被揭穿。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那些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来谈论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人，能揭露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概念的狭隘性，而且是出于自私的狭隘性，不要只是引证数字，只是为“巨大的”数字而高兴。自由主义者则“希望”这样来评价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对它的狭隘性保持缄默，对它拒绝把“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东西归入这一斗争保持缄默。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是在以自由派的观点议论那些有趣的、但为古什卡先生毫无意义地、盲目统计出来的数字时被人捉住的。显然，这点一旦被揭穿，阿·叶尔曼斯基先生除了谩骂和支吾搪塞之外，就别无他法了。

让我们在中断的地方继续引用阿·叶尔曼斯基的文章吧：

“显然，事实上这里只有伊林一人用自己的品评，同时还用〈!!〉从法国大革命历史中搬来的作为学生楷模的刻板准则偷换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研究。”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这样糊涂，竟愈加无情地“毁灭着”自己！他还没有发觉，这个对法国大革命的“死板公式”的愤怒的攻击使他的自由主义被揭穿和暴露到何种程度！

亲爱的叶尔曼斯基先生，你该懂得（尽管取消派如何难以明白这一点），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者自由派的观点，或者反动的观点等来品评、评价事物，就无法“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

叶尔曼斯基先生，您过去和现在都是用自由派的观点来评论善良的官吏古什卡的“研究”的，而我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论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您的批判的分析在国家政权机构问题面前停住了，这样您就证明您的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局限性。

这就是所需要的证明。

您对法国大革命的“死板公式”的攻击使您露出了马脚。因为任何人都会懂得，事情不在于死板公式，也不在于法国的楷模，比如当时在“死板公式和楷模”的条件下，并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特别是政治性的罢工。

事情在于：您成为取消派分子之后，已经不会运用革命的观点来评价社会事件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马克思决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十八世纪末的“死板公式和楷模”上，他运用的观点永远是革命的，评价（善良的叶尔曼斯基先生，要是您喜欢更富于“学术味的”名词，就用“品评”吧！）阶级斗争时总是极其深刻的，总是剖析它是否涉及“基本的”东西，总是无情地抨击任何怯懦的思想和任何掩盖不发展的、被阉割的、被自私地歪曲了的阶级斗争的行为。

十八世纪末的阶级斗争向我们表明，它是怎样变成政治性的斗争的，它是怎样达到真正“全民族的”形式的。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高度大大不同了。旧的“死板公式”并没有阻止任何人研究我在上面已经稍稍提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永远要求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评价”，永远要揭露自由派的歪曲，半吞半吐，胆怯的掩饰的贫乏。

我们向阿·叶尔曼斯基先生致意，因为他以忘我的精神十分精彩地说明取消派丧失了用革命观点观察社会现象的能力，如何以自由派的阶级斗争概念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

载于 1913 年 5 月《启蒙》
杂志第 5 期
署名：弗·伊林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19 卷
第 104—110 页

几个争论问题

(公开党和马克思主义者)

一、1908年的决议¹³⁴

许多工人觉得,《真理报》¹⁵⁷和《光线报》¹⁵⁸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和难于理解的。自然,某几号报纸上所载关于个别问题,有时甚至是枝节问题的论战性文章,不能给人一个关于斗争对象和内容的完整概念。因此,工人表示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引起斗争的取消主义问题,是目前工人运动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不详细了解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定的见解,就不能成为觉悟的工人。凡是愿意独立决定自己党的命运的工人,都不会漠视初看起来似乎不甚明了的论战,而会认真地去寻找真理,也一定会找到真理。

怎样去寻找真理呢?怎样弄清互相矛盾的意见和论断呢?

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某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那末为了确定真理,就不要只看争论双方的声明,而要自行审查事实和文件,自行考察,看看有无证人的证词以及这些证词是否确实。

不消说,这不是时常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做“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

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向那些不怕用这种功夫，而有决心去独立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实、文件以及证词的工人发表一些意见。

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取消主义呢？这个名词是从哪里得来的，它的含意是什么？

《光线报》说，党的取消主义，即解散党、毁坏党和背弃党，这只不过是恶意捏造出来的东西。说什么这是布尔什维克“派别组织分子”捏造出来反对孟什维克的一种罪名！

《真理报》说，全党斥责取消主义，与它作斗争，迄今已经四年有余了。

究竟谁是对的？怎样找到真理呢？

显然，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从最近四年来，即从1908年起至取消派完全脱离了党的1912年止这一期间的党的历史中去寻找事实和文件。

现在的取消派还留在党内的这四年，正是审查取消主义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和怎样产生的最重要的时期。

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个基本结论：谁谈论取消主义问题而避开1908—1911年这一时期的事实和党的文件，谁就是对工人隐瞒真理。

这些事实和党的文件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190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决议。如果工人不愿让别人把他们当作可以用神话和谎言来欺骗的小孩子看待，那末他们就应当去问问自己的顾问、领导者或代表，在1908年12月，党是否就取消主义问题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决议斥责了取消主义，说明了取消主义的实质。

所谓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取消〈即

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经验)为代价”。

这就是党在四年多以前所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问题的决议。

从这个决议中可以看出,取消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受到斥责。取消主义的实质就是背弃“地下组织”,取消它,用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来代替它。总之,党所斥责的并不是合法工作,并不是进行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党所斥责(而且绝对斥责)的是用一种不定形的“公开的”东西去代替旧有的党,因为这样的东西已经不能称之为党了。

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存,不坚决反对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那它就会不能生存。这是不言而喻的。

谁借口建立新的党而背弃现有的党,那我们就应当告诉他:任凭你去建立新的党吧,可是你却不能作为旧有的,目前的,现存的党的党员。190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决议的意思就是如此,显然,关于党的生存问题是不能有另一种决议的。

取消主义当然是与叛变行为,与背弃纲领和策略的行动,与机会主义有思想联系的。上述决议的结尾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取消主义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把党引上资产阶级的错误的道路,引上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背弃自己的党,也不取消它。取消主义则是走到了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如果党把那些不承认党的生存的人包括在内,那它就不能生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今的条件下,背弃地下组织,那就是背弃旧有的党,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试问取消派对于1908年通过的这一党的决议究竟采取什么

态度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检验取消派态度是否真诚和政治上是否诚实的标准。

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只要没有发疯，都不会否认这个事实：党确实通过了这样的决议而并没有把它废除。

于是取消派便玩弄支吾搪塞的伎俩：或是避开问题不谈，在工人面前不提党在1908年所通过的决议；或是叫喊（往往带有许多谩骂语句）说什么这个决议是由布尔什维克提出通过的。

然而谩骂的语句不过是暴露出取消派的软弱无力罢了。曾经有过由孟什维克提出通过的党的决议，例如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关于土地地方公有问题的决议¹⁵⁹就是如此。这是尽人皆知的。很多布尔什维克都不同意这个决议。然而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否认这是党的决议。同样，1908年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问题的决议，也是党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玩弄任何支吾搪塞伎俩，都不过是想把工人们引入迷途而已。

谁想不仅仅在口头上承认党，那他就不能容许在这里有任何的支吾搪塞，并且要找出党关于取消主义问题的决议的真理。从1909年起，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切护党派孟什维克¹³⁸也赞同了这个决议；普列汉诺夫在他所出版的《日志》¹⁶⁰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刊物上，曾经屡次和十分肯定地说明过：取消党的人不能留在党内。

普列汉诺夫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个孟什维克。可见，取消派通常借口1908年的党的决议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这种说法，更是错上加错。

取消派在《光线报》或在《我们的曙光》¹³¹上愈是谩骂普列汉诺夫，这便愈加明显地证明取消派无理，证明他们企图用喧闹、叫

喊和吵架来蒙蔽真理。虽然有时用这些手段也能一下子使一些情况生疏的人茫然失措，但工人们毕竟自己能够分清是非，而且很快就会鄙弃这些漫骂语句的。

工人的统一是否必要呢？当然是必要的。

没有工人组织的统一，试问能有工人的统一吗？显然不能。

什么东西阻碍工人党的统一呢？是因取消主义问题而发生的争论。

这就是说，工人应当认清这些争论，以便自行决定自己党的命运，捍卫自己的党。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必须熟识党关于取消主义的第一个决议。工人们应当切实知道和细心思索这个决议，而抛弃一切躲避问题或撇开问题的企图。每个工人把这个决议思索一番，就会开始了解，取消主义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如此“麻烦”；为什么在四年多的反动时代，这个问题总是摆在党的面前。

在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考察党关于取消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决议，这就是约在三年半以前所通过的一项决议，然后我们就来考察决定问题现状的种种事实和文件。

二、1910 年的决议

在第一篇文章里（《真理报》第 289 号），我们已经引证了第一个基本文件，这就是党在 1908 年 12 月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是愿意在目前争论中探索真实情况的工人所必须知道的。

现在我们要引证和考察党对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决议，即三年半以前，在1910年1月所通过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一致通过的，一切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一切所谓前进派分子¹⁶¹，和（这是最重要的）一切孟什维克和现在的取消派毫无例外，以及一切“民族的”（即犹太的、波兰的、拉脱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赞成了这个决议。

我们把该决议中最重要的一段全部引录如下：

“社会民主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造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是：一方面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降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缩小彻底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上的各种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反对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彻底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目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

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用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的一切阶级斗争方面的工作来克服上面这两种倾向，并说明这两种倾向的危险性。”¹⁶²

从这个决议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三年半以前，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派别的代表毫无例外，都不得不一致承认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策略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被承认是危险的。关于这两种倾向都没有拿偶然性和个别人的恶意来解释，而是拿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环境”来说明。

不仅如此，一致通过的党的决议中，还指出了这两种倾向的阶级根源和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以空空洞洞地指出混乱和瓦解为限。大家都看得见，许多拥护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们的头脑中，都充满着混乱、犹疑、消沉和疑惑。仅仅承认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造成这种混乱和瓦解的阶级根源是什么，无

产阶级朋友中间的这种“混乱”状态究竟是由非无产阶级成分中的哪些阶级利益所引起的。

党在三年半以前通过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倾向是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所产生的，是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所产生的。

这些势必使无产阶级去接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倾向究竟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倾向，即是与“前进派”有联系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倾向，几乎完全消失了。在俄国，已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再鼓吹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了。“前进派”（包括阿列克辛斯基等等）已开始在《真理报》上与护党派孟什维克一起进行工作了。

党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另一个倾向就是取消主义。这一点从决议上指明“否认”地下组织和“降低”它的作用及意义的条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三年前发表的而谁也没有把它驳倒的最确切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出自一切“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托洛茨基（取消派不能提出比他们更好的证人了）；这个文件直截了当地宣称：“其实，最好把决议案中所指出的那个必须与之斗争的派别称为取消派”……

总之，每一个愿意理解现时争论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三年半以前党一致地承认取消主义是一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倾向，是一个必须与之斗争的倾向，是一个表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倾向。

具有反民主情绪，具有一般反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取消和解散旧有的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极力散布和支持一切趋向于取消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资产阶级力求散播背弃旧有任务的思想，力求“缩短”、削减、限制和阉割这些任务，力求去与普

利什凯维奇之辈实行调和或妥协，而不愿彻底铲除他们的政权的基础。

取消主义也就是把这些资产阶级的背弃和叛变的思想传布到无产阶级中间来。

三年半以前一致通过的党的决议所指出的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就是如此。全党认为取消主义的最大害处和危险性，它对工人运动，对工人阶级独立（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政党团结事业的致命作用，也就在此。

取消主义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毁坏）工人阶级的旧有政党，而且是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

在下一篇文章，我们将清楚地说明对于取消主义的这种估计，并将把取消派《光线报》上所登载的最重要的言论完全引述出来。现在把上面所说的作一简括的总结。一般“光线派分子”，尤其是费·唐恩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企图把事情弄成这样，好象全部“取消主义”都是捏造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一种非常虚伪的遁辞，其目的是要使《光线报》读者完全不知道真实情况。其实，除1908年通过的党的决议之外，还有1910年一致通过的党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取消主义作了全盘的估计，认为它是一个对工人阶级危险的致命的和离开无产阶级道路的资产阶级倾向。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才能隐瞒或回避党所作的这个估计。

三、取消派对 1908 年和 1910 年决议的态度

在前一篇文章里(《真理报》第 95 号〔总第 299 号〕),我们已经确切引证了一致通过的党的关于取消主义问题的决议,认为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

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个决议是在 1910 年 1 月通过的。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些取消派分子的行为吧,这些人至今还胆敢硬说过去现在都没有什么取消主义。

1910 年 2 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在当时刚刚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二期上公然说:“象一个完整的有组织的等级制度〈即“机构”的等级或系统〉那样的政党是没有的”,取消那“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东西也是不可能的(见《我们的曙光》1910 年第 2 期第 61 页)。

这是在党的决议一致通过后一个月,也许还不到一个月的時候写的!!

1910 年 3 月,取消派所出版的另一个杂志,即《复兴》杂志¹³³(它的撰稿人也是波特列索夫、唐恩、马尔丁诺夫、叶若夫、马尔托夫和列维茨基之流)又强调了波特列索夫先生所说的话,并对它加以通俗的说明:

“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消,而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自己还要补充说——梦想恢复这个等级制度的旧有的秘密形式,简直是一种有害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从前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们失掉了政治的敏感性。”(《复兴》杂志 1910 年第 5 期第 51 页)

党已经没有了，要想恢复它，就是一种有害的空想，——这是何等明显而肯定的言论。这是何等明显而公然地背弃党的行为。这些背弃了党（并且劝导过工人来背弃党）的人，也就是抛弃地下组织和“幻想”公开党的人。

其次，1912年间，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¹⁶³（1912年第6号）和《我们的曙光》（1912年第6期）上，也是十分肯定而公开地支持这种离开地下组织的行为的。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当时写道，“情形既是如此，那末谈论什么非派别组织，这就同鸵鸟无异，就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派别组织的形成和联结，是主张党内改革的人，或确切些说，主张党内革命的人的直接责任和迫切任务”。

总之，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公开主张党内革命，即主张消灭旧有的党，而建立一个新的党。

《光线报》1913年第一〇一号所载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编辑部社论公然说道，“某些地方的工人群众中间，甚至同情地下组织的心理正在复活和巩固”，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后来，该文作者耳·谢多夫自己承认说，这篇论文甚至在拥护《光线报》策略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不满”（《我们的曙光》1913年第3期第49页）。同时，耳·谢多夫自己的解释又引起了一个拥护《光线报》的人，即安恩方面的新的不满，安恩¹⁶⁴在《光线报》第一八一号上发表文章反对谢多夫。安恩反对谢多夫所谓“地下组织是阻止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形成和阻止工人建立社会民主党的障碍物”的说法。安恩讥笑耳·谢多夫，说他在要不要地下组织的问题上“态度暧昧”。

《光线报》编辑部在安恩这篇论文后面加了一篇很长的后记，表示赞成谢多夫，而认为安恩“对耳·谢多夫的批评是不对的”。

我们在后面还要分析《光线报》编辑部的议论和安恩本人的取

消主义错误。这里暂且不谈。现在我们应当仔细地估计一下从我们引证的文件中得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①

无论在1908年或1910年,全党都斥责和驳斥了取消主义,详细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一派别的阶级根源及其危险性。取消派的一切报纸和杂志——无论是《复兴》(1909—1910年),或《我们的曙光》(1910—1913年),《涅瓦呼声报》(1912年),或《光线报》(1912—1913年)^②——在党已作出了最确定的、甚至一致通过的决议以后,仍然在重复包含有明显的取消主义的思想 and 议论。

甚至拥护《光线报》的人也不得不声明说不同意这种议论,不同意这种宣传。这是事实。因此,象托洛茨基、谢姆柯夫斯基及其他许多袒护取消派的人那样叫喊什么“迫害”取消派,这简直是不老实的,因为这是对真理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歪曲。

我所引证的五年多以来(1908—1913年)的文件所证明的一个真理,就在于取消派嘲弄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继续对党,即对

①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一书内将此段改变如下(按手稿刊印):
“在《现代生活报》¹⁶⁵第八号上(1913年7月19日),维·查苏利奇把取消派的议论重复了数十次,她写道:‘很难断定这个新的组织(社会民主党)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了……工作’。这种说法显然是等于背弃党。维·查苏利奇认为从党内脱逃出去是正当的,她说人们纷纷退出组织是‘因为当时那里无事可作了’。维·查苏利奇创出一种纯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认为应该用‘广大阶层’来代替党。对这个理论的详细分析,见《启蒙》杂志¹⁵⁵1913年第9期(《列宁全集》第19卷第394—417页。——编者注)。从我们引证的文件中得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是什么呢?”——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一书内补充了“或《新工人报》¹⁶⁶(1913—1914年)”一语以及如下一段脚注:

“例如见《新工人报》1914年第一号所载新年献词:‘设法造成公开行动的政党也就是设法造成党内的统一’(是说公开党建立者之间的统一吗?)。又如1914年第五号:‘克服这些东西(即克服横在组织工人代表大会途程上的一切障碍),也就是真正为结社自由而斗争,即为工人运动的合法地位而斗争,而工人运动是与争取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存在的斗争分不开的。’——编者注

“地下组织”大肆辱骂和攻击。

每个愿意自己认真弄清党的争论问题和麻烦问题，愿意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人，都应当首先通晓这个真理，为此每个工人都要独立地研究和审查上述党的决议和取消派的议论。只有细心研究、思索并独立解决自己党的问题和命运的人，才配称为党员和工人党的建设者。究竟是党犯了“迫害”（即是过分激烈和不正确地攻击）取消派的“罪过”呢，还是取消派犯了公然违背党的决议，顽固地鼓吹取消党，即毁坏党的罪过，——对于这个问题是不能抱淡漠态度的。

很明显，党若不竭力去同破坏党的一切势力作斗争，它便不能存在。

上面我们已经引证了关于这个基本问题的种种文件，在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要估计一下鼓吹成立“公开党”的思想内容。

四、取消主义的阶级作用

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里（《真理报》第 289、299、314 号）已经指出，无论在 1908 年或 1910 年，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毅然决然地斥责了取消主义，认为它是背弃了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向工人阶级说明，取消主义就是把资产阶级的影响传播到无产阶级中去。1909 至 1913 年间所有一切取消派的刊物，都公然违背了而且继续违背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各次决议。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取消派至今还在《光线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上表示拥护的那个口号：建立“公开的工人党”或“为公开党而斗争”。

这个口号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呢，还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从取消派或其他集团的情绪和计划中去找，而应从对现代俄国社会力量对比的分析中去找。口号的意义不是由提出口号的人们的意图来决定，而是由国内所有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农奴主-地主和他们的“官僚”，对于一切保证政治自由的变更，都抱仇视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资产阶级按其在半农奴制的落后国家内所处的经济地位来说，不能不追求自由。但是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的积极性，甚于害怕反动势力。1905年革命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工人阶级非常清楚地了解了这个真理；只有机会主义和半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才没有了解这个真理。

资产阶级是自由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因此就产生了它的那种软弱而可怜得好笑的改良主义。幻想改良，但又害怕同农奴主认真算账，农奴主是不但不会给予什么改良，反而会把已经给过的改良也要夺回去的。鼓吹改良，但又害怕人民运动。想要排挤农奴主，但又害怕失去他们的帮助，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把全部政权交给农奴主、而使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的六三政制¹²⁴，就是建筑在这种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绝对没有可能去同任何人“分享”特权或害怕任何人失去这些特权。因此，那种贪图私利的、狭隘的、鄙俗和愚钝的改良主义同无产阶级是格格不入的。至于农民群众，由于他们一方面受着重重压迫，只有忍饥挨饿而谈不到什么特权，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势必动摇于自由派和工人之间。

客观情况就是如此。

从这一情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公开的工人党这一口号，按其阶级根源说来，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里面除了改良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它根本没有暗示：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为了扩大对整个民主派的影响而同自由派进行斗争；它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消除农奴主、“官僚”等等的任何特权基础本身，要奠定政治自由和民主宪制的一般基础；可是，这里却包含着默然背弃旧有的东西，因而也就是叛变和解散（取消）工人党。

简而言之，这个口号是在反革命时代把恰巧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自己队伍中间的所作所为拿到工人队伍中间去宣传。因此，如果没有取消派，那聪明的资产阶级进步党人¹⁶⁷就必须寻找或雇用一些知识分子来把这种宣传带到工人阶级中去！

只有那些昏庸愚昧的人，才会拿取消派的言论去同取消派的动机对照。其实，应当把他们的言论去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动和它的客观地位对照。

请看这些行动吧。1902年，资产阶级是主张地下组织的。当时它派司徒卢威去出版秘密的《解放》杂志¹⁶⁸。当工人运动引起十月十七日事件¹²³的时候，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⁶便抛弃了地下组织，然后就背弃了这个组织，宣布它是不必要的和不合理的东西，说它是罪孽和无法无天的事情（《路标》¹¹⁹）^①。这时，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再提地下组织而是为公开党而斗争了。这是一件历史事实，这件事被立宪民主党人（1905—1907年）和进步党人（1913年）

① 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一书中《路标》一词省略了，添上了如下一段脚注：

“有一本极妙的书，叫做《路标》文集，大量印行过；它是集这些反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之大成的总汇。”——编者注

始终不倦地企图实现合法化的行为证实了。

我们在立宪民主党人那里看见“公开的工作和它的地下组织”，善良的即不自觉的取消派分子阿·弗拉索夫，不过是“用自己的话”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转述出来罢了。

为什么自由派背弃地下组织而采取了“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呢？是不是因为司徒卢威成了叛徒呢？不是的。恰恰相反。司徒卢威之所以转到了另一方面去，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都转过去了。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转过去，第一，是因为他们得到了1905年12月11日¹⁶⁹的特权，甚至在1907年6月3日得到了可以容忍的反对党的地位；第二，是因为它自己被人民运动吓得要命。把“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从“高深的政治”译成简单明了的语言，那就是说：

——地主老爷们！不要以为我们要把你们从世界上赶走呀。不是的。请你们稍微让出一点地方，使我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坐下来（公开党），——那时候我们来保护你们，将会比提莫什金之辈和萨勃列尔派的神甫们¹⁷⁰还要“聪明”、狡猾、“科学”许多倍哩。

小资产者，民粹派，也模仿着立宪民主党人，采取了“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1906年8月，《俄国财富》⁸⁹上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及其伙伴们背弃了地下组织，宣布“为公开党而斗争”，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那些彻底民主主义的，即“地下组织的”口号。

由于这些庸人用改良主义者的腔调空谈什么“广泛的和公开的党”的结果，人人都看得明白，他们失去了任何政党，失去了与群众的任何联系，立宪民主党人甚至不再幻想这种联系了。

这样，也只有这样来分析各个阶级的地位，考察反革命时期的一般历史，才可以做到了解取消主义。取消派就是资产阶级所派遣的把自由主义的腐化现象带到工人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取消派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民主运动的叛徒。他们（也如自由派或民粹派那样）提出“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不过是要借以掩盖他们背弃过去和脱离工人阶级的行为罢了。这是第四届杜马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情形以及工人的报纸《真理报》产生的经过情形所证明了的事实。大家都看得清楚，只有那些没有背弃过去，能够本着过去的精神为加强、巩固和发展过去的东西而善于利用“公开工作”和一切“可能性”的人，才是与群众有联系的。

在六三政制时代，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关于取消派（即自由派）怎样“削减”纲领和策略的问题，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再谈。

五、“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

在前一篇文章里（《真理报》第122号），我们考察了“公开党”或“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的客观的即由阶级的关系所决定的意义。这个口号乃是对资产阶级策略的奴隶般的重复；对于资产阶级说来，这个口号正确地表达了它的背弃革命或它的反革命性。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取消派中间特别流行的维护“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的某些企图。无论马耶夫斯基、谢多夫、唐恩以及一切“光线派分子”，都力图把公开党同公开的工作或公开的活动混为一谈。这种混淆简直是诡辩，是把戏，是对读者的欺骗。

第一，就1904—1913年这一时期来说，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公开的活动乃是事实。公开党却是知识分子用以掩盖背弃党的一个词句。第二，党多次斥责过取消主义，即斥责过公开党这一口号。但是，党不仅没有斥责过公开的活动，相反，正好斥责过忽视这种

活动或背弃这种活动的人。第三，在1904—1907年间，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特别努力进行过公开的活动。但是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任何一个流派和任何一个派别组织都没有提出过“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

这是历史事实。对于这件事，每个愿意了解取消主义的人都应当思索一下。

在1904—1907年间没有提出“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是否妨碍过公开活动呢？绝对没有。

为什么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没有提出这种口号呢？正是因为当时反革命势力还没有如此猖獗，还没有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滚到极端的机会主义立场上去。“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是机会主义的词句，是背叛“地下组织”，这在当时是非常明显的。

诸位先生们，请仔细探究一下这个历史转变的意义吧：在1905年时代，公开活动蓬勃发展，并没有“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在反革命时代，公开活动发展得比较薄弱，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就出现了（跟着资产阶级）背弃“地下组织”和“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

难道这一转变的意义和阶级作用还不明显吗？

最后，还有第四种情况，这是最主要的情况。公开活动可能有（而且确实有）两种，有两种绝对相反的方向：一种是为拥护旧有的东西完全本着旧有的精神，为了旧有的口号和策略而进行的，另一种是为了反对旧有的东西，为了背弃它，降低它的作用和口号等等而进行的。

这两种原则上相反而不可调和的公开活动的并存，是1906年（立宪民主党人和彼舍霍诺夫先生及其伙伴）至1913年（《光线报》、《我们的曙光》杂志）这个时代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因此，

当你听到一个蠢汉（或一个暂时装作蠢汉的人）说：既然两者都是进行公开活动，试问这有什么可以争论的？这能不使人发笑吗？亲爱的，这里所要争论的恰恰是究竟应当如何来进行这个活动的问题：是保护“地下组织”和本着它的精神呢，还是降低它的作用，反对它，不本着它的精神！所争论的只是——不过“只是”！——在于：是本着自由主义的精神去进行这个公开工作，还是本着彻底民主主义的精神去进行这个公开的工作。所争论的“只是”能否局限于公开的工作：请回忆一下自由派司徒卢威先生吧，他在1902年没有局限于这个工作，而在1906—1913年间却完全“局限于”这个工作了！

我们的《光线报》上的取消派始终不能了解，所谓“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就是把用“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打扮起来的自由主义（司徒卢威主义¹⁷¹的）思想传播到工人中间去。

或者拿《光线报》编辑部自己在回答安恩时所发挥的议论（第181号）来看吧：

“……社会民主党并不限于因被实际生活所迫而不得不秘密进行工作的若干同志。如果党只是限于地下组织，那末它会有多少党员呢？两三百人吧？而在事实上担负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成千的工人——也许有成万的工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每个有脑筋的人，只要听见这段议论，就足以认定这段议论的作者是自由派了。第一，他们关于“地下组织”所说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中远不止“数百”人。第二，在世界上，党员的数目比起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工人数目来，到处都是“狭小”的。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有一百万党员，而投票拥护社会民主党的约有五百万，无产者人数约有一千五百万。党员人数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数目之间的比例，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差异来决定的。

第三，我们并没有其他一种可以代替“地下组织”的东西。这就是说，《光线报》是搬出非党工人或党外工人来反对党。这也是自由派分子所惯用的手段，他们竭力想使群众离开它的觉悟的先锋队。《光线报》不懂得党与阶级的关系，正象 1895—1901 年的“经济派”不懂得这种关系一样。第四，现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只有当它是本着旧有的精神、为着旧有口号来进行的时候，才是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

《光线报》的议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议论，他们不愿意加入实际存在的党组织，而是唆使那些散漫的觉悟不高的非党群众去反对党组织，企图借此破坏这个组织。德国的自由派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硬说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十五分之一在“党”内！

再来看看《光线报》上更常见的一种议论，说什么“我们”主张公开党，“也和欧洲一样”。自由派和取消派愿意有宪法和公开党，也和今日的“欧洲一样”；可是他们不愿意走欧洲达到今日这个地步的那条道路。

取消派分子兼崩得分子¹⁷²的科索夫斯基，在《光线报》上拿奥地利人做例来教训我们。可是他忘记了，奥地利人从 1867 年起就有了宪法，如果（1）没有 1848 年的运动，（2）没有 1859—1866 年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当时工人阶级很软弱，才使俾斯麦之流能借助于有名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而脱身出来），那也不能有这个宪法的。但是从科索夫斯基、唐恩、拉林以及一切“光线派分子”的训海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一定要用“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精神来帮助解决我们的危机！但他们的这种工作也就是斯托雷平工党¹⁴⁰的“工作”。

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到处都可以看见取消派既背弃马克思主义，又背弃民主主义。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详细考察他们认为必须削减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的议论。

六

现在我们要考察取消派是怎样削减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的。为此，最好拿他们八月代表会议¹⁷³的决议来作例子，但是，由于种种不言而喻的原因，对这些决议的分析只能拿到国外刊物上去。所以，这里只得拿《光线报》来讲一下，该报在耳·谢·的那篇论文中（第108号〔总第194号〕），对于取消主义的全部精神实质作了极确切的叙述。

耳·谢·先生写道：

“……杜马代表穆拉诺夫暂时只承认三个局部要求，即众所周知的列宁派的选举运动纲领所根据的三大要求：国家制度完全民主化，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真理报》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但我们也如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应读作：“我们也如那位硬说谢谢上帝，我国有了宪法的米留可夫一样”），认为提出局部要求是一种鼓动手段，这种手段只有当它考虑到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时，才能产生效果。只有那种一方面对于工人运动向前发展有原则意义，而另一方面又能成为群众迫切要求的東西，我们才认为可以提出来，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应集中注意的那种局部要求。《真理报》所提出的三个要求中，只有一个要求，即八小时工作制，将在工人日常斗争中发生作用，而且可能发生作用。其余两个要求在目前只能作为宣传的课题，但不能作为鼓动的课题。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可参看格·瓦·普列汉诺夫所著《消除饥荒》这本小册子中的出色的几页”（耳·谢·找错了地方：回忆

1899—1902年间普列汉诺夫与“经济派”的论战，对他是“痛苦的”，因为耳·谢·自己的这些言论，就是从经济派那里抄来的！。

“除了八小时工作制之外，结社自由、成立各种组织的自由，包括集会和言论（口头的和出版的）的自由在内，都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全部进程所提出的这种局部要求。”

你们看，这就是取消派的策略。看吧！耳·谢·用“完全民主化等等”字眼所描写的，以及他称之为“土地归农民”的要求，都不是“群众迫切要求”，都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全部进程”所提出来的要求！！这是多么陈腐的议论啊，这是每一个记得俄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历史的人，记得它同背弃民主主义任务的“经济派”进行多年斗争的人多么熟识的议论啊！《光线报》抄袭当时企图把工人引上自由主义道路的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观点，是多么有才能啊！

但我们还是仔细地分析一下《光线报》的议论吧。在头脑健全的人看来，这个议论简直是一种疯子的话。难道没有发疯的人会断定上面所说的那个“农民的”要求（就是说，有利于农民的要求）不是“群众迫切要求”吗？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全部进程所提出来的”吗？这不仅是谎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俄国十九世纪的全部历史，全部“俄国生活的进程”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使它成了迫切的和最迫切的问题，这在俄国的全部立法上都反映出来了。《光线报》怎么能说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呢？

《光线报》也不能不说出这种谎话来，因为它被自由派的政策所束缚，而自由派是当然要反对（或如《光线报》那样撇开）农民要求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的阶级地位使它不能不迎合地主，反对人民运动。

《光线报》向工人灌输了自由派地主的思想，而背叛了民主派

农民。

其次，难道只有结社自由才算“迫切”吗？那么人身不可侵犯呢？废除专横独裁制度呢？普遍等等的选举权呢？一院制呢？以及其他等等呢？凡有常识的工人，凡记得不久以前的事实的人，都深深知道所有这些都是迫切的。一切自由派分子在成千累万的文章和演说中，也承认这些都是迫切的。为什么《光线报》只承认一种——就算是最重要的一种——自由是迫切的，而把政治自由、民主制和立宪制度的根本条件都一笔勾销，搁置一旁而交到“宣传工作”的档案库中去，把它从鼓动工作中踢出去呢？

就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光线报》不接受自由派所不接受的东西。

从群众的迫切需要、工人运动的要求和俄国生活的进程看来，穆拉诺夫和《真理报》所说的三个要求（简而言之：彻底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无论工人要求，农民要求以及一般政治要求，都同样是群众迫切需要的，同样是工人运动的种种要求和“俄国生活的全部进程”所提出的。从我们那位温文尔雅的人所喜爱的“局部性”看来，所有这三个要求也是一样的：它们对最终目标说来是“局部的”，但它们对——比如说——整个“欧洲”说来则是很高的。

为什么《光线报》接受八小时工作制，而反对其余的要求呢？为什么它替工人来断定说，八小时工作制在他们的日常斗争中“发生作用”，而一般政治要求和农民要求却不发生这种作用呢？事实告诉我们：一方面，工人在日常斗争中，既提出一般政治要求，也提出农民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常常为缩短工作日这种比较不高的要求而斗争。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是《光线报》持着改良主义态度，它把自己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局限性，照例套到“群众”和“历史进程”等等头上来了。

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八小时工作制是和保存资本的权力相容的。俄国自由派为了引诱工人，自己也甘愿赞成（“在可能范围内”）这个要求。至于《光线报》不愿意“提倡”的那些要求，则是与保存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奴制时代的基础不相容的。

《光线报》所排斥于鼓动工作范围之外的，正是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东西，自由派不愿消除地主的政权，而只愿同地主瓜分政权和特权。《光线报》所排斥的正是与改良主义观点不能相容的东西。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无论穆拉诺夫，无论《真理报》以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反对局部的要求。如果说我们反对局部要求，这是废话。保险运动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反对用空谈局部要求，用改良主义来欺骗人民。我们反对现代俄国的自由派改良主义，因为它是一种空想，是一种贪图私利的虚伪的东西，它是建筑在立宪幻想的基础上的，充满着甘愿给地主当奴隶的精神的。《光线报》想用什么一般“局部要求”的词句来蒙混和掩盖的症结就在这里，虽然它自己也承认穆拉诺夫和《真理报》并不反对某些“局部要求”。

《光线报》削减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使其适合于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狭小尺度，从而把资产阶级的思想灌输到工人中间去。

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正是先进工人为了影响人民

群众，为了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而同自由派资产者们进行斗争的表现。

载于1913年4月12、26日，5月15、29、31日和6月2日《真理报》第85、95、110、122、124、126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根据1914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第二部分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5—158页

给阿·马·高尔基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怎么竟做出这种事情？这简直太糟糕了，真的！

昨天我从《言论报》¹¹⁰上读了您对拥护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叫嚣”的回答¹⁷⁴，本来感到很高兴，今天取消派¹³²的报纸来了，上面刊登了您的一段文章，这段文章在《言论报》上是没有的。

这一段文章这样说：

“至于‘寻神说’，应当把它暂时〈仅仅是暂时吗？〉搁下，这是一种无益的事情：在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没有什么可寻找。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你们那里并没有神，你们还〈还！〉没有把它创造出来。不要寻找神，要创造神；不要虚构生活，而要创造生活。”

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暂时”的！！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¹⁹代替它！！

您竟能做出这种事情，这岂不是太糟糕了吗？

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不是为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奸尸勾当（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尸勾当，即使信仰的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是创造的神，也是这样），而是要表明蓝鬼比黄鬼好，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

在那些最自由的国家里，呼吁“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是完全不适当的，——在这样的国家（美国、瑞士等等）里，人们正是特

别热心地用这种纯洁的、精神上的、创造的神的观念来麻痹人民和工人。正因为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观念，甚至任何对神的谄媚，都是无法形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是民主资产阶级毫不在乎的（在很多场合甚至是他们所欢迎的）东西，——所以是最危险的东西，是最可恶的“传染病”。群众识破千百万种罪恶、坏事、暴行和肉体的传染病，比识破精巧的、精神上的、用最漂亮的“思想”外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要容易得多，因此前者的危害性比后者小得多。强奸少女的天主教神父（我刚才偶然在一张德文报纸上读到这件事）对于“民主制”的危害，比不穿袈裟的神父，比不相信粗陋宗教的神父，比宣传建神和创神的、思想上的、民主主义的神父要小得多。因为揭露、谴责和赶走前一种神父是容易的，而赶走后一种神父就不能这样简单，揭露他们要困难一千倍，没有一个“脆弱的和可悲地动摇的”庸人会同意“谴责”他们。

您知道小市民灵魂的“脆弱性和可悲的动摇性”（俄国的灵魂，为什么说俄国的呢？意大利的就好些吗？），而您却拿最甜蜜的、用糖衣和各种彩色纸巧妙地包着的毒药来诱惑他们的灵魂！！

真的，这太糟糕了。

“代替我们这里的自我批评的自我侮辱已经够了。”

造神说难道不是最坏的一种自我侮辱吗？一切从事造神的人，甚至只是容许这种做法的人，都是以最坏的方式侮辱自己，他们所从事的不是“实际活动”，而恰巧是自我直观，自我欣赏，这种人只“直观”自“我”身上种种被造神说所神化了的最肮脏、最愚蠢、最富有奴才气的特点。

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一切造神说都正是愚蠢的小市民和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是在幻想中“自我侮辱”的、“悲观疲惫的”庸人和小资产者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您关于灵魂

的说法很正确，只是不应当说“俄国的”，而应当说小市民的，因为无论犹太的、意大利的、英国的，都是一个鬼，卑鄙的小市民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丑恶，而在思想上干奸尸勾当的“民主小市民”则加倍丑恶）。

我一边读您的文章，一边在探索，怎么能够在您那儿发生这种笔误，但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是您自己也不赞成的那篇《忏悔》的残余吗？是它的余波吗？

或者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例如您想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吗？也许是为了同“一般民主派”谈话而打算象同孩子说话那样奶声奶气吗（请原谅我的这种说法）？也许是“为了”向庸人们作“通俗的说明”，您想暂时容许他的或者他们的（庸人的）偏见吗？

但要知道，无论从哪种意义和哪个方面来说，这种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我在前面写过，在民主国家里，呼吁“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从无产阶级作家方面来说，是完全不适当的。那末，在我们俄国呢？这种呼吁也不完全适当，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庸人的偏见。对某种模糊不清的一般呼吁，我们这里甚至伊兹哥也夫也会在《俄国思想》杂志¹⁷⁵上举双手表示赞成。为什么提出这些口号呢？您倒可以把这些口号同伊兹哥也夫主义区分得很清楚，但读者不能区分。为什么给读者蒙上一层民主的薄纱，而不去明确地区分小市民（脆弱的、可悲地动摇的、疲惫的、悲观的、自我直观的、直观神的、造神的、姑息神的、自我侮辱的、糊里糊涂的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词真妙！！——等等）和无产者（他们善于做真正实际的精神奋发的人；善于把资产阶级的“科学和舆论”同自己的“科学和舆论”，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区分开来）？

为什么您做出这种事情？
真叫人难受。

您的 弗·伊·

附言：用挂号印刷品寄出的小说，收到没有？

又及：的确，您要认真地治疗一下，这样冬天就能动身而不致
得感冒（冬天感冒很危险）。

您的 弗·乌里杨诺夫

写于1913年11月中旬

从克拉科夫寄往喀普里
岛（意大利）

1924年第一次发表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5卷
第105—108页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 破坏统一的行为

现代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些麻烦的问题，尤其在经历过这一运动的昨天（即历史上刚过去的阶段）的那些人看来，更是如此。这里首先就是所谓派别活动和分裂等等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参加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用一种激愤的、神经质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口气要求不要触及这些麻烦问题。在经历过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各派长期斗争（如1900—1901年开始的斗争）的人看来，关于这些麻烦问题的许多议论，自然可能是不必要的重复。

但是，参加过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十四年（如果从出现“经济主义”最早的征候算起，已经有十八九年了）斗争的人，现在已不多了。现在补充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对于过去的斗争不是记不清楚，便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对这些麻烦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我们的杂志所进行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些似乎是初次（对于年轻一代工人来说，确实是初次）由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性工人杂志”——《斗争》杂志¹⁷⁶提出来的问题谈一下。

一、论“派别性”

托洛茨基称自己的新杂志为“非派别性”杂志。他在广告中把这几个字放在首要地位，他用各种调子强调这一点，在《斗争》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中强调过，在该杂志出版以前，他在取消派¹³²的《北方工人报》¹⁶⁶上发表的关于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什么叫作“非派别性”呢？

托洛茨基的“工人杂志”是托洛茨基为工人办的杂志，因为在杂志上丝毫看不出有工人的倡议，也看不出杂志同工人组织有什么联系。托洛茨基为了通俗起见，在他为工人办的杂志上，向读者解释了“领土”和“因素”等等名词。

这很好。但是为什么不把“非派别性”这个名词也向工人解释解释呢？难道这个名词比领土和因素更容易懂吗？

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想用“非派别性”的幌子来欺骗年轻一代的工人。这一点很值得加以说明。

派别活动是社会民主党在某一历史时代的主要特点。究竟是什么时代呢？就是1903年至1911年这段时期。

为了尽量清楚地说明派别活动的实质，至少必须回忆一下1906—1907年的具体条件。当时党是统一的，没有分裂，但是有派别活动，也就是说，在统一的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派别，两个事实上是独立的组织。当时基层工人组织是统一的，但是每遇到重大的问题，两个派别就制定两套策略；这两种策略的拥护者在统

一的工人组织中互相争论（例如，在1906年讨论杜马内阁或者设立宪民主党⁶内阁口号的时候，在1907年选举伦敦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最后问题按多数意见来解决；一派在统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1906年）失败了，另一个派在统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1907年）失败了。¹⁷⁷

这在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只要回忆起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就可以识破托洛茨基所散布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谎言了。

自从1912年以来，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派别活动了，在统一的组织中、在统一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的那种对策略问题的争论没有了。现在的情况是，党同取消派已经完全决裂，党在1912年1月已经正式声明：取消派不再属于党了。¹⁷⁸托洛茨基往往称这种情形为“分裂”，关于这个名词，我们到下面还要专门谈一谈。但是，“派别活动”这一名词同真实情况不符，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说法是不加批判地、不明智地、毫无意义地重复在昨天曾经是正确东西，即在过去的时代曾经是正确东西。我们听到托洛茨基说起“派别斗争的混乱状态”（见第1期第5、6页及其他许多页），立刻可以听出，他所说的到底是哪些早已过时的东西。

请用目前在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占十分之九的年轻工人的观点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形吧。他们看到现在工人运动中有三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或思潮：“真理派”¹⁵⁷（以《真理报》为中心，发行量四万份），“取消派”（一万五千份）和左派民粹派（一万份）。报纸的发行量可以向读者说明某种宣传的群众性。

试问，这与“混乱状态”有什么关系呢？托洛茨基爱讲漂亮而空洞的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混乱状态”一词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把昨天国外的关系搬到（确切些说，妄想搬到）今天俄国的土壤上来了。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中，没有任何“混乱状态”。这一点想必连托洛茨基也不敢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运动一诞生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一斗争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不同的阶级在利益和观点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如果说有“混乱状态”，那只是存在于不懂得这一点的怪人的头脑中。

还有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是“混乱状态”吗？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取消派已经被全党认为是一种思潮，并且从1908年起就受到全党的痛斥，因此决不能把反对这一思潮的斗争称为混乱状态。凡是注意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取消派甚至按其领袖和参加者的成员来说，都是同“孟什维主义”（1903—1908年）和“经济主义”（1894—1903年）有着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把自己党的历史看作“混乱状态”，那是不可原谅的无知。

可是，从巴黎或维也纳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情况，那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除了“真理派”和“取消派”之外，至少还有五个俄侨“派别”，这些单独的集团，如托洛茨基集团、《前进》派的两个集团¹⁷⁹，“布尔什维克护党派”¹⁸⁰以及“孟什维克护党派”¹⁸⁸，都想把自己算作是同一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这在巴黎或维也纳（我只是拿这两个特别大的城市作例子），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的。

在那里，托洛茨基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那里确实有派

别活动，确实是一片混乱状态！

所谓“派别活动”，就是名义上统一（在口头上大家都是在一个党内），而实际上四分五裂（在事实上各个集团都是独立的，彼此进行谈判和协商，正如主权国家一样）。

所谓“混乱状态”，就是（1）没有经得起核对的客观材料，来说明这些派别同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2）没有材料能判明这些派别的真正的思想面貌和政治面貌。拿1912年和1913年这整整的两年来说吧！大家知道，这是工人运动活跃和高涨的年代，当时任何一个稍微象样的群众性的（在政治上，只有群众性的东西才能算数）思潮或派别，都不能不在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在罢工运动中，在公开的报纸上，在工会中，在保险运动等活动中表现出来。在这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这五个国外派别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在俄国上述任何一种群众性工人运动中显示过任何作用！

这是每个人都容易核对的事实。

这一事实证明，我们说托洛茨基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代表，是完全正确的。

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口头上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这就是派别活动，这里具备了派别活动的两个重要特征：（1）名义上承认统一，（2）事实上各派各自为政。这就是派别活动的残余，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真正联系。

最后，这是最坏的一种派别活动，因为它在思想上政治上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而真理派也好（甚至坚决反对我们的尔·马尔托夫也承认，我们就一切问题所通过的众所周知的正式决议，建立了“团结和纪律”），取消派也好（他们的面貌很清楚，至少那些著名人物的面貌很清楚，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面貌，而正是自由派的

面貌),都具有这种明确的立场。

不能否认,从维也纳和巴黎的角度(决不是从俄国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的那些同托洛茨基派类似的派别组织,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有某些明确的立场的。例如,马赫主义的《前进》集团¹⁶¹拥护马赫主义理论,是明确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坚决反对这些理论,拥护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理论上谴责取消派,这也是很明确的。

而托洛茨基呢,在思想上政治上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所谓“非派别性”的专利权,不过是他在各派之间任意飞来飞去的专利权而已(关于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详细谈到)。

小结:

(1)托洛茨基不说明、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种派别之间思想分歧的历史意义,虽然在社会民主党二十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分歧,而且牵涉到当代所有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我们还要谈到);

(2)托洛茨基不了解,派别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名义上承认统一,事实上四分五裂;

(3)托洛茨基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帜,在维护一个最没有原则、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最没有基础的国外派别组织。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二、论分裂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如果说,你们真理派没有派别活动,也就是说,连事实上四分五裂情况下的名义上的统一也不承认,那你们

这样就更坏，这就是分裂主义。”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说的，他不善于思考自己所说出意思，不能自圆其说，一会儿大声疾呼反对派别活动，一会儿又高喊什么“分裂派接连获得自杀性的胜利”（第1期第6页）。

这段话只能有一种意思，就是：“真理派接连获得胜利”（这是经得起核对的客观事实，只要研究一下1912年和1913年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便可以肯定这一事实），可是我托洛茨基却要严斥真理派，因为第一、他们是分裂派，第二、他们是自杀的政治家。

我们把这一点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感谢托洛茨基，不久以前（从1912年8月至1914年2月），他还跟着费·唐恩跑，大家知道，唐恩曾经威胁和号召要“杀死”反取消派。现在托洛茨基并没有威胁说要“杀死”我们这一派（和我们的党，——请托洛茨基先生不要生气，这是实话！），而只是预言我们这一派会自己杀死自己！

这不是说得客气多了吗？这不是已经同“非派别性”言论相差无几了吗？

玩笑少开（虽然对于托洛茨基的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清谈，唯一客气的回答方法就是开开玩笑）。

所谓“自杀”，只是一句空话，只是“托洛茨基主义”而已。

分裂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政治罪名。取消派以及上述这些从巴黎和维也纳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存在的集团，都千方百计地把这个罪名加到我们头上。

但是，他们重复这种严重的政治罪名，都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请看托洛茨基吧。他承认“分裂派（请读作：真理派）接连获得自杀性的胜利”，同时又补充说：

“许许多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茫然失措状态的先进工人，往往自行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第1期第6页)

这几句话难道不是揭示了对问题最不严肃的态度吗？

目前，我们在俄国工人运动的舞台上所看到的只有取消派。你们责备我们是分裂派，那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不正确呢？是的，上面所举的那些国外的集团，无论它们彼此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它们都认为我们对取消派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分裂主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所有这些集团和取消派也有相似之处(而且是重要的政治上的相似)。

如果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在理论上原则上是不正确的，那末托洛茨基就应该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指出，他究竟认为什么地方不正确。可是，托洛茨基多年来一直回避这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在实践中，运动的经验否定了我们对取消派的态度，那也应该分析这个经验；但是，托洛茨基也没有这样做。他承认：“许许多多先进工人”“往往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请读作：真理派路线、策略、系统和组织的积极代理人)。

为什么会发生托洛茨基也承认已被经验所证实的可悲现象，为什么先进工人，而且是许许多多先进工人，都拥护《真理报》呢？

托洛茨基回答说：这是因为这些先进工人“在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

不用说，这种解释使托洛茨基，使五个国外派别和取消派都身价百倍。托洛茨基非常欢喜“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说些夸张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如果“许许多多先进工人”，都成为与托洛茨基路线不合的另一条党的政治路线的“积极的代理人”，那末，托洛茨基就立刻毫不客气地、直截了当地解答说，这些先进工人是“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茫然失措状态”，

而他托洛茨基显然是“处于”政治路线坚定、鲜明、正确的“状态”！……这位托洛茨基同时却又捶胸大骂派别活动、小组习气以及知识分子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工人的行为！……

看到这样的东西，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喊声是不是从疯人院里发出来的？

关于取消主义和谴责取消主义的问题，党在1908年就向“先进工人”提出了¹³⁴，关于同取消派这一既成的集团（即《我们的曙光》¹³¹派）“分裂”的问题，也就是不撇开这一集团、不反对这一集团就无法建设党的问题，则是在两年多以前，在1912年1月提出的。绝大多数先进工人恰恰是拥护“一月（1912年）路线”的。托洛茨基讲到“胜利”和“许许多多先进工人”，可见他本人也承认这个事实。托洛茨基只是谩骂这些先进工人是“分裂派”、“政治上茫然失措”，以此来支吾搪塞！

只要不是疯子，都会从这些事实中作出另一种结论。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哪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哪里就有党性和党。

我们看到被工人“撤职的”取消派分子，或两年来丝毫没有证明自己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有什么联系的半打国外团体，在他们那儿才真是一片茫然失措和分裂主义的景象。现在托洛茨基企图说服工人不要执行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所承认的那个“整体”的决议，就是企图破坏运动，引起分裂。

虽然这种企图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必须揭露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这些妄自尊大的领袖，他们自己在搞分裂，却又大喊反对分裂；他们两年多来在“先进工人”面前已经遭到完全失败，现在却非常蛮横无礼地侮辱这些决议，侮辱这些先进工人的意志，骂他们“政治上茫然失措”。这岂不是诺兹德烈夫⁷⁹或犹大什克·果洛夫廖

夫181的手法吗？

我们出于政论家的责任，要不厌其烦地列举确切的颠扑不破的材料，来回答这些反复的分裂叫嚣。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第二届杜马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百分之四十七，在第三届杜马代表中占百分之五十，在第四届杜马代表中占百分之六十七。

请看，这就是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所在，这就是党的所在，这就是大多数觉悟工人的统一意见和统一行动的所在。

取消派作了反驳（见《我们的曙光》第3期布尔金和尔·马·的文章），说我们是依靠斯托雷平划分选民团的制度才有了立论的根据。这是不明智的、不老实的反驳意见。德国人按照排斥妇女的俾斯麦选举法进行选举，以此来衡量他们所获得的成就。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现行的选举法来衡量他们所获得的成就，但是并不为选举法种种反动的限制辩护，因此只有疯子才会借此来斥责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地，我们根据现行的选举法来衡量我们所获的成就，也并不是为选民团或选民团制度辩护。在前后三届杜马（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杜马）选举中，都有选民团的划分，但是在同一工人选民团内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却发生了不利于取消派的根本的变动。谁不愿自欺欺人，谁就应该承认工人的统一战胜了取消派这一客观的事实。

另一种反驳意见也同样的“聪明”：说什么“孟什维克和取消派投了某某布尔什维克的票（或参加了选举）”。好极了！难道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占百分之五十三，在第三届杜马选举时占百分之五十，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占百分之三十三的非布尔什维克代表，不也是如此么？

如果可以不用杜马代表的材料，而引用工人复选代表或初

选代表等等的材料，那我们很乐意这样做。但是，这种更详细的材料并没有，“反驳者”不过是借此混淆公众的视听而已。

关于工人团体帮助各派报纸的材料怎么样呢？在两年中间（1912年和1913年），有二千八百零一个团体拥护《真理报》，七百五十个团体拥护《光线报》¹⁵⁸①。这些材料，谁都能够加以核对，而且谁也没有想否认。

试问，多数“先进工人”行动和意志的统一表现在哪里，违背多数工人意志的行为又表现在哪里？

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活动”，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

三、论八月联盟¹⁷³的瓦解

要检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关于分裂主义的责难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事实，还有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

你们认为“列宁派”就是分裂派吗？好吧，就假定你们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们是正确的，为什么其他一切派别和集团都没有证明，撇开“列宁派”和反对“分裂派”，就能同取消派团结一致？……如果我们分裂派，为什么你们联合派彼此没有联合，也没有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你们这样做，不是能真正地向工人证明统一的可能和统一的好处吗？……

我们来追溯一下往事吧。

① 按1914年4月1日的初步统计，有四千个团体拥护《真理报》（从1912年1月1日算起），有一千个团体拥护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

1912年1月，“分裂主义者”的“列宁派”声明，他们是撇开取消派和反对取消派的党。

1912年3月，所有的集团和“派别”——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前进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护党派”——都在他们的俄文报刊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¹⁸²上联合起来，反对“分裂派”。他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一唱一和、异口同声地痛骂我们，给我们起了“篡夺者”、“骗子”等等亲热好听的诨名。

先生们，好极了！你们为什么没有联合起来反对“篡夺者”，给“先进工人”作一个统一的榜样呢？如果先进工人看到你们取消派和非取消派团结一致反对篡夺者，另一方面又看到“篡夺者”、“分裂派”等等众叛亲离，他们难道会不拥护你们么？？

如果意见分歧仅仅是由“列宁派”虚构或鼓吹出来的，如果事实上取消派、普列汉诺夫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派等等有统一的可能，为什么你们两年来自己没有作出榜样来证明这一点呢？

1912年8月，召开了“联合派”代表会议。但是立刻就开始了分裂：普列汉诺夫派根本拒绝参加，前进派参加了，可是很快就退出了，并且提出抗议，揭露这种打算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取消派、拉脱维亚人、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和谢姆柯夫斯基）、高加索人、七人团¹⁸³“联合起来了”。是真的联合起来了吗？我们当时就说过，并没有真的联合，这不过是为取消主义打掩护罢了。事变是否把我们的话推翻了呢？

到了1914年2月，正好过了一年半就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1) 七人团瓦解，布利杨诺夫退出七人团。

(2) 留在新的“六人团”内的齐赫泽同土利亚科夫或另外一个人，在答复普列汉诺夫的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报纸上表示要给他答复，但是始终没有能答复。

(3) 托洛茨基事实上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在《光线报》露面了，他脱离该报办他“自己的”《斗争》杂志去了。托洛茨基称这个杂志为“非派别性”杂志，这就明显地(凡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得很明显)说明，在托洛茨基看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原来是些带有“派别性的”联合派，也就是说拙劣的联合派。

亲爱的托洛茨基，既然你是个联合派，你说可以同取消派统一，既然你和他们一起站在“1912年8月所拟订的基本观点”(《斗争》杂志第1期第6页《编辑部的话》)的立场上，那末，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上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

还在托洛茨基的杂志出版以前，《北方工人报》发表过一篇用心恶毒的评论，说该杂志的面目“还不清楚”，说关于这个杂志“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谈论得很多”，当时《真理之路报》¹⁵⁷(第37号)^①自然就揭穿了这种谎话，说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谈论”的是托洛茨基反对光线派的秘密信，说明托洛茨基的面目和他脱离八月联盟的行动已经十分“清楚”了。

(4) 曾经反对过耳·谢多夫的(因此受到费·唐恩之流当众的斥责)高加索取消派的著名领袖安恩¹⁶⁴，现在已经在《斗争》杂志上出头露面了。高加索人现在愿意同托洛茨基一道走，还是同唐恩一道走，这一点“还不清楚”。

(5) 拉脱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是“八月联盟”中唯一实在的组织，现在已经正式退出了这个联盟，并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1914年)的决议中声明：

“调和派的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会议)联合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堕落成取消派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附属品了。”

^①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1—154页。——编者注

这个采取中立立场、不愿和两个中央机关的任何一个发生联系的组织，根据一年半的经验，作了这样的声明。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中立者所通过的这项决议应当是更有分量了！

看来，够了吧？

那些给我们加上分裂主义罪名、责备我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同取消派相处的人，自己也没有同取消派相处好。八月联盟原来是一个空中楼阁，它已经土崩瓦解了。

托洛茨基在读者面前隐瞒这种瓦解情况，也就是欺骗读者。

我们的敌人的经验，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证明同取消派一起共事是不可能的。

四、一个调和派分子对“七人团”的忠告

《斗争》杂志第一期以《杜马党团的分裂》为题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文章，文章谈到一个调和派分子对拥护取消派的（或动摇到取消派方面去的）国家杜马代表七人团的忠告，忠告的主要点就是下面这句话：

“凡是必须同其他党团达成协议的时候，应该首先同六人团¹⁸⁴商量。”
（第29页）

这个明智的忠告大概就是托洛茨基同取消派-光线派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从两个杜马党团斗争一开始，从夏季会议（1913年）¹⁸⁵通过决议那时起，真理派就采取了这种立场。而且在分裂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还在报刊上屡次声明，不顾“七人团”的再次拒绝，它仍然采取这个立场。

我们在一开始，在夏季会议通过决议的时候，就认为而且现在

还认为，就杜马活动问题达成协议，是适当的，也是可能的。既然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派（劳动派¹¹²）都能屡次达成这种协议，那末，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当然更有可能、更有必要达成协议了。

不要夸大意见分歧，而要正视现实：所谓“七人团”，就是一些动摇到取消派方面去的人，他们昨天还完全跟着唐恩跑，今天却忧郁地把自己的目光从唐恩转到了托洛茨基的身上，并且来回地转来转去。所谓取消派，就是脱离党、推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合法派。他们否认“地下组织”，所以在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事务方面，根本谈不上同他们实行什么统一。谁不这样看，谁就大错特错，谁就没有估计到1908年以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但是，在个别问题上，当然可以同这个党外的或者说与党貌合神离的集团达成协议；我们对待这个集团，也应该象对待劳动派那样，应该经常地让他们在工人的（真理派的）政策和自由派的政策之间有所抉择。例如，在争取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是按自由派那样地提问题，否定或忘记不受检查的报刊；还是实行相反的工人的政策，取消派显然是动摇的。

在杜马政策的范围内不会直接涉及杜马以外的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同自由派工人代表的七人团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也是适当的。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由取消派立场转到党的夏季（1913年）会议的立场上来了。

不过不要忘记，党外的集团对于协议的理解，同党员一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非党员看来，在杜马中的“协议”，就是“制定策略决议或路线”。在党员看来，达成协议就是要吸引其他人来实行党的路线。

例如，劳动派没有政党。在他们看来，达成协议就是今天同立

宪民主党人一起，明天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自由地”“制定”路线。而我们对于同劳动派达成协议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关于一切重要策略问题都有党的决议，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这些决议；在我们看来，同劳动派达成协议，无非是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让他们相信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从而使他们不拒绝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反对黑帮，反对自由派。

党员和非党员对协议的看法的这种基本区别，竟被托洛茨基忘得干干净净（他在取消派那里毕竟没有白呆！），他下面这段议论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国际的代表必须把我们已经发生分裂的议会代表团中的两部分召集起来，并同它们一起研究它们观点一致的地方和分歧的地方……那时就能制定一个详细的策略决议案，规定议会策略的基础……”（第1期第29—30页）

真是取消派观点最明显最典型的范例！托洛茨基的杂志把党忘掉了，这样的小事情难道还值得想起它么？

在欧洲（托洛茨基是喜欢瞎谈欧洲主义的），不同的政党彼此达成协议或实行联合，通常是互派代表来开会，首先澄清分歧点（国际提出来作为俄国当前任务的正是这一点，国际并没有把考茨基认为“旧党已不存在”的轻率论断写入决议）。代表们澄清了分歧点以后，就拟出一些应提交两党的代表大会分别加以讨论的有关策略和组织等问题的决议（决议、条件等等）。如果能拟出一致赞成的决议草案，那就由两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采纳；如果拟定出来的是两种不同的提案，那末，两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进行同样的彻底的讨论。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觉得“可爱的”，仅仅是欧洲机会主义的榜样，而决不是欧洲党性的榜样。

杜马代表将制定“详细的策略决议案”！俄国“先进工人”（托

洛茨基对他们非常不满意，是不无原因的)从这个例子能够清楚地看出，在维也纳和巴黎的那些国外的小集团，玩弄可笑的异想天开的把戏，已经达到了什么地步，它们甚至要考茨基相信在俄国“党已不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外国人有时也许能受他们的骗，但是，俄国“先进工人”(不怕是否又会引起威严的托洛茨基的不满)却要当面耻笑这班异想天开的家伙。

工人会对他们说：“我们的详细的策略决议案是由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来制定的，例如1907年、1908年、1910年、1912年和1913年的历次会议那样（不知道你们党外的人怎么样）。我们很愿意向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和健忘的俄国人介绍我们党的决议，我们更愿意请‘七人团’、‘八月联盟派’或‘左派’¹⁸⁶的代表或是其他任何人，把他们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决议向我们介绍一下，并且请他们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能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他们对于我们的决议或对于保持中立的拉脱维亚人1914年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这就是俄国“先进工人”要对各种异想天开的人说的话，这就是彼得堡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刊物上说过的话。托洛茨基想不理睬在报刊上对取消派提出的这些条件吗？那对托洛茨基就更糟了。我们的责任是要预先告诉读者：不愿考虑俄国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提出异想天开的“联合”（是仿照八月“联合”么？）计划，是多么可笑啊！

五、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观点

托洛茨基在他的新杂志上，极力不谈自己观点的实质。《真理

之路报》(第 37 号)已经指出,关于秘密组织、关于争取公开党的口号等问题,托洛茨基一句话也没有提到。^①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他这种企图成立独立的组织,而又不说明任何思想政治面貌的行为,是最坏的派别活动。

托洛茨基虽然不愿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他的杂志上有许多地方已经表明他所偷运、所隐瞒的究竟是些什么思想。

在第一期第一篇编辑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革命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第 5 页)

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主义和取消主义的论调,事实上是一种否定党的导言。这种论调是以歪曲历史事实为基础的。1895—1896 年的罢工,已经形成了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这些罢工,这些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鼓动是“知识分子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的吗!!?

请看,1901—1903 年有关国事罪的确切材料和前一时期同类材料的比较。

在每一百个参加解放运动(犯国事罪)的人中间,各种从业人员所占的比例:

时 期	农业从业人员	工商业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者和学生	无固定职业者和无职业者
1884—1890 年	7.1	15.1	53.3	19.9
1901—1903 年	9.0	46.1	28.7	8.0

由此可见,在八十年代,俄国还没有社会民主党,运动还是“民粹主义的”运动,那时知识分子居于主要地位,占运动参加者的一大半。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151—154 页。——编者注

在1901—1903年这段时期，已经有了社会民主党，旧《火星报》⁸⁵已经进行工作，情形就完全改观了。知识分子只占运动参加者的少数，工人（“工商业从业人员”）已经比知识分子多得多，工人和农民一起占总数一半以上。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思潮的斗争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翼，开始是“经济主义”（1895—1903年），接着是“孟什维主义”（1903—1908年）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托洛茨基重复取消派对党的诬蔑，害怕提起党内各种思潮二十年来的斗争历史。

请看另一个例子：

“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议会制度的态度，也经过了三个阶段……（正如其他各国一样）……起初是‘抵制主义’……然后是原则上承认参加议会的策略，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用谢德林的话来说，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为了纯粹鼓动的目的……最后把当前的要求……搬上杜马的讲台……”（第1期第34页）

这又是用取消派的态度歪曲历史。这里虚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差别，是为了暗中替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辩护。抵制主义无论在欧洲或俄国，都不是“社会民主党对议会制度的态度”的一个阶段。在欧洲，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只是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譬如对布里根杜马¹²²的抵制，只是为了对付特定的机关，同“议会制度”从来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措施是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为了继续进行袭击所作的特殊斗争产生的。至于这个斗争如何反映到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两种思潮的斗争上，托洛茨基却根本没有提到！

既然谈到历史，就应该说明各种具体问题，说明各种思潮的阶级根源；谁愿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阶级斗争，研究各个派别在参加布里根杜马这一问题上所发生的斗争，谁就会看出自由派

工人政策的根源。但是托洛茨基“提到”历史，只是为了规避具体问题，而杜撰一些替现代机会主义者辩护的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东西！

托洛茨基写道：“……事实上，所有的派别都在采用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高喊我们工人运动中有自由主义的危险，就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现实进行粗暴的讽刺。”（第1期第5页和第35页）

这就是公然地替取消派辩护，而且火气很大。但是，我们还是举出一件比较新鲜的小小的事实。托洛茨基专爱说空话，我们希望工人自己来考虑这一事实。

这件事就是3月13日《北方工人报》所载的言论：

“人们不去强调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一定的具体任务，即迫使杜马否决法案（关于出版的法案）的任务，却提出一个模糊的公式，要争取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同时鼓吹秘密刊物，其实这种鼓吹只能削弱工人争取自己的公开报刊的斗争。”

这是白纸上写黑字，明确地拥护取消派的政策，批评真理派的政策。怎么样？难道一个有见识的人能说两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吗？难道一个有见识的人能说取消派在这里不是实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吗？能说工人运动中的这种自由主义危险是臆造出来的吗？

托洛茨基所以回避事实和具体的论据，正是因为这些事实和论据无情地推翻了他那些气愤的叫嚣和夸张的词句。装腔作势，说什么“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现实进行粗暴的讽刺”，当然是很容易的。再添上一些更刺激更夸张的字眼，说什么必须“从保守的派别活动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不难做到的。

可是，这不是太没有价值了么？这种武器不正是托洛茨基当初在中学生面前大出风头的时候所惯用的吗？

但是，托洛茨基所憎恨的“先进工人”，还是希望得到一个直截

了当的明白的答复：上面对于具体政治运动的估计已经明确地反映了一种“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你对于这种方法是否赞成？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如果赞成，那就是实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党；如果认为可以同这种政策，同推行这种政策的集团讲“和平”，讲“统一”，那就是自欺欺人。

不赞成吗？——那就请你直截了当地说吧。可是，在今天的工人看来，讲空话已经不足为奇了，讲空话满足不了他们，也吓唬不了他们。

顺便说一句：取消派在上面这段话中所鼓吹的政策，甚至从自由派观点看来也很愚蠢，因为在杜马中能否通过法律，要取决于那些已经在委员会摊牌的卜尼格先之类的“十月党人¹²⁵-地方自治局人士”。

* * *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在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年），给这种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

我们考察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一定的思潮是在许多年来生长起来的，它同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定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

“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

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¹⁸⁷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

这种典型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在过去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别、集团、派别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谈论同他人联合的“强国”。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愿理睬党从1908年起就确定和规定的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决议，根本不愿考虑事实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

载于1914年5月《启蒙》

杂志第5期

署名：弗·伊林

按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0卷
第325—347页

论民族自决权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第九条，近来引起了（我们在《启蒙》杂志¹⁵⁵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①）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¹³²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上，崩得分子¹⁷²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¹⁸⁸，无疑是同现在一般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也要给予最多的注意。

1. 什么是民族自决？

要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所谓自决，首先自然就要提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了解自决？是从法权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

①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5页。——编者注

的法律定义中去寻找答案呢，还是从对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研究中去寻找答案？

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借嘲笑马克思主义纲领“不清楚”来敷衍了事，这是毫不奇怪的，同时大概由于头脑简单，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民族自决问题不仅在1903年通过的俄国党纲中谈到了，而且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也谈到了（我将要在适当的地方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是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罗莎·卢森堡曾多次宣布说这一条似乎太抽象，太形而上学，而她自己正是犯了这种抽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正是罗莎·卢森堡经常陷入泛论民族自决问题（甚至非常可笑地空谈怎样去认识民族意志的问题），而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事情的本质究竟是在于法律的定义，还是在于全世界民族运动的经验？

确切地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立刻就会把罗莎·卢森堡的论据驳倒十分之九。民族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

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着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关于为什么只能把自决权了解为国家分离权，而不能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的其他理由，我们下面再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罗莎·卢森堡如何企图“避开”成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这一必然的结论。

考茨基的小册子《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新时代》²⁴ 1907—1908年卷第1期附刊，俄译文载于1908年里加出版的《科学思想》杂志)，罗莎·卢森堡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她知道，考茨基在那本小册子的第四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的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低估了趋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力量”(见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条件(即不同于中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等条件的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最容易实现其任务(即能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就是他认为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某些原因，始终是内部结构不合常态或不够发展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合常态，是指不适合于那些最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言的。

现在我们要问：罗莎·卢森堡对考茨基的这些历史经济的结

论，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些结论正确不正确呢？是考茨基所提出的历史经济理论正确，还是鲍威尔所提出的那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理论正确？鲍威尔的明显的“民族机会主义”立场，他的拥护民族文化自治¹⁸⁹的观点，他对民族主义的迷恋（如考茨基所说“有些地方强调民族成分”），他“过分夸大民族成分而完全忘记国际成分的态度”（考茨基），究竟同他低估趋向建立民族国家力量的态度有什么联系呢？

罗莎·卢森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看出这种联系。她没有仔细地考虑鲍威尔的理论观点的整体。她甚至完全没有把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同心理学理论加以对比。她只是用下面的意见来反对考茨基。

“……这个‘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容易受到理论上的发挥和理论上的拥护，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社会民主党评论》1901908年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弱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取得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多少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

看了这些议论，不能不对作者不通事理的本领表示惊奇！用庄严的神情教训考茨基，说什么小国在经济上依赖大国，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用强盗手段征服异族而互相斗争，说什么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仍然存在，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的卖弄聪明的行为，因

为所有这些都和问题毫不相干。不仅小国，而且象俄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富强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蕞尔小国，就连十九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说过了。¹⁹¹ 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是这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问题，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象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不是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況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亚洲的实例是拥护考茨基而反对罗莎·卢森堡的。

巴尔干各国的实例也是反对她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巴

巴尔干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正在随着在这个半岛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形成起来。

所以，无论是全体先进文明人类的实例也好，巴尔干的实例也好，亚洲的实例也好，都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相反，而证明考茨基的论点绝对正确：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至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看来，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支持“民族国家”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下面将要详细地谈到。现在，我们只是阐明一下“自决”这一概念的定义，不过还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倒还知道这个概念（“民族国家”）的内容，而拥护她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如李普曼、谢姆柯夫斯基、尤尔凯维奇之流，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2. 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来,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并且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议机关等等方式,这样那样地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吸引到政治生活中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斗争争取的是一般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一个居民阶层——农民投入了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贸易周转的各个民族更加接近,彼此杂居,而把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资本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了起来;同时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正是在这里,我们也就遇到了罗莎·卢森堡的议论中最软弱的地方。她拼命用一套反对我们纲领第九条的“厉害”字眼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说它“笼统”“死板”,是“形而上学的空谈”等等。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就是反辩证法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

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历史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一定的时代——二十世纪初期和一个一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民族问题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俄国究竟摆在什么地位，俄国在这方面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在她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人们告诉我们说：巴尔干的民族问题跟爱尔兰的不同；马克思在1848年的具体条件下怎样估计过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整页都是引证马克思的话）；恩格斯怎样估计过瑞士各森林州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以及1315年的莫尔加顿的战役（整页都是摘引恩格斯的话和考茨基所加的有关评注）；拉萨尔认为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等等。

当然不能说这些意见和引证有什么新奇之处，但不管怎么样，读者感兴趣的是再一次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态度分析各国具体的历史问题。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已经陷入何等可笑的境地。她雄辩地义愤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丝毫没有打算确定一下，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表明别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像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入地狱，人们用好心的忠告掩饰自己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实际上利用这些忠告。

请看一个大有教益的对照。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

口号时，引证了她在 1898 年所写的一篇证明“波兰工业发展”迅速并且向俄国推销工厂产品的著作。不用说，从这里丝毫也不能得出什么有关自决权问题的结论，只不过证明旧的贵族波兰已经消灭等等罢了。但罗莎·卢森堡总是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种结论，就是在那些促使俄国同波兰结合的因素中，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纯粹经济因素现在已经占了优势。

可是，我们的罗莎一谈到自治问题时，就来证明波兰王国有特别的权利要求自治（见《启蒙》杂志 1913 年第 12 期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①），虽然她的文章的标题是一般《民族问题和自治》。为了证实波兰有权要求自治，罗莎·卢森堡就认为俄国的国家制度——显然是按其经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方面的标志来说——是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种种特征的总和（《社会民主党评论》第 12 期第 137 页）。

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末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资本主义以前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末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也就愈大，因为连结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可见，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关于俄国政权的社会结构对于资产阶级波兰的关系问题上，也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而关于俄国民族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28—35 页。——编者注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一下。

3. 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 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

“……虽然‘民族自决权’原则有伸缩性，纯粹是老生常谈，显然不但适用于俄国的各个民族，而且同样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的各个民族，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党的纲领内，都找不到这个原则……”（《社会民主党评论》第6期第483页）

罗莎·卢森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纲领第九条时就是这样写的。她把纲领中这一条文误认为“纯粹是老生常谈”的见解强加在我们头上，而她自己恰巧是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宣称这个条文“显然同样适用于”俄德等等国家。

我们的回答是：罗莎·卢森堡显然下决心要使自己的文章成为供中学生做习题用的逻辑错误大全，因为她的议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对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的嘲笑。

如果不是用小孩子的方法，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那就不难看出，这个纲领是有关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既然如此（而且无疑是如此），那末，这个纲领“显然”对于一切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场合都是“笼统的”，都是“老生常谈”等等。罗莎·卢森堡只要稍加思索一下，也显然会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纲领仅仅是指这种民族运动实际存在的场合来说的。

罗莎·卢森堡只要把这些明显的理由思索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知道，她说的话是多么荒谬。她责难我们提出的是“老生常谈”，

她反对我们的论据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国家的纲领里没有民族自决的条文。好一个聪明绝顶的论据啊！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个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它们的发展规律无疑是共同的。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拿来作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以互相比较。例如，只有十分无知的人，才会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拿去同西欧的土地纲领“作比较”（如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俄国思想》¹⁷⁵上所作的那样），因为我们的纲领所回答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改革问题，而西欧各国根本谈不到这样的改革。

民族问题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早已解决了。在西欧各国的纲领里寻找对不存在的问题的答复，这是可笑的。这里罗莎·卢森堡恰恰忽视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全部关键就在于这种区别。由于罗莎·卢森堡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她那篇宏论也就成了一套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了。

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约是从1789年起，到1871年止。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而且通常是些单一民族的国家体系。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

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

我们不妨把上述罗莎·卢森堡论文中的言论再引证几句：

她写道：“……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有首要作用的那个党的纲领里，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里，并没有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上）

总之，有人想拿“特别是”奥地利的例子来说服读者。那就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看这个例子合理的东西多不多。

第一、我们要提出关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基本问题。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848年开始，1867年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那里整个说来始终是由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宪制统治着，而合法的工人政党也就是根据这个宪制公开进行活动。

因此，在奥地利内部发展的条件下（即从奥地利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奥地利各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产生飞跃的因素，而伴随这种飞跃的现象之一，可能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罗莎·卢森堡经过比较之后，以为俄国在这一点上是处在同样的条件下，于是她不仅作了一个根本错误的反历史的假定，而且不由自主地滚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

第二、奥地利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俄国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这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奥地利不仅是一个长期德意志人占优势的国家，而且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还曾经怀有想做整个德意志民族霸主的野心。也许罗莎·卢森堡

(她似乎是很不喜欢老生常谈和死板的、抽象的东西……)愿意记起这事实吧,这种“野心”已经被 1866 年的战争粉碎了。在奥地利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德意志人竟留在 1871 年最终建成的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外面了。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尝试,早在 1849 年就被俄国农奴制的军队打破了。

于是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恰恰不是趋向于脱离奥地利,而是趋向于保持奥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持民族独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破坏掉!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奥地利便形成两个中心的(二元的)国家,而现在又变成三个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国家。

俄国同这种情形有哪点相似的地方呢?我们这里的“异族人”是否因为怕受到更坏的民族压迫而情愿同大俄罗斯人合并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看出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拿俄国同奥地利来比较,是多么荒谬、多么死板、多么愚昧了。

在民族问题上,俄国所具有的特殊条件恰恰同我们在奥地利看到的相反。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着巨大的整块地区,人口约有七千万。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他们就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最后,正是在邻近的亚洲各国我们看到了

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并且部分地蔓延到住在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中去了。

由此可见，正是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才使我们在目前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

况且，就是从纯粹的事实方面来看，罗莎·卢森堡断定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上没有承认民族自决权，也是不对的。只要打开通过民族纲领的布隆代表大会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卢西人社会民主党人甘凯维奇代表整个乌克兰（卢西人）代表团（记录第85页），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烈格尔代表整个波兰代表团（记录第108页）提出声明说，上述两个民族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把他们的本民族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愿望，列在自己的要求之内了。可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接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但是它同时又完全容许党的各个部分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事实上这当然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因此，罗莎·卢森堡把奥地利拿来作论据，但在各方面却反对了罗莎·卢森堡自己。

4. 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机会主义者特别喜欢抓住罗莎·卢森堡的这样一个论据：我们纲领第九条里没有包含一点“实际的东西”。罗莎·卢森堡自己也非常欣赏这个论据，我们在她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有时在一页之内一连把这个“口号”重复八次。

她写道，第九条“对于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指示，对于民族问题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

她的这个论据还这样表述过：第九条不是毫无所指，就是责成大家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个论据。

在民族问题上要求“实际精神”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对每个民族分离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具体回答；或者使民族要求一般能够直接“实现”。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要求“实际精神”的这三种可能的含义。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获得民族间的和平(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获得平等权利，获得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

把无产阶级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以所谓消极的要求，即以承认自决权为限，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是最能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只是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受到什么损害）。

资产阶级最关心这种要求的“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让机会主义者去说这不“实际”吧，但这是唯一实际的保证，是反对封建主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和平的保证。

从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上所提出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罗莎·卢森堡不懂得这一点，糊里糊涂地赞美实际主义，这恰巧是为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为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机会主义让步大开方便之门。

为什么是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在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民族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和压迫民族中的表现自然是各不相同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精神”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赞成民族分离权，就是赞成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样说的有罗莎·卢森堡，附和她的有机社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顺便说一下，他是在取消派报纸上就这个问题鼓吹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

我们的回答是：不，在这里，正是资产阶级需要“实际的”解决，而工人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划清两种趋势。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考茨基早就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罗莎·卢森堡，而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罗莎·卢森堡因害怕“帮助”波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上规定分离权，事实上就是帮助了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她在事实上就是帮助对大俄罗斯人享受特权（并且是比特权更坏的东西）采取机会主义调和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因而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东西，恰恰是资产阶级成分少而封建成分多的东西，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

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企图使自己民族具有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

这在资产者和市侩们看来是“不实际的”。但这是民族问题上唯一实际的，真正有助于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原则政策。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要用取消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的观点，来估计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

让我们看看压迫民族的地位。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①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长期的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关于这种镇压的系统的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民族的资产阶级容忍这种偏见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民族的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不断地进行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能担保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① 巴黎有一位名叫耳·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名词。这位耳·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这个字在讽刺的意思上可译为“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耳·弗拉·大概打算写一篇研究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铲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论文。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预先不得而知的千百种因素为转移。我们并不想凭空“猜测”，只是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特权。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突变中，在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问题上发生冲突和斗争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我们无产者预先就宣布我们反对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并且依照这个方向来进行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

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的和民族的特权，拥护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的任务；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让大俄罗斯民族的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前者和后者都要求肯定地回答是或否，他们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不明确”）都认为这种宣传“不实际”吧。其实，正是这种宣传，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障俄国在它仍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可能奠定各民族间的和平，而在产生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的问题时，又能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损害地）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民族问题上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现在研究一下大俄罗斯自由派对“民族自决”的态度和挪威从瑞

典分离出去的实例。

5. 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我们知道，罗莎·卢森堡当作一张主要“王牌”用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论据，就是承认自决权等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罗莎·卢森堡说，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权利了解为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那末在纲领上就不需要有特别的一条，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根本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的。

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不容争辩地指出过的那样，第一个论据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嫁祸于人，因为罗莎·卢森堡自己因害怕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在事实上作了大俄罗斯人黑帮民族主义的帮凶！第二个论据实质上是胆怯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认分离权？如果包括，那就是说，罗莎·卢森堡承认我们党纲第九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不包括，那就是说她不承认民族平等。在这里回避问题和支吾搪塞，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罗莎·卢森堡没有这样做，因而恰恰是犯了她在费尽心机地企图归罪于她的论敌的那种形而上学、抽象、老生常谈、笼统等等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即俄国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应不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各统治阶级的立场呢？

“官僚”（怨我们用了这个不确切的字眼）和贵族联合会¹⁹²之类的封建地主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民族平等和自决权，都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口号是从农奴制度时代拿来的旧口号——专制、正教、民族，他们所谓的民族只是指的大俄罗斯民族。甚至乌克兰人也被宣布为“异族人”，甚至他们的民族语言也要受到压制。

我们来看看“被召来”参加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吧，固然它在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很有限，但总算是参加了政权，参加了“六三”立法和行政体制¹²⁴。十月党人¹²⁵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跟着右派走的，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可惜，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俄罗斯自由资产阶级、进步党人¹⁶⁷和立宪民主党人⁶的立场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谁不研究这个立场，不考察这个立场，那他在讨论民族自决权时就必然会犯抽象和武断的错误。

去年《真理报》¹⁵⁷同《言论报》¹¹⁰进行了论战，这个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虽然非常巧于玩弄外交手腕而逃避直接回答“不愉快的”问题，但是它终于被迫作了一些宝贵的自供。这场争论是1913年夏天在里沃夫召集的全乌克兰学生代表大会引起的。闻名的“乌克兰问题专家”或者说《言论报》乌克兰问题撰稿人莫吉梁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最厉害的骂人字眼（“梦呓”、“冒险主义”等等）攻击乌克兰实行分立（分离）的思想，攻击民族社会党人董措夫所拥护而为上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这个思想。

《工人真理报》¹⁵⁷丝毫也不同意董措夫先生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个民族社会党人，说许多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

意他的看法，但是同时又声明说，《言论报》的论调，或者更确切地说，《言论报》对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对一个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或愿意做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应有、完全不容许的^①。让《言论报》去直接反驳董措夫之流的先生们吧，但是一个以民主派自命的大俄罗斯机关报竟忘记分离自由和分离权，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

过了几个月，莫吉梁斯基先生在里沃夫出版的乌克兰文报纸《道路报》¹⁹³上读到了董措夫先生的反驳意见，其中顺便指出了“《言论报》上的沙文主义攻击，只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受到了应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于是莫吉梁斯基先生便在《言论报》第三三一号上发表了一篇“解释”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的“解释”就是一连三次重复说：“批评董措夫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

莫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呵！〉；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

于是，《无产阶级真理报》¹⁵⁷（1913年12月11日第4号）便向莫吉梁斯基先生和立宪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②。

当时《言论报》（第340号）就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内容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1）在立宪民主党纲领第十一条上，直接地和明确地谈到了

① 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0—26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26—528页。——编者注

民族“自由文化自决权”。

(2)《言论报》断言,《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问题同分立主义,即同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彻底混淆了”。

(3)“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见1913年12月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上所载《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①)

我们先来看看《言论报》声明中的第二点。它向谢姆柯夫斯基之流、李普曼之流、尤尔凯维奇之流及其他机会主义者先生们明显地指出,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一词“不清楚”或“不明确”,实际上,即根据俄国各阶级相互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形来看,不过是重复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言论而已!

当时《无产阶级真理报》向《言论报》的那些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他们是不是否认在全部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了解为政治自决,即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呢?(2)他们是不是否认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也包含这种意思呢?(3)他们是不是否认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谈到民族自决问题时,就把民族自决了解为政治自决呢?——当《无产阶级真理报》提出这三个问题时,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便哑口无言了!!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无言可答。他们不得不默然承认《无产阶级真理报》绝对正确。

自由派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这个概念不清楚,说社会民主党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彻底混淆了”等等,这不过是力图扰乱问题,

^①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1—43页。——编者注

不愿承认民主派共同确定了的原则而已。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如果不是这样愚昧无知，就会羞于用自由派口吻来向工人说话了。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无产阶级真理报》迫使《言论报》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纲领上所谈的“文化”自决，就是否认政治自决。

“立宪民主党的确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言论报》所说的这些话当作我国立宪民主党的“忠顺”的模范，介绍给《新时报》和《庶民报》¹⁹⁴看，是不无原因的。《新时报》在第一三五六三号上，当然没有放过机会来骂骂“犹太鬼子”，并且向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说了各种挖苦话，但是同时又声言说：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已成为英明的政治定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意见分歧了”。

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学过历史，清楚地知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实行这种‘只捉不放’¹⁹⁵的天赋权利，往往引起怎样的——说得婉转些——‘蹂躏式的’行动。”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清楚地知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站到拥护这个阶级所造成的关系和国界的立场上去。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或确定的关系和国界中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如果听起来不象是诬蔑日本人和中国人的

话，那我们就要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这也就是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向他们卑躬屈节，唯恐动摇他们的地位，保卫他们不受人民运动的攻击，不受民主运动的攻击。《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实际上这是迎合了农奴主的利益，迎合了统治民族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熟悉历史，并且以民主主义者自居，他们甚至不敢肯定说，现在已经成为东欧和亚洲一般特征的民主运动，力求按各文明资本主义国家模型改造东欧和亚洲的民主运动，一定要绝对保存封建时代，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具有无限权力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毫无权利的时代所决定的国界。

《无产阶级真理报》同《言论报》的争论所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字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当前的真正政治事件的问题，这也是由1914年3月23—25日举行的最近那次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证明了的。我们从《言论报》(1914年3月26日第83号)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报道中可以看到：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基辅的代表(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两人也赞同他们的意见)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费·费·科科什金指出，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相合)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很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这个极其精彩的议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¹⁹⁶显然是非常熟悉内幕并且肯定能正确地转达科科什金先生的意见

的，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警告论敌）。

《言论报》的正式报道是用圆滑的外交笔调写成的，为的是尽可能少打开幕布，多隐藏内情。但是从这个报道中大体上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经过情形。熟悉乌克兰情况的自由资产者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正是民族政治自决的问题。不然，科科什金先生就用不着号召“小心对待”这一“公式”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纲领（参加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当然知道这个纲领）上所写的，恰巧不是政治自决，而是“文化”自决。可见，科科什金先生是捍卫这个纲领而反对乌克兰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是捍卫“文化”自决而反对“政治”自决的。非常明显，科科什金先生表示反对“政治”自决，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把“政治自决”公式称为“有伸缩性的”（与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完全合拍！），也就是捍卫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而反对立宪民主党内比较“左倾”或比较民主的分子，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

科科什金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获得胜利了，这从《言论报》的报道里露了马脚的“可是”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大俄罗斯民族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党人中获得胜利了。难道这种胜利还不能促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些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害怕“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的糊涂虫醒悟过来吗？

“可是”我们现在来实际地看看科科什金先生的思维进程吧。科科什金先生引用“过去的政治经验”（显然是指1905年的经验，当时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权，而以它自己的恐惧心理来恫吓立宪民主党）而指出“国家瓦解”危险时，就表明他清楚地知道政治自决除了实现分离权和组织独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思。试问，从一般民主主义观点特别是从无产

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科什金先生的这种忧虑呢？

科科什金先生硬要我们相信承认分离权就会增加“国家瓦解”的危险。这是遵循“只捉不放”这一格言的警察梅穆列佐夫的观点。而从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

科科什金先生的议论和民族主义者一脉相承。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猛烈攻击了乌克兰的“马泽帕分子”。萨温科先生及其伙伴大叫大嚷，说乌克兰运动有减弱乌克兰同俄国联系的危险，因为奥地利正利用亲乌政策来巩固乌克兰人同奥地利的联系！！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不能用萨温科之流的先生们归罪于奥地利的那种方法，即让乌克兰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实行自治和成立自治议会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试图“巩固”乌克兰人同俄国的联系呢？

萨温科之流的先生们的议论和科科什金之流的先生们的议论完全相同，而且从纯粹逻辑方面来看，又是同样可笑、同样荒谬的。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坚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能不能有什么比分离自由，比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呢？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被自由派（以及那些因为头脑简单而附和他们的人）弄糊涂了的问题，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离婚问题来说吧。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论文中写道，中央集权制的民主国家虽然完全可以容许个别部分实行自治，但是它应当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其中包括关于离婚问题的立法工作，划归

中央议会处理。这样关心用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来保障离婚自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动派反对离婚自由，号召大家“小心对待”它，而且大喊大叫，说离婚自由就是“家庭瓦解”。而民主派认为，反动派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警察和官僚的专横，维护男性享受特权而女性遭受最痛苦的压迫；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解”，而相反地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坚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责备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立主义，正象责备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支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管理手段，损害民主手段。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所产生的政客习气，有时也使议员或政论家极端轻率地，甚至简直荒谬可笑地空谈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可是，只有反动派才能被这种空谈所吓倒（或者他们假装被这种空谈所吓倒）。凡是拥护民主制观点，即主张由居民群众解决国家问题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政客的荒唐空谈和群众的解决问题之间是“相隔十万八千里”¹⁹⁷的。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清楚地知道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阶级斗争自由的利益恰恰是要求分离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什金先生的议论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议论也含有某种逻辑，即

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科科什金先生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拥护资产阶级的一般特权，特别是它的国家特权；他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携手一起拥护这些特权，不过普利什凯维奇更相信农奴制的棍子，而科科什金之流知道这根棍子已被1905年的事变大大折损了，所以更多地指望使用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的手段，例如用“国家瓦解”的怪影来恫吓小市民和农民，用“人民自由”同历史基础相结合的词句来欺骗他们等等。

自由派敌视民族政治自决原则的实际阶级意义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就是捍卫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即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小资产者尤尔凯维奇等，正是在目前，在六三政制时代极力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实际上只是跟着民族自由主义跑，而用民族自由主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达到完全的团结和最紧密的统一，要求反对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离开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优先剥削他们的人，不管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比异族资产阶级占优势，还是波兰资产阶级比犹太资产阶级占优势，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无论是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无论是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应许说他们一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分离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在前进着，并且会继

续前进。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总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实际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拿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具体例子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6. 挪威从瑞典的分离

罗莎·卢森堡正是引用了这个例子，并且根据这个例子推论说：

“联邦关系史上最近的一次事变，即挪威和瑞典分离这一事变发生时，波兰社会爱国派报刊（见克拉科夫的《前进报》198）马上就把它抓住了，并且把它看作国家分离趋向具有力量和进步性的一种可喜现象，但这次事变立刻鲜明地证明，联邦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挪威发生了这次撤换和赶走瑞典国王的所谓‘革命’之后，挪威人用人民投票的办法正式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草案，安然地选出了另一个国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运动和任何一种独立的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革命’，原来只是表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具有分立主义，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来代替瑞典贵族所强加于他们的国王，因而这种运动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时，这次瑞典和挪威君合国破裂的事实又一次证明，迄今存在的联邦制，就在这里也不过是纯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就是君主政体和反动统治的一种

形式。”(《社会民主党评论》)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一切!! 应当承认, 罗莎·卢森堡立场的脆弱在解释这个例子时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

过去和现在的问题, 都是在民族复杂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没有必要制定承认自决权或分离权的纲领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所举的挪威的例子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我们的作者转弯抹角, 绕来绕去, 故作聪明, 大叫大喊反对《前进报》, 但是不回答问题!! 罗莎·卢森堡什么都说到了, 就是对问题的实质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 挪威的小资产者既然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本族的国王, 并且用人民投票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草案, 也就暴露了小市民的最恶劣的品质。毫无疑问, 《前进报》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 那它也就暴露了同小市民一样的恶劣品质。

但是所有这些究竟同问题有何相干呢??

要知道, 这里所谈的问题是关于民族自决权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待这种权利的态度呵! 为什么罗莎·卢森堡不回答问题, 而只是兜圈子呢?

俗语说, 猫是老鼠心目中最凶的野兽³⁷。看来, “弗腊克派”¹⁸⁶也是罗莎·卢森堡心目中最凶的野兽了。“弗腊克派”是“波兰社会党”的俗称, 即所谓革命派别, 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是赞同这个“派别”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堡因为努力同这个“派别”的民族主义立场作斗争, 竟弄得头昏眼花, 以致除了《前进报》之外, 什么都看不见了。

如果《前进报》说个“是”, 那末罗莎·卢森堡认为她的神圣义

务就是要马上说个“不是”，殊不知她运用这种手段，并不是表明她对《前进报》没有依赖，相反地恰恰表明她对“弗腊克派”依赖到可笑的地步，表明她不善于用一种比克拉科夫这个地方的鼠目寸光的人稍微深刻、稍微广阔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前进报》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报纸，而且根本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但是我们既然举了挪威的例子，那就不应当妨碍我们分析这个例子的实质。

为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个例子，我们不需要说明那些极可怕的“弗腊克派”的恶劣品质，而首先要说明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具体历史特点，其次要说明两国无产阶级在发生这个分离时所担负的任务。

使挪威同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经济和语言上的联系，其密切程度并不亚于许多非大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同大俄罗斯民族的联系。但是挪威同瑞典的联合不是自愿的，所以罗莎·卢森堡谈论“联邦制”实在毫无道理，只是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罢了。挪威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由各国君主违背挪威人的意志送给瑞典的，而瑞典人为了征服挪威，曾不得不把军队调到挪威去。

此后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虽然挪威享有非常广泛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议会等等），但是挪威同瑞典经常发生摩擦，挪威人极力设法摆脱瑞典贵族的束缚。1905年8月，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种束缚；挪威议会通过决议，不再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后来挪威人举行了全民投票，全民公决，以绝对多数的票数（约二十万票与几百票之比）赞成完全从瑞典分离出去。瑞典人经过一些犹豫之后，只得容忍了分离的事实。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下，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才可能发生民族分离并且实现这种分离，以及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的情况下，这种分离有时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不敢说政治自由和民主制问题同他无关（他要是这样说自然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就不能否认，这个例子在实际上证明觉悟的工人必须不断地进行宣传 and 准备工作，使那些因民族分离问题而可能引起的冲突，只能按照解决 1905 年挪威同瑞典之间冲突的那种解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按照俄国方式”去解决。这也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纲领要求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罗莎·卢森堡只好用猛烈攻击挪威小市民们的市俗习气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的方法来推开这个不利于她的理论的事实，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历史事实把她所发表的民族自决权是一种“空想”、等于“用金碗吃饭”的权利等等言论，取得**体无完肤**了。这种言论只是表现了相信东欧各民族间现有力量对比永远不会改变的那种贫乏而自满的机会主义思想而已。

我们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首先注意和最注意的是各民族内部的无产阶级自决。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问题也轻轻放过去了，因为她觉得，用她所举的挪威的例子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利于她的“理论”。

在因分离而引起的冲突中，挪威无产阶级和瑞典无产阶级究竟采取了什么立场，以及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呢？在分离之后，挪威觉悟的工人自然应当投票赞成共和制^①，如果有投别种票的社会主义者，那只是证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间往往还有很多愚蠢的市俗机会主义成分罢了。关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两种意见的，我们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想用**文不对题**的空话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在分离问题上，我们不知道挪威社会主义的纲

^① 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末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

领是不是责成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一种确定的意见。就假定说他们的纲领没有责成这样做，假定挪威社会主义者是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证阶级斗争自由，以及同瑞典贵族经常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如何妨害经济生活自由的问题当作悬案吧。但是，挪威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这个贵族而拥护挪威农民民主运动（即使这个运动具有小市民的一切局限性），却是无可争辩的。

而瑞典无产阶级呢？大家知道，在瑞典神甫支持下的瑞典地主们曾经鼓吹用战争反对挪威，同时又因为挪威比瑞典弱得多，因为它已经遭受过瑞典的侵犯，因为瑞典贵族在本国内占有很大的势力，于是这种鼓吹就成为非常严重的威胁。可以担保说，瑞典的科科什金之流长期以来竭力号召大家“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大肆渲染“国家瓦解”的危险，硬说“人民自由”可以同瑞典贵族制度的基础相容等等，他们用这些言论蛊惑过瑞典民众。毫无疑问，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既反对地主的思想和政策，又反对“科科什金的”思想和政策；如果它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科什金之流也是承认这种平等的）之外，没有坚持民族自决权，即挪威分离的自由，那它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

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结果促进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合，促进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瑞典的工人把他们同挪威无产者兄弟般的联合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欧洲各国君主和瑞典贵族所强加于挪威的这种联系的破坏，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联系加强了。瑞典工人证明他们不管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各种变动（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能发生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从瑞典人的事情！），他们始终能够

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来同时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和挪威资产阶级。

由此可见，“弗腊克派”有时企图“利用”我们同罗莎·卢森堡的意见分歧去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是毫无根据的，而且简直是不严肃的。“弗腊克派”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同波兰的社会革命党相类似。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该党达到任何统一，任何时候都谈不到，而且根本不可能谈到。反之，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懊悔过”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的事情。波兰社会民主党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第一次在波兰这个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要求和狂热的国家里，建立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所以有这种伟大的功绩，并不是由于罗莎·卢森堡说了一些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纲领第九条的荒唐话，而是尽管有了这件可悲的事情。

“自决权”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当然没有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重大的意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同醉心于民族主义的波兰小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特别（有时候也许是稍微过分了）喜欢“矫枉过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来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波兰分离的主张当作他们的罪过。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当他们试图否认（象罗莎·卢森堡那样）必须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上承认自决权的时候，才是犯了错误。

实质上，这就是把从克拉科夫这个天地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关系，搬到俄国一切民族（包括大俄罗斯人在内）中来。这就成了“改头换面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人。

因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正是主张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7. 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个决议写道：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民族或其他专制制度压迫的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ßte，即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的。”^①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决议。但是罗莎·卢森堡知道这个决议，并且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们的纲领一样的“自决”一语。

试问，罗莎·卢森堡是怎样来铲除横在她的“新奇”理论路上的这个障碍的呢？

呵，简单得很：……这里的重点，是在决议的第二部分……这个决议带有宣言的性质……只是由于误解才会引用它！！

我们这位作者一筹莫展和狼狈不堪的情况，简直令人吃惊。

^① 见用德文公布的伦敦代表大会正式文件，《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Verhandlungen und Beschlü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 und Gewerkschafts-Kongresses zu London, vom 27. Juli bis 1. August 1896»）1897年柏林版第18页。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已经印成俄文小册子出版，译文中把“自决”一语误译成“自治”了。

通常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把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条文说成是宣言性质，并且怯懦地回避公开反对这些条文。显然，罗莎·卢森堡这次落到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这一群可怜的伙伴中去，并不是偶然的。罗莎·卢森堡不敢公开声明，她到底认为她所引证的决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她支吾搪塞，躲躲闪闪，好象指望读者都是些不细心、不懂事、读到决议后半节便忘掉前半节的人，或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代表大会以前在社会主义报刊上进行过争论的人。

但是，罗莎·卢森堡如果以为她在俄国觉悟的工人面前，可以这么容易地把国际关于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随便加以践踏，甚至不愿用批评态度把它分析一下，那她就大错而特错了。

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中，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上发表过，而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这就是俄国读者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实质。

当时争论的是关于波兰独立的问题。有三种观点：

(1)“弗腊克派”的观点，代表他们讲话的是黑克尔。他们要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个提议没有通过。这个观点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2)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波兰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本谈不上宣布民族自决权。这个观点也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3)卡·考茨基当时发挥得最周密的观点：考茨基反对罗莎·卢森堡，证明她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极端“片面的”。按照这个观点看来，国际现在不能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纲领，考茨基说，但是波兰社会党人完全可以提出这类要求。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

在国际的决议中也就采纳了最后这个观点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一方面，完全直截了当地而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建立他们阶级斗争的国际统一。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东欧和亚洲各国来说，只有根据这个决议，只有把它这两部分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给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政策提供唯一正确的指示。

现在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上述三种观点。

大家知道，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认为积极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是西欧一切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绝对职责。对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俄国“农民改革”¹⁸⁹时代来说，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唯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只要俄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²⁰⁰，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①

① 如果把1863年波兰起义贵族的立场、全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立场和乌克兰小市民德拉哥马诺夫在多年以后的立场加以比较，倒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历史研究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能够（和马克思一样）重视波兰运动的意义，而德拉哥马诺夫则代表了农民的观点，极端粗野愚昧，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粪，这种农民由于对波兰贵族的正当仇恨，不能了解这些贵族的斗争对于全俄民主运动的意义（参看德拉哥马诺夫的《历史上的波兰和大俄罗斯民主派》）。德拉哥马诺夫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变成民族自由主义者的彼·别·司徒卢威先生的热烈亲吻，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或第三个四分之一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二十世纪就已经不正确了。在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甚至其中最落后国家之一的俄国，都掀起了独立的民主运动，甚至是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贵族的波兰已经消失而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波兰了。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义。

波兰社会党（现在的“弗腊克派”）在1896年企图把适用于另一时代的马克思观点“固定下来”，这已经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了。因此，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反对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狂热，指出民族问题对于波兰工人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一次在波兰创立了纯粹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宣布俄罗斯工人同波兰工人及其阶级斗争中结成最紧密联盟的极重要的原则，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是不是说，国际在二十世纪初，可以认为民族政治自决原则对于东欧和亚洲是多余的呢？可以认为民族分离权是多余的呢？如果这样认为，那是荒谬绝伦的，这就等于（在理论上）承认土耳其、俄国和中国国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已经完成，就等于（在实际上）对专制制度采取机会主义态度。

不。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态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态度，而是彻底、认真、诚恳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不管该国的历史怎样变迁，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变更各个国家的界线。

1896年国际的决议所规定的正是无产阶级的这两方面的任务。191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季会议所通过的决议²⁰¹的原则基础也正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这个决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决议在第四条上承认自决权——分离权，似乎是对民族主义“作了”最高限度的让步（其实，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就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义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义），而在第五条上，却又提醒工人要反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要求各民族的工人都统一并且融合为统一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可是，只有头脑简单到极点的人，才会认为这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例如，为什么瑞典工人捍卫了挪威实行分离而组织独立国家的自由，结果就是促进了瑞典和挪威两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阶级团结。

8. 空想的卡尔·马克思和 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说波兰独立是一种“空想”，并且常常把这句话重复得令人作呕，她用讽刺的口吻感叹道：为什么不提出爱尔兰独立的要求呢？

“实际的”罗莎·卢森堡，显然不知道卡·马克思对于爱尔兰独立问题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这一点值得谈一谈，以便说明应当怎样用真正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是用机会主义观点来分析具体的民族独立要求。

马克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习惯用“查看牙齿”的办法来检查他所认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觉悟性和信念。马克思认识洛

帕廷以后，在1870年7月5日写信给恩格斯，极力称赞这位俄国青年社会主义者，但是同时补充说：

“……弱点就是波兰问题。洛帕廷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²⁰²

马克思向压迫民族中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中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

在谈到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积极主张以前，我们必须附带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一般民族问题总是采取严格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例如1851年5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由于研究了历史，他对波兰问题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波兰问题只有暂时的意义，即只是在俄国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义。认为波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大胆的蠢事”。“一分钟也不能认为，波兰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俄国的文明、教育、工业和资产阶级成分，要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²⁰³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

可是这些非常英明的和有远见的思想，绝对没有妨碍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十二年以后，即俄国仍然处于沉眠状态而波兰已经沸腾起来的时候，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

1864年，马克思起草国际告工人阶级书²⁰⁴时写信给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说，必须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马克思

写道：“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²⁰⁵ 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

1866年来到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巴黎“蒲鲁东派”，说他们“宣布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他们简直太可笑了”（1866年6月7日的信）。²⁰⁶

马克思在1866年6月20日写道：“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以及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吧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²⁰⁷

从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工人阶级是最不会把民族问题当作偶像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就唤起一切民族都来争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末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

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享有建立国家的特权的民族）。^①

我们再回来谈谈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在他的书信里有下面几段话表述得最清楚：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²¹⁰……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²¹¹

他在同年11月30日写的一封信里又补充说：

“我们应当劝告英国工人怎样做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 Repeal（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英国同爱尔兰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讲，就是写明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 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 土地革命……”²¹²

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67年12月17日的信）。²¹³

恩格斯在1868年11月20日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间有仇

① 再参看马克思1867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读了《泰晤士报》²⁰⁸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俄国而拥护波兰的呼声……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²⁰⁹

恨爱尔兰人的心理”，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日），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 il n'y a qu'un pas（只有一步之差）……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要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末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马克思在1869年8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为有了他们柏林同志的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资本老爷’的斗争虽然采取的还是低级形式，即罢工的形式，但它在铲除民族偏见方面，要比资本家老爷们口头上空谈和平的声明更为重要。”²¹⁴

马克思在国际里对爱尔兰问题所执行的政策，可从下列事实看出：

1869年11月18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内关于英国内阁对赦免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讲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话，并且提出了下列决议案：

“决定：

格莱斯顿先生在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释放爱尔兰爱国分子时有意地侮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无论对于坏政府手下的牺牲者或对于这些牺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同样是一种侮辱；

格莱斯顿身为政府官吏，曾经公开而郑重地表示欢迎美国奴

隶主的暴动，而现在却向爱尔兰人民宣传消极服从的学说；

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大赦问题的全部政策，十足地表现了他先前曾加以揭露因而推翻了他的政敌托利党²¹⁵的内阁的那种‘征服政策’；

国际工人协会²¹⁶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

本决议应通知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同它有联系的工人组织。”²¹⁸

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写道，他准备在国际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作一个报告，其内容将如下述：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²¹⁷（这是美国报纸，马克思在很长一个时期为该报撰稿）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着重号是马克思自己加的）²¹⁸

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读者现在想必完全明白了吧。

“空想家”马克思竟如此“不实际”，公然主张爱尔兰分离，而这种分离在半个世纪以后也还没有实现。

马克思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呢？这个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

马克思最初以为能够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

运动，而是压迫民族中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这正是现代俄国民族问题极其困难的地方），是无法预先估计到的。

但是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自由派的影响，成了他们的尾巴，由于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使自己失去了领导。爱尔兰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加强起来，并且采取了革命的形式。马克思重新审查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作了改正。“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巩固自己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俄国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

马克思在国际中提出了同情“爱尔兰民族”和“爱尔兰人民”的决议（聪明的耳·弗拉·大概要大骂可怜的马克思忘记了阶级斗争了！），鼓吹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马克思这一结论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般说来早已完成了。但是爱尔兰还没有完成，只是现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英国自由派的改良才正在把它完成。如果英国资本主义的覆灭，象马克思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快，那末爱尔兰就不会有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了。可是这种运动既然产生了，马克思就号召英国工人支持它，给它以革命的推动，为了自己的自由把它进行到底。

爱尔兰同英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联系，当然比现在俄国同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联系要密切些。当时，爱尔兰从英国

分离出去的“不实际”和“不能实现”(单就地理条件,以及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原则上虽然是反对联邦主义的,但他这次却容许联邦制^①,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结果不是这样,原来爱尔兰人民和英国无产阶级都软弱无力。直到现在,才由英国自由派和爱尔兰资产阶级通过卑鄙的交易,用土地改革(缴付赎金)和自治(现在还没有实行)来解决爱尔兰问题(乌尔斯脱的例子表明这是很难办到的)。究竟怎样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空想家”,说他们提出的是“不能实现的”民族要求,说他们受了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的影响等等呢?

当然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也实行了真正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使爱尔兰和英国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迟延半个世纪,不致让自由派为讨好反动势力而把这种改革弄得残缺不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它警告人们要反对世界各国、各色人种和各民

① 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既不能把民族“自决”权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一般地拥护联邦主义,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

族中的那些市侩的“奴仆式的急性病”，这些人一看见有人要改变某一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和特权所造成的国界，就急忙宣布说这是一种“空想”。

如果当时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没有采纳马克思的政策，没有提出主张爱尔兰分离的口号，那他们就会犯最有害的社会主义错误，就会忘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而向英国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让步。

9. 1903 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是 1903 年的代表大会¹⁸⁷通过的，这次大会的记录现在已成了罕有的珍本，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不知道纲领个别条文的来由（尤其是因为有关文件并不是都能公开传播的……）。因此，把 1903 年代表大会上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首先应当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文件虽然非常少，但是就从现有的文件中仍然可以完全明显地看出，所谓自决权向来都是指分离权而言。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所以怀疑这一点，说第九条“不清楚”等等，只是因为他们无知或漠不关心而已。还在 1902 年，普列汉诺夫在《曙光》杂志上维护纲领草案中的“自决权”时就写道，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一定是必需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是必需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末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

言……”219

这是维护这条纲领的基本论据的一个非常中肯的说明，正因为它非常中肯，所以那些批评我们纲领的“忘本的”人，过去和现在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它。不承认这一条，不管拿什么理由作借口，事实上都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可耻的”让步。既然谈论的是一切民族的自决权，为什么说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这里所谈的是同大俄罗斯民族分离。无产者联合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团结的利益，都要求承认民族分离权，——这就是十二年前普列汉诺夫在上述那段话里所承认了的道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对这一点稍微思索一下，对于自决问题也许就不会发表这么多谬论。

在批准了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这个纲领草案的 1903 年代表大会上，主要工作是在纲领委员会里进行的。可惜，纲领委员会的讨论没有作记录。而关于这一条的记录恰巧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只是在委员会里试图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对“承认自决权”提出异议。读者如果愿意把他们的论据（瓦尔沙夫斯基的演说，他和加涅茨基的声明，见记录第 134—136 页和第 388—390 页）拿来同罗莎·卢森堡在上述我们分析过的那篇用波兰文写的论文的论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据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普列汉诺夫是驳斥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究竟是怎样对待这些论据的呢？把这些论据无情地嘲笑了一顿！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建议取消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意见的荒谬性被揭露得如此明显，如此清楚，以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都不敢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重复自己的论据了！！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张在大俄罗斯、犹太、

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会议上没有希望被通过，于是就退出了大会。

这一段历史轶事对于每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纲领的人当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在纲领委员会上被彻底击破了，他们放弃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己观点的企图，——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实。难怪罗莎·卢森堡在她1908年写的那篇文章里很“谦逊地”隐讳了这一点，大概是因为一想到代表大会，就觉得太不愉快了吧！同时，她把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在1903年用全体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名义提出的、而罗莎·卢森堡和其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却始终没有敢（而且现在也不敢）再提的关于“修改”纲领第九条的这个令人发笑的拙劣建议，也隐讳过去了。

可是，如果罗莎·卢森堡为了隐瞒自己在1903年的失败，不肯讲出这些事实来，那末关心自己党的历史的人，就要设法认识这些事实并好好考虑它们的意义。

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时给代表大会的声明写道：“……我们提议，把纲领草案第七条（现在的第九条）改写为：第七条、建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记录第390页）

总之，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关于民族问题发表的意见是很不明确的，他们所提出来代替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

听起来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但是可惜这都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上，虽然五个崩得分子拥有五票，三个高加索人拥有六票，而柯斯特罗夫的发言权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结果竟没有一票赞成取消自决这一条。有三票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补充这一条（即赞成哥里德勃拉特所提出的条文：“建立保障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有四票赞成李伯尔所提出的条文（“各民族有自由

发展文化的权利”）。

现在，当俄国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它的纲领中把民族政治自决改成“文化自决”了。这样看来，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朋友们同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干得很出色，竟提议用自由派的纲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了！而他们还责备我们的纲领是机会主义的纲领呢，难怪这种责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只是受到嘲笑而已！

我们知道，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反对过“民族自决”，那末这些代表究竟是怎样了解这个“自决”的呢？

记录中的下面三段话可说明这一点：

“马尔丁诺夫认为，决不能给‘自决’这个名词以广义的解释；它的意思只是说民族有权实行分离而组成单独的政治整体，而决不是地方自治。”（第 171 页）马尔丁诺夫当时是纲领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个委员会里，卢森堡的朋友们的论据是受到驳斥和嘲笑的。当时，马尔丁诺夫按他的观点来说是个经济主义者，是个激烈反对《火星报》⁸⁵的人，如果他当时发表了为纲领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不能同意的意见，那他当然会被驳倒的。

当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后，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纲领第八条（现在的第九条）时，首先发言的就是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

哥里德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争取独立，那我们就不能反对它。就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正式婚姻，那我们就不应去妨碍它。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意这种意见。”（第 175—176 页）

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哥里德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上所说的话；在该委员会里，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了“自决权”的意思就是分离

权。在哥里德勃拉特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李伯尔，他说：

“如果某一民族不能在俄国境内生活，党当然是不会妨碍它的。”（第176页）

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只”是意味着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当时，连崩得分子也懂得这个真理，而只是在目前这个反革命继续猖獗和“背叛之风”盛行的可悲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因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说纲领“不清楚”。可是，在未谈到这些可怜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我们姑且把波兰人对纲领的态度问题作个结束吧。

他们参加第二次（1903年）代表大会，并且声明说绝对必须实现统一。可是，他们在纲领委员会里一遇到“挫折”，就退出了代表大会，而他们的最后几句话就是载于代表大会记录的书面声明，其内容就是上面摘录过的那个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来代替自决的建议。

1906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党，可是他们无论在入党的时候，或者在入党以后（无论在1907年代表大会上，在1907年和1908年代表会议上，或在1910年中央全体会议上），都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俄国党纲第九条的任何建议！！

这是事实。

不管人们怎样花言巧语，但是这件事实毕竟明显地证明，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都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争论和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已经把问题完全解决了，证明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因为他们在1903年退出大会以后，又于1906年入了党，而且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党的途径提出修改党纲第九条的问题。

罗莎·卢森堡的文章是在1908年由她自己署名发表的。当

然谁都从来没有打算否认党的著作家有批评党纲的权利，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同样也没有一个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机关提出修改第九条的问题。

因此，托洛茨基为罗莎·卢森堡的某些崇拜者效劳，真是熊的效劳²²⁰，他以《斗争》杂志¹⁷⁶编辑部的名义在第二期（1914年3月）上写道：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党纲中删去。”（第25页）

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危险！除了“私下说的话”（就是播弄是非，托洛茨基向来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以外，他找不到什么证据来把一般“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是罗莎·卢森堡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没有气节、没有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党纲都不尊重的人。好一个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

1903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因为自决权问题而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托洛茨基还可以说，他们认为这个自决权没有什么内容而应该从党纲中删去。

可是，自此以后，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又加入了拥有这一纲领的党，而且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党纲的建议。^①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他的杂志的读者隐瞒这些事实呢？只是因为他想借此投机，挑起波兰反对取消派的人同俄国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并且他想在党纲问题上欺骗俄国工人。

^① 有人对我们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夏季会议上只有发言权，他们对于自决权（分离权）问题完全没有参加表决，而在发言中一般地反对过这种权利。他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行动，并且完全有权照旧在波兰宣传反对波兰分离。但是这跟托洛茨基说的不完全相同，因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要求“从党纲中删去”第九条。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现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爷们对党是不讲客气的。

请听听崩得分子李普曼所说的话吧！

这位先生写道：“十五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党纲里提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条文时，每个人都曾问过自己：这个时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这一名词至今还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疑团。实际上，当时很难驱散这个疑团。当时大家都说：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把这一条具体化的时候，就让它是一个疑团吧。生活本身会指明这一条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这一个侮辱党纲的“没有穿裤子的孩子”²²¹，不是漂亮得很吗？他为什么要侮辱党纲呢？

只是因为他一窍不通，什么都没有学过，连党史都没有读过，而只是落入取消派队伍，在取消派队伍里，对于党和党性的问题“照例”是赤身裸体，毫不害羞的。

在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里，有一个神学校的学生常常以“把痰吐到装满白菜的桶里”而自鸣得意。崩得派先生们更进了一步。他们把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放出来，让他们当众把痰吐到自己的桶里。至于国际代表大会通过某个决议，至于崩得自己的两位代表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曾表示完全能够了解（虽然他们非常“严格”批评过和坚决反对过《火星报》！）“自决”的意义，甚至赞成自决，这一切又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党的政论家”（别开玩笑了！）象神学校的学生那样来对待党史党纲，那不是更容易把党取消吗？

你们再看另一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即《钟声》杂志²²²的尤

尔凯维奇先生。尤尔凯维奇先生手头大概有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因为他引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一段由哥里德勃拉特转述过的话，并且还表现出他知道只能把自决解释为分离权。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乌克兰小资产阶级中间造谣诬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主张俄国的“国家完整性”（1913年第7—8期合刊第83页和其他各页）。当然，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要离间乌克兰的民主派同大俄罗斯的民主派，除了这样造谣诬蔑之外，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的。《钟声》杂志这个作家团体的全部政策，就是实行这样一种离间，鼓吹乌克兰工人分离出去，组成特别的民族组织！^①

分裂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市侩团体，——这就是《钟声》杂志的客观作用。这种团体在民族问题上散布一些极端糊涂的思想，当然是完全相称的。不言而喻，尤尔凯维奇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他们一听见人家把他们叫作“与党貌合神离的人”，就气得“要命”），简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到底打算怎样在党纲上解决分离权的问题。

现在再看第三个而且是主要的一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即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他在取消派的报纸上，当着大俄罗斯公众的面“大骂”党纲第九条，同时又说“由于某些理由不能赞成”主张取消这一条的意见！！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

1912年8月，取消派代表会议¹⁷³正式提出民族问题。一年半以来，关于第九条的问题，除了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的文章之外，没

^① 请特别看一下尤尔凯维奇先生为列文斯基的《加里西亚乌克兰工人运动发展简史》（«Нарис розвитку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робітничого руху в Галичині»）1914年基辅版所写的序言。

有看见过一篇东西。而且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反驳党纲时，又说他“由于某些〈是不是一种不便对人说的病症？〉理由不能赞成”主张修改党纲的意见！！我敢担保：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种机会主义的例子，很难找到这种比机会主义更坏的背叛党、取消党的例子。

谢姆柯夫斯基的论据是怎样的呢，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他写道：“如果波兰无产阶级想在一国范围内同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想使波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并且在全民投票（全民公决）中获得大多数赞成分离的票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是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新工人报》166第71号）

可见，谢姆柯夫斯基先生连他所说的是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他没有想一想，分离权的问题，正好不是由中央议会来解决，而只能由实行分离的那个地区的议会（议会，全民投票等等）来解决。

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科科什金之流甚至把分离的念头也当作罪恶的时候，居然有人撇开真正实际的具体政策问题不谈，而象一个小孩那样发问：如果大多数在实行民主时都赞成反动派，“那又该怎么办呢”！大概整个俄国的无产阶级今天不应该同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作斗争，而是要放过他们，去同波兰的反动阶级作斗争吧！！

这种荒谬已极的议论竟写在取消派的机关报上，而该报的思想领导者之一，就是尔·马尔托夫先生，就是那个起草了纲领草案，并且在1903年努力使它通过，后来又写文章维护分离自由的尔·马尔托夫。现在尔·马尔托夫大概是按照下列原则发表意见的：

那里用不着聪明人，
你们派烈阿德去就行，

让我看看再说。223

他把谢姆柯夫斯基这个烈阿德派去，让他在日报上向那些不了解我们党纲的新读者们曲解党纲，制造无穷的混乱！

取消派实在是跑得太远了，——连过去许多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点党性。

当然不能把罗莎·卢森堡同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和谢姆柯夫斯基一班人等量齐观，但是她的错误恰好被这班人抓住了，这个事实也就特别明显地证明她陷入了怎样的机会主义泥坑。

10. 结 束 语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自决权问题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1896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也好，自决权只能了解为分离权也好，组织独立民族国家是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也好，都是不容争辩的。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困难的情况是，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正在共同奋斗，而且应当共同奋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过程，有时会引起同该民族的民族主义进行非常残酷的斗争，以致使人迷失方向，忘记压迫民族民族主义。

但是这种迷失方向，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各民族无产者共同斗争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当从“克拉科夫的”观点，

而应当从全俄的观点来提出政治问题。但统治全俄政治的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一流人。他们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因为异族人抱有“分立主义”思想，怀有分离念头，他们就对异族人进行迫害，杜马、学校、教会、营房以及在千百种报纸上，宣传这种迫害，实行这种迫害。正是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毒素毒化了全俄政治空气。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动势力在全俄巩固起来，那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怀念1849年和1863年，成了一种活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大风暴发生，这种传统恐怕还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阻碍一切民主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

毫无疑问，不管被压迫民族（而被压迫民族的“不幸”，就在于人民群众往往被“本”民族解放的思想所迷惑）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时看起来多么合乎情理，但是在事实上，从俄国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来看，拒绝维护自决权，就是最凶恶的机会主义，就是拿科科什金之流的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而这种思想，其实也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思想和政策。

因此，如果说最初一个时候，还可以把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当作是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种特殊的狭隘观点^①而加以宽恕，那末到了现在，当民族主义，首先是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到处盛行的时候，当这个民族主义已在指挥政治的时候，这种狭隘观点就成为不能宽恕的了。实际上，现在一切民族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抓住了这种狭隘观点，否认“风暴”和“飞跃”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而倾向于科科什金之流的自由主义。

^① 不难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除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宣传反对某个离婚案件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嘲笑谢姆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现在所“煽动起来的”那种莫须有的“矛盾”的。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一定会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而以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哪些阶级占首要地位为转移。1905年以前,我们几乎只知道有民族反动派。革命以后,我国就产生了民族自由派。

事实上我国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即整个现代资产阶级,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往后必然会产生大俄罗斯民族民主派。“人民社会”党²²⁴创始人之一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⁸⁹8月号上让人小心对待农夫的民族主义成见的时候,就表示了这种观点。不管人家怎样诬蔑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把农夫“理想化”了,可是我们总是而且以后还要继续把农夫的理智和农夫的成见,农夫反对普利什凯维奇的民主主义立场同农夫想跟神父和地主调和的倾向严格地区别开来。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来也许还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考虑到这一点。^①1905年以后,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大大觉醒了(例如第一届杜马中的“自治联邦派”,乌克兰运动、穆斯林运动的发展等等),这种觉醒一定会使城乡大俄罗斯小资产

① 例如,把波兰民族主义演变的情况,由贵族民族主义变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后又变成农民民族主义的情况考察一下,是很有趣的。路德维希·伯恩哈特在他写的《普鲁士的波兰人》(《Das polnische Gemeinwesen im preußischen Staat》,有俄译本)一书中,自己站在德国的科科什金的立场上,却描写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的波兰人组织了一种“农民共和国”,这就是波兰农民的各种合作社和其他种种团体都紧密团结起来,为民族、为宗教、为“波兰人的”领土而斗争。德国人的压迫使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并且还把波兰贵族、波兰资产者和波兰农民群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继激发起来了(特别是1873年德国人开始反对在学校里教授波兰文以后)。在俄国也有这种趋向,而且不仅是对一个波兰。

阶级的民族主义加强起来。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争执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殊反动性，将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它们在邻国有时享有大得多的民主）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趋向。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在本文已经排好版以后，我收到了《我们的工人报》¹⁶⁶第三号，在这份报纸上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谈到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他写道：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主义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公式既然是指领土独立权而言，当然也就完全没有涉及究竟应当怎样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的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请你们拿这件事同崩得《时报》²²⁵编辑部让李普曼先生侮辱纲领并宣称纲领不清楚的事实对照一下吧!!崩得分子先生们那里的“党性”道德,真是奇怪得很……至于科索夫斯基究竟为什么硬说代表大会通过的自决条文是机械的抄袭,那就只有“真主知道”了。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用什么反驳,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知道的。

写于1914年2—5月

载于1914年4—6月《启蒙》
杂志第4、5、6期

署名:弗·伊林

按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0卷
第395—457页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²²⁶

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几十年来酝酿的欧洲大战已经爆发了。军备的扩张，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先进国家争夺市场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以及最落后的各东欧君主国家的王朝利益，都必然促成而且已经促成这场战争。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

社会民主党的责任，首先是揭示战争的这种真实意义，无情地揭穿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了鼓吹战争所散布的谎言、诡辩和“爱国主义的”言论。

德国资产阶级是交战国一方的头子。它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是为了解放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是为了摧毁反动的沙皇制度。而实际上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充当以威廉二世为首的普鲁士容克的走狗，一直是沙皇制度最忠实的盟友和俄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敌人。实际上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和容克一道，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全力支持沙皇君主制度来反对俄国革命。

实际上德国资产阶级向塞尔维亚举行了强盗式的进攻，企图征服塞尔维亚和扼杀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革命，并且用自己的主

力军进攻比利时和法国这些比较自由的国家，以便抢劫更富有的竞争者。德国资产阶级胡诌它是进行防御战，实际上它选择了它认为最有利的战争时机，利用了它的最新的军事技术，预防了俄法两国准备使用的新武器。

英法资产阶级是交战国另一方的头子。它们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们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暴虐。而实际上英法资产阶级早就用几十亿巨款雇佣和训练欧洲最反动最野蛮的君主制度——俄国沙皇制度的军队来进攻德国。

实际上英法资产阶级作战的目的是夺取德国的殖民地，打垮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竞争国。正是为了这个高尚的目的，“先进的”、“民主的”国家帮助野蛮的沙皇制度加紧扼杀波兰、乌克兰等民族，加紧镇压俄国的革命。

交战国双方，在掠夺方面、在战争的野蛮和无限残酷方面，都不相上下，但是为了愚弄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唯一真正的解放战争，即反对“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各国资产阶级都竭力用爱国主义的谎言来宣扬“本国”民族战争的意义，硬说资产阶级力图战胜对方，并不是为了掠夺和强占土地，而是为了“解放”本民族以外的其他一切民族。

但是，各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愈是拚命分裂工人，挑拨工人自相残杀，愈是为了这个崇高目的疯狂地采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制度（甚至目前在战争时期，对“国内”敌人的迫害也远比对国外敌人的迫害厉害得多），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愈要负起责任，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匪帮的沙文主义叫嚣，维护自己的阶级团结，捍卫自己的国际主义，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觉悟的工人放弃这项任务，就是放弃自己的一切解放的和民主的要求，更谈不到

坚持社会主义的要求了。

我们以万分沉痛的心情断定，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没有执行自己的这项任务，而这些党的领袖的行为，特别是德国党的领袖的行为，已经近乎直接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历史的重大关头，现在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1889—1914年）的大多数领袖企图以民族主义来盗换社会主义。由于他们采取这种行动，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没有起来反抗政府的犯罪行为，反而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溶合起来。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重复“本”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作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现代欧洲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领袖和最有威信的社会主义报刊所持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最有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负玷污社会主义的责任。但是不能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出卖祖国并同俾斯麦勾结起来镇压公社的资产阶级政府中拥有几个部长席位。

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企图为自己支持战争的行为作辩护，说他们是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声明，我们认为这种辩护纯粹是诡辩。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年来在我们国内又具有很大的规模。领导这一运动的一直是俄国工人阶级。近几年来成百万人的政治罢工，都是在推翻沙皇制度、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举行的。大战前夕，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彭加勒在访问尼古拉二世的时候，在彼得堡的街头可以亲眼看到俄国工人双手筑起来的街垒。俄国无产阶级不惜任何牺牲，要使全人类摆脱沙皇君主制度的凌辱。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推迟沙皇制度的崩溃，可以帮助

沙皇制度反对俄国的一切民主派的话，那就是目前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拿英、法、俄等国资产阶级的钱袋来为沙皇制度的反动目的服务的。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挠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话，那就是俄国沙文主义报刊不断向我们推崇的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行为。

就假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小到不得不放弃任何革命活动的程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决不能参加沙文主义阵营，也决不能采取那种步骤，意大利的社会党人说得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玷污了无产阶级国际的旗帜。

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蒙受而且还要蒙受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我们一切合法的工人刊物被查封了。大多数工会被取缔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志被逮捕和流放了。但是我们的议会代表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认为：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为了表示更强硬的抗议而离开杜马会议厅，指责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这是它的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的义务。尽管沙皇政府的压迫加重了十倍，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还是印发了第一批秘密的反战宣言，执行了对民主派和国际所负的义务。

既然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如少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中立国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对第二国际的破产感到万分可耻，既然英法的社会党人也发出了反对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内的沙文主义的呼声，既然以德国《社会主义月刊》²²⁷（«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为代表的、早已站在民族自由主义立场上的机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庆祝他们对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那末，动摇于机会主义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人们（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企图闭口不谈或者以外交辞令来掩饰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一种

对无产阶级最坏的效劳。

恰恰相反，应当公开承认这种破产，了解破产的原因，以便在全世界工人中建立起新的、更巩固的社会主义的团结。

机会主义者撕毁了斯图加特²²⁸、哥本哈根²²⁹和巴塞尔²³⁰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责成各国社会党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反对沙文主义，责成社会党人要加紧宣传国内战争和社会革命，以对付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挑起的一切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在以往的（所谓“和平的”）历史时代特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并于近几年来在国际中取得了实际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者早就准备好了这一破产。他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顶替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鼓吹阶级合作；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名义下宣扬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忽视或否认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在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局限于感伤的小市民观点，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崇拜这种合法性，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作为机会主义天然的“补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同样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背道而驰的），其特征是同样恬不知耻、自鸣得意地重复沙文主义口号。

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

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首先应当是同本国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在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⁶）完全浸透了沙文

主义，而民粹主义者直到社会革命党人¹⁴⁶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部分地浸透了沙文主义（特别要痛斥象耶·斯米尔诺夫、彼·马斯洛夫和格·普列汉诺夫发表的、受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报刊赞扬和广泛利用的沙文主义言论）。

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看，在现时情况下，不能肯定交战国双方哪一方失败对社会主义危害最小。但是，对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毫无疑问，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看，要是压迫欧亚两洲的民族和人口最多的、最反动、最野蛮的沙皇专制政府失败，那危害是最小的了。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治口号应当是建立欧洲共和国联邦，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只要能把无产阶级拖入沙文主义的洪流，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社会民主党人则要阐明，不举行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完全是虚伪和荒唐的。

俄国由于最落后，由于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仍然是实现彻底民主改革的三个基本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一切先进国家中，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的战争负担愈重，在现代“爱国主义的”可怕的野蛮行为过去以后，在拥有大资本主义的巨大技术成就的条件下重建欧洲时，无产阶级的作用愈积极，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就愈迫切。资产阶级利用战时法律封闭无产阶级的一切喉舌，这就给无产阶级提出一项必须建立秘密鼓动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任务。让机会主义者不惜用背叛自己信念的代价去“保全”合法组织吧，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却要利用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和联系，来建立适应于危机时代的秘密斗争形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使工人

不是同本国沙文主义资产阶级讲团结，而是同各国工人团结起来。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建立新的国际。目前机会主义的胜利是维持不久的。战争造成的牺牲愈大，工人群众就愈能看清机会主义者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愈能看清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示，由巴塞卢决议（1912年）所规定，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就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决不能放弃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渝的准备工作。

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摆脱对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依赖，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以坚定的步伐比较迅速地走上各民族真正自由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全世界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斗争中的国际团结万岁！

摆脱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写于1914年9月28日
(10月11日)以前

载于1914年11月1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并根据
手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1卷
第10—17页

卡尔·马克思²³¹ (摘录)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序 言

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1913年（据我记得）为格拉纳特辞典写的。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著作的目录。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其次，辞典编辑部怕书报检查机关通不过，把本文末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可惜目前我无法把这部分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的一些文件中。我只记得，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²³² 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了了解的地方，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滚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

1918年5月14日于莫斯科

1918年载于莫斯科“波涛”
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
《卡尔·马克思》一书

按手稿刊印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新历5月5日生于特利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后,先入波恩大学,后来入柏林大学,研究法学,但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出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按其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黑格尔左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小组,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不准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褫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权,这就使马克思不得不抛弃做学者的志愿。当时黑格尔左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又有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出版。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必须亲身体验”这些书的“解放作用”。“我们(即黑格尔左派,包括马克思)一下子成为费尔巴哈派了。”²³³这时,同黑格尔左派接近的莱茵激进资产者,在科伦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²³⁴(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主编,并从波

恩迁居科伦。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趋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两三重检查，以后决定干脆要在1843年1月1日将其查封。这时，马克思只好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了。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大篇论文，除后面列举的（见参考书目^①）以外，恩格斯还指出了论摩塞尔河谷酿造葡萄酒农民状况一文。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时代就同她订婚了。燕妮出身于普鲁士一个反动的贵族家庭，她的哥哥在一个最反动的时期（1850—1858年）当过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到了巴黎，以便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黑格尔左派分子，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亡命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杂志《德法年鉴》⁹⁸只出过第一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又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²³⁵；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到巴黎住了几天，从此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极其热情地投入了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起着特别作用，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哲学的贫困》一书对它进行彻底的清算），并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创立了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72页，本选集未收入。——编者注

参考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马克思被视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而逐出了巴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²³⁶,出色地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三月革命后,他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的科伦。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出版了《新莱茵报》²³⁷,马克思任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变进程光辉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都证实了它。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去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²³⁸后又被逐出巴黎,于是他移居伦敦,直到逝世。

侨居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出版)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小资产阶级和一般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占着上风,所以马克思不得不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最疯狂最野蛮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²³⁹)。马克思避开侨民小组,写了许多历史著作

(见参考书目) 阐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 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 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一卷) 两书中, 使这门科学革命化了(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 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 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 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 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 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 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 反对所有这些宗派和学派的理论, 从而为各国工人阶级锻造出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巴黎公社失败(1871年)——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作了一个极深刻的、准确的、出色而起积极作用的、革命的估价(《法兰西内战》, 1871年出版)——以及巴枯宁分子使第一国际分裂后, 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以后, 马克思便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时代, 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 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 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尽管如此, 他还是收集大量新资料, 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文), 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 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 马克思的夫人逝世。1883年3月14日, 马克思在他的安乐椅上静静地长眠了。他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

墓，和他的夫人葬在一起。当家境十分贫困时，马克思有几个孩子在童年时代死于伦敦。三个女儿嫁给英国和法国的三个社会主义者：爱琳娜嫁给艾威林，劳拉嫁给拉法格，燕妮嫁给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²⁴⁰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因此，我们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前，必须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简略地叙述一下。

哲学唯物主义

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特别是一个拥护路·费尔巴哈的人，就是在后来他也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不够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在法国，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斗争”（《遗著》中的

《神圣家族》》²⁴¹。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创立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明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运动的物质或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认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我们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某种观念的反映。”²⁴²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是精神先于自然界，还是自然界先于精神……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先于自然界，从而归根到底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

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至多是“把当众逐出的唯物主义羞答答地从后门放进来”²⁴³。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指出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说过的比通常“较为唯物主义的”言论，及其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离开唯物主义立场”的说法，而同时又斥责赫胥黎留下了逃往不可知论和休谟主义去的“后路”。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²⁴⁴，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也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时还应加上物质电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3）旧唯物主义者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²⁴⁵

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们认为，其他一切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当时几乎只有我和马克思两人决心拯救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证物，并且正是现代自然科学表明这种证物异常丰富（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呵！），每天都提供大量材料，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²⁴⁶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个个别场合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都带有必然灭亡的迹象；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任何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²⁴⁷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

物主义“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²⁴⁸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时，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所表述的这个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比通常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参看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⁷⁴。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道：“工艺学会

揭示出人类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²⁴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周密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²⁵⁰（参看马克思 1866 年 7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

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阶级斗争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

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灭亡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设立代议机关、实行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创办深入群众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联合会等等出现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

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用客观态度去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并且同对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²⁵¹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¹⁵⁶。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²⁵²研

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就从商品的分析着手。

价 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重复亿万次的交换，使得千差万别的不能相比的使用价值经常彼此相等。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经常彼此相等的这些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在交换产品时，使各种不同的劳动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下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种形态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某一社会内表现于所有商品价值总额中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人类劳动力，亿万次的交换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个单个商品只表现某一部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一位旧经济学家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只是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某个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从

表现在重复亿万次的大量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的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单个的偶然的交换行为起（“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交换），直到一般价值形式，即几种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交换，以至货币的价值形式，这时金便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各个生产者通过市场所发生的社会联系遮蔽和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且在这里（如同在《资本论》的前几章中一样）也特别应当指出，这里所作的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的一定发展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如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者流通手段，或者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照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着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资本论》第1卷）²⁵³

剩 余 价 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变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T(商品)——M(货币)——T(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M(货币)——T(商品)——M(货币)，这就是说，为卖(加上利润)而买。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那种增殖额叫做剩余价值。货币在

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变为资本，即变为一种特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不过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间的盈亏必会抵销，并且这里所谈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要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²⁵⁴，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种商品确是有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由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强迫他整天做工，譬如说做十二小时的工。其实工人在六小时内（“必要”劳动时间）就能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六小时内（“剩余”劳动时间）则创造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看来，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一部分一部分）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增殖起来，因为它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要说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较，而只应当同可变资本相比较。这种比率，马克思称做剩余价值率，按上述例子来看，就是六分之六，即百分之一百。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两种

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一方面他们出卖劳动力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脱离土地和脱离任何生产资料，这是无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分析第一种方法时，描绘了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政府为延长工作日（十四至十七世纪）和缩短工作日（十九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事实。

马克思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是如何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就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丰富的材料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都显示出来了。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变为资本，不是把它用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奢侈，而是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所有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在于认为变成资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作可变资本。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较快的事实，有巨大的意义。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

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其表现形式极其纷繁,使资本有可能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就给了我们一把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钥匙,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相隔的时间则比较长,比较不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原始积累就是强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霸占村社土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

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²⁵⁵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的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而将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I)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II)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来详细考察社会总资本在实现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和实行积累时的周转情形。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解决了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全部社会经济来分析问题,而不是象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限于分析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剩余价值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情况。利润是剩余价值和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的”资本(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而“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价值总量是与商品价格总和相等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它的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的价格(或生产价

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个众所周知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就为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量是与价格总和相等的。然而价值(社会的)转化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道路,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道路,因为很自然,在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各个分散的商品生产者联系起来的¹社会内,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较快。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和全部资本之比,不只是和可变资本之比)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掩盖或阻碍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去转述《资本论》第三卷中专论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等饶有兴趣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全被各个业主占有,面积有限,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于是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优等地相继变为劣等地而产生的。相反地,也有倒逆的改变,也有某一类土地改变为另一类土地的事实(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一

切工业部门和一切国民经济部门中利润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完全自由，是资本能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资本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作为垄断者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于是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化为国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化就是摧毁私有者的垄断，在农业中比较彻底和完全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切近地“触犯”现代另一种特别重要的和“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的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3卷第77—81页。并参看1862年8月9日的信，同书第86—87页。）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指出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变过程的分析：劳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变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其交给地主），然后转变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变成货币，在旧俄称为“代役租”），最后转变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起源”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进化的许多深刻的（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在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中，不仅必然同时形成受货币雇用的无产

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变之前就已形成这个阶级。在短工阶级已产生而还只是个别现象的时候，那些较富裕的缴纳代役租的农民自然而然就养成一种自己剥削农村雇佣工人的习惯，正如封建时代富裕农奴自己也有农奴一样。于是，这些农民便渐渐有积蓄起相当的财产而变成未来的资本家的可能性。于是，那些独立经营的旧土地占有者中间就渐渐产生出资本主义租佃者的苗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业范围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32页）²⁵⁶“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²⁵⁷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²⁵⁸。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²⁵⁹。“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²⁶⁰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

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²⁶¹。“小农土地占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粮价低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低价(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困的结果,而决不是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高的结果。”(《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340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土地私有制,即小生产的通常形式,不断衰落、消灭以至灭亡。“小土地私有制实质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的日益广泛采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不可避免地处使小土地私有者陷于贫困。把资本用来购买土地,便不能用来改善土地的经营。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农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大量消耗。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土地私有制的规律。”²⁶²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村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提高了这种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枯竭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以会发展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的联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着一切财富的泉源——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

13 章末)

社会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向前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半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在智慧和精神上推动这个转变、在体力上完成这个转变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它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完全割断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为这种联系准备新因素，使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其基础是自觉地运用科学，集体劳动的联合，人口的重新分布（一方面消灭农村的偏僻状况、与外界隔绝和未开化状态，另一方面消灭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内，女工和童工的使用，父权制家庭被资本主义瓦解，必然要通过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恶的形式。可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

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的形式建立起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也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或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相互联系而形成统一的历史发展序列。显然，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粗野的资本主义形式（在那里是工人为生产过程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存在）上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道发展的泉源”（《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工厂制度向我们表明“未来时代教育的萌芽，那时对于所有超过一定年龄的儿童，生产劳动将同教学及体操结合起来，这不但是扩大社会生产的手段，而且是生产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手段”（同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虽然这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完全是一个真理：“工人没有祖国”，至少各文明国家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²⁶³。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各个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

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控制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控制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表制的国家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²⁶⁴。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建立联系，直接或间接收买官吏和报刊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剥夺生产资料以利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调节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²⁶⁵“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²⁶⁶

最后，谈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会存留的小农的态度问题时，必须指出恩格斯说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这种转变的一切好处。”（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也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24。）²⁶⁷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马克思在1844—1845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不能了解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评价革命实际活动的意义，他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一切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为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材料还远未收齐、综合、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作最一般最简短的说明，同时着重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²⁶⁸。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机，无产阶级的策略都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龟行的发展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

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达到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共产党宣言》上论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²⁶⁹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这必须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作出的许多指示：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工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²⁷⁰、使工人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败坏工人的意识”（第2卷第218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²⁷¹；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毅力”（第3卷第124页）；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宪章派²⁷²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²⁷³；英国工人领袖是怎样按“介于激进资产者和工人中间”的样式造成的（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

当这种垄断地位尚未破坏时，“对不列颠工人是毫无办法的”（第4卷第433页）²⁷⁴。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用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把它和工人运动的全部进程（和结局）联系起来观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²⁷⁵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实行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间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被世界风暴吓得魂不附体；在在显得无力，处处实行抄袭；……没有首创精神；……该死的老头子注定要为自己晚年的利益而领导年轻力壮的人民的青春热情的首次进发……”（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²⁷⁶大约过了二十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一觉察到将有争取自由的斗争发生，就宁愿去同奴隶制媾和。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做法（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究竟怎样要求进行这种工作，这可以从他对1856年德国最黑

暗的反动年代的情况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²³²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马克思当时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的利益而背叛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也正是因为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写信同马克思商量他们将在刊物上共同发表意见的问题时说道：“在一个农业国家里，代表工业工人说话时只攻击资产者，而忘记了封建贵族对农村工人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²⁷⁷1864—1870年间，当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时代，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了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相互斗争的时代快告终结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思想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无论对俾斯麦或亲奥派都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要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要在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基础上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²⁷⁸。在1870年9月9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宣言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发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害处，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少些，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精神颓丧，削弱无产阶级

的战斗。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消沉和资产阶级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²⁷⁹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¹²⁰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暂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采取不合法斗争手段的决心来对付非常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²⁸⁰，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写于1914年7—11月

1915年第一次载于《格拉纳特
百科全书》第7版第28卷

署名：弗·伊林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1918年
版的小册子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1卷
第27—58页

辩证法的要素

(摘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1) 观察的客观性 (不是实例, 不是枝节之论, 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辩证法的要素

×

(2)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 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 它自身的运动, 它自身的生命。

(4) 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

(5)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 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 (9)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 向自己的对立面? 的转化。
- (10)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 (11)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 (12)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 (13)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 (14)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 (15)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 (16)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15和16是9的实例)）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写于1914年9月—12月

1929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
第9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8卷
第238—240页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现在,关于民族和祖国的言论、议论和叫喊太多了!英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大臣,法国无数的“先进”政论家(他们竟和反动政论家的意见完全一致),俄国许许多多官方的、立宪民主党^①的和进步党¹⁸⁷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无聊文人,都异口同声地高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高唱民族独立的伟大原则。他们当中谁是卖身求荣歌颂刽子手尼古拉·罗曼诺夫或者歌颂黑人和印度居民的蹂躏者的无耻之徒,谁是因为愚蠢无知或没有气节而“随波逐流”的庸俗市侩,真叫人无法分辨。不过,分辨这点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面前是一个很广泛很深刻的思潮,这个思潮的根源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极紧密的关系。为了宣传有利于这些阶级的思想,每年要花费几千万和几百万的金钱,这副磨盘真不小,到处汲取水力来推磨,从顽固的沙文主义者缅施科夫起,直到由于机会主义思想或没有气节而成了沙文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鲁巴诺维奇和斯米尔诺夫、克鲁泡特金和布尔采夫一流人为止。

我们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也想明确一下我们对这一思潮的态度。我们这些处在欧洲最东部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大国民族的代表,不应当忘记民族问题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在人们公允地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国家内,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在欧洲最东部和亚洲唤起和唤醒许许多多“新的”大小民族的时候,特别

是在沙皇君主制度迫使千百万大俄罗斯人和“异族人”拿起武器，遵照贵族联合会¹⁹²和古契柯夫、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多尔哥鲁科夫、库特列尔、罗迪切夫一帮人的利益去“解决”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时刻。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十分之九的人）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生活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感到自豪，因为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¹⁴²、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为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为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父和地主。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²⁸¹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向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

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当时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

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征服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强那败坏我们大俄罗斯民族声誉的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匪帮的势力。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例如，把压迫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行为称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

十九世纪彻底民主派的伟大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²⁸²所以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的大俄罗斯工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人类平等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正因为我们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说：二十世纪在欧洲(即使在欧洲的最东部也好)“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即反对我们祖国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实战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危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堕落，失去廉耻，丧失节操，教他们压迫异族人民，教他们用一些似乎是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

也许有人反驳我们说，除沙皇制度以外，已经有另一种历史力量在它的卵翼下诞生和壮大起来，这就是大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它起着进步的作用，使经济集中并使广大地区联系紧密。但是，这种反驳不但不能维护反而更有力地斥责我们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

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应称作沙皇—普利什凯维奇的社会主义者（如马克思称拉萨尔派为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那样）。姑且假定历史解决问题将有利于大俄罗斯的大国资本主义而不利许许多多小民族。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全部历史都是压迫、掠夺、血腥和污秽的历史。我们并不主张各个小民族一定要分立；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我们无条件地主张集中制，反对市侩式的联邦制的理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协助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征服乌克兰等等，不是我们应做的事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更不要说社会主义者了）应做的事情。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是，谁要想根据这点来证明社会主义者应当帮助俾斯麦，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太好了！此外，俾斯麦把分散的受异族压迫的德国人联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大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和飞速发展，都要求在我们国内消除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我们那些崇拜真正俄国的准俾斯麦的人常常忘记这一差别。

第二，如果历史解决问题将有利于大俄罗斯大国资本主义，那末，应该得出结论说：大俄罗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社会主义作用将更加巨大。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长期地用最充分的民族平等和友爱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因此，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上看，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来坚持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隶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马克思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英国住了几十年，已经成了半个英国人，他为了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仍然要求保障爱尔兰

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我们俄国土生土长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及其他一些人,在我们所谈的第二种假定的情况下,不仅会成为自己祖国的叛徒,自由民主的大俄罗斯的叛徒,而且会背弃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即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载于1914年12月12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
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1卷
第83—87页

第二国际的破产

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人们往往单从形式上去了解，如认为是交战国社会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中断，国际代表会议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²⁸³会议的无法召开等等。持有这种观点的有中立小国的一些社会党人，甚至还有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正式党派，以及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拥护者。在俄国报刊上，弗·科索夫斯基先生曾以值得深深感谢的坦率态度在崩得¹⁷²的《新闻小报》²⁸⁴第八号上表示拥护这种看法，而《新闻小报》的编辑部连一个字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可以预料，科索夫斯基先生拥护民族主义，他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辩护，这将促使许多工人彻底认清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质。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各种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背叛自己的信念，背叛自己在斯图加特²²⁸和巴塞尔²³⁰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决议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等等。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背叛、认为看到这种背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背叛。如果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根据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第二国际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已经倒向本国总参谋部、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这是具有全世

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所以不能不对它加以尽量全面的分析。大家早就认为，战争虽然会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已经开始给人类带来显著的好处：这次大战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是否真的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呢？显然，不管是叛徒自己，还是那些确切知道——或者模糊地猜测到——自己将不得不同叛徒友好和妥协的人，都不喜欢谈论这一点。但是，尽管第二国际的各种“权威人士”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他们这一派的朋友会感到不愉快，我们还是应该正视现实，直言不讳，向工人说出真相。

有没有实际的材料来说明，社会党在战前和在预见到这个战争的时候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和策略的呢？无疑是有的。这就是1912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现在把它和同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斯代表大会的决议²⁸⁵一起翻印出来，让大家回忆回忆社会主义的“被忘记了的话”。这个决议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在昨天的第二国际权威、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名流中，无论是海德门或盖得，无论是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都不敢向自己的读者提起这个决议，他们不是对决议只字不提，就是引用（象考茨基那样）其中次要的地方，

而回避整个重要的内容；单是这个事实，就不能不叫做背叛。起先通过最“左的”最革命的决议，然后极无耻地忘记或抛弃这些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破产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同时也最明显地证明：只有那些无比幼稚而又异想天开地要使以往的虚伪流传百世的人，才能相信单用一些决议就可以“纠正”社会主义，“矫正它的路线”。

可以说就在昨天，当海德门在战前转到维护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有“正派的”社会党人都称他为疯疯癫癫的怪人，并且没有一个人不是用不屑的口气来谈论他。可是现在，各国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都完全滚到海德门的立场上去了，所不同的只是色彩的浓淡和温度的高低而已。因此，对于象《我们的言论报》²⁸⁶的作家之类的人，我们决不能用一些文雅的词句来估计和评价他们的公民勇气，因为他们用轻蔑的笔调描写海德门“先生”，又用恭维的（或谄媚的？）态度谈论——或只字不提——考茨基“同志”。难道能把这种态度同尊重社会主义以及尊重自己一般信念的态度调和起来吗？既然你们肯定海德门的沙文主义的虚伪性和危险性，那末难道就不应该批评和攻击为这种观点辩护的更有威望、更加有害的考茨基吗？

最近，盖得分子沙尔·仲马在《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和平》的小册子里，几乎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盖得的观点。这位“茹尔·盖得办公室主任”（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他是这样署名的），自然只能本着爱国主义精神来“引用”社会党人过去的声明（象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在其最近那本谈论保卫祖国的小册子中引用这类声明一样），而不引用巴塞尔宣言！普列汉诺夫对于这个宣言也是只字不提，而洋洋自得地谈论沙文主义的庸俗观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引用巴塞尔宣言时，抛弃了其中所有革命的地方

(即全部重要内容!),——大概是借口书报检查机关不许可吧……警察和军事当局通过书报检查来禁止谈论阶级斗争和革命,倒“正好”帮了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忙!

但是,巴塞尔宣言也许真是一个空洞的宣言,其中丝毫没有涉及当前具体战争的确切的历史内容和策略内容吧?

完全相反。巴塞尔决议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巴塞尔决议谈的正是这场已经爆发了的战争,正是1914—1915年爆发的帝国主义之间的这些冲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争夺巴尔干的冲突,奥地利和意大利争夺阿尔巴尼亚等地的冲突,英国和德国争夺市场和一般殖民地的冲突,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争夺阿尔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冲突,——这就是巴塞尔决议在预见到目前这场战争时所谈的事实。巴塞尔决议正是在谈到目前“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时指出,这场战争“是绝对不能以人民利益为借口来辩护的!”

就拿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这两个最典型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用俄文写作,另一个的著作被取消派¹³²译成俄文)、有威望的社会党人来看,现在他们(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帮助下)为战争寻找各种“人民的〈或确切些说,从资产阶级野鸡报上抄来的、平民的〉辩护”,他们装出博学的样子,拿出大量假的马克思引文,引证1813年和1870年的战争(普列汉诺夫)或1854—1871年、1876—1877年、1897年的战争(考茨基)的“实例”,——老实说,只有毫无社会主义信念、毫无社会主义良心的人,才会看了这种论据“信以为真”,才能不把它们称为空前的诡辩、虚伪和对社会主义的糟蹋!让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因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的新杂志(《国际》²⁶⁷)正确地估计了考茨基而去咒骂吧,让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海德门之流在“三个协约国”²⁶⁸警察的帮助下也去攻击自

己的对手吧，——我们只用翻印巴塞尔宣言来回答他们，这个宣言会揭穿这些领袖们的转变，这种转变不能叫别的，只能叫做叛变。

巴塞尔决议所谈的不是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甚至在 1789—1871 年期间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即人民战争，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拒绝过的那种革命战争，而是现在的战争，即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的基础上，在两个交战国集团即奥德和英法俄集团的“侵略政策”的基础上发生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简直是在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谎言，竭力想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防御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防御的）战争，并从历史上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实例中寻找为这场战争辩护的根据。

关于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早已越出纯理论问题的范围了。帝国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根据其其特征已被断定为垂死的、衰老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为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的斗争；这些结论不仅在各国社会党人为数众多的书刊上千万遍地重复过；不仅是我们的“盟国”的代表法国人德勒季在《行将到来的战争》（1911 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里通俗地解释过，说这次战争从法国资产阶级方面看也带有掠夺性。不仅如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巴塞尔也曾一致正式地声明，肯定认为行将到来的战争正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由此作出了策略上的结论。因此，说什么民族策略和国际策略的区别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参看《我们的言论报》第八十七号和第九十号上阿克雪里罗得最近的谈话）等等借口都是诡辩，应该是一下子就能驳倒的。其所以是诡辩，因为对帝国主义作全面的科学的研究是一回事（这种研究还刚开始，实质上它也和一般的科学一样，是无止境的），社会党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基础却是另一回事

(这些策略基础已经在社会民主党数百万份报纸上和国际的决议中阐明了)。社会党不是辩论的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当几营的队伍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叫他们叛徒,骂他们叛徒,而决不要“轻信”这样的花言巧语,即说什么对帝国主义“各有各的”了解,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库诺夫就能够写出这方面的大本著作,问题还“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等等。资本主义的一切掠夺表现及其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问题,是永远也研究不完的;在个别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问们)是永远会争论不休的。“根据这一点”而拒绝同资本主义作社会主义的斗争,不把自己同背叛这个斗争的人对立起来,那是可笑的,——但是考茨基、库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向我们推荐的难道不正是这种东西吗?

在战争爆发后的今天,甚至还没有一个人想来分析分析巴塞尔决议,证明它是不对的!

二

但是,也许真诚的社会党人预见到战争会造成革命形势,所以赞成巴塞尔决议,可是后来事变把他们否定了,革命也不可能了,是吗?

库诺夫(在《党破产了吗?》这本小册子和许多论文中)正是企图用这种诡辩来替自己转向资产阶级阵营的行为作辩护的,而且我们看到,以考茨基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有这类“论据”的暗示。库诺夫议论说,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而死抱住幻想不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这个司徒卢威主义者¹⁷¹连一

句话也没有提到所有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的人的“幻想”，却装作一个非常高雅的人，尽量把事情都推到潘涅库克和拉狄克这类极左派的人的身上！

现在我们就从本质上来研究一下关于巴塞尔宣言的作者曾真心诚意地预期革命的来临，但事变却否定了他们的那个论据吧。巴塞尔宣言说：（1）战争将造成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2）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犯罪，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各国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进行的一种互相枪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引起工人的“不满和愤怒”；（3）社会党人必须利用上述危机和上述工人的心情来“激励人民并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4）“各国政府”——毫无例外——要开始战争，就不会“没有自身的危险”；（5）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6）各国政府“应当回忆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1905年的革命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的思想，这里并没有保证说革命必将发生；这里是着重指出要正确估计事实和趋势。谁在谈到这种思想和议论时说期待革命的到来已成幻想，谁就暴露了他对待革命的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司徒卢威主义的，是警察式和叛徒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那我们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

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她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按照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总起来说就叫做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和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有过；而这种形势在德国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俄国1859—1861年、1879—1880年也曾有过，虽然那时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

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就是这样，这种观点已屡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已经特别明显地为1905年的经验所证明了。试问，1912年巴塞尔宣言在这方面所预料的是什么，在1914—1915年到来的又是什么？

所预料的是革命形势，这个形势以“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这句话简略地表达出来。这个革命形势是否到来了呢？无疑是到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连施（他在维护沙文主义方面要比库诺夫、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这些伪君子表现得更直率，更露骨，更真诚）甚至这样说：“我们正经历着一种特殊的革命”（他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战争》1915年柏林版第6页）。政治危机是存在的：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正象比利时政府被逐出一样）等危险。所有的政府都生活在火山，个个都求助于群众的自动

性和英雄精神。欧洲的政治制度已整个地被震撼了，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点的）一个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吧。考茨基在宣战两个月之后（1914年10月2日在《新时代》²⁴上）写道，“政府从来没有象战争开始时那样强大，政党从来没有象战争开始时那样软弱”，这就是考茨基为了讨好休特古姆之流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历史科学的范例之一。政府从来没有象战时那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的一致支持，那样需要被压迫阶级“驯服地”服从这种统治，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在战争开始时”，特别是在预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国家内，政府仿佛具有无限威力，那末任何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把对革命形势的期待完全同战争“开始”时期联系起来，尤其没有把“仿佛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同等看待。

至于说欧洲大战是残酷无比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看到和承认的事情。战争的经验越来越证明这一点。战争正在扩大。欧洲的政治基础已日益动摇。群众的贫困状况是骇人听闻的，政府、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极力想隐瞒这种贫困的作法，也越来越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心的愤懑，愚昧的阶层对于美好的（“民主的”）和平的模糊期望，“下层”中开始发出的怨言——这一切都是存在的。而战争愈是拖延和剧烈，政府就愈会激发并且一定会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作过分紧张的努力和自我牺牲。战争的考验，也象历史上各种危机、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灾难和各种变革的考验一样，可以使一些人变得迟钝和消沉，但同时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一般说来，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除某个国家衰落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为多。

和约的缔结不仅不能“立刻”中止所有这一切灾难和整个矛盾

的尖锐化，相反地，在许多方面却使最落后的人民群众更加深切地感到和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些灾难。

总之，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是存在的。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证实了。如果象库诺夫、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那样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这个真理或者不谈这个真理，那就是撒弥天大谎，欺骗工人，替资产阶级效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²⁸⁹（第34、40、41号）上，我们曾引用一些材料来表明，那些害怕革命的人，即基督教的市侩牧师、总参谋部、富豪们的报纸，都不得不肯定欧洲革命形势的征象是存在的。^①

这种形势要持续多久，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点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说明这点。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幻想”，也谈不到什么打破幻想，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保证说，正是目前的（而不是以后的）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将来的）革命形势要产生革命。这里所指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最基本的任务：即必须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解释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进而采取革命行动，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任何一个有威望的和负责的社会党人无论何时都没有敢怀疑过社会党的任务就是这样；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任何“幻想”，它恰好在谈到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时说道：激励、“发动”人民（而不是象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那样以沙文主义来麻痹人民），“利用”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以巴黎公社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73—74、158—159、170—171页。——编者注

和 1905 年 10—12 月的实例作为指南。目前的政党不去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表明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表明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表明它们已经投向资产阶级。

三

但是，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代表和领袖怎么会背叛社会主义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我们先研究一下“在理论上”替这种背叛行为作辩护的企图。我们不妨说明一下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理论的特征。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细”得多，看起来在理论上无比严谨）可以算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祸首”论大概是最鄙陋的理论。人家侵犯了我们，我们起来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反击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刊物和黄色刊物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见解，普列汉诺夫这位著作家也非要狡猾地用“辩证法”来粉饰一番不可，说什么为了估计具体形势，首先需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 年巴黎版；另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²⁹⁰ 第 86 号和第 87 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创了新纪录。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抓住

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的一句话：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屡次揭穿沙皇对加里西亚、阿尔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哪怕是最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他也一点不打算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绩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正是目前交战列强集团双方政策的主要轴心①。

- ① 甚至不惜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莱斯佛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14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1914年3月!)是很有教益的。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已经解决了(第35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36页)是巴格达铁路，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可注意的事件”之一，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反对凯约(1911年和1913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撕毁了这种协议(第38—40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将资本输到较弱的国家中去(第74页)。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1899年是九千万至一亿英镑(吉芬)，在1909年是一亿四千万英镑(派施)，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乔治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二亿英镑，几乎达二十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觅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质(第85—87页)。一小撮人从扩军备战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和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人民(第93页)。和平主义者今天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赖军火商的政党的党员(第161页)。如果三个协约国将来比较强大，它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斯，而三个同盟国则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167页)。伦敦和巴黎在1906年3月给了俄国数十亿巨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解放运动(第225—228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229页)。俄国已经燃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230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吗？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反复过一千次的吗？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可是，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却创造出一种关于德国的过错的理论，而考茨基则创造出一种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途”的理论。在上述这些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这些理论是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于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呵！

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歪曲了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①，他的思想受胎于黑格尔。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普列汉诺夫笨拙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较为精细的、迁就调和而又花言巧语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投靠“本国”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同我国交战国家的社会党人）有这种权利……（见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和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这种绝妙的议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个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请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为这种行为作辩护；为了“保卫祖国”而让法国工人向德国工人开枪，让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开枪！

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议论的理论前提，那末我们看到的正是克劳塞维茨大约在八十年以前所嘲笑的那个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的历史上所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势就会产生！只有“纯粹的”

^①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Karl 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谁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各国政府间和各个民族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这样想，似乎战争一开始，这种关系就会中断，并且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己特殊规律支配的形势。我们的论断恰恰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通过另一种手段干预的继续。”

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纯粹的”反击！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家分裂和镇压工人阶级的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立刻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写的正是这种“政治”。

这两个社会沙文主义头子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普列汉诺夫提起1813年普鲁士和1870年德国的民族战争，考茨基则装做博学的样子证明说，马克思研究过关于1854—1855年、1859年、1870—1871年的战争中哪方面（即哪个资产阶级）胜利更为有利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也研究过关于1876—1877年和1897年战争的同样的问题。一切诡辩家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他们所指的以前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多年来的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那时，除了某个资产阶级获胜更为有利这个问题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预先号召各国人民进行这类战争，燃起民族的仇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和1848年以后曾经号召各国人民去同俄国作战一样，正如恩格斯在1859年燃起德国人对他们的压迫者拿破仑第三和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仇恨一样。^①

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

^① 顺便说一下，加尔迭宁先生在《生活报》²⁹¹上说，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拥护用革命战争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表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⁴⁶的机会主义（或——更正确些说，和——轻率浮夸）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拥护

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这就象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等“资产阶级代表”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等“资产阶级代表”拿来对比一样。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如果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不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做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帝国主义者在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另外还有一个社会沙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国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国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理论的，在我们这里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人那里有连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笨拙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连施；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夫，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细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我们不必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种笨拙的理论。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二十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

反对反革命民族的革命战争的。举例来说，如果社会主义于1920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我们也罢），那我们就要拥护那个向它们进行的攻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达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吗？您真是罗普申²⁹²一类的革命家！

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外衣来贯彻自己观点和希望的这种“手法”。最近的事变特别鲜明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柔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用拥抱手段，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来扼杀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一般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应当密切注意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既多，形式也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点：（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的发展，支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种“改造”，把它改成适合于庇护对机会主义作的各种让步。（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脏物的很小一部分，无疑会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及其官僚分子的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醉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替他们联合“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作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研究第二国

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四

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一种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论。下面就是作者本人对这个理论所作的最明白、最确切、最新颖的说明：

“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削弱，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军的要求，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迅速缩减，以及各种金融资本集团的国际交错日益加强——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第5期第144页）

……“目前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可能在这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它可能使金融资本家间的民族仇恨达到极点，使扩张军备和在这方面占上风的愿望加强起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必不可免，从而完全摧毁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预见，一定会实现到惊人的程度，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道德上的衰落（直译是“没落，Abwirtschaftung”，破产）定会增强起来……应当指出，考茨基用这种华丽辞藻所指的不过是“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对于资本主义的“仇视”而已）……但战争也可能有另一种结局。它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请注意这一点！）可能加速在和平时期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如果事情弄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地步，那末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德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新的阶段自然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新的灾难”，“也许是更大的灾难”，但是“超帝国主义”“暂时”“可能在资本主义领域中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第145页）。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替社会沙文主义作辩护的根据呢？

他用了一个对“理论家”来说是相当奇怪的办法：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使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过渡到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很粗鲁地说：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考茨基扮演“中派”的角色在两者之间进行调解：

他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本小册子（1915年纽伦堡版）中写道，“极左派”想把社会主义同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就是说，“不仅想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半世纪以来就是把这种宣传同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对立起来的），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是很激进的，然而只能把那些不相信能立刻在实际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推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第17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考茨基在谈到立刻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实现”的是一种伪造，借口在德国，特别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考茨基清楚知道，左派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决不是要求“立刻在实际上实现社会主义”。

左派根据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得出革命行动必然性的结论。考茨基用“超帝国主义论”替机会主义者作辩护，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机会主义者根本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无非是“不相信”立刻能实现社会主义，期待着在我们面前“有可能”出现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这种“理论”可归结为而且也只能归结为如下一点，即考茨基拿着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替机会主义者和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目

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作辩护!

请注意,考茨基这里不仅没有说,新阶段能够而且应当从某种情况和某种条件下产生出来,恰恰相反,他直截了当地说:连新阶段“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我也还不能断定。这倒也是真的,你们不妨看看考茨基所指出的那些新纪元的“趋势”吧。奇怪的是,作者竟把“裁军的要求”也看做是经济方面的事实!这就是说,他想在天真的市侩言谈和幻想的掩护下回避那些同矛盾和缓论丝毫不能相容的确凿事实。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几个字完全没有表达出作者所要说的意思)是表明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他告诉我们说:“英国和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削弱了。”但这里究竟有没有哪怕是一点点新纪元的趋势呢?走到极端的美国保护关税制是削弱了,但保护关税制却仍然存在,正象对英国有利的英国殖民地的特权即优惠税率仍然存在一样。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现代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处未被占据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某一整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发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呢?即使是考茨基恐怕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并且破坏了它的基础,而地球的瓜分又迫使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果认为两国的保护关税制的削弱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那就可笑了。

其次是几年来两国资本输出的减少问题。例如根据 1912 年哈尔姆斯的统计,这两个国家,即法国和德国,每一国在国外的资本约有三百五十亿马克(约一百七十亿卢布),而英国一国就要比它们多一倍以上^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加从来就不是平衡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谈到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例如由于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敢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国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

至于“金融资本集团的国际交错的日益加强”,这不是几年来的也不是两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世界整个资本主义唯一真正普遍的无疑的趋势。但是为什么从这里就应当产生裁军的要求,而不是象迄今为止那样产生扩张军备的要求呢?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炮”(和一般生产军用品的)公司为例。就拿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吧。不久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²⁹³(1915年5月1日)报道说,该公司的利润从1905—1906年的六十万零六千英镑(约六百万卢布)提高到1913年的八十五万六千英镑和1914年的九十四万英镑(九百万卢布)。这里金融资本的交错甚为密切,并且在日益增强;德国资本家“参与了”英国公司的事务;英国公司替奥地利制造潜水艇等等。国际上交错的资本在扩张军备和战争方面正干着得意的买卖。要想从各国资本联合和交错成统一国际整体的事实中,得出裁军的经济趋势的结论,就等于用

^① 见伯恩哈特·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Bernhard Harms,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 1912年耶拿版。乔治·派施《大不列颠在殖民地的投资》(George Patsh,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in Colonies etc.»), 载于《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 Soc.») 1910—1911年第74卷第167页。劳合-乔治在1915年初的一次演说中,认为英国在国外的资本是四十亿英镑,即等于八百亿马克。

小市民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愿望来代替阶级矛盾的真正尖锐化。

五

考茨基完全本着庸人的精神来谈战争的“教训”，他把这些教训看作是对战争灾难的一种精神恐惧。例如，他在《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毋庸置疑，也无须证明，真正关心世界和平及裁军的阶层是存在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那些会比他们从战争和扩张军备中所遭受的损害更大的利益，来使他们倾心于帝国主义。”（第21页）

这是在1915年2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投靠帝国主义，而考茨基却象个套中人²⁰⁴，很悠然自得地用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他们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到处都同他们的行动相违背。这正象不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以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因为资产阶级的牧师老是赌咒发誓说，现制度是充满着基督教理想的。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把它的一切内容都取消，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唯灵论的意义的“利益”两字，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普遍福利的天真愿望。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

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恶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对于金融资本的屈从和五六个“强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对世界的瓜分。列强瓜分世界就是表明,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乐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乐于压迫其他民族,享受那些因自己属于“强国”、属于压迫民族而得到的收入较多的肥缺和特权。^①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稳步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来到。金融资本正在排挤这样的国家,并且一定会把它挤出强国的行列,夺取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象对英国作战的德国所采取的威胁行动一样),夺取小资产阶级手中的“强国的”特权和附带的收入。这是已由战争证明了的事实。这是早已公认了的、连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中也承认了的那种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当争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劝导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军才是好事。这样做和这样做的结果完全象基督教的牧师从讲台上劝导资本家

^① 恩·舒尔采报道说,到1915年全世界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家的和市政的公债、契约和工商业公司的股票等等在内)总值是七千三百二十亿法郎。在这个数目中,英国占一千三百亿法郎,美国占一千一百五十亿法郎,法国占一千亿法郎,德国占七百五十亿法郎,——因而这四个强国共占四千二百亿法郎,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超越其他各国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的先进的强国,获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和特权(恩斯特·舒尔采博士《在俄国的法国资本》(Dr. Ernst Schultze, «Das französische Kapital in Russland»), 载于1915年柏林出版的《金融文汇》(«Finanz-Archiv»)第32年卷第127页)。“保卫祖国”,保卫强大民族的祖国,就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大家知道,在俄国,资本帝国主义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的。

说，博爱上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所向，是文明的道德规范。考茨基称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劝告。

要谈资本输出吗？可是，输出到独立国家（如美国）去的资本，要比输出到殖民地去的资本多得多。要谈侵占殖民地吗？可是，殖民地已被侵占干净而且几乎都在追求解放了：“印度可能不再是英国的领地，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帝国，将永远不会为外国所统治。”（上面引的小册子，第49页）“无论哪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想要攫夺殖民地帝国而使自己在获取原料方面不再依赖外国，都一定会使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把它卷入长期的、消耗的战争中，不使它接近自己的目的。这个政策肯定会导致国家整个经济生活的破产。”（第72—73页）

这难道不是象庸人那样规劝金融家放弃帝国主义吗？用破产来恐吓资本家，就等于劝交易所经纪人不要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倾家荡产的”。资本是从同它竞争的资本家和同它竞争的民族的破产中获得赢利，并日益积聚起来的，因此，经济竞争——即在经济上促使对方破产——愈是尖锐和“紧张”，资本家就愈想采取军事行动来使竞争者破产。象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土耳其）那样有利于投资的国家（因为金融家投资于这些国家，比投资于自由的、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如美国，可以多获两倍的利润）剩下的愈少，则征服和瓜分土耳其、中国等的斗争就愈加剧烈。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考茨基却把这一切都变为庸俗的市侩“道德”：说用不着大发脾气，尤其用不着为瓜分土耳其或掠夺印度而开火，因为“反正是不会长久的”，倒不如和平地来发展资本主义……自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市

场，那就更好了，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本着这种精神来劝导金融家，是牧师布道的最适当的题目……好心的考茨基几乎完全说服了和劝住了德国金融家：用不着同英国争夺殖民地，因为这些殖民地反正很快就要解放了！……

英国对埃及的输出和输入，从1872年到1912年比英国总的输出和输入增长得慢。“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道德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埃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第72页）。“资本扩张的愿望”“最好能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来实现”（第70页）。

这是多么严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呀！考茨基出色地“修正了”这段不合理的历史，并“证明”说，英国人完全不必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埃及，而德国金融家也根本不值得发动战争、组织土耳其远征和采取其他的措施来把英国人撵出埃及！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误会而已，英国人还没有想到，“最好”不对埃及采用暴力，而改用（照考茨基的意见是为了扩大资本的输出！）“和平的民主”的办法……

“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认为，自由贸易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矛盾，当然，那只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是自由贸易，无论是民主制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但是，我们在各方面都希望，消灭这些矛盾时采用那种使劳动群众少受痛苦和牺牲的斗争形式”（第73页）……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叫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条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祈求上帝怜悯。”²⁹⁵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牧师劝导资本家采用和平的民主的办法，并且说这

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那末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虽然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维护宗教的人都说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很公正地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性，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1909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这是谁都没有反驳过而且也无法反驳的），承认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新的“革命时期”即将到来。他说，不可能有“过早的”革命，并且说，虽然在斗争以前不能否认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是不承认起义有胜利的可能，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

战争来到了。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群众的苦难深重了。战争在拖延下去，战场在日益扩大。考茨基正在一本又一本地写他的小册子，驯服地听从书报检查官的吩咐，在小册子中不引用掠夺领土和战争惨象的材料，不引用军火商获得惊人利润、物价高涨、应征入伍的工人遭受“军事奴役”等等的材料，却一味安慰无产阶

级，用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和进步的那个时候的战争，即用“马克思本人”希望某个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那个时候的战争作为例子来安慰他们，举出一大堆的数字来证明资本主义不要殖民地，不要掠夺，不要战争和扩张军备是“可能”存在的，证明“和平的民主”是最好的东西，并以此来安慰无产阶级。考茨基不敢否认群众苦难的加剧和目前革命形势的真正到来（这一点谈不得呀！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于是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献媚，描绘一幅在新阶段中会出现“少受牺牲和痛苦”的那种斗争形式的“远景”（远景“能否实现”他不担保）……因此，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称考茨基为娼妓（Mädchen für alle）是完全正确的。

* * *

1905年8月，俄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沙皇为了“安慰”愤怒的群众答应召开布里根杜马¹²²。如果说可以把金融家放弃扩张军备和彼此间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这种行动叫做“超帝国主义”，那末布里根立法的谘议制度也就可以叫做“超专制制度”了。我们暂且假定，“交错”在几百个大企业中的几百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家，明天会答应各国人民在战后裁军（我们暂时作这种假定，是为了彻底研究一下从考茨基的笨拙理论中所得出的那些政治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也是直接背叛无产阶级的，因为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远景都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更高利钱的债款等的灿烂远景，而且还分裂和腐化无产阶级，因而给资本家阶级带来更大的政治利益。考茨基正在帮助进行这种腐化工作，他为了同“本”国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之流实行统一而祝

祷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这种国际分裂！可是竟有人还不了解旧政党统一的口号就是要一国的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统一”，就是要各国无产阶级分裂……

六

当上面这段文章写完时，5月28日出版了一期《新时代》（第9期），考茨基在上面发表了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破产”的总结性的议论（他驳斥库诺夫的第七节）。考茨基把维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切旧的和一个新的诡辩归纳起来，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非常荒谬的是：似乎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不是选择帝国主义就是选择社会主义，似乎德国、法国以及英国（从许多方面来说是这样的）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不加思考，听了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新诡辩和对工人的新欺骗就是：你们看，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

在现时的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是极端动摇的，这位党的领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避巴塞尔和开姆尼斯代表大会的明确的正式的声明，就象小偷避开他刚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中曾经断言，战争“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性的”（第64页）。现在加上了一个新的声明：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请问，那是什么性质的呢？

原来战争还带有民族的性质！考茨基借助“普列汉诺夫式的”那种所谓辩证法说出了下面这种令人惊奇的话：

“现时的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是俄国革命的产物。”考茨基

还在1904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一定会强烈地燃烧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那时波兰问题也将成为尖锐的问题……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把目前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瓦解”（后一段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1904年的文章中引来的）……“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现时的战争中潮水般涌现出来的，它们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趋势”（第273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又是一个糟蹋马克思主义的例子！因为“民主的俄国”会燃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现在这场不能解放任何一个民族，而到头来总是奴役许多民族的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意味着奥地利的瓦解（由于它的民族结构的不民主），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制度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现时的战争”不带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神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受压制的农民，所以科学人士，即“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依据下述“公式”来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趋势，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

辩证法正在变成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在这次战争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党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指出过^①）。只有在塞尔维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7页。——编者注

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个运动的“继续”就是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末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这就是从这次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替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做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的民族因素对全欧的战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胜利，它就会灭亡比利时以及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胜利，它就会灭亡加里西亚、波兰的一部分以及阿尔明尼亚等等。如果“胜负不分”，那末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目前战争的百分之左右的一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民族而不能解放民族的垂死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个协约国要是“解放”塞尔维亚，那就会把塞尔维亚的自由出卖给意大利帝国主义，来答谢它帮助掠夺奥地利的功劳。

这一切是大家都知道的，而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却无耻地加以歪曲。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

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人，那就是愚蠢透顶的学究或滑头的骗子。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考茨基在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因为他说，“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民族问题，而对于统治阶级说来则是“帝国主义的趋势”（第 273 页），同时又似乎辩证地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第 274 页）来“证明”这个论据。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时也不可置疑，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现实中有两条根本的主流：战争的客观内容就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也就是“强国”的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上”占优势的思想体系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一再重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似乎“左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在战争到来时”不是选择帝国主义就是选择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已经分析了。这是无耻的欺骗伎俩，因为考茨基明明知道，左派所提出的是另外的抉择：或者使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或者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也知道，只有书报检查机关才会保护他，不让德国的“左派”揭穿他那些为了替休特古姆之流效劳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群众”和“一小撮议员”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这里提出一个陈腐不堪的反驳意见：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替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定，象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社会主义呢？我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示罗莎·卢森堡和弗·梅林办的《国际》杂志，因为这个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它的中央（即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表示应有的蔑视），——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四百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一起向右转，直接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说这是符合事实的，那末这当然不仅证明我党的悲惨的破产，而且也证明**群众**的破产（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软绵绵的绵羊，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274页）

在政治上和科学上很有威望的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可怜的遁词把自己给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或者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出息，正因为这样，所以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战友在《国际》杂志上责骂考茨基之流是最卑鄙的人物，是唯一正确的。

你们只要想一想：当初能够比较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直接被逮捕法办，不会有被枪毙的直接威胁）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只有“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投反对票——就是在俄国也不至于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也不会被逮捕），一小撮官吏以及记者等人。现在，考茨基很清高地把这个社会阶层的叛变和没有气节的行为推在群众身上，可是多年来数十次写文章谈论这个阶层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位考茨基呀！一般科学研究的，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规则，要求作家考察社会主义的两个流派（即谈论和高喊叛变并敲起警钟的那一流派，以及看不到叛变的那一流派）现在的斗争同过去数十年的斗争的关系。考茨基对于这点也只字不提，甚至不想提出流派和思潮的问题。过去有过的一些思潮，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留下的仅仅是奴隶成性的人所永远夸耀的“权威”的大名。在这里，互相引证，并以狼狈为奸的

原则互相包庇“罪过”，是特别方便的事情。尔·马尔托夫在伯尔尼的一次讲演会上惊叹地说：请问，象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机会主义的呢！（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上）写道：指责象盖得这样一些人是机会主义者，应当格外谨慎。考茨基也在柏林随声附和道：我不为自己辩护，但是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怎么会是……！杜鹃恭维雄鸡是因为雄鸡恭维了杜鹃。²⁹⁶

考茨基象奴仆一样献殷勤，简直要去吻海德门的手了，把他描绘成只是在前一天才投身到帝国主义那里去的。可是，就在那个《新时代》和全世界数十种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关于海德门的帝国主义却已经谈了许多年了！如果考茨基真的对他所举出的一些人物的政治履历感到兴趣，那他就应该回忆一下：在这些履历中有没有表明不是“一天功夫”而是十年来就准备好投向帝国主义的特征和事实，瓦扬当过饶勒斯派⁸的俘虏没有，普列汉诺夫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没有？在十分枯燥无味的、庸碌无能的、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独立立场的盖得派⁹的《社会主义》杂志²⁹⁷上，盖得的流派难道没有在众人眼前消失吗？在米勒兰主义⁷的问题上，在开始同伯恩施坦主义²⁹⁸作斗争的时候，以及在其他方面，考茨基（这是我们的补充，以供那些把考茨基同海德门及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这是十分正确的——的人作参考）难道没有表现出他毫无气节吗？

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兴趣以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领袖的履历。甚至也不想去分析：这些领袖现在用来庇护自己的是他们自己的论据呢，还是只重复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这些领袖的行为所以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威信呢，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威信的”并得到军事机关支持的思潮

即资产阶级思潮？考茨基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人士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提出所争论的问题和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①

……“四百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了”……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四百万，而是一百万，并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人们询问这一小撮人的意见，请他们投票表决；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询问。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拆散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做的。军事机关当时是存在的，它里面的领袖还没有叛变，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的忠告），要不就枪毙你。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等“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新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谬的话加在他们头上，硬说他们好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

^① 考茨基在援引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时，还有另一个特点。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象连施和哈尼施之流，正是援引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来替自己的政策辩护的。而他们是有权援引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这说的是实话。然而，考茨基带着轻蔑的口吻谈起连施和哈尼施这些投靠帝国主义的激进派。考茨基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不象那些税吏²⁹⁹，他不同意他们，他仍然是个革命者——别开玩笑！可是事实上，考茨基的立场同他们的立场是一样的。假仁假义的满嘴花言巧语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直率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连施和哈尼施更可恶得多。

争，“群众”就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造成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没有气节和叛变”。其实，这根本是胡说，那些编纂资产阶级和警察式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的人向来就是用这种胡说来“击败”革命者的，而考茨基现在却以此炫耀自己。考茨基的对手左派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历史危机和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不会有统一的意志；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关作斗争，是件困难的和长期的事情。当群众的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的时候，群众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替战争辩护，公开主张本国政府失败，整顿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刊物^①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考茨基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类似的行动），只是因为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直接公开地谈论这些罢了。于是，想千方百计替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望，使考茨基干出了极为卑鄙的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显然荒谬的话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至于被揭穿。

^① 顺便谈一下，在创办秘密刊物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刊以回答禁写有关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文章的命令。象《前进报》¹⁸²那样接受不写这类文章的条件，就是风膝和怯懦的表现。尔·马尔托夫说过，《前进报》由于接受了这种条件而在政治上死亡了，这句话是说对了的。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可以评论战争，而公开的工人刊物则不做这种评论，它不说谎，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

七

考茨基故意千方百计地避开一个科学上和政治上的重要问题，以博得机会主义者的无限欢心，这个问题就是：第二国际最著名的代表怎么会背叛社会主义呢？

显然，我们不能从叙述某些权威人士的个人传记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将来替他们做传记的人应当从这方面去研究问题，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现在所要求的完全不是这一点。现在要研究的是社会沙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条件、意义和力量。（1）社会沙文主义是从哪里来的？（2）什么东西给了它力量？（3）怎样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严肃的，而把目标转移到“个人”身上，实际上就是诡辩家的遁词和手腕。

要回答头一个问题，就应当研究一下：第一、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思想内容是否同社会主义中某种旧有的思潮有关系？第二、从实际的政治划分来看，社会党人现在分为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这种划分同历史上原先有的划分有什么关系？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在当前帝国主义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次战争中同“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联合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政治思想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础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个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它的一系列特别的因素和刺激附加到一般的因素和刺

激之中，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平庸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增多了，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投入这个阵营。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特别明朗化和更加具有强迫的性质。机会主义是数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的特征所产生的，在这个时期，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同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所具有的革命情绪，毫不相干了。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结局，因为这是强国争夺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的战争。保持和巩固自己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 and 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必然的继续，这就是现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① 自然，习惯的力量，由于比较“和平的”发展而产生的守旧思想，民族的偏见，对于情势急速变化的恐惧和怀

① 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者多么重视“强国的”和民族的特权对于分裂工人、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者卢卡斯在《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一书中，承认在现代的不列颠帝国中红种人没有充分的权利（第96—97页），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帝国中，当白种工人和红种工人一块儿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是同事的关系，白种工人倒象是红种工人的监工”（第98页）。——反社会民主党人帝国联盟的前任书记爱尔兰·别尔盖尔在《战后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版）这本小册子中，赞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认为他们应当成为“纯粹的工人的政党”（第43页），即“民族的”、“德国的工人的政党”（第45页），而不要有“国际主义的空想的”、“革命的思想”（第44页）。——德国帝国主义者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斯豪森在论述国外投资的著作中（1907年版），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民族福

疑，——所有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对机会主义所表现的虚伪而怯懦的调和态度（似乎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日益加强起来。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最高的阶段，增加了它的色彩的浓度和种类，扩大了它的信徒的队伍，用许多新的诡辩充实了它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小溪和支流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了，但主流并没有消灭，而是相反。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

不愿意看见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有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人，抓住个别情况和“意外事件”，就说某个机会主义者成了国际主义者，而某个激进分子则成了沙文主义者。但是，这一点在思潮发展的问题上其实并不是重要的论据。第一，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享受“本”国资本特权的残羹剩饭的少数上层分子，为了反对无产者群众即反对一般劳动者和被压迫群众而结成的联盟。第二，两种思潮的政治思想内容也完全相同。第三，一般说来，社

利”（第 438 页）——即掠夺殖民地——而赞扬英国工人的“现实主义”，例如，赞扬他们反对外来移民的斗争。——德国外交家吕多尔费尔在论述世界政治的基础的书中强调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的国际化丝毫也不能消除各国资本为争夺权势、争夺“大多数的股票”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第 161 页），而且指出，这个激烈斗争会把工人也卷进去（第 175 页）。该书于 1913 年 10 月出版，而作者已经很明白地说，“资本的利益”（第 157 页）是现代战争的起因。又说，“民族趋势”的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关键”（第 176 页），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示威游行（第 177 页），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色彩事实上越来越浓厚了（第 103、110、176 页）。如果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则国际社会主义就会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情感占上风，则社会主义就会失败（第 173—174 页）。

会党人在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这种旧划分,同现在分为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这种新划分是相适应的。

为要确信后面这个论点的正确,应当记住一个原则:在社会科学中(也象在一般科学中一样),所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事件。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法国和比利时等十个欧洲国家来说吧。在前八个国家中,社会党人的新划分(按是否拥护国际主义)和旧划分(按是否拥护机会主义)是相适应的;在德国,机会主义的堡垒《社会主义月刊》²²⁷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堡垒。国际主义的思想受到极左派的支持。在英国的英国社会党³⁰⁰内,国际主义者约占七分之三(根据最近的统计,赞成国际主义决议的有六十六票,反对的有八十四票),而在机会主义者联盟(即工党³⁰¹加上费边社分子³⁰²再加上独立工党⁹)中,国际主义者不到七分之一^①。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¹³¹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尤其嚣张,但是我们只要根据1910—1914年这五年的经验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工作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¹⁵⁷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1912年1月重新组织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

在意大利,比索拉蒂之流的纯粹机会主义的政党,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政党。国际主义的代表是工人党。工人群众都拥护这个

① 人们通常只拿一个“独立工党”来同“英国社会党”作比较。这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当只看重组织形式而忽略事情的本质。就拿日报来说吧,日报曾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社会党的报纸《每日公报》³⁰³,另一种是机会主义联盟的报纸《每日公民报》³⁰⁴。这两种日报都是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等实际工作的。

党，而机会主义者、议员、小资产者却拥护沙文主义。意大利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自由地进行了选择，选择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阶级地位的区别相适应的。

在荷兰，特鲁尔斯特拉的机会主义政党是对整个沙文主义采取调和态度的（不要被这样的话所欺骗，说什么荷兰的小资产者同大资产者一样，特别憎恨会最先“并吞”他们的德国）。以果特和潘涅库克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培养出了彻底的、忠诚的、热情的和自觉的国际主义者。在瑞典，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布兰亭，由于人们斥责德国社会党人为叛徒而大发雷霆，可是左派领袖霍格伦则宣称，在他的同道者中间，有些人正是这样看的（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在保加利亚，机会主义的敌人“紧密派”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新时代》³⁰⁵）上撰文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捣乱”。在瑞士，机会主义者格雷利希的同道者乐于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辩护（见他们的机关报——苏黎世的《民权报》³⁰⁶），而激进得多的罗·格里姆的同道者则把伯尔尼的报纸（《伯尔尼哨兵报》³⁰⁷）变成了德国左派的机关报。十个国家中只有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国家例外，然而就在这两个国家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也不是没有国际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部分是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力量太弱和受到压制；我们不要忘记，瓦扬自己在《人道报》³⁰⁸上也承认，他从自己读者那里收到了许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来信，但是这些信一封都没有全文登载过！

一般说来，一谈到思潮和流派，就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正式政党中机会主义派的力量，它表面的强大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考茨基是极善于提出历史问题的，特别是在谈到古罗马之类同实际

生活不太接近的事情时是极善于提出问题的，可是在现在，当事情涉及到他本人的时候，就装模作样起来，好象他并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事情是最明显不过的。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在我们俄国，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常常这样观察问题：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内一向就有而且将来还会有两个极端的派别存在；整个问题在于避免“极端”等等。一切庸人的大作上都是这样写的。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当有赫罗斯特拉特³⁰⁹名声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明显地昭示了这个社会的、阶级的真理的时候，许多好心肠的人都惊叹起来了。法国的社会党人²⁴⁰和普列汉诺夫开始指摘休特古姆，——可是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只要照一照镜子，那他们在镜子中看到的也正是休特古姆，只是民族容貌稍微不同罢了。赞扬考茨基而又为考茨基所赞扬的德国中央委员（“执行委员会”）也赶快谨慎地、谦虚地、有礼貌地声明（没有指明休特古姆）说，他们“不同意”休特古姆的路线。

这是很可笑的，因为事实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中，在紧急关头，一个休特古姆胜过一百个哈阿兹和考茨基（正如一个《我们的曙光》杂志胜过害怕同它分裂的布鲁塞尔联盟³¹⁰的各派思潮一样）。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休特古姆背后站着强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他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休特古姆的政策，而对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政策却用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监狱和枪毙来

制止。休特古姆的声音从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上发出去(正象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的声音一样),而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声音却不能在公开的报纸上听到,因为有战时书报检查机关呀!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这个事实的意义却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好想过的。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1889—1914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应当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可是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入秘密工作(要实行这种转变,非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以及各种军事计谋不可)。要阻挠这种转变,只要一个休特古姆就够了,因为从历史上和哲学上来说,整个“旧世界”都拥护休特古姆,——因为从实践上和政治上来说,休特古姆一向就把而且永远会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一切作战计划泄露给资产阶级的。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和别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只是做休特古姆所喜欢的事情,或休特古姆能够容忍的事情。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公开地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有正直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都是违背它的中央,绕过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进行的,都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的,都是用派别活动形式以匿名的新党新中央的名义进行的。今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上登载的德国“左派”的匿名宣言³¹¹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新党正在发展、巩固和组织起来,这是真正工人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列金、休特古姆、考茨基、哈阿兹、谢德曼之流的陈旧腐朽的民族自由主义的政党。^①

所以,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³¹²上无意

^① 最典型的是8月4日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投票前所发生的事件。正式的党用官扬式的谎言掩盖了这一事件,说大多数人已经决定,说大家一致投了赞成票。

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右倾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是有害的，因为那时工人会离开这个党。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联合右翼和左翼并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政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漂亮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使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在口头上，在人民、群众和工人面前，是社会主义和革命性；在事实上，却是休特古姆主义，即一切严重的危机关头投靠资产阶级。我们说一切危机，是因为不仅在战争爆发时，而且在每次严重的政治罢工发生时，无论是“封建的”德国，无论是“自由议会制的”英国或法国，都会立刻以各种名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和记忆健全的人都不会怀疑的。

上面提出的如何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由此就可以得到解答了。社会沙文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它在漫长的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很成熟、很巩固、很蛮横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定型了，同资产阶级和各届政府已经很接近了，因此不能再容忍这个流派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继续存在。假如在小城市的平坦的便道上行走时穿薄底软鞋还可以将就的话，那末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就非穿有铁钉的厚底鞋不可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了比较和平的和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

但是什特列别尔在《国际》杂志上揭穿了 this 谎言，说出了真情实况。在社会民主党党内有两派，他们都准备好了最后通牒，即派别性的、分裂性的决议。一派是机会主义者，约三十人，他们决定无论如何要投赞成票，另一派是左派，约十五人，他们决定（不太坚决）投反对票。当立场极不坚定的“中派”或“泥潭派”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投票时，左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就屈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完全是个假象，它掩盖着事实上必然向机会主义者的最后通牒屈服这一情况。

一刀两断，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洗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了。

当然，这样确定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新时代向社会主义提出的任务，还不能直接说明，在个别国家，工人的革命社会主义民主党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分离的过程究竟会快到何种程度，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但是从这里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政党的全部政策正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决定。1914—1915年的战争是个非常伟大的历史转变，因此对待机会主义的态度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变成尚未发生的事情；机会主义者在危机关头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事实既不能从工人的意识中，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经验以及现代的政治成果中抹掉。机会主义（如果从整个欧洲范围来看）在战前可以说是处于少年时代。它随着战争成长，完全长成大人了，再不能使它“天真烂漫”和返老还童了。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中某些分子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本国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而资产阶级也完全会器重它和“使用”它。既不能使历史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止不动，——能够而且应当做的，就是勇往直前，从预备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的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进到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危害，“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

由此可见，那些用怎样对待第二国际最显赫的权威人士——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问题，来模糊自己的意识和工人的意识的人，对事物的观察是多么不正确。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这些人不了解新的任务，那他们只好站在一边，或

者象现在那样去做机会主义者的俘虏。如果这些人从“俘虏”中解脱出来，未必就会遇到政治上的阻碍，妨碍他们回到革命阵营中来。想以个人的作用问题来代替各种思潮的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时代变更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是荒谬绝伦的。

八

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最重要的特征。在德国党内，这些组织曾是最有力量的，1914—1915年的战争在那里造成的转变最剧烈，提出的问题也最尖锐。很显然，要转入革命行动，警察就会来解散合法的组织，而旧党（从列金起到考茨基为止一无例外）就是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不管怎样否认，事实终究是事实。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³¹³，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

我们就拿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会领袖卡尔·列金所著的《工会的官员为什么应当更多地参加党内生活？》（1915年柏林版）这本小册子来说吧。这本小册子是作者在1915年1月27日工会运动官员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列金在他的报告中宣读了而且在小册子上也转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件，这个文件在其他场合下，是战时书报检查机关绝对不会放过的。这个所谓“尼德尔巴尼姆区（柏林近郊）报告人的资料”的文件，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的说明书，是他们对党的抗议书。文件中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也没有可能预见到下面一个因素：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已经站到进行战争的政府

方面去了，这全部力量已被用来摧残群众的革命毅力了。”（列金的小册子第34页）

这是绝对的真话。这文件中下面的一个论断也是真话：

“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投票表明：另一种观点，即便它已深入群众，那也只有不受经过考验的党的领导，只有反对党机关的意志，只有在克服党和工会的反抗的条件下，才能给自己开辟道路。”（同上）

这毫无疑问是实话。

“如果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那末组织的外形大概会被消灭，但精神还是会存在的，这种精神在实行非常法²⁷⁹期间曾经鼓舞了党并且帮助党克服了一切困难。”（同上）

列金在自己小册子中写道，他召集来听报告的那一伙“领袖们”，即所谓工会的领导人、官员，一听到上面这些话就哄堂大笑起来。关于在危机时期能够而且应当建立秘密的（象在实行非常法的条件下那样）革命组织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而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列金却拍拍胸脯嚷着说：

“这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破坏组织，让群众去解决问题。我毫不怀疑，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自命为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袖的资产阶级奴仆们齐声喊道：“对呀！”（同上，第37页）

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这些人竟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甚至不能理解必需有另一种组织即秘密组织来领导革命斗争的思想。他们竟至于认为，似乎得到警察许可而存在的合法组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似乎在危机时期保存这种组织作为领导机关完全是可能的！请看，这就是机会主义的生动的辩证法：合法组织的单纯发展，愚蠢而老实的庸人只会记流水账的普通习惯，使这些老实的市侩在危机关头成了叛徒、变节

者、群众革命毅力的摧残者。这可不是偶然的現象。向革命组织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局面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毅力的摧残者，越过旧政党并摧毁这个政党，才能做得到。

反革命的市侩自然会嚎叫“无政府主义！”，正如机会主义者爱·大卫申斥卡尔·李卜克内西时嚎叫“无政府主义”一样。大概在德国，只有那些被机会主义者骂成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才依然是忠实的社会党人……

就拿现代的军队来说吧。军队是组织的一个好范例。这种组织所以好，就因为它灵活，同时又能使千百万人服从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动员令一下，他们就会在指定地点集合。今天他们还蹲在战壕里，有时得蹲几个月，明天他们就会以别的队形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避开枪林弹雨创造出奇迹，明天他们又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上地雷，明天他们会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俄里。受同一意志所感召的千百万人，为了同一目标而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工具和武器，以适应改变着的形势和斗争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没有激发群众和提高他们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组织，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为了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死抓住安乐椅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剥夺了你的选票而交给你枪枝和最新式的速射炮，那你就把这些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听信那些害怕战争的多愁善感的颓丧者的话；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

火和刀枪来消灭的东西多着哩；如果群众的仇恨和绝望日益增长，如果有了革命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不用说，这不是容易的。它要求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要求付出重大的牺牲。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应当学会，可是不经错误和失败是学不会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方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正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蹲战壕的关系是一样的。这种斗争方式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提上日程的；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在数十年之内长久地留存。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斗争中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二十年。

……拿卡·考茨基同卡·列金对照一下吧。卡·考茨基写道：

“当党还年青的时候，一切反对战争的抗议，在宣传上都被看做是勇敢的行动……最近俄国和塞尔维亚同志的行动受到普遍的赞扬。党愈是强大，在它各项决议的动机中出于宣传的考虑和对实际效果的估计就愈是错综复杂，要给这两种动机以同等的地位也就愈加困难，而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因此，我们愈强大，在各种新的复杂形势下我们之间的分歧就愈容易发生。”（《国际主义和战争》第30页）

考茨基的这种议论同列金的议论所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显得非常虚伪和怯懦。考茨基事实上是支持和袒护列金之流背弃革命活动的卑鄙行为的，不过，他是偷偷摸摸干这种事情的，他不明确表示意见，仅仅作暗示，一方面向列金表示敬意，另一方面也向俄国人的革命行动表示恭维。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态度，我们俄国人只是在自由派中间才经常看到。自由派始终愿意称赞革命者的“勇敢”，但同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自重的革命者是不会接受考茨基的这种“敬意”的，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唾弃这种提问题的方法。当时如果没有革命的形

势，如果没有必要鼓吹革命行动，那末，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就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让列金和考茨基这样的勇士们拿出勇气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吧，让他们把这一点直率地谈出来吧。

如果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社会党人的策略是值得“赞扬”的，那末替德、法等国“强大的”政党的相反策略作辩护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罪行。考茨基故意用“实际效果”这个模糊不清的词句来掩盖这样一个简单真理，即这些实力很强的大政党都害怕政府解散它们的组织，夺取它们的经费，逮捕它们的领袖。这就是说，考茨基是用采取革命策略会收到不妙的“实际效果”这一理由，来替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的。难道这还不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吗？

据说，有一位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在柏林工人会议上说：不然我们就被逮捕了。而当时工人们大声回答他说：“咳，那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没有别的信号向德国和法国工人群众传达革命情绪和必须准备革命行动的思想，那末，一个议员因敢于讲话而被捕，就会成为在革命工作中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一个号召，而起着良好的作用。这种团结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站在上面、能看清全部政策的议员尤其要以身作则。

不仅在战时，而且无疑在任何政治形势尖锐化的情况下（更不用说群众起来采取某种革命行动的时刻了），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总是要用解散合法组织、夺取其经费和逮捕其领袖等诸如此类的“实际效果”来进行威胁的。遇到这种情况那该怎么办呢？是否象考茨基那样就根据这一点来替机会主义者辩护呢？要是这样，那无异于赞成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族自由主义工党。

对于社会党人，结论只能有一个：“欧洲”各政党的纯合法主义

即唯合法主义已经过时了，由于帝国主义以前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的基础。必需建立秘密基地、秘密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工作来弥补合法主义，而同时又不放弃任何一个合法的阵地。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只要意识到必须走这条路，那经验会告诉我们的。1912—1914年俄国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证明，这个任务是可以解决的。在法庭上比别人表现得更加坚定并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工人代表穆拉诺夫也清楚地表明，除内阁主义的⁷议会活动（从韩德逊、桑巴、王德威尔得到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他们也完完全全是“内阁主义的”，只是不让他们跨出奴仆呆的前厅！）外，还有非法的和革命的议会活动。让科索夫斯基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去赞扬或容忍奴才们的“欧洲式的”议会活动吧，而我们还是要坚持不懈地告诉工人说，象这样的合法主义，象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只该受到鄙视。

九

现在我们来作结论。

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惊人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斯图加特及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势、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民族自由主义工党的破产，仅仅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完成阶段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阶段的过渡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了并培植了机会主义。这个

时期，我们在欧洲一些国家（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现象，而这种分裂一般地说正是由机会主义引起的；我们在欧洲另一些国家（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中，看到各种思潮长期进行顽强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是由机会主义引起的。大战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俗套，割破了早已溃烂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此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同工人政党在组织上彻底地分开，已成为必需的了。帝国主义时代不容许在一个党内同时存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中享用“本”民族“大国”特权地位的残羹剩饭的半市侩式贵族。认为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政党中的“合法派别”的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欺骗和对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连串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权威考茨基，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比较忠诚、比较觉悟和比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不愤激地唾弃这个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烈拥护的“权威”。

无产阶级群众（旧领导层大概有十分之九的人已经离开他们而投靠了资产阶级）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的压迫下，显得非常分散而孤立无援。但是战争造成的日益扩大、日益深化的客观革命形势，必然会产生革命的情绪，锻炼和教育一切优秀的、最有觉悟的无产者。象俄国1905年初由“加邦请愿阴谋”¹²⁶引起的那种群众情绪的急速转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变得越来越肯定了。1905年初俄国在几个月甚至在几个星期里

就从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锻炼出一支跟着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走的百万大军。至于在这次战争之后不久或在战争期间是否会爆发强大的革命运动，那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怎么样，只有按照这个方向所进行的工作，才配称做是社会主义的工作。国内战争的口号是概括和指导这一工作的口号，是促使愿意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的那些人统一和团结起来的口号。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完全分裂，是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准备好了的。抹杀这段历史，宣称反对“派别活动”，因而使自己无法了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多年来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实际过程，这种人对工人运动起着最坏的影响。在参加现时战争的一切“大”国当中，只有俄国在最近经历了革命，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内容，在无产阶级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不能不在工人运动中引起资产阶级思潮同无产阶级思潮的分裂。在大约二十年（1894—1914年）的整个时期中，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一个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有着联系的组织了（而不象1883—1894年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潮而已），在这约二十年时期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1894—1902年这个时代的“经济主义”，无疑是属于后一类的思潮。它的思想体系的许多论据和特点（“司徒卢威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借口“群众”来替机会主义辩护等等）同目前被考茨基、库诺夫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把过去的《工人思想报》³¹⁴和《工人事业》杂志³¹⁵拿来同现在的考茨基作一比较，以提醒现在这一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这倒是件很有益的事情。

以后一个时期（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不仅在思想上

而且在组织上也是“经济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在俄国革命时期，它所奉行的策略，客观上是使无产阶级依赖于自由资产阶级，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倾向。再后一个时期（1908—1914年），孟什维主义思潮的主流产生了取消派，当时该思潮的这种阶级意义已经非常明显，就连孟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也不断地反对《我们的曙光》派的政策。而这一派是最近五六年来唯一在群众中进行系统工作来反对工人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派别；它终于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派！而且这种现象是发生在专制制度依然存在、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未完成、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还压迫着大多数“异”民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象某些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一小撮工人贵族能够“享有”“本”民族“大国”地位的特权的那种“欧洲”式的发展，在俄国也不能不出现。

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历史，已经使它们具备了一切条件来采取“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

附言：这篇文章排完字的时候，报上发表了考茨基、哈阿兹和伯恩斯坦的联名“宣言”。他们看到群众在左倾，于是现在决意同左派“调和”，当然，调和的代价是同休特古姆之流保持“和平”。真不愧为娼妓！

写于1915年5月下半月至6月上半月

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15年第1—2期合刊

署名：尼·列宁

按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3—236页

社会主义与战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初版(国外版)序言

战争进行了一年了。我们党在战争刚开始时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确定了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是在1914年9月拟定,1914年11月1日在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²⁸⁹第三十三号上发表的^①(事先曾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和我党在俄国的负责代表,并征得他们同意)。以后在第四十号(1915年3月29日)上又刊载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②,这些决议更准确地说明了我们的原则和策略。

目前俄国群众的革命情绪在显著地高涨。在其他国家里,虽然大多数投靠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革命情绪高涨的迹象。由于这种情况,非常需要出版一本总结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策略的小册子。现在趁重印党的上述全部文件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并尽量注意到文献中和党的会议中提出过的、涉及资产阶级策略和无产阶级策略的一切主要论据。

① 见本卷第568—574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6—142页。——编者注

第二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是在 1915 年夏天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³¹⁶ 召开前夕写成的。小册子还用德文和法文出版，并译成挪威文在挪威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上全文发表。小册子的德文版秘密运到德国的柏林、莱比锡、不来梅等城市，由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拥护者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派在当地秘密散发。法文版在巴黎秘密印刷，由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得派在当地散发。俄文版传到俄国的份数非常有限，因此在莫斯科，工人们就用手抄写。

现在我们把这本小册子作为一个文件全部再印出来。读者应该时刻记住，小册子是在 1915 年 8 月写成的。特别是在读到涉及俄国的地方时要记住这一点，因为俄国当时还是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

载于 1918 年版小册子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因此，必须研究当前这一战争的历史特点。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止，也就是从1789年起到1871年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

的战争成了各种战争类型中的一种。换句话说，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是这种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因此这种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切正直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社会党人，总是同情那些有助于推翻或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极端有害的基础的国家（即资产阶级），希望它们取得胜利。例如，在法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法国人掠夺过和侵占过他国领土，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些战争破坏和动摇了整个旧农奴制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掠夺过法国，但是这没有改变这个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战争把数千万德国人民从封建割据状况、从俄国沙皇和拿破仑第三这两个暴君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

1789—1871年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革命的回忆。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人谈到这个时代的“防御”战争的合理性时，一向指的就是这些归结为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农奴制度的革命的目的。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曾这样说过）。社会党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例如，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那末不管谁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们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假设一个拥有一百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另一个拥有二百个奴隶的奴隶主作战。显而易见，在这种场合运用“防御”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看是一种歪曲，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奴隶主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现代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多半曲解了这个概念，不是片面地运用这个概念，就是总寻找借口说这一战争可能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二十世纪才达到的。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这些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操纵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整个地球几乎都被这些“资本大王”瓜分完毕，他们或者占有殖民地，或者用金融剥削的无数绳索紧紧缠住其他国家。垄断、夺取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趋向代替了自由贸易和竞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由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各民族的最大压迫者。资本主义已由进步转为反动，它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类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要在许多年内、甚至在数十年内熬受各“大”国为勉强保存资本主义（通过侵占殖民地，实行垄断，建立特权，实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 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把所谓“大”国（即在大规模的掠夺中卓有成效者）瓜分世界的确实的材料列举如下：

各奴隶占有制“大”国瓜分世界的情况

各“大”国	殖民地				宗主国		共 计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六个“大”国…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不属于大国									
(而属于比									
利时、荷兰									
等等国家)									
的殖民地……			9.0	45.3			9.9	45.3	
三个“半殖民地”国家(土耳其、中国和波斯)							14.5	361.2	
							总计……	105.9	1367.1
其余各国……………							28.0	289.9	
全地球(两极地区除外)……………							133.9	1657.0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789—1871年期间多半领导过其他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民族，在今天，在1876年以后，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过度成熟”，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从1876年起到1914年止，六个“大”国掠

夺了二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掠夺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六个大国奴役着五亿以上（五亿二千三百万）的殖民地居民。各“大”国平均每四个人摊到“自己的”殖民地的五个居民。同时大家知道，殖民地是用火和剑夺取来的，殖民地居民受着虐待，他们遭到各式各样的剥削（如资本输出、租借、欺骗式贸易、强迫服从“统治”民族当局，以及其他等等）。英法资产阶级欺骗人民说，他们是为了各民族和比利时的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是为了保存他们抢得够多的殖民地而战。英国人和法国人只要把自己的殖民地“公平合理地”分给德帝国主义者一些，德帝国主义者立刻就会退出比利时等地。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取决于大陆上的战争。从资产阶级的正义和民族自由（即民族生存权）的观点看来，德国反对英国和法国无疑是对的，因为它殖民地“分得少”，它的敌人比它压迫着多得多的民族，而在它的盟友奥地利那里，被压迫的斯拉夫人享有的自由无疑比在沙皇俄国这个真正的“各族人民的监狱”里享有的自由更多。但是德国自己并不是为解放其他民族，而是为压迫其他民族作战的。社会党人决不应该帮助一个较年轻较强壮的强盗（德国）去抢劫一个较老的吃得过多的强盗。社会党人应当利用这些强盗间的斗争，以便把他们一齐打倒。为此，社会党人首先应当向人民说明真相，指出这场战争从三种意义上说是奴隶主为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这场战争是要通过更“公平地”瓜分殖民地和今后更“和睦地”剥削殖民地来巩固殖民地的奴隶制；第二、这场战争是“大”国要巩固对异族的压迫，因为无论奥地利或俄国（在俄国比在奥地利还要厉害得多和坏得多）都是专靠这种压迫来维持，都是用战争来加强这种压迫的；第三、这场战争是要巩固和延长雇佣奴隶制，因为无产阶级被分裂、受压制，而资本家则得到好处：发战争财，挑起民

族偏见，加强反动势力，目前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和共和制的国家里，这种反动势力都抬头了。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

(即暴力)“的继续”³¹⁷

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的战争，你们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实行的政治是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当前的战争正是这一政治的继续，也只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例如无论在奥地利或俄国，无论平时或战时的政治都是奴役各民族，而不是解放各民族。相反地，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一些附属国里，我们看到的政治却是亿万人民觉醒起来争取民族生存，是亿万人民要从反动“大”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现在仍然只能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在考察当前的战争时，只要把这一战争视为“大”国及其主要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就立刻可以看出，认为在当前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那完全是反历史的、虚伪的和骗人的。

比利时的例子

三个(现在是四个)协约国²⁸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俄国是普列汉诺夫之流)最爱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是反对他们的。德帝国主义者无耻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他们象只要需要

就践踏一切条约和义务的交战国随时随地所做的一样。假定一切愿意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都向德国宣战，要求德国退出比利时并赔偿它的损失。在这种场合，社会党人当然要同情德国的敌人。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三个(或四个)协约国”并不是为了比利时而进行战争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伪君子才会隐瞒这一点。英国抢劫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俄国抢劫加里西亚和土耳其，法国要夺取阿尔萨斯-洛林以至莱茵河左岸地区，同意大利签订了分赃条约(瓜分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谈了分赃生意。在各国现在的政府进行的当前战争的条件下，不帮助扼杀奥地利或土耳其等国，就不能帮助比利时！这跟“保卫祖国”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正是垂死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府为压迫其他民族而进行的战争的特点。谁为参加这个战争辩护，谁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永久存在。谁主张利用各政府现有的困难来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谁就是捍卫真正一切民族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的真正自由。

俄国为什么作战？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在俄国那样，国内的大多数居民是受压迫的。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即不到一半，而其他一切民族被当做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在俄国的一亿七千万居民中，有一亿左右的居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彻底扼杀乌克兰人的自由，夺取阿尔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等等。沙皇政府把战争看做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注意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

运动的手段。现在，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摊到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还力图通过战争扩大俄国所压迫的民族的数量，巩固对他们的压迫，以便破坏大俄罗斯人本身争取自由的斗争。压迫和掠夺其他民族的可能性加强了经济停滞，因为收入的来源不是依靠发展生产力，而往往是依靠对“异族人”进行半封建剥削。由此可见，俄国进行的战争是极端反动的和反自由的。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一思想中接着引出的结论就是，应当在战时放弃阶级斗争，应当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的是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事实上他们主张的并不是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的“保卫祖国”，而是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的“权利”。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说什么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民族自由和民族生存，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者为某一交战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或者象考茨基一样，认为一切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文主义既然事实上维护“本国”（或不不论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行，也就彻底背叛了一切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²³⁰的决议。

巴塞尔宣言

1912年在巴塞尔一致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宣言，正是指1914年爆发的英德两国及双方现在的盟国间进行的战争。宣言直截了当

地宣称，对于以列强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为基础、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各国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决不能用人民的利益来辩护。宣言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对各国政府”（无一例外）是危险的，指出各国政府都害怕“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明确地举出1871年的公社和1905年10—12月的例子，即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例子。这样，巴塞尔宣言就恰好为对付这次战争制定了在国际范围内各国工人对本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巴塞尔宣言重申斯图加特决议²²⁸的主张，认为社会党人在战争一旦爆发时，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是用资产阶级解放的观点替战争辩护，主张“保卫祖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等等，这个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如我们在下面看到的，它只是说明机会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在欧洲的大多数党内已经占了上风。

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为首）援引马克思对1870年的战争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连施、大卫之流）援引1891年恩格斯关于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时德国社会党人应当保卫祖国的声明；最后，那些想调和国际沙文主义并使之合法化的考茨基类型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援引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斥责战争，可是从1854—1855年到1870—1871年和1876—1877年，每当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那方。

这一切引证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象吉约姆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替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从德国方面看来，1870—1871年的战争在拿破仑第三失败以前，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曾一道压迫了德国许多年，支持了德国的封建割据。但是当战争一转到掠夺法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斥责德国人。而且在这个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个资产阶级进步的 and 民族解放的战争的评价用于评价现代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真理的嘲弄。至于1854—1855年的战争以及十九世纪的一切战争，更是如此，因为那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一切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恰恰没有巴塞尔宣言借以引伸出由于列强战争而应采取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那些条件。

谁现在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恰恰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垂死时代、针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2年，全世界社会党人在巴塞尔郑重宣告，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极反动的行为，它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爆发了，危机到来了。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而实行

反动的策略，站到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破产。我们应当弄清这种破产的原因，弄清社会沙文主义产生并具有力量的原因。

社会沙文主义是到了顶的机会主义

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期间，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都存在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引起分裂（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怀疑，机会主义代表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被压迫群众的利益。

十九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战争加速了发展进程，使机会主义变为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变为公开的联盟。同时军事当局到处实行戒严，压制工人群众，工人群众的旧的领袖几乎全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捍卫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异族、靠大国优越地位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的“权利”。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本国”政府渡

过难关，而不利用它的困难进行革命。只要对欧洲所有的国家作一总的考察，只要不是注重某些个别人物（哪怕最有威望的人物），就可以看出，恰恰是机会主义的思潮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支柱，而革命者阵营几乎在一切地方都不同程度地一贯对这种思潮提出抗议。如果以 1907 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派别划分为例，就可以看出，国际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在那时就已经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了。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本”民族的 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分裂国际革命工人阶级

在过去，在大战以前，机会主义虽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偏向”和“极端”，但它毕竟还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战争表明今后的情况不能这样了。机会主义已经“成熟”，已经彻底完成了在工人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特使的使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已成为十足的伪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例子。机会主义者在一切重要场合（例如 8 月 4 日的投票）都带着自己的最后通牒出现，依靠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工会理事会中的多数等等，来实现这种通牒。现在同机会主义者统一，事实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异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

尽管同许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有些场合还很困难，尽管把机会主义者清除出工人政党的过程在每个国家里各不相同，但是这个过程必将到来，必将富有成果。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在死亡；再生的社会主义正如法国社会党人²⁴⁰保尔·果雷正确地指出的，“将是革命的、不调和的和起义的”。

“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¹⁷¹或“布伦坦诺主义”³¹⁸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关于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考茨基主义”的这一根本骗局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荷兰，罗兰-霍斯特虽然否认保卫祖国的思想，但是坚持同机会主义政党统一。在俄国，托洛茨基虽然也否认这种思想，但是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我们的曙光》¹³¹派统一。在

罗马尼亚，拉柯夫斯基虽然向机会主义宣战，把它看作第二国际破产的祸首，但是又决心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果特、潘涅库克）所谓的“消极的激进主义”这一祸害的表现，是理论上用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践上在机会主义面前卑躬屈节或软弱无力这一祸害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是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战争无疑带来了最尖锐的危机，空前加剧了群众的灾难。这次战争的反动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以“民族”观念掩饰掠夺目的的无耻谎言，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下都不可避免地造成群众的革命情绪。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人们认清这种情绪，加深和巩固这种情绪。能够正确反映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一切彻底的阶级斗争，一切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我们还不知道，无论就列强的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而言，强大的革命运动将在战争中爆发还是在战后爆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根据这个方针去一贯地和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

巴塞尔宣言直接援引巴黎公社的例子，也就是变各国政府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例子。半世纪以前，无产阶级还太弱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各个交战国内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巴黎的一部分工人对“民族观念”（1792年的传统）的迷恋，是马克思所及时指出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弱点的表现，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公社失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削弱当时革命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如果一个社会党人在今天容忍

拒绝按巴黎公社社员的精神来工作，那是不可宽恕的。

战壕联欢的例子

一切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报纸都举出了各交战国士兵甚至在战壕内联欢的例子。军事当局(德国和英国)颁布了严峻的法令取缔这种联欢，这证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都认为这种联欢有重大的意义。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中机会主义完全占统治地位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报刊、第二国际的所有权威人物都支持社会沙文主义的情况下，还能发生联欢的事例，这就向我们表明，只要根据这个方针不断进行工作，哪怕只是各交战国的左派社会党人来进行工作，那末制止现在这场罪恶的、反动的和奴隶主的战争，组织国际革命运动，是非常可能的。

秘密组织的意义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在当前战争中宣传社会沙文主义(照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那样)，和机会主义者同样地使自己蒙受耻辱。这次战争将把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齐打垮，这无疑会是这次战争的有利结果之一。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应当拒绝利用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也决不应当盲目崇拜合法性。恩格斯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³¹⁹在这里恩格斯正是暗示进行国内战争，暗示在资产阶级破坏合法性以后我们必须破坏合法性。危机证明，资产阶级在所有国家甚至最自由的国家里破坏着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革命的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例如在德国，社会党人所做的一切正直的事情，都是反对卑鄙的机会主义

和伪善的“考茨基主义”的，并且正是秘密进行的。在英国，印发号召不参军的传单，要被送去服苦役。

认为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可以否认秘密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合法刊物中嘲笑这种方式，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关于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

拥护本国政府在当前战争中胜利的人和拥护“不胜不败”口号的人，同样都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本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只有相信和希望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必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而结束的资产者，才会认为要各交战国社会党人都主张各“该国”政府失败的思想是“可笑的”和“荒谬的”。相反地，只有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的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行动路线。

毫无疑问，英国、德国和俄国的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认真的反战宣传，“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宣传是社会党人的功绩。社会党人必须向群众说明：除了用革命推翻“本国”政府，他们没有别的出路；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利用这些政府在当前战争中的困难。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是他们对于反动战争的抗议、愤慨和认识的开端。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他们将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示威游行，但是他们不会欺骗人民说，在没有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可以取得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抢劫、没有各国现在的政府和统治阶级之

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这样欺骗人民，只会有利于各交战国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它们的反革命计划。谁希望取得持久的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关于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在当前战争中最常用的欺骗人民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英国人答应给比利时自由，德国人答应给波兰自由，等等。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是一场压迫着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者为巩固和扩大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战争。

社会党人不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绝对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主义党承认和捍卫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正是政治含义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强大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捍卫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

捍卫这种权利不但不是鼓励成立小国家，恰巧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地因而也是更广泛更普遍地成立更有利于群众和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

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¹⁸⁹）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语）²⁸² 无产阶级哪怕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资产阶级和战争

俄国政府有一点是不落后于它的欧洲伙伴的，它也象它们一样，善于大规模地欺骗“本国”人民。庞大而骇人的撒谎和欺骗的机关在俄国也大肆活动起来，为的是要用沙文主义毒害群众，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沙皇政府是在进行“正义的”战争，是在大公无私地保卫“斯拉夫同胞”等等。

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热烈拥护沙皇政府的黩武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地期待从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的遗产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特权。他们开过一系列会议，盘算沙皇军队打胜时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口袋的利润。同时反动派十分懂得，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推迟罗曼诺夫君主制的崩溃和阻止新的革命在俄国爆发的话，那只能是沙皇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

城市“中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等广大阶层，也沾染上沙文主义（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是如此）。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⁶，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立宪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早就成为执政党。沙皇外交已经不止一次用来进行大规模政治欺骗的泛斯拉夫主义，现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堕落为民族自由主义。它和黑帮作“爱国主义”竞赛，总是很乐意投票赞成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等等。在七十年代，德国“自由思想的”自由主义发生了分化，分离出一个民族自由主义的政党。目前在俄国自

由主义的阵营内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终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我国机会主义者认为俄国自由主义仍然是俄国革命动力的观点已被实际生活粉碎。

统治集团在资产阶级报刊和僧侣等等的协助下，在农民中也煽起了沙文主义情绪。但是随着士兵从战场回来，农村中的这种情绪无疑会发生不利于沙皇君主制的变化。同农民接近的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没有抵挡住沙文主义的浪潮。劳动派¹¹²在国家杜马中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可是他们通过自己的领袖克伦斯基的口宣布了对君主制特别有利的“爱国”宣言。“民粹派”的所有合法刊物都尾随自由派。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即加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²⁸³的所谓社会革命党¹⁴⁶，也和这一思潮同流合污。该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鲁巴诺维奇先生，已成为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³²⁰上，这个党有半数代表投票赞成沙文主义的决议（另一半代表弃权）。沙文主义者在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新闻报》³²¹等等）中占有优势。“来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即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这次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破产。克鲁泡特金、布尔采夫和鲁巴诺维奇的可悲下场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工人阶级和战争

俄国唯一没有沾染沙文主义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个别过火行动只涉及到工人的最落后的阶层。工人参加莫斯科反对德国人的粗暴行动一事被大大夸大了。整个说来，俄国工人阶级对沙文主义是有免疫力的。

这种情况可以由国内革命的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般生活

条件来说明。

1912—1914年，标志着俄国新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们又看到大罢工运动，而这样的大罢工运动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1913年参加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人数，根据统计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1914年则超过二百万人，接近1905年的水平。大战前夜，在彼得堡情势已发展到发生首批街垒战的地步。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履行了自己对国际的义务。国际主义的旗帜在它的手中从未倒过。我们党早就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集团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了。机会主义和“绝对合法主义”没有成为我们党的绊脚石。这种情况帮助我们党履行革命义务，正象同比索拉蒂的机会主义党分裂帮助了意大利的同志一样。

我国的一般情况是不容许“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盛行的。在俄国，我们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等中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它们在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层中却是微不足道的。特权工人和职员阶层在我国是非常软弱的。在我们这里不可能有对合法性的盲目崇拜。战前，取消派¹³²（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和马斯洛夫等领导的的机会主义政党）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有力的支持。选入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所有六个工人代表，都反对取消主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合法的工人报纸的发行份数和捐款情况，无可置辩地证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是反对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

战争爆发时，沙皇政府逮捕和放逐了成千上万的先进工人和我们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由于这种情况，加上国内实行戒严、我们的报纸被封闭等等，运动遭到了阻碍。然而我们党的秘密革命工作依然继续进行着。我们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出版了秘密报纸《无产者呼声报》³²²。

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在彼得格勒翻印出来，并送往各省。出版秘密传单，有的甚至散发到军营中去。在城郊的各个偏僻地方，工人秘密集会。最近在彼得格勒爆发了五金工人大罢工。我们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就这些罢工事件发表了几篇告工人书。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在1913年发生了分裂。一方面齐赫泽领导下的七个拥护机会主义的人。他们是由七个非无产阶级省份选出的，这七个省只有二十一万四千工人。另一方面有六个代表，他们全都是由俄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区的工人选民团选出的，这些区域共有一百万零八千工人。

主要的分歧点是：实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呢，还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策略。实际上分歧多半表现在议会以外的群众工作上。在俄国，如果做这项工作的人还想站在革命立场上的话，就必须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齐赫泽党团¹⁸³始终是放弃秘密工作的取消派的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同工人的一切谈话中和在一切会议上，都替取消派辩护。由此就发生了分裂。六个代表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一年来的工作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人正是拥护这个党团的。

战争一开始，分歧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齐赫泽党团只进行议会活动。它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因为否则它就会引起工人对它的极大的愤慨（我们看到，在俄国甚至连小资产阶级劳动派也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它也没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反映我党政治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则不同。它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进行反战工作，它向俄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进

行反帝宣传。

这个党团赢得了工人的深切同情，因而吓坏了政府，使它不得不公然破坏自己的法律，逮捕我们的代表同志并判决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在逮捕我党同志的第一个正式文告中这样写道：

“社会民主团体的某些成员在这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他们进行活动的目的，是要通过反战宣传、秘密传单和口头宣传，动摇俄国的军事力量。”

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暂时”停止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的著名号召，只有我们党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给了否定的答复。现在从沙皇驻比利时公使库达晓夫公爵的证词中可以知道，这个号召不是王德威尔得一个人拟定的，而是同这位沙皇公使一起拟定的。取消派的领导核心赞同王德威尔得，在报纸上正式宣称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反对战争”。

沙皇政府首先控告我们的代表同志在工人中宣传这个对王德威尔得的否定答复。

沙皇检察官涅纳罗科莫夫先生在审判中给我们的同志举出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作榜样。他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而成为政府的朋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了，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可悲的骑士们却没有这样做……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都忘记了自己和其他阶级间的纷争，忘记了党派纠纷，毫不犹豫地站到战旗下。”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们却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这样做……

这次审判展示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秘密进行广泛的反战宣传的动人图景。当然，沙皇法庭还远没有“查出”我们同志在这方面的全部活动。但是所查出的活动就已经表明，我们在这短

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多少工作。

法庭宣读了我们的小组和委员会所散发的反对战争和拥护国际主义策略的秘密传单。全俄国的觉悟工人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有联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也尽力帮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战争。

哈尔科夫省的工人代表穆拉诺夫同志在法庭上说：

“我知道，我被人民派到国家杜马来不是为了坐杜马的安乐椅，我到过许多地方，去了解工人阶级的情绪。”他在法庭上承认，他担负过我党秘密鼓动员的职务，并在乌拉尔的上伊塞特工厂和其他地方组织过工人委员会。这次审判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在战争爆发后，为了进行宣传几乎走遍了全俄国，表明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巴达也夫等人组织了多次工人会议，这些会议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等等。

沙皇政府用死刑恫吓被告。因此，在法庭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表现得象穆拉诺夫同志那样勇敢。他们尽力设法使沙皇检察官难于给他们判刑。现在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却卑鄙地利用这一点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工人阶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议会活动？

休特古姆和海涅、桑巴和瓦扬、比索拉蒂和墨索里尼、齐赫泽和普列汉诺夫都承认议会活动。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同志们也承认议会活动，同沙文主义者决裂的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同志也承认议会活动。有各种各样的议会活动。一些人是利用议会舞台取宠于本国政府，或者至多不过象齐赫泽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议会活动，则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要履行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义务。一些人的议会活动使他们坐上都长的安乐椅，另一些人的议会活动则使他们坐监牢、被流放、做苦工。一些人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些人

则为无产阶级服务。一些人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章 恢复国际

怎样恢复国际呢？不过，先要谈一谈不应当怎样恢复国际。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呵，一切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战争一爆发，他们就替国际担心。他们一方面要人相信，关于国际破产的传闻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请听一听考茨基是怎样说的。他说：国际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自然，在战时，这个工具是会有些不适用的。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并且主要是国际的——手段来摆脱现状。这个手段并不复杂，只需要等待战争结束，在战争结束以前，各国的社会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支持“本国”政府，战争结束以后，则应当互相“赦免”，承认大家都正确，承认在和平时期我们象兄弟一样地相处，在战时我们恪守某某决议，号召德国工人屠杀自己的法国兄弟或者号召法国工人屠杀自己的德国兄弟。

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克多·阿德勒以及海涅是完全一致的。维克多·阿德勒写道，“当我们正处在这个艰苦时期的时候，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不要彼此斤斤计较”。考茨基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任何地方的庄重的社会党人没有发出要人

们担心”国际命运的“呼声”。普列汉诺夫说，“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沾满无辜被害者的鲜血的手是不愉快的”。但是他又立即提出“赦免”，他写道，“感情服从理智在这里将是完全适当的。国际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应当注意到甚至是事后的懊悔”。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²²⁷中称王德威尔得的行为是“勇敢的和豪迈的”，说他是德国左派的榜样。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马上就会拟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将顺利地掩盖起来。他们不去帮助工人了解所发生的事情，而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统一”欺骗工人。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联合起来，就是所谓的恢复国际。

不必隐瞒自己，这种“恢复”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本国工人群众了解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他们除了“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人们不大了解这种危险性。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恢复国际联系的尝试。我们且不谈伦敦和维也纳的代表会议，当时一些沙文主义者在那里集会，是要帮助自己“祖国”的总参谋部和资产阶级。我们要谈的是罗迦诺和哥本哈根的代表会议、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和国际青年代表会议³²³。这些会议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看到上述的危险性。它们没有制定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它们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恢复”国际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它们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至多是在原地踏步。

反对派的情况

毫无疑问，一切国际主义者最关心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的情况。曾是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的、居领导地位的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国际工人组织一个极沉重的打击。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同时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在欧洲的许多大党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那些一贯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³²⁴和《国际》杂志²⁸⁷。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散发秘密革命传单，譬如《主要敌人在本国》的传单。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明显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我们在这里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三个派别：机会主义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堕落和叛变行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象在德国那样的程度；考茨基的“中派”，他们在这里除了充当机会主义者的奴仆，决没有力量起任何别的作用；左派，它是德国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派。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德国左派的内部情况。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

它的情况怎样呢？

《国际》杂志说得很对，在德国左派中，一切还处于酝酿过程，还将发生巨大的分化，它的内部有比较坚定的分子和不够坚定的分子。

不言而喻，我们俄国国际主义者决不想干涉我们德国左派同志的内部事务。我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完全有权根据时间和地点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我们认为，我

们的权利和义务仅仅是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对情况的看法。

我们深信《国际》杂志的社论的作者是极其正确的，他肯定说，考茨基的“中派”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现在谁抹杀意见分歧，谁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向工人宣传考茨基派所宣传的东西，谁就是麻醉工人，就比直接提出问题而让工人辨别是非的休特古姆和海涅之流更有害。

考茨基和哈阿兹最近竟敢同“领导机关”对抗起来，这是迷惑不了任何人的。他们和谢德曼之流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晋已经胜利了，因此现在已经大可以抗议兼并了。另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晋还没有胜利，因此应当“坚持到底”。

考茨基派反对“领导机关”的斗争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这样做正是为了战后在工人面前掩饰原则性的争论，用第一千零一个带有含糊的“左的”精神的冗长决议遮蔽问题。第二国际的外交家们都是这方面的能手。

十分明显，德国反对派在反对“领导机关”的困难斗争中，也应当利用考茨基派的这种非原则性的对抗。不过，对新考茨基主义的否定态度应当始终是一切国际主义者的试金石。谁反对考茨基主义，了解到“中派”即使在自己的领袖实行假转变之后在原则方面仍然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盟友，谁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对国际中所有动摇分子的态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分子多半是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社会党人，在中立国和在某些交战国中（例如在英国有独立工党^⑨）都有这些分子。这些分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和他们接近起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他们仅仅是同路人，他们在恢复国际的主要

和根本问题上不会拥护我们而会反对我们，会拥护考茨基、谢德曼、王德威尔得和桑巴。决不能在国际会议上把自己的纲领局限在这些分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则我们自己就被动摇不定的和平主义者俘虏了。例如，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就是这样的。持着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观点的德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实际起了“中派”的作用。妇女代表会议所谈到的，仅仅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荷兰机会主义党的代表和独立工党（I. L. P.）的代表所能接受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独立工党曾在“协约国”沙文主义者伦敦代表会议上投票赞成王德威尔得的决议案。我们非常尊敬独立工党在战时对英国政府所作的英勇斗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举起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而明确地向工人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看法，提出群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即变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为国内战争时代起点的口号。

不管怎样，在许多国家里都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俄国、斯堪的那维亚（霍格伦同志所代表的有势力的一派）、巴尔干（保加利亚的“紧密派”³⁰⁵）、意大利、英国（英国社会党³⁰⁰的一部分）、法国（瓦扬自己在《人道报》³⁰⁸上承认，他曾接到国际主义者的许多抗议信，然而没有全文发表过一封）以及荷兰（论坛派³²⁵）等国家中，都有这样的人。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尽管他们起初为数很少），用他们的名义向人们提示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面来。

直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谓“行动”纲领的会议，只是较完全或不够完全地宣布了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不是和

平主义。争取尽速停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才是真正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完满而明确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阐明什么是帝国主义、应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机会主义已使第二国际破产，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排除并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只有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宣布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纲领，才会使我们迟早赢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就同本国的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现在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又变成沙文主义者了。这只能使我们更加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是必要的。我们确信，今天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时社会党人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普鲁士年鉴》³¹²上说得很对，目前的统一有利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因为它迫使左派服从沙文主义者，妨碍工人了解争论的实质，妨碍工人建立真正工人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深信，革命者在目前情况下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决裂，这恰恰象过去正是为了尽快教育落后工人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而必须同黄色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会决裂一样。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正应当建立在这种革命的基础上。对我们党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适当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对我们党来说，现在存在的

只是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要在各国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准备。德国这个具有历史最久和最强有力的工人运动的国家，是有决定意义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个已经清除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进行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进化过程。那末我们党将在旧国际内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国形成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基础为止。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会怎样发展。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并且坚决相信的，就是在我们的国家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我们党将按上述方针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的全部日常活动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

我们俄国也不缺乏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集团。这些人将会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和休特古姆站在同一原则立场上的，并且现在已经向休特古姆伸出了手。我们知道，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所谓“组织委员会”³²⁶正在俄国宣传考茨基主义。这些人打着工人阶级统一的招牌，宣传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并通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统一。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当前俄国工人运动的全部情况使我们完全相信，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仍然是拥护我们党的。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史和现状

上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策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三十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深刻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个策略和我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因此，我们也必须在这里向读者提醒这个历史中的几件主要事实。

社会民主派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是在1883年产生的。那时，“劳动解放社”³²⁷在国外最先根据俄国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在九十年代以前，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一个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的思想流派。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人的风潮和罢工运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支同工人阶级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有密切联系的积极政治力量。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为“经济派”和“火星派”⁸⁵。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 (1894—1903年)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政治实质可归结为下面的纲领：“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即“承认”完全抹掉了任何革命性的、只合乎资产阶级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借口俄国工人群众落后，希望“和群众一道前进”，而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范围限制为进行经济斗争和在政治上支持自由主义，没有给自己提出独立的政治任

务和任何革命任务。

旧《火星报》(1900—1903年)为捍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全部优秀分子都站在《火星报》方面。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几年提出了最彻底的和不调和的纲领。1905年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和群众发动证明这个纲领是正确的。“经济派”迁就群众的落后性。《火星报》则培养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社会沙文主义者目前所持的论据(必须顾及群众,帝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者的“幻想”等等),全部都是经济派已经提出过的。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早在二十年前,就看到过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司徒卢威主义”的现象。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1903—1908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是过去的斗争的直接继续。“经济主义”变成了“孟什维主义”。对旧《火星报》的革命策略的捍卫造成了“布尔什维主义”。

在1905—1907年的暴风雨中,孟什维主义成为受自由派资产阶级支持并在工人运动中散布自由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主义。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任务,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发动民主派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而工人群众正如孟什维克自己所屡次承认的,在革命时期的历次规模最大的发动中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5年的革命,考验、加强、加深和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

不调和的革命策略。各阶级和各党派的公开言行不止一次地揭露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

(1908—1914年)

反革命时期以完全新的形式又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孟什维主义的主要潮流不顾它的许多优秀代表的抗议,产生了取消主义思潮,也就是放弃争取在俄国实行新革命的斗争,放弃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轻蔑地嘲笑“地下组织”和共和国的口号等等。以《我们的曙光》杂志的一伙合法作家(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等等先生)为代表结合成一个离开旧社会民主党而独立的核心,这个核心得到了企图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的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百般支持、吹捧和宠爱。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¹⁷⁸把这个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不顾许多国外的大小集团的疯狂反对,恢复了党。在两年多(1912年初至1914年中)内,两个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个是1912年1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后者不承认一月代表会议,并企图按另一种方式即在同《我们的曙光》派保持统一的情况下来恢复党。两种工人日报(《真理报》¹⁸⁷和《光线报》¹⁸⁸以及它们的后继者)之间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真理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之间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真理派”始终忠于党的革命教导,支持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特别在1912年春季以后),把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报刊和鼓动结合起来,从而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到自己周围,而

取消派——作为一支仅以《我们的曙光》派为代表的政治力量进行活动——则依靠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支持。

工人团体对两党报纸的公开捐款，是适合俄国当时条件的（同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实行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审查的）社会民主党的党费形式，它清楚地证明了“真理派”（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和威信的泉源是无产阶级，而取消派（以及他们的“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和威信的泉源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下面就是关于这些捐款的简要材料，这些材料详细地刊载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³²⁸一书中，并摘要登载在1914年7月21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³²⁹上。

1914年1月1日至5月13日，捐款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派的）日报和取消派的日报的单位和捐款总数如下：

	真 理 派		取 消 派	
	捐 款	捐款总数	捐 款	捐款总数
	单位数	（卢布）	单位数	（卢布）
来自工人团体的………	2 873	18 934	671	5 296
来自非工人团体的………	713	2 650	453	6 760

由此可见，我们党到1914年就把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周围。在1913年全年中，捐款给真理派的工人团体有二千一百八十一一个，捐款给取消派的只有六百六十一一个。1913年1月1日至1914年5月13日，捐款给“真理派”（即我们党）的工人团体共有五千零五十四个，捐款给取消派的只有一千三百三十二个，即只占百分之二十点八。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 (1914—1915年)

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在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检查自己的策略。沙皇政府比其他各国政府更明显得无可比拟地表现了战争的反动性、掠夺性和奴役性。尽管如此，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在俄国，除了我们党，它是唯一有巨大影响的集团，因为它和自由派有联系）仍然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我们的曙光》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独占合法地位，在群众中鼓吹：“不要反对战争”、盼望三个（现在是四个）协约国取得胜利、斥责德帝国主义“罪大恶极”等等。自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多次表现了他的毫无政治气节和投靠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现在他更加坚决地采取这种立场，博得了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称赞。普列汉诺夫已堕落到宣称沙皇政府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并在意大利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谈话，想把意大利拖进战争！！

这就完全证实我们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和把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开除出党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取消派的实际纲领和他们方针的实际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机会主义，而且还在于他们维护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大国特权和优越地位。这是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方针。这是一部分激进小资产者、一小撮特权工人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许多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集团、阿列克辛斯基集团、托洛茨基集团等等）或所谓“民族

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1912年的一月代表会议。我们挨到无数的咒骂,其中最常听到的罪名就是“篡夺行为”和“分裂主义”。我们对此的回答就是举出确凿的、经得起客观检查的数字,这些数字证明我们党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在反革命时代秘密工作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这个数目不算小了。

如果说在俄国不必清除《我们的曙光》派就可以在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基础上“统一起来”,那末,为什么我们为众多的反对者甚至彼此之间也没有统一起来呢?自1912年1月到现在,已过去整整三年半了,在这整个期间内,我们的反对者虽然很想建立一个反对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个事实替我们党作了最好的辩护。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的全部历史,是一部混乱和瓦解的历史。在1912年3月它们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1912年8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¹⁷³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瓦解了。一部分集团分离出去。它们无法建立起党和中央。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1912—1914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派是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和自由派有联系。1914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联盟)正式退出“八月联盟”,而联盟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非正式地退出联盟,又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的集团。1914年7月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参加下建立了所谓“布鲁塞尔联盟”³¹⁰来反对我们,拉脱维亚人

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派）也立即脱离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爆发后便瓦解了。《我们的曙光》、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以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袖安恩，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德国失败最好。组织委员会和崩得¹⁷²捍卫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原则。齐赫泽党团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俄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劳动派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但仍然是《我们的曙光》的忠实盟友。我们的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对齐赫泽党团十分满意。在巴黎创办了《我们的言论报》²⁸⁶（其前身是《呼声报》²⁹⁰），其主要参加者是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既想空谈捍卫国际主义，又想和《我们的曙光》、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无条件地统一。这个报纸在出版了二百五十号以后，自己不得不承认瓦解，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倾向我们党，马尔托夫仍然忠于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谴责《我们的言论报》犯了“无政府主义”（正如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大卫之流、《国际通讯》³³⁰、列金之流责难李卜克内西同志犯了无政府主义一样）；托洛茨基宣称和组织委员会决裂，但又愿意和齐赫泽党团一道走。下面就是齐赫泽党团的一个领袖阐明的该党团的纲领和策略。契恒凯里在1915年《现代世界》杂志³³¹第五期（这个杂志执行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方针）中写道：“悦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制止本国的举事发动而没有这样做，这不是暗地盼望该党不仅给自己而且也给自己的祖国在街垒战中找到死亡，就是拿无政府主义的望远镜观察近在咫尺的事物。”^①

① 1915年《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第148页。托洛茨基在不久前宣称，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高齐赫泽党团在国际中的威信。毫无疑问，契恒凯里必然也会大力提高托洛茨基在国际中的威信……

这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社会沙文主义的全部实质：既在原则上替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完全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能够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一般地是否能够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行动呢，还是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中真正“死掉”。

我们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爆发前产生，并在革命和反革命时期巩固起来了。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派，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合法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崇拜“合理的”、“欧洲式的”（不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运动。俄国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了三十年的坚决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可耻的破产，使我们的民族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巩固起来。这个经验更使我们确信，我们党今后必须继续沿着那条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写于1915年7—8月

1915年秋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印成单行本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1卷
第275—317页

论欧洲联邦口号³³²

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²⁸⁹第四十号上发表过如下的消息：我们党的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决定把“欧洲联邦”口号问题延缓到报刊上讨论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时再来解决。^①

我们的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偏重于政治一方面。发生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把这个口号直接叫做政治口号（宣言说：“当前的政治口号……”），同时，宣言不但提出了欧洲共和国联邦，而且还特别着重指出，“不举行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便是荒唐和虚伪的。^②

在对这个口号作政治评价的范围内，反对这样的问题提法，譬如说，以为这个口号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那是完全不对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是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的。恰巧相反，它们总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为它扩展基础，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新阶层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充满政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3页。——编者注

治上经济上巨大震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整个时代。

固然，在举行革命推翻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君主制度首先是俄国的君主制度的条件下，把欧洲共和国联邦这一口号作为政治口号提出来，是无可非难的，但是还剩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即关于这一口号的经济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先进的”“文明的”殖民强国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

资本已经具有国际性和垄断性。世界已经被少数强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瓜分完毕。欧洲四大强国，即英、法、俄、德四国，共有二亿五千万至三亿人口和将近七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而它们所占领的殖民地却有近五亿（四亿九千四百五十万）人口和六千四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即差不多占地球面积的一半（地球面积除两极地区外，共有一亿三千三百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土耳其、波斯，现在被日、俄、英、法这四个进行“解放”战争的强盗弄得四分五裂。亚洲这三个所谓半殖民地（其实现在十分之九已成了殖民地）国家，共有人口三亿六千万，土地一千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欧洲面积一倍半）。

其次，英、法、德三国在国外的投资不下七百亿卢布。为要从这笔令人快意的款项上每年得到三十多亿卢布的“正当的”收入，有百万富翁们的全国委员会即所谓政府为之服务，这些政府拥有陆军和海军，把“亿万富翁”的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当什么总督、领事、大使、各种官员、牧师之类的吸血鬼。

在资本主义最高发展时代，少数强国掠夺地球上将近十亿人

口的事情，就是这样组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这样组织，放弃殖民地，放弃“势力范围”，放弃资本输出吗？谁这样想，就是把自己降到牧师的水平，每逢礼拜天向富翁宣扬基督教宽大为怀，劝他们周济贫民……如果不能每年拿出几十亿卢布，那就拿出几百卢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资本”的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¹，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而要测验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战争以外，没有也不能有别的办法。战争同私有制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

当然，各个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达成暂时协议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端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

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的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一种在我们看来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联合和自由的国家形式，直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为止。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借以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同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

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根据大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以后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讨论，中央机关报

编辑部得出了一个结论：欧洲联邦口号是不正确的。

载于 1915 年 8 月 23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4 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
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1 卷
第 318—322 页

谈谈辩证法问题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①），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6页。——编者注

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

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维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①）。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说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東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① 施维格勒的译文是：“denn natürlich kann man nicht der Meinung sein, daß es ein Haus gebe außer den sichtbaren Häusern”。原文是：*ὁ γὰρ ἂν θείμεν εἶναι τινα οὐκίαν παρὰ τὰς τινὰς οὐκίας*。——编者注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保尔·福尔克曼（参看他的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①, S.）都把认识看做一串圆圈。

哲学上的“圆圈”： 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 不！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

① 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1910年莱比锡—柏林版第35页。见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40页。——编者注

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 (狄慈根)³³³ 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注意
这个
警句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写于1915年

1925年第一次载于《布尔什维克》
杂志第5—6期合刊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8卷
第403—412页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 纲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发展到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创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所以，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这只有在最终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

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2. 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象不实行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准备好战胜资产阶级。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比方说，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梦想”，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意义上来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劳动货币或危机的消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不能实现，那是完全不对的。第二、即使只举 1905 年挪威和瑞典分离的例子，就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英国在今天或明天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波兰、印度等新国家的形成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第四、金融资本竭力向外扩张，“自由”收买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

和国的政府以及任何一国、甚至“独立”国的被选出来的官吏。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和一般资本的统治一样，并不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能消灭的；而自决则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金融资本的这种统治，丝毫不能消除政治民主这一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显明的形式的作用。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于政治民主的一种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一切论断，归结起来，就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同一般政治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断定。

在第二种场合，这种论断是不全面和不确切的。因为不单是民族自决权，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只是不完全地、残缺地而且是以罕见的例外形式（如1905年挪威和瑞典的分离）“实现”的。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经过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然而，社会民主党并不因此而拒绝为实现这一切要求立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拒绝这种斗争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恰恰相反，必须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合法的范围，而要打破这个范围；不要满足于议会中的发言和口头上的抗议，而要使群众积极地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剧争取实现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直接进行冲击，也就是说，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并且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和萨比林事件³³⁴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在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上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发。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并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

斗争,相反地,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就在这种基础上发生的冲突,作为群众行动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³³⁵。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一定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一定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¹⁸⁹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

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 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问题的革命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们最低民主纲领中的一切条文，早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就已经由小资产阶级提出来了。而且小资产阶级到现在还是空想地提出这一切条文，因为他们看不见民主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加强，而相信“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骗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拥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空想就是这样的。同这种市侩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用笼统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资产者所重复的空谈去反对兼并和赞成一般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该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达到相互信任或阶级团结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

自决的拥护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们是闭口不谈被“他们本”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们本”国内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各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妥协（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如巴尔干小国的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这种情况也很少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象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主义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如罗曼语各国），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拒绝自己的共和主义一样。^①

① 不用说，如果认为从自决权中似乎会得出“保卫祖国”的结论，因而否认民族自决权，那是很可笑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1914—1916年常常拿民主派的任何一个要求（如它的共和主义）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主张，为“保卫祖国”辩护，这也是不值一驳的。马克思主义承认欧洲某些战争中，例如，法国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结论，而否定1914—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结论，都是从分析每次战争的具体历史特点，而决不是从什么“一般原则”和纲领中某一条文得出来的。

5. 民族问题中的马克思主义 和蒲鲁东主义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表现。这些要求中的每一个要求都能成为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已经成了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拿来同其余的要求相对立，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际行动中，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争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的斗争服从自己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认”民族问题的蒲鲁东分子相反，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²⁸²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胜利就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³³⁶。正是从英国工人的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²¹¹。马克思只是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才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驳斥资本辩护人的论调，他们大叫什么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不但经济集

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而马克思却不是以帝国主义者理解来坚持这种集中的进步性的，他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各国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也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拿群众的革命行动来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它所揭露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伪善的奥吉亚斯的牛圈³³⁷，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种政策应当成为各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①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分成三类主要国家：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正象十九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一样。^②

① 有些人常常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承认民族自决的必要性，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连施在《钟声》杂志³³⁸第八、九两期上就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³³⁹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② 在某些没有参加1914—1916年战争的小国中，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辩护。这就是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的原因之一。人们维护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即否

第二、欧洲东部的国家，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里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才特别发展了起来，民族斗争才特别尖锐了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和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融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总共达十亿人口。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远未结束。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而有机会的时候，也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任务。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也就是说，在那些把“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

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但提出的论据不正确。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中表现了一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果特同志在他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和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中间，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有两种主要色彩。

一方面，我们看到，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仆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的进步性而赞成兼并，否认似乎是空想的、梦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自决权。属于这类人的，在德国有库诺夫、帕尔乌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在英国有一部分费边社分子³⁰²和工联领袖；在俄国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等。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者，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在实践上和他们完全一致，他们拥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和虚假的，因为他们认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要求“过份了”（«zu viel verlangt»，见考茨基在1915年5月21日《新时代》²⁴上所用的字眼），他们不坚持正是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采取革命的策略；相反地，却抹杀他们的革命义务，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使他们易于欺骗人民，对于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内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恰恰避而不谈，等等。

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糟蹋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所说明的那种策略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迫切性。

至于其中讲到兼并，这个问题由于战争而变得特别迫切了。但是，什么是兼并呢？不难相信，反对兼并的抗议，或者归结于承认民族自决，或者是基于主张维持现状和敌视一切暴力、甚至革命暴力的和平主义的言词。这种言词根本是虚伪的，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8. 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资产阶级，特别是费边社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止革命，硬要革命接受有限的民主目的。如果说，在无产者开始冲击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情况下，一切纯民主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都会起着阻碍革命的作用，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也就是它们的自决权）是非常迫切需要的，正如1848年德国的或1905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获得胜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样。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今后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1914—1916年那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亚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革命宣传和革命群众行动也推广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比林这样的事件来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来举行游行示威和组织革命群众发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的行动。

9.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 以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

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早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¹⁸⁷上就表现出来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并且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抗议把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第九条列入了这个党纲。此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以党的名义重新提议把第九条从我们党纲中删掉，或提议用其他某种说法来代替这一条。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1912年1月重新恢复的我们的党，在191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²⁰¹，这项决议肯定了自决权，并且正是根据上述具体意义作了说明。1914—1916年，不论在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社会党人（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³⁴⁰等等）中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都曾猖獗一时，这就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认这个要求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政府。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决权的言行决不负任何责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民族问题立场的最新说法（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³¹⁸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要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使波兰人民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把完整的国家重新分成几部分”……宣言斥责那些让霍亨索伦王朝担当……“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的社会党人。它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破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异国统治的一切形式，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宣言认为战争“对波兰人”是“双重的自相残杀的战争”（1915年9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³⁴¹第2号第15页；俄译文见《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页）。

这些论点实质上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它的政治措词比第二国际大多数的纲领和决议更含糊不清。用确切的政治措词来表达这些思想和确定它们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尝试，都将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认民族自决是错误的。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应当根据上述论点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阶级内容；（3）必须分清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认自决是不彻底的，纯粹是口头上的，因此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虚伪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民族（大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坚持受“他们”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的；（6）必须使为争取这一要求和

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去欺骗人民，结果使他们错误地否认自决）的观点搬到“国际”中来，是一个理论上的错误，是用蒲鲁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险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附言：在刚刚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时代》上，考茨基公开向最卑鄙齷齪的德国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利茨伸出基督徒的和解之手，否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有被压迫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承认俄国的波兰有这种自由，是为了向兴登堡和威廉二世效犬马之劳。这是考茨基主义自己揭穿自己的再好不过的事实！

写于1916年1—2月

载于1916年4月《先驱》杂志
第2期

1916年10月用俄文教于
《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卷

按《文集》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2卷
第137—150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³⁴²

通俗的论述

序 言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1916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条件下，我当然深感法文和英文参考书的缺乏，尤其是俄文参考书的缺乏。但是，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纯理论性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我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也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合法”作品时不得不用的那种伊索寓言式的——可恶的伊索寓言式的——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再读到小册子里那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象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关于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关于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彻底地背叛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关于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等等，当我谈到

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部即将再版的1914—1917年的国外论文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119—120页^①上的一段文字：为了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向读者说明，资本家以及转到资本家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同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怎样无耻地在兼并问题上撒谎，怎样无耻地掩饰本国资本家的兼并政策，我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细心的读者不难用俄国来代替日本，用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斯兰和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来代替朝鲜。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作 者

1917年4月26日彼得格勒

^① 见本卷第839—840页。——编者注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³⁴³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说过，本书在1916年写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现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许是不适当的，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不改写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无益处：他们看了这本被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合法的书，就会相信，象在现今的美国或在法国，虽然不久以前几乎全体共产党人都被逮捕，但他们还是可能并且必须利用共产党人还有的那一点点合法机会，来揭露社会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全部虚伪性。至于对这本经过检查的书的一些最必要的补充，我将在这篇序言中写出来。

(二)

本书已经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割和重新分割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

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我在说明 1876 年和 1914 年世界分割的情形（第六章）以及说明 1890 年和 1913 年世界铁路分割的情形（第七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种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结。这种总结表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

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美、法“民主”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巧,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歌颂“威尔逊主义”,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达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市侩,完全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后来的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抑、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²³⁰在1912年所估计的战争,正是1914年爆发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已经成了揭露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全部可耻的破产和一切叛变行为的纪念碑。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三请读者注意:宣言里有许多地方,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即将到来的这次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设法地避开这些地方,就象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上的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之流，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教士。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解体、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种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作家几十年来，特别是在他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现在“考茨基主义者”在全世界都同极端的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夺过来。

(五)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⁸⁴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¹⁴⁶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³⁴⁵；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八十亿至一百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从这样巨量的超额利润（因为这种利润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各“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正是在收买他们，用千百种方法，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方法在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

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活动家”。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估计到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末，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年7月6日

在最近十五年到二十年里，特别是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和政治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这位作者所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所站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有俄译本，1912年莫斯科版）。虽然作者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斯²⁸⁵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

下面，我们就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叙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尽管是值得谈的，我们也不谈了。参考书目及其他注释，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到兴趣的，所以放在书的最后面。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德国，每一千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五十人以上的大企业在1882年有三个，1895年有六个，1907年有九个。每一百个工人中，这些企业的工人占二十二个、三十个、三十七个。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关于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说明了这一点。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在三百二十六万五千六百二十三个企业中，大企业有三万零五百八十八个，只占百分之零点九。在一千四百四十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五百七十万，即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在八百八十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六百六十万马力，即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三；在一百五十万瓩电力中，它们占有一百二十万瓩，即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二。

不到百分之一的企业，竟占有总数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和电力！而二百九十七万个小企业（雇用工人五人以下的），即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一的企业，却只占有百分之七的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无足轻重。

德国在1907年雇用工人一千人以上的企业，有五百八十六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万），它们的

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二）^①。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银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加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猛烈。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划分出来，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在1904年，产值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一千九百个（占企业总数二十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一个的百分之零点九）；它们有一百四十万工人（占工人总数五百五十万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它们的产值有五十六亿美元（占总产值一百四十八亿美元的百分之三十八）。五年之后，在1909年，相应的数字如下：三千零六十个企业（占企业总数二十六万八千四百九十一的百分之一点一），有二百二十万工人（占工人总数六百六十万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它们的产值有九十亿美元（占总产值二百零七亿美元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②。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三千个大型企业，包括了二百五十八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成立协定；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① 数字是根据《德意志帝国年鉴》（《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1911年察恩版综合的。

② 《美国1912年统计汇编》（《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第202页。

美国统计上写着：在二百五十个工业部门中有三千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都有十二个规模最大的企业。

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对另一些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第一、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能获得比‘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即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①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著，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一方面只剩下几个大煤业公司，采煤量达几百万吨，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大铸钢厂及其钢业辛迪加。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四十万吨（一吨等于六十普特）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雇有一万个分住在工厂区各宿舍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个别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五六家大银行作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

^① 《金融资本》俄译本第 286—287 页。

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关税和运费来保护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①。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引起垄断，不过时间稍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海尔曼·列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一本专论“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著作中的一段话：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带来了垄断的趋势。一方面，集中的结果，必须在企业上耗费大量的资本；因此，在必要资本数量方面对新企业的要求愈来愈高，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用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②

在五十年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

①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Han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ßeisengewerbe》) 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56、278页。

② 海尔曼·列维《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Hermann Levy: 《Monopole, Kartelle und Trusts》) 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

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企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埋葬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分析，证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个别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推翻了。”但是，英国俗话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还是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期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引起垄断，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现阶段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可以从1860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个别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可以发现现在极常见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垄断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重要的时期，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各国工业衰落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当时，英国已经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生存的形式。”

“大转变开始于1873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开始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这次萧条经历了欧洲经济史中的二十二年，只有在八十年代初稍有间断，在1889年左右发生过异常蓬勃然而为时甚短

的高涨。”“在 1889—1890 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尔来利用行情。轻率的政策不断提高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荣地埋葬在‘破产的坟墓’里了。后来又过了五年业务不振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是一件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市场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到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它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了以后再没有重大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十九世纪末的蓬勃高涨和 1900—1903 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工业和炼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的标志下发生的。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①

总之，垄断组织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2）1873 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过广泛的发展，但是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

^① 泰·弗格尔施坦《资本主义工业的金融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形成》(Th. Vogelstein: «Die finanzielle Organis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 und die Monopolbildungen»), 见《社会经济概论》(«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1914 年杜宾根版第 6 篇。参看同一作者所著《英美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组织形式》(«Organisationsformen der Eisenindustrie und Textilindustrie in England und Amerika») 1910 年莱比锡版第 1 卷。

固,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3)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规定产品数量,确定价格,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约有二百五十个,在1905年约有三百八十五个,参与的企业约有一万二千个^①。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业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单是这一万二千个最大的企业,大概就集中了占总数一半以上的汽力和电力。北美合众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一百八十五个,在1907年是二百五十个。美国的统计把所有的工业企业分为三类:属于个人的,属于商号的,属于公司的。最后这一类,在1904年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在1909年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九,即四分之一以上。这些企业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六,在1909年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六,即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产值分别是一百零九亿美元和一百六十三亿美元,即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七和百分之七十九。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

^① 里谢尔博士《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Dr. Rieser: «Die deutschen Großbanken und ihre Konzentration im Zusammenhange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amt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912年第4版第149页;罗·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拉斯以及国民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R. L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und die Weiterbildung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 1910年第2版第25页。

时，已经集中了该区总采煤量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而在1910年，则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点四^①。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且形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一亿五千万美元。当时发行了一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一亿零六百万美元的优先股票。自1900年起至1907年止，优先股票每年获得的股息分别为：百分之四十八、百分之四十八、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四十四、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共计三亿六千七百万美元。1882年到1907年的纯利为八亿八千九百万美元，其中六亿零六百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②。“钢业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有企业的职工，在1907年不下二十一万零一百八十人。德国采矿工业中最大的企业，即‘格耳晋基尔恒矿业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在1908年有四万六千零四十八个职工”^③。钢业托拉斯在1902年就生产了九百万吨钢^④。它的钢产量在1901年占美国全部钢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在1908年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一^⑤。它的矿石开采量，

① 弗里茨·克斯特涅尔博士《强迫加入组织。卡特尔与国外企业斗争情形的研究》(Dr. Fritz Kestner: «Der Organisationszwa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Kämpfe zwischen Kartellen und Aussenseitern») 1912年柏林版第11页。

② 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R. Lief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enwesen») 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页。

③ 同上，第218页。

④ 齐·契尔斯基博士《卡特尔与托拉斯》(Dr. S. Tschierschky: «Kartell und Trust») 1903年哥丁根版第13页。

⑤ 泰·弗格尔施坦《组织形式》(Th. 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 第275页。

在1901年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在1908年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三。

美国政府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说：“它们比竞争者优越，是因为它们的企业规模大、技术装备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创办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量地采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此目的，它收买了与烟草加工多少有关的一切发明专利权，耗费了巨额的款项。有许多发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须经过在托拉斯供职的工程师的改进。在1906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发明专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设立了自己的铸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在勃鲁克林，每个这样的工厂平均有三百个工人，专门根据发明试制纸烟、小雪茄、鼻烟、包装用的锡纸和烟盒等等，并且就地改进各种发明。”^①“其他托拉斯也雇有所谓 *developping engineers* (改进技术的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明新的生产方法，进行技术改良的试验。钢业托拉斯给那些在提高技术或减低费用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和工人以高额奖金。”^②

德国的大工业，例如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化学工业，也是这样组织技术改良工作的。到1908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经在这个工业中造成了两个主要“集团”，它们按自己的方式同样走到垄断。起初，这两个集团是由两对各有资本二千万至二千一百万马克的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一方面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迈斯迪拿工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方面是路易港的苯胺制碱厂和爱北斐特的前拜耳公司。后来，一个集团在1905

① 烟草工业联合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 1909年华盛顿版第266页。——引自保尔·塔费尔博士《北美托拉斯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Dr. Paul Tafel: «Die nordamerikanischen Trusts und ihre Wirkungen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echnik») 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48页。

② 同上，第49页。

年，另一个集团在1908年，又各同另一个大工厂成立了协定。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边联盟”，各有资本四五千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已经开始“接近”，订立价格“条约”等等^①。

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象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铁矿产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定来“瓜分”这些市场。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路线和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向完全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涅尔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企业的斗争”的著作，所谓“局外企业”，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他这本著作叫做《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当叫做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只要看看垄断者同盟在为了这种

^① 里谢尔所著前书第3版第547页及往下各页。据报纸报道（1916年6月），不久前又成立了一个把德国整个化学工业联合起来的大型托拉斯。

“组织”而进行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时所采取的那些手段，也是有益处的。这些手段就是：（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最重要手段之一”）；（2）用“联盟”方法（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剥夺劳动力；（3）剥夺运输工具；（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降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企业”，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耗费几百万金钱，以便在某一时期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汽油工业中就有过这样的例子：价格从四十马克跌到二十二马克，差不多跌了一半！）；（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下面就是这种过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涅尔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的活动方面，也在发生某种转变，从先前那种商人活动转变为组织者、投机者的活动。能够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会根据自己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寻找并且‘发现’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能够预先估计到，哪怕只是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就是生产社会化，但是人类所达到的这种社会化的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下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市侩式的反动批评

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车，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

克斯特涅尔说：“由于卡特尔的组成而使价格长期上涨的现象，至今还只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煤、铁和钾等部门，而在成品方面则从来没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限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对此还要作一点补充：原料加工（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业，不仅因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利润的好处，使那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业受到损失，而且它对这一工业还保持一定的统治关系，这是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①

我们加上着重号的那几个字，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不愿意而且很少承认的，也是以卡·考茨基为首的现代的机会主义辩护者所竭力支吾搪塞、回避不谈的。统治关系和同它相联系的暴力，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万能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

我们再举一个说明卡特尔支配一切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来源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就特别容易产生，垄断组织就特别容易形成。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来源的其他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连这个工业也高度卡特尔化了。水泥厂都按区域联合成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的价格：每一车桶水泥的售价是二百三十至二百八十马克，而成本却只有一百八十马克！企业付出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六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

^① 克斯特涅尔所著前书第254页。

分得股息之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消除如此盈利的工业部门中的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散布谣言，说工业的情形很坏；在报上登匿名广告说，“资本家们，小心点！别在水泥业上投资！”；最后就收买“局外企业”（即没有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付给他们六万、八万以至十五万马克的“出让费”^①。垄断组织用尽一切办法，从偿付一点“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按美国方式“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在一切地方为自己开辟道路。

所谓用卡特尔消除危机，这是拚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余工业部门“更加严重地缺乏计划性”，正如《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这本好书的作者厄伊得尔斯所承认的那样^②。

资本主义的无耻的辩护者利夫曼说：“国民经济越发展，就越是求助于更带冒险性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求助于需要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企业，或者求助于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业。”^③冒险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同资本的大量增加有关的，资本可以说是漫溢出来而流向国外，如此等等。同时，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个

① 路·厄什韦葛《水泥》（《Zement》 von L. Eschwege），见《银行》杂志346 1909年第1期第115页及往下各页。

② 厄伊得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Jeidels: 《Das Verhältnis der deutschen Großbanken zur Indust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isenindustrie》）1905年莱比锡版第271页。

③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34页。

利夫曼又不得不承认说：“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组织的大变革”……如电力、航空……“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经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很厉害的投机事业发展起来……”^①

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厄伊得尔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断：

“遭到1900年危机的，除了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有许多在今天说来结构上已经过时了的所谓‘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起来的企业），它们是在工业高涨时浮到浪头上来的。价格的低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单纯’企业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这是大的联合企业根本没有遇到过的，或者仅仅在极短的时期内碰到过。结果，1900年的危机所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是1873年的危机远远比不上的。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选留了一些较好的企业，但是这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并没有使胜利地渡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占据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现在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很复杂，组织分布很广，资本雄厚），而且垄断程度很高；其次是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的某些部门和交通等方面的企业，不过垄断程度较低。”^②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的实际的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完备，极不充分，和极其不足的。

^①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65—466页。

^② 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108页。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银行原先的主要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所有一切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许许多多普通的中介人变为极少数垄断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来谈一谈银行业的集中。

在1907/8年，德国所有资本在一百万马克以上的股份银行，共有存款七十亿马克；在1912/3年，已经有九十八亿马克。五年中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这新增加的二十八亿马克中，有二十七亿五千万马克属于五十七家资本在一千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存款在大小银行中的分配情形如下①：

	在存款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柏林 九家 大银行	其余四十八 家资本在一 千万马克以 上的银行	一百十五家 资本在一百 万至一千万 马克的银行	资本不到一 百万马克 的小银行
1907/8年……	47	32.5	16.5	4
1912/3年……	49	36	12	3

① 阿尔弗勒德·兰斯堡《五年来德国银行的业务》(Alfred Lansburgh: «Fünf Jahre d. Bankwesen»), 见《银行》杂志 1913 年第 8 期第 728 页。

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而大银行当中仅仅九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但是，这里还有许多情况没有注意到，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关于这些以后再讲。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计算，1913年年底，存款总额约为一百亿马克，而柏林九家大银行就占了五十一亿马克。这位作者不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银行资本，他写道：“1909年年底，柏林九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一百一十三亿马克，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约三十亿马克，同普鲁士国有铁路管理局一样，也是旧大陆上资本积聚最多，而且分权程度很高的企业。”^①

我们把提到“附属”银行的地方加上着重号，因为这是最新资本主义集中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小企业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等等来“联合”小企业，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用术语说，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利夫曼教授写了一本五百页的大“著作”，描述现代的“参与和投资公司”^②，可惜，这本书里除了一些往往没有加过工的原始材料以外，还有一些十分低劣的“理论”推断。关于这种“参与”制在集中方面造成的结果怎样，说得最清楚的是银行“活动家”里谢尔那本论德国大银行的著作。但是，在引用他的材料之前，我们先举一个“参与”制的具体例子。

“德意志银行”“集团”，是所有大银行集团当中最大的集团之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杜宾根版第12页和第137页。

② 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页。

一，甚至是最大的一个集团。要弄清楚把这一集团所有的银行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必须分清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参与”，或者说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依赖（比较小的银行对“德意志银行”的依赖）。结果情形如下①：

	第一级依赖：	第二级依赖：	第三级依赖：
“德意志 银行”	始终参与的……17家银行；	其中有9家又参与34家银行；	其中有4家又参与7家银行。
	不定期参与的……5家银行；		
	间或参与的……8家银行；	其中有5家又参与14家银行；	其中有2家又参与2家银行。
共 计……	30家银行；	其中有14家又参与48家银行；	其中有6家又参与9家银行。

在“间或”隶属于“德意志银行”的八家“第一级依赖”的银行中，有三家外国银行：一家是奥地利的（维也纳“联营银行”——*Bankverein*），两家是俄国的（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直接和间接地、全部和局部地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的，共有八十七家银行，这个集团所支配的资本，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共有二三十亿马克。

一家银行既然领导着这样一个集团，并且同其他五六家稍小一点的银行成立协定，来办理公债之类的特别巨大、特别有利的金融业务，那末很明显，这家银行已经超出“中介人”的作用，成了极少数垄断者的同盟。

从我们简略地摘引在下面的里谢尔的统计材料里，可以看出，正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发展得十分迅速：

① 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德国银行业中的参与制》（*Alfred Lansburgh: «Das Beteiligungssystem im deutschen Bankwesen»*），见《银行》杂志1910年第1期第500页。

柏林六家大银行拥有的机构

年 份	在德国的 分支机构	存款部和 兑换所	始终参与的 德国股份银行	机构总数
1895.....	16	14	1	42
1900.....	21	40	8	80
1911.....	104	276	63	450

我们看到，银行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了全国，汇集了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成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后来又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述那段引文中，代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个“分权”，实际上却是愈来愈多的从前比较“独立的”、确切些说是地方性的同外界隔绝的经济单位，隶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心了。其实，这是集权，这是加强垄断巨头的的作用、意义和实力。

在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银行网”更密。英国——包括爱尔兰在内——1910年所有银行的分行，共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家。其中四家大银行各有四百家以上的分行（自四百四十七家至六百八十九家），另外还有四家大银行各有二百多家分行，十一家银行各有一百多家分行。

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里昂信贷银行 (Crédit Lyonnais)，国民贴现银行 (Comptoir National) 和总公司 (Société Générale) 的业务和分行网发展的情形如下①。

	分行和存款部数目			资 本 额 (单位百万法郎)	
	在地方上	在巴黎	共计	自己的	别人的
1870年.....	47	17	64	200	427
1890年.....	192	66	258	265	1 245
1909年.....	1 033	196	1 229	887	4 363

① 欧根·考夫曼《法国银行业》(Eugen Kaufmann: «Das französische Bankwesen») 1911年杜宾根版第356页和第362页。

为了说明现代大银行“联系”的特点，里谢尔引用了德国和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 (它的资本在1914年已经达到三亿马克)收发信件的统计数字：

	信件数目	
	收到的	发出的
1852年·····	6 135	6 292
1870年·····	85 800	87 513
1900年·····	533 102	626 043

巴黎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的账户，在1875年是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五个，而在1912年已经增加到六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九个。^①

这些简单的数字，也许比长篇议论更能清楚地表明：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替几个资本家办理往来账，似乎只是执行着一种纯粹技术性的、纯粹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账及其他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最后则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

我们刚才谈到柏林“贴现公司”有三亿马克的资本。“贴现公司”的资本增加的经过，也是柏林两家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

^① 让·列斯居尔《法国储蓄业》(Jean Lescure: «L'épargne en France») 1914年巴黎版第52页。

行”和“贴现公司”争夺霸权的斗争中的一幕。在1870年，“德意志银行”还是一家新银行，资本只有一千五百万马克，而“贴现公司”有三千万马克。在1908年，前者有资本二亿，后者有资本一亿七千万。到1914年，前者的资本增加到二亿五千万，后者因为同另一家第一流的大银行“沙福豪森联合银行”合并，资本就增加到了三亿。当然，在进行这种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同时，这两家银行也订立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巩固的“协定”。这种发展的进程，使得那些在观察经济问题时决不越出最温和、最稳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的银行专家，也不得不做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的《银行》杂志就“贴现公司”资本增加到三亿马克这一点写道：“其他银行也会跟着走上这条道路的，现在在经济上统治着德国的三百人，将会逐渐减到五十人、二十五人甚至更少一些。不要以为最新的集中运动将仅限于银行业。各个银行间的紧密联系，自然会使这些银行所保护的工业家的辛迪加接近起来……总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会惊奇地发现我们面前尽是一些托拉斯，到那时就必须以国家垄断来代替私人垄断。然而，除了听凭事情自由地发展，让股票稍稍加速这种发展以外，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①

这就是资产阶级政论家无可奈何的典型表现，而资产阶级学者和这种政论家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更不老实，力图掩饰事情的本质，拿树木来遮盖森林而已。看见集中的后果而感觉“惊奇”；“责备”资本主义德国的政府或资本主义的“社会”（“我们”）；害怕采用股票会“加速”集中，例如德国的一个“卡特尔问题”专家契尔施基就害怕美国托拉斯，“宁愿”要德国的卡特尔，因为德国的卡特尔似

^① 阿·兰斯堡《一家有三亿资本的银行》(A. Lansburgh: «Die Bank mit den 300 Millionen»), 见《银行》杂志1914年第1期第426页。

乎“不会象托拉斯那样过分地加快技术和经济的进步”^①，——这难道不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吗？

但是，事实还是事实。德国没有托拉斯，“只”有卡特尔，但统治德国的，不超过三百个资本巨头。而且这些巨头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有什么样的银行法，银行总是大大地加强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

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里写过：“银行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见俄译本第3卷第2部第144页³⁴⁷）。我们所引用的关于银行资本的增长、关于最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及其账户数目的增加等材料，都具体地向我们表明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公共簿记”，而且不仅是资本家阶级的公共簿记，因为银行所收集（虽然只是暂时收集）的，是一切货币收入，其中也有小业主的，也有职员的，也有少数上层工人的。“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从形式上看来，这是由现代银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最大的银行在法国不过三家到六家，在德国六家到八家，它们支配着几十亿几十亿的款额。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分配，就其内容来说，决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大资本（首先是最大的、垄断的资本）的利益，因为大资本是在民众忍饥挨饿，整个农业的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重工业”向其他一切工业部门收取贡税的条件下活动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方面，储金局和邮政机关也开始同银行竞争，它们是比较“分权”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

^① 齐·契尔施基所著前书第128页。

了更多的区域、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广大的居民群众中。下面是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收集的比较银行和储金局存款增加情形的统计材料①。

存款(单位十亿马克)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银行 存款	储金局 存款	银行 存款	储金局 存款	银行 存款	互贷协 会存款	储金局 存款
1880年……	8.4	1.6	?	0.9	0.5	0.4	2.6
1888年……	12.4	2.0	1.5	2.1	1.1	0.4	4.5
1908年……	23.2	4.2	3.7	4.2	7.1	2.2	13.9

储金局为了支付百分之四和百分之四点二五的存款利息，就必须给自己的资本找到“有利的”投资地方，如从事票据、抵押等业务。银行和储金局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失”。例如波洪和爱尔福特的商会，就要求“禁止”储金局经营票据贴现之类的“单纯的”银行业务；并且要求限制邮政机关经营“银行”业务②。银行大王好象是在担心国家垄断组织会不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钻出来站在他们旁边。当然，这种担心不过是一个办公室的两个科长之间的竞争。因为储金局的几十亿资本，实际上终究还是由那些银行资本巨头们支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

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所替代，还表现在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银行》杂志

① 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的材料，见《银行》杂志1910年第1期第1200页。

② 《银行》杂志1913年第811页和第1022页；1914年第713页。

写道：“从前交易所是流通中必要的中介人，当时银行还不能把发行的大部分有价证券推销到自己的顾客中间去，而现在交易所早已不是这样的中介人了。”^①

“‘任何银行都是交易所’，——这是一句现代的名言。银行愈大，银行业的集中愈有进展，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②“从前，在七十年代，象年轻人那样放荡的〈这是对1873年交易所的崩溃，对滥设企业者的丑事³⁴⁸等等所作的一种“微妙的”暗示〉交易所，开辟了德国的工业化时代，而现在银行和工业已经能‘独自应付’了。我国大银行对交易所的统治……正表明德国是一个十分有组织的工业国。如果说这样就缩小了自动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的范围，而大大扩大了通过银行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的范围，那末少数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方面所负的责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③德国教授舒尔采-格弗尼茨就是这样写的，这位教授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是各国帝国主义者眼中的权威，他力图抹杀一件“小事情”，即这种通过银行进行的“有意识的调节”，就是由极少数“十分有组织的”垄断者来掠夺大众。资产阶级教授的任务不是暴露全部内幕，不是揭穿银行垄断者的种种勾当，而是加以粉饰。

一位更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和银行“活动家”里谢尔也完全一样，他用一些言之无物的空话来回避无可否认的事实：“交易所从前有一种为全部经济和有价证券流通所绝对必需的性能，它当时不仅是它所汇集的那些经济运动的一种最准确的尺度，而且几乎

① 《银行》杂志1914年第1期第316页。

② 奥斯卡尔·施提利希博士《货币与银行业》(Dr. Oscar Stillich: «Geld- und Bankwesen») 1907年柏林版第169页。

③ 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杜宾根版第101页。

是那些经济运动的一个自然的调节者，而现在这种性能已经逐渐消失了。”^①

换句话说，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的现象的鲜明特征，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人们自然要问，这种最新的资本主义究竟“过渡”到哪里去呢？但是，资产阶级学者都不敢提出这个问题。

“在三十年前，不属于‘工人’体力劳动范围以内的经济工作，十分之九都是由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来做的。而现在呢，这种经济上的脑力工作十分之九都是由职员们来担任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银行业。”^②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这种供认，使人们一再想问：最新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向哪里去的过渡呢？——

在少数几个由于集中过程而仍然处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领导地位的银行中间，成立垄断协定、组织银行托拉斯的倾向自然会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九家，而是两家最大的银行，即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和摩根的银行，控制着一百一十亿马克的资本^③。在德国，我们上面指出的“贴现公司”吞并“沙福豪森联合银行”的事实，引起了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兰克福报》³⁴⁰如下的一段评论：

“随着银行的日益集中，一般可以发放贷款的机构也减少了，

① 里谢尔所著前书第4版第629页。

② 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杜宾根版第151页。

③ 《银行》杂志1912年第1期第435页。

这就使大工业更加依赖于少数银行集团。在工业同金融界联系密切的情况下，需要银行资本的那些工业公司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工业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看待银行的日益托拉斯化（联合成或转变为托拉斯）；的确，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各大银行康采恩开始成立某种协定，某种限制竞争的协定。”^①

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成就还是垄断。

说到银行和工业的密切联系，那末，正是在这一方面，银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现得最明显。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期票，给他开立往来账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地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也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账使银行能够更详细、更充分地知道这位顾客的经济情形（事实上确实如此），那末，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

同时，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所谓个人联合也发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而日益溶合起来。德国经济学家厄伊得尔斯搜集了关于这种形式的资本集中和企业集中的极为详细的材料。柏林六家最大的银行由经理作代表，参加了三百四十四个工业公司，又由董事作代表，参加了四百零七个公司，一共参加了七百五十一个公司。它们在二百八十九个公司中各有两个监事，或者占据了监事长的位置。在这些工商业公司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如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饭馆、戏院、工艺美术业等等。另一方面，在这六家银行的监事会中（在1910年）有五十一个最大的工业家，其

^① 引自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前文，见《社会经济概论》第155页。

中有克虏伯公司的经理,大轮船公司«Hapag»(Hamburg—Amerika)^①的经理等等。在1895—1910年间,这六家银行中的每一家银行都参加了替数百个(二百八十一至四百十九个)工业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工作^②。

除了银行和工业进行“个人联合”以外,这两种公司又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厄伊得尔斯写道:“他们自愿把监事的位置让给很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当局交涉的时候得到不少的方便<!!>……”“在大银行的监事会里,常有国会议员或柏林市议会的议员。”

可见,所谓大资本家垄断组织,正在通过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途径十分迅速地创立和发展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几百个金融大王之间的某种分工正在有步骤地形成:

“除了个别大工业家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如加入银行董事会等等),“地方银行经理专管某一工业区以外,大银行领导人之间的专业化也有某些加强。这样的专业化,只有在整个银行企业的规模很大,尤其是在银行同工业的联系很广的时候,才可能实现。这种分工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把联系整个工业界的事情交给一个经理,作为他的专职;另一方面,每个经理都负责监督几个企业或几组在行业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有组织地监督各个企业的程度了)……某个经理专门管德国工业,甚至专门管德国西部的工业(德国西部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另一些经理则专门负责同外国和外国工业联系,了解工业家等等的个人的情况,掌管交易所业务等等。此外,银行的每个经理又往往专管某个地方或某个工业部门:有的主

① “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编者注

② 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和里谢尔所著前书。

要是在电力公司监事会里工作,有的是在化学工厂、啤酒厂或制糖厂里工作,有的是在单独的企业中工作,同时又参加保险公司监事会……总而言之,在大银行里,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大和业务种类的增多,领导人的分工无疑也就更加细密,其目的(其结果)是使他们的知识稍微超出所谓单纯的银行业务,使他们更有判断的能力,更熟悉工业的一般问题以及各工业部门的特殊问题,培养他们在银行的工业势力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能力。除了这些办法以外,银行还竭力挑选熟悉工业的人物、企业家、过去的官吏,特别是在铁路和采矿部门中工作过的官吏,来参加本银行的监事会”等等。^①

在法国银行业里,也有这类的机构,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例如,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之一“里昂信贷银行”,专门设了一个“金融情报收集部”(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在那里工作的经常有五十多个工程师、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等。这个机构每年耗费六七十万法郎。这个部又分成八个科:一科专门收集关于工业企业的情报,另一科研究一般统计,第三科研究铁路和轮船公司,第四科研究证券,第五科研究财务报告等等。^②

结果,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溶合起来,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中肯的说法,日益混合生长了;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万能的性质”的机构。我们认为必须引用在这方面最有研究的作家厄伊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的看法:

“我们考察了全部工业联系,结果发现那些为工业工作的金融机构具有万能的性质。大银行同其他形式的银行相反,同有时著作中提出的关于银行应当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或某一工业部门

① 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157页。

② 引自欧根·考夫曼关于法国银行的文章,见《银行》杂志1909年第2期第851页及往下各页。

工作,以免丧失立足点这样的要求相反,总是力求在尽可能不同的地区和生产部门同工业企业发生联系,力求消除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发生的资本分配不均的现象。”“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加强;这两种趋势在六大银行中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已经在同样程度上大规模地实现了。”

在工商界经常听到有人埋怨银行的“恐怖主义”。既然大银行象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发号施令”,那末听到这样的埋怨也就不奇怪了。1901年11月19日,柏林所谓D字银行(四家最大银行的名称都是以字母D开头的)之一,给“北德—西德—中德水泥辛迪加”管理处写了这样一封信:“兹阅贵处本月18日在某报上登载的通知,我们应当认为贵辛迪加定于本月30日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贵企业而为敝行所不能接受的决议。因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不得不停发贵辛迪加所享有的贷款……如此次大会并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决议,并对将来也不通过这种决议提出相应的保证,敝行愿就给予贵辛迪加以新贷款的问题举行谈判。”^①

其实,这也就是小资本在埋怨大资本的压迫,不过这里列入“小”资本的,是整整的一个辛迪加罢了!大小资本之间的旧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无比的发展阶段上恢复起来了。当然,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例如银行设立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局”等等。

^① 奥斯卡尔·施提利希博士《货币与银行业》1907年柏林版第148页。

大银行的领导人自己不会看不到这里所形成的，是国民经济的一些新条件，但是他们在这些条件面前束手无策。

厄伊得尔斯写道：“凡是在最近几年来考察过大银行经理和监事人选变更情形的人，都不能不看出，权力逐渐转到了一些认为积极干预一般工业的发展是大银行必要的、愈来愈迫切的任务的人物手中，并且，这些人和老的银行经理在业务方面，往往也在个人关系方面就由此发生了意见分歧。实质上问题是在这里：银行是一种信用机关，它会不会因为干预工业生产过程而受到损失呢；它会不会因为从事这种同信贷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业务，从事这种会使它比从前更受工业行情的盲目支配的业务，而牺牲掉自己的稳固的原则和可靠的利润呢。许多老的银行领导人都这样说。但是，大部分新起的领导人却认为积极干预工业问题是必然的，正象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必然会产生大银行和最新的工业银行业一样。双方的意见只有一点相同，就是大家都认为大银行的新业务既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①

旧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新资本主义是向某方面去的一种过渡。要想寻找“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来“调和”垄断和自由竞争，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实践家的自白，听起来和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之流的“理论家”的颂扬完全不同，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在用官场口吻颂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美妙。

大银行的“新业务”究竟是什么时候完全确立起来的呢，——关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厄伊得尔斯那里找到相当确切的答复：

“工业企业间的联系及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机构即既

^① 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183—184页。

按集权又按分权原则组织起来的大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现象，未必早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把这个起点移到 1897 年，当时各种企业都实行了大‘溶合’，为了适应银行的工业政策而第一次造成了新式的分权组织。也许还可以把这个起点移到更晚一些的时候，因为只有 1900 年的危机才大大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过程，巩固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把银行和工业的联系变成大银行的真正垄断，并大大地密切了和加强了这种联系。”^①

总之，二十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主义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运用工业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支配资本，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就是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只好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中。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②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

^① 厄伊得尔所著前书第 181 页。

^② 鲁·希法亭《金融资本》1912 年莫斯科版第 338—339 页。

引这个定义的那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地指出了资本家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现在我们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家垄断组织的“经营”怎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资产阶级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如里谢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辩护士。对于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国会的联系等等，他们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他们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号召银行经理们拿出“责任心”，赞扬普鲁士官员们的“尽职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和“条规”法案中的细枝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把戏，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商业是收集财富、保管财富、把财富供人支配的一种经营活动**”^①（着重号和黑体是该教授著作中原有的）……这样说来，商业在不知道交换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会存在下去！

但是，有关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了，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无论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市侩式的批评。

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出来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

^① 罗·利夫曼所著前书第476页。

制”。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最先注意到了问题的实质，请看他是怎样叙述的：

“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译是“母亲公司”）；总公司又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等等。于是，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一百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八百万资本。如果这样‘交错’下去，那末拥有一百万资本就能控制一千六百万、三千二百万以至更多的资本了。”^①

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就能操纵股份公司的业务^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算是社会民主党人”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它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老的和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德国法律不许发行一千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金融巨头看见英国法律准许发行一英镑（等于二十个马克，约合十个卢布）的股票，就羡慕不已。1900年6月7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德国国会中声称：“一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③这个商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同那位被认为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很不光彩的作家³⁵⁰比起来，显然要深刻得多，“马克思

①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68—269页。

② 利夫曼所著前书第1版第258页。

③ 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前文，见《社会经济概论》第5卷第2期第110页。

主义”得多，那位作家竟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

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势力大大地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女儿公司”负责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做出”种种的事情。下面是我们从1914年5月德国《银行》杂志上抄下来的例子：

“加塞尔的‘弹簧钢股份公司’在几年以前算是德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后来因为管理不善，股息从百分之十五跌到百分之零。原来，董事会没有通知股东就出借了六百万马克给自己的一个‘女儿公司’——‘哈西亚’，而‘哈西亚’名义上的资本只有几十万马克。这笔几乎比‘母亲公司’的股份资本大两倍的借款，根本没有记在‘母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在法律上，这样隐瞒账目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隐瞒整整两年，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商业法。监事长虽然以负责人的资格在这种虚假的资产负债表上签了字，但他仍旧是加塞尔商会的会长。这笔借款被发现是个错误（错误这两个字，作者应当加上引号），知道底细的人开始把‘弹簧钢股份公司’的股票卖出去而使股票价格几乎下跌了百分之百，在这以后很久，股东们才知道有借款给‘哈西亚’公司这回事……

……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这种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最新的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办法，不但使董事们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使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用及时出卖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替自己所做的一切

事情负责……

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古时代有名的隐迹纸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内容。”（隐迹纸本是涂掉原来的字迹重新写上别的内容的一种羊皮纸稿本。）

“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看不懂的办法，是成立‘女儿公司’或合并‘女儿公司’，把一个统一的企业分成几部分。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现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简直是一种例外。”①

作者举出了著名的“电气总公司”（即 A. E. G.，这个公司我们以后还要讲到），作为最大的垄断公司极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的例子。据 1912 年的计算，这个公司参与了一百七十五至二百个公司，当然就统治了这些公司，总共掌握了大约十五亿马克的资本②。

好心的——即怀有维护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员们，用来吸引公众注意的办法，例如拟订种种监督条例、公布资产负债表、制定一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设立监察机构等等，在这里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谁也不能禁止股票的买卖、交换和典押等等。

“参与制”在俄国大银行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叶·阿加德提供的材料来判断。阿加德在“俄华银行”工作了十五年，他在 1914 年 5 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十分确切，叫做《大银行与

① 路·厄什韦葛《女儿公司》(L. Eschwege: «Tochtergesellschaften»), 见《银行》杂志 1914 年第 1 期第 545 页。

② 库尔特·海尼希《电力托拉斯之路》(Kurt Heinig: «Der Weg des Elektrot trusts»), 见《新时代》杂志²⁴ 1912 年第 30 年卷第 2 分卷第 484 页。

世界市场》^①。作者把俄国大银行分为两大类：(甲)“参与制”下的银行；(乙)“独立的”银行，然而他把“独立”任意地理解为不依赖于外国银行。作者又把第一类分为三小类：(1)德国参与的；(2)英国参与的；(3)法国参与的，——这是指各该国家最大的国外银行的“参与”和统治。作者把银行资本分为“生产性”的投资(投入工商业的)和“投机性”的投资(投入交易所业务和金融业务的)，他抱着他那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似乎可以把第一种投资和第二种投资分开，并且消除第二种投资。

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各银行的资产(根据 1913 年 10—11 月的表报)

(单位百万卢布)

俄 国 银 行 种 类	所投的资本		
	生产性的	投机性的	共 计
(甲 1) 4 家银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俄罗斯银行，国际银行，贴现银行……	413.7	859.1	1 272.8
(甲 2) 2 家银行：工商银行，俄英银行……	239.3	169.1	408.4
(甲 3) 5 家银行：俄亚银行，圣彼得堡私人银行，亚速海顿河银行，莫斯科联合银行，俄法商业银行……	711.8	661.2	1 373.0
(11 家银行)总 计……(甲)=	1 364.8	1 689.4	3 054.2
(乙) 8 家银行：莫斯科商人银行，伏尔加河—卡马河银行，容克股份银行，圣彼得堡商业银行(从前的弗斐堡银行)，莫斯科银行(从前的列布申斯基银行)，莫斯科贴现银行，莫斯科商业银行，莫斯科私人银行……	504.2	391.1	895.3
(19 家银行)共 计……	1 869.0	2 080.5	3 949.5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近四十亿卢布的大银行“活动”资本当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即三十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外国银行的“女儿公司”的那些银行;这些外国银行主要是巴黎的银行(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在1906—1912年间,把资本由四千四百万卢布增加到九千八百万卢布,把准备金由一千五百万卢布增加到三千九百万卢布,“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德国的资本”;前一家银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银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银行属于柏林“贴现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的银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软弱无力,感到十分愤慨。自然,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最肥的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了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放在自己的皮包里,一年之后,以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的市价,即几乎高一倍的市价售出,“赚了”约六百万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希法亭所说的“创业利润”。

据该书作者计算,彼得堡各最大银行的全部“实力”,等于八十二亿三千五百万卢布,几乎达到八十二亿五千万之多;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外国银行的“参与”,确切些说,各个外国银行的统治划分如下:法国银行占百分之五十五,英国银行占百分之十,德国银行占百分之三十五。据作者计算,在这八十二亿三千五百万职能资本

① 叶·阿加德《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从大银行对俄国国民经济和德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来看大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政治作用和经济作用》(E. Agahd:《Großbanken und Weltmark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Großbanken im Weltmark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Einflusses auf Rußlands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1914年柏林版。

当中，有三十六亿八千七百万，即百分之四十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石油业辛迪加、冶金业辛迪加、水泥业辛迪加。可见，由于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溶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税。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经营”的无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1887年哈夫迈耶把十五个小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糖业托拉斯，这些小公司的资本总额为六百五十万美元。而这个托拉斯的资本，正象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掺了水”的，竟估定为五千万美元。这种“过度资本化”是因为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正象美国的钢业托拉斯因为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就购买愈来愈多的铁矿产地一样。后来，这个糖业托拉斯果然规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竟能为“掺水”七倍的资本支付百分之十的股息，也就是为创办托拉斯时实际投入的资本支付将近百分之七十的股息！到1909年，这个托拉斯的资本为九千万美元。在二十二年内，资本增加了十几倍。

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反对法国金融寡头》，是里季斯一本名著的标题，1908年出了第五版），只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而已。四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所享有的，不是相对的垄断，而是“绝对的垄断”。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垄断保证它们能从发行证券获得垄断利润。在借债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十被银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银行从四亿法郎的中俄公债中得到百分之八的利润，从八亿法郎的俄国公债（1904年）中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润，从六千二百

五十万法郎的摩洛哥公债(1904年)中得到百分之十八点七五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里季斯说:“法国人是欧洲的高利贷者。”各种经济生活条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蜕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代表八百万法郎资本的五十个人,能够支配四家银行的二十亿法郎。”我们谈过的那个“参与”制,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最大银行之一的“总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为“女儿公司”“埃及精糖厂”发行了六万四千张债券。发行的市价是百分之一百五十,就是说,银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赚了五十个戈比。后来发现这个“女儿公司”的股息是虚假的,这样就使“公众”损失了九千万至一亿法郎;“‘总公司’有一个经理是‘精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做出结论说:“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①。

发行有价证券,是金融资本的主要业务之一。这种业务的利润率特别高,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极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杂志写道:“在发行外国公债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获得的利润是十分高的,国内没有任何一种生意能够获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润。”^②

“没有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能够获得象发行行业那么高的利润。”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发行工业企业有价证券的利润每年平均如下:

^① 里季斯《反对法国金融寡头》(Lysis: «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1908年巴黎第5版第11、12、26、39、40、48等页。

^② 《银行》杂志1913年第7期第630页。

1895 年——38.6%	1898 年——67.7%
1896 年——36.1%	1899 年——66.9%
1897 年——66.7%	1900 年——55.2%

“在 1891—1900 年的十年间，靠发行德国工业有价证券‘赚到’的钱有十亿以上。”^①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大得无比的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赖银行的好机会。”^②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特的矿业“联合”股份公司，是在 1872 年创办的。发行的股份资本将近四千万马克，而在第一个年度获得百分之十二的股息时，股票市价就涨到百分之一百七十。金融资本捞到了最肥的油水，赚了二千八百万的小利。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三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东们只好赞成“冲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三十年中，“联合”公司的账

① 施提利希所著前书第 143 页，以及威·桑巴特《十九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W.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1909 年第 2 版第 526 页，附录 8。

② 《金融资本》第 172 页。

簿上消失了七千三百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五了”^①，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总是“赚钱”的。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分成小块有利地卖出去等等，首先要看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担任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有联系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典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厄什韦葛称做“泥潭”的局面：城郊土地的投机狂，建筑公司的倒闭（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诺尔公司”的倒闭，这个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帮助，弄到了一亿马克的巨款，这个银行当然是通过“参与”制暗地里在背后活动，结果银行“不过”损失一千二百万马克了事），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们的破产，以及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机关勾结起来干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②。

“美国风气”本来是欧洲的教授和好心的资产者假惺惺地憎恶的，而在金融资本时代，简直成了各国各大城市流行的风气。

1914年初，在柏林传说要组织一个“运输业托拉斯”，即由柏林的三个运输企业（城市电气铁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和公共马车公司）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杂志写道：“当公共马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转到其他两个运输公司手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

① 施提利希所著前书第138页，以及利夫曼所著前书第51页。

② 路·厄什韦葛《泥潭》（L. Eschwege: «Der Sumpf»），见《银行》杂志1913年第952页；同上杂志1912年第1期第223页及往下各页。

就知道有这种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这种目的的人是希望通过统一调整运输业来节省一些费用，这样对于公众终究是有些好处的。但是这个问题弄复杂了，因为站在这个正在创建的运输业托拉斯背后的是这样一些银行，它们可以任意地使自己所垄断的交通运输业服从自己的土地买卖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相信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在创办城市电气铁路公司的时候，鼓励创办该公司的那家大银行的利益就已经渗透进来了。就是说，这个运输企业的利益和土地买卖的利益交错在一起了。因为这条铁路的东线要经过银行的土地，当该路的建设已经有保证时，银行就把这些土地卖出去，使自己和几个参与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①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在德国经济著作中，通常都是阿谀地赞美普鲁士官员的廉洁，而指责法国的巴拿马案件³⁵¹和美国政界的贿赂风气。但是事实是，甚至专论德国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书刊，也不得不经常谈到远远越出单纯银行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针对官员们愈来愈多地转到银行去服务这件事，有人谈到“钻进银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培廉街（在柏林，“德意志银行”设在那里）钻营一个肥缺的官员，他的廉洁情形究竟怎样呢？”^②《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在1909年写了《拜占庭主义的经济意义》一文，其中谈到威廉二世到巴勒斯坦去的旅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结果，即巴格达铁路的建筑，这一不幸的‘德意志进取精神的大事件’，对于

① 《运输业托拉斯》（《Verkehrstrust》），见《银行》杂志1914年第1期第89页。

② 《钻进银行的欲望》（《Der Zug zur Bank》），见《银行》杂志1909年第1期第79页。

德国受‘包围’一事应负的责任，比我们所犯的一切政治错误所应负的责任还要大”（所谓“包围”是指爱德华七世力图孤立德国，用帝国主义的反德同盟圈来包围德国的政策）^①。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厄什韦葛，在1911年写了一篇《财阀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国官员费尔克尔的事情。费尔克尔当过卡特尔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很卖力气，但是不久以后却在最大的卡特尔——钢业辛迪加中得到了一个肥缺。这类决不是偶然的事情，迫使这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得不承认说，“德国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普遍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保证我们不变成不自由的人民”^②。

说到俄国，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载过一个消息，说信用局局长达威多夫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到一家大银行任职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几年里所得的薪俸将超过一百万卢布。信用局是个“统一全国所有信用机关业务”的机关，它给了首都各银行总数达八亿至十亿卢布的津贴^③——。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至于这一过程进行到

① 《银行》杂志第301页。

② 《银行》杂志1911年第2期第825页；1913年第2期第962页。

③ 叶·阿加德所著前书第202页。

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业,即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①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经济著作分别地引用过。下面是四个十年中的总数:

每十年内发行证券的数目(单位十亿法郎)

1871—1880 年.....	76.1
1881—1890 年.....	64.5
1891—1900 年.....	100.4
1901—1910 年.....	197.8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总数增加了,特别是由于普法战争以及德国战后滥设企业时期发行的公债而增加了。大体说来,在十九世纪最后三个十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快,直到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才大大增加,十年之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见,二十世纪初,不仅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资本的增长方面,都是一个转折时期。

据奈马尔克计算,1910年全世界有价证券的总数大约是八千一百五十亿法郎。他大致地减去了重复的数字,把这个数目缩小到五千七百五十亿至六千亿法郎。下面是这个数目在各国分布的情形(这里引用的总数是六千亿):

^①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1912年海牙版第19卷第2册。第2栏关于各个小国家的材料,大致是按1902年的数目增加百分之二十计算出来的。

1910年有价证券数目(单位十亿法郎)

英国.....	142	} 479	荷兰.....	12.5
美国.....	132		比利时.....	7.5
法国.....	110		西班牙.....	7.5
德国.....	95		瑞士.....	6.25
俄国.....	31		丹麦.....	3.75
奥匈帝国.....	24		瑞典、挪威、罗马尼亚 等国.....	2.5
意大利.....	14			
日本.....	12		共 计.....	600.0

从这些数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四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它们各有约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们以下就要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发展速度上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和德国。这四个国家一共有四千七百九十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际银行家、这四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

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赖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 资 本 输 出

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候，劳动力也成

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起先，英国早于别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实行自由贸易，企图成为“世界工厂”，由它供给各国成品，这些国家则供给它原料作为交换。但是英国的这种垄断局面，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已经被破坏了，因为当时有许多国家用“保护”关税来自卫，发展成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二十世纪开始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大量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已经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的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

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下面是三个主要国家国外投资的大概数目^①：

国外投资(单位十亿法郎)

年 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1862.....	3.6	—	—
1872.....	15	10(1869年)	—
1882.....	22	15(1880年)	?
1893.....	42	20(1890年)	?
1902.....	62	27—37	12.5
1914.....	75—100	60	44

由此可见，资本输出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三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一千七百五十亿至二千亿法郎。按百分之五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每年会有八十亿至一百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

① 霍布森《帝国主义》(Hobson:《Imperialism》)1902年伦敦版第58页；里谢尔所著前书第395页和404页；保·阿伦特(P. Arndt)的文章，见《世界经济文汇》(《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16年第7卷第35页；奈马尔克(Neymarck)的文章，见公报(Bulletin)；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92页；劳合-乔治(Lloyd-George)1915年5月4日在英国下院的演说，见1915年5月5日的《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伯·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B. Harms:《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1912年耶拿版第235等页；济格蒙德·施尔德博士《世界经济发展趋势》(Dr. Sigmund Schilder:《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Weltwirtschaft》)1912年柏林版第1卷第150页；乔治·派施《大不列颠……的投资》(George Paish:《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etc.》)，见《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第74卷1910—1911年第167页及往下各页；若尔日·迪乌里奇《德国银行在国外的扩张及其同德国经济发展的关系》(Georges Diouritch:《L'Expansion des banques allemandes à l'étranger, ses rapports avec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1909年巴黎版第84页。

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这种国外投资究竟在各国之间怎样分配，究竟投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问题，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回答，可是这个大概的回答也足以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的某些一般的相互关系和联系了：

国外投资在世界各洲分布的大概情形(1910年左右)

(单位十亿马克)

	英国	法国	德国	共计
欧洲.....	4	2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亚洲、非洲、澳洲.....	29	8	7	44
总 计	70	35	35	140

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领土，它的这种殖民地领土在美洲也很多(例如加拿大)，在亚洲和其他各洲更不必说了。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关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讲到。法国的情形不同。它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不下一百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贷资本即公债，而不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资。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德国又是另外一种，它的殖民地不多，它的国外投资在欧美两洲是分布得最平均的。

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末这只会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相当的“利益”，这种利益

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例如柏林的《银行》杂志在1913年10月写道：

“在国际的资本市场上，近来正在上演一出很值得阿里斯托芬动笔描写的喜剧。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金融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现在金融市场上的情况并不怎样美妙，政治的前途也未可乐观。但是没有一个金融市场敢于拒绝贷款，惟恐相邻的市场预先同意贷款而换得某种报酬。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乎总要占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定购大炮。”^①

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法国在最近二十年中（1890—1910年）常常采用这种手段。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巨大的企业之间订立的契约，按照施尔德尔“婉转的”说法^②，往往“接近收买的边缘”。德国的克虏伯、法国的施耐德、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就是这种同大银行和政府有紧密联系的公司的标本，在缔结贷款条约时，是不容易“撇开”它们的。

法国贷款给俄国的时候，就在1905年9月16日缔结的贸易条约上，把俄国“压”了一下，取得了直到1917年为止的相当的让步；在1911年8月19日同日本缔结贸易条约时，也是如此。奥地利同塞尔维亚的关税战争从1906年开始，一直继续到1911年，中

^① 《银行》杂志1913年第2期第1024页。

^②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346、350、371页。

间只有七个月的休战，这次关税战争部分是由奥地利和法国供应塞尔维亚军用物资方面的竞争所引起的。1912年1月，保尔·德沙尼尔在议会里说，法国公司在1908—1911年间供给塞尔维亚的军用物资，价值达四千五百万法郎。

奥匈帝国驻圣保罗(巴西)领事在报告中说：“巴西修筑铁路，大部分用的是法、比、英、德的资本；这些国家在办理同修筑铁路有关的金融业务时，商定由它们供应铁路建筑材料。”

这样看来，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德国帝国主义者看见“老牌”殖民国家在这方面特别“顺利”，真是羡慕不已。在1904年，英国有五十家殖民地银行和二千二百七十九家分行(1910年有七十二家银行和五千四百四十九家分行)，法国有二十家殖民地银行和一百三十六家分行，荷兰有十六家殖民地银行和六十八家分行，而德国“总共只有”十三家殖民地银行和七十家分行^①。美国资本家也羡慕英德两国的资本家，他们在1915年诉苦说：“在南美，五家德国银行有四十家分行，五家英国银行有七十家分行……最近二十五年来，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投了约四十亿美元的资本，结果支配了这三个国家全部商业的百分之四十六。”^②

从假借的意义来说，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分割完了。但是，金融资本又引起了直接的分割世界。

^① 里谢尔所著前书第4版第375页，并见迪乌里奇所著前书第283页。

^② 《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15年5月第59卷第301页。在这卷第三三一页上又写着：据著名的统计学家派施(Paish)在最近一期的金融杂志《统计学家》(《Statist》)上的计算，英、德、法、比、荷五国输出的资本总额是四百亿美元，等于二千亿法郎。

五 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分割国内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把本国的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以及“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张，“自然”就使得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全世界的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

这是全世界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无比的阶段。我们来看看这种超级垄断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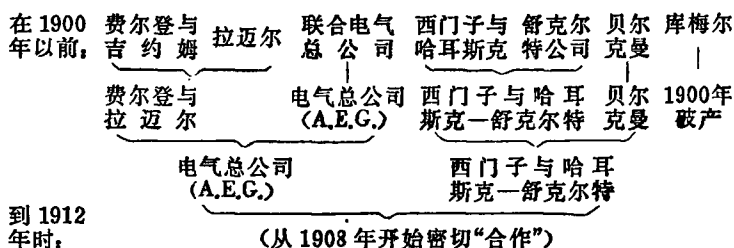
电力工业是最能代表最新的技术成就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在德国，1900年的危机特别有力地促进了这个部门的集中。当时已经同工业相当紧密地混合生长的银行，在这个危机时期大大地加速和加深了较小企业的死亡和大企业吞并较小企业的过程。厄伊得尔斯写道：“银行停止援助的正是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企业，这样就使那些同银行联系不够密切的公司，起初虽有蓬勃的发展，后来却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①

结果在1900年以后，集中有了长足的进展。在1900年以前，电力工业中有七八个“集团”，每个集团都是由几个公司（总共有二十八个公司）组成的，每个集团背后都有二至十一家银行。到

^① 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2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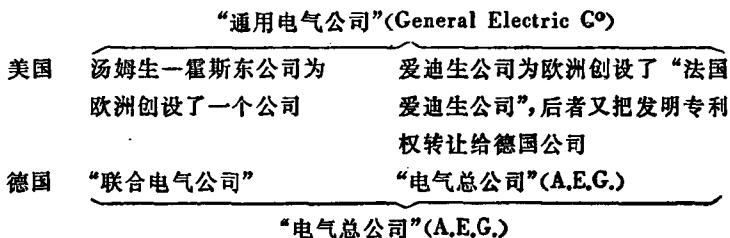
1908—1912年时，所有这些集团都合并成两个或一个集团了。这个过程如下：

电力工业中的集团



这样成长起来的著名的电气总公司(A. E. G.)统治着一百七十五至二百个公司(通过“参与”制)，总共支配着约十五亿马克的资本。单是它在国外的直接代表机构就有三十四个，其中有十二个是股份公司，分设在十多个国家中。德国电力工业在国外的投资，远在1904年时，据计算就有二亿三千三百万马克，其中有六千二百万投在俄国。不用说，这个“电气总公司”是一个巨大的“联合”企业，单是它的制造公司就有十六个，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从电缆和绝缘体起，到汽车和飞机为止。

但是，欧洲的集中也就是美国集中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经过情形如下：



于是形成了两个电力“强国”。海尼希在他的《电力托拉斯之

路》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它们的电力公司。”关于这两个“托拉斯”企业的周转额和规模，下列数字能使我们得到某种（远不是完整的）概念：

	商品周转额 (单位百万马克)	职员人数	纯利 (单位百万马克)
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 (G. E. C.) ……………	1907 年, 252	28 000	35.4
	1910 年, 298	32 000	45.6
德国的“电气总公司” (A. E. G.) ……………	1907 年, 216	30 700	14.5
	1911 年, 362	60 800	21.7

后来在 1907 年，美国的托拉斯和德国的托拉斯缔结了瓜分世界的条约。竞争消除了。“通用电气公司”（G. E. C.）“获得了”美国和加拿大，“电气总公司”（A. E. G.）“分得了”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又缔结了关于“女儿公司”的特别的（当然是秘密的）条约，这些“女儿公司”正在渗入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还没有正式被瓜分的国家。此外还规定要互相交换发明和试验成绩。^①

要同这个实际上是统一的、支配着几十亿资本的、在世界各地有“分支机构”、代表机关、代办处以及种种联系等等的世界托拉斯竞争，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托拉斯分割世界的事实，当然并不排除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如果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破产等等而发生变化的话。

煤油工业就是企图实行这种重新分割，为重新分割而斗争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① 里谢尔所著前书，迪乌里奇所著前书第 239 页，库尔特·海尼希所著前文。

厄伊得尔斯在1905年写道：“世界的煤油市场现在还是被美国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C-y）和俄国巴库油田的老板路特希尔德与诺贝尔这两个大金融集团分占着。这两个集团彼此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几年以来，它们的垄断地位一直受到五大敌人的威胁”^①：（1）美国石油资源的枯竭；（2）巴库的曼塔舍夫公司的竞争；（3）奥地利的石油资源；（4）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5）海外的石油资源，特别是荷兰殖民地的石油资源（极富足的赛米尔公司和壳牌公司，它们同英国资本也有联系）。后面三个地区的企业是同最大的“德意志银行”所领导的那些德国大银行有联系的。这些银行为了拥有“自己的”据点而有计划地独自发展煤油工业，例如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煤油工业中，据计算1907年有外国资本一亿八千五百万法郎，其中德国资本占七千四百万。^②

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在经济著作中叫做“瓜分世界”的斗争。一方面，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想夺取一切，就在荷兰本土办了一个“女儿公司”，收买荷属印度的石油资源，想以此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英荷壳牌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银行”和其他柏林银行又力求把罗马尼亚“保持”在自己手里，使罗马尼亚同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拥有大得多的资本，又拥有运输煤油和供应煤油给消费者的出色的组织。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德意志银行”完全失败，在1907年它果然完全失败了，这时“德意志银行”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放弃自己的“煤油利益”，损失数百万，或者是屈服。结果“德意志银行”选择了后一条出路，同“煤油托拉斯”订立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德意

① 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193页。

② 迪乌里奇所著前书第245页。

志银行”必须“不做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但是又规定，一旦德国通过了国家煤油垄断法，这个条约即告失效。

于是一出“煤油喜剧”开始了。德国一个金融大王、“德意志银行”的经理冯·格文涅尔，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什塔乌斯进行主张煤油垄断的宣传。这家最大的柏林银行的整个庞大机构、一切广泛的“联系”都开动起来了，报刊上声嘶力竭地发出了反对美国托拉斯“压制”的“爱国主义的”叫嚣。1911年3月15日，德国国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了请政府制定煤油垄断法案的决议。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受众人欢迎的”主张。于是，“德意志银行”欺骗它的美国对手、用国家垄断来恢复自己业务的这一场赌博，好象是已经赢了。德国煤油大王已经做着一一种获得不亚于俄国糖厂主人的大量利润的美梦……但是，第一、德国各大银行在分赃上彼此发生了争吵，“贴现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银行”的自私自利；第二、政府害怕同洛克菲勒斗争，因为德国是否能不通过洛克菲勒而获得煤油，还很成问题（罗马尼亚的生产率不高）；第三、在1913年，正赶上德国要拨款十亿来准备战争。垄断法案搁下来了。斗争的结果是，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暂时获得了胜利。

柏林的《银行》杂志关于这点写道，德国只有实行电力垄断，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才能同“煤油托拉斯”斗争。这个杂志又说：但是，“电力垄断只有在生产者需要的时候才会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在下一次电力工业大危机逼近的时候，只有在各私营电力工业‘康采恩’现在在各处设立的、已经从市政府和国家等方面获得了某些垄断权的那些成本高的大电站不能获利的时候，才会实现。到那时候就只好使用水力；但是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也不能靠国家出钱来办；还是要交给‘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垄断组织’去经营，因为私营工业已经订立了许多契约……争得了巨额的补偿……以

前钾的垄断是如此，现在煤油的垄断是如此，将来电力的垄断也是如此。我们那些给美妙的原则迷住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总应当了解到：德国的垄断组织从来没有抱定过这样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结果，即为消费者带来好处或者交给国家一部分企业利润，它仅仅是为了用国家的钱来振兴快要破产的私营工业罢了。”^①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这种宝贵的供认。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个别环节而已。

在商轮航运业中，集中的巨大发展也引起了对世界的分割。德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公司，即“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和“北德路易邮船公司”，它们各有资本两亿马克（股票和债券），共有价值一亿八千五百万至一亿八千九百万马克的轮船。另一方面，美国在1903年1月1日成立了所谓摩尔根托拉斯，叫做“国际海上贸易公司”，联合了美英两国的九个轮船公司，拥有资本一亿二千万美元（四亿八千万马克）。早在1903年，德国大亨和这个美英托拉斯缔结了一项为瓜分利润而瓜分世界的条约。德国的公司不再在运输业上同英美两国竞争了。条约明确地规定了哪些海港“属于”谁，并且设立了一个共同的监察委员会等等。条约的期限定为二十年，同时规定了一个附带条件：一旦发生战争，该约即告失效^②。

国际钢轨卡特尔形成的历史，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早在1884

① 《银行》杂志 1912 年第 1 期第 1036 页，1912 年第 2 期第 629 页，1913 年第 1 期第 388 页。

② 里谢尔所著前书第 125 页。

年工业极为衰落的时候，英、比、德三国的钢轨制造厂就作过组织这种卡特尔的第一次尝试。它们议定不在缔约各国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国外市场则按下面的比例分割：英国得百分之六十六，德国得百分之二十七，比利时得百分之七。印度完全归英国。对于一个没有参加缔结协议的英国公司，它们就合力进攻，从出售总额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补偿进攻的耗费。但是到了1886年，有两个英国公司退出了同盟，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几次工业高涨的时期中，始终没有达成过协议。

1904年初，德国成立了钢业辛迪加。1904年11月，国际钢轨卡特尔又按下面的比例恢复起来了：英国得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德国得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三；比利时得百分之十七点六七。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所获得的份额在总数百分之百以外占有百分之四点八、百分之五点八、百分之六点四，即在百分之一百零四点八、百分之一百零五点八、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四的总数中占有百分之四点八、百分之五点八、百分之六点四。1905年，又有美国的“钢业托拉斯”（“钢业公司”）加入，随后奥地利和西班牙也加入了。弗格尔施坦在1910年写道：“现在，世界已经瓜分完了，于是大消费者，首先是国营铁路，——既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它们的利益又得不到照顾——就可以象诗人一样生活在丘必特的天宫里了。”^①

此外还要提一提1909年成立的国际锌业辛迪加，它把生产量在德、比、法、西、英等国的五个工厂集团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还有国际火药托拉斯，用利夫曼的话来说，它是“德国所有炸药厂的最新式的紧密同盟，后来这些炸药厂与法美两国用同样的方法组

^① 弗格尔施坦《组织形式》第100页。

织起来的炸药厂一起，可以说是共同瓜分了整个世界”^①。

据利夫曼统计，德国所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在1897年将近有四十个，到1910年就已经将近一百个了。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卡·考茨基现在也附和他们，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可以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骗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资本家同盟究竟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后面这一点最重要，只有它才能向我们说明当前事件的历史经济意义，因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分割世界)，时而强调这种斗争形式，时而强调那种斗争形式，这是符合譬如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论见解方面实质上已经转到德国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

^① 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拉斯》第2版第161页。

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的变更，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达成协议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墮落成诡辩家。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在从经济上分割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与此有联系的是，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在从领土上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六 列强分割世界

地理学家亚·苏潘在《欧洲殖民地领土的扩张》^①一书中，对十九世纪末殖民地领土的扩张情形，做了如下的简短的总结：

属于欧洲殖民列强（包括美国在内）的土地面积所占的百分比

	1876年	1900年	增减数
在非洲的……………	10.8%	90.4%	+79.6%
在玻里尼西亚的…	56.8%	98.9%	+42.1%
在亚洲的……………	51.5%	56.6%	+5.1%
在澳洲的……………	100.0%	100.0%	—
在美洲的……………	27.5%	27.2%	-0.3%

苏潘得出结论说：“可见，分割非洲和玻里尼西亚，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因为在亚洲和美洲，未被占据的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扩大苏潘的结论，应该说，世界

^① 亚·苏潘《欧洲殖民地领土的扩张》(A. Supan: «Die 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 1906年版第254页。

分割完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未被占据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是第一次被分割完了，所以将来只有重新分割，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这里，首先就发生了两个事实问题：殖民政策的加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的尖锐化是不是恰好在金融资本时代才出现的呢？在这方面，现在世界分割的情形究竟怎样呢？

美国作家莫利斯在他写的一本关于殖民史的著作中^①，综合了有关英、法、德三国在十九世纪各个时期的殖民地领土面积的材料。现在把他所得出的总数摘录如下：

殖民地领土面积

年 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人 口 (单位 百万)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人 口 (单位 百万)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人 口 (单位 百万)
1815—1830年	?	126.4	0.02	0.5	—	—
1860年	2.5	145.1	0.2	3.4	—	—
1880年	7.7	267.9	0.7	7.5	—	—
1899年	9.3	309.0	3.7	56.4	1.0	14.7

^① 亨利·克·莫利斯《殖民史》(Henry C.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1900年纽约版第2卷第88页；第1卷第419页；第2卷第304页。

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 1860—1880 年这个时期,而且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还在大量地夺取。法德两国加紧夺取殖民地也正是在这二十年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霍布森在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把 1884—1900 年这个时期划为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扩大领土)的时期。据他计算,在这个时期中,英国夺得了三百七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五千七百万人口;法国夺得了三百六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三千六百五十万人口;德国夺得了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一千四百七十万人口;比利时夺得了九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三千万人口;葡萄牙夺得了八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九百万人口。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拚命争夺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 1840—1860 年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麦·伯尔在 1898 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现代英国帝国主义”的文章^①中指出,在 1852 年的时候,象迪斯累里这样一个一般说来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要人,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石磨。”而到十九世纪末,成为英国风云人物的,已经是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最无耻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谢西尔·罗得斯

^① 《新时代》杂志 1898 年第 16 年卷第 1 分卷第 302 页。

和约瑟夫·张伯伦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当权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最新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了。张伯伦曾经特别指出目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所遇到的德国、美国、比利时方面的那种竞争，而鼓吹帝国主义是“代表真理的、英明的和经济的政策”。资本家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他们就创办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也随声附和地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去夺取世界上尚未瓜分的土地。据谢西尔·罗得斯的密友新闻记者斯特德说，1895年罗得斯曾经同他谈到自己的帝国主义思想，罗得斯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充满‘面包，面包！’的呼声的粗野的发言。回家时，我把看到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神圣的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四千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①

这就是百万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谢西尔·罗得斯在1895年讲的话。他对帝国主义的辩护不过有些笨拙、无耻，实质上和马斯洛夫、休特古姆、波特列索夫、大卫诸先生以及那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等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谢西尔·罗得斯是一个比较老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为了对世界领土的分割情况和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变化作一个尽可能确切的叙述，我们要利用苏潘在上述那部关于世界列强

^① 《新时代》杂志1898年第16年卷第1分卷第304页。

殖民地领土问题的著作中提供的综合材料。苏潘选的是1876年和1900年。我们现在选择1876年(这一年选得很恰当,因为正是到这个时候,西欧垄断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整个说来,可以算是发展完了)和1914年,并且用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上的比较新的数字来代替苏潘的数字。苏潘只列出了殖民地,我们认为,把关于非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的简略数字补充进去,对描绘世界分割的全貌是有益的。我们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

结果如下:

列强的殖民地领土

(面积单位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单位百万居民)

	殖 民 地				宗主国		共 计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六大国总计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其他强国(比利时、荷兰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中国、土耳其)..... 14.5 361.2

其他各国..... 28.0 289.9

全 球..... 133.9 1 657.0

我们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是分割“完毕”了。1876年以后，殖民地领土有极大的扩张：六个最大的强国的殖民地领土增加了一半以上，由四千万平方公里增加到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增加了二千五百万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国的面积（一千六百五十万）多一半。其中有三个强国在1876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强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没有。到1914年，这四个强国获得的殖民地面积为一千四百一十万平方米，即大致等于欧洲面积的一倍半以上，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一亿。殖民地领土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等于德日两国殖民地总和的三倍。不过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代的初期，法国金融资本的数量大概也要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倍。除开纯粹的经济条件而外，地理和其他条件也在这些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影响到殖民地领土的大小。近几十年来，在大工业、交换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各国经济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但差别还是不小的。在上述六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它们近来的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

除了大国的殖民地领土以外，我们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块殖民地。到了可能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时候，这些殖民地可以说就是分割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存在着摩擦等等，妨碍了它们达成分赃的协议。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自

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不过，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典型的“中间”形式。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拿来相提并论那样^①。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所有的原料来源都被霸占起来的时候，这种垄断组织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拚命地致力于剥夺敌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铁矿产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直到战胜敌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

^① 查·普·卢卡斯《大罗马和大不列颠》(C. P. Lucas: 《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 1912年牛津版，或克罗美尔伯爵《古代帝国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Earl of Cromer: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 1910年伦敦版。

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施尔德尔说：“可以作出一个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荒诞无稽的论断，就是说，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加，在较近的将来与其说会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碍，远不如说会遇到工业原料缺乏的障碍。”例如日益昂贵的木材，例如皮革和纺织工业原料，都是愈来愈缺乏。“工业家同盟企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内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平衡；1904年几个最重要的工业国家棉纺业工厂主同盟所成立的国际同盟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1910年，欧洲麻纺业厂主同盟也仿照它成立了一个同盟。”^①

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当然企图贬低这种事实的意义，说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说“简单地”改善一下一般农业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原料的供应。但是，这样说就是替帝国主义辩护，替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因为这样说就是忘记了最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垄断。自由市场愈来愈成为过去的事情，垄断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条件，就是要改善民众的处境，提高工资，减少利润。除了在甜蜜蜜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里，哪里还有能够关怀民众的处境而不夺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来源，而且可能发现的原料来源，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发明了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或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

^①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38—42页。

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来源，惟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分割已经分割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英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竭力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发展棉花生产（1904年埃及的二百三十万公顷耕地中，就有六十万公顷，即四分之一以上用来种植棉花），俄国资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土尔克斯坦也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更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更容易地垄断原料来源，更容易地成立一个实行“联合”生产、包揽棉花种植和加工各个过程的、更经济更盈利的纺织业托拉斯。

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促进对殖民地的掠夺，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殖民地市场上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当的“联系”等等。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有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好象是在发挥和补充上述谢西尔·罗得斯的思想^①，他写道，除了现代殖民政策的经济原因以外，还应当加上社会原因。“愈来愈艰难的生活，不仅压迫着工人群众，而且压迫着中等阶级，因此在一切古老文明的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宁的急躁、愤

^① 见本卷第799页。——编者注

怒和憎恨的情绪，脱离了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必须找到应用的场所，应当让它到国外去发泄，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①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标本。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财政上这样依赖于伦敦，几乎可以说是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② 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09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八十七亿五千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方面的领导人物有了多么巩固的联系。

葡萄牙向我们表明，它是政治上独立而财政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形式稍有不同的例子。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① 瓦尔《法国在殖民地》(Wahl: «La France aux colonies»), 摘自昂利·留西耶《大洋洲的瓜分》(Henri Russier: «Le Partage de l'Océanie»)1905年巴黎版第165页。

② 舒尔采-格弗尼茨《二十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Schulze-Gaevernitz: «Britisch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 zu Beginn des 20-ten Jahrhunderts»)1906年莱比锡版第318页，以及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 «Das volkswirtschaftliche System der Kapitalanlage im Auslande»)1907年柏林版第46页。

但是实际上从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01—1714年)起,这二百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巩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阵地,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领土。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利用葡萄牙的港湾、岛屿、海底电缆等等的便利^①。一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一向是有的,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分割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全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一些环节。

为了结束对世界分割问题的讨论,我们还要指出以下一点。不但美西战争以后的美国著作和英布战争以后的英国著作,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十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但最“忌妒地”注视着“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德国著作系统地估计了这个事实,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著作中也相当明确而广泛地——在资产阶级看来可以设想的范围内——提出了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引证历史学家德里奥的一段话,他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的论“列强与分割世界”一章里写道:“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下一世纪(即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对世界进行大规模的剥削。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扩张殖民地、实行‘帝国主义’的狂热,而‘帝国主义’就是十九世纪末最显著的特点。”作者又补充说:“在这种分割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

^①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1卷第160—161页。

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强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不见得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势力和占据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列强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①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作出一定的总结，把以上关于帝国主义所谈的话归纳起来。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经济方面，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看到，自由竞争开始变成垄断，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最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致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以及同这些垄断组织溶合起来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

^① 日·爱·德里奥《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J. E. Driault: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1907年巴黎版第299页。

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包括了最主要的内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是与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溶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就是由无障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占据的地区扩张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是要从定义中特别引伸出应该规定的那个现象的极重要的特点，那毕竟是不够的。因此，一方面不要忘记，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同时也应该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包括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一般资本主义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

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尽量确切的概念，我们故意尽量多地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万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来说明银行资本等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必须进行争论，首先是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这二十五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争论。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那个定义中的基本思想，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看做一个东西”；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卡特尔、保护关税政策、金融家的统治、殖民政策），那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就成了“最平板无味的同义反复”，因为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思想，我们引用他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贯彻这些思想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中所提出的反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所提出的反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就其本身以及它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提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充分，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不过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经济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世界已经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对德国来说，比利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英据点；对英国来说，巴格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德据点，等等）。

考茨基特别引用、并且屡次引用英国人的言论，认为英国人所

^① 《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32 年卷）第 2 分卷（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第 909 页，参看同一杂志 1915 年第 2 分卷第 107 页及往下各页。

确定的帝国主义这个名词的纯粹政治上的意义，是同他考茨基的意思相同的。我们现在举出英国人霍布森来，看看他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已经为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扩大政治势力和获得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①

我们看到，考茨基说他引用一般英国人的言论，实际上是绝对错误的（除非他引用的是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公开辩护士的言论）。我们看到，考茨基自以为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退后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历史”（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具体历史的嘲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2）金融家控制着商人。如果主要是说工业国兼并农业国，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这一点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该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的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

^① 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年伦敦版第324页。

来，世界领土的分割（这种分割恰巧在金融资本时代进行完毕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士库诺夫争论过。库诺夫又笨拙又无耻地推论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象民粹派在1894—1895年揶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那末他们就应该开起酒店来培植资本主义。考茨基反驳库诺夫说，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形式之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同帝国主义，同兼并等等作斗争。

这种反驳好象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调和，因为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暴露极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显然，这种“理论”只能用来替那种主张同库诺夫保持统一的思想进行辩护！

考茨基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①，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

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②。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离马克思主义究竟到了怎样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要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来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把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纯粹的”抽象概念，那末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象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一点上说来，超帝国主义“论”和“超农业论”同样都是胡说。

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二十世纪初的具体历史时代，那末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助长帝国主义辩护士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理·卡尔韦尔在他写的《世界经济入门》^③这本小册子里，曾

① 《新时代》杂志1914年（第32年卷）第2分卷（1914年9月11日出版）第921页；参看同一杂志1915年第2分卷第107页及往下各页。

② 《新时代》杂志1915年第1分卷（1915年4月30日出版）第144页。

③ 理·卡尔韦尔《世界经济入门》（R. Calwer: «Einführ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1906年柏林版。

经把可以具体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纯粹经济的材料作了综合。他把整个世界分为五个“主要经济区域”：(1)中欧区(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2)不列颠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洲区。同时他把殖民地列入所属国的“区域”内，而把少数没有按上述区域划分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亚等等，“搁在一边”。

现在把他所列出的这些区域的经济材料摘录如下：

世界主要 经济区域	面积	人口	交通运输业		贸易	工业		
	(单位) 百万平方 公里	(单位) 百万	(单位) 千公里	(单位) 百万吨	(进出口 共 计) (单位十 亿马克)	产 量 (单位) 百万吨	棉纺织业 纱锭数目 (单位) 百万	生铁 (单位) 百万
(1)中欧区	27.6 ①(23.6)	388 (146)	204	8	41	251	15	26
(2)不列 颠区	28.9 ①(28.6)	398 (355)	140	11	25	249	9	51
(3)俄国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4)东亚区	12	389	8	1	2	8	0.02	2
(5)美洲区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

① 括弧里是殖民地的面积和人口。

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市侩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做“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象“可以”把实验室里的药片生产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由和平分割转为非和平分割、再由非和平分割转为和平分割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分割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改变着的（通过完全非和平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上，重新分割世界吗？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铁路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①。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铁路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① 1915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1892年《铁路业文汇》（《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关于1890年各国殖民地间铁路分布方面的某些详细情形，只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铁路长度(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欧洲.....	224	346	+ 122
美国.....	268	411	+ 143
所有殖民地.....	82	210	+ 128
亚美两洲的独立国	} 125	} 347	} + 222
和半独立国.....			
共 计.....	617	1 104	

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在亚洲和美洲殖民地及其他国家建筑二十万公里的新铁路,就等于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四百多亿马克的资本。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款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各大强国及其殖民地的铁路总长度如下:

(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美国.....	268	413	+ 145
不列颠帝国.....	107	208	+ 101
俄国.....	32	78	+ 46
德国.....	43	68	+ 25
法国.....	41	63	+ 22
五个强国共计.....	491	830	+ 339

可见，将近百分之八十的铁路集中在五个最大的强国手中。但是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要大得不可比拟，因为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美、俄及其他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

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了十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三倍。但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比英国快得无比，更不必说比法国和俄国了。1892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四百九十万吨，英国为六百八十万吨；但是到1912年，已经是一千七百六十万吨比九百万吨，也就是说，德国远远地超过英国了^①！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对这个方面多半都是估计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倒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

^① 再参看埃德加·克勒芒德《不列颠帝国同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关系》(Edgar Crammo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该文载于《皇家统计学会杂志》1914年7月，第777页及往下各页。

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有个欧文斯，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搁起来迟迟不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全面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当然，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还继续在发生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会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特别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的的事实，也在发生同样的作用。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

霍布森写道：“在 1893 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数的百分之十五。”^①我们要指出，到 1915 年，这种资本

^① 霍布森所著前书第 59 页和第 60 页。

大约又增加了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对于纳税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意义很小……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在英语里，这个概念是用 *investor* 一词来表示的，意即“投资者”，食利者），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据统计学家吉芬计算，1899年大不列颠从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包括输入和输出）所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一千八百万英镑（约合一亿七千万卢布），这是按贸易总额八亿英镑的百分之二点五计算出来的。”不管这个数目多么大，它仍然不能说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能够说明的是九千万至一亿英镑的“投”资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在国外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政治上依赖的国家或结盟国家的投资；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防止债务人造反。”^① 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斯豪森在他所著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中，把荷兰当做“食利国”的标本，并且说现在的英国和法国也成了这样的国家^②。施尔德尔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他没有把荷兰算进去，只是因为荷兰“工业不大发达”^③。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20等页。

② 萨·冯·瓦耳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4册。

③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393页。

权人。

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来，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高涨的经济基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间的关系更巩固些。”^①关于德国的情形，柏林的《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1911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德国人喜欢讥笑法国显露出来的那种变为食利者的倾向。但是他们忘记了，既然说到资产阶级，那末德国的情形同法国是愈来愈相象了。”^②

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且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同时他又是个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英布战争记忆犹新的时候，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业务和供应商品等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指挥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是资本家；但是同一动机也影响到了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在不小的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情况。”这位作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老牌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122页。

② 《银行》杂志1911年第1期第10—11页。

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方面最严重的是英国。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役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的大量常备军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非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分割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象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象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所能开辟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职员和仆役，这些职员和仆役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

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现代英国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动也很难预料，所以不能预先肯定只有这一种前途或其他任何一种前途。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确实是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那末这些势力就会正是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①

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会遇到抵抗，它就正会走向这种结局。这里对于“欧洲联邦”在现代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分割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拥护帝国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现在满可以充当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给霍布森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宣传组织“西欧联邦”（俄国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斯兰教运

^① 霍布森所著前书第103、205、144、335、386等页。

动”，以便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对付“中日联盟”^①等等。

舒尔采-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表明了同样的寄生性的特征。从1865—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大约增加了一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了八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末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重的工业劳动，推给黑人去干，自己则安心地过食利者的生活，也许这样就为红种人和黑人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做好了准备”。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人们谈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专门用来打猎和作其他运动的地方时，都说“它是专靠遗产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赛马和猎狐上面的费用，就有一千四百万英镑（约合一亿三千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一百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国人口	主要工业部门 的工人人数	工人在人口总数 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百万）		
1851年………	17.9	4.1	23%
1901年………	32.5	4.9	15%

研究“二十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

① 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工业统治地位和工业社会主义的动摇》(Gerhard Hildebrand: «Die Erschütterung der Industriebherrschaft und des Industriesozialismus»)1910年版第229页及往下各页。

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和许多教派。选举法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而这种选举法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讲到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说：“失业问题主要是伦敦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下层的问题，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① 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很少重视的。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口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述种种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口从 1884 年起开始减少；1884 年有二十四万二千人，而 1900 年只有十六万九千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口，在 1881—1890 年的十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一百四十五万三千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十年里，又减少到五十四万四千人和三十四万一万人。同时，从奥、意、俄等国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 1907 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二百九十四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四十四万零八百人，农业工人有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九人^②。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③。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④。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 301 页。

② 《德意志帝国统计》（《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第 211 卷。

③ 亨兹尔《法国的投资》（Henger:《Die Kapitalsanlage der Franzosen》）1913 年斯图加特版。

④ 古尔维奇《移民与劳动》（Hourvich:《Immigration and Labour》）1913 年纽约版。

在工人中间也造成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使工人运动暂时腐朽的这种趋势，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大量的殖民地领土；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几十年中不断地注意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联系。例如，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²⁷¹ 将近二十五年以后，恩格斯又在1881年8月11日写的信里说到了“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³⁵²。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人和自由激进党人，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³⁵³①（恩格斯在1892年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2卷第290页；第4卷第453页。考茨基《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K. Kautsky: 《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1907年柏林版第79页；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

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甘愿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结束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吸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而所剥削的每一部分都要比英国在1858年剥削的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七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六集中在六个强国手里；有六千一百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一，集中在三个强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就在于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所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起来。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某一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取得完全的胜利了，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完全成熟，已经成熟过度，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溶合起来了。^①

^① 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契恒凯里先生之流、马斯洛夫先生之流等等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无论是它的公开形式，或是它的隐蔽形式(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先生)，都是从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即从取消主义¹³²生长起来的。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一方面，巨量的金融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非常广泛而稠密的关系和联系网，这个密网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和业主，而且控制了最小的资本家和业主；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家集团同其他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分割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结果，就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尽量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如果说现在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那末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³⁰²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通常都是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替帝国主义辩护，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厚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毫无意义的“改良”计划，例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无耻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即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是一种荒谬想法的帝国主义者，是很少发表意见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这一出

出版物中，力图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指出印度的风潮和抗议运动，纳塔尔（南非）的运动，荷属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个人在评论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亚、非、欧三洲受外国统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从属民族和种族代表会议的报告时，对会议上的演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据称，必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统治国应当承认从属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强国同弱小民族订立的条约的履行。除了表示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会议并没有继续前进。我看不出他们对下面这个真理有丝毫的了解：帝国主义同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11〉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仅限于反对个别特别可恶的过火现象。”^①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没有“继续”前进，所以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就“继续”后退了，后退到在所谓“科学性”的掩盖下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逻辑”！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

^① 《世界经济文汇》第2卷第193页。

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一批莫希干人³⁵⁴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做“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吉纳尔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吉纳尔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管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管理自己同时又管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①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表示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那末这种批评就仍然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主张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要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厄什韦葛，也有法国作家维克多·别拉尔，他是1900年出版的那本肤浅的《英国与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所有这些人丝毫没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同帝国主义相对立，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关于巴格达铁路的计谋，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研究国际证券发行情况的统计学家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到“国际”有价证券达几千亿法郎时，

^① 约·帕土叶《美国帝国主义》（J. Patouillet: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1904年第戎版第272页。

甚至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做出这样一副天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用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来推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发现这方面进出口的数量比英国进出口总额增加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埃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愿望”，“最好能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来实现”^②。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跟班（也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俄国掩护人）斯彼克塔托尔³⁵⁵先生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这个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必须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1915年4月那次在内）认为，希法亭的结论是“所有社会

①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第19卷第2册第225页。

②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Kautsky,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1915年纽约版第72页和第70页。

党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已经成为过去的、自由贸易时代的政策和仇视国家的政策同更进步的资本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答复、对帝国主义的答复，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是不可能象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①

考茨基在金融资本时代维护“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末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一般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个别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末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么？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商业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程度也就愈高。而且垄断已经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维护自由竞争的理由，因为自由竞争在产生

^① 《金融资本》第567页。

垄断以后，就不可能存在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复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论断修改一下，象斯彼克塔托尔说的那样，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比英属殖民地同其他各国的贸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他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垄断和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引起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³⁵⁶）恰好是那些能够出口的产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种“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贱几倍的价格倾销，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如果说德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比英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要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更高明，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关税政策或殖民地附属关系作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优势，比殖民地疆界或保护关税的城墙更厉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张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民主”的“理由”，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市侩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虽然也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作了市侩式的批评，但是他对贸易统计材料毕竟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他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国家，也不是单拿

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财政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如下：

		德国的输出(单位百万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数
对财政上依赖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罗马尼亚……	48.2	70.8	+ 47%
	葡萄牙……	19.0	32.8	+ 73%
	阿根廷……	60.7	147.0	+143%
	巴西……	48.7	84.5	+ 73%
	智利……	28.3	52.4	+ 85%
	土耳其……	29.9	64.0	+114%
	总计……	234.8	451.5	+ 92%
对财政上不依赖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大不列颠……	651.8	997.4	+ 53%
	法国……	210.2	437.9	+108%
	比利时……	137.2	322.8	+135%
	瑞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亚……	21.2	64.5	+205%
	荷属印度……	8.8	40.7	+363%
总计……	1 206.6	2 264.4	+ 87%	

兰斯堡没有做总计，所以很奇怪，他没有看到：如果这些数字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只能证明他自己不对，因为对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虽然快得并不多(我们把“如果”两字加上着重号，是因为兰斯堡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输出和贷款的关系时写道：

“1890/91年，罗马尼亚通过几家德国银行缔结了一项贷款条

约。其实在前几年,这些德国银行就已经发放这笔贷款了。这笔贷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购买铁路材料的。1891年德国对罗马尼亚的输出是五千五百万马克。下一年就降到三千九百四十万马克;以后断断续续地下降,到1900年一直降到二千五百四十万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有了两笔新的贷款,才又达到了1891年的水平。

德国对葡萄牙的输出,由于1888/89年的贷款而增加到二千一百一十万马克(1890年),在以后两年内,又降到一千六百二十万马克和七百四十万马克,直到1903年才达到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贸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贷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输出在1889年达到了六千零七十万马克。两年后,输出只有一千八百六十万马克,还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直到1901年,才达到并超过1889年的水平,这是同承办新的国家公债和市政公债,同拨款兴建电力厂以及其他信贷业务有关的。

德国对智利的输出,由于1889年的贷款,增加到四千五百二十万马克(1892年),一年后降到了二千二百五十万马克。1906年通过德国几家大银行缔结了一项新的贷款条约以后,输出又增加到八千四百七十万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降到了五千二百四十万马克。”^①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滑稽的市侩说教:同贷款相联系的输出是多么不稳固、不平衡;把资本输出国外而不用来“自然地”、“和谐地”发展祖国工业,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贷款时,克虏伯要付出几百万的附加费,代价是多么“大”,等等。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

^① 《银行》杂志 1909 年第 2 期第 819 页及往下各页。

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认为兰斯堡的统计是完备的，但是必须加以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彼克塔托尔的统计要更科学些，因为兰斯堡指出了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要议论金融资本在输出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专门地、单独地说明输出同金融家骗人勾当的联系，专门地、单独地说明输出同卡特尔产品的销售等等的联系。随便地拿一般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宣传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

于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①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自然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十三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字头代替另一个字头^②，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进步的地方，不过是妄想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其实是英国牧师的谎话，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非战役中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缴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变成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哪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蜜的考茨基的意图如何善良，但是他那个“理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

① 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144页。

② 原文«ультра-империализм»（“超帝国主义”）和«интер-империализм»（“国际帝国主义”）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两个拉丁语字头（ультра и интер）的差别。——编者注

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了。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六七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张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又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上述亚洲国家，这将会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例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

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和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在后天结成“和平的”总联盟来分割——譬如说——土耳其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现代“商业帝国主义”时代^①。另一个作家则把1870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细亚一带向印度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1885—1902年），为了分割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年的“法索达”事件，——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②。早在1905年，银行“活动家”里谢尔就指出，在意大利进行活动的法国金融资本，为

① 戴维·杰恩·希尔《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第1卷第10页。

②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178页。

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各国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进行斗争等等，于是他写道：“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与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也就必然要粉饰帝国主义，这种情形在他批评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性时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统治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就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发现的国家里，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不断地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險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性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慢慢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工具。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被它剥削的那些最宝贵的、最有光辉前途的区域中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牌国家也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

^① 《金融资本》第487页。

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紧进行的政治反动，然而他没有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他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最无伤于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例如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该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摯的，政治上 is 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浸透了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都贯串着一种尽力保持欧洲工人运动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机会主义者统一的意图。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四种主要的垄断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这

就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那末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表明了垄断是由生产集中产生的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来源，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个人联合”，把持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一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赖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明显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是远在1876年的情形），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分割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

使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研究德国大银行的作家里谢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象拿旧时的邮车同现代的汽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异常迅速地成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成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也不反对更“心安理得地”去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从更富有的国家手里，用不单是和平的手段加以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美国最新资本主义的寄生性

的特征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的极大的政治上的差别也大大缩小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都带有明显的寄生性的特征。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个别的工人阶层，而且还可能暂时收买相当数量的少数工人，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的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分割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明显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等等，那末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是没有希望的。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必须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

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叙述最新资本主义时常用的一些字眼，什么“交错”呀、“没有孤立性”呀，等等；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讲了这种话的同一个里谢尔，却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错”这个字眼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那个过程的最明显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错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错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错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取得数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从原料的依次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末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简单的“交错”；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叫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

末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错”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况彻底想一番，那末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统一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管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劳动的工作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也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①

不用说，这是对马克思的很好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圣西门的猜测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

写于1916年1—6月

1917年4月第一次在
彼得格勒用单行本刊印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单行本
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2卷
第179—297页

^① 《社会经济概论》第146页。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一本社会民主党的论述战争问题的小册子，没有迁就卑鄙的容克的书报检查，终于在德国秘密地出版了！这位作者显然属于社会民主党“左翼激进”派，署名尤尼乌斯（拉丁文的意思是：幼者），书名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在附录里还刊印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这个提纲已经提交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ИСК）并刊载在该委员会公报³⁴¹的第三号上。这个提纲是《国际》派³⁴⁵提出的。他们在1915年春天出了一期名叫《国际》的杂志²⁸⁷（其中载有蔡特金、梅林、罗·卢森堡、塔尔海麦、敦克尔及什特列别尔等人的文章），在1915—1916年冬天召开了德国各个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³⁵⁷，通过了这个提纲。

正如作者在1916年1月2日的引言中所说的，这本小册子写于1915年4月，在刊印时“未加任何修改”。一些“外部情况”的阻碍，使这本小册子没有能早日出版。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不如说是分析战争，驳斥那些关于这次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奇谈怪论，证明这场战争无论从德国或其他列强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对这个正式党派的行为进行了革命的批评。尤尼乌斯这本写得非常生动的小册子，在反对已经转到资产阶级和容克方面去的德国旧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毫无疑问，已经起了而且还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衷心地向作者致贺。

对于熟悉 1914—1916 年在外国用俄文刊印的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俄国读者来说，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并没有提供什么原则性的新东西。要是在读这个小册子的时候，把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1914 年 9—11 月)^①、伯尔尼决议(1915 年 3 月)^②以及许多关于决议的评论中所叙述的论点，同这位德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对照一下，那就只会确定尤尼乌斯的论点极不全面，并且犯了两个错误。在进一步批评尤尼乌斯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是为了全面地检查那些应当成为第三国际思想基础的观点。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总的说来，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可能，它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偶然性。

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的主要缺点，在于对社会沙文主义(作者既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使用社会爱国主义这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同机会主义的联系只字未提，它比合法的(虽然出版以后立即遭到查禁的)《国际》杂志简直是后退了一步。作者完全正确地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和破产、它的“正式领袖”的“背叛”，但是并没有再前进一步。可是《国际》杂志却对“中派”即考茨基派进行了批评，并且对它的毫无气节、出卖马克思主义和向机会主义者献媚的行为作了十分公正的嘲笑。而且这个杂志已开始揭露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例如，公布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1914 年 8 月 4 日机会主义者提出了最后通牒，即已经决定无论如何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无论是在尤尼乌斯的小册子里，或者是在这个提纲中，既没有提到机会主义，也没有提到考茨基主义！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不把“背叛”同机会主义这个有其悠久

① 见本卷第 568—574 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36—142 页。——编者注

历史,即有第二国际全部历史的派别联系起来看,就无法说明背叛的原因。这在实践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因为不阐明公开的机会主义派(列金、大卫等)和暗藏的机会主义派(考茨基之流)这两个派别的意义和作用,那就既不能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它。譬如和奥托·吕勒在1916年1月12日《前进报》¹⁸²上发表的一篇历史性的文章相比,这是后退了一步。因为吕勒在那篇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证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编辑部回答他的时候,只是重复了考茨基的甜蜜的、虚假的言词,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真正的论据来否认目前已有两个党,而且根本不能把它们调和起来)。这显然是不彻底的,因为在《国际》派的提纲第十二条里已经直接提到,“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的正式代表机构”已经“背叛”并且“转到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场上”,因而必须成立“新”国际。显然,如果让德国旧社会民主党或对列金、大卫之流抱调和态度的党加入“新”国际,那简直是太可笑了。

至于《国际》派为什么后退了一步,我们不得而知。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秘密组织来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这样的组织无论对机会主义或考茨基主义都要采取明确的立场。这一点所以必要;尤其是因为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仅有的两家日报,即《不来梅市民报》³⁵⁸和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³⁵⁹现在已经被夺走了,这两家报纸转到考茨基分子那边去了。只有“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S.D.)³⁶⁰还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岗位,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

看来,《国际》派中的某些人又滚到无原则的考茨基主义的泥潭里去了。例如,什特列别尔竟在《新时代》²⁴上拍起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马屁来了!就在前几天,即1916年7月15日,他在报纸

上发表一篇《和平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文章，为考茨基的最卑鄙的和平主义进行辩护。至于尤尼乌斯，他是最坚决反对考茨基的“裁军”、“取消秘密外交”等等异想天开的计划的。可能在《国际》派中有两派：一派是革命的，一派正在动摇到考茨基主义方面去。

尤尼乌斯的第一个错误论点表现在《国际》派的提纲第五条：“……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纪元)，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了。民族利益只是欺骗的工具，驱使劳动人民群众为其死敌——帝国主义效劳……”以这个论点结尾的第五条，一开头就说明了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根本否认民族战争，可能是疏忽大意，或者是在强调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这个完全正确的思想时偶然偏激。但是，既然也可能有相反的情形，既然不同的社会民主党人因看到有人胡说这次战争是民族战争而错误地否认任何民族战争，那就不能不谈一谈这个错误。

尤尼乌斯强调“帝国主义环境”在这次战争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说塞尔维亚背后有俄国，“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背后有俄国帝国主义”，并且说荷兰如果参战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性质的，因为第一、它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第二、它是帝国主义联盟的盟员之一，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就这次战争来说，这是不容争辩的。既然尤尼乌斯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同“目前支配着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民族战争的幽灵”(第81页)进行斗争，那就不能不认为他的论断既是正确的，又是完全恰当的。

他的错误只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把对这次战争的估计搬到帝国主义时代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为“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这个论点辩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经被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以后

也会由于触犯帝国主义列强或联盟之一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第 81 页)。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至于说这次 1914—1916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会转化为民族战争，这在极大程度上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因为代表向前发展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在客观上力图把这次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其次还因为两个联盟的力量相差并不很大，国际金融资本到处造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但是，这种转化也不能说是不可能的：假如欧洲无产阶级还要软弱二十年之久，假如这次战争结果是象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并且奴役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假如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的)也能

维持二十年之久(例如,由于日美战争),而没有转入社会主义,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这就会使欧洲后退几十年。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十亿人口,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在这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就是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这种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可能导致目前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

举一个例子: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打了七年仗,也就是说,进行了七年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或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以及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发生)。结果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这两个国家仍占有今天美国的一部分),由于仇视英国,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便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了友好条约。当时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塞奥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争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由此可见,死板地应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并且由此得出“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的结论,那

是何等的荒谬。比如波斯、印度和中国联合起来反对某些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完全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因为它是从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至于这种战争是否转化为目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要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但担保这些情况一定会产生，那是令人可笑的。

第三、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的时代”使目前的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要引起（在社会主义还未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使目前各大强国的政策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这个“时代”丝毫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姑且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战争，——正如它不排斥东欧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一样。尤尼乌斯对奥地利的判断是很正确的，他不仅估计到“经济”方面，而且估计到特殊的政治方面，指出“奥地利内在没有生命力”，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组织，而只是由若干社会寄生集团组成的联系薄弱的辛迪加”，“奥匈帝国的灭亡在历史上不过是土耳其的崩溃的继续；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要求”。至于某些巴尔干国家和俄国，情况也并不妙。在这次战争中“大”国弄得筋疲力尽的条件下，或者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民族战争完全可能发生，甚至会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能实现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信口开河地”说：小国反对大国的战争是没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必须指出：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其次，“大国”内部的某些现象——如革命的爆发——可以使“没有希望的”战争成为大“有希望的”战争。

我们所以详细分析所谓“不可能再有民族战争”这个不正确

的论点，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第三国际只有在非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左派”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示漠不关心，那当然是极其可悲的。而且这个错误在政治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人们会从这得出“废除武装”的荒谬宣传，因为除了反动战争以外，仿佛再也不会有任何战争；人们从这还可以得出对民族运动更荒谬的和简直是反动的漠视态度。当欧洲的“大”民族，即压迫许多小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那些民族的成员，以所谓学者的姿态声称“不可能再有民族战争”的时候，这种漠视态度就是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虽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人口众多的居民（我们所举的例子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力量的削弱、它们的战争、它们的对抗等等，无力进行干涉）特别有利的配合，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这后一种情况，从无产阶级胜利所期望的和对之有利的观点来看，是最主要的）。

但是必须指出，如果责难尤尼乌斯对民族运动漠不关心，那是不公正的。因为至少他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罪过之一，就是对喀麦隆一个土著领袖因“叛变”（显然是因为他在战争爆发时企图起义）而被处死刑一事默不作声，同时他在另一个地方专门（对那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人”的列金、连施这伙先生们及其他坏蛋）强调指出，殖民地民族也是民族。他极其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都有独立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国际社会主义承认自由、独立、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是，只有它才能建立这样的民族，只有它才能实行民族自决权。而

这个社会主义的口号——作者公正地说——也和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为现存的东西辩护，而是指出道路，促使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改造的、积极的政策”（第 77 和 78 页）。因此，谁要认为一切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象某些荷兰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已经陷于眼光狭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境地，甚至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自决也加以否认，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关于犯这个错误的荷兰和波兰的特殊根源，我们还要在别处谈到。

尤尼乌斯的另一个错误论断，是同保卫祖国问题有关的。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尼乌斯也支持我们的这一信念：我们党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正确的提法，即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产阶级反对保卫祖国，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掠夺、奴役和反动的性质，是因为有可能和有必要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来抵制它（并竭力把它变成这种国内战争）。尤尼乌斯一方面很好地揭露了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它不同于民族战争；可是另一方面，又犯了非常奇怪的错误，企图用民族纲领对这次非民族的战争作牵强附会的解释！这听起来几乎是不可置信的，但却是事实。

“资产阶级拚命叫喊外国“侵略”，以便欺骗人民群众，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带有列金和考茨基色彩的官方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资产阶级献媚，特别热心地一再拿这种“侵略”作为论据。考茨基现在向那些天真而轻信的人保证说（顺便指出，是通过俄国的组委会分子³²⁶斯彼克塔托尔³⁵⁵），他从 1914 年年底就转到反对派方面来了，然而他却继续在援引这个“论据”！尤尼乌斯在竭力驳斥这个理由时，举了一些历史上极有教益的例子，来证明“侵略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象官方的神话所说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两者互为手段，互为表现的”。例子是：法国波旁

王朝曾引起反对雅各宾派的外国侵略，1871年资产者引起反对巴黎公社的外国侵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

“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³⁶¹

尤尼乌斯在引证1793年的例子时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一切时代的典型例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历来的经验证明，不是戒严状态，而是可以唤起人民群众的自尊心、英雄气概和道德力量的忘我的阶级斗争，才是保护国家、保卫国家、反对外敌的最好办法。”

尤尼乌斯的实际结论是：“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在历史的大危机时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重大罪过，也恰恰在于它在1914年8月4日的宣言里庄严地宣布：‘我们决不会在危急时刻，使我们祖国处于无防御状态’，同时却又自食其言。它使祖国在最危急的时刻处于无防御状态。因为在这个时刻它对祖国的首要义务是：向祖国指出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背景，撕破掩盖这种侵害祖国行为的爱国主义的和外交的种种谎言；大声地明确地声明，对德国人民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无论胜负都会招致灭亡，必须竭力反对用戒严状态来扼杀祖国；宣布必须立即武装人民，让人民来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坚决要求在整个战争期间连续（不断）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保证人民代表机关对政府、人民对人民代表机关的细心监督；要求立刻废除一切政治权利上的限制，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胜利地保卫自己的国家；最后，要用1848年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旧的真正民族纲领，即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纲领：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的口

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纲领——旨在保存奥地利和土耳其，即保存欧洲和德国反动势力的纲领。这就是应当在全国面前展开的旗帜，它应当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解放的旗帜，它和德国的优良传统、和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政策的优良传统相一致”……“因此，在祖国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之间的难于抉择，促使我们的国会议员以‘沉重心情’站到帝国主义战争方面去的悲剧性的冲突，乃是一种纯粹的梦想，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构。相反地，无论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协调的，因为无论战争或和平都要求极其有力地展开阶级斗争，极其坚决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尤尼乌斯就是这样论断的。这样论断显然是错误的，既然我国沙皇制度的公开的和暗藏的走狗普列汉诺夫和契恒凯里先生，甚至于马尔托夫和齐赫泽先生，都会幸灾乐祸地抓住尤尼乌斯的话，不去考虑理论上的真理，而是考虑如何脱身，灭迹，混淆工人视听，那末，我们就必须比较详细地来说明尤尼乌斯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他建议用民族纲领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他建议先进阶级要面向过去，而不要面向将来！1793年和1848年，无论在法国、德国或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客观地提到日程上来的。“真正的民族”纲领，即当时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民族纲领，同这种客观的历史形势是相适应的，在1793年，资产阶级和平民中最革命分子曾经实行过这种纲领；而在1848年，马克思也代表整个先进的民主派宣布过这种纲领。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的战争相对立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现在，对欧洲各先进的大国来说，客观情况就不同了。目前的

向前发展——撇开可能的、暂时的后退不说——只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阶级的观点看来，客观上能够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战争的，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国内战争（没有这种战争，就不能大大前进），其次是只在一定特殊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因此，有些布尔什维克（好在只是个别的，并且立即被我们抛到号召派³⁶²那边去了）准备采取有条件的保卫祖国的观点，即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共和国胜利的条件下保卫祖国的观点，他们虽然忠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词句，却背叛了它的精神；因为卷入欧洲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俄国，即使有共和国的形式，它进行的还是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只是运用了一半马克思辩证法，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步之后，马上又离开了这条道路。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说法，不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这过于一般化，所以对这一特殊场合是不够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不是一个国家）避免侵略的危险。要是“大德意志共和国”在1914—1916年存在的话，那它还会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要进行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只是他害怕彻底说出全部真理，而在1914、1915、1916年向后转了，陷入了“民族战争”的幻想。要是不从理论方面，而纯粹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那尤尼乌斯的错

误也是很明显的。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级，一直到农民，都是拥护战争的（在俄国大概也是这样，至少是大多数富裕农民和中农以及很大一部分贫农，显然都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迷惑）。资产阶级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成立共和国、常设国会、人民选举军官（“武装人民”）等等的纲领，实际上就是“宣布”（具有不正确的革命纲领的）革命！

尤尼乌斯在这里说得完全对，革命是不能“制造”的。革命在1914—1916年提上了日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应当是以革命阶级的名义“宣布”这一点，大胆地彻底地指出它的纲领，在战争时代，没有反对反动透顶的、罪恶的、使人民遭受无法形容的灾难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应当是周密制定系统的、彻底的、实际的措施，这些措施在革命危机发展的任何速度下都必须是绝对可行的，符合日益成熟的革命路线的。这些措施在我们党的决议中已经指出：（1）投票反对军事拨款；（2）破坏“国内和平”；（3）成立秘密组织；（4）举行士兵联欢；（5）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①。所有这些步骤如能顺利实现，必然会引起国内战争。

宣布伟大的历史性的纲领，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意义，但不是宣布旧的、对1914—1916年来说已过了时的德国民族纲领，而是要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你们资产者打仗，是为了掠夺；我们一切交战国工人向你们宣战，为社会主义而战，——这就是没有象列金、大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盖得、桑巴之流那样背叛无产阶级的社会党人，于1914年8月4日在各国议会里应当发表的演说的内容。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9页。——编者注

看来，尤尼乌斯的错误可能是由双重错误的想法造成的。毫无疑问，尤尼乌斯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坚决拥护革命策略的，普列汉诺夫这班先生对尤尼乌斯的“护国主义”幸灾乐祸，是抹杀不了这个事实的。对于这种可能的和可以想象得到的诽谤，必须立即给以直接的反击。

但是，第一、尤尼乌斯还没有完全摆脱德国那些即使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包围”，这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彻底说出革命的口号。^①这种害怕心理是错误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的。他们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的。而他们正在坚定不移地、真心诚意地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他们同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的重大的、原则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因为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和斯柯别列夫一样）一只手打着欢迎“各国李卜克内西”的旗子，一只手和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亲热拥抱！

第二、看来，尤尼乌斯本想实现一种同孟什维克的已经完蛋的“阶段论”相类似的东西，想从革命纲领中对小资产阶级“最方便”、“最通俗”、最能接受的地方开始执行革命纲领。这是一种类似“蒙哄历史”、蒙哄庸夫俗子的东西。据说，谁也不会反对保卫真正祖国的最好办法，而真正的祖国就是大德意志共和国，保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民兵、常设国会等等。据说，这样的纲领一旦被采纳，

① 尤尼乌斯对于“胜利好还是失败好？”这个问题的议论，也有同样的错误。他的结论是：二者都不好（破产、军备扩充，等等）。这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和平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要是说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干涉”——虽然，无论尤尼乌斯或《国际》派的提纲都谈到这一点，可惜太一般化了——那就必须从别的观点提出问题：（1）不冒失败危险，能不能进行“革命干涉”？（2）不冒同样危险，能不能抨击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3）我们不是向来说明，而且反动战争的历史经验也在说明，失败会促进革命阶级的事业吗？

它本身便会到达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

大概就是这种推论有意无意地确定了尤尼乌斯的策略。不用说，这种推论是错误的。读了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令人感到他是一个孤独者，他没有那种习惯于透彻地考虑革命口号并经常用这种口号精神教育群众的秘密组织的同志。不过这种缺点并不是尤尼乌斯个人的缺点（忘记这一点是极不正确的），而是德国所有左派分子的软弱性造成的，因为他们被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四面八方包围着。尤尼乌斯的拥护者虽然孤独无援，但是已经能够着手印发秘密传单并同考茨基主义作战了。他们也一定能够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写于1916年7月

载于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
文集》第1卷

署名：尼·列宁

按《文集》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2卷
第298—313页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摘录)

7. 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

波兰同志破例地不用间接方式，而用直接方式来反驳我们引证马克思对爱尔兰分离问题所持的态度。他们的反对意见究竟是什么呢？照他们看来，援引马克思在1848—1871年所持的立场，“没有一点价值”。他们发表这个异常气愤而坚决的声明的理由是，马克思“同时”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等等”要求独立的愿望³³⁹。

所以特别气愤地提出这种理由，是因为它特别站不住脚。照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马克思不过是一个“同时”谈两种截然相反的事情的糊涂虫而已！这完全不对，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波兰同志提出“具体”分析的要求，并不是为了照着做，而正是这种要求使我们必须考察一下，马克思对不同的具体的“民族”运动采取不同的态度，是不是从同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观出发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张波兰独立，是从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无限权威和压倒一切的反动影响——的斗争利益出发的。这个出发点的正确性在1849年就得到了最明显的和事实上的证明，当时俄国农奴主的军队镇压了匈牙利争取民族解放的和民主革命的起义。从那时起直到马克思逝世，甚至更晚一点，到1890年（当时沙皇政府同法国勾

结，竭力要发动反动战争来反对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民族独立的德国)，恩格斯始终是首先而且坚决主张同沙皇政府作斗争的。因此，也只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任何人如果不是为了鄙弃马克思主义才注意马克思主义，只要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把在欧洲充当“俄国前哨”的“一整批反动民族”同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等“革命民族”直接地肯定地区分开来的。这是事实。在当时指出这个事实，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1848年各革命民族为自由奋斗过，当时自由的主要敌人是沙皇政府，而捷克人等确实是反动民族，是沙皇政府的前哨。

这是每个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当进行具体分析的具体例子，它究竟向我们说明了些什么呢？它只说明，（1）欧洲几个大民族和最大民族的解放利益高于各个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2）民主要求应当从全欧洲范围来看，现在应当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如此而已。这里丝毫也没有否定波兰人常常忘记而马克思始终遵守的那个起码的社会主义原则：“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²⁸²。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是沙皇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时代，如果这具体形势又以同样形式重演，即有几个民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1848年在欧洲开始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其他民族却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那我们还是应当主张同后面这些民族进行革命战争，“粉碎”它们，摧毁它们的一切前哨，不管它们那里已经掀起了什么小民族的运动。因此，我们决不当抛弃马克思的策略范例（抛弃这些范例，就是口头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决裂），而应

当从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中吸取有益于将来的极其宝贵的教训。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某一国家的共和运动可能只是其他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不应当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点就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

从1848—1871年到1898—1916年这段时期（这里所举的是帝国主义的最重大的阶段，即从美西帝国主义战争到欧洲帝国主义大战）的具体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沙皇政府显然无疑地已不再是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了，第一、因为它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特别是法国金融资本的支持；第二、因为发生过1905年革命。当时，大民族国家体系——欧洲各民主国家——与沙皇政府相反，向世界传播了民主和社会主义。^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少数（五六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而这种压迫是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办法之一，是人为地支持那些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民族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办法之一。当时解放各

^① 梁赞诺夫在格律恩堡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库》（1916年第1卷）上发表了恩格斯在1866年写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一篇极有趣的文章。恩格斯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承认欧洲各大民族的政治独立和“自决”（right to dispose of itself），同时又指出“民族原则”（特别是波拿巴加以利用的），即把任何一个小民族和这些大民族等量齐观是荒谬的。恩格斯说：“俄国是大量赃物”（即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占有者，“而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³⁶³ 无论波拿巴政府或沙皇政府，都是利用小民族运动来反对欧洲民主运动，使自己得到好处。

个最大民族的西欧民主运动，是反对沙皇政府利用各个小民族运动来达到反动的目的。现在沙皇帝国主义同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在共同压迫许多民族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已分裂为沙文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部分和革命部分。

这恰恰就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忽视的形势的具体变化，他们没有履行诺言，去作具体的分析！可见，在同样一些社会主义原则的运用上也有具体变化：那时主要是“反对沙皇政府”（并且反对它用来反对民主运动的那些小民族运动），拥护西方大民族的革命人民；现在却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社会帝国主义者步调一致的统一阵线，主张利用一切反帝民族运动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反对整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愈纯粹，“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国际主义原则显然也就愈有现实意义。

蒲鲁东分子为了进行学理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革命，竟忽视了波兰的国际作用，抛弃了民族运动。现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也完全是学理主义的，他们破坏了反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阵线，由于自己在兼并问题上的动摇而（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帝国主义者。因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阵线同各小民族的具体立场的关系已经改变了：那时（1848—1871年）小民族的作用是既可能成为“西方民主运动”和革命民族的同盟者，又可能成为沙皇政府的同盟者；而现在（1898—1914年）小民族已失去了这样的作用；它们今天的作用是成了“大国民族”寄生性的一个滋生地，因而也是这些民族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滋生地。现在重要的不是什么五分之一或百分之—的小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能不能获得解放，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由于客观原因分成两个国

际阵营，其中之一已被大国资产阶级的残羹剩饭（顺便指出，也由于对小民族的双重或三重的剥削）所腐蚀，而另一阵营不解放小民族，不用反对沙文主义的精神，即反对兼并的精神，即“自决”的精神教育群众，自己是不能得到解放的。

波兰同志忽视了事情的这个最主要的方面，他们不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阵地，不是从国际无产阶级有两个阵营的观点来看问题。

这里还有两个证明他们拥护蒲鲁东主义的明显例子：（1）他们对1916年爱尔兰起义的态度，这一点下面再谈；（2）他们在提纲中（第二章第三节、第三节末尾）声称：“不应当用任何东西来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正是一种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为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同在一切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上的彻底的革命立场联系起来，就会“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我们的纲领是“民族改良主义的”。请对照一下两种实际主张：（1）主张自治（波兰的提纲第三章第四节）和（2）主张分离自由。要知道，我们双方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而且也仅仅在这里！改良主义的纲领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难道还不明显么？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革命的变革却要破坏政权基础。民族纲领中改良主义的变革并不废除统治民族的一切特权，并不造成完全平等，并不消灭任何民族压迫。“自治”民族同“强国”民族是不平等的。波兰同志如果不是硬要忽视（象我们的老“经济主义者”那样）对政治概念和政治范畴的分析，就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05年以前，自治的挪威作为瑞典的一部分而享有极广泛的自治权，但是同瑞典不是平等的。只有在它实行自由分离之后，才在事实上表明和证明它享有平等权（这

里顺便补充一句，正是这种自由分离，才为根据平等原则实行更紧密更民主的接近打下了基础。当挪威还只实行自治的时候，瑞典贵族享有一种额外特权，而这种特权并没有被“削弱”（改良主义的实质就是削弱祸害，而不是消灭它），只有实行分离才能被完全消灭（这是纲领中革命变革的基本标志）。

顺便说一说，自治是一种改良，它和作为革命措施的分离自由有原则的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大家都知道，改良实际上往往只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正是自治才能使被强制地留在某一国家疆界以内的民族最终组成一个民族，聚集、认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选择完全适当的时机，以使用……“挪威的”方式声明：我们是某某民族或某某边区的自治议会，宣布全俄皇帝已经不再是波兰的国王，等等。人们通常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声明，而是要用战争来解决的。对，这种问题在大多数场合都要用战争来解决（正象大国的政体问题在大多数场合只能用战争和革命来解决一样）。可是不妨想一想，这种对革命政党政纲的“反对意见”，是否合乎逻辑？难道我们反对为正义的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事业、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争和革命吗？

“但是，我们不能拥护各个大民族之间的战争，不能拥护为了也许只有一两千万人口的某个小民族不可靠的解放而断送两千万人的生命！”当然不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抛弃自己纲领里的完全的民族平等，而是因为一个国家民主运动的利益必须服从几个和一切国家民主运动的利益。假定两大君主国之间有一个小君主国，它的国王因为亲缘及其他种种关系而同两大邻国君主都有“联系”。其次，假定在这个小国里宣布了实行共和制，赶走了它的君主，那在实际上就意味着两大邻国要为恢复这个小国某一君主进行战争。毫无疑问，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这个小国社会民主

党里一部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种场合，就应当反对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这并不是—种绝对的东西，而是一种民主要求，它应当服从整个民主运动的利益（当然，更要服从整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想必丝毫不会引起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假如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根据这点就建议取消国际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共和国口号，那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人们就会对他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忘记特殊和一般在逻辑上的基本区别。

这个例子使我们多少能从另一方面来观察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教育问题。这种教育工作——对于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和极为迫切的重要性，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³¹⁶中间是不可能有什么意见分歧的——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末我

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我们应当教育工人“漠视”民族的差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不是兼并主义者的漠视。压迫民族的成员对于小民族究竟属于他的国家还是属于邻国，还是由它们自己来管理的问题应当抱“漠视”态度，应当按照小民族的意愿去解决。谁不抱这种“漠视”态度，谁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要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专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践上有人恰恰表现出兼并主义者的漠视态度。祸根就在这里。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各自为政，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这种状况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道路。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荷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状况。

9. 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

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一书中（1907年柏林版）发表了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写给他的信，这封信对于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353

恩格斯根本没有认为“经济上的”因素自己会直接解决一切困

难。经济变革会使一切民族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同时又可能发生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战争。政治适应经济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不会一下子发生，不会顺利地、简单地、直接地发生。恩格斯认为只有一个绝对国际主义的原则才是“肯定的”，他把这个原则运用于一切“异族”，也就是说，不仅仅运用于殖民地民族，这个原则就是：强迫他们接受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就会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

无产阶级决不会因为一完成社会革命就能变得洁白无瑕，保险不犯错误和没有弱点。可是，各种可能犯的错误（以及自私自利——企图骑在别人头上），必然会使无产阶级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所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分子都确信，象考茨基这样的人在1914年从马克思主义转到维护沙文主义以前也曾经确信，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正如同一个考茨基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就在“旦夕之间”。民族的反感不会很快消失；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仇恨（也是完全正当的）暂时还会存在，只有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在各民族间彻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才会消散。如果我们想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就应当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压迫民族中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不能进行这种教育。

写于1916年7月

按《文集》原文刊印

载于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
文集》第1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2卷
第334—342、346—348页

署名：尼·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³⁶⁴

在荷兰、斯堪的那维亚和瑞士，在那些同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要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话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人民武装”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我们在罗·格里姆最近提出的提纲³⁶⁵中也看到了对“废除武装”这种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和《先驱》杂志³⁶⁶也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考察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立场。

一

主张废除武装的主要论据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显、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在这个主要论据中，恰恰包含有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主要错误。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而且也不可能反对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因而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

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受它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己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³⁴⁵的提纲第五条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已不可能有任何民族战争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在二十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中，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出于我们所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而叫作“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和尖锐化。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她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引起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也是帝国主义的大国的干涉，因此，任何民族战争都会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据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可能发生，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假如我们声明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把各交战国弄得精疲力尽而结束了），“不可能”发生“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比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是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民的民族的，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反对“我们”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这就不仅要引起摩擦，而且要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然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认为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³⁵³，他是完全正确的。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最终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东西，即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工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最艰巨、最需要斗争的工作，那末，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父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愿意想，不愿意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

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让人家用词句来欺骗我们。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次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忘掉去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在这次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就是认为这次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这只能这样理解，绝对不可能有别的理解，因为侵入别国在任何战争中都是免不了的。就被压迫民族方面说来，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否认“保卫祖国”，或者就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说来，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的战争中否认“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忘记一切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大强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植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和培植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注意到下面这个一般的理由。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

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瑞士——也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这个道理很简单，几乎用不着作特别的说明。这里只要指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用军队镇压罢工者就够了。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动辄哭泣的小资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流血和死亡等等，那我们就应当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止境的恐怖。如果现在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给这个社会准备恐怖的结局，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合理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废除武装（正确些说，梦想废除武装），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个是托拉斯的作用和妇女在工厂中劳动的作用；另一个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情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要求”这种发展，不“支持”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在工厂中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庭劳动的时代。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壮丁军事化，而且使青年也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于这些，我们应当说，这太好了！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推翻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末他们怎么会被青年等等的军事化吓倒呢？这并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也不是什么空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重演这些事实表示怀疑，那就真正糟糕透顶了。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在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呵！”在公社时期，妇女和十三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作战。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消极地眼看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坏或

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象 1871 年那样拿起武器，于是目前这些被吓倒了民族，正确些说，目前这个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无疑会、虽然迟早不定但绝对无疑会发展成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已经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会引起包括中立国和小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无产阶级的妇女对这种现象怎么办呢？只去咒骂一切战争和军事行动，只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军事。无产者需要这门科学，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去打别国的工人，象当前的战争中所做的那样，象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为了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而不是靠善良的愿望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如果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拒绝正是在当前的战争中进行这种宣传，那就最好干脆别说关于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人民武装”这一纲领性的条文，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的让步。我们在前面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

的关系问题。这个要求不能接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要求和由此产生的幻想必然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是国际当前的主要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得³¹⁶和昆塔尔³⁶⁷的一个主要缺点，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恰恰在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来，更不用说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内部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一个是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之流的先生们露骨的、无耻的、因而也是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另一个是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劳动派”³⁶⁸，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其他“独立工党”⁹的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露骨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内阁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³⁶⁹（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平主义的口号，来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联盟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活动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于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具体问题以及革命的其他具体问题

闭口不谈，掩盖躲避，即使谈，也唯恐触犯警察的禁令。尽管战前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²³⁰中又正式地指出过这一未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正是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重演悲剧的可能性，尽管群众一再爆发出不平和不满的情绪，尽管我们做了努力，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成长起来，人类还会经受（在最坏的情况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我们赞成的改良纲领也应当是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假如我们单让机会主义者去争取改良，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机会主义者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正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1914—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承认保卫祖国，这只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而已。”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的做法，在理论上要正确得多，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要难堪得多。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本国’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

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文钱和一个人”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也“不用一文钱和一个人”去帮助资产阶级民兵，即使象在美国、瑞士、挪威等等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特别是在1907年和1911年，被收买来当作军队去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来选举军官，取消一切军法制度，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象瑞士这类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愈来愈多地、愈来愈无耻地剥削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研究军事的自由协会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給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研究军事。无产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作这样的研究。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当然不能单用纲领去同机会主义作斗争，而应当实行始终不懈的监督，使纲领真正实现。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言行不符，养成了虚伪和好说无耻的革命空话的习惯（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这种社会思想，是从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并能够影响一定社会阶层的思想，而不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是在个别小国的特殊的、分外“安宁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想一直站在一旁。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想一下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据就够了。他们说：“我国小兵少，我们对大国毫无办法（因此也就无力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同盟）……我

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继续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中立等等。”（大概象比利时那样的“永久”吧？）

许多小国想始终站在一旁的小打算，只想远远离开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搏斗，利用自己比较独占的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状态的小资产阶级愿望，——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受到一定欢迎和得到一定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打算是反动的，完全建筑在幻想上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中去的。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就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垄断同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尽量有利地、尽量安静地利用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

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操着三种世界语言，并且正是操着与瑞士毗邻的那些交战国的语言。

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缴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捐”，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而用三种语言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在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中间散发，说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的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象《哨兵报》³⁷⁰、《民权报》³⁰⁸、《伯尔尼哨兵报》³⁰⁷这几家优秀的报纸就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

不够。只有这样做，阿劳党代表大会³⁷¹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出色的决议而已。

现在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是：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适合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方向呢？显然，是不适合的。“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的带有极浓厚的民族性、特殊的民族性的纲领，决不是国际主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的纲领。

写于1916年9月

根据德文报纸译成俄文刊印

1917年9月和10月第一次载于
《青年国际》第9期和第10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3卷
第73—84页

署名：尼·列宁

1929年俄译文第一次载于《列宁
全集》第2、3版第19卷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运动中的分裂

机会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取得的异常可鄙的胜利,是否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呢?

这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现在我们有可能而且应当来分析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我们在我们党的书刊上已经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如下两点:第一、我们这个时代和当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第二、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及其相同的思想政治内容。

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制有五种主要表现:(1)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2)大银行占垄断地位,三五个大银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3)原料产地被托拉斯和金融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和银行资本溶合起来的垄断工业资本);(4)国际卡特尔开始瓜分世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经在一百个以上,它们占据了全部世界市场,并且“和睦地”进行瓜分(当战争还没有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这

种特殊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5）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

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第一、这表现在腐朽的趋势上，这种趋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共和民主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君主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所以日益消失，正是因为两者都在活生生地腐烂着（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迅速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专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五十亿至八十亿法郎。第三、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的表现。第四、“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贿赂收买风行一时，类似巴拿马案件³⁵¹层出不穷。第五、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身上的寄生虫。罗马的无产者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现代无产者过活。西斯蒙第这个深刻的见解，马克思曾特别加以强调。³⁷²现在帝国主义稍微改变了这种情况。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部分地也依靠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过活。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

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错”的东西），其含义也是一样。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定义，就不免要同卡·考茨基完全抵触，因为他不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断定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是“工业”国力图兼并“农业”国^①。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论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工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力图兼并农业国，而且还力图兼并一切国家。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割裂开了，来为他的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裁军”、“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这种理论捏造的全部用意和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从而为同那些帝国主义辩护士即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实行“统一”的理论辩护。

考茨基的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已在《社会民主党人报》²⁸⁹和《共产党人》³⁷³上详细论述过了。我们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以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彼克塔托尔³⁵⁵为首的“组委会分子”³²⁶，还有马尔托夫、大体上托洛茨基也不例外，都认为最好避开不谈考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问题。他们不敢公开维护考茨基在战时所写的东西，而只是捧一下考茨基（如阿克雪里罗得所写的一本德文小册子，组织委员会曾答应把它印成俄文）或援引几封考茨基的私信

①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于1914年9月11日在《新时代》²⁴上发表的论文）

(如斯彼克塔托尔)来敷衍了事。考茨基在这些信里硬说他持反对派的立场,而狡猾地试图完全否认自己的一切沙文主义言论。

应当指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无异于粉饰帝国主义的“见解”,不仅比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后退了一步(虽然希法亭本人现在也极力拥护考茨基,并且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统一”!),而且比社会自由主义者约·阿·霍布森也后退了一步。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丝毫不想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是他在他的1902年的著作^①中却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远为深刻的定义,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了远为深刻的揭露。请看这位著作家(在他那里几乎可以找到考茨基的所有一切和平主义的和“调和主义的”陈腐见解)对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这一极重要的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吧:

霍布森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老牌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

“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从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口中唱出这种关于帝国主义者的“盲目症”的调子来,要比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口中唱出来适当得多),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方面最严重的是英国。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役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的大量常备军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非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①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J. A. Hobson. «Imperialism») 1902年伦敦版。

分割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象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象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所能开辟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职员和仆役，这些职员和仆役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现代英国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资者’（食利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动也很难预料，所以不能预先肯定只有这一种前途或其他任何一种前途。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确实是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那末这些势力就会正是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不知道，只有革命无产阶级，而且只有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才能实行这种“抵抗”。这正是他作为社会

自由主义者的本色！不过，他早在1902年就出色地考察了“欧洲联邦”（请考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国伪善的考茨基主义者所极力掩饰的种种事实的意义，即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现在战胜了（能长久吗？）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之间的这种极深刻的经济联系，不仅在我们的一些论文中，而且在我们党的一些决议中都一再指出过。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考茨基主义者却宁愿回避这个问题！例如，马尔托夫还在他所作的几次专题报告中就进行过诡辩，他的那番话登载在《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³⁷⁴上（1916年4月10日第4号），原文如下：

——“……如果那些在智力发展方面最接近于‘知识界’的最熟练工人竟也注定要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而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那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是很糟糕的，甚至是绝望的……”

玩弄一下“注定”这个愚蠢字眼和某种“捏造把戏”，就把某些工人阶层转到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回避过去了！而组织委员会的诡辩家们正是要回避这一事实！他们用考茨基主义者希法亭以及其他许多人目前所炫耀的“官场乐观主义”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客观条件一定会保证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革命派的胜利！说什么他们都是些对无产阶级抱“乐观主义的人”！

其实，所有这些考茨基主义者，如希法亭、组委会分子以及马尔托夫之流，不过是对……机会主义抱乐观主义罢了。实质就在这里！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产儿，而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产儿。当然，从世界范围看来，“无产阶级”迟早——早五十年或迟五十年，从这一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问题——“会”统一起来，而革命社会民主党“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但是，考茨基主义者先生们，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你们现在向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机会主义者献媚讨好，而这些人对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说来是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不摆脱这些人，工人运动始终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你们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即同列金、大卫之流，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统一”，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得力代理人去奴役工人。革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只有反对你们，这种胜利才能到来而且一定能到来，才能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这种胜利也就是对于你们的胜利。

现代工人运动中的这两种倾向，甚至是两个派别，在1914—1916年间已经十分明显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决裂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这段时期内，在英国仔细地考察过这两个派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最早也只能说是在1898—1900年间开始的。但英国的特点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种例外情形时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现象是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

利(暂时的胜利)有联系的。

恩格斯在 1858 年 10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²⁷¹ 恩格斯在 1872 年 9 月 21 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黑尔斯 (Hales) 在国际联合会委员会掀起了一场大风波，投票谴责马克思，因为他说过“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了”。马克思在 1874 年 8 月 4 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至于说到此地〈英国〉的城市工人，遗憾的只是那帮领袖都没有进入议会，不然这倒是摆脱这帮混蛋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³⁷⁵ 恩格斯在 1881 年 8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里说到了“被资产阶级收买的，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³⁵²。恩格斯在 1882 年 9 月 12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人和自由激进党人，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³⁵³

恩格斯在 1889 年 12 月 7 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这里〈英国〉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respectability)……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意味着什么了。”³⁷⁶ 他在 1890 年 4 月 19 日的信中说：“运动〈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暗中向前发展着，席卷了愈来愈广大的阶层，而且往往是那些至今处于停滞状态的、处在最低层〈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的群众，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认识到自

己的地位，认识到原来正是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的运动着的力量。”³⁷⁷ 恩格斯在1891年3月4日写道：“分崩离析的码头工会失败了，战场上将只剩下一些富足的因而也是胆怯的‘旧的’保守的工联……”他在1891年9月14日写道：在工联新堡代表大会上，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旧工联主义者失败了，“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承认了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失败……〈所有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³⁷⁸

恩格斯曾把他数十年来反复说明的这些思想在书刊上公开发表，他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所写的序言³⁷⁹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个序言中谈到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谈到了“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和“广大工人群众”相对立的事实。工人阶级中间只有那些“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英国在1848—1868年的特权地位所提供的“长期的利益”，而“广大群众的情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新”工联即非熟练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在英国被称为“所谓工人代表”的那些人，“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

我们故意相当详细地摘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坦率的言论，是想使读者能够全面加以研究。这些言论是必须研究的，是值得细细玩味的。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条件要求我们在工人运动中所采取的那个策略的关键，正是在这里。

考茨基在这里依然企图“把水搅浑”，企图用同机会主义者调

和的甜言蜜语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坦白的、天真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连施之流)说德国进行战争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垄断地位,考茨基在同他们论战时用来“纠正”这种明显的谎话的不过是另一种明显的谎话罢了。他用娓娓动听的谎话代替了厚颜无耻的谎话!他说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早就被粉碎了,早就被破坏了,因此也就用不着再来破坏,无须再来破坏了。

这种论据的虚伪性何在呢?

第一、就在于它把英国的殖民地垄断地位回避过去了。而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早在三十四年以前即1882年,就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这种垄断地位!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虽然已被破坏,但是其殖民地垄断地位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了,因为全世界被瓜分完毕了!考茨基用甜蜜的谎言作幌子,偷运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机会主义市侩的货色,妄说“没有什么东西非要用战争来争夺不可”。恰巧相反,现在资本家不仅要用战争来争夺东西,而且为了保存资本主义,他们非打仗不可,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

第二、为什么英国的垄断地位造成了机会主义在英国的胜利(暂时的胜利)呢?因为垄断地位能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资本家可以从这种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维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它们的雇主的有名“同盟”吧),即本国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被破坏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破坏得怎样呢?是不是一切垄断都消失了呢?

如果是这样，考茨基主张调和的（同机会主义调和的）“理论”倒会有些根据了。但问题就在于并不是这样。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每个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以及每个大银行，都是一种垄断组织。超额利润并没有消灭，它仍然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财政上富足的国家剥削其他一切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变本加厉了。少数富强国家（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万万以至数十万万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万万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就在于此，而考茨基不仅没有把此中最深刻的矛盾揭示出来，反而把它们掩盖起来了。

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每年拿出一两亿法郎，在经济上收买“本国”工人中间的上层分子，因为他们的超额利润大概有十亿之多。至于这点小恩小惠怎样分配给工人部长、“工人议员”（请想一下恩格斯对于这个概念的卓越分析吧）、军事工业委员会³⁶⁹的工人代表、工人官吏、狭隘行业工会工人以及职员等等，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在1848—1868年以及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只有英国一国享有垄断权；因此机会主义能在英国得势数十年，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占有过如此丰富的殖民地或工业垄断权。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是过渡到帝国主义新时代的时期，这时享有垄断权的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资本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国的金融资本了（在日俄两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由于这种不同的情况，从前英国的垄断权才可能存在几十年而不受争夺。现代金融资本的

垄断权则已遭到疯狂的争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从前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可能被收买腐化几十年。现在这就很难办到了，甚至办不到了，但是收买为数较少的（与1848—1868年的英国相比较）“工人贵族”阶层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每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这样干。从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用恩格斯的寓意极深的话来说——只能在一国内形成（因为当时只有一国拥有垄断权），但是能维持很久。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卷进了瓜分赃物的疯狂斗争中，这种党也就未必能在许多国家里得势很久。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

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强的民族变为“永远”叮在他人身上的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坐享“清福”，用装备着杀人利器的最新军国主义制度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到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当前工人运动的历史必将在这两种趋势的斗争中逐渐展开。因为前一种趋势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经济“根源”的。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产生了、养育了和为自己提供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象意大利比索拉蒂之流的成形的十足社会帝国主义的党，同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布尔金、齐赫泽、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半成形的所谓的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工人贵族阶层分离出去而投靠资产阶级的过程，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完成了，而要为这种经济事实和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找到一种适当的政治形式，是不怎么“费劲”的。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机关，如报刊、议会、各种团体和代表大会等等，就替那些恭顺驯良的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职工们，创造了一种同他们经济上的特权和小惠相适应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小惠。内阁或军事工业委员会、议会和种种委员会内以及“庄严的”合法报纸编辑部或同样庄严的“唯资产阶级之命是听的”工人联合会理事会内的安稳的肥缺，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用来诱感和嘉奖“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代表人物及其拥护者的东西。

政治民主制的机构也是循着这一方向运转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选举是不行的，没有群众是行不通的，而要在印刷术异常发达和议会制度盛行的时代诱惑群众，就必须有一套广泛施展、一贯推行、周密布置的手法，来阿谀奉承、制造谣言、欺骗敲诈、玩弄流行的时髦字眼、信口答应工人实行种种改良和增进种种福利，只要他们肯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把这套手法叫做劳合-乔治主义，因为英国大臣劳合-乔治是在一个拥有“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典型国家里玩弄这套手法的一位最高超最狡猾的代表。劳合-乔治是一个第一流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滑头政客，是一个颇有声誉的演说家，他善于在工人听众面前乱吹一通，甚至讲一些最最革命的词句，他善于向驯良的工人大施恩惠，如许诺实行社会改良（保险等等），他出色地为资产阶级服务^①，并且正是在工人中间替资产阶级服务，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着资产阶级影响，即在一个最有必要而最难于在精神上征服群众的地方传播着这种影响。

^① 不久以前，我在一种英文杂志上读到劳合-乔治的一位政敌托利党人²¹⁵写的一篇文章：《托利党人眼中的劳合-乔治》。战争打开了这位政敌的眼睛，使他看到劳合-乔治是资产阶级的一名多么出色的帮办！托利党人已经同他和解了！

试问，劳合-乔治同谢德曼、列金、韩德逊、海德门、普列汉诺夫以及列诺得尔之流是否有很大区别呢？有人会反驳说，在后者中间有些人会回到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从政治上即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一种程度上的微不足道的区别。在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中间可能有个别人会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是，社会沙文主义或（完全是一回事的）机会主义的流派却不会消失，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这个政治流派，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事实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俄国的齐赫泽党团¹⁸³、《我们的事业》杂志³⁴⁰、《劳动呼声报》³⁸⁰以及国外的“组委会分子”，都无非是这样一个党的变种罢了。我们根本不能设想这些党派会在社会革命以前消失。恰巧相反，这个革命愈迫近，爆发得愈猛烈，革命进程的转变和飞跃愈急剧，则群众革命潮流反对机会主义市侩潮流的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愈大。考茨基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流派，因为它无论在群众中间或在投靠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中间，都是没有基础的。但是考茨基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利用属于过去的思想，竭力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坚持前者和后者的一致，从而提高后者的威信。

群众已经不再跟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走了：劳合-乔治在英国工人大会上受到了斥责，海德门退出了党，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波特列索夫和格沃兹迭夫之流全靠警察来保护。考茨基主义者暗中掩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行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考茨基派最常散布的诡辩之一，就是以“群众”为借口。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脱离群众和群众组织呀！可是请想一想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吧。英国工联的“群众组织”在十九世纪曾经拥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就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而是揭露它。他们没有忘记：（1）工联组织直接包括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少数。无论当时在英国或现在在德国，参加组织的人数至多占无产者的五分之一。决不能认真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把大多数无产者包括到组织中去。（2）——这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参加组织的人数，而在于这个组织所采取的政策客观实际意义：这个政策是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即为群众从资本主义下得到解放服务呢，还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代表少数人同资本主义的调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现在的德国等等的真实情况。

恩格斯把“最低层群众”即真正的多数同旧工联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分开，同享有特权的少数分开，并且向这个没有沾染上“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的真正多数发出号召。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于此！

我们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估计到，无产阶级中间究竟有一部分人在现在或将来会拥护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只有斗争才能证明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决定这一点。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的人”只代表少数。因此，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

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在出卖群众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这样也就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们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停战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用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丑恶本质而不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想就这条同考茨基主义截然相反的路线的主要特点作一概括的说明。

写于1916年10月

载于1916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
文集》第2卷

署名：尼·列宁

按《文集》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3卷
第103—119页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 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³⁸¹

第一篇(或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转变

有迹象表明,这种转变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那就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和平。

两个帝国主义联盟无疑地已经疲惫不堪;继续进行战争有困难;一般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通过可耻的“军事”利润已经把人民剥得精光,要再剥很少一点都困难了;美国、荷兰、瑞士等中立国的金融资本家已经饱腹,他们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由于缺乏原料和食物,再做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已经不容易了;德国拚命想使它的主要帝国主义竞争者英国的某个同盟国脱离英国;德国政府发表了和平主义的言论,一些中立国的政府也跟着这样做,——这就是上述迹象中最主要的迹象。

有没有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呢?

这个问题很难给以肯定的回答。据我们看来,有两个可能性是相当明显的:

第一个可能性是德国同俄国单独媾和,尽管不通过通常书面的正式条约形式。第二个可能性是不这样媾和,英国及其同盟国实际上还能支持一年、两年等等。在第一种情况下,战争即使不是

在现在，也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停下来，而且不可能指望在它的进程中会发生重大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战争就可能遥遥无期地继续打下去。

现在就来谈第一种情况。

德国同俄国之间刚刚进行过单独媾和的谈判；尼古拉二世本人或最有权势的在朝党羽是赞成这样媾和的；世界政治中出现了由俄英反德的帝国主义同盟向俄德反英的同样帝国主义的同盟的转变，——所有这些都是无容置疑的。

特列波夫代替了斯提尤尔美尔；沙皇政府公开声明，俄国占有君士坦丁堡的“权利”是各同盟国公认的；德国正在建立一个单独的波兰国家，——这些迹象似乎表明单独媾和的谈判失败了。也许沙皇政府进行这种谈判，只是为了恫吓英国，要它正式地和毫不含糊地承认暴君尼古拉占有君士坦丁堡的“权利”，并对这种权利作某些“郑重的”保证吧？

既然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的、基本的内容，就是俄、德、英三个主要的帝国主义竞争者、三个强盗之间的分赃，那末这样的推测没有任何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

另一方面，沙皇政府愈觉得在事实上、在军事上不可能夺回波兰，占领君士坦丁堡，击破德国的坚固防线（德国由于最近在罗马尼亚取得了胜利而大大整顿、缩短和巩固了自己的防线），就愈不得不同德国单独媾和，也就是从联英反德的帝国主义同盟转到联德反英的帝国主义同盟。为什么不会是这样呢？俄国同英国就曾经因为两国在中亚细亚分赃方面的帝国主义竞争而几乎打起来！英国同德国就曾经在 1898 年进行过关于联合起来反对俄国的谈判，而且英国同德国当时曾经秘密议定，“一旦”葡萄牙不履行自己财政上的义务，就去瓜分它的殖民地！

德国帝国主义的领导集团极力图谋同俄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这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很明显了。联合的基础显然就是要瓜分加里西亚(扼杀乌克兰鼓动和乌克兰自由的中心，对于沙皇政府是很重要的)和阿尔明尼亚，也许还有罗马尼亚！有一家德国报纸“暗示”说，罗马尼亚可能被奥地利、保加利亚和俄国瓜分！德国也许会同意再向沙皇政府作些“小让步”，只要能实现同俄国(也许还要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英国。

尼古拉二世同威廉二世之间可能秘密地单独媾和。外交史上有过缔结秘密条约的先例，这种秘密条约除了两三个人以外，任何人甚至连大臣们都不知道。外交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大国”去参加“全欧”会议的时候，事先已秘密商定了各主要竞争者之间的主要问题(如1878年柏林会议以前，俄国同英国就达成了掠夺土耳其的秘密协定)。如果说，沙皇政府还考虑到在俄国目前情况下，要是正式单独媾和，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或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就可能出来执政，因而拒绝两国政府正式单独媾和，同时却同德国缔结秘密的、非正式的、但同样是“持久的”和约，规定“崇高的缔约双方”在将来的和会上共同采取某种路线，这种情况是毫不足怪的！

这种推测是否正确，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如何，同喋喋不休地、好心肠地空谈什么目前一般资产阶级政府可能在不割地等等的基础上缔结和约相比，这种推测包含的真理(即对实际情况的估计)要多上一千倍。这种空谈不是天真的愿望，就是掩盖真相的欺骗和谎言。这个时期、这次战争和这个企图缔结和约的时机的真相，就是帝国主义的分赃。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跟资产阶级政策不同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了解这种真相，说出这种真相，“说出实际情况”，而对于资产阶级政策来说，主要的是隐

瞒和掩盖这种真相。

两个帝国主义联盟都抢得了一定数量的赃物，而以德国和英国这两个主要的和最厉害的强盗抢得最多。英国没有丧失一寸自己的土地和殖民地就“得到了”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的一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德国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在欧洲得到了更宝贵无比的领土，夺得了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法国的一部分和俄国的一部分等等。问题在于瓜分这些赃物，同时，每个匪帮的“头目”，即英国和德国，也应当多多少少酬答一下自己的同盟国，因为这些同盟国，除保加利亚其次除意大利以外，都是损失得特别多的。最弱的同盟国损失得最多，在英国联盟内，被摧毁的有比利时、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在德国联盟内，土耳其丧失了阿尔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德国得到的赃物无疑要比英国多得多。到目前为止，德国是胜利了，它比战前任何人所预料的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因此很明显，尽可能迅速地缔结和约对德国是有利的，因为它的竞争者还可以利用自己可能得到的（虽然不十分可靠的）最有利的机会，出动更多的后备新兵等等。

客观情况就是这样。目前帝国主义分赃之争的局面就是这样。这种局面首先使德国联盟内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其次使各中立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产生了和平主义的愿望、声明和言论，这是非常自然的。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得不竭力愚弄人民，进行彻头彻尾的欺骗，空谈什么民主的和平、弱小民族的自由、裁军等等，借以掩饰帝国主义和平的丑恶面目，掩饰分赃，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力图愚弄人民是自然的，那末社会党人是怎样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呢？这一点在下一篇（或下一章）里就要

谈到。

第二篇(或第二章) 考茨基与屠拉梯的和平主义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理论家,是德国所谓“马克思主义中派”的最著名的领袖,是在国会中成立了特别党团“社会民主劳动派”³⁶⁸(哈阿兹和累德堡等等)的反对派的代表。现在,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登载了考茨基论和平条件的文章,这些文章转述了“社会民主劳动派”就德国政府提议和谈的著名照会所作的正式声明。这个声明在要求政府提出一定的和平条件的时候,还讲过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

“……要使这份照会〈德国政府的照会〉导致和平,一切国家必须毫不含糊地打消兼并别国土地以及使某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屈从别国政权的念头……”

考茨基在自己的文章中转述这个论点并加以具体化的时候,周密地“证明”,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藩属国。

我们现在就来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考茨基及其伙伴们所提出的这些政治口号和论据。

当问题涉及到俄国,即涉及到德国的帝国主义竞争者的时候,考茨基就提出一个不是抽象的,不是“一般的”,而是完全具体的、实在的、明确的要求: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这样一来,他就揭穿了……俄国真正的帝国主义阴谋。当问题涉及到德国,即恰恰涉及到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在进行帝国

主义战争时，得到了认考茨基为自己党员（并任命他担任自己主要的、指导性的、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新时代》²⁴的编辑）的政党的大多数的帮助，——在那个时候，考茨基就不去揭穿本国政府的具体的帝国主义阴谋，而只表达“一般的”愿望或论点：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藩属国！！

考茨基的政策，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同法国和英国的所谓战斗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后者不也是公开揭穿德国具体的帝国主义步骤，而谈到英国和俄国所侵占的国家或民族时则用“一般的”愿望或论点敷衍了事吗？不也是对侵占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大叫大嚷，而对侵占加里西亚、阿尔明尼亚和非洲殖民地默不作声吗？

其实，考茨基和桑巴—韩德逊的政策同样是在帮助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竞争者和敌人的阴谋上，而替“本国”资产阶级的同样的帝国主义步骤，披上一层含糊的一般词句和善良愿望的薄纱。如果我们只作所谓基督教式的默想，沉湎于一般善良词句的善心好意，而不揭穿这种词句的实际的政治意义，那我们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本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难道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都是以极其善良的“一般的”词句和“民主的”声明自我标榜，借以掩饰对弱小民族的掠夺、欺凌和压迫吗？

“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藩属国……”如果我仅仅这样说，那末表面上看来好象我是主张土耳其完全自由的。但是实际上我只是重复德国外交家们通常也说的一句话，他们显然是在撒谎骗人，用这句话来掩盖目前德国既在财政上又在军事上已把土耳其变成自己的藩属的事实！如果我是一个德国的社会党人，那

我所说的“一般的”词句只会对德国外交有利，因为这些词句的真正意义是为德国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一切国家必须打消兼并……以及使某国人民在经济上屈从的念头……”话是多么善良呵！帝国主义者“打消”兼并以及从财政上压迫弱小民族的“念头”有几千次了，但是否应该拿这一点同事实对比呢？事实表明，德、英、法、美等国的每一家大银行都使弱小民族处于“屈从”的地位。既然在各弱小民族的铁路等企业上的投资已达数十亿之多，那末目前富强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又怎能在事实上放弃对其他民族进行兼并以及使它们在经济上屈从呢？

谁是真正在同兼并等等作斗争呢？是那些空口说些善良词句而其客观意义完全等于在加冕的资本主义强盗头上洒基督圣水的人呢，还是那些向工人解释说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不能制止兼并和财政压迫的人？

下面还可以看到考茨基鼓吹的和平主义在意大利的实际例子。

著名的改良主义者菲力浦·屠拉梯 1916 年 12 月 25 日在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³⁸²（«Avanti!»）上发表了一篇题名《废话》的文章。他写道，1916 年 11 月 22 日意大利社会党的议会党团向议会提出了缔结和约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它“指出英、德两国代表所宣布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些原则应当作为可能达成的和约的基础，并且提请政府在美国及其他中立国的调停下开始和谈”。屠拉梯本人就是这样叙述社会党人建议的内容的。

1916 年 12 月 6 日，议院“葬送了”社会党人的建议，将它“延期”讨论。12 月 12 日，德国的首相以自己的名义向国会提出意大利社会党人所希望的建议。12 月 22 日威尔逊发出了照会，用

菲·屠拉梯的话来说，他“转述了和重复了社会党人的建议的思想和动机”。12月23日其他中立国也出来讲话，转述了威尔逊的照会。

屠拉梯感叹地说，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了。莫不是威尔逊和各中立国也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了吗？

12月17日屠拉梯在议会中发表了演说，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异乎寻常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强烈反应。据《前进报》报道，原话如下：

……“假定说，德国向我们建议的那种讨论，能够大体上解决军队撤出比利时和法国，复兴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要是你们愿意的话）门的内哥罗这样一些问题；我还要向你们补充一句，在那些无疑是属于意大利并且适合于战略保障的地方，修改意大利边界……”说到这里，资产阶级的和沙文主义的议院就把屠拉梯的话打断了；四面八方发出呼声：“妙啊！原来这一切也是你所希望的啊！屠拉梯万岁！屠拉梯万岁”……

屠拉梯似乎感到资产阶级的这种喝采有点不妙，于是就想加以“更正”或“解释”，他说：

……“先生们，请不要乱开玩笑。容许我们向来承认的民族统一的适宜性和权利，这是一回事；为了这个目的而引起战争或替战争辩护，则是另一回事”。

无论是屠拉梯的这个“解释”，或者是《前进报》替他辩护的文章，无论是屠拉梯12月21日的一封信，或者是某个署名“bb”的在苏黎世的《民权报》³⁰⁶上的文章，都丝毫“更正”不了事实，消除不了屠拉梯露出马脚这一事实！……正确些说，露出马脚的不是屠拉梯，而是考茨基和法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往下我们就能看到）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报刊

抓住了屠拉梯演说中的这段话而欢呼起来，是有道理的。

上述那位 *«bb»* 想替屠拉梯辩护，说他谈的只是关于“民族自决权”。

多么糟糕的辩护！大家知道，“民族自决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是（在国际民主派的纲领中向来也是）指保护被压迫民族说的，它同这里的问题有什么相干呢？难道它是指帝国主义战争，即指瓜分殖民地、压迫其他国家的战争，指进行掠夺和压迫的列强间为着谁能压迫更多的其他民族的战争说的吗？

借口民族自决来替帝国主义的而不是民族的战争辩护，这同阿列克辛斯基、爱尔威和海德门等人的言论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就是以法国的共和制同德国的君主制相对立作为借口的，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次战争根本不是由于共和主义同君主制原则的冲突，而是由于两个帝国主义联盟要瓜分殖民地等等而发生的。

屠拉梯替自己解释和申辩说，他根本不是替战争“辩护”。

我们就相信这位改良主义者、这位考茨基的信徒屠拉梯的话，说他的用意不是替战争辩护吧。可是谁不知道，在政治上要考虑的不是用意而是行动，不是善良的愿望而是事实，不是想象而是现实呢？

就算屠拉梯没有想替战争辩护，就算考茨基没有想替德国建立土耳其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藩属关系的行为辩护。但是事实上，这两位好心肠的和平主义者恰恰是在替战争辩护！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假如考茨基不是在谁也不读的枯燥无味的杂志上，而是在议会的讲坛上，向活跃的、敏感的、具有南方人气质的资产阶级听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君士坦丁堡不应当归俄国，土耳其不应当成为任何国家的藩属国”，那末，毫不奇怪，机灵的资产者就会高呼“好啊！对啊！考茨基万岁！”

屠拉梯实际上(不管他是否希望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站在建议各帝国主义强盗订立亲善协定的资产阶级经纪人的立场上。“解放”那属于奥地利的意大利土地,实际上就是替意大利资产阶级因参加帝国主义大联盟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得到的报酬作掩饰,就是瓜分非洲殖民地、划分达尔马威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势力范围以后的一件次要的附加物。也许改良主义者的屠拉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是自然的,但是考茨基实际上同屠拉梯丝毫没有区别。

要不粉饰帝国主义战争,不帮助资产阶级把这种战争冒充为民族的战争即解放民族的战争,不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就不应当象考茨基和屠拉梯那样说话,而应当象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说话,应当向本国资产阶级指明,它讲民族解放是欺人之谈;如果无产阶级不“掉转枪口”对准本国政府,就不可能从这次战争中得到民主的和平。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他的立场就应当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真正为民主的和平效力的,不是那些重复一般的、无谓的、不负责任的、好心肠的和平主义愿望的人,而是那些既揭穿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又揭穿这次战争所准备的帝国主义和平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是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反对万恶的政府的人。

某些人有时企图这样来替考茨基和屠拉梯辩护,他们说,要比反政府的“暗示”更进一步,在合法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暗示”在那班和平主义者的言论中是有的。但是应当这样来回答这一点:第一、不可能合法地说出真相,并不能作为掩盖真相的理由,而只能作为必须有不合法的,即不受警察和书报检查机关摆布的组织 and 刊物的理由;第二、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时刻,那时社会主义者必须同一切合法性决裂;第三、甚至在农奴制的俄国,杜勃罗

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善于说出真相，他们的办法就是一方面闭口不谈 1861 年 2 月 19 日的诏书¹⁹⁹，另一方面嘲笑和责骂当时的自由派，而当时自由派所说的话，同考茨基和屠拉梯所说的话是非常相似的。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谈到法国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已经反映在刚刚开完的法国工人组织和社会党人组织的两个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了。

第三篇(或第三章) 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

法国 C. G. T.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工会总同盟)³⁸³ 的代表大会和法国社会党²⁴⁰ 的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目前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真正意义和真正作用，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下面就是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是由以臭名远扬的茹奥(Jouhaux)为首的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多数派、无政府主义者勃鲁特舒和……“齐美尔瓦尔得派”梅尔黑姆全体一致通过的：

“各全国性团体联盟、工团联合会(工会)和劳动介绍所代表会议获悉美国总统‘敦请各交战国公开说明自己关于结束战争条件的意见’的照会之后，——

请求法国政府对这一建议表示同意；

敦请政府首先向自己的同盟国发表类似的声明，使和平早日实现；

代表会议声明：作为最终和平的保证之一的民族联盟，只有在

一切大小民族都获得独立，领土不受侵犯和政治上经济上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障。

与会的各组织有责任支持并且在工人群众中传播这种思想，以便中止动荡的、暧昧的局面，这种局面只对秘密外交有利，而秘密外交是工人阶级所一向反对的。”

这就是完全合乎考茨基精神的“纯粹的”和平主义的典范，这种和平主义已经得到了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大多数是由沙文主义者组成的正式工人组织的赞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沙文主义者同“考茨基主义者”在和平主义空谈的立场上实行政治联合的文件，这是一个很出色的、值得予以最严重注意的文件。我们在上一篇中曾极力证明什么是沙文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资产者与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观点一致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一致性已经在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实际地实现了。

梅尔黑姆 1915 年 9 月 5—8 日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³¹⁶上说过：«Le parti, les Jouhaux, le gouvernement, ce ne sont que trois têtes sous un bonnet»（“党、茹奥先生之流和政府，这是三位一体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是一致的）。梅尔黑姆 1916 年 12 月 26 日在工会总同盟代表会议上同茹奥一起投票赞成和平主义的决议。1916 年 12 月 23 日，在德国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一家最露骨最极端的机关报——开姆尼斯的《人民呼声报》³⁸⁴上，登载了一篇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政党的瓦解与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恢复》。这篇文章当然对休特古姆、列金、谢德曼之流，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多数派和德国政府的爱好和平大加赞扬，并且宣布说，“战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应当恢复党的统一，只有少数拒绝交纳党费的狂热分子（即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拥护者！）除外”，“应当在党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工会的政策

基础上恢复党的统一”。

德国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同考茨基之流、同“社会民主劳动派”讲“统一”的思想和政策，在这里表现和宣扬得最明显不过了。这是一种在和平主义词句的基础上的统一，是茹奥和梅尔黑姆1916年12月26日在法国所实行的“统一”！

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1916年12月28日的编辑部评论中写道：

“如果说比索拉蒂和休特古姆，博诺米和谢德曼，桑巴和大卫，茹奥和列金转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营垒，背叛了〈hanno tradito, 叛变了〉他们曾经答应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国际主义者的思想统一，那末我们要同我们的德国同志如李卜克内西、累德堡、霍夫曼、迈耶尔，是要同我们的法国同志如梅尔黑姆、勃朗、布里臧、拉芬-杜然斯等不曾变节、不曾动摇的人站在一起的。”

你们看，多糊涂啊：

比索拉蒂和博诺米早在战前就作为改良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被开除出意大利社会党了。《前进报》把他们同休特古姆和列金相提并论，这当然完全正确，但是休特古姆、大卫和列金是德国假社会民主党、真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的领袖，而同一个《前进报》却出来反对开除他们，反对同他们决裂，反对建立第三国际。《前进报》声明（而且声明得完全正确）列金和茹奥是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营垒里去的人，而把李卜克内西和累德堡、梅尔黑姆和布里臧同他们对立起来。但是我们知道，梅尔黑姆是同茹奥一起投票的，而列金通过开姆尼斯的《人民呼声报》宣称，他确信只要把李卜克内西的同志们除外就能恢复党的统一，也就是同累德堡所加入的“社会民主劳动派”（考茨基包括在内）一起谈“统一”！！

这种糊涂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前进报》把资产阶级的和平主

义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混淆起来了，而象列金和茹奥那样有经验的政客却很懂得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同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原是一个东西。

既然在我们援引了全文的这个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事实上除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的空谈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丝毫革命意识，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那末茹奥先生和他的沙文主义的报纸《战斗报》³⁸⁵对茹奥同梅尔黑姆的“意见一致”，怎么会不真正感到高兴呢！

在资产阶级政府未被推翻，资产阶级未被剥夺以前，所谓“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也和所谓在现代社会中全体公民，即小农和富农，工人和资本家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一样，是欺骗人民的。如果不谈这一点，而去谈“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那岂不是可笑吗？

茹奥和梅尔黑姆所一致投票赞成的决议，从头到尾充满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前进报》公正地指出了茹奥的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奇怪的是，这个《前进报》却没有看出梅尔黑姆身上也有这个东西。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卖弄关于一般“民族联盟”和“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的“一般的”词句。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这样说：只要一部分民族（如英吉利和法兰西）还在向国外投资，把几百亿几百亿法郎的资本贷给弱小的和落后的民族以榨取高额利息，只要弱小民族还在受它们的奴役，高谈“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就是可恶的撒谎。

社会党人对茹奥和梅尔黑姆所一致投票赞成的决议的每一句话，本来不应该不提出坚决的抗议。社会党人本该直接针对这个

决议声明,威尔逊的演说显然是在撒谎骗人,因为威尔逊是靠战争发了数十亿横财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公然为了进行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而拚命武装美国的政府的首脑;社会党人本该声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被金融资本(它是金融资本的奴隶),被同英、俄等国缔结的、彻头彻尾掠夺性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秘密条约捆住了手脚,因此它在关于民主的和“公正的”和平问题上,除了照样撒谎以外,再不能说出和做出别的什么了;社会党人本该声明,争取这种和平的斗争并不是要重复一般的、空洞的、无谓的、不负责任的、实际上只是粉饰帝国主义污点的、好心肠的、甜蜜蜜的和平主义的词句,而是要向人民说出真相,告诉人民;要得到民主的和公正的和平,就要推翻各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就要为此而利用千百万工人的武装,利用居民群众因物价高涨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而产生的普遍不满情绪。

这就是社会党人本该代替茹奥和梅尔黑姆的决议而说出的话。

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该大会同工会总同盟的代表大会同时在巴黎举行)非但没有说这些话,反而以二千八百三十八票对一百零九票、二十票弃权的票数,也就是说,由社会沙文主义者(列诺得尔之流,所谓的«majoritaires»,即多数派的拥护者)和龙格派(龙格的拥护者,法国的考茨基主义者)的联盟通过了一项更坏的决议!!同时齐美尔瓦尔得派布尔德朗和昆塔尔派(kinthalien,昆塔尔代表会议³⁶⁷的参加者)拉芬-杜然斯也都投票赞成这个决议!!

我们打算援引该决议的原文,因为它过于冗长而又索然无味;它一面说些关于和平的好心肠的、甜蜜蜜的词句,同时又声明准备继续支持法国的所谓“保卫祖国”,即支持法国联合英国和俄国这两个更强大的强盗一起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

由此可见，在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同和平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同一部分齐美尔瓦尔得派的联合，不仅在工会总同盟内部，而且在社会党内部都已经成了事实。

第四篇（或第四章） 十字路口的齐美尔瓦尔得

报道工会总同盟代表大会的法国报纸是在12月28日到伯尔尼的，而伯尔尼和苏黎世的社会党的报纸在12月30日就登载了伯尔尼 I. S. K.（«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即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执行机关的新宣言。这个在1916年12月底发表的宣言，谈到了德国以及威尔逊和其他中立国的和平建议，并且把这些政府的言论称作是——这当然是非常公道的——“玩弄和平的滑稽戏”，“愚弄本国人民的把戏”，“外交家的骗人的和平主义的手法”。

同这种滑稽戏和谎言相对立的，是国际无产阶级“把斗争的武器转向本国的敌人而不是转向自己的兄弟”的“坚强意志”，这是能够实现和平等等的“唯一力量”。

上面的引文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过去在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内部好象是和睦共处的，现在则完全背道而驰了。

一方面，屠拉梯肯定地而且非常公正地说，德国和威尔逊等等的建议只是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转述”；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声明和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投票表明，这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很好地评价了用和平主义来掩盖他们的政策的好

处的。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宣言，把各交战国和中立国政府的和平主义称作滑稽戏和欺骗。

一方面，茹奥跟梅尔黑姆联合，布尔德朗、龙格和拉芬-杜然斯跟列诺得尔、桑巴和托马联合，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休特古姆、大卫和谢德曼宣布即将同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劳动派”“恢复社会民主党的统一”。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宣言号召“社会党的少数派”同“本国政府”及其仆从(Söldlinge)社会爱国派”作有力的斗争。

二者必居其一。

是揭穿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的空洞性、荒谬性和虚伪性呢，还是把它“转述”成“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是同茹奥和列诺得尔之流，列金和大卫之流这些政府的“仆从”作斗争呢，还是在法国式或德国式的空洞的和平主义宣言的基础上同他们联合？

这就是目前区别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分水岭，右派始终是极力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的，左派还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期间就不为无因地注意到要公开同右派划清界限，并且在代表会议上和会后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特别纲领。和平的临近或者哪怕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对和平问题的加紧讨论，都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引起了这两种政策的特别显著的分歧。因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及其“社会党人的”摹仿者或应声虫，过去或现在都认为和平是一种原则上不同的东西，就是说，“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这一思想，始终是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1914—1917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1898—1914年（如果不是更早的时期的话）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这一点，无论是资产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过去

和现在都是不愿意看到的。目前的和平，在资产阶级政府尚未被革命推翻的情况下，就只能是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的帝国主义和平，这一点，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者都是看不到的。

人们过去用些荒谬的、粗野的、庸俗的关于一般进攻或防御的话来评价这次战争，现在又用同样一些庸俗的一般的话来评价和平，可是忘记了具体的历史形势和帝国主义列强间具体的斗争情况。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政府和资产阶级在工人政党内部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而然地特别利用和平的临近，甚至利用关于和平的议论，来掩盖被战争揭穿了了的他们的改良主义、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内幕，来恢复自己在群众中已经破产了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德国或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拚命地企图同“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不坚定的、无原则的、和平主义的分子“实行联合”。

在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内部，大概也会产生掩盖两种不可调和的政策路线的分歧的企图。可以预料，这类企图将会有两种。“讲求实际的”调和将只是把响亮的革命词句（如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宣言中的词句）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实践机械地结合起来。第二国际中的情形就曾经是这样。胡斯曼和王德威尔得宣言中以及代表大会一些决议中的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了大多数欧洲政党的极端机会主义的实践，而不是去改造它，破坏它，同它作斗争。这种策略在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内部能不能再次成功，尚属疑问。

“原则性的调和者”将试图用这样一种论断的精神来伪造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改良并不排斥革命，说对国界、国际法或军费开支预算等作某些“改善”的帝国主义和平，可以同革命运动并存而作这个运动的“一个扩展因素”，等等，等等。

这就是伪造马克思主义。当然，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可是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革命者不要在改良主义者面前排斥自己，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者不要拿改良主义的工作来代替自己的革命工作。欧洲正处在革命形势中。战争和物价高涨使这种革命形势日益尖锐起来。由战争转到和平，还完全不一定会消除这种革命形势，因为无论如何不能得出结论说，目前手中握着优良武器的千百万工人，一定会无条件地让自己被资产阶级“和平地解除武装”，而不去执行卡·李卜克内西的忠告，即掉转枪口对准本国资产阶级。

问题并不象和平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所提的那样：要么是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要么是拒绝改良。这是资产阶级对问题的提法。事实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进行革命斗争，万一革命不能完全成功，有时改良是它的副产品（这是整整一部世界革命史所证明了的）；要么光是空谈改良和答应改良。

目前以和平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考茨基、屠拉梯和布尔德朗的改良主义，不仅把革命问题放在一边（这已经是背叛社会主义），不仅在实践中拒绝进行任何系统的、顽强的革命工作，而且还发展到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考茨基在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上说过这句话），发展到拥护并着手同革命斗争的公开死敌休特古姆、列金、列诺得尔及托马之流等等实行统一。

这种改良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全面地利用欧洲当前的革命形势来直接鼓吹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由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为了发展争取革命的斗争，以及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也丝毫不拒绝、不放弃利用改良。

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表明，欧洲一般的事变进程，特别是改良主

义-和平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其中也包括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内两部分的斗争,将如何开展起来。

1917年1月1日于苏黎世

1924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2卷
署名:尼·列·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3卷
第177—196页

注 释

1 蒲鲁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因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约·蒲鲁东而得名。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大所有制，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他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工人依靠这些银行的帮助就能购置自己的生产资料，保证“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不懂得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竭力反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否认国家的必要性。蒲鲁东派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平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第2,708页。

2 巴枯宁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因米·亚·巴枯宁而得名。巴枯宁主义主张阶级平等，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鼓吹工人阶级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把国家看做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实现无政府状态。巴枯宁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在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中进行阴谋分裂活动，妄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72年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巴枯宁主义者的理论和策略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列宁称巴枯宁主义是“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1页）。——第2页。

3 新康德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德国产生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它是康德哲学中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原理的翻版。新康德主义者在“回到康

德那里去!”的口号下,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企图使科学与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相调和,否认“自在之物”,不承认社会的客观规律等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新康德主义者(爱·伯恩施坦、卡·施米特等人)对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行了修正。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是新康德主义的拥护者。——第3、27页。

- 4 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第3页。
- 5 欧根·柏姆-巴维克是奥地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胡说利润来自对现今和未来的财富的主观估价的差别,而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结果。他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妄图诱使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斗争。——第4页。
- 6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1905年10月成立,首领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自称为“人民自由”党,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他们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第7、201、369、383、390、409、420、470、487、527、572、609、685页。
- 7 米勒兰主义(或内阁主义,即内阁派)是一种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反动内阁而得名。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第7、645、662页。
- 8 盖得派是茹·盖得的拥护者,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其领导是盖得和拉法格。盖得派曾坚持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1901年组成为法兰西社会党。

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

鲁斯、马隆等人为首。布鲁斯、马隆等在1882年造成了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即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为一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茹·盖得和法国社会党的整个领导一起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去了。

饶勒斯派是饶勒斯的拥护者。饶勒斯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右翼改良派的首领，在九十年代同米勒兰一起组织了“独立社会党”。饶勒斯派在要求“自由批评”的伪装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他们在1902年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8,645页。

- 9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把持，他们推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策。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

英国独立工党于1893年成立。该党的首领是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等人。列宁指出，独立工党“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立工党于1914年8月13日发表直言反对战争。之后，在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党人同意代表会议通过的

- 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议。从那时起,独立党首领以和平主义词句作掩护,推行社会沙文主义。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左派党员群众的压力下,独立工党的首领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议。1921年独立党人参加了所谓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他们重新加入了第二国际。——第8、651、694、878页。
- 10 整体派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它主张社会主义不应当只依靠工人阶级,而应当不分阶级地依靠整个“受苦的人”;主张阶级和平,反对阶级斗争。这一个派别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马隆和意大利的恩利科·费里。九十年代,意大利整体派在一些问题上曾反对过采取极端机会主义立场并同反动的资产阶级合作的改良派。——第8、205页。
- 11 “革命工团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别。
- 工团主义者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工会(工团)只要组织工人总罢工而不必进行革命,就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取得生产的管理权。——第8页。
- 12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是列宁在1908年5—6月写的发言提纲,这个提纲是给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的成员、《无产者报》编辑委员杜勃洛文斯基(印诺肯齐)参加波格丹诺夫在日内瓦召开的哲学报告会用的。这个提纲是布尔什维克派同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的哲学观点公开划清界限的基础。——第10页。
-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第10、115、174页。
- 14 同上,第99页。——第10、257、272页。
- 1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75、153—154页。——第11页。
- 16 见列宁1908年2月25日给高尔基的信(《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5—432页)。——第11页。
- 17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

个新时代。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成果，对当时流行的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潮，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列宁的这一著作是在哲学领域中坚持党性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

1908年2月列宁在日内瓦开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908年5月列宁从日内瓦到伦敦，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专门研究一些日内瓦所没有的文献。列宁住在伦敦约一个月。

1908年10月该书写成，手稿按秘密地址转寄到莫斯科。该书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

列宁的姐姐叶利札罗娃在莫斯科担任了该书的校对工作，把一份校样寄给了在国外的列宁。列宁详细地审阅了校样，指出了他所发现的全部印错的地方，并做了更正。列宁的一部分更正改在正文中，一部分更正列入附在第一版的重要勘误表中。

为了使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没有禁止该书出版的借口，列宁不得不同意把该书的某些地方改得缓和一些。

列宁坚决主张迅速出版该书，他强调指出他对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负有写作的责任，而且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

该书于1909年5月出版，印数为两千册。——第12页。

- 18 信仰主义这个术语最初在列宁的手稿中是僧侣主义，后来由于书报检查的关系才改为信仰主义。列宁在1908年11月8日给叶利札罗娃的信中对这个术语做了说明（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361页）。——第13页。

- 19 指所谓的“造神说”。这是文学界中的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哲学思潮，它产生于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党内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这些知识分子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造神派”（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等）鼓吹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企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宗教。高尔基有一个时候和他们接近。《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1909年）斥责了“造神说”，并在特别决议中声明：布尔什维克派“跟诸如此类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

- 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第 13, 382, 481 页。
- 20 涅夫斯基的论文曾作为附录载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版中。——第 15 页。
- 21 指波格丹诺夫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散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马赫主义）和反动的文化艺术观点（未来主义）。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否认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企图使苏维埃文化的发展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必须利用文化遗产的卓越成就。列宁坚决反对在“无产阶级文化”组织中培植波格丹诺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20 年 12 月 1 日俄共（布）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论无产阶级文化》的信，斥责了这些有害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组织从 1922 年以后逐渐瓦解。——第 15 页。
- 2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1 页。——第 27, 97, 126 页。
- 23 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87 页）。——第 27 页。
- 24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 年至 1923 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 年 10 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 1883 年至 1917 年 10 月是卡·考茨基，从 1917 年 10 月至 1923 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 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27, 509, 601, 622, 725, 772, 848, 885, 904 页。
- 25 百科全书派是十八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所形成的派别。他们在《百科全书》（1751—1780 年）的编纂过程中团结在一起，因而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的主编是狄德罗。百科全书派坚决反对天主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不小作用。——第 30, 378 页。

- 2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73—74页。——第36页。
- 27 《新经院哲学评论》(《*Revue Neo-Scholastique*》)是1894年天主教哲学协会在卢汶(比利时)创办的一种神学哲学杂志。——第43页。
- 28 《斗争》(《*Der Kampf*》)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1907年至1938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杂志站在机会主义的中派的立场上,以左的词句掩饰它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效忠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行为。——第47页。
- 29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是美国修正主义流派的月刊,1900年至1918年在芝加哥出版。——第47页。
- 30 《科学的哲学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是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的哲学杂志,1877年至1916年在莱比锡出版(1896年以前由阿芬那留斯主编)。1902年起,该杂志改名为《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学季刊》。——第52页。
- 31 《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Studien*》)是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它主要研究心理学问题,1883年至1903年由冯特在莱比锡出版,1905年至1918年改名为《心理学研究》。——第56页。
- 32 彼特鲁什卡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人物。他很爱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至于书中讲的是什么却不去了解,他感到有趣的就是字母总会拼成字。——第57页。
- 33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第59页。
- 34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山雀》。这篇寓言说,山雀飞到海边夸口要把大海烧枯。全世界都为这件怪事议论纷纷,等着瞧海水怎样燃烧。山雀闹得满城风雨,却不曾把大海烧着,便羞愧地逃回它的巢窝。这篇寓言主要讽刺那些爱吹牛夸口的人物。——第59页。
- 35 《思想》(《*Mind*》)是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它主要研究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題,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66页。

- 36 从列宁 1908 年 12 月 19 日给叶利札罗娃的信中可以看出，最初书中是这样写的：“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设想出了’一个神。”后来为了避免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才把这句话改得和缓一些。为了这件事情，列宁在信中写道：“‘设想出了一个神’应该改成：‘设想出了……（说得和缓些）宗教的概念’，或诸如此类的说法。”（见《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369 页）——第 74 页。
- 37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小老鼠和大老鼠》。这篇寓言说，有一天小老鼠听说狮子把猫逮住了，就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大老鼠。大老鼠说：“你用不着那样高兴，还不是一场空欢喜！如果它们两个打起来，狮子一定要送命，因为再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第 83、141、537 页。
- 3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4 页。——第 84 页。
-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3、213 页。——第 84 页。
- 40 见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处世之道》。诗中刻画了一个贼喊捉贼的老骗子。这个老骗子宣扬一种要用自己的丑行去攻击对手的处世哲学。例如，如果自己是个叛徒就攻击对手没有信念，如果自己是个奴仆就攻击对手是个走狗，这样就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没有这些丑行。——第 85 页。
- 41 《系统哲学文库》（*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是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是《哲学文库》（见注 81）的一部分，1895 年至 1931 年在柏林单独印行。该杂志用德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刊登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文章。——第 92 页。
- 42 《康德研究》（*Kantstudien*）是德国的哲学杂志，唯心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的刊物，1897 年至 1937 年出版。还有其他唯心主义派别的代表给这个杂志撰稿。——第 92 页。
- 43 《自然界》（*Nature*）是自然科学周刊，英国自然科学家的刊物，1869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92 页。
- 44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准备付印时，叶利札罗娃把“更为正直的笔头上的敌人”改为“较有原则的笔头上的敌人”。列宁反对这样的改法（参看《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389 页）。——第 95 页。

- 45 伏罗希洛夫 是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中的一个艺术形象，假装博学的书呆子的典型。——第 97 页。
- 4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1—222 页。——第 98 页。
- 47 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第 101 页。
- 4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86 页。——第 105、210 页。
- 49 同上，第 386—387 页。——第 108 页。
- 50 奥尔托多克斯 是柳波芙·伊萨柯夫娜·阿克雪里罗得的笔名。她在 1892 年参加劳动解放社，1903 年加入孟什维克。曾对经济主义、新康德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做过批判，但又追随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主义观点，重复他在哲学上的错误。——第 109 页。
- 51 欧根·狄慈根 是约瑟夫·狄慈根的儿子。欧·狄慈根把他父亲哲学著作中的某些弱点绝对化，歪曲他父亲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把他父亲的学说称为“自然一元论”、“狄慈根主义”等，妄图以此“补充”马克思主义，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 118 页。
- 52 别尔托夫 是普列汉诺夫的笔名。普列汉诺夫在 1895 年出版《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时就署的是这个笔名。——第 120 页。
- 5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25—126 页。——第 133 页。
- 54 同上，第 130 页。——第 134 页。
- 55 见马克思 1868 年 12 月 5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35、252 页。
- 56 指下列著作：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 年）；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和《论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 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19 页，第 4 卷第 210—254 页，第 3 卷第 379—403 页）。——第 137 页。
- 57 参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

- 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第4卷第221页，第3卷第387页）。——第137页。
- 58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家西尼耳的理论（见《资本论》第1卷第7章第3节）。——第138页。
- 59 哥·恩·舒尔兹 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的信徒。他企图使古代怀疑论现代化。由于他以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家埃奈西德穆作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的书名，所以在哲学史上被称为舒尔兹-埃奈西德穆。——第140页。
- 60 《哲学评论》（*Revue de Philosophie*）是法国唯心主义的杂志，1900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50页。
- 61 康康舞 是法国游艺场中的一种下流舞蹈。——第154页。
- 6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62、74—75页。——第157页。
- 6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2页。——第157页。
- 64 《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是唯心主义实证论派别的杂志，由威·奥斯特瓦尔德主编，1902年至1921年在莱比锡出版。——第166页。
- 65 契玛拉 是希腊神话中的狮头羊身蛇尾的喷火怪兽。——第168页。
- 6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82页。——第174页。
- 6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页。——第177页。
- 68 《自然科学》（*The Natural Science*）是评论性的月刊，1892年至1899年在伦敦出版。——第185页。
- 69 《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是美国唯心主义哲学杂志，1892年起在波士顿出版。——第185页。
- 70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中原来排印的是“引起的不仅是微笑”，而不是：“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列宁审阅校样后，曾请叶利札罗娃改正这个地方或者在勘误表中指明：“‘引起的不仅是微笑’

应改为：‘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列宁的更正载于该书第一版的重要勘误表中。——第 189 页。

7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53—154 页。——第 190 页。

72 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机会主义流派。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即臭名昭彰的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们鼓吹阶级合作，企图把无产阶级反对其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溶化在普遍的人类博爱之中，主张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所谓全面的党，诬蔑工人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要由“有教养的”大小资产者来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批判了这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把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称为“反革命空谈家”。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72—190 页）。——第 205 页。

73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 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 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 年至 1905 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 1905 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九十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撰稿。——第 206 页。

7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6 页。——第 208、245、584 页。

75 指恩格斯的下列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和《论历史唯物主义》（1892 年），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0—254 页，第 3 卷第 379—403 页）。——第 208 页。

7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9 页。——第 209 页。

77 《内在论哲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mmanente Philosophie*）是德国的哲学杂志，它鼓吹唯我论这一反动透顶的主观唯心主义，1895 年

- 至 1900 年在柏林出版。——第 214 页。
- 78 指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虚伪声明。斯托雷平否认在邮政机关设有“信件检查室”秘密检查沙皇政府认为形迹可疑分子的信件。——第 224 页。
- 79 诺兹德烈夫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地主，喜欢争吵，招摇撞骗。——第 228、493 页。
- 80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54—356 页）。——第 234、376 页。
- 81 《哲学文库》（《Archiv für Philosophie》）是德国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杂志，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刊物，1895 年至 1931 年在柏林出版。这个杂志同时出两种本子，一种是关于哲学史的，另一种是关于一般哲学问题的。——第 242 页。
- 8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4 页。——第 257 页。
- 83 《心理学年鉴》（《Année Psychologique》）是一批法国唯心主义心理学家的刊物，1894 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264 页。
- 84 《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总评》（《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pures et appliquées》）是法国杂志，1890 年至 1940 年在巴黎出版。——第 266 页。
- 85 火星派是《火星报》的拥护者。
-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 年由列宁创办。《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由于警察的迫害，在俄国无法出版革命的报纸，列宁早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就周密地考虑了在国外出版报纸的计划。列宁在 1900 年 1 月流放结束后立刻着手实现这个计划。
- 《火星报》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 24 日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在慕尼黑出版，自 1902 年 4 月起在伦敦出版，自 1903 年春天起在日内瓦出版。

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春天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的文章，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评论。

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等）建立了列宁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委员会。

火星派组织是在列宁培养出来的职业革命家（尼·艾·巴乌曼、伊·瓦·巴布什金、谢·伊·古谢夫、米·伊·加里宁等）的直接领导下产生和进行工作的。

《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倡议和在他的直接的参与下，制定了党纲草案，准备了在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俄国的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拥护《火星报》，赞同它的策略、纲领和组织计划，承认它是自己的领导机关。代表大会在一个专门的决议中指出《火星报》在建党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并宣布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编辑部。马尔托夫不顾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而拒绝参加编辑部，因而《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编辑出版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克主义立场上去，他要求让已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原来的全体孟什维克编辑参加《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加强党中央委员会里的阵地，并从这个阵地上打击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出版的。1903年11月26日，普列汉诺夫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独自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补选为《火星报》编辑。从第52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从此时起，党内就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第276、503、557、698页。

- 86 指经济派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阿基莫夫反对《火星报》提出的党纲，其中一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一词在党纲中不是主语，而是补语。——第 276 页。
- 87 《哲学和心理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сихологии》)是俄国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1889年至1918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从1894年起由莫斯科心理学协会出版，主编是洛帕廷。“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曾参加该杂志的工作，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该杂志刊载过波格丹诺夫和其他马赫主义者的哲学论文。——第 306 页。
- 88 俄罗斯人民同盟是沙皇政府为了镇压革命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建立的极端反动的君主派黑帮组织。同盟是由反动地主、富农、大房产生、商人、警官、神甫、无业游民和刑事犯罪分子组成的。
- 同盟实际上是以农奴制时代的旧口号“正教、专制、民族”为自己的反动纲领。同盟镇压革命的主要方法是蹂躏和杀害，毒打革命工人和学生，驱散和扫射集会的群众，组织对犹太人的蹂躏，疯狂地迫害非俄罗斯民族。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盟被取缔。——第 306 页。
- 89 《俄国财富》(《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1876年在彼得堡创办的月刊，1918年中停刊，从九十年代初期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机关刊物，由克利文柯和米海洛夫斯基编辑。该杂志主张和沙皇政府妥协，鼓吹放弃反对沙皇政府的任何革命斗争，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1906年起该杂志成为“人民社会党”这一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第 320、471、565 页。
- 90 E 价值是阿芬那留斯的用语。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第一卷第十五页中写道：“任何能够加以描述的价值，如果被假定为我们周围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简单地称之为 R。”“任何能够加以描述的价值，如果被看作别人的陈述的内容，我们就简单地称它为 E。”E 是德文 Erfahrung(经验)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是德文 Erkenntnis(认识)一词的第一个字母。——第 322 页。

- 91 见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第322、431页。
- 92 这句话是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根据歌德的四行诗改写的。列宁引自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见《屠格涅夫全集》1930年俄文版第9卷第183页）。——第323页。
- 93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5页）。——第328页。
- 9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5页。
- 95 马尔萨斯主义是一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动的人口理论，因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而得名。马尔萨斯断言，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是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规律。他认为贫困、饥馑、瘟疫、繁重劳动、战争等是减少人口、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主张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人口繁殖。他把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和一切社会灾难都归于他虚构的这个自然规律，以便使劳动人民脱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
-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揭穿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科学性质和反动实质，证明绝对的人口规律是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贫困的原因是受剥削。——第336页。
- 96 巴札罗夫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人物。——第339页。
- 97 这封信的日期应为1843年10月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446页。——第343页。
- 98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该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双刊号。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343、577页。
- 9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44页。
- 10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44页。

- 101 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2—395页)。——第344页。
- 102 在正文中提到的那几年里恩格斯完成了下列著作：《反杜林论》(187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第344页。
- 103 参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第346页。
- 104 《国外新闻报》(《Заграничная Газета》)是日内瓦的一批俄国侨民于1908年3月16日至4月13日用俄文出版的周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以及其他召回派分子。——第351页。
- 105 《教育》(《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文学、通俗科学和社会政治的综合性月刊，1892年至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1902年至1908年，马克思主义者曾为该杂志撰稿。——第351页。
- 106 语出圣经《马可福音》。犹太是出卖耶稣的叛徒，用和耶稣接吻作为告密的暗号。——第356页。
- 107 博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是果戈里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两个地主。他们不但相貌近似，而且特点也颇相同，终日无所事事，喜欢无聊争论，到处打听消息，传播新闻。有一天，他们探听到来了一位所谓“钦差大臣”后，都跑去报告市长。一个说他听到关于钦差大臣的情况时，受到上天的启示，不禁喊出了一声“唉！”，另一个争着说是他先喊出“唉！”的，彼此争论不休。——第358页。
- 108 指1908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另一本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第362页。
- 109 《第四章第一节的补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的手稿，是列宁在1909年3月下半月寄给叶利札罗娃的，当时书已付印。列宁在1909年3月23日或24日写信给叶利札罗娃说：“寄上补充一则。不过用不着因它而耽误出版。要是时间来得及，可用另一种字

体，如用小号字印在卷末，放在结论后面。我认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赫主义者对照一下是极为重要的。”（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394—395页）——第366页。

- 110 《言论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906年2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来曾以别的名称出版，到1918年8月停刊。——第369、481、527页。

- 111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见《涅克拉索夫作品集》1950年俄文版第241页)。——第370页。

- 112 劳动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了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出让的私有土地规定给予报酬。由地方农民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第372、390、419、424、429、499、686页。

- 113 民意党是民粹派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1879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该党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1881年3月1日〔公历13日〕）以后不久，民意党就被沙皇政府粉碎了。在此以后，民粹派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宣传同沙皇专制制度调和和妥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了富农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第372、422页。

- 114 参看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第375页。
- 115 见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7—595页)。——第376页。
- 116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376页。
- 117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用来代替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因为它摒弃了拉萨尔主义的教条。但是,爱尔福特纲领还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1891年6月恩格斯对这个纲领的草案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第377页。
- 118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1页)。——第377页。
- 119 《路标》是立宪民主党人写的文集,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中有尼·别尔嘉也夫、谢·布尔加柯夫、彼·司徒卢威、米·格尔申臧和其他反革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的文章。路标派在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中,企图贬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刺刀和牢狱”拯救了资产阶级。文集号召知识分子去为专制政府服务。列宁认为《路标》文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的纲领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不相上下,并且称该文集是“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一整套对民主派的反动诬蔑”。——第383、400、470页。

- 120 约翰·莫斯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第383、396、606页。
- 121 《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创办的秘密报纸，1906年9月3日至1909年12月11日由列宁编辑出版，共出了五十号。《无产者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和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但有时也以莫斯科专区、皮尔姆、库尔斯克、喀山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无产者报》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最初二十号是在芬兰出版的。1908年2月26日至12月14日该报在日内瓦出版，从1909年1月21日起在巴黎出版。
- 该报发表了列宁的一百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1910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的隐藏的代理人 and 帮凶调和派设法通过了关于停办《无产者报》的决定。——第385页。
- 122 布里根杜马是1905年沙皇政府答应成立的咨议性“代议机关”。建立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和杜马选举条例是由内务大臣布里根主持的委员会拟订，并于1905年8月6日(公历19日)颁布的。布尔什维克宣布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风刮走了。”(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3页)——第386、503、639页。
- 123 在俄国革命群众斗争的压力下，1905年10月17日(公历30日)沙皇被迫颁布诏书，许诺给公民自由和成立“立法”杜马。这是沙皇政府所玩弄的政治骗局，企图以此赢得时间分裂革命力量，破坏罢工和镇压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彻底揭露了这一阴谋，号召无产阶级准备武装起义，为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斗争。——第386、470页。
- 124 1907年6月3日(公历16日)政变是一次反动的政变，在这次政变中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修改了杜马的选举法。新的选举法大大增加了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名额，把人数本来就不

多的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名额减少了一大半。新选举法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大多数居民的选举权，把波兰和高加索的代表名额减少了一半。根据这个选举法选出的并在1907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杜马，从代表成分来看是黑帮-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六三政变开始了以“六三政制”著称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第386、469、527页。

- 125 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 是代表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政党，于1905年沙皇的10月17日（公历30日）诏书颁布后成立。十月党人在口头上承认10月17日诏书（在这个诏书中，被革命吓坏了的沙皇答应给人民公民权），事实上并不想对沙皇制度实行什么限制，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该党的首领是大工业家亚·古契柯夫和大领地所有者米·罗格柯。从1906年秋天起，十月党成了执政党。——第387、409、505、527页。
- 126 1905年1月9日（公历22日）暗探局的奸细加邦神甫怀着挑衅的目的组织彼得堡工人的和平队伍到冬宫去向沙皇呈递请愿书。沙皇命令军队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沙皇政府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工人的抗议风暴。1月9日是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起点。——第388、663页。
- 127 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 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集团，1890年成立。集团的基本核心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和青年文学家（集团由此而得名）。集团提出的纲领，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任何议会活动。恩格斯把“青年派”称为玩弄“革命空谈”的英雄，说这些人是企图“通过内讧和阴谋来瓦解党”。1891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青年派被开除出党。——第396页。
- 128 参看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第398页。
- 129 召回主义 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间产生的机会主义派别，其代表人物是波格丹诺夫、波克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布勃诺夫等人。这个派别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活动。召回主义直接继承了

1907年布尔什维克内部以波格丹诺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思潮——抵制主义。1908年，召回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集团反对列宁。召回派坚决拒绝参加杜马、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群众组织，极力主张仅仅进行秘密活动。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实际上是执行取消派的路线：他们企图使党不能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使党脱离非党群众，遭受反动派的打击。列宁把召回派叫做“新式的取消派”，“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第401页。

- 130 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即资产阶级中最坚决的代表，他们主张必须消灭专制政体和封建主义。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不同，他们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最终走上了同君主派勾结的道路。

列宁称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山岳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后，列宁经常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第404页。

- 131 《我们的曙光》（《Наша Заря》）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年至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该杂志被封闭以后，从1915年1月起便开始出版《我们的事业》杂志。——第405、451、460、493、651、680页。

- 132 取消派出现在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当时孟什维克背弃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秘密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参看列宁《几个争论问题》（本卷第457—480页）。——第406、451、481、486、507、617、687、826页。

- 133 《生活事业》（《Дело Жизни》）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杂志，1911年1—10月在彼得堡出版。

《复兴》（《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杂志，1908年

12月至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第407、465页。

134 指1908年12月21—27日(公历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十六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有五个布尔什维克,三个孟什维克,五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三个崩得分子。列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他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且发表了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关于组织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演说。布尔什维克在会上对党内的两种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进行了斗争。根据列宁的建议,代表会议谴责了取消主义,号召所有党组织同取消党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代表会议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5—260页)。——第407、457、493页。

135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至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第407页。

136 1906年11月9日(公历22日)颁布的《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规定的补充》的法令和1910年6月14日(公历27日)《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的若干规定的修改和补充》的法律,确定了农民退出村社和份地归他们私有的规章。——第409页。

137 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中一个傻瓜的名字。——第411页。

138 护党派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脱离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并反对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小团体。

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在1909年8月重新出版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普列汉诺夫和他的集团一方面仍旧保持孟什维克的立场,另一方面也主张保存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并力求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

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要尽力促使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取消派分离,在保卫思想性和党性的基础上同护党派接近,建立一个护党分子的统

一联盟，联盟内部的“分歧不应妨碍”为保卫党和反对取消派而进行“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和“共同的斗争”。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建议，同他订立了暂时的联盟。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了地方的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工人报》。普列汉诺夫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

列宁提出的同拥有一部分工人群众的普列汉诺夫派结成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助于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的工人组织中更广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把取消派排挤出去。列宁的主张得到了斯大林的全力支持。

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借口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者和解。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并对布尔什维克大肆诽谤。——第412、460、488页。

139 《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1910年3月19日至1911年5月12日在巴黎出版，总共出过三期。——第412页。

140 斯托雷平工党是工人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称呼，因为他们迁就斯托雷平制度，同它妥协，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以求得沙皇政府允许所谓“工人的”政党合法存在。——第413、475页。

141 比朗是俄国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统治时期(1730—1740年)的宠臣，出身于日耳曼贵族，他利用权势巧取豪夺，专横暴戾，历史上有“比朗暴政时期”之称。

阿拉克切也夫是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陆军大臣，以实行专横残暴的军阀统治著称。——第416页。

142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者，因1825年12月14日发动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的起义而得名。

十二月党人成立了三个秘密团体：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北方协会、巴·伊·彼斯节里领导的南方协会和安·伊·波利索夫和彼·伊·波利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些团体都有自己的

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统治的纲领。由于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局限性，他们害怕广大人民起义，企图通过军事政变实现自己的纲领。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数百名起义者被逮捕，最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彼斯节里等人被处绞刑。列宁指出：“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见本卷第 422 页）——第 416、610 页。

143 引自亚·伊·赫尔岑《终结和开始》（见《赫尔岑选集》1937 年俄文版第 349 页）。——第 416 页。

144 指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 1848 年 6 月 23—26 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第 417、438 页。

145 引自亚·伊·赫尔岑《致老友书》（第四封信和第二封信）（见《赫尔岑选集》1937 年俄文版第 385、379 页）。——第 418 页。

146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 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它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丁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295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 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反革命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社会革命党人不支持农民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

1917 年 12 月，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 418、573、627、686、736 页。

- 147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1905年建立的革命的民主组织。1905年8月和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协会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协会的纲领和策略。农民协会要求政治自由和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对第一届国家杜马采取了抵制的策略。协会的土地纲领包含有废除土地私有制,把寺院、教堂、皇室、阁部和国家的土地无代价地交给农民的要求。协会在自己的政策中曾表现出不彻底性和动摇性。协会一方面要求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同时又同意给地主一部分报酬。农民协会一开始活动就遭到了警察的迫害。全俄农民协会于1906年底解散。——第419、424页。
- 148 《钟声》(«Колокол»)是政治性杂志,是在“我向人们召唤!”的口号下出版的。该杂志从1857年至1865年4月在伦敦出版,从1865年至1868年12月在日内瓦出版,每月出一期或两期,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并由赫尔岑创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刊印。1868年该杂志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第419页。
- 149 《北极星》是文学政治文集,头三本文集由亚·伊·赫尔岑主编,后几本由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1855年至1862年在伦敦由自由俄国印刷所刊印。最后一本于1868年在日内瓦刊印,总共出了八本。——第419页。
- 150 指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这篇文章的译稿与列宁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涅瓦明星报》上。——第423页。
- 151 《人民报》(«Le Peuple»)是比利时工人党(改良主义的党)的中央机关报,1884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第423页。
- 152 亨利·乔治是十九世纪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错误地认为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是人们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的唯一原因,鼓吹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其办法是对私有土地征收单一的累进税,妄图以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亨利·乔治的观点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尖锐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1—19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260页,《列宁全集》第13卷第379页)。——第427页。

153 指的是：(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154页)；(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5节；(3)《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9章第10节。——第427页。

154 指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信中对巴黎公社做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第430页。

155 《启蒙》(*«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起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个杂志是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的，它代替了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列宁曾在外国领导《启蒙》杂志，该杂志曾发表列宁的下列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选举的总结》、《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等。

1912年至1913年斯大林住在彼得堡时，直接参加了杂志的工作。《启蒙》杂志发表了斯大林的论文《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启蒙》于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该杂志复刊，但只出了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两篇著作：《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第451、467、507页。

156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第453、588页。

157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是斯大林遵照列宁的指示发起创办的，于1912年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

《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它是依靠工人的捐款出版的。它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家。《真理报》仅仅在一年之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篇工人通讯。《真理报》的发行量平均每日四万份，个别月份平均每日达六万份。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派。斯大林说，“1912年的《真理报》为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给报纸写文章，给

编辑部指示。斯大林在1912年9月逃出纳雷姆流放地以后参加了《真理报》的领导工作。1913年1—2月，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该报编辑。1913年2月，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按照列宁的指示改组了《真理报》编辑部。

《真理报》在创刊后的两年多的时间内，被沙皇政府查封过八次，但是每次被查封后又改用别的名称出版，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

在1914年7月2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真理报》被封闭。二月革命以后，从1917年3月18日起《真理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扩大会议决定斯大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在1917年4月回到俄国后直接领导了《真理报》。七月事变后，由于列宁转入秘密状态，斯大林担任了报纸的责任编辑。1917年7—10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四次更换名称继续出版，用过的名称有：《〈真理〉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自11月9日起又用原名《真理报》出版。——第457、487、497、527、528、651、700页。

158 《光线报》(《Лучи》)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日报，1912年9月至1913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列宁说，该报是“靠资产阶级阔朋友的钱”维持的。从1913年7月起，代替《光线报》的先是《现代生活报》，后来是《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第457、495、700页。

159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土地地方公有问题的孟什维克土地纲领。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和《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对这个纲领做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95—315页，第13卷第234—342页)。——第460页。

160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主编的不定期的机关刊物，1905年3月至1912年4月断断续续地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六期。1916年《日志》曾在彼得堡复刊，只出了一期。——第460页。

- 161 前进派(前进集团)是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和马赫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反党集团,在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于1909年12月成立的。1912年,前进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结成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党联盟,即由托洛茨基组织起来的八月联盟。
- 由于得不到工人支持,前进集团实际上在1913年已经瓦解了。它的彻底瓦解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第462、490页。
- 162 引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就党内状况问题所通过的关于谴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9—300页)。——第462页。
- 163 《涅瓦呼声报》(«Невский Голоз»)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公开报纸,1912年5—8月在彼得堡出版。——第466页。
- 164 安思是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的笔名。——第466、497页。
- 165 《现代生活报》(«Живая Жизнь»)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1913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第467页。
- 166 《新工人报》(«Нов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日报,1913年8月在彼得堡创刊。1914年1—5月起代替该报出版的是《北方工人报》,同年5—7月是《我们的工人报》。列宁常常把这个报纸称为“新取消派报”。——第467、486、562、566页。
- 167 进步党人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进步党人就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列宁全集》第18卷第496页)。进步党人的首领是莫斯科的厂主列布申斯基和柯诺瓦洛夫等。1912年11月进步党人形成了独立的政党。——第470、527、609页。
- 168 《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双周刊,1902年至1905年由彼·别·司徒卢威在国外编辑出版。从1904年1月起成为自由君主派的解放社的机关刊物。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

心。——第 470 页。

- 169 指在莫斯科武装起义炽烈时沙皇政府于 1905 年 12 月 11 日（公历 24 日）公布的关于召开“立法的”国家杜马的法令。根据 1905 年 12 月 11 日法令选举的第一届杜马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第 471 页。
- 170 1912 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时，沙俄主教公会总监、反动分子萨勃列尔指示神甫们积极参加选举，以保证代表成分有利于沙皇政府。列宁把那些神甫叫做“萨勃列尔派的神甫们”。——第 471 页。
- 171 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歪曲。彼·别·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工人运动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揭露了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和后来采取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形式的修正主义的萌芽；他指出司徒卢威主义必然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司徒卢威是俄国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掩护，坚持社会沙文主义，并为掠夺战争、兼并和民族压迫作辩护，他的虚假的借口就是“我国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见本卷第 628 页）。——第 474、619、680 页。
- 172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 1897 年，它所联合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 年 3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驳斥了崩得在组织上的民族主义以后，崩得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1906 年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一直支持孟什维克，不断反对布尔什维克。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崩得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 年崩得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同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敌人站在一边。在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崩得分子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当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内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日益明显时，崩得声明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根据一般原则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加入党的某些崩得分子是两面派，其入党的目的是要从内部破坏党；后来他们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第475、507、614、704页。

- 173 指1912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组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联盟的组织者是托洛茨基。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崩得的代表，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及侨居国外的各取消派团体即《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和前进集团的代表等等。从俄国国内派遣代表的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取消派的“发起小组”以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的编辑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还有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斯皮尔卡”（“联盟”）国外委员会的代表。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侨居国外的与俄国工人阶级毫无联系的人。

代表会议在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所有问题上都通过了取消派的反党决议，并且反对秘密党的存在。

由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八月联盟，在代表会议一开始就闹得分崩离析。取消派没有能够选出中央，只是组成了组织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的打击下，反党八月联盟很快就彻底瓦解了。——第476、495、561、703页。

- 174 指阿·马·高尔基就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根据费·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反动小说《魔鬼》改编的戏而在报纸上发表的抗议。资产阶级报纸则袒护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这出戏。——第481页。

- 175 《俄国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月刊，1880年至1918年中在莫斯科出版。1905年革命以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由彼·别·司徒卢威主编。——第483、517页。

- 176 《斗争》（《Борьба》）是托洛茨基办的杂志，1914年2—7月在彼得堡出

版。托洛茨基打着“非派别性”的假招牌，在这个杂志上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第485、559页。

- 17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出席大会的有代表五十七个地方党组织的一百一十二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以及二十二名具有发言权的代表。此外，出席大会的还有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崩得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工党各有三名代表，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和芬兰工人党各有一名代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也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四十六人，孟什维克代表六十二人。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土地问题，对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组织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在大会上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对国家杜马选举的策略问题以及武装起义等问题做了报告和发言。

孟什维克在大会上占了多数，虽然是微弱的多数，但也决定了大会决议的性质，在许多问题上大会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土地纲领以及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等等)。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大会承认以下几个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部分：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工党，并且预先决定了关于崩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

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由三个布尔什维克和七个孟什维克组成，而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成员则全是孟什维克。

对代表大会的工作的分析，见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6—351页)和斯大林的《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著者第一卷序言》(《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1—253页和第7—10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5月13日—6月1日在伦敦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共三百三十六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一百零五名，孟什维克代表九十七名，崩得

代表五十七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四十四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二十九名，“无派别”代表四名。由于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支持布尔什维克，所以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占了稳定的多数。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1)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组织；(3)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4)国家杜马；(5)“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6)工会和党；(7)游击活动；(8)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9)组织问题；(10)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军国主义)；(11)军队中的工作；(12)其他。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是这次代表大会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代表大会在一切原则性问题上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五人，孟什维克四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二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一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有布尔什维克十人，孟什维克七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三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二人。

代表大会以布尔什维主义对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的胜利而结束。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见列宁的《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6—496页)和斯大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49—75页)。——第487页。

178 指1912年1月18—30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这次代表会议有二十多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所以从实质上来看是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列宁领导了这次代表会议，他做了一系列报告，并就会议议程上各个最重要的问题拟定了决议草案。

会议决定将孟什维克取消派驱逐出党，永远结束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一个党内的形式上的统一。布尔什维克从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独立政党。布拉格代表会议创立了新型的政党，列宁主义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第487、700页。

179 指前进派分裂后的两个集团，一个以沃依诺夫(即卢那察尔斯基)为首，一个以阿列克辛斯基为首。——第488页。

180 所谓布尔什维克护党派是人数极少的一个调和派集团。他们为了表示

与站在列宁方面的布尔什维克相对抗，故自称为布尔什维克护党派。他们同取消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等一起激烈反对列宁，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第 488 页。

- 181 犹大什克·采洛夫廖夫 是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小说《果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一个极端自私、虚伪、残酷、贪婪、愚蠢的地主。——第 494 页。
- 182 《前进报》(«Vorwärts»)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 年 10 月在莱比锡出版。恩格斯曾在该报上对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经常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进报》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该报在柏林出版到 1933 年。——第 496、647、848 页。
- 183 七人团(齐赫泽党团)是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七个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参看本卷第 688 页)。——第 496、688、896 页。
- 184 六人团(工人选民团六人小组)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六名代表即阿·叶·巴达也夫、马·康·穆拉诺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费·尼·萨莫依洛夫、尼·罗·沙果夫、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个奸细)，他们是由工人选民团选举参加国家杜马的。——第 498 页。
- 185 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为了保密起见，会议叫做“夏季会议”或“八月会议”)，于 1913 年 9 月 23 日—10 月 1 日(公历 10 月 6—14 日)在波罗宁村召开，这年夏天，列宁就住在这里。

参加会议的有下列组织的二十二个代表：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启蒙》杂志编辑部、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团以及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科斯特罗马、基辅和乌拉尔的组。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列席参加了会议。中央委员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梁当时在流放地，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1)各地的报告，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民族问题；(3)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社

马工作；(4)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状况；(5)组织问题和党代表大会；(6)关于罢工运动；(7)关于合法社团中的工作；(8)关于民粹派；(9)关于党的刊物；(10)关于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最初两天就国家杜马的实际工作问题专门召开了杜马代表的会议。

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列宁致开幕词，并做了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民族问题报告、维也纳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报告；此外，列宁几乎就议程上的所有问题都发了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拟定了决议草案。

在地方的各个报告中都指出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会议认为必须统一全俄党的工作，以便领导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动。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总结了自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在关于即将在191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提议尽可能多从秘密的和合法的组织中派遣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且指出应在召开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党代表大会。会议由列宁致闭幕词。

波罗宁会议的记录没有找到。决议印成单行本发表，标题是：《1913年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的通报和决议》，由中央委员会在国外出版。为了保密起见，某些决议没有全文发表，例如关于罢工运动的决议第6条和关于党的刊物的决议第1—5条都省略了。决议全文是用秘密的胶印版发表的。——第498页。

186 1906年波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波兰社会党分裂成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波兰社会党右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没有完全摒弃民族主义，但放弃了波兰社会党的许多民族主义的要求和恐怖的斗争手段。在策略问题上，同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相近，并且和他们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左派的大多数人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并且靠近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18年12月他们共同组成了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右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支持德奥帝国主义。后来波兰社会党右派又采用了波兰社会党这个名

称。——第 501, 537 页。

- 18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03 年 7 月 30 日—8 月 23 日举行。代表大会最初在布鲁塞尔开了十三次会。后来因受警察迫害而移至伦敦举行。总共开了三十七次会。列入代表大会日程的共有二十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纲、党的组织(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二十六个组织的四十三名代表,他们有五十一票表决权(其中八个代表各有二票),另外有十四名代表有发言权。

代表大会由列宁的《火星报》筹备。列宁为筹备代表大会做了巨大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见《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195 页)。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了在俄国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巨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革命纲领。列宁在提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任务的同时,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大会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建党的组织原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和他的战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根本原理: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有组织的部队,它是由革命理论、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以及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起来的。唯有这样高度觉悟而有组织的、团结而集中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党,才能够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夺取政权。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评,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55—56 页。——第 506, 554, 727 页。

- 188 “十二个民族的侵犯”是形容 1812 年拿破仑第一对俄国的侵略。当时

拿破仑侵略军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法国人只占三分之一。此处用这句话形容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猛烈攻击。——第 507 页。

189 关于对伦纳和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思想的批判，见列宁《论“民族文化”自治》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504—507 页，第 20 卷第 1—35 页）以及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89—358 页）。——第 510、684、719 页。

190 《社会民主党评论》（《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是在罗·卢森堡的密切参加下，由波兰社会民主党创办的杂志。1902 年至 1904 年以及 1908 年至 1910 年在克拉科夫出版。——第 510 页。

191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25 章。——第 511 页。

192 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地主的反革命组织，1906 年 5 月成立。该联合会政府对的政策有很大影响。在第三届国家杜马时期，有很多会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第 527、610 页。

193 《道路报》（《Шляхи》）是民族主义的乌克兰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1913 年 4 月至 1914 年 3 月在里沃夫出版。——第 528 页。

194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 1868 年至 1917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最初是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 1876 年起成为反动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喉舌，不仅反对革命运动，而且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运动。从 1905 年起该报是黑帮分子的机关报之一。列宁把《新时报》叫做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二月革命以后，该报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 年 11 月 8 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

《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黑帮的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 年 7 月至 1917 年 2 月在彼得堡出版。——第 530 页。

195 语出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名叫梅穆列佐夫的警察，他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后来“只捉不放”这句话成了形容沙皇警察专横的成语。——第 530 页。

- 196 《基辅思想报》(«Киев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日报,1906年12月至1918年12月在基辅出版。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第531页。
- 197 引自亚·谢·格利波也多夫的喜剧《聪明误》(见《格利波也多夫全集》1945年俄文版第39页)。——第534页。
- 198 指《前进报》(«Напрёд»)。该报是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主义中央机关报,1892年起在克拉科夫出版。——第536页。
- 199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沙皇政府由于农民反对农奴制剥削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斗争而被迫实行的。1861年2月19日(公历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关于农民摆脱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改革法令,同时签署了俄国废除农奴制的特别诏书。列宁在谈到这次农民改革的基本特点时指出:“臭名昭彰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海辱。”(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2—103页)——第544、909页。
- 200 指1863年1月中央民族委员会(1863年5月改称国民政府)领导的沙皇俄国所属的波兰地区的解放起义。1863—1864年的起义是由于波兰王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目标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贵族阶级分子组成的民族委员会在起义之初,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土地问题和民主问题的要求。俄国革命民主派深切同情起义者。同加·尼·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联系的秘密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社员,努力给予起义者各种帮助。土地和自由社的中央委员会散发了《告俄国官兵书》,这个呼吁书流传在被派去镇压起义者的军队之中。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钟声》上发表了许多声援波兰人民斗争的文章,并给起义者以物质援助。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农民群众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到1863年秋天,起义基本上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个别起义队伍的斗争继续到1864年底。——第544页。

- 201 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由列宁起草，经有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案载于《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6—428页。——第546、727页。
- 20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7页。
- 20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58、286页。——第547页。
- 204 即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6—135页）。——第547页。
- 20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6—17页。——第548页。
- 206 同上，第224页。——第548页。
- 20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9—360页。——第548页。
- 208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549页。
- 20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7页。——第549页。
- 210 芬尼亚运动是芬尼亚社社员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运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出现的，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的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脱离了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运动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1867年2—3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该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走上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第549页。
- 2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第549、722页。
- 21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页。——第549页。

- 2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8页。——第549页。
- 214 见恩格斯1868年11月20日、1869年10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69年8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50页。
- 215 托利党是英国大土地贵族和大金融贵族的政党。托利党于十七世纪成立后,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守和腐败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第551、895页。
- 216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年秋由马克思在伦敦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本选集第3卷第809页)。——第551页。
- 217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第551页。
- 21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51页。
- 219 列宁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该文曾载于1902年《曙光》杂志第4期。
- 《曙光》(*Заря*)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1901年至1902年由《火星报》编辑部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四期(三册),第1期在1901年4月出版,第2—3期合刊在1901年12月出版,第4期在1902年8月出版。《曙光》杂志曾刊载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的前四章、《内政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第555页。
- 220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这篇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有一天,他们一同出去游玩,途中隐士困倦酣睡,熊为了赶走隐士鼻子上

的一只苍蝇，用一块大石头把朋友的脑袋砸成两半。因此，人们把帮倒忙叫做熊的效劳。——第 559 页。

- 221 这个用语出自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见《萨尔梯柯夫-谢德林选集》1947 年俄文版第 344—350 页)。——第 560 页。

- 222 《钟声》(《Дзвон》)是孟什维克的合法的民族主义月刊，1913 年 1 月至 1914 年中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第 560 页。

- 223 列宁引用了描述克里木战争时期 1855 年 8 月 4 日黑河战役的塞瓦斯托波尔士兵歌曲的歌词。歌词的作者是列·尼·托尔斯泰(见《托尔斯泰全集》1935 年俄文版第 4 卷第 307—308 页)。——第 563 页。

- 224 人民社会党是 1906 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该党提出了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人民社会党人拒绝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性的原则，主张以赎买的办法征收地主的土地。列宁称人民社会党人是“市侩机会主义者”、“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的首领是阿·瓦·彼舍霍诺夫、维·亚·米雅柯金、尼·费·安年斯基等人。

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社会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入反革命阵营。——第 565 页。

- 225 《时报》(《Цайм》)是崩得的机关报，1912 年 12 月至 1914 年 6 月在彼得堡每周出版。——第 567 页。

- 226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列宁根据他起草的关于战争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改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宣言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彻底揭露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尖锐地谴责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社会党领袖的叛变行为，并且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当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斗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曾作为阐明党对战争的态度正式文件，寄给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二国际的执行机构)和英、德、法、瑞典、瑞士等国的一些社会主义报纸。1914 年 11 月 13 日，瑞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哨兵报》摘要刊载了这篇宣言。

根据列宁的指示，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寄给了中立国家的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在俄国，宣言全文刊载于1915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呼声报》创刊号。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很多大工业中心散发的传单里都反映了宣言里所提的党的最重要的论点和口号。——第568页。

227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也是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之一，1897年至1933年在柏林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571、651、692页。

228 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有三十七位代表。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有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李维诺夫等人。

大会的主要工作在几个决议起草委员会内进行。列宁参加了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和罗·卢森堡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下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修改：社会党人必须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发动群众和推翻资本主义；大会通过了这一修改意见。

关于代表大会的情况，见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59—65页和本选集第1卷第742—750页)。——第572、614、676页。

229 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大会的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波克罗夫斯基等人。为了事先酝酿和拟定某些问题的决议，代表大会选出了几个委员会。列宁参加了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确认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并提出了社会党的议员在议会内反对战争时所应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一)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二)普遍裁军；(三)取消秘密外交；(四)各民族实行自治并防备对他们的军事进攻与压迫。——第572页。

- 230 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由于欧洲面临战争的威胁而召开的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着重指出了未来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号召各国社会党人积极参加反战斗争。——第572、614、675、734、879页。
- 231 《卡尔·马克思》一文是列宁为格拉纳特兄弟百科辞典出版社写的,1914年春列宁在加里西亚的波罗宁着手写,1914年11月在瑞士伯尔尼脱稿。在1918年出版的单行本序言中,列宁指出,他记得该文写于1913年。
- 该文于1915年刊载在辞典中,署名是:弗·伊林,并附有《马克思主义书目》。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关系,编辑部删掉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两节,并对原文做了某些修改。
- 1918年波涛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附有列宁的序言,单行本按百科辞典刊印,但没有《马克思主义书目》。
- 手稿全文于1925年第一次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编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中。——第575页。
- 23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第575、605页。
- 233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第576页。
- 234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576页。
- 235 见马克思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第577页。

236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关于同盟的历史,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6—206页)。——第578页。

237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当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

- 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578页。
- 238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因为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578页。
- 23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第578页。
- 240 法国社会党是饶勒斯派于1902年建立的改良主义政党。1905年，法国社会党和盖得派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组成统一的社会党。加入这个党的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成员（盖得分子、布朗基分子、饶勒斯分子等）。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领导权为党内占多数的以饶勒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所掌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它的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它的代表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在1920年12月25—30日的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多数派组成法国共产党，以莱昂·勃鲁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少数派退出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个旧名称。——第580、653、679、909页。
- 2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第581页。
- 24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98—99、74—75、64页。——第581页。
- 24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222页。——第582页。
- 24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第582页。
- 245 参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第582页。
- 246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2页）。——

- 第 583 页。
- 247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39—240、213、239 页)。——第 583 页。
- 248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5 页)。——第 584 页。
- 24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3 章第 1 节。——第 585 页。
- 25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83 页。——第 585 页。
- 25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0—251、261—262 页。——第 588 页。
- 25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07 页。——第 588 页。
- 25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章第 4 节、第 1 节、第 3 节 A 和第 4 章第 3 节。——第 590 页。
- 254 同上,第 4 章第 3 节。——第 591 页。
- 25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6—267 页。——第 594 页。
- 25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47 章第 4 节。——第 597 页。
- 25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52 页。——第 597 页。
- 258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第 4 节。——第 597 页。
- 25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74 页。——第 597 页。
- 260 同上,第 696 页。——第 597 页。
- 261 同上,第 473 页。——第 598 页。
- 262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47 章第 5 节。——第 598 页。
- 26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0 页。——第 600 页。
- 26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8 页。——第 601 页。
- 26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0 页。——第 601 页。

- 26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第601页。
- 267 同上,第310页。——第601页。
- 268 见马克思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8页)。——第602页。
- 26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第603页。
- 27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1页。——第603页。
- 27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第603、825、890页。
- 272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争取通过人民宪章的政治运动。人民宪章包括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为保障工人享受此项权利而规定的一系列条件。列宁称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本选集第3卷第811页)。英国工商业垄断地位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使得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日益增长,工联领袖不再支持宪章运动,因而宪章运动逐渐衰落。——第603页。
- 273 见恩格斯186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99页。——第603页。
- 274 参看恩格斯1869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和恩格斯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页)。——第604页。
- 27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第604页。
- 276 见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2—323页)。——第604页。
- 27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58页。——第605页。
- 278 见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3年6月12日

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 1863 年 11 月 24 日和 1864 年 9 月 4 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40、48、55、376、408、418 页。——第 605 页。

- 279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 1878 年 10 月 21 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 1890 年 10 月 1 日被废除。恩格斯在《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中对这一法律做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08—310 页）。——第 606、658 页。
- 28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54—55、64、89—90、101—102、105 页。——第 606 页。
- 281 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序幕》（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49 年俄文版第 13 卷第 197 页）。——第 610 页。
- 282 见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86 页）。——第 611、684、722、862 页。
- 283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是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是根据 1900 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1905 年至 1912 年，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614、686 页。
- 284 《崩得国外组织新闻小报》（《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 Загранич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Бунда》）于 1911 年 6 月至 1916 年 6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一号。后来代替《新闻小报》继续出版的是《崩得国外委员会公报》，共出了两号。——第 614 页。

- 285 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斯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15—21日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决议说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并号召全党“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第615、738页。
- 286 《我们的言论报》(《Наше Слово》)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的日报，1915年1月至1916年9月代替《呼声报》在巴黎出版。——第616、704页。
- 287 《国际》(《Die Internationale》)是罗·卢森堡和弗·梅林创办的杂志，只在1915年4月在柏林出过一期。1922年，慕尼黑未来出版社翻印过。——第617、693、846页。
- 288 三个协约国是英、法、俄三国于1907年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1915年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和意大利)加入协约国，形成英、法、俄、意四个协约国。——第617、673页。
- 289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从1908年2月出版到1917年1月，一共出过五十八号。创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各号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后来在日内瓦。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
- 《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八十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列宁曾在该报编辑部内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一部分编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取消派采取了调和态度，企图阻挠列宁路线的执行。担任编辑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唐恩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实行怠工，同时在他们小集团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公开为取消主义辩护。
- 由于列宁毫不调和地反对取消派，马尔托夫和唐恩于1911年6月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自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第623、666、706、885页。
- 290 《呼声报》(《Голос》)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的日报，1914年9月至1915年1月在巴黎出版，该报采取中派的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初

- 期,《呼声报》刊登过马尔托夫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文章。马尔托夫向右转以后,该报极力维护社会沙文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它宁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而不愿接近那些同社会沙文主义不妥协的人”(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94页)。1915年1月《呼声报》停刊,另行出版了《我们的言论报》。——第624、704页。
- 291 《生活报》(«Жизнь»)是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于1915年3月创刊,以代替当时被查封的《思想报》,先后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1916年1月停刊。——第627页。
- 292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萨文柯夫用罗普申的笔名写了两部反动小说《一匹瘦弱的马》和《未曾有过的东西》,作品浸透了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中广为流行的神秘主义,对1905年革命灰心失望的颓废情绪和完全放弃革命斗争的反动思想。——第628页。
- 293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633页。
- 294 套中人是契诃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因循守旧的典型。——第634页。
- 295 这是歌德的一句名言,见《歌德全集》1893年柏林第6版第2卷第593页。——第637页。
- 296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公鸡和杜鹃》。这篇寓言主要讽刺那些互相捧场、互相标榜的人物。——第645页。
- 297 《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是法国社会党人茹·盖得创办和主编的杂志,1907年至1914年6月在巴黎出版。——第645页。
- 298 伯恩施坦主义 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而得名。伯恩施坦在1896—1898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的文章中和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学说,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社会民主党的

任务就是争取改良。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政党的支持。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伯恩斯坦主义、对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俄国，追随伯恩斯坦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崩得分子、孟什维克。——第 645 页。

299 参看圣经《路加福音》第 18 章。——第 646 页。

300 英国社会党 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于 1911 年同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而成立的。英国社会党曾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宣传 and 鼓动，但是该党人数不多，并且脱离群众，因而具有某种宗派主义的性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内出现两派：一个是以海德门为首的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一个是以阿·英克平和费·罗特施坦等人为首的国际主义派。1916 年 4 月该党发生分裂。海德门及其拥护者占少数，他们退出该党。从此国际主义分子成为英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他们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第 651、695 页。

301 工党 是英国的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于 1900 年由工联、费边社等联合而成，最初叫“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 年改名为工党。工党公开执行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的首领们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第 651 页。

302 费边社分子 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 1884 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维伯和比·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37 页）。1900 年，费边社并入工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651、725、827 页。

- 303 《每日公报》(*The Daily Herald*)是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12年起在伦敦出版，从1922年起是工党的机关报。——第 651 页。
- 304 《每日公民报》(*The Daily Citizen*)是英国工党、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机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1912年至1915年在伦敦出版。——第 651 页。
- 305 紧密派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革命派，是1903年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形成的。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德·布拉哥也夫，后来领导紧密派的是布拉哥也夫的学生格·季米特洛夫、瓦·柯拉罗夫等人。1914年至1918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国际。
- 《新时代》(*Ново Време*)是紧密派的理论刊物(双周刊)，由德·布拉哥也夫主编，1923年被保加利亚反动政府查封。——第 652、695 页。
- 306 《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和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898年起在苏黎世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曾登载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文章。该报曾登载过列宁的文章，《十二条纲要(驳赫·格雷利希对保卫祖国的辩护)》、《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等。后来该报采取了反共反民主的立场。——第 652、881、906 页。
- 307 《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3年创刊于伯尔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曾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以及其他一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后来该报采取了反共反民主的立场。——第 652、881 页。
- 308 《人道报》(*L'Humanité*)是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的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社会党在1920年12月代表大会上发

生分裂后不久，建立了法国共产党，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第 652、695 页。

309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留名于后世，竟焚毁了他故乡爱非斯城有名的阿尔蒂米斯神殿。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追求个人荣誉而不惜犯罪的人的通称。——第 653 页。

310 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是 1914 年 7 月 3—5 日（公历 16—18 日）在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时期结成的，这个会议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执行委员会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交换意见”而召集的。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和靠近组织委员会的团体——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斗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前进集团、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和波兰社会党（社会党左派）。

虽然会议本来只应当交换意见，不能做出硬性的决议，但是，考茨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仍然被提交大会表决。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这一决议的表决，但决议由于多数赞成而获通过。

第二国际借口“调解”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借口奠定“党内和平”，要求布尔什维克停止对取消派的妥协政策进行批评。但布尔什维克反对调和，拒绝服从机会主义第二国际的决议，没有做任何让步。——第 653、703 页。

311 指卡·李卜克内西写的宣言《主要敌人在本国》。——第 654 页。

312 《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是保守派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杂志，是德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机关刊物，1858 年至 1935 年在柏林出版。——第 654、696 页。

313 语出圣经《创世记》。以扫为了一点饼和红豆汤把长子权利卖给弟弟雅各。以后便成为一个典故，比喻“因小失大”。——第 657 页。

314 《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经济派的报纸，1897 年 10 月

至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出版，共出十六号。列宁在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指出它的观点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第664页。

- 315 《工人事业》(«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经济派的杂志，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1899年4月至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由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弗·巴·伊万申担任编辑。杂志总共出了十二期，共九册。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和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的观点。——第664页。

- 316 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齐美尔瓦尔得举行。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列宁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其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国际主义者的反战立场。

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篇宣言，认为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会议谴责了“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号召欧洲工人展开反对战争的斗争，争取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代表会议还通过对战争牺牲者表示同情的决议，并选出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使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并使他们团结起来，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采取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建立第三国际。

关于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的意义，见列宁《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2—367, 368—372页)。——第667、727、867、878、910页。

- 317 见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第1卷第1篇第1章第24节。——第673页。
- 318 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学说”(见本选集第3卷第616页),因路·布伦坦诺而得名。路·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企图证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改良,通过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可以实现社会平等的。布伦坦诺和他的追随者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幌子,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第680页。
- 319 见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第682页。
- 320 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14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英、法、比三国社会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代表和和平主义派的代表以及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布爾什维克没有被邀请,但是列宁委托李维诺夫(马克西莫维奇)出席代表会议,以便宣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这篇声明是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它要求社会党人退出资产阶级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彻底决裂,拒绝同他们合作,坚决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谴责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李维诺夫在宣读声明时被打断并被剥夺了发言权,因此他把声明原文交给主席团以后,就退出了会场。
关于伦敦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2—114、155—157页。——第686页。
- 321 《新闻报》(《Новости》)是社会革命党的日报,1914年8月至1915年5月在巴黎出版。——第686页。
- 322 《无产者呼声报》(《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15年2月至1916年12月出版,共出了四号。该报创刊号曾转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第687页。
- 323 罗迦诺代表会议是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于1914年9月27日在罗迦诺召开的,列宁曾参加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列宁论战争的提纲在会上进行讨论后有一部分列入决议。瑞士方面参加会议的有:罗·格里

姆,沙·奈恩等,意大利方面有:塞拉蒂、拉查理、莫尔加利、屠拉梯、莫迪利扬尼等。会议的决议阐明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并要求国际无产阶级为争取和平而斗争。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不是彻底国际主义的和彻底革命的,但在准备恢复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中,多少起了推动的作用。

哥本哈根代表会议 是中立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社会党人于1915年1月17—18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目的是恢复第二国际。会议决定通过中立国社会党的议会代表,建议本国政府出面调停,争取各交战大国停战。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 是为了讨论对待战争的态度而于1915年3月26—28日在伯尔尼召开的。会议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妇女组织的倡议和国际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克拉拉·蔡特金的参加下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英、德、法、荷兰、瑞士、意大利、俄国和波兰等国的代表,共二十五人。俄国的代表中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印涅萨·阿尔曼德。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 是为了讨论对战争的态度而于1915年4月4—6日在伯尔尼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俄国、挪威、荷兰、瑞士、保加利亚、德国、波兰、意大利、丹麦和瑞典等十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代表。会议决定每年举行国际青年节,选出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局,后者根据会议的决议创办了《青年国际》杂志。列宁和卡·李卜克内西曾参加该杂志的工作。——第692页。

324 《光线》(*Lichtstrahlen*)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由尤·博尔夏特主编。该杂志于1913年至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第693页。

325 论坛派 是集聚在《论坛报》周围的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集团。1909年,论坛派被开除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组成独立的政党(荷兰社会民主党)。论坛派是荷兰工人运动的左派集团,但不是彻底革命的政党。1918年,论坛派参加了建立荷兰共产党的工作。

《论坛报》(*De Tribune*) 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该报从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

关报, 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第695页。

- 326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 组委会分子即由此而来)是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 在1912年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一切反党集团和派别联合举行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改选后停止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697、854、885页。

- 327 劳动解放社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883年在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 一直存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

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点上进行过很多工作, 它在理论上创立了社会民主运动, 实现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2页)。它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译成俄文, 在国外刊印并在俄国境内秘密传播。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主义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劳动解放社也有严重错误: 民粹主义观点的残余、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这些错误成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一些成员后来的孟什维主义观点的胚胎。——第698页。

- 328 指《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文集》第2册, 1914年7月由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载有列宁反对取消派的一些文章, 其中《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和《工人对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两篇文章里, 有关于捐款的详细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366—374、543—551页)。——第701页。

- 329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机关报, 从1894年至1933年每天出版。在很多年内, 弗·梅林和罗·卢森堡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从1917年至1922年《莱比锡人民报》是德国“独立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该报成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第701页。

- 330 《国际通讯》(《*Internationale Korrespondenz*》)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国际政治和工人运动问题的周刊,1914年至1917年在柏林出版。——第704页。
- 331 《现代世界》(《*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性的月刊,1906年至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孟什维克,包括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内,直接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在同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布尔什维克曾为该杂志撰稿。1914年3月,《现代世界》刊载了列宁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第704页。
- 332 《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第一次表述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这一著作于1915年8月写成,曾作为社论载于1915年8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第706页。
- 333 指约·狄慈根使用了 *überschwenglich* 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夸大的、过分的、无限度的。例如,他在1903年斯图加特出版的《短篇哲学论文集》第204页上就曾用过。狄慈根在使用这个词时写道:“绝对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的区分不是无限度的。”也可参看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第4章第2节,那里谈到精神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区分的限度。——第715页。
- 334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反动的君主派军阀集团于1894年对总参谋部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组织的挑拨性的审判,诬告他进行间谍和叛国活动。军事法庭把德雷福斯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由于在法国展开了重申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共和派同君主派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德雷福斯终于在1906年被宣告无罪。
- 萨比林事件于1913年11月发生在阿尔萨斯的萨比林城。这个事件是由于普鲁士军官侮辱阿尔萨斯人引起的。当时激起了当地居民(大多是法国人)反对普鲁士军阀的压迫的怒潮。关于萨比林事件,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14—516页。——第718页。

- 33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页。——第719页。
- 336 见恩格斯《布拉格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5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因为当时列宁引自弗兰茨·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108—114页，这篇文章在该书中没有标明作者。——第722页。
- 337 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第723页。
- 338 《钟声》（《Die Glocke》）是1915年至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格尔方德）出版的杂志。——第723页。
- 339 见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因为当时列宁引自弗兰茨·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246—264页，这篇文章在该书中没有标明作者。——第723、861页。
- 340 《我们的事业》（《Наше 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杂志，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1915年创刊于彼得堡，用来代替1914年10月停刊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27、896页。
- 341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 S. K. —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是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选出的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从1915年9月至1917年1月用英、法、德文出版了机关刊物《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共出了六期。——第728、846页。
- 34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它总结了《资本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在半个世纪中的发展，对帝国主义做了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根据他所揭示的帝国

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胜利而不可能同时所有国家胜利的结论。列宁的这一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坚定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1916年写成的。早在1915年，列宁就在伯尔尼开始研究各国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从1916年1月起开始写这本书。这年1月底，列宁移居苏黎世，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里继续写这本书。列宁从几百本外文书籍、杂志、报纸和统计汇编中做的摘录、纲要、札记和表格等共有四十多印张。1939年，这些资料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印成单行本出版。

1916年7月2日，列宁写成本书，并且把手稿寄交孤帆出版社。出版社里的孟什维克分子删去了书中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把列宁原用的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改为“变成”，把“反动性”（“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1917年初，孤帆出版社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刊印了这本书。

列宁回到俄国以后，给这本书写了序言。1917年9月这本书问世。——第730页。

343 这篇序言第一次发表在1921年10月《共产国际》杂志第18期上，标题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第732页。

344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成立于1917年4月，首领是考茨基。考茨基主义的组织“劳动友谊社”是该党的主要部分。“独立党人”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替他们辩解，庇护他们，主张放弃阶级斗争。

1920年10月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党内很大一部分人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一直存在到1922年。——第736页。

345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斯巴达克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卡·李卜克内

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大部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它的周围,形成国际派。从1916年起,国际派开始出版了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它加入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1918年11月,在德国革命过程中斯巴达克派形成了斯巴达克联盟。十一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于同年12月建立德国共产党。

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德国左派,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没有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他们发挥了半孟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即直到实行分离,成立独立国家),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而崇拜运动的自发性。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卷第846—860页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8—72页)等著作,以及斯大林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页)都对德国左派的错误做了批评。——第736、846、872页。

- 346 《银行》(*Die Bank*)是德国金融家的杂志,1908年至1934年在柏林出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准备工作中多次分析了这家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材料(见《列宁全集》第39卷第60—78、172—195、544—545页)。——第751页。
- 347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章。——第759页。
- 348 滥设企业者的丑闻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加紧创办股份公司的时期。随着滥设企业而来的,是发了财的资产阶级投机者所进行的骗人勾当,是交易所里的土地和有价值证券的投机狂。——第761页。
- 349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高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的简称,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

- 年起用这个名称)。——第 762 页。
- 350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第 770 页。
- 351 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是指 1892—1893 年在法国揭露的被法国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公司所收买的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的大舞弊、大受贿案件。——第 779、884 页。
- 35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8 页。——第 825、890 页。
- 353 同上，第 353 页。——第 825、869、873、890 页。
- 354 莫希干人是美洲一个已经绝种的民族。“最后一批莫希干人”一语，来源于美国作家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后来，此语就成了最后的代表者的同义语。——第 829 页。
- 355 斯彼克塔托尔，即俄国经济学家、崩得分子米·伊·纳希姆桑。——第 830、854、885 页。
- 35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6 章第 2 节。——第 832 页。
- 357 指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 1916 年 1 月 1 日在柏林卡·李卜克内西寓所举行，通过了罗·卢森堡拟定的国际派的提纲。——第 846 页。
- 358 《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来梅派的机关报，1890 年创刊，1919 年停刊。1914 年至 1915 年该报实际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1916 年转入考茨基分子手中。——第 848 页。
- 359 《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71 年在不伦瑞克创刊。1914 年至 1915 年该报实际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1916 年转入考茨基分子手中。——第 848 页。
- 360 德国国际社会党人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德国出现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博尔夏特等人)。该派赞助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划清界限的问题上采取了比罗·卢森堡的拥护者更为彻底

的立场。但是该派缺乏同群众的广泛联系，因此很快就瓦解了。——第 848 页。

36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98 页。——第 855 页。

362 号召派是因《号召报》而得名。

《号召报》(«Прозыв») 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沙文主义集团的机关报，1915 年 10 月至 1917 年 3 月在巴黎出版。——第 857 页。

363 见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75 页)。——第 863 页。

364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继《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之后，再次表达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时也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原理。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于 1916 年 9 月用德文写成，原拟在斯塔的那维亚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发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党纲中“人民武装”的条文，并提出了“废除武装”的错误口号。

1916 年 12 月，本文经过修改后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 2 卷(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92—102 页)。

1917 年 4 月，列宁在回俄国前不久，曾将这篇文章的德文原稿交给《青年国际》杂志编辑部。文章载于 1917 年该杂志第 9 期和第 10 期。

《青年国际》(«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915 年 9 月至 1918 年 5 月在苏黎世出版。对《青年国际》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63—167 页。——第 871 页。

365 指罗·格里姆(瑞士社会民主党首领之一)1916 年夏因筹备召开瑞士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而草拟的军事问题提纲。这次代表大会原定 1917 年 2 月召开，以解决瑞士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第 871 页。

- 366 《新生活》(*«Neues Leben»*)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1915年1月在伯尔尼创刊,1917年12月停刊。该杂志宣传齐美尔瓦尔得右派的观点,从1917年初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 《先驱》(*«Vorboten»*)是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理论性机关刊物,1916年在伯尔尼用德文出版,共出了两期:第1期于1916年1月出版,第2期于1916年4月出版。该杂志曾刊载列宁的著作《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第871页。
- 367 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于1916年4月24—30日在昆塔尔举行。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了,左翼比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更加团结更加有力了。由于列宁的力争,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批评社会和平主义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机会主义活动的决议。昆塔尔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前进了一步,但是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采取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第878、913页。
- 368 社会民主劳动派(劳动友谊社)是德国中派的组织,1916年3月由脱离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代表组成。该派是1917年成立的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这个党曾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护,并且主张同他们保持统一。——第878、903页。
- 369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为了帮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于1915年在俄国成立的。资产阶级为了使工人接受自己的影响,向他们灌输护国主义的情绪,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工人团”,吸引工人代表参加这些团体,以便鼓动工人群众提高军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孟什维克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策划的这种冒牌的爱国主义的勾当,布尔什维克则宣布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并且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胜利地进行了抵制。——第878、893页。
- 370 《哨兵报》(*«La Sentinelle»*)是纽沙特尔州(瑞士法语区)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884年创刊于绍德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

年,该报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1914年11月13日在该报第265号上曾摘要刊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本卷第568—574页)。——第881页。

- 371 指1915年11月20—21日在阿劳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大会日程的中心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对于国际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态度问题。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的三个派别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斗争,这三派就是:(1)反齐美尔瓦尔得派(格雷利希、弗吕格等);(2)齐美尔瓦尔得右派的拥护者(罗·格里姆等);(3)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拥护者(普拉廷等)。

格里姆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瑞士社会民主党加入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并赞同齐美尔瓦尔得右派的政治路线。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对格里姆的决议案提出了修正,建议必须展开反对战争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并声明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帝国主义战争结束。

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左派的修正案。——第882页。

- 372 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0页)。——第884页。

- 373 《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办的一个杂志,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1915年在日内瓦出版,只出了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列宁在杂志编辑部内进行了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党集团的斗争,揭穿了该集团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和利用杂志进行派别活动的企图。由于该集团的反党立场,列宁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同该集团断绝关系并停止共同出版杂志。从1916年10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开始出版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885页。

- 37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Известия Заграни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是孟什维克的报纸,1915年2月创刊于瑞士,1917年3月停刊,共出了十

- 号。——第 888 页。
- 37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890 页。
- 37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63 页。——第 890 页。
- 37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391 页。——第 891 页。
- 37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44、151 页。——第 891 页。
- 37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71—287 页。——第 891 页。
- 380 《劳动呼声报》(«Голос Трудя»)是孟什维克的公开报纸,1916 年创刊于萨马拉,其前身是《我们的呼声报》。——第 896 页。
- 381 列宁本来打算把《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在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党人于纽约出版的《新世界报》上发表。但该报没有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头两章经过修改后以《世界政治的转变》为题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后一号即第 58 号上(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269—277 页)。——第 899 页。
- 382 《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创刊于 1896 年 12 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了不彻底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没有同改良派断绝关系。——第 905 页。
- 383 工会总同盟(劳动总联合会)是全法国的工会联合会,成立于 1895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者方面,鼓吹阶级合作和进行“保卫祖国”的宣传。——第 909 页。
- 384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0 年 1 月至 1933 年 2 月在开姆尼斯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报纸。——第 910 页。
- 385 《战斗报》(«La Bataille»)是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机关报,1915 年 11 月在巴黎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沙文主义立场。——第 912 页。

人名索引

A

- 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Adler, Friedrich 1879—1960)——第 47, 52, 59, 94, 115, 224, 317 页。
- 阿德勒, 维克多(Adler, Victor 1852—1918)——第 691, 692 页。
- 阿迪克斯, 埃利希(Adickes, Erich 1866—1928)——第 357 页。
- 阿芬那留斯, 理查(Avenarius, Richard 1843—1896)——第 16, 21, 22, 33, 34, 36, 42—48, 50—52, 54—77, 81—91, 110—112, 114, 124—127, 136, 144—154, 158, 160, 162, 165, 168, 170, 171, 190, 192, 196—197, 199, 201, 202, 207—215, 217, 219, 221—223, 227, 230, 244, 248, 255, 320, 321, 323—325, 336, 346, 348, 349, 351, 352, 354, 360, 364, 366, 367 页。
- 阿基莫夫(Акимов 1872—1921)(真名马赫诺韦茨,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Махновец,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第 276 页。
- 阿吉纳尔多, 艾米里奥(Aguinaldo, Emilio 1869—1964)——第 829 页。
- 阿加德, 叶·(Agahd, E.)——第 772—774, 780, 829 页。
-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1928)——第 466, 617—619, 623, 624, 645, 687, 697, 826, 885 页。
- 阿克雪里罗得, 柳波芙·伊萨柯夫娜(Аксельрод, Любовь Исааковна 1868—1946)(笔名奥尔托多克斯 Ортодокс)——第 109, 329 页。
- 阿拉克切也夫, 阿列克塞·安得列也维奇(Аракчеев, 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1763—1834)——第 416 页。
-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 446—385)——第 786 页。
- 阿列克谢也娃, 叶甫多基娅·米特罗范诺夫娜(Алексеева, Евдокия Митрофановна)——第 601 页。
- 阿列克辛斯基, 格里哥里·阿列克谢也维奇(Алексин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生于 1879 年)——第 463, 651, 702, 704, 907 页。
- 阿伦特, 保尔(Arndt, Paul)——第 784 页。
- 阿姆斯特朗, 威廉·乔治(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800)——第 786 页。
- 阿西萨, 茹(Assézat, J.)——第 30 页。
- 艾瓦德, 奥斯卡尔(Ewald, Oskar 生于 1881 年)(真名弗里德兰德, 奥斯卡尔 Friedländer, Oskar)——第 56, 68, 69, 88, 91 页。
- 艾威林, 爱德华(Aveling, Edward 1851

- 1898)——第 580 页。
 爱德华七世 (Edward VII 1841—1910)
 ——第 780 页。
 爱尔威, 古斯塔夫 (Hervé, Gustave 1871—1944)——第 907 页。
 安恩——见饶尔丹尼亚。
 奥尔托多克斯——见阿克雪里罗得, 柳波芙·伊萨柯夫娜。
 奥斯特利茨, 弗里德里希 (Austerlitz, Friedrich 1862—1931) ——第 729 页。
 奥斯特瓦尔德, 威廉·弗里德里希 (Ostwald, Wilhelm Friedrich 1853—1932)——第 45, 54, 169, 230, 236, 260, 275—280, 294, 304, 339, 349, 350 页。

B

- бв——第 906—907 页。
 巴达也夫, 阿列克塞·叶哥罗维奇 (Бадаев, Алексей Егорович 1883—1951)——第 690 页。
 巴克斯,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 (Bax, Ernest Belfort 1854—1926)——第 150 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第 418, 579 页。
 巴札罗夫 (Базаров 1874—1939) (真名鲁德涅夫,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Рудне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第 4, 12, 16—17, 20, 69, 78—83, 95, 104—105, 107—115, 141, 170, 186—187, 199, 215, 216, 219, 222, 237, 238, 244, 288, 330, 331, 337—338, 351 页。
 包曼, 尤利乌斯 (Baumann, Julius 1837—1916)——第 194 页。
 保尔逊, 弗里德里希 (Paulsen, Friedrich 1846—1908)——第 357 页。
 鲍勃凌斯基,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也维奇 (Бобрин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生于 1868 年)——第 611, 612 页。
 鲍狄埃, 欧仁 (Pottier, Eugène 1816—1887)——第 434—436 页。
 鲍威尔, 奥托 (Bauer, Otto 1882—1938)——第 509, 510, 684, 719, 735 页。
 鲍威尔, 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第 576 页。
 贝克莱, 乔治 (Berkeley, George 1685—1753)——第 17—28, 30, 32, 33, 36—39, 42, 46, 47, 60, 62, 64, 66, 80, 82, 89, 102, 105, 111, 116, 120, 125, 186, 194, 196, 198, 199, 201, 202, 204, 209, 210, 214, 217, 226—228, 241, 253, 303, 317, 361, 364, 714 页。
 贝拉, 约瑟夫·索朗热·昂利 (Pellat, Joseph-Solange-Henri 1850—1909)——第 266 页。
 贝歇尔, 埃利希 (Becher, Erich 1882—1929)——第 194—195, 296, 297 页。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第 216, 409—411, 677 页。
 本特利, 麦迪逊 (Bentley, Madison 1870—1955)——第 185 页。
 比德曼, 阿路易斯·埃曼努埃尔 (Biedermann, Alois Emanuel 1819—1885)——第 216 页。
 比朗, 恩斯特·约翰 (Biron, Ernst Johann 1690—1772)——第 416 页。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第 344 页。
 比索拉蒂, 列奥尼达 (Bissolati, Leonida 1857—1920)——第 651, 687, 690,

- 894, 911 页。
- 彼得楚尔特, 约瑟夫 (Petzoldt, Joseph 1862—1929)——第 11, 21, 36, 50, 51, 57, 61, 71, 73—78, 81, 90, 127, 136, 147, 152, 162—165, 173, 175—176, 190, 192, 208, 210, 213, 217, 219, 224, 227—228, 255, 325—328, 351—352, 354, 358, 360 页。
- 彼得罗夫, 安东 (Петров, Антон 死于 1861 年) (真名西得罗夫, 安东·彼得罗维奇 Сидоров, Антон Петрович)——第 421 页。
- 彼得罗夫斯基, 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 (Петров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78—1958)——第 690 页。
- 彼舍霍诺夫, 阿列克塞·瓦西里也维奇 (Пешехонов, 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7—1933)——第 471, 473, 565 页。
-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第 139, 376, 409—410, 475, 494, 548, 570, 605, 612 页。
- 毕尔生, 卡尔 (Pearson, Karl 1857—1936)——第 46—47, 89, 92—93, 145—146, 161—162, 184—186, 210, 217, 228, 265, 274, 285, 290, 309—310, 312, 349 页。
- 毕希纳, 路德维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第 42, 244—246, 248, 272, 307, 336—337, 339, 344, 582 页。
- 毕雍, 弗朗斯瓦 (Pillon, François 1830—1914)——第 29, 215, 236 页。
- 卜尼格先, 埃·普·(Беннигсен, Э. П. 生于 1875 年)——第 505 页。
- 别尔盖尔, 爱尔文 (Belger, Erwin 1875—1919 至 1922 年间)——第 649 页。
- 别尔曼, 雅柯夫·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ерман, 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8—1933)——第 12, 95, 192, 315, 338 页。
- 别尔托夫, 恩·——见普列汉诺夫。
- 别拉尔, 维克多 (Berard, Victor 1864—1931)——第 829 页。
- 别洛乌索夫, 帖廉提·奥西波维奇 (Белоусов, Терентий Осипович 生于 1875 年)——第 385 页。
- 波尔茨曼, 路德维希 (Boltzmann, Ludwig 1844—1906)——第 93—94, 270, 293—296, 304 页。
- 波格丹诺夫 (Богданов 1873—1928) (真名马林诺夫斯基,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Малин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第 4, 11, 12, 15—17, 21—22, 42, 45, 52—55, 61—62, 85—87, 91, 93, 95, 109, 119—125, 130—133, 135—136, 143, 146, 150, 153—154, 169—170, 188—190, 199, 215, 223, 226—227, 229—236, 243, 268—269, 275—276, 278—279, 281, 284, 288, 293—294, 308—311, 328—337, 338, 342, 343, 349, 353 页。
- 波林, 威廉·安得列阿斯 (Bolin, Wilhelm Andreas 1835—1924)——第 81, 203 页。
- 波米亚洛夫斯基,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 (Помя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1835—1863)——第 560 页。
- 波旁王朝 (Bourbons)——第 854—855 页。
- 波特列索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Потре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34)——第 413, 464—465, 625, 662, 687, 700, 799, 826, 859, 889, 894, 897 页。
- 波义耳, 罗伯特 (Boyle, Robert 1627—1691)——第 134 页。

波英廷, 约翰·亨利 (Poynting, John Henry 1852—1914)——第280, 285页。

伯恩哈特, 路德维希 (Bernhard, Ludwig 1875—1935)——第565页。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第2, 7, 205, 406, 665, 735, 848页。

伯尔, 麦克斯 (Beer, Max 1864—1943)——第798页。

伯倍尔, 约瑟夫 (Popper, Josef 1838—1921)——第328页。

柏克勒尔, 安都昂·昂利 (Bequerel, Antoine-Henri 1852—1908)——第256页。

柏克勒尔, 让 (Bequerel, Jean 1878—1953)——第291页。

柏拉图 (Plato 约公元前427—347)——第81, 129, 714页。

柏姆·巴维克, 欧根 (Böhm-Bawerk, Eugen 1851—1914)——第4, 6页。

勃朗, 亚历山大 (Blanc, Alexandre 1874—1924)——第911页。

勃鲁克尔, 路易·德 (Brouckère, Louis de 1870—1951)——第8页。

勃鲁特舒, 勃· (Broutchoux, B.)——第909页。

博诺米, 伊万诺耶 (Bonomi, Ivanoe 1873—1951)——第911页。

布尔采夫, 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 (Бурцев, Владимир Львович 1862—1936)——第609, 686页。

布尔德朗, 阿尔伯 (Bourderon, Albert 1858—1930)——第913, 915, 917页。

布尔加柯夫, 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Булгак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1—1944)——第357页。

布尔金 (Булкин 生于1888年) (真名谢

明诺夫, 费多尔·阿法纳西也维奇 Семенов, Федо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第494, 894页。

布哈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第765页。

布莱, 弗兰茨 (Blei, Franz 1871—1942)——第320—325, 328页。

布莱斯佛德, 亨利·诺埃尔 (Brailsford, Henry Noel 1873—1958)——第625页。

布兰亭, 卡尔·亚尔马 (Branting, Karl Hjalmar 1860—1925)——第652页。

布里臧, 比埃尔 (Brizon, Pierre 1878—1923)——第911页。

布利杨诺夫, 阿·弗· (Бурьянов, А. Ф. 生于1880年)——第496页。

布日纳提埃尔, 斐迪南 (Brunetière, Ferdinand 1849—1906)——第311页。

C

蔡特金, 克拉拉 (Zetkin, Clara 1857—1933)——第695, 846页。

查苏利奇, 维拉·伊万诺夫娜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49—1919)——第467页。

察恩, 弗里德里希 (Zahn, Friedrich 1869—1946)——第740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第366—368, 419—420, 422, 544, 610, 909页。

D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第254, 335页。

- 达兰贝尔, 让 (D'Alembert, Jean 1717—1783)——第 31—32 页。
- 达威多夫, 列奥尼德·费多罗维奇 (Давыдов, Леонид Федорович)——第 780 页。
- 达乌盖, 巴维尔·格奥尔基也维奇 (Дауге, Павел Георгиевич 1869—1946)——第 253—255 页。
- 大卫, 爱德华 (David, Eduard 1863—1930)——第 616, 646, 659, 676, 704, 799, 848, 858, 889, 911, 915 页。
- 德拉克鲁阿, 昂利 (Delacroix, Henri 1873—1937)——第 210 页。
- 德拉哥马诺夫,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Драгоманов,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841—1895)——第 544 页。
- 德勒季, 弗兰西斯 (Delaisi, Francis 生于 1873 年)——第 618 页。
- 德雷福斯, 阿尔弗勒德 (Dreyfus, Alfred 1859—1935)——第 718 页。
- 德里奥, 日·爱德华 (Driault, J. Edouard)——第 806—807 页。
-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370)——第 129, 361—362, 714 页。
- 德涅夫尼茨基, 普·恩·(Дневницкий, П. Н. 生于 1883 年) (真名策杰尔包姆, 费多尔·奥西波维奇 Цедербаум, Федор Осипович)——第 412 页。
- 德沙尼尔, 保尔 (Deschanel, Paul 1855—1922)——第 787 页。
- 邓尼金, 安东·伊万诺维奇 (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1872—1947)——第 736 页。
- 狄慈根, 欧根 (Dietzgen, Eugen 1862—1930)——第 118, 253, 255 页。
- 狄慈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f 1828—1888)——第 16, 114—116, 118—120, 134—135, 138, 157—158, 162, 175, 213, 244, 248—255, 267, 272—273, 289, 338, 346—348, 351—352, 715 页。
-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第 30—33, 40, 42, 111, 125 页。
- 狄克逊, 爱德华·特拉弗斯 (Dixon, Edward Travers)——第 92—93 页。
- 狄奈-德涅斯, 约瑟夫 (Diner-Dénes, Josef 1857—1937)——第 256—257 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Disraeli, Benjamin 1804—1881)——第 798 页。
- 迪乌里奇, 若尔日 (Diouritch, Georges)——第 784, 787, 790—791 页。
- 笛卡儿, 勒奈 (Descartes, René 1596—1650)——第 31, 304, 714 页。
- 董措夫, 德米特罗 (Донцов, Дмитро)——第 527—528 页。
- 杜勃罗留波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第 419, 908—909 页。
- 杜恒, 比埃尔·莫里斯·玛丽 (Duhem, Pierre-Maurice-Marie 1861—1916)——第 47, 263, 285, 309—310, 316—318, 349 页。
- 杜林, 欧根·卡尔 (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第 2, 4, 35—36, 72, 130, 132—133, 174—180, 188, 205, 234, 244, 246—248, 336—337, 339—340, 344—345, 375—376, 383 页。
- 敦克尔, 凯特 (Duncker, Käte 1871—1953)——第 846 页。
- 多尔哥鲁科夫, 巴维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Долгоруко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866—1930)——第 610 页。

E

厄什韦葛, 路德维希 (Eschwege, Ludwig)——第 751, 772, 778, 780, 829 页。

厄伊得尔斯, 奥托 (Eidels, Otto)——第 751—752, 763—765, 767—768, 788, 791 页。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 2, 4, 10—11, 12—13, 16, 27—28, 35—36, 41—42, 46, 50, 55, 59, 61, 72, 80, 83—84, 88, 95—101, 104—116, 120—121, 125, 127, 130—137, 139, 141, 146—147, 151, 156—157, 159—160, 162—163, 167—168, 174—178, 184—192, 199, 204—210, 231, 234, 238, 244—253, 255—257, 259, 261, 267—269, 272, 275, 300, 304, 315—316, 320—322, 324—325, 336—340, 343—346, 351—352, 354, 364, 367—368, 375—379, 384—385, 398, 431—432, 437, 442, 514, 544, 547—550, 553, 575—578, 581—585, 587, 596, 601—605, 611, 626—627, 673, 676—677, 682, 684, 711, 825, 832, 855, 862—863, 869, 873, 889—894, 897 页。

尔·马·——见马尔托夫。

耳·弗拉·——见舍印芬克尔。

耳·谢·——见柯里佐夫。

F

法拉第, 迈克尔 (Faraday, Michael 1791—1867)——第 304 页。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Philo of Alexandria 约公元前 20—公元 54)——第 711 页。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第 16, 42, 46,

80—84, 96, 98, 101—103, 114, 116—117, 120, 129, 137, 141—142, 154—156, 159—160, 163, 169, 176, 178, 202—204, 207—209, 237, 240—241, 245, 248, 310, 336, 343—344, 346, 351—352, 366, 368, 375, 378, 383, 417, 442, 576, 580—582, 638, 714 页。

费尔伏恩, 麦克斯 (Verworm, Max 1863—1921)——第 227 页。

费尔克尔 (Völker)——第 780 页。

费利, 恩利科 (Ferri, Enrico 1856—1929)——第 333 页。

费舍, 库诺 (Fischer, Kuno 1824—1907)——第 199 页。

费希纳, 古斯塔夫·泰奥多尔 (Fechner, Gustav Theodor 1801—1887)——第 344 页。

费希特, 伊曼努尔·海耳曼 (Fichte, Immanuel Hermann 1796—1879)——第 213 页。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第 30, 64, 67—68, 73, 77—78, 92, 140—141, 144, 149, 153, 197—199, 201, 203, 213, 217, 233, 303 页。

冯特, 威廉 (Wundt, Wilhelm 1832—1920)——第 56—58, 61—62, 65—66, 71, 87—88, 90, 149, 152—153, 160, 173, 195, 209, 218 页。

弗格尔施坦, 泰奥多尔 (Vogelstein, Theodor)——第 744, 746, 794 页。

弗拉索夫, 阿·(Власов, А.)——第 471 页。

弗兰克, 阿道夫 (Franck, Adolphe 1809—1893)——第 129 页。

弗兰克, 菲力浦 (Frank, Philipp 生于 1884 年)——第 166 页。

- 弗雷塞, 亚历山大·肯普贝尔 (Fraser, Alexander Campbell 1819—1914) —第 18, 23—27 页。
- 伏尔特曼, 路德维希 (Woltmann, Ludwig 1871—1907) —第 333 页。
- 符尼埃尔, 欧仁 (Fournière, Eugène 1857—1914) —第 205 页。
- 福贝尔, 约翰·威廉 (Vaubel, Johann Wilhelm 1864—1957) —第 295—296 页。
- 福尔克曼, 保尔 (Volkman, Paul 1856—1938) —第 167, 714 页。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第 42, 245, 336, 582 页。

G

- 盖得, 茹尔 (Guesde, Jules 1845—1922) (真名巴塞尔, 马蒂约 Basile, Mathieu) —第 615—616, 643, 645—646, 656, 858 页。
- 甘凯维奇, 尼古拉 (Ганкевич, Николай 生于 1869 年) —第 520 页。
- 高尔察克,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20) —第 736 页。
- 高尔基, 马克西姆 (Горький, Максим 1868—1936) (真名彼什科夫,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Пешков,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第 481—484 页。
- 高尔纽, 玛丽·阿尔弗勒德 (Cornu, Marie-Alfred 1841—1902) —第 304 页。
- 哥里德勃拉特 (Гольдблат 1879—1923) (真名格林别尔格, 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 Гринберг, Владимир Давыдович) —第 556—558, 561 页。
- 格尔方德, 奥·伊·Гельфонд, О. И. 1863—1942) —第 12—13, 158, 249, 338 页。
- 格拉纳特, 亚·纳·和伊·纳·(Гранат, А. Н. и И. Н.) —第 575 页。
- 格腊斯曼, 海尔曼·君特 (Grassmann, Hermann Günther 1809—1877) —第 172 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第 550—551 页。
- 格雷利希, 海尔曼 (Greulich, Herman 1842—1925) —第 652 页。
- 格里姆, 罗伯特 (Grimm, Robert 1881—1958) —第 652, 871 页。
- 格林, 卡尔 (Göring, Karl 1841—1879) —第 97 页。
-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 —第 81, 204, 343 页。
- 格律恩堡, 卡尔 (Grünberg, Karl 1861—1940) —第 863 页。
- 格文涅尔, 阿尔图尔·冯 (Gwinner, Arthur von 1856—1931) —第 792 页。
- 格沃兹迭夫, 库兹马·安东诺维奇 (Гвоздев, Кузьма Антонович 生于 1883 年) —第 894, 897 页。
- 龚帕斯, 赛米尔 (Gompers, Samuel 1850—1924) —第 735 页。
- 古尔维奇, 伊萨克·阿道夫维奇 (Гурвич, Исаак Адольфович 1860—1924) —第 824 页。
- 古契柯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Гуч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62—1936) —第 610, 628, 901 页。
- 古什卡——见叶尔曼斯基。
- 果戈里,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52) —第 57, 252 页。

果雷, 保尔 (Golay, Paul 1877—1951)
——第 679 页。

果特, 海尔曼 (Gorter, Herman 1864—
1927)——第 652, 681, 724 页。

H

哈阿兹, 胡果 (Haase, Hugo 1863—
1919)——第 653—654, 665, 694, 878,
903 页。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er)——第 729,
852 页。

哈尔姆斯, 伯恩哈特 (Harms, Bernhard
1876—1939)——第 633, 784 页。

哈夫迈耶, 约翰 (Havemeyer, John 1833
—1922)——第 775 页。

哈尼施, 康拉德 (Haenisch, Konrad
1876—1925)——第 646 页。

哈特曼, 爱德华·冯 (Hartmann, Eduard
von 1842—1906)——第 60, 291—293,
299, 357 页。

哈伊姆, 鲁道夫 (Haym, Rudolf 1821
—1901)——第 80, 154 页。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 (Hyndman, Hen-
ry Mayers 1842—1921)——第 615—
617, 624, 643, 645—646, 735, 878, 896
—897, 907 页。

海费尔德, 维克多 (Heyfelder, Victor
生于 1871 年)——第 239 页。

海克尔, 恩斯特·亨利希 (Haeckel,
Ernst Heinrich 1834—1919)——第
40, 92, 175, 230, 254, 280, 307, 353,
356—360, 362—363 页。

海曼, 汉斯·吉德翁 (Heymann, Hans
Gideon)——第 741—742, 770 页。

海尼希, 库尔特 (Heinig, Kurt 1886—
1956)——第 772, 789—790 页。

海涅, 沃尔弗于格 (Heine, Wolfgang

1861—1944)——第 646, 690, 691, 632,
694 页。

海因泽, 麦克斯 (Heinze, Max 1835—
1909)——第 195 页。

韩德逊, 阿瑟 (Henderson, Arthur 1863
—1935)——第 662, 878, 896, 904 页。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Гер-
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
1870)——第 416—422, 423—424 页。

赫尔姆霍茨, 海耳曼·路德维希·斐迪
南 (Helmholtz, 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1821—1894)——第 237—
244, 263—264, 270, 296 页。

赫拉克利特 (Herakleitos 约公元前 540
—480)——第 711, 714 页。

赫林, 艾瓦德 (Hering, Ewald 1834—
1918)——第 188 页。

赫尼格斯瓦尔德, 理查 (Hönigswald,
Richard 1875—1947)——第 17, 92,
173 页。

赫沃尔桑, 奥列斯特·达尼洛维奇 (Хволь-
сон, Орест Данилович 1852—
1934)——第 356 页。

赫希柏格, 卡尔 (Höschberg, Karl 1853
—1885)——第 205 页。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 (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第 29—30,
88, 106, 210—211, 240, 344—346, 582
页。

赫兹, 亨利希·鲁道夫 (Hertz, Heinrich
Rudolf 1857—1894)——第 226, 242,
270, 290—291, 304, 305, 306 页。

黑尔斯, 约翰 (Hales, John 生于 1839
年)——第 890 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
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
—1831)——第 3, 69, 80, 92, 97—98、

- 126, 136, 189, 192, 194, 231, 232, 233, 237, 248, 254, 316, 344—345, 367, 416—417, 442, 576, 580—581, 583—584, 607, 624, 626, 711, 713—714 页。
- 黑克尔, 艾米尔 (Häcker, Emil 1875—1934)——第 543 页。
- 亨盖尔, 汉斯 (Henger, Hans)——第 824 页。
- 侯里欧克, 乔治·杰科布 (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第 603 页。
- 胡斯曼, 卡米尔 (Huysmans, Camille 1871—1968)——第 843, 916 页。
- 华德, 詹姆斯 (Ward, James 1843—1925)——第 88, 173—174, 210—211, 280, 283—289, 292, 296, 299, 305, 348, 352 页。
- 霍布森, 约翰·阿特金森 (Hobson, John Atkinson 1858—1940)——第 730, 736, 738, 784, 798, 811, 817—822, 824, 827, 829, 835—836, 886—887 页。
- 霍尔巴赫, 保尔·昂利 (Holbach, Paul-Henri 1723—1789)——第 244, 714 页。
- 霍夫曼, 阿道夫 (Hoffmann, Adolph 1858—1930)——第 911 页。
- 霍格伦, 泽特 (Höglund, Zeth 1884—1956)——第 652, 695 页。
-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第 728 页。

J

- 基尔霍夫, 古斯塔夫·罗伯特 (Kirchhoff, Gustav Robert 1824—1887)——第 172, 263, 270, 284 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

—1874)——第 587 页。

- 吉芬, 罗伯特 (Giffen, Robert 1837—1910)——第 625, 819 页。
- 吉约姆, 詹姆斯 (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第 677 页。
- 加尔迭宁, 尤·——见切尔诺夫。
-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第 548, 628 页。
- 加利费, 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Galliffet, Gaston-Alexandre-Auguste 1830—1909)——第 874 页。
- 加涅茨基 (Ганецкий 1879—1937) (真名菲尔施坦堡, 雅柯夫·斯塔尼斯拉沃维奇 Фюрстенберг, 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第 555—556 页。
- 伽桑狄, 比埃尔 (Gassendi, Pierre 1592—1655)——第 714 页。
- 焦耳, 詹姆斯·普雷斯科特 (Joule, James Prescott 1818—1889)——第 311 页。
- 君特, 济格蒙德 (Günther, Siegmund 1848—1923)——第 293 页。

K

- 卡尔韦尔, 理查 (Calwer, Richard 1868—1927)——第 813—814 页。
- 卡拉乌洛夫, 瓦西里·安得列也维奇 (Караулов, 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854—1910)——第 404 页。
- 卡鲁斯, 保罗 (Carus, Paul 1852—1919)——第 229—230, 236, 279, 351 页。
- 卡内基, 安德鲁 (Carnegie, Andrew 1835—1919)——第 823 页。
- 卡诺, 尼古拉·勒昂纳·萨迪 (Carnot, Nicolas-Léonard-Sadi 1796—1832)——第 311 页。
- 卡斯坦宁, 弗里德里希 (Carstanjen, Friedrich)——第 61—62, 147, 153—

- 154 页。
- 卡维林, 康斯坦丁·德米特利也维奇 (Кавел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8—1885)——第 420 页。
- 凯尔文——见汤姆生, 威廉, 凯尔文勋爵。
- 凯约, 约瑟夫 (Caillaux, Joseph 1863—1944)——第 625 页。
-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第 3, 20, 27, 78, 80, 92, 96—100, 108, 114, 116, 119, 125—126, 135, 137, 140, 156, 159, 162, 165, 167, 169—170, 173, 179, 185—186, 194, 196—210, 214, 217, 225—227, 229, 240, 244, 247, 252, 311, 344, 364, 366—367, 582, 714 页。
-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第 97, 206, 255, 500—501, 509—512, 514, 523, 526, 543, 615—619, 621—628, 630—648, 652—657, 660—665, 675—676, 680, 682, 691—695, 703, 725, 729, 731, 735—736, 738, 750, 795, 809—813, 815, 825, 828—832, 835—840, 843, 848—849, 854, 858, 860, 869—870, 873, 878, 880, 885—886, 890—893, 903—911, 915, 917 页。
- 考夫曼, 欧根 (Kaufmann, Eugen)——第 756, 765 页。
- 柯亨, 海尔曼 (Cohen, Hermann 1842—1918)——第 97, 289—292, 299, 305, 314 页。
- 柯里佐夫, 德·(Кольцов, Д. 1863—1920) (真名金兹布尔格, 波利斯·阿布拉莫维奇 Гинзбург, 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笔名耳·谢·Л. С.; 谢多夫, 耳·Седов, Л.)——第 466, 472, 476—477, 497 页。
- 柯斯特罗夫——见饶尔丹尼亚。
- 柯特利亚尔, 格·阿·(Котляр, Г. А.)——第 36 页。
- 柯维拉尔, 扬·弗朗斯·万 (Cauwelaert, Jan Frans van 生于 1880 年)——第 43, 55, 149 页。
- 科科什金,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Кокоскин,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871—1918)——第 531—535, 540, 562, 564—565 页。
- 科柳巴金,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Колуба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68—1915)——第 531 页。
- 科内利乌斯, 汉斯 (Cornelius, Hans 1863—1947)——第 222—224, 227, 235—236, 351 页。
- 科索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 (Кос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1870—1941) (真名列文桑, 姆·亚·Левинсон, М. Я.)——第 475, 566—567, 614, 662 页。
- 克莱因佩特, 汉斯 (Kleinpeter, Hans 1869—1916)——第 91, 194, 210, 225—230, 236, 242—243, 264, 290, 360—361 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Carl 1780—1831)——第 626, 673 页。
- 克劳脍斯, 鲁道夫 (Clausius, Rudolf 1822—1888)——第 311 页。
- 克勒芒德, 埃德加 (Crammond, Edgar)——第 817 页。
- 克利福德, 威廉·金顿 (Clifford, William Kingdon 1845—1879)——第 228 页。
- 克列斯托夫尼科夫, 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Крестовников,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生于 1855 年)——第 610 页。
- 克虏伯 (Krupp)——第 786, 834—835 页。

-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第 609, 686 页。
- 克伦斯基,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1881—1970)——第 686, 901 页。
- 克罗美尔, 艾威林·巴林 (Cromer, Aveling Baring 1841—1917)——第 802 页。
- 克斯特涅尔, 弗里茨 (Kestner, Fritz)——第 746, 748—750 页。
- 孔德, 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第 208, 344 页。
- 孔狄亚克, 埃蒂耶纳·博诺·德 (Condillac, Etienne-Bonnot de 1715—1780)——第 30 页。
- 库达晓夫, 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 (Кудашев,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生于 1859 年)——第 689 页。
- 库格曼, 路德维希 (Kugelman, Ludwig 1830—1902)——第 134, 252, 335, 344 页。
- 库诺夫, 亨利希·威廉·卡尔 (Cunow, Heinrich Wilhelm Karl 1862—1936)——第 619, 621, 623, 628, 640, 664, 725, 812 页。
- 库斯柯娃, 叶卡特林娜·德米特利也夫娜 (Куск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1869—1958)——第 477 页。
- 库特列尔,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Кутлер,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9—1924)——第 610 页。
- L**
- 拉波波特, 沙尔 (Rapport, Charles 生于 1865 年)——第 205 页。
- 拉布里奥拉, 阿尔图罗 (Labriola, Ar-

- turo 1873—1959)——第 8 页。
- 拉狄克, 卡尔·别隆加尔道维奇 (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85—1939)——第 620 页。
-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第 205—206, 255, 548, 580 页。
- 拉法格, 劳拉 (Lafargue, Laura 1845—1911)——第 580 页。
- 拉芬-杜然斯, 让·比埃尔 (Raffin-Dugens, Jean-Pierre 生于 1861 年)——第 911, 913, 915 页。
- 拉格朗日, 约瑟夫·路易 (Lagrange, Joseph-Louis 1736—1813)——第 304 页。
- 拉葛德尔, 于贝尔 (Lagardelle, Hubert 1874—1958)——第 8 页。
- 拉赫美托夫, 恩·(Рахметов, Н. 生于 1886 年) (真名勃柳姆, 奥斯卡·Блюм, Оскар)——第 11, 235 页。
- 拉吉舍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Радищ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49—1802)——第 610 页。
- 拉柯夫斯基, 克利斯提安·格奥尔基也维奇 (Раков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3—1941)——第 681 页。
- 拉林, 尤里 (Ларин, Юрий 1882—1932) (真名卢利叶,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Лурье,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第 407—414, 475 页。
- 拉摩, 约瑟夫 (Larmor, Joseph 1857—1942)——第 263, 270 页。
- 拉姆赛, 威廉 (Ramsay, William 1852—1916)——第 319 页。
-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第 514, 605, 637, 711, 855 页。

- 拉斯, 恩斯特 (Laas, Ernst 1837—1885) ——第 97, 209, 214 页。
- 拉瓦锡, 安都昂·罗朗 (Lavoisier, Antoine-Laurent 1743—1794) ——第 258 页。
- 莱尔, 雷金纳德·约翰 (Ryle, Reginald John 1854—1922) ——第 186 页。
- 莱克列尔, 安东·冯 (Leclair, Anton von 1848—1919) ——第 66, 182, 201—202, 212—213, 216—219, 235—236, 239, 241, 246—248, 254, 352, 355 页。
- 莱维, 阿尔伯 (Lévy, Albert) ——第 102—104 页。
- 莱伊, 阿贝尔 (Rey, Abel 1873—1940) ——第 259—264, 266, 269—271, 292, 299—305, 311—314, 315, 317 页。
- 兰斯堡, 阿尔弗勒德 (Lansburgh, Alfred 1872—1940) ——第 753, 755, 758, 779, 820, 829, 832—835 页。
-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 ——第 97, 204, 209, 214, 289, 310—311, 314, 333—335, 344 页。
- 朗之万, 保尔 (Langevin, Paul 1872—1946) ——第 266, 270 页。
- 劳, 阿尔勃莱希特 (Rau, Albrecht 1843—1920) ——第 204—205, 240—241, 366 页。
- 劳合-乔治, 戴维 (Lloyd George, David 1863—1945) ——第 625, 633, 784, 895—897 页。
- 劳拉——见拉法格, 劳拉。
- 勒卢阿, 爱德华 (Le Roy, Edouard 1870—1954) ——第 297—299 页。
- 雷姆克, 约翰 (Rehmke, Johannes 1848—1930) ——第 66, 182, 202, 212, 216—217, 233, 284, 311, 355, 357 页。
- 雷诺维叶, 沙尔·贝尔纳 (Renouvier, Charles Bernard 1815—1903) ——第 29, 210, 214—216, 236 页。
- 雷帖尔恩 (Рейтерн 死于 1861 年) ——第 421 页。
- 累德堡, 格奥尔格 (Ledebour, Georg 1850—1947) ——第 903, 911 页。
- 黎尔, 阿路易斯 (Riehl, Alois 1844—1924) ——第 97, 149, 209, 214 页。
-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 ——第 272 页。
- 李伯尔 (Либер 1880—1937) (真名戈德曼, 米哈伊尔·伊萨柯维奇 Гольдман, 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第 556, 558 页。
-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 1871—1919) ——第 659, 667, 704, 908, 910—911, 917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 ——第 109, 411, 605, 669, 677 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第 322, 443, 595 页。
- 李凯尔, 阿瑟·威廉 (Rücker, Arthur William 1848—1915) ——第 280—286 页。
- 李普曼, 奥托 (Liebmann, Otto 1840—1912) ——第 97 页。
- 李普曼, 弗·(Либман, Ф. 生于 1882 年) (真名格尔什, 普·耳·Герш, П. Л.) ——第 507—508, 512, 529—530, 535, 542—543, 554, 560—561, 563, 567, 725 页。
- 里季斯 (Lysis) (真名累太叶尔, 欧仁 Le-tailleux, Eugène) ——第 775—776 页。
- 里谢尔, 雅科布 (Riesser, Jakob 1853—

- 1932) ——第 745, 748, 754—755, 757, 761—762, 764, 769, 784, 787, 790, 793, 838—839, 842, 844 页。
- 利夫曼, 罗伯特 (Liefmann, Robert 1874—1941) ——第 745—746, 751, 754, 767, 769—770, 778, 794—795 页。
- 利希, 奥古斯托 (Righi, Augusto 1850—1921) ——第 264—266, 269 页。
- 连施, 保尔 (Lensch, Paul 1873—1926) ——第 621, 628, 646, 676, 723, 853, 892 页。
- 梁赞诺夫, 达维德·波利索维奇 (Рязанов, 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1870—1938) (戈尔登达赫 Гольдендах) ——第 506, 863 页。
- 列布申斯基,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 (Рябушинский,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生于 1871 年) ——第 773 页。
- 列金, 卡尔 (Legien, Carl 1861—1920) ——第 646, 654, 658, 660—662, 704, 848, 853—854, 858, 878, 889, 896, 910—912, 915, 917 页。
- 列诺得尔, 比埃尔 (Renaudel, Pierre 1871—1935) ——第 725, 896—897, 913, 915, 917 页。
- 列斯居尔, 让 (Lescure, Jean 1882—1947) ——第 757 页。
- 列维, 海尔曼 (Levy, Hermann 生于 1881 年) ——第 742 页。
- 列维茨基 (Левицкий 生于 1883 年) (真名策杰尔包姆, 弗拉基米尔·奥西波维奇 Цедербаум, Владимир Осипович) ——第 406, 413, 465 页。
- 列文斯基, 符·(Левинский, В. 生于 1880 年) ——第 561 页。
- 列谢维奇, 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 (Лес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1837—1905) ——第 51, 193, 210, 213, 325 页。
- 烈格尔, 塔捷乌什 (Reger, Tadeusz 1872—1938) ——第 520 页。
- 林肯, 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第 829 页。
- 留西耶, 昂利 (Russier, Henri) ——第 805 页。
- 龙格, 让·罗朗·弗雷德里克 (Longuet, Jean-Laurent-Frederick 1876—1938) ——第 580, 878, 913, 915 页。
-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3—1903) ——第 548, 580 页。
- 龙格, 燕妮 (Longuet, Jenny 1844—1883) ——第 580 页。
-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第 577 页。
- 卢卡斯, 查尔斯·普雷斯特伍德 (Lucas, Charles Prestwood 1853—1931) ——第 649, 802 页。
- 卢那察尔斯基, 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5—1933) ——第 12—13, 74, 76, 189—190, 288, 333, 350, 352—353, 357, 382 页。
-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 1871—1919) (笔名尤尼乌斯 Junius) ——第 506, 507—567, 617, 639, 643—644, 846—860, 872 页。
- 鲁巴诺维奇, 伊里亚·阿多尔佛维奇 (Рубанович, Илья Адольфович 1860—1920) ——第 609, 686, 727 页。
- 路加, 艾米尔 (Lucka, Emil 1877—1941) ——第 92, 167, 195 页。
- 路特希尔德 (Rothschild) ——第 791 页。
- 吕多尔费尔 (Ruedorffer 1882—1955) (真名里茨列尔, 库尔特 Riezler, Kurt)

- 第 650 页。
 吕勒, 奥托 (Rühle, Otto 1874—1943)
 ——第 848 页。
 伦纳, 卡尔 (Renner, Karl 1870—1950)
 ——第 684, 719 页。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
 第 205, 628 页。
 罗得斯, 谢西尔·约翰 (Rhodes, Cecil John 1853—1902) ——第 798—799,
 804 页。
 罗狄埃, 若尔日 (Rodier, Georges 1848—1910) ——第 228 页。
 罗迪切夫, 费多尔·伊兹马伊洛维奇 (Родичев, Федор Измаилович 生于 1856 年) ——第 610 页。
 罗兰-霍斯特, 亨利埃特 (Roland-Holst, Henriette 1869—1952) ——第 680 页。
 罗仑兹, 亨德里克·安东 (Lorentz, Hendrik Antoon 1853—1928) ——
 第 263, 270 页。
 罗曼诺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
 见尼古拉二世。
 罗曼诺夫王朝 (Романовы) ——第 421,
 667, 685 页。
 罗普申 (Ропшин 1879—1925) (真名萨
 文柯夫, 波利斯·维克多罗维奇
 Савинков, 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
 第 628 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翰·卡尔
 (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 ——第 427, 595 页。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
 ——第 24, 125 页。
 洛克菲勒, 约翰·戴维逊 (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1839—1937) ——第
 762, 791—792 页。

- 洛帕廷, 格尔蒙·亚历山大罗维奇 (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 ——第 546—547 页。
 洛帕廷, 列甫·米哈伊洛维奇 (Лопатин, 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5—1920) ——
 第 306—308, 310, 350, 360 页。
 洛治, 奥利弗·约瑟夫 (Lodge, Oliver Joseph 1851—1940) ——第 92, 266,
 288, 356 页。

M

- 马尔丁诺夫, 亚·(Мартынов, А. 1865—1935) (真名皮凯尔, 亚历山大·萨
 莫依洛维奇 Пикер, 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第 465, 506, 557 页。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第
 335 页。
 马尔托夫, 尔·(Мартов, Л. 1873—
 1923) (真名策杰尔包姆, 尤利·奥西波
 维奇 Цедербаум, 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笔名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 Нардис
 Тупорылов; 尔·马·Л. М.) ——第
 406, 411—414, 465, 489, 494, 562, 645,
 647, 704, 826, 843, 856, 859, 878, 885,
 888 页。
 马赫, 恩斯特 (Mach, Ernst 1838—1916)
 ——第 11, 16—17, 21—22, 29, 33—
 42, 45—50, 52—60, 62—64, 67—68,
 70, 72—74, 76, 83—84, 88—89, 91—
 94, 101, 104—106, 109—110, 112, 114,
 124—128, 136—141, 145—147, 149—
 151, 159—162, 165, 167—168, 170—
 174, 176, 179—186, 188, 190, 192—
 197, 201—202, 207—215, 217—230,
 235—236, 241—244, 246—248, 252—
 255, 260, 262—263, 275, 278, 285, 289

- 290, 294—297, 300—305, 308—312, 316—317, 324—325, 328, 336, 346, 348—356, 358, 360, 362, 364, 366—367 页。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第1—5, 8—9, 12—13, 35, 42, 46—47, 50, 61, 80, 96, 101—104, 116, 134—139, 141, 143, 147, 159—160, 163, 170, 174, 186, 192, 199, 204—205, 207, 220, 244—246, 248—249, 252—255, 259, 268—269, 275, 304, 315, 320—325, 328, 330—331, 334—338, 340—341, 343—344, 346, 349, 351—354, 364, 368, 375, 377—379, 385, 418, 427, 430, 437—440, 441—446, 453, 456, 511, 514, 544—554, 575—606, 611—612, 617, 626—627, 629, 639, 642, 644, 668, 673, 676—677, 681, 684, 712—714, 719, 722—723, 725, 741—743, 759, 825, 845, 855—857, 861—863, 884, 889—891, 896—897 页。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第577, 579—580 页。
- 马克思-艾威林, 爱琳娜 (Marx-Aveling, Eleanor 1855—1898) (杜西 Tussy) ——第580 页。
- 马肯晋, 奥古斯特 (Mackensen, August 1849—1945) ——第694 页。
- 马隆, 贝努瓦 (Malon, Benoît 1841—1893) ——第205 页。
- 马斯洛夫, 彼得·巴甫洛维奇 (Маслов,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1867—1946) ——第573, 609, 687, 799, 826 页。
- 马耶夫斯基, 叶甫盖尼 (Маевский, Евгений 1875—1918) (真名古托夫斯
- 基, 维谦提·阿尼采托维奇 Гутковский, Викентий Анищетович) ——第472 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第547, 579 页。
- 迈尔, 尤利乌斯·罗伯特 (Mayer, Julius Robert 1814—1878) ——第311 页。
- 迈尔西埃, 路易·塞巴斯提安 (Mercier, Louis-Sébastien 1740—1814) ——第205 页。
- 迈拉, 巴托罗缪 (Mayéras, Barthelemy 生于1879年) ——第878 页。
- 迈耶尔, 恩斯特 (Meyer, Ernst 生于1888年) ——第911 页。
- 麦克斯韦, 詹姆斯·克拉克 (Maxwell, James Clerk 1831—1879) ——第263, 270, 304—305 页。
- 麦克唐纳, 詹姆斯·拉姆赛 (MacDonald, James Ramsay 1866—1937) ——第735, 878 页。
- 曼, 汤姆 (Mann, Tom 1856—1941) ——第890 页。
- 曼塔舍夫 (Мангашев) ——第791 页。
- 梅尔黑姆, 阿尔方斯 (Merrheim, Alphonse 1881—1925) ——第909—913, 915 页。
- 梅林, 弗兰茨 (Mehring, Franz 1846—1919) ——第13, 255, 363, 617, 639, 643—644, 846 页。
- 门格尔, 安东 (Menger, Anton 1841—1906) ——第328 页。
- 弥勒, 约翰内斯·彼得 (Müller, Johannes Peter 1801—1858) ——第310 页。
- 米尔柏格, 阿尔都尔 (Mülberger, Arthur 1847—1907) ——第2 页。
-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

тинович 1842—1904) ——第 207—208, 333 页。

米勒兰, 亚历山大·埃蒂耶纳(Millerand, Alexandre-Etienne 1859—1943) ——第 628, 735 页。

米留可夫, 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Милю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9—1943) ——第 476, 901 页。

米涅, 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e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 ——第 587 页。

缅施科夫, 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Меньшиков, Михаил Осипович 1859—1919) ——第 68, 128, 215, 609 页。

摩尔根, 柯内·劳埃德(Morgan, Conwy Lloyd 1852—1936) ——第 40, 185 页。

摩根, 约翰·皮尔庞特(Morgan, John Pierpont 1867—1943) ——第 762 页。

摩莱肖特, 雅科布(Moleschott, Jacob 1822—1893) ——第 42, 245, 336, 582 页。

莫吉梁斯基,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Могиланский,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3—1942) ——第 527—528 页。

莫利斯, 亨利·克·(Morris, Henry C. 生于 1868 年) ——第 797 页。

莫尼托尔(Monitor) ——第 654, 696 页。

莫斯特, 约翰(Most, Johann 1846—1906) ——第 383, 396, 606 页。

墨索里尼, 本尼托(Mussolini, Benito 1883—1945) ——第 690 页。

穆拉诺夫,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Муранов, 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73—1959) ——第 476, 478—479, 662, 690 页。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第 106, 145, 276, 302 页。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第 131, 136, 143, 184, 850 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第 417, 627, 669, 677 页。

奈马尔克, 阿尔弗勒德(Neymarck, Alfred) ——第 781, 784, 829—830 页。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1868—1918)(罗曼诺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Рома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第 570, 609, 611—612, 626, 867, 900—901 页。

涅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Не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76—1937) ——第 15 页。

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维萨里昂诺维奇(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生于 1879 年) ——第 531 页。

涅纳罗科莫夫, 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Ненарскомов, 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生于 1874 年) ——第 689 页。

牛顿, 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 ——第 180, 258, 311 页。

诺贝尔(Nobel) ——第 791 页。

诺克斯, 霍华德(Knox, Howard 生于 1868 年) ——第 228 页。

诺斯克, 古斯塔夫(Noske, Gustav 1868—1946) ——第 736 页。

O

欧文斯, 迈克尔·约瑟夫(Owens, Mi-

chael Joseph 1859—1923)——第 818 页。

Р

帕尔乌斯(Параус 1869—1924)(真名格
尔方德, 亚历山大·拉札列维奇 Гель-
фанд,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заревич)——
第 725 页。

帕土叶, 约瑟夫 (Patouillet, Joseph)
——第 829 页。

派施, 乔治 (Paish, George 1867—1957)
——第 625, 633, 784, 787 页。

潘涅库克, 安东尼 (Pannekoeck, An-
toinie 1873—1960)(笔名霍纳, 克·
Horner, K.)——第 392, 394, 396,
620, 652, 681 页。

彭加勒, 昂利 (Poincaré, Henri 1854—
1912)——第 25, 47, 166, 184, 258—
259, 262—263, 269, 280, 284—285,
289, 297—299, 303, 305, 309, 312, 315,
317, 349—350 页。

彭加勒, 雷蒙 (Poincaré, Raymond 1860
—1934)——第 570, 867 页。

彭加勒, 律西安·安都昂 (Poincaré, Lu-
cien-Antoine 1862—1920)——第 304
页。

皮浪 (Pyrrhon 约公元前 365—275)——
第 140, 206 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第
548—549, 577, 579 页。

普雷斯曼, 阿德里安 (Pressemane, Ad-
rien 1879—1929)——第 878 页。

普利什凯维奇, 弗拉基米尔·米特罗范诺
维奇 (Пуришк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Мит-
рофанович 1870—1920)——第 201,
429—431, 463, 530—531, 535, 562,

564—566, 611—612 页。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笔名别尔托夫, 恩·
Бельтов, Н.; 沃尔金, 阿·Волгин,
А.; 卡缅斯基, 恩·Каменский, Н.)
——第 3—4, 16—17, 20, 52, 78—80,
83, 95—98, 101—102, 107, 109, 114,
120—121, 141, 146, 151—154, 199,
237—238, 244, 255, 257, 362, 460, 476
—477, 496, 529, 554—555, 557, 561,
573, 609, 613, 615—618, 621, 623—
628, 643, 645—646, 651, 653—654,
656, 654, 673, 676, 680, 682, 690—692,
697, 702, 704, 711, 714, 727, 770, 799,
856, 858—859, 878, 889, 896 页。

普罗柯波维奇, 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Прокопович,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1—1955)——第 477 页。

Q

齐赫泽, 尼古拉·谢明诺维奇 (Чхеидзе,
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1864—1926)
——第 496, 688, 690, 700, 704, 826,
856, 859, 878, 894, 896 页。

齐亨, 泰奥多尔 (Ziehen, Theodor 1862
—1950)——第 227, 236 页。

契尔施基, 齐格弗里特 (Tschierschky,
Siegfried 生于 1872 年)——第 746,
758—759 页。

契恒凯里, 阿卡基·伊万诺维奇 (Чхен-
кели, Акакий Иванович 1874—1959)
——第 704, 826, 856, 859, 889 页。

乔治, 亨利 (George, Henry 1839—
1897)——第 427 页。

乔治五世 (George V 1865—1936)——
第 867 页。

切尔诺夫,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 (Чер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6—1952) (笔名加尔迭宁, 尤·Гарденин, Ю.) ——第 16、95—99、101—102、109、114、127、133、136、188、193、207、215、219、320、627—628 页。

切列万宁, 恩·(Череванин, Н. 1868—1938) (真名利普金, 费多尔·安得列也维奇 Липкин, Фе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第 687、700 页。

R

饶尔丹尼亚, 诺依·尼古拉也维奇 (Жордания, Но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0—1953) (笔名柯斯特罗夫 Костров, 安恩 Ан) ——第 466、474、497、556、704 页。

饶勒斯, 让 (Jaurès, Jean 1859—1914) ——第 205 页。

热里雅鲍夫, 安得列依·伊万诺维奇 (Желябов,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1850—1881) ——第 628 页。

茹奥, 莱昂 (Jouhaux, Léon 1879—1954) ——第 909—913、915 页。

S

萨尔梯柯夫-谢德林,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1826—1889) ——第 503、531 页。

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斯豪森, 奥古斯特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August 1852—1938) ——第 649、805、819 页。

萨兰德拉, 安东尼奥 (Salandra, Antonio 1853—1931) ——第 628 页。

萨温科, 安那托里·伊万诺维奇 (Савен-

ко, 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ич 生于 1874 年) ——第 533 页。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extus Empiricus 二世纪) ——第 140 页。

塞曼, 彼得 (Zeemann, Pieter 1865—1943) ——第 296 页。

桑巴, 马赛尔 (Sembat, Marcel 1862—1922) ——第 653—654、662、690、695、858、878、904、911、915 页。

桑巴特, 威纳尔 (Sombart, Werner 1863—1941) ——第 777 页。

沙多勃利昂,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1768—1848) ——第 205 页。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第 604 页。

舍印芬克尔, 米朗·康斯坦丁诺维奇 (Шейнфинкель, Миро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79—1925) (笔名耳·弗拉·Л. Вл.) ——第 524、552 页。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 ——第 845 页。

施达克, 卡尔·尼古拉 (Starcke, Carl Nikolaus 1858—1926) ——第 208—209 页。

施尔德尔, 济格蒙德 (Schilder, Sigmund 死于 1932 年) ——第 784、786、803、805—806、819、838 页。

施米特, 亨利希 (Schmidt, Heinrich 1874—1935) ——第 356 页。

施奈德 (Schneider) ——第 786 页。

施什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Шишк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0—1906) ——第 306—308 页。

施泰因, 罗伦兹 (Stein, Lorenz 1815—1890) ——第 584 页。

施提利希, 奥斯卡尔 (Stillich, Oskar 生

- 于 1872 年)——第 761、766、777—778 页。
- 施维格勒, 阿尔伯特 (Schwegler, Albert 1819—1857)——第 130、713 页。
- 什塔乌斯, 艾米尔·格奥尔格 (Stauß, Emil Georg 生于 1877 年)——第 792 页。
- 什特列别尔, 亨利希 (Ströbel, Heinrich 1869—1945)——第 655、846、848—849 页。
- 叔本华, 阿尔都尔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第 194、209、233 页。
- 舒伯特-索尔登, 理查 (Schubert-Soldern, Richard 1852—1935)——第 66、72、82、182、212—214、216—217、219—221、236、254—255、330—332、352、355 页。
- 舒尔采, 恩斯特 (Schulze, Ernst 1874—1943)——第 635 页。
- 舒尔采-格弗尼茨, 格哈特 (Schulze-Gaevernitz, Gerhart 1864—1943)——第 754、756、761—763、767、769—770、805、819—820、823—824、844—845 页。
- 舒尔兹, 哥特利勃·恩斯特 (Schulze, Gottlieb Ernst 1761—1833)——第 140—141、187、197—199、201 页。
- 舒佩, 威廉 (Schuppe, Wilhelm 1836—1913)——第 11、66、68—69、74、82、110、182、212—214、216—219、222、227—228、233、235、248、330、352、362 页。
- 司徒卢威, 彼得·别隆加尔道维奇 (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第 68、215、352、404、470—471、474、544、628 页。
- 斯彼克塔托尔 (Спектатор 1880—1938) (真名纳希姆桑, 米朗·伊萨柯维奇 Нахимсон, Мирон Исаакович)——第 830、832、835、854、885—886 页。
- 斯宾诺莎, 巴鲁赫 (别涅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第 714 页。
-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第 208、228、333 页。
- 斯柯别列夫,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 (Скобелев, 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5—1939)——第 826、859、894 页。
- 斯米尔诺夫, 耶·(Смирнов, Е. 生于 1865 年) (真名古烈维奇, 艾曼努伊尔·李沃维奇 Гуревич, Эммануил Львович)——第 573、609 页。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第 443、592 页。
- 斯密斯, 诺曼·凯姆普 (Smith, Norman Kemp 1872—1958)——第 66、68、88、149 页。
- 斯奈德, 卡尔 (Snyder, Carl 生于 1869 年)——第 360—361 页。
- 斯塔洛, 约翰·贝尔纳德 (Stallo, John Bernard 1823—1900)——第 316—317 页。
- 斯特德, 威廉·托马斯 (Stead, William Thomas 1849—1912)——第 799 页。
- 斯提尤尔美尔, 波利斯·弗拉基米罗维奇 (Штюмер, Борис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48—1917)——第 900 页。
- 斯托雷平, 彼得·阿尔卡季也维奇 (Столыпин,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1862—1911)——第 224、372、387、390、411、413、494 页。
- 苏尔科夫, 彼得·伊里奇 (Сурков, Петр Ильич 1876—1946)——第 375、385 页。

- 苏格拉底(Sokrates 约公元前 469—399)
——第 81 页。
- 苏潘, 亚历山大(Supan, Alexander 1847—1920)——第 796、799—800 页。
- 苏沃洛夫,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Суворов,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9—1918)——第 12—13、337—342 页。
- 孙中山(1866—1925)——第 423—428 页。
- 索列尔, 若尔日(Sorel, Georges 1847—1922)——第 299 页。
- 索洛维约夫,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也维奇(Соловье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1853—1900)——第 306 页。

T

- 塔尔海麦, 奥古斯特(Thalheimer, August 1884—1948)——第 846 页。
- 塔菲尔, 保尔(Tafel, Paul)——第 747 页。
- 泰勒斯(Thales 约公元前 624—547)——第 289 页。
- 汤姆生, 威廉, 凯尔文勋爵(Thomson, William, Lord Kelvin 1824—1907)——第 263、270 页。
- 汤姆生, 约瑟夫·约翰(Thomson, Joseph John 1856—1940)——第 266 页。
- 唐恩, 费·伊·(Дан, Ф. И. 1871—1947)(真名古尔维奇, 费多尔·伊里奇 Гурвич, Федор Ильич)——第 407、451、464、465、472、475、491、497、499 页。
- 特雷维斯, 克罗狄奥(Treves, Claudio 1868—1933)——第 878 页。
- 特列波夫, 阿·弗·(Трепов, А. Ф. 1862—1928)——第 900 页。
- 特鲁别茨科伊, 叶甫盖尼·尼古拉也维奇(Трубецкой, 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 1863—1920)——第 517 页。
- 特鲁尔斯特拉, 彼得·叶勒斯(Troelstra, Pieter Jelles 1860—1930)——第 652、695 页。
- 梯也尔, 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第 587 页。
- 梯叶里, 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Thierry, 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第 587 页。
- 提莫什金, 弗·弗·(Тимошкин, Ф. Ф. 生于 1872 年)——第 471 页。
- 屠格涅夫, 伊万·谢尔盖也维奇(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8—1883)——第 85、97、339、420—421 页。
- 屠拉梯, 菲力浦(Turati, Filippo 1857—1932)——第 903、905—909、914、917 页。
- 土利亚科夫, 伊·恩·(Тулякxв, И. Н. 生于 1877 年)——第 496 页。
- 托尔斯泰, 列甫·尼古拉也维奇(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10)——第 369—374 页。
- 托洛茨基, 列甫·达威多维奇(Троцкий,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第 463、467、485—493、495—506、559—560、564、680、702—704、885、888 页。
- 托马, 阿尔伯(Thomas, Albert 1878—1932)——第 735、878、915、917 页。
- 陀思妥也夫斯基,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1—1881)——第 481 页。

W

- 瓦尔, 莫·(Wahl, M.)——第 805 页。
- 瓦尔沙夫斯基, 阿道夫(Warszawski, Adolf 1868—1937)——第 555—556 页。

瓦连廷诺夫 (Валентинса 1879—1964) (真名沃尔斯基, 尼古拉·弗拉基斯拉沃维奇 Воль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第 11, 12—13, 16, 33, 82, 95, 150, 153—154, 188, 199, 215, 219, 235, 244, 252, 264—265, 268—269, 309 页。

瓦扬, 爱德华 (Vaillant, Edouard 1840—1915) ——第 643, 645—646, 652, 690, 695 页。

瓦-拉维斯泰因, 威廉 (Van Ravestejn, Willem 生于 1876 年) ——第 447 页。

王德威尔得, 艾米尔 (Vandervelde, Emile 1866—1938) ——第 8, 617, 653—654, 662, 689, 692, 695, 703, 725, 878, 916 页。

威尔逊, 托马斯·伍德罗 (Wilson, Thomas Woodrow 1856—1924) ——第 905—906, 913—914 页。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859—1941) ——第 568, 626, 729, 779, 867, 901 页。

维伯, 比阿特里萨 (Webb, Beatrice 1858—1943) ——第 892 页。

维伯, 悉尼·詹姆斯 (Webb, Sidney James 1859—1947) ——第 892 页。

维尔纳茨基,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Вернад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63—1945) ——第 307 页。

维利, 鲁道夫 (Willy, Rudolf 1855—1920) ——第 43, 55, 69—71, 75—78, 81, 90, 165, 210, 213—214, 354, 360, 362 页。

维利希, 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第 604 页。

文德尔班, 威廉 (Windelband, Wilhelm 1848—1915) ——第 209 页。

乌尔维格, 路易 (Houllevigue, Louis

1863—1944) ——第 264 页。

X

西门子·格奥尔格 (Siemens, Georg 1839—1901) ——第 770 页。

西尼耳, 纳骚·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第 138 页。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 ——第 884 页。

希本, 约翰·格里尔 (Hibben, John Grier 1861—1933) ——第 278 页。

希尔, 戴维·杰恩 (Hill, David Jayne 1850—1932) ——第 838 页。

希尔德布兰德, 格尔哈特 (Hildebrand, Gerhard) ——第 822—823 页。

希法亭, 鲁道夫 (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 ——第 736, 738, 741, 768, 774—775, 777, 784, 804, 817, 830—831, 839, 886, 888 页。

谢德林——见萨尔梯柯夫-谢德林。

谢德曼, 菲利浦 (Scheidemann, Philipp 1865—1939) ——第 646, 654, 662—663, 694—695, 736, 878, 896—897, 910—911, 915 页。

谢多夫, 耳·——见柯里佐夫。

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Серно-Соловье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8—1869) ——第 419 页。

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1775—1854) ——第 92, 343, 367 页。

谢姆柯夫斯基 (Семковский 生于 1882 年) (真名勃朗施坦, 谢明·尤里也维奇 Бронштейн, Семен Юльевич) ——

第 467, 496, 507—508, 512, 523, 529—530, 535, 542—543, 554, 561—564, 725 页。

兴登堡, 保尔 (Hindenburg, Paul 1847—1934)——第 694, 729 页。

休谟, 大卫 (Hume, David 1711—1776)——第 10, 27—30, 47, 60, 62, 96—100, 105, 111, 114, 125—126, 135, 137, 140—141, 156, 159—160, 162—163, 165, 167—168, 170, 185, 187, 196, 199, 201, 204, 206, 208—210, 214, 217, 223, 253, 302, 317, 344, 364, 582, 714 页。

休特古姆, 阿尔伯特 (Sudekum, Albert 1871—1944)——第 622, 639, 643, 653—654, 662—663, 665, 690, 694, 697, 799, 910—911, 915, 917 页。

许布纳尔, 奥托 (Hübner, Otto)——第 800 页。

Y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第 711, 713 页。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第 419—420 页。

燕妮——见 龙格, 燕妮。

耶鲁萨伦姆, 威廉 (Jerusalem, Wilhelm 1854—1923)——第 92, 149, 255 页。

叶尔曼斯基, 阿·(Ерманский, А. 1866—1941) (真名科甘, 奥西普·阿尔卡季也维奇 Коган, Осип Аркадьевич, 笔名古什卡 Гушка)——第 451—456 页。

叶夫洛吉 (Евлогий 生于 1868 年) (真名格奥尔基也夫斯基, 瓦西里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第 139 页。

叶若夫 (Ежов 1879—1939) (真名策杰尔包姆, 谢尔盖·奥西波维奇 Целербаум

Сергей Осипович)——第 465 页。

伊壁鸠鲁 (Эпикурос 约公元前 341—270)——第 576 页。

伊兹哥也夫 (Изгоев 生于 1872 年) (真名兰捷, 亚历山大·索洛莫诺维奇 Ланде,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омонович)——第 404, 433 页。

尤尔凯维奇 (Юркевич 1885—1918) (真名雷巴尔卡, 列甫 Рыбалка, Лев)——第 507—508, 512, 529—530, 535, 542—543, 554, 560—561, 563, 725 页。

尤尼乌斯——见 卢森堡。

尤什凯维奇, 巴维尔·索洛莫诺维奇 (Юшкевич, Паве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3—1945)——第 11—13, 16—17, 24—25, 56—57, 61, 65, 95, 150, 166—169, 174—175, 177, 199, 207—209, 235, 256, 268—269, 279, 281, 288, 298, 309, 338, 353 页。

宇伯威格, 弗里德里希 (Überweg, Friedrich 1826—1871)——第 195 页。

袁世凯 (1859—1916)——第 425, 428, 450 页。

约德尔, 弗里德里希 (Jodl, Friedrich 1849—1914)——第 81 页。

Z

詹姆斯, 威廉 (James, William 1842—1910)——第 349 页。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 1836—1914)——第 799 页。

仲马, 沙尔 (Dumas, Charles 1833—1914)——第 616 页。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第 606, 890 页。